



追溯近现代中国起源与历史

——现代化中国的起源与简史，以及东西方世界

【一个基督徒的视角】

【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现代化起源、历史、思想、轨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法律、民情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明体系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冲击、影响、等复杂关系】

第五章（中）

2020年9月

目录

大西洋宪章	第 5 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因、过程、简史、后果	第 83 页
国军抗战历史	第 314 页
汪伪政权	第 364 页
中共的壮大	第 373 页
苏联与中国	第 375 页
美国与中国	第 410 页
日本与中国	第 422 页
二战期间的国共两党关系	第 433 页
满洲国	第 436 页
抗战期间的中国文化与思想	第 468 页
抗战期间中国的基督教信仰的发展	第 527 页
朝鲜、台湾、港澳、南洋、等地	第 582 页
韩国基督教信仰简史	第 671 页
日本的宗教信仰	第 706 页

台湾的宗教信仰。。。。。。。。。。。。。。。。。。。。第 723 页

香港以及珠江三角洲一带地区的人民的宗教信仰。。。。第 741 页

追溯近现代中国起源与历史

——现代化中国的起源与简史，以及东西方世界

【一个基督徒的视角】

【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现代化起源、历史、思想、轨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法律、民情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明体系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冲击、影响、等复杂关系】

2020年9月

=====

+++++

+++++

+++++

+++++

+++++

+++++

+++++

+++++

+++++

【引述 《论民主》 在现代世界民主政治制度起源之历史上的几件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及其相关反思】

民主的起源

仅仅一百多年前，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包括欧洲的许多国家，还都是专制主义制度的国家。那时，只有英美等为数不多的、几个主要的领导国家采取的是现代民主主义制度。然而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包括非洲、南美洲、亚洲的等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已经转型成为现代民主主义制度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尤其是二战以后的七十年中，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现代世界上的主要国家中，最早实行系统化现代民主主义制度的国家是美国。美国的国家制度，是由四百年前那些离开英国、追求基督教信仰自由的清教徒们以及他们的后代所建立起来的。1776年7月4日，是美国的建国日，因为在那一天，美国人民宣布了独立宣言，正式脱离英国政府的统治，而成立了世上最早的一个现代民主主义体制的国家，即，“自由圣洁之民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国家。

现代民主制度的起源，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现代民主制度起源历史中，有几个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值得后人深切纪念。

第一件事情是八百年前的英国《大宪章》的颁布。

英国大宪章，中世纪拉丁文全称是Magna Carta Libertatum，意思是“关于自由的大宪章”，通常简称为Magna Carta，即“大宪章”，是公元1215年6月

15日由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所起草的、英国国王与英国贵族们之间的和平协约。它的内容包含了保护基督教会权利，保护英国贵族免被非法监禁，保证公正法律，等等重要原则性内容。

订立《大宪章》的主因是教宗、英王约翰及封建贵族对王室权力出现意见分歧。《大宪章》要求王室放弃部分权力，保护教会的权力，尊重司法过程，接受王权受法律的限制。《大宪章》是英格兰议会接收国王行政及立法权的起点。

诺曼人于1066年开始入侵英格兰，在征服者威廉成为英国的国王后，于十一及十二世纪逐渐强大。他们建立的集权政府，加上本地盎格鲁-撒克逊人原来的统治方法，还有盎格鲁人和诺曼人在诺曼底所拥有的土地，使英国国王在1199年成为欧洲最有权力国王。当英王约翰在十三世纪初即位之后，一连串的事件却令英格兰的封建贵族起来反抗他，并要求限制绝对的王权。

1215年6月10日，约翰与反叛者的首领在兰尼米德会晤。兰尼米德距温莎城堡的皇家森林和反叛者在斯坦斯的大本营都不远。反叛者向约翰出示了他们起草的改革要求草案，也就是《男爵法案》。在接下来的十天中，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朗顿将“男爵法案”的条款转换成了一份停战协定，也

就是后来的《大宪章》。6月19日，反叛者重新宣誓效忠约翰国王，《大宪章》的抄本被分发至各地。

1215年的《大宪章》确立了一些英国贵族享有的政治权利与自由，亦保障了教会不受国王的控制；同时改革了法律和司法，限制了国王及王室官员的行为。宪章内大部分的内容是从亨利一世时所颁布的《自由宪章》抄写过来。《自由宪章》是亨利一世1100年加冕时颁布，它限制了国王如何对待教会及贵族，基本上给予了教会及贵族一定的权利。

最初的《大宪章》有六十三条条款，当中大部分是针对十三世纪当时的状况而订，例如限制王室狩猎范围等等。而当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第三十九条，由它衍生了人身保护的概念：“除非经过由普通法官进行的法律审判，或是根据法律行事，否则任何自由的人，不应被拘留或囚禁、或被夺去财产、被放逐或被杀害”。根据这个条文的规定，国王若要审判任何一个人，只能依据法律；而不能以他的私人喜好来进行。

英国国王约翰死后，亨利三世的摄政政府为了争取支持，在删除了一些比较极端的条款后，于1216年重新颁布了《大宪章》。到1217年第一次诸侯战争结束时，亨利三世颁布的《大宪章》成为了停战协议的一部分。1225年，由于资金匮乏，亨利再次颁布了《大宪章》，以此换取征收新税的权

力。

亨利三世的儿子爱德华一世在1297年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爱德华一世确认了《大宪章》从此成为英格兰成文法的一部分。

从此，《大宪章》成为了日后英国政治秩序的基石。

十七世纪，英国处于深刻变革和腾飞时期；在这个期间，《大宪章》发挥了保障私有财产的作用，不允许未经议会同意而任意加税支应战争的开支。根据宪章的内容多次修订而成的法律，保障更多的权利和涵盖更多的人民。1642至1688年，是英格兰议会内阁制度演化的关键期间。最后，英国政治组织形式成为了立法权和行政权相结合、独特的英格兰“君主议会内阁制度”。这吸引了法兰西孟德斯鸠的关注研究；1748年他以匿名发表《论法的精神》；在法兰西大革命后，这演变成现代的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内阁制度的理论依据。1297年发布的《大宪章》至今仍是英国法律的一部分。不少日后的政府宪法，包括《美国宪法》，都是起源自《大宪章》保障私有财产的观念。

以前每次英王发布《大宪章》，都会抄送多份到各地，这些抄本部分被带到北美殖民地，保存至今。约翰于1215年签署的第一份《大宪章》并未被保存下来，只有四份同时期的抄本现仍分别存放在大英图书馆、林肯大教堂和索尔兹伯里大教堂，另外还有13份1297年以前的《大宪章》现也仍被保存。

（维基百科）

第二件事情是1620年的五月花号事件。

十六世纪初的1517年，马丁路德正式在欧洲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基督教宗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十六世纪中叶，英国正式离开天主教，成为了独立的英国教会系统；更重要的是，英文圣经得以正式出版发行；千千万万人开始第一次真正明白了圣经中的话语。从而，开始诞生了英国清教徒运动。这些清教徒们批评天主教以及英国教会系统中的金字塔式权力组织结构，

指责当时教会中所存在的许多腐败现象。在整个十六世纪、以及十七世纪上半叶、直到英国光荣革命时期以前，清教徒们受到历届英国政府的压制、甚至严厉逼迫。

从1620年开始，英国清教徒们陆陆续续地来到北美大陆，寻求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免于压制和逼迫的环境。当时，北美大陆还是一片原始的荒野森林与沼泽之地，还没有任何成型、成规模的经济文化活动等等。在这个移民大潮中，1620年第一批清教徒的历史，最为著名，也最被后世所纪念。

当时，他们乘坐的横跨大西洋的船，叫五月花号。所以五月花号清教徒因此得名。

这些五月花号船上的清教徒们，被称作是pilgrims，意思是“天路者”，或“作寄居、作客旅”的意思；这个词语是来自于圣经希伯来书11章：——

1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的把握，是还没有看见的事的明证。2因着这信心，古人得到了称许。

3因着信，我们就明白宇宙是因着 神的话造成的。这样，那看得见的就是从那看不见的造出来的。

4因着信，亚伯比该隐献上更美的祭品给 神；借着这信心，他被 神称许为义人，这是 神指着他的礼物所作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借着信仍然说话。5因着信，以诺被迁去了，使他不至于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 神把他迁去了。原来在迁去以前，他已经得了 神喜悦他的明证。6没有信，就不能得到 神的喜悦；因为来到 神面前的人，必须信 神存在，并且信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7因着信，挪亚在还没有看见的事上，得了神的警告，就动了敬畏的心，做了一艘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借着这信心，他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因信而来的义。

8因着信，亚伯拉罕在蒙召的时候，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为业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9因着信，他在应许之地寄居，好像是在异乡，与承受同样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住在帐棚里。10因为他等待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 神所设计所建造的。11因着信，甚至撒拉，她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还是能够怀孕，因为她认为那应许她的是信实的。12所以从一个好象已死的人，竟然生出许多子孙来，仿佛天上的星那么众多，海边的沙那么无数。

13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了的，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只不过是从小处看见，就表示欢迎，又承认他们在世上是异乡人，是客旅。14因为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他们在寻求一个家乡。15如果他们怀念已经离开了的地方，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16但是现在他们所向往的，是一个更美的、在天上的家乡。所以，神不以他们称他为神而觉得羞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17因着信，亚伯拉罕在受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就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人，献上了自己的独生子；18论到这个儿子，曾经有话说：“以撒生的，才可以称为你的后裔。”19亚伯拉罕认定，神能使人从死人中复活，因此，就喻意说，他的确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20因着信，以撒给雅各和以扫祝福，论到将来的事。21因着信，雅各临死的时候，分别为约瑟的儿子祝福，又倚着杖头敬拜神。22因着信，约瑟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子民出埃及的事，并且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言。

23因着信，摩西的父母在摩西生下来以后，因为看见孩子俊美，就把他藏了三个月，不怕王的命令。24因着信，摩西长大了以后，就拒绝被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25他宁愿选择和神的子民一同受苦，也不肯享受罪恶中暂时的快乐。26在他看来，为着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注视将来的赏赐。27因着信，他离开了埃及，不怕王的忿怒；因为他坚定不移，就像看见了人不能看见的神。28因着信，他立了逾越节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命的侵犯以色列人的长子。29因着信，他们走过了红海，好象走过旱地一样；埃及人也试着要过去，就被淹没了。30因着信，耶利哥的城墙被围绕了七天，就倒塌了。31因着信，妓女喇合和和平平接待了侦察的人，就没有和那些不顺从的人一起灭亡。

32我还要再说甚么呢？如果再要述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间就不够了。33他们借着信，就战胜了敌国，伸张了正义，得到了应许，堵住了狮子的口，34消灭了烈火的威力，逃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成刚强，在战争中显出大能，把外国的军队击退。35有些妇女得回从死里复活的亲人；但也有些人忍受了酷刑，不肯接受释放，为的是要得着更美的复活。36又有些人遭受了戏弄、鞭打，甚至捆锁、监禁；37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被刀杀死。他们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到处奔跑、受穷乏、遭患难、被虐待；38原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飘流无定，在旷野、山岭、石洞和地穴栖身。

39所有这些人都借着信得了称许，却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40因为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使他们若不跟我们在一起，就不能完全。

这些1620年以及整个十七世纪中来自英国的清教徒们，成为150年后、1776年美国独立建国时的重要基石。当年，五月花号船上的乘客们所签署的著名五月花号公约精神，成为了一百五十年后美国宪法的精神核心所在。当年，1620年来美的五月花号船上，只有102名乘客；而且，第一年冬天由于天气格外寒冷，就有一半人去世。但是，其余的50人在美国所生下的后

代，到今天已经有三千五百万人。在美国国家历史上，这些五月花号后代们成为美国立国的重要中坚力量。在迄今为止的美国五十位左右的历任总统中，大约有五分之一是那50名五月花号乘客的后代。这些五月花号后代中，包含了无数著名医生、律师、各级法官、国会议员、参议员、各级政府部门主管、作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还有无数的护士、教师、教授、各行各业专业人士、演艺界人士，以及无数普通劳动者等等；他们成为美国国家架构中的栋梁。

当然，1620年的那一百名乘客，只是整个十七世纪中来到北美大陆的大批英国清教徒的一个缩影。这些当年的清教徒们不仅奠定了美国立国的坚实基础，不仅他们的后代成为了美国国家力量的中坚和脊梁，而且，他们为后来来到美国的、其他国家的无数移民们做出了杰出的人生榜样。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敬虔而真挚、热忱而专诚的基督徒；他们在家庭中是忠诚而恩爱的丈夫与妻子，是孝敬而顺从的儿女，是仁慈而正义的父母，是彼此相亲相爱的兄弟姐妹。在他们中间，很少有私生活的丑闻；他们在社区中，都是彼此团结、互相尊重、公义而正直的人们。当1776年美国独立建国的时候，绝大多数美国人民都是这样的状态。后来，在十九世纪，美国经济开始大规模腾飞。期间，伴随着持续的、大量的海外移民从欧洲等地来到美国。

到今天为止，美国的民主自我管理政治体制，如果从1620年的五月花号时代开始算起，至今已经有四百年了。美国不仅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变为一个世界上最伟大、最强盛繁荣的国家，而且，美国的民主制度对世界产

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成为了全人类的榜样。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参战、领导作用与英勇贡献，不仅拯救了整个欧洲，也挽救了整个世界。二战以后，美国推动了联合国的成立与《世界人权宣言》等等，使得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如火如荼地传播开来。

今天，美国的民主制度虽然不是完美的，但是，却在人类历史中、世界各个国家中间，是最好的制度之一。美国对于世界的影响、贡献、引领，直到今天也是有目共睹、无可否认的。迄今为止，仍然有数量巨大的美国人在持守着敬虔的基督教信仰，仍然在生活、工作、生命、心灵之中，跟随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慈爱、圣洁公义的脚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

今天，美国是一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人口组成复杂、文化极其丰富和复杂的国家。关于美国本身的复杂特点、历史、人文、政治、信仰等方面，我们会在其它书籍中进行专门讨论。这里就不再赘述。

第三件事情是十七世纪的英国光荣革命。

光荣革命或名誉革命、荣誉革命（英语：Glorious Revolution）发生于1688年到1689年。英国国会中辉格党以及部分支持新教（英国国教）的托利党人联合起义；将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国王驱逐，改由詹姆斯之女玛丽二世与夫婿威廉三世，两伉俪君主共治英国。这场政变以不流血著称。光荣革命诞生了1689年权利法案，是英国君主立宪制形成的重要事件。它通过确认议会对王室的优先地位结束了一个世纪的政治争端，这是在1689年权利法案中确立的一项原则。

议会重掌大权后，1689年1月在伦敦召开的议会全体会议上，宣布詹姆斯二世退位，由威廉和玛丽共同统治英国，称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同时国会向威廉提出《权利宣言》。宣言谴责詹姆斯二世破坏法律的行为；指出以后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赋税；天主教徒不能担任国王；国王不能与天主教徒结婚等。威廉接受宣言提出的要求。宣言于当年10月经议会正式批准定为法律，即《权利法案》。

由于这场革命并未产生死伤（即没有流血——“bloodless”），故称“光荣革命”。至此，代表民意之英格兰国会与代表君主绝对权力之英国国王近半

个世纪的斗争，以议会的胜利而告结束。

这场革命与欧洲大陆上的大同盟战争密切相关，可以被看作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光荣革命后因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立刻决定，帮助被废的詹姆斯二世复位，并在18世纪上半叶，断续地支援詹姆斯党夺取英国王位。所以英国被威廉三世及辉格党势力轻易地带入反法战争当中，英国的反法情绪从此飘高不下，光荣革命可以说开启了1689—1815年英法第二次百年战争（即，在此期间，英法双方之间处于断断续续的、相互敌对的、常常发生小规模武装冲突的状态）。1815年英国最终获胜后，成为主宰世界的日不落帝国。以国际贸易竞争的角度来看，光荣革命反转了前三次英荷战争（1652-1674）中英国与法国联合对抗荷兰的格局，荷兰商人成为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大股东，而英国则学习并引进荷兰先进的金融体制，包括学习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英格兰银行、引入国家公债体系，奠定了英国成为全球贸易帝国的基础。（维基百科）

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关于基督教信仰的时代背景。

公元1646年，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前的著名的威斯敏斯特会议，以及该会议所通过的威斯敏斯特信条的宣言，对于团结英语世界中的基督徒、乃至全世界的信仰纯正的基督徒们，系统化陈述主流纯正的基督徒信仰与教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威斯敏斯特会议本身标志着英国清教徒正式走上了英国社会的主流、主干层面，并成为英国信仰的引领者。

《西敏信条》（英语：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也译为《威斯敏斯特信仰信条》或《韦斯敏斯德信仰信条》。这个信条表达的是通常被称作加尔文主义或新教归正宗的神学。这个信条是在西敏会议（The Westminster Assembly, 1643-1649）上被制定出来的。华腓德博士论到《西敏信条》说：“这是人所构思并写出有关我们所称‘福音派信仰’中最齐全、最清楚、最周延、最完美、又最生动的信条；如果我们要福音派信仰延续不绝，就必须护卫这个信条和其他性质相同的各个信条。”传统的长老会持受这个信仰信条。浸信会根据这个信条制定了自己宗派的信条《1689年浸信会信仰宣言》。（维基百科）

《威斯敏斯特信仰信条》杰出地总结了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以后的、基于圣经的、纯正基督教信仰的信仰要义。

1646年的威斯敏斯特大会上，通过了这个英格兰国教教会的信仰宣言；这个信仰告白，系统性地、清晰明确地、全面完整地总结了以圣经为根基的纯正基督教信仰的要义和教义。这个教会也被苏格兰教会体系以及全世界的长老教会所推崇。

这个历史上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大会，起源于1643年英国议会号召富有学识的、信仰敬虔的、杰出基督徒人士们来到威斯敏斯特开会，对关于基督教信仰的敬拜、教义、教会治理等等问题提出全面的建议，以帮助英格兰国教教会。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内，威斯敏斯特会议经过详尽而深入的讨论，形成了《威斯敏斯特信条》宣言，包括一个详尽版与一个简明版。这些内容都是严格地以圣经为基础和根基，并大量地引用圣经原文。在过去三百多年中，全世界的许多以圣经为核心根基的纯正基督徒们都同意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中的教义大纲，或认同其中的要义。

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一章讲述了圣经本身。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权威无误的；是关乎上帝的荣耀、关乎人的救赎、信仰与生命。圣经是上帝的完全而完备的启示；世人不能对于圣经的内容进行添加删减。圣经是基督教会在教义方面的唯一而完全的权威，是检验基督教会在信仰中教义正确与否的基准。圣灵借着圣经对人说话。

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二章讲述了上帝的品格与属性。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第三章讲述了，上帝以他圣洁而自由的意志，拣选了那些属他的百姓，使他们的生命成为圣洁。第四章回顾了圣经创世纪的历史，讲述了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在人的里面，有不朽的灵魂。第五章讲述了上帝的意旨安排、护理之工。第六章讲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第七章讲述了上帝与人所立的约，即律法之约与恩典之约。第八章讲述了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之上帝中第二个位格，是天父与世人之间的中保，有着伟大的先知、祭司、君王的职事；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就了那十字架救赎的恩典；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人可以因信称义而得到救赎、与上帝和好、得到永远的生命。第九章讲述人的自由意志；讲述人犯罪堕落，人的意志成为自己罪性的奴隶。第十章至第十八章讲述关于救赎的各个方面，包括关于“因信称义”的教义。十九章讲述上帝的律法与基督徒伦理。二十至二十二章讲述了关于教会敬拜事宜、民事政府权力与教会关系等的事情。二十二、二十三章讲述基督徒应当为在上掌权者祷告，并顺服于政府合法权力。二十四章关于婚姻。二十五章关于教会的治理。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二十六章关于基督徒们之间的联合。二十七章关于圣礼。二十八章关于洗礼。二十九章关于圣餐之礼，纪念基督为我们所舍的圣体与所流的宝血。三十章关于教会人员职事与教会治理。三十一章关于教会公会、理事会。三十二章关于死后的生命。三十三章关于基督的再来与末日审判。

第四件事情是二战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所签订的《大西洋宪章》。

《大西洋宪章》又称《丘吉尔罗斯福联合宣言》，于1941年8月14日由英国首相丘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的联合宣言。当时，苏德战争爆发后，第二次世界大战范围扩大，英、美迫切需要进一步协调反法西斯的战略。两国首脑于1941年8月在大西洋北部纽芬兰阿金夏海湾内的美国的重巡洋舰“奥古斯塔”号上举行大西洋会议。在13日两国首脑在“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的后甲板上进行了《大西洋宪章》的签字仪式，14日正式公布。

该文件全文共8条，宣布对德战争的目的和战后和平的处置，同时表明两国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不承认法西斯通过侵略造成的领土变更，尊重各国人民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恢复被暴力剥夺的各国人民的主权，各国在贸易和原料方面享受平等待遇，促成一切国家在经济方面最全面的合作，摧毁纳粹暴政后重建和平，公海航行自由，各国必须放弃武力削减军备，解除侵略国家的武装。

以下为大西洋宪章全文。

第一部分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代表联合王国的首相丘吉尔，经过会商，觉得把他们两个国家政策上若干共同原则（对更好的未来世界的希望即以此为基础）在此时向世界宣布，是合适的。

第一，他们两个国家不寻求任何领土的或其它方面的扩张；

第二，他们不希望看见发生任何与有关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不相符合的领土变更；

第三，他们尊重所有民族选择他们愿意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权利；他们希望看到曾经被武力剥夺其主权及自治权的民族，重新获得主权与自治；

第四，他们要在尊重他们现有的义务下，努力促使所有国家，不分大小，战胜者或战败者，都有机会在同等条件下，为了实现它们经济的繁荣，参加世界贸易和获得世界的原料；

第二部分

第五，他们希望促成所有国家在经济领域内最充分的合作，以促进所有国家的劳动水平、经济进步和社会保障；

第六，在纳粹暴政被最后消灭之後，他们希望建立和平，使所有国家能够在它们境内安然自存，并保障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在免于恐惧和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安度他们的一生；

第七，这样的和平将使所有人能够在公海上不受阻碍地自由地航行；

第八，他们相信，世界上所有国家，为了现实的和精神上的理由，必须放弃使用武力。如果那些在国境外从事或可能以侵略相威胁的国家继续使用陆海空武器装备，则未来的和平将无法维持；所以他们相信，在一个更普遍和更持久的全面安全体系建立之前，解除这些国家的武装是必要的。同样，他们会协助和鼓励一切其它可行的措施，来减轻爱好和平的人民在军备上的沉重负担。

富兰克林·罗斯福

温斯顿·丘吉尔

1941-08-14

《大西洋宪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于动员世界人民，加强反法西斯联盟，打败德、意、日侵略者，无疑起着积极的作用。美国作为一个尚未参战的国家，与英国一起发表如此明确的声明，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是个沉重的打击。

同时大西洋宪章不仅标志英、美两国在反法西斯基础上的政治联盟，而且也是后来联合国宪章的基础。

在丘吉尔从其海上会面返回后不久，1941年9月，在伦敦召开了讨论大西洋宪章的同盟国会议。英国、苏联、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挪威和“自由法国”参加了会议。实际上，大西洋宪章已成为这些国家继续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纲领。

苏联政府为了集中力量打击德国法西斯，促进反法西斯联盟进一步加强，也发表声明，赞同宪章的基本原则，同时明确表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当前必须集中力量，尽快地解放被希特勒奴役的各国人民，在战后必须消灭法西斯。

大西洋宪章的历史意义。

大西洋宪章对于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赢得反法西斯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不仅如此，大西洋宪章所表达的精神，更是二战以后，在过去七八十年中，世界和平秩序与经济繁荣局面得以建立起来的重要基石。正是在大西洋宪章精神的影响下，二战以后，世界上虽然存在着苏联与自由世界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冷战，虽然存在着小规模、间断性的地区武装冲突，但是，迄今为止，再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生灵涂炭的、国家之间的长久战争。在二战以后的大半个世纪中，整个世界经历了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曾有过的经济繁荣发展。亚洲、非洲、南美

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数以几十亿计的人民生活，都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在过去七八十年中，和平与发展成为了世界人民的主旋律。

同时，在过去七八十年中，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极其广泛的传播。迄今为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联合国中三分之二以上的主要国家，都已经实行了民主制度。

这一切，都与大西洋宪章中首次所表达出的世界和平、民主、自由的精神有着重大的关联性关系。大西洋宪章为新世界的诞生奠定了坚实有力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使得英美以及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自由的国家和民族联合起来，为建设一个平等、民主、自由的新世界秩序而共同努力。

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现代人就可以躺在前人所奠定的和平基础之上，高枕无忧了。今天，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角落，仍然在剑拔弩张、冲突不断。更重要的是，今天，人口最多、幅员最广阔、经济规模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中国，仍然还没有能够实现民主。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国家中，怎样才能够实行健康的、和平的、稳定的、成熟的、自由的民主制度？对此，我们仍然任重而道远。当这个目标实现的时候，那么，十四亿中国人民就能够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思想精神上的自由，那些爱好寻求真理与自由的人们，就能够通过对于世事真相

与人生真理的反思，明白许多从前所未能明白的事理；整个中国就会成为像英美那样的、对于世界人民和平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力量，甚至会成为世界人民的引领者。

我们抚今追昔，深刻地认识到，在世界范围内，现代民主主义革命还远远没有完全成功。在中国，现代民主主义革命还甚至根本没有开始。在今后漫长的年月中，在民主主义社会革命的道路上，一定还会有许许多多的挑战。世界仍然在面临着许多巨大的困难、甚至毁灭性的危险。让我们每一位读者都起来、奋进、共同努力，为中国的民主主义事业，在思想上、道路上、组织上、实际行动上，添砖加瓦，直到民主自由之光照耀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直到中国成为世界上一切爱好民主自由事业之人民的真诚朋友、有力的支撑和后盾。

第五件事情是二战以后联合国的《人权宣言》。

《世界人权宣言》是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0日在法国巴黎夏乐宫通过的一份旨在维护人类基本权利的文献（联合国大会第217号决议，A/RES/217），共有30条。宣言起草的直接原因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省，是第一份在全球范围内表述所有人类都应该享有的权利的文件。

《世界人权宣言》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一起包含在国际人权法案中。后两个公约都是在1966年通过。

《世界人权宣言》由1946年成立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负责起草。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遗孀埃莉诺·罗斯福是该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副主席为中华民国籍的哲学家兼剧作家张彭春。联合国秘书长邀请了加拿大籍的法学专家约翰·彼得斯·汉弗莱主持了宣言的起草。

联合国大会在1948年通过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列出一系有关人权之一般原则，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共同标准”。该文件于1948年12月10日提交联合国大会表决。在出席的56个成员国中，48票赞成，0票反对，8票弃权（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南斯拉夫、波兰、南非、捷克斯洛伐克和沙特阿拉伯），另有2国代表缺席。尽管汉弗莱是宣言的主要起草人，但加拿大在最初对宣言的草稿的投票中弃权，但同意了最终稿。以下

是1948年投了赞成票的国家：阿富汗，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缅甸联邦，加拿大，智利，中华民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丹麦，多米尼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埃及，埃塞俄比亚，法国，危地马拉，海地，印度，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利比里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希腊，冰岛，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瑞典，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英国，美国，乌拉圭，委内瑞拉。

《世界人权宣言》既包括了第一阶段的公民的政治权利，也包括了更进一步的第二阶段的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之后，联合国在1966年通过两项人权公约，分别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两项公约列出基本人权和自由，并规定所有缔约国有责任采取各种适当措施，贯彻这些权利。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了公民个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和基本自由。主要包括：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不得使为奴隶和免于奴役的自由，免受酷刑的自由，法律人格权，司法补救权，不受任意逮捕、拘役或放逐的自由，公正和公开审讯权，无罪推定权，私生活、家庭、住房或通信不受任意干涉的自由，迁徙自由，享有国籍的权利，婚姻家庭权，财产所有权，思想、良心和宗教的自由，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参政权。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同时也明确了部分权利的有条件性或者绝对性。比如，第四条允许缔约国在国家生存受到威胁并且正式宣布社会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减少原本应承担的义务，但减少的程度必须是客观需要前提下的最低限度，而且不得包括纯粹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或社会出身的理由的歧视。第二十八条规定，设立人权事务委员会，负责监督公约的实施。这两个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一般被合称为“国际人权法案”。自1950年起，联合国把每年的12月10日定为“国际人权日”。

（维基百科）

《世界人权宣言》是人权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它由来自世界各个地区不同法律和文化背景的代表起草，于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召开的大会会议上以第217A(III)号决议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的共同成就，第一次规定了基本人权应得到普遍保护。《世界人权宣言》已被翻译成近500种语言。

《世界人权宣言》全文

序言

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

鉴于有必要促进各国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鉴于各联合国国家的人民已在联合国宪章中重申他们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并决心促成较大自由中的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

鉴于各会员国业已誓愿同联合国合作以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

鉴于对这些权利和自由的普遍了解对于这个誓愿的充分实现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因此现在，

大会，

发布这一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共同标准，以期每一个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本宣言，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并通过国家的和在国际的渐进措施，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各会员国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辖下领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

第一条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第二条

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

等任何区别。 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托管领土、非自治领土或者处于其他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之下。

第三条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第四条

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

第五条

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第六条

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

第七条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权享受平等保护，以免受违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视行为以及煽动这种歧视的

任何行为之害。

第八条

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

第九条

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

第十条

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

第十一条

(一) 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

(二) 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为犯有刑事罪。刑罚不得重于犯罪时适用的法律规定。

第十二条

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

第十三条

(一) 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

(二) 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

第十四条

(一) 人人有权在其他国家寻求和享受庇护以避免迫害。

(二) 在真正由于非政治性的罪行或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的行为而被起诉的情况下，不得援用此种权利。

第十五条

(一) 人人有权享有国籍。

(二) 任何人的国籍不得任意剥夺，亦不得否认其改变国籍的权利。

第十六条

(一) 成年男女，不受种族、国籍或宗教的任何限制有权婚嫁和成立家庭。他们在婚姻方面，在结婚期间和在解除婚约时，应有平等的权利。

(二) 只有经男女双方的自由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缔婚。

(三) 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并应受社会和保护。

第十七条

(一) 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

(二) 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

第十八条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第十九条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第二十条

(一) 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二) 任何人不得迫使隶属于某一团体。

第二十一条

- (一) 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
- (二) 人人有平等机会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
- (三) 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

第二十二条

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这种实现是通过国家努力和国际合作并依照各国的组织和资源情况。

第二十三条

- (一) 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
- (二) 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权利，不受任何歧视。
- (三) 每一个工作的人，有权享受公正和合适的报酬，保证使他本人和家属有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必要时并辅以其他方式的社会保障。

(四) 人人有为维护其利益而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

第二十四条

人人有享有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给薪休假的权利。

第二十五条

(一) 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

(二) 母亲和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顾和协助。一切儿童，无论婚生或非婚生，都应享受同样的社会保护。

第二十六条

(一) 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性质。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

(二) 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教育应促进各国、各种族或各宗教集团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并应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

(三) 父母对其子女所应受的教育种类，有优先选择的权利。

第二十七条

(一) 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

(二) 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

第二十八条

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在国际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能获得充分实现。

第二十九条

(一) 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

(二) 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

(三) 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无论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第三十条

本宣言的任何条文，不得解释为默许任何国家、集团或个人有权进行任何旨在破坏本宣言所载的任何权利和自由的活动或行为。

世界人权宣言的作用和意义

二战以后的七八十年，是人类发展与繁荣的七八十年；在绝大多数国家中，经济都已经实现了很大的腾飞。在全世界范围内，人民的生活水平、教育文化水平、物质环境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同时，民主制度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很大的传播。如今，在世上大多数国家内都已经建立起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在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已经转型成为民主国家。在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现在只有很少的一些国家还不是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

二战以后的七八十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也是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民主制度的传播和建立，更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相比于二战

以前的时代，或是相比于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在二战以后的世界中，尤其是在过去二十年内，我们可以说，人类社会是处于空前的繁荣时期。

在过去七八十年中，由于世界人权宣言的广泛影响与传播，“人权”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高度重视的一个政治概念。在各个国家中，民主制度的伟大意义，常常与“人权”联系在一起。世界人权宣言在联合国的通过，对于民主制度的广泛传播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概念基础。

然而，当我们在这个地上的世界中寻找理想与完美的目标的时候，就总是会其中看到失望与败坏之事。虽然，世界人权宣言本身是好的，但是，其中却有一个最大的缺失与盲点之处，那就是，它忽视了人生命本质层面的罪性。如果在人的生命和心灵本质中是纯洁无罪的，是有着圣洁真挚信仰的，那么，基于世界人权宣言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就是人类历史中最完美的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然而，正如本书中开宗明义所说的，所谓民主制度，是圣洁自由之民所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因而，当我们观察和反思世界历史与现状的时候，就会轻易地看到，由于世人生命与心灵本质层面中的罪性，民主不但不能够完全解决人类社会中的问题，反而，在某些条件下、某些范围中，反而会加剧人类社会中的问题与缺陷的严重性。

这些不好的问题与缺陷之处，首先是从西方社会自身内部所产生并广泛发展起来的。对此，我们在下文中进行冷静的分析和反思。

=====

西方国家现状与内部矛盾

上述五件重大历史事件，与其背后所代表的无数历史进程，以及相关的深远意义与影响，对于整个人类从古代的愚昧贫穷、生产力极度落后、战争动荡不息的局面，进入到繁荣、和平、发展、进步的近现代时代，产生了决定性的、催生性的作用。正是在这些积极而巨大的影响作用下，现代科学技术产生了爆炸性的发展，现代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等等架构相比于古代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除了上述五件重大历史事件之外，过去几百年来，还有很多事件，例如法国大革命、德国社会变革、意大利社会变革、苏联解体、日本社会变革、

印度等许许多多第三世界国家民族国家独立、东欧剧变、东亚现代化、等等，也对于世界民主大潮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指出，在经过了几个世纪的艰难发展以后，虽然全世界在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然而今天，世界又仿佛走到了十字路口。

今天，在西方世界内部，在美国内部、英国内部、以及其他西方各个传统民主国家内部，正在衍生着愈来愈严重的内部分裂与矛盾。在全世界许多地区，虽然很多国家之间仍然在维持着表面的和平，但是，在人们内心中，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正在继续产生着、繁衍着许许多多的矛盾。

一方面，在很多西方先进国家的引领下，科学技术仍然在继续飞速地向前发展、进步，经济仍然在快速地前行，人们的财富、经济发荣景象仍然在不断地扩大、遍及许多国家地区。

另一方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几乎所有西方“先

进”国家中，正在处于一种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在对外关系上，这些国家与以穆斯林世界为代表的中东人口存在着深刻的撕裂关系。西方世界与俄罗斯、中国、亚洲许多地区之间，也有着深刻的隔阂，并存在着一些潜在的战争危险。

但最重要的是，西方国家所处于的内部环境恶化、撕裂的严重局面，愈演愈烈。一方面，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基督教信仰仍然是主流的信仰。尤其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中，仍然有着数量巨大的、信仰真诚、心态谦卑的基督徒们。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指出，在今天的西方国家，就平均状况而言，人们的信仰愈来愈缺乏敬虔热忱的情感；在人们的心中，普遍地流行泛滥着许多诡诈与欺谎；尤其严重的，就是所谓的“白左”现象。

所谓“白左”，即白人中左派的简称。在海外华人中，常以此称呼那些观念迂腐，缺乏真理、正义和常识，主张无原则的容忍主义，主张无原则的加税、平均主义、“政治正确”、乌托邦主义思想等等的，西方自由派政客、思想家、文人、演艺界人士、知识界人士、美国的左派激进民主党成员等。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在许多领域、许多方面、许多范畴内，这些白左早已经登堂入室、占据主流、甚至已经发展到了几乎令很多人深恶痛绝的程度。我们仅以美国内部国情为例，简要总结归纳。

在今天的美国主流媒体界（包括主要的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例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美联社等主要纸面媒体与新闻社，以及CNN，ABC，CBS，NBC等主要电视频道），以及美国主要的人文学术界（包括所有的常青藤大学，以及全国几乎所有大学的历史系、文学系、哲学系、法律系的教授们等等），文化界，出版界，硅谷科技界，等等，到处都充斥着左派、自由派、反保守主义、反传统、解构主义思想的主流势力。这些左派势力，往往是以无神主义为内核，以社会主义、平均主义、劫富济贫为经济理念，大力地提倡同性恋合法化，毒品合法化，性解放，贬低信仰的价值，贬低传统婚姻家庭观念等等重要意义和价值，大力贬低基督教信仰传统价值、重要意义、历史积极作用，等等。

如果我们追本溯源，就会发现，这些白左们的思想，与历史上的三个人，即，马克思、达尔文、弗洛伊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们的深刻思想影响，很有渊源。马克思的思想代表了，经济上劫富济贫和平均主义、政治上阶级斗争、信仰上无神主义的深刻思想观念。达尔文的思想代表了，认为人不是来自于上帝的创造、而是来自于自然的进化，并且不但如此，这个世界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世界。达尔文思想为现代无神主义者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尽管，并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有效的科学证据能够证明物种之间的进化。弗洛伊德的思想则为罪、性淫乱等等给出了貌似科学的、中性、“理性”的解释；正是在佛洛伊德为代表之思想所开的先河的影响下，现代社会的自由化、性解放、同性恋、双性恋、性与毒品泛滥与合法化等等主张，到处蔓延，并且不断地撕裂西方主流社会观念，激化左派、右派之间的争斗，带来深刻矛盾与纷争。

+++++

+++++

+++++

+++++

+++++

+++++

+++++

+++++

+++++

圣经启示录中的预言

启示录16章

1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圣所里发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 神烈怒的七碗倒在地上！”

2第一位天使去了，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性的毒疮，生在那些有兽的记号和拜兽像的人身上。

3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水就变成好象死人的血，海里的一切生物都

死了。

4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和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了血。5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

“今在昔在的圣者啊！

你这样审判是公义的，

6因为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

现在你给他们血喝，

这是他们该受的。”

7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

“是的，主啊！全能的 神，

你的审判真实、公义！”

8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太阳上，太阳就得了能力，可以用火烤人。9人被高热烧烤，就亵渎那有权柄掌管这些灾难的 神的名，并不悔改，把荣耀归给他。

10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为痛苦就咬自己的舌头。11他们又因为所受的痛苦和所生的疮，亵渎天上的 神，并不为自己所作的悔改。

12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为了要给那些从东方来的王预备道路。13我看见三个污灵，好象青蛙从龙口、兽口和假先知的口中出来。14他们原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牠们到普天下的众王那里去，叫他们在全能 神的大日聚集作战。1516污灵就把众王聚集在一个地

方，希伯来话叫哈米吉多顿。

17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圣所的宝座上发出来，说：“成了！”18于是有闪电、响声、雷轰和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发生过这么大的地震，19那大城裂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它。20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21有大冰雹从天上落在人的身上，每块重约四十公斤。由于这冰雹的灾，人就亵渎神，因为这灾太严重了。

启示录13章

1我又看见一只兽从海里上来，有十角七头，十角上戴着十个皇冠，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2我所看见的兽，样子好象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龙把自己的能力、王位和大权柄，都交给了牠。3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致命伤，但那致命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很惊奇，跟从那兽。4因为龙把权柄交给了兽，大家就拜龙，也拜兽，说：“有谁可以跟这兽相比？有谁能与牠作战呢？”

5龙又给了那兽一张说夸大和亵渎话的嘴巴，也给了牠权柄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6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他的名和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7牠得了允许能跟圣徒作战，并且能胜过他们；又有权柄给了牠，可以管辖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各邦国。8所有住在地上的人，名字没有记在创世以来被杀的羊羔之生命册上的，都要拜牠。

9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10如果人应该被俘掳，

就必被俘掳；

如果人应该被刀杀，

就必被刀杀。

在这里圣徒要有忍耐和信心！

11我又看见另一只兽从地里上来。牠有两个角，好象羊羔，说话好象龙。
12牠在头一只兽面前，行使头一只兽的一切权柄。牠使全地和住在地上的人，都拜那受过致命伤而医好了的头一只兽。13牠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上降在地上。14牠得了能力，在头一只兽面前能行奇事，迷惑了住地上的人，吩咐住地上的人，要为那受过刀伤而还活着的兽做个像。15又有能力赐给牠，可以把气息给兽像，使兽像能够说话，并且能够杀害那些不拜兽像的人。16那从地里上来的兽，又要所有的人，无论大小贫富，自由的和作奴隶的，都在右手或额上，给自己作个记号。17这记号就是兽的名字或兽名的数字，除了那有记号的，谁也不能买，谁也不能卖。18在这里要有智慧。有悟性的人，就让他计算兽的数字，因为这是人的数字，它的数字是六百六十六。

【【【马太亨利圣经注释 启示录16章 启示录13章】】】

亨利马太圣经注释简本

启示录

第十六章

第一位天使把碗倒在地上；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1-7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第五位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8-11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12-16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17-21节）。

V。1-7

我们应当祷告，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里记述了，一系列的可怖灾祸、神的可畏惩罚与意旨安排。这些灾祸，映照了埃及的那些灾祸与惩罚。罪是相似的，因而惩罚也相似。全地，空中，海里，江河，城邑，都要因他们的罪孽而被毁灭。神的圣洁、公义和真实，是可称颂的。神的审判与惩罚，是何等可畏。那些逼迫属神圣徒和先知的恶人，他们将要落入永远的悲惨之境。

V。8-11

人的心如此罪恶，以致于他们在最严厉的惩罚面前也不知悔改；若没有神的特别恩典，所有人就都这样坠入灭亡之中了。地狱本身，里面就充满了亵渎神、憎恨神的人；若我们熟悉人类的历史、人的本性，熟悉圣经，熟知人的心，我们就会知道，当人越经受痛苦的时候，当人越清楚地看见神手的作为的时候，他们就常常越对神充满愤怒和憎恨。罪人们应当到基督这里来，悔改自己的罪，寻求圣灵的恩典；否则，他们就会带着这颗不谦卑、不悔改、绝望的心，承受永远的痛苦和恐惧了。黑暗是与智慧和知识相对立的；人的心在黑暗和罪恶之中，充满了愚妄和慌乱，他们敬拜偶像、跟随兽。他们丝毫没有欢乐和喜悦，而是内心充满煎熬和烦忧苦痛。

V。12-16

这或许是在表明，东方各国的民将要进入到基督的教会之中；道路已经为他们准备。

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

与基督为敌的敌人们，想要招聚力量，在毁灭之前作垂死的挣扎。神警告属他的百姓，将会有试炼和患难；神鼓励、激励他们，要为此预备好。

将会有极大的引诱和试探；因此，基督借着使徒约翰，呼召他的仆人们，要儆醒。那 儆 醒 ， 看 守 衣 服 ， 免 得 赤 身 而 行 ， 叫 人 见 他 羞 耻 的 ， 有 福 了。

耶稣基督，主的荣耀，会突然临到，并审判世界。那是一切信从基督之人所喜乐地盼望的。

V. 17-21

第七位、最后一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罪恶的世界、巴比伦彻底地倾倒了。属天的教会，看见而欢喜，得胜的喜悦充满他们。那些沉溺在罪中、自觉安稳的人有祸了。许多人为灾祸而亵渎神、憎恨神：即使是在最大的灾祸面前，他们也不愿意悔改、谦卑。人若在神的面前心地刚硬，在神的公义审判惩罚面前刚硬顽梗，那么，这就是清楚的记号，表明那人必将承受确定的、永远的、彻底的惩罚与毁灭。

亨利马太圣经注释简本

启示录

第十三章

从海里有一个兽出来；龙将自己的能力给了那兽（1-10节）。又有一个兽，两角如同羊羔，说话却像龙（11-15节）。它让众人都拜他，并在额上受印记（16-18节）。

V。 1-10

使徒约翰站在岸边，看见一个恶兽从海里出来；这是一个残暴的、充满偶像罪污的、迫害人的势力；它的能力来自于前面的那龙。这是一个何等可恶可怕的怪兽！它似乎代表了那些属世的、逼迫人的统治；多少年来，甚至从巴比伦被掳时期，它就对神的百姓充满敌意。从那第一个兽开始，就欺压、逼迫义人；而义人们更受到但以理所述的第四个兽（罗马帝国）的压迫；他们用许多残酷的迫害来逼迫圣徒们。这些黑暗罪恶的权势是来自于那龙。这权势，是出于魔鬼，并被魔鬼支撑着。受伤的头，或许是代表那所废弃的偶像罪污；头被医好了，代表着偶像之罪又卷土重来；那虽然是新的形式，却是同样的罪，为满足魔鬼的恶计。世人崇拜权力、计谋和成功。他们归荣耀于魔鬼，并顺服于魔鬼的统治和伎俩。魔鬼使用卑鄙的能力和诡计，让人把本属于神的荣耀归于受造之物。然而，魔鬼的能力和成功是有限的、是被约束的。基督有属于他所拣选的余民，是被他的血所救赎的，记在他的生命册中，是有圣灵的封印的；虽然魔鬼和敌基督的势力能够胜过他们的身体，能够夺走他们的性命，但是，它们却不能够战胜他们的灵魂，不能够使真正的信从基督之人放弃他们的信仰，不能够使他们离弃救主、去和这些神的敌人同流合污。在这极大的患难试炼和试探引诱之中，他们仍然持守着福音的信仰，仍然持守在对真神的敬拜之中。那些患难和试探引诱，虽然使地上的人、除了神的选民以外，都顺服了魔鬼；然而，那些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却一直持守着贞德。这是何等大的鼓励，是何等大的激励；使我们能够始终如一地持守在基督里，忠心到底；这，就是整本《启示录》的主旨。

前面的那个兽，代表的是属世界的权柄；而这第二个兽，则是在虚伪信仰的外衣下，藏着同样的恶意、迫害和权力。它伪装着作出对人灵魂慈善的样子；它要在属灵的层面管辖人；它假装是出于基督的；它先是用温柔的方式和样子欺哄人；但是很快地，它就显出龙的本像。它所说的话，暴露出它的本像；从它的口中，说出虚假的教义和残酷的命令；显明它本属于龙，而不是属于羔羊。它行使前面那只兽的所有权力。它包含着前面那只兽的所有恶意；即，使人偏离对真神的敬拜，使人离弃神，使人的灵魂顺服在罪恶的意愿和控制之下。这第二只兽，用诡计使人敬拜那死伤医好后的头一个兽。它把欺哄人的希奇之事，伪装成神迹。它迫害、杀死那些不拜兽像的人。它使那些所有拜兽的人都受印记；而且只有这些人才能作买卖，得属世的利益。他们要给那个受伤还活的兽做一个兽像，并且要俯伏敬拜在它的脚前，顺服于它的罪恶与命令，顺服于这恶兽的品性。这里给出兽的数目，就是人的数目，是666。这个数目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谁，没有明言；但是，我们若有属神的智慧、知识，就会明白，神的任何敌人都已经被数算过、都已经被标出印记，即将被毁灭；他们罪恶的权势即将转瞬即逝；万国都将要俯伏于我们公义与和平之君的宝座前。

+++++

+++++

+++++

+++++

+++++

+++++

+++++

+++++

+++++

=====

反思在民主起源历史中的五件重要事件的本质、影响与意义，正确与缺失之处

民主制度在人类历史、世界范围中发展的进程，是一个漫长、曲折、远远还没有结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重要的里程碑事件，正如本文上面所述的五个重要里程碑事件。在这五个事件中，十三世纪英国大宪章的通过，是现代民主主义制度的第一道曙光。十七世纪的五月花号事件与英国光荣革命，则预示了民主制度在英国和美国将要生根发芽、成长结果。二十世纪的大西洋宪章与世界人权宣言，则代表了民主制度将要在整个欧洲以及全世界范围内普及开来。

其中，大西洋宪章与世界人权宣言的内容，都是对于二战中希特勒法西斯所代表的专制主义思想的针对性反应。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都集中地反映了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的一些严重错误思想的结果。这些错误的思想，集中性地体现在以德国等国家的思想学术界为代表的许多社会人文哲学观念体系中。在这些社会人文观念体系中，在

信仰上以泛神主义【即，否认上帝是能听、能看、能言的；把上帝仅仅看作是世界本身，或是无知无觉的一种因果关系、能量等等】、自然神主义【即，认为上帝在创造了世界以后就撒手不管了；上帝与世人今天具体的生活事务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为表现形式，在政治上以专制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国家争霸、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等等为表现形式。例如，自从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以来，德国等国的思想界、学术界就受到诸如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一大批泛神主义者与自然神主义者的深刻影响，以至于发展到了尼采的“上帝死了”，以及马克思的“一个幽灵在欧洲大陆的上空飘荡”。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让全世界人民的主流观念痛定思痛，深刻认识到专制主义等等思想的深刻危害性。因此，以大西洋宪章与世界人权宣言所代表的政治理念，反映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大西洋宪章与世界人权宣言的政治思想内容的精髓，简而言之就是，在这个世上，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随意选择自己所相信的内容，选择自己所喜欢的生活方式，选择自己所喜欢的政治制度，等等。

大西洋宪章与世界人权宣言所代表的思想框架本身，并非是不好的。如果它们被应用于一个在生命心灵本质中没有罪性的世人所生活的世界中，那么，它们所代表的，就是最好的思想与政治体系。

但遗憾的问题是，在这个世上，在每一个世人的生命与心灵的本质层面中，不但不是纯洁无辜的，反而是充满了深深的罪性。这里所说的罪性，并非仅仅是言语行为等外在的表现，而更是人生命与心灵的一种重要本质层面的性质，是人在内心深处对于上天、造物主、生命之主的背离，是：——人以自己为生命、生活、世界的中心，而不愿意去寻求真理、公义、圣洁，不愿意去谦卑而真挚地寻求和倚靠上帝。

因此，我们在现代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必须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在大西洋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之中所代表的思想观念体系，并非是一个绝对真理，而仅仅是对于专制主义的针对性反应而已。固然，专制主义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对于专制主义的反对，就是绝对正确的。

如果我们认识不到大西洋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思想中的缺失，如果我们认识不到现代世界所流行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概念中的局限性，那么，我们就必然会陷入今天西方世界中“白左”所陷入的怪圈和困境，必然会在民主的道路上，遭遇失败和重大的挫折。

对于世人生命与心灵本质层面之罪性的忽视、无视，正是大西洋宪章与世

界人权宣言所代表之思想精髓中的最大缺陷，也正是现代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中的最大漏洞。

那么，在建设现代民主主义政治的道路上，我们应当怎样做呢？我们应当怎样弥补上面所述的那些缺陷和漏洞呢？我们应当怎样面对世人生命与心灵本质层面之中的罪性呢？我们又应当怎样面对我们自己里面的罪呢？

请注意，我们并不是在这里说，专制主义就是对的，或者，应当以专制主义的强力手段，来面对世人生命与心灵本质层面中所普遍存在的罪性。

我们如果想要明白上述问题的答案，就必须深刻明白在基督教信仰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的深刻关系，也必须深刻明白人间法律与上帝律法之间的深刻关系。

+++++

+++++

+++++

+++++

+++++

+++++

+++++

+++++

+++++

【【【引述 圣思录 人间法律与上帝的律法之间的关系】】】

《我们都是罪人》

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决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

3:10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3:11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 3:12 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3:13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虺蛇的毒气。 3:14 满口是咒骂苦毒。

3:15 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 3:16 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 3:17 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

3:18 他们眼中不怕神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3:20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第一部分】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是在罪恶之下。我们自己的心思里面，是谗言，嫉妒争竞，虚谎自高；我们对待他人的心态里，总是含着骄傲自义；我们在面对他人的恶时，常常沉默不言，避之不及，没有勇气去在那些看起来事不关己的事情上，为了正义挺身而出。我们生活的一个箴言就是，少管闲事。我们的舌头里面，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污言秽语、咒骂苦毒和花言巧语。

(1)

世人之间的差别，常常其实微不足道。

我们彼此相看的时候，会觉得人与人之间真是相差万里——无论是在地位上，才能上，财富上，成功上，所处环境上，起跑线上，成就上，道德品质上，业绩上，性格上，体质上，外表上，等等等等。我们常常以为，在这世上，有的人轻如鸿毛，有的人重于泰山。

或许，的确如此。然而，要看我们说话的参照系是什么。

就好象我们看世上的亭台楼宇，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高低不同，风貌万千。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从地上的角度看，而是从天空看，从永恒看，从那无限、极远的光辉之处看，那么，这些楼阁亭台的彼此之间的差别，可以说真地是微乎其微了。

同样，若我们从神的角度看，人心之中的尔虞我诈、迷魅魍魉、彼此勾

陷，大概也的确是彼此类似。不同的，是量；相同的，是质。

(2)

神的律法是什么？律法的总纲第一是爱主你的神，第二是爱人如己。这写在圣经的十诫当中，也写在世人的良心里面。

我们每个人的良心里面，都知道，那满天的繁星、浩渺的大地的背后，那繁杂的世事、波澜壮阔而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背后，有一位无限大能的造物主、“老天爷”。他是独一无二的，是自有永有的。他是全备而充足的。他能听、能看。他公义、慈爱——虽然，我们看不见他，因己罪而不认识他；但是，他从来离我们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气息，都在乎他。

我们每个人的良心里面，也都知道，我们应当敬畏、遵从这位宇宙天地的造物主；因为，他是良善的源头，是一切生命的赐予者，是一切价值和意义的归宿与基点。阳光雨露，出于他。苦难中的甘霖，也是来自他。

我们也知道，这世界中的一切事情，善恶一定有报。这并非科学所研究的物理定则和规律，而是，超自然中的赏善罚恶，来自于那位超自然的上帝本身。

我们的良心更知道，应当以善待人，爱人，就如同爱自己一样。不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己所欲，施于人。

我们渴望怜悯和同情，因此我们要怜悯和同情他人。我们渴望理解和关怀，因此我们要努力理解和关怀他人。我们期望别人对我们耐心忍耐，原谅我们的错，饶恕我们的过犯；因此，我们要对别人耐心忍耐，原谅别人的错，饶恕别人的过犯。我们憎恨、厌恶别人的罪恶、不义、不公、虚谎；因此，我们自己不应当罪恶、不义、不公，并要诚实。我们愿意别人为帮助我们而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因此，我们也当为帮助别人而牺牲自

己。

这，就是人生的真谛。

【第二部分】

平安的路是什么？

也许，有的人在财富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亲情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哲理中找到顿悟和平安。有的人在工作和事业的自我实现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人与人之间的武力与威胁对峙中，找到和平与平安。有的人在健康和长寿之道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清心寡欲的生活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一生一世、山盟海誓、相濡以沫的爱情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放下”的心境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知足常乐的平凡人生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天下可笑之人”的智慧中找到平安。

以上这些，无论好或不好，却都没有触及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自己生命中的罪（自以为义、自以为是、自私、自我、自利、不公、不义、虚谎、懦弱、不怜悯、不宽容——无论是从前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正如被通缉的逃犯无论逃到哪里、逃了多久，都终将不得不面对法庭的审判）怎么办？我们怎样才能挣脱罪的网罗，洗清我们的罪责，逃脱罪的惩罚，躲避死亡的咒诅，改变我们被罪恶所玷污、所充满的生命？

无论我们自己怎样觉得——问题是，对善恶的裁决和审判，对罪的惩罚，对善的奖赏，权柄并不在我们手中。

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是永恒中的审判。

《与弟兄和平》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5:22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有古卷在凡字下添无缘无故地五字）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5:23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5:24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5:25 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5:26 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第一部分】

先与弟兄和好

（1）神的律法，和人间的法律

（1. A）

人的良善，应是从心里、由衷的，是由内心而至外在的言语行为的，而不是相反：——

因为神是监察人内心的神；也更因为，人的本质，是由其内心决定；人的

行为和言语，只是其内心真实光景的反映。

这世上的法律，只看人的言语和行为，只看人的外在表现。所以，一个内心罪恶的人，仍然可以通过伪装和约束，在这世上不触犯刑律，庸庸碌碌，终其一生。而另一方面，一个无辜的人，则可能会由于马虎大意，犯了过失之罪，承担刑责。

世上的法律，只以人所能查究核实的证据、证人或证言、供词为基础；关注的，只是世上的秩序、公平等。

换言之，人间法律所管辖的范围，是那些属世的、可见的、可把握的、可查究的、可测量的、非永恒的事情。

(1. B)

然而，这并不是说，世上的法律就没有价值；也不是说，世上的法律，与神的律法就没有关系。

只不过，这两者之间，绝非等价。

在世上的法律中，所言及的“公平”，“平等”，“公义”，“正义”，“罪行”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建基于神放在人良知之中的、先天性的，关于公义、公平、圣洁、正直、诚实、真实等的认知。

在这世上，若没有信仰、若没有对永生真神的敬畏，那么，人间的法律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如果人的心里，对宇宙天地主宰、造物主、神尚且没有敬畏，对自己的灵魂尚且毫不关心；那么，人也不会在内心深处，尊敬世上的法律。

人间的一部一部法律，无论多么完善，无论条款多么多么详细，都无法完完全全囊括人类生活中的复杂微妙、变化多端的方方面面；也无法事先预

见各种各样纷繁的情境。

人间的法律，必须假设，它所针对的对象，是能够、且愿意诚实地，理解并应用抽象概念和原则的；是愿意尽力去诚恳待人的；是愿意诚实守信、遵守契约的。否则，任何人间法律，都会成为一纸空文，如沙子筑成的城堡，瞬间塌垮。

然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如果人想故意逃避惩罚、规避人间法律、钻法律漏洞、破坏规则、为自己走捷径找理由，那么，他一定很快就能学会怎样把法律玩弄于股掌之中。

他也许不一定敢于堂而皇之地杀人放火，直接与法律和国家公器对抗，但是他知道，怎样利用法律、规避法律、玩弄法律，来满足自己的私利和罪恶之心。

很多时候，人们不杀人放火，并非因为他们不愿意，而是因为他们害怕法律的惩罚。他们的罪恶之心是一样的。

所以，当一个社会的法律越看似健全，越复杂全面的时候，人们的心往往不是变得更好，而是变成了更加虚伪和狡猾。

(1. C)

但是，世上的法律，并不能诛心，——不能仅仅根据人心里的想法和动机，来定一个人的罪。对于隐藏在人心里深处的罪恶想法，和自私、猥琐、残暴、暴怒的意念，世上的法律无能为力。

实际上，若有任何的人间法律，要管束、定罪人的自由内心，那么，这样的法律，往往不是“善法”，反而很可能是法西斯专制主义的“恶法”。

这样的恶法，以及制定这样诛心之法律的人，是愚妄地想要取代神的权柄，愚妄地试图篡夺神的荣耀；正如圣经《但以理书》中记述的，尼布甲

尼撒下诏，要求全地的人都跪拜他，把他当作天地之主来敬拜。

主耶稣说：

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

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

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

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作你们的用人。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1. D)

事实上，人间法律之所以不能够针对人的内心定罪，不仅是因为那终极审判的权柄在于神，也因为，我们世人往往不能看透人内心之中的真实光景。我们常常会冤枉一个软弱犯错的无辜之人，也常常会被一个罪恶虚伪之人的甜言蜜语和伪装所蒙蔽。

神是监察人内心的神，他的旨意纯全，他的判断是按着真实；人的心在他面前是完全敞开的，没有任何秘密和隐秘之事能够在他眼前隐藏；

而世人，则往往只能看见、也只看重，人的外表和表现，而看不见人的本质。

(1. E)

如果，世界上、人心之中，没有神的律法，没有神的权柄和主宰，那么，

任何的人间法律（不论多么貌似公正、貌似完善）也就毫无意义，毫无作用，毫无价值——

因为，决定人行为的，是他里面的喜好、兴趣、倾向、口味、价值、欲望、思想、理念和选择；决定人言语、行为及其一切外在表现的，是他里面的本质和灵魂的光景。

虽然：——人间的法律，在人的内心面前，无能为力；或者，像现代民主社会里面的法律那样，强调人的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对人的内心毫不关心、毫不在意，只注重外在行为层面的证据，以及外表行为层面的管理和管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心就可以像脱缰野马一般，在罪恶、诡诈、虚伪、狡猾、贪婪的世界里任意驰骋；更并不意味着，人的灵魂，就不在神律法的管束和审判之下。

(1. F)

主耶稣说：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蠅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

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

面也干净了。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

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1.G)

世上人间的法律和刑罚，可以把人捆锁在监狱之中，甚至可以判处人死刑。但是，尽管人的身体可以被杀死，世上却没有任何势力和权威，能够审判灵魂、把灵魂投在地狱里、永远地刑罚灵魂。

这宇宙天地和其中的万有，都随时在神的掌控和主宰之下；其中的任何事情及其发展，都是按着神的允许和安排，要成就神至善至美的旨意。顺从神的人，将要兴旺；悖逆神的人，必将衰亡。落在永生神的审判和惩罚之中，何其可怕。

然而，神更在那永恒之中，在终极的审判之日，对人的灵魂有着最高的审判和刑罚的权柄。那些活在罪中、死在罪中的世人，终将面临神的永远审判和刑罚；他们要在不灭的地狱之火中，永远地痛苦哀号。

神的审判，永远的、终极的审判，不是按着外在的虚浮与功利，而是按着人心的真实光景，按着人灵魂的真实面目。

(2)

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

拉加与魔利的意思，类似于“蠢货”“傻冒”等恶毒辱骂人的名词。

也许，一句脏话，尤其是辱骂、咒骂自己弟兄的话，在人眼里，在人间法律之中，并不算什么，也不会受到什么严厉惩罚。然而，在神的眼中，这却与杀人的罪同罪。因为，其背后的心境和动机是一样的。其本质和性质也是一样的。都是出于暴怒和仇恨。都是沉浸于罪中之人灵魂的外在表现。

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谦卑自己的心，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灵魂的主，遵从他的吩咐和教训。我们要从自己的口舌上，悔改自己的罪。把罪中的故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里面，有一个崭新的、重生的、洁净的生命生长起来。

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

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

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

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惟有详细察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大卫的诗，交与伶长耶杜顿。）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時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

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

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使用舌头说话。

耶和華阿，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终，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

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

前，如同无有。各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细拉）

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主阿，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

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

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

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的笑容或作所喜爱的）如衣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细拉）

耶和華阿。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

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

【第二部分】

偿还对人的亏欠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5:24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5:25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5:26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1)

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真的愿意来寻求神，

那么，我们就会知道，

在我们心里，与弟兄反目、对人苛刻、不怜恤人，是一件严重的向神犯罪、得罪神的事。

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讨神的喜悦，真的愿意寻求神的饶恕，

那么，我们就必会寻求同弟兄的和好。

若要来神的祭坛前，向神献礼物，我们必须首先与弟兄和好。

(2)

我们也要偿还人的亏欠，否则，就必不得神的喜悦。

要与人和息。

【第三部分】

真诚的敬拜

神是灵，因此，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God is spirit, and his worshipers must worship in the Spirit and
in truth.

不要自欺欺人；更不要，以为神是可以欺哄的！

=====

+++++

=====

民主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

我们从现代民主制度的起源历史中，会清楚地看见，现代民主主义制度不仅发源于欧洲，而且，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一般性而言，在西方各国中间，如果，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在人民大众中传播得越广泛，人民的基督教信仰越真挚而热忱，那么，在这个国家中的民主制度就越容易建立起来，并且，民主制度在这样的国家中就发展得越快、越稳定；反之，当一个国家中的基督教信仰越来越不受到人们重视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中的民主制度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混乱喧嚣、内耗内斗；甚至，当这个国家中大多数人民都离弃了敬虔信仰的时候，也就必然会导致，民主制度终将引向彻底混乱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并最终被专制主义野心家所推翻、篡权。

其中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民主制度究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人民群众内部之间相互协商、共同决策的复杂过程。在这样的复杂过程中，在一个社会中，尤其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世界主要国家中，必然会存在许许多多不同的利益冲突、不同的观点角度、不同的意识理念等等。那么，在这些不同的、甚至激烈的力量角力过程中，怎样能够达到和平安祥的、团结一心的、众志成城、稳定牢固的政治结果呢？

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民主制度若要成功【而不是逐渐滑向无政府主义以及

专制主义】，那么，我们就必须思考和面对以下这样的一般性困境：——在民主政策的决策与实施的过程中，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复杂社会环境中，必然会有很多人成分、很多政治力量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甚至，政策方向是被很多人所彻底反对的。【——尽管，当然，政策方向之所以被决定下来，是因为社会中超过半数的政治力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那些在某个政策决策上意见少于半数的人群；但是，由于社会政策决策有许许多多的方面，因此，这些在每一个政策决策上意见少于半数的人群，加在一起，人数就反而会占据社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例如，有的人反对某些医疗方面的政策决策，而另外有些人则反对某些教育方面的政策决策；虽然那些人在每一项具体政策决策上都少于半数，但他们在不同政策决策相关方面上相应的人数加在一起，却超过了社会人口中的大多数。】

于是，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怎样避免扯皮、庸碌无为、无法决策？怎样避免决策结果导致国家动荡、不稳定、怨声载道？

核心问题就是，如果“我”是民主社会中的一个成员，那么，当面对某个不符合“我”利益、违背“我”意识形态的、然而却是民主程序下所制定的决策结果的时候【例如，民主决策的某个政策结果是：——减少某个地区的、面向某类职业的教育经费，增加某种医疗的收费，针对某种行业加税，增加某些方面的军费，甚至是堕胎，毒品合法化等等】，——在“我”的内心，怎样还能有和平安宁的心情呢？“我”怎样还能够平静地、和平地遵守那些既定的民主秩序和政策法律结果【即，和平地等到下一次投票的时候

再去表达意见；甚至，——“我”心里明知道自己是少数派，无论再投多少次票也没用，根本不可能改变某种政策决策结果】，而不是心怀怨言、鼓噪喧嚣、甚至图谋用非法手段推翻既定政策法律结果呢？

本书必须在这里清晰地、大声地、毫不含糊地指出，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正是民主制度本身的生死成败之关键所在。

如果在社会中的千千万万个“我”，在各种不同的民主决策结果面前，都忿忿不平地面对上述困境【例如，有的人是在医疗决策结果上，非常不满；有的人是在教育政策决策结果上，充满愤怒；等等】；那么，在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民的心中，就一定没有和平、平安和幸福；在这样的人民之中，民主制度就一定会失败。

请注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各种具体政策决策结果本身，就公义、平等、公正而言，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而人们心中的各种怨言、不满、甚至愤怒本身，并不一定没有道理的，并不一定是不对、不合理的。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关键问题是，虽然有这样许多的、甚至看似很严重的不合理之处，虽然有这样许多的、看似合理的不满之处，但是，——民主制度本身怎样才能够，保持稳定、和平、长治久安，而不是被动辄轻易推翻、政权总是处于动荡更替的无序混乱之中？

如果我们认识不到民主制度本身的局限性、有限性，如果我们不知道应当怎样回答上述问题，应当怎样面对上述困境，那么，——我们国家社会中的民主制度就必然不会成功，就必然会跌入无政府主义混乱之中，并必然最终被专制主义所取代；我们就必然无法挣脱专制主义的欺骗、愚民、诡计、邪恶、与枷锁。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在各样的复杂政治角力过程中，在人民群众中间，如果没有一种深挚真诚的、敬虔热忱的、谦卑虚己的、以对于造物主上帝之敬拜为中心的信仰，——来调和、引领、协调民主决策过程，并在民主过程中起到根基性的作用，——那么，从几个世纪以上的长远眼光来看，所谓民主制度就一定会面临失败，跌入无政府主义混乱，并被专制主义取代。

基督教信仰对于现代民主主义制度的成功，具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当人们以那属天的国度为心灵的归依，以造物主上帝自己为心灵

归依的时候，那么，——就会在生命品格中有以下重要特征。一方面，这样的人会积极热心地投身于公共事务的讨论、投票、决策过程之中，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冷眼旁观。另一方面，当民主决策的结果是违背自己的愿望和观念的时候，这样的人并不会要死要活，以为自己是绝望的；——因为，他内心的倚靠，从终极的、根本的层面而言，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在天上，在那上帝永恒的国度里。

最重要的是，在以耶稣基督十字架为中心的信仰中，人们不会把自己当作是世界的中心，更不会颐指气使地把自己当作是绝对真理的化身，甚至要“替天行道”、唯我独尊等等；而是，在内心深处看见己罪、承认己罪、悔改己罪。因此，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心灵深处一定是真正谦卑的，因为他的心灵之锚，他的一切盼望与期待，究其根本层面而言，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在那永恒的天上国度里。正是因此，他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既勤勉地生活、一丝不苟地努力去做好一切所当行之事，以热忱的心灵和情感，去面对一切世事和世人；但同时，他并不以这个世界为依归，而是把心灵的眼目单单地瞩目于那天上的国度，就是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盼望所在。这一点，正是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中马丁路德、加尔文以及无数英国清教徒们、和过去漫长历史中一代又一代无数敬虔基督徒们的深挚信仰和坚定信念。这种信仰和信念用一句简单的英文总结就是：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意思就是，勤勉热诚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却不以这个世界为归依。

正是这样的以圣经为核心、为根基的基督教信仰精神，才导致了现代民主

主义革命的诞生。正是这样的基督教信仰精神，才能够使得民主制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稳定地、平安地、和平地持续下去，并使得其中的人民看见世事真理、享有幸福。

正是这样的基督教信仰精神，才使得无数人们以敬虔的心去顺服“在上掌权者”、顺服于世上的法律体系、政权秩序、决策过程；使得人民群众在民主决策过程中，无论决策结果是否如己所愿，都能够和平地彼此相处。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基督徒们在关于各项公共政策事务的协商与决议过程中，会主动而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会为了公共的利益而努力地献计献策；但是，若自己的一些主张和意见建议没有得到全体社会的采纳，那么，基督徒们的心里仍然是有平安的，因为他们在心灵深处的盼望与归依不是在这个世界上。

+++++

+++++

+++++

+++++

+++++

+++++

+++++

+++++

+++++

This image shows a full page of primary-ruled notebook paper. It features multiple sets of horizontal lines designed for teaching handwriting. Each set consists of three lines: a solid top line, a dashed middle line, and a solid bottom line. These sets are repeated vertically down the entire page, providing ample space for practicing letter formation and alignment. The paper is otherwise blank, with no margins or additional markings.

[illegible]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因、过程、简史、后果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A%8C%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98>

第二次世界大战（英语：World War II，简称WWII或WW2；法语：Seconde Guerre mondiale；德语：Zweiter Weltkrieg；俄语：**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日语：第二次世界大戦 / だいにじせかいたいせん），简称二战；是1939年至1945年所爆发的全球军事冲突。整场战争涉及全球绝大多数的国家，包括所有的大国，并最终分成两个彼此对立的军事同盟—同盟国和轴心国。这次战争是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动员1亿多名军人参与这次军事冲突。主要的参战国纷纷宣布进入总体战状态，几乎将自身国家的全部经济、工业和科学技术用于战争之上，同时将民用和军用的资源合并以

便规划。包括有犹太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肃清大屠杀、卡廷大屠杀、马尼拉大屠杀、战争中日军对中国军民进行细菌战、以及最终美国对大日本帝国首次使用原子弹等事件，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有纪录以来最多大规模民众死亡的军事冲突，全部将近有6900万人因而死亡，让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了人类历史上死伤人数最多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世界局势，英国、法国等欧洲殖民帝国衰落，美国和苏联则取代欧洲殖民帝国的地位成了新的超级大国并在战后形成两强格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

在1931年9月，日本便侵占中国东北，建立傀儡国家满洲国。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更爆发中国抗日战争。不过大多数人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定为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开始，这次入侵行动即导致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然而德国在入侵波兰后开始尝试在欧洲建立一个帝国，自1939年到1941年为止，发动一连串战争使德国几乎占领欧洲大部分的地区，并和意大利、日本签署三国同盟条约。而保持中立的苏联在和德国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后，也开始侵略，陆续占领或吞并在欧洲边界的6个国家，在这之中也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所占领的波兰领土。英国及英联邦的成员则持续与轴心国作战，并在北非和大西洋海上爆发多次军事冲突，而这也使英国成了欧洲少数仍继续抵抗德军入侵的主要武力之一。1941年6月，欧洲的轴心国决定撕毁和苏联的合作约定，联合入侵苏联，这次攻势也使得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地面行动爆发，也就是巴巴罗萨行动，但在之后让几乎统辖整个欧洲地区的轴心国投入大量军力来维持作战优势。

到了1941年12月，亚洲轴心国日本为了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获得领导地位，发动珍珠港事件，袭击位于太平洋的和落下的英美殖民地，导致美国向轴心国宣战，很快地于西太平洋和东亚战区获得了主导权。但到了1942年时，日本开始在一系列的海战中战败，在中途岛海战损失四艘航空母舰，欧洲的意大利也陆续于北非战役及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败退，这些都使轴心国暂停进攻的脚步。1943年时，意大利在西西里岛战役被同盟

国部队经其殖民地突尼斯登陆打败投降，推进至意大利南部，国内政变，首相墨索里尼失势，导致分裂成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德军在库尔斯克会战战败后失去对于东线的主动权，同时美国在太平洋战区中获得了一连串的胜利，自此轴心国逐渐失去主导权并开始将布署于各地的前线部队进行撤退。到了1944年时，盟军决定登陆法国诺曼底以开辟第二战场，而苏联除了收复过去被占领的领土外，也开始转往进攻其他轴心国。在苏联部队攻入柏林后，德国元首希特勒自杀，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最终在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的情况下宣告结束。而另一方面美国在1944年和1945年成功击败了日本海军部队并陆续占领数个重要的西太平洋岛屿，这使得日本列岛随时面临同盟国部队入侵的危机。最后在美国分别于广岛市和长崎市投下原子弹并造成大量日本平民死亡。1945年8月8日苏联进攻日本控制下的中国东北地区，8月14日日本跟进宣布愿意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条件，而随着亚洲战事的停息也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1945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胜利宣告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世界影响极为深远，改变往后世界的政治版图和社会结构，特别是战败的轴心国集团被迫接受同盟国的安排。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亦宣告成立，期望能够促进各国合作并防止未来的军事冲突；同时战胜的盟军各国，也纷纷在联合国各个机构中担任重要职位，特别是以美国、苏联、中国、英国和法国5个国家为首成立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主导着世界的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促使美国和苏联二者势力大幅扩张，成为彼此对立的超级大国，并在战争结束后展开长达44年的冷战局势。与此同时过去各个欧洲大国的影响力则逐渐下降，促使各个亚洲与非洲殖民地出现非殖民化的运动，陆陆续续有许多地方宣告独立。而为了面对战争所带来的破坏，各个国家也开始为自身的产业推出振兴经济措施；另外为了能够稳定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欧洲也开始推动欧洲一体化的目标。

时间

一般认为战争是于1939年9月1日爆发，这样的论点是以德国入侵波兰做为起点，3天之后英国和法国便先后对德国宣战。不过对于战争开始的日期仍然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其中一些人便认为实际上战争早在1937年7月7日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便已经开始。英国历史学家安东尼·毕佛等人则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应该从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奉天事变开始计算。

另外也有如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等抱持着不同的想法，认为抗日战争和在欧洲以及其殖民地所爆发的战争刚开始只不过是同时发生的不同军事冲突，两场战争最终于1941年合并而称其为“世界大战”。

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彻底改变了协约国和同盟国的政治版图，其中作为战胜国的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希腊和罗马尼亚获得领土作为赔偿，并且立即于这些领土上设立新的地方行政区划以进行有效的管理，而战败的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则纷纷宣告瓦解。另外一方面在1917年时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成功自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夺取了俄罗斯帝国的政权，也让原本作为参战国之一的俄罗斯帝国跟着宣告结束。

尽管在战争结束后社会开始出现追求和平主义的声音，许多欧洲国家仍充斥着民族统一主义和复仇主义的民族情节且越来越深化。特别是德国在签署《凡尔赛条约》后丧失大量领土、殖民地以及其自身的经济优势，使得德国社会对于领土收复以及复仇的思想更趋强化。然而由于《凡尔赛条约》的种种限制，德国仍然失去包括德国自身13%的领土以及所有海外殖民地，过去德国在战争期间吞并的他国领土也被迫允许独立，并以战争开销与赔偿为由征收巨额赔款。条约中更进一步限制德国军事力量的规模以及配备，包括了撤除空军以及撤销参谋部。而与此同时俄国内战渐趋缓

和，并且另外成立苏联掌管政权。

1918年到1919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导致德意志帝国瓦解并由另外建立的民主政府取代，新成立的德国政府后来又称魏玛共和国。然而在战争间期的这段时间，刚刚成立的魏玛共和国便面临了国内右派与左派各自支持者的权力争夺冲突。另一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与英国和法国签署1915年伦敦条约的意大利以获得领土为条件决定转而投靠协约国集团，但是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不满在战争结束后两国并没有遵守领土转移的承诺，随后因为这次领土扩展事件反而让意大利社会爆发冲突。而从1922年到1925年开始，以本尼托·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党成功于意大利获得执政权力，并且以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废除了原本的代议制民主结构，不断打压意大利当地的社会主义、左派和自由主义的的活动；同时意大利政府也积极展开许多外交策略，期望能够将意大利发展成为世界大国之一，而成为“新罗马帝国”。另一方面在德国，以阿道夫·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党则开始尝试在德国建立一个法西斯政府。伴随着经济大恐慌爆发之后，德国社会开始支持纳粹党执政，到了1933年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在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希特勒开始大力提拔纳粹党成员担任政府重要官员，并开始将德国塑造成法西斯极权的一党制国家。

1931年大日本帝国内军国主义正趋高涨，帝国政府开始策划如何能够有效掌控中国领土并且获取自然资源，进而借此发展出足够的实力来掌管亚洲地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满洲，并随即另外建立作为傀儡政权的满洲国。此时蒋中正以“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回应日本的入侵行为，继续剿共战争，以便稳定局势，另一方面则期望国际联盟协助处理日军进占中国领土的问题，但日本在遭到国际联盟谴责行为后随即宣布退出该组织。在这之后日本又发动了一连串的挑衅行为如上海、热河、河北，一直到1933年中日签署《塘沽协定》双方才一度宣告停战。不过中国仍组织志愿部队继续在满州、察哈尔和绥远等地抵抗日军入侵。

尽管阿道夫·希特勒曾在1923年时发起一场以失败告终的政变尝试推翻德国政府，出狱后竞选总统输给保罗·冯·兴登堡，但在1932年保守右派前总理帕彭向政敌报仇的策划下，透过右翼国家人民党及德国企业家们政商合作，身为国会第一大党的纳粹不仅获得资助、解除濒临破产的危机，更因此得到政商名流联名游说，最终说服兴登堡任命他于1933年合法成为德国总理。他宣布废除民主制度，同时借由民族主义的风潮提出要重新修正世界秩序，并很快便开始大规模地重整军备。与此同时法国为了确保意大利仍然与其合作、维持同一阵线之协议，允许意大利将埃塞俄比亚列为自己的殖民地。然而在希特勒的主导下，德国于1935年再度合并原本作为德国领土的萨尔盆地地区，而在获得民意支持的情况下德国随后推翻《凡尔赛条约》且加速重整军备的计划，甚至以大规模征兵的方式扩充部队兵力，而这些强调国家主权的举动也更加加深了德国社会对于希特勒的声望。

为了能够抗衡纳粹德国的不断发展，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决定成立斯特雷萨阵线。另外苏联也怀疑德国的目标也包括占领东欧的广大领土，苏联为此也与法国签署《苏法互助条约》；然而尽管《苏法互助条约》已经签署，该协议仍然坚持必须要经过国际联盟的讨论才能针对入侵行为有所因应，这使得这一条约基本上并无威慑力。而在1935年6月，英国甚至与德国签署了《英德海军协定》，更加缓和了先前《凡尔赛条约》的部分限制。而美国则于同年8月通过了中立法案，表示不会干涉美洲以外的国际事务。这也促使意大利于同年10月时入侵埃塞俄比亚，德国是少数愿意表态支持意大利入侵举动的欧洲国家，这也使得意大利在稍后德国吞并奥地利并未表示反对。

尽管1936年3月阿道夫·希特勒不顾《凡尔赛条约》与《罗加诺公约》而进驻莱茵兰，但是其他欧洲列强对于此事并未多加干涉。同年7月时西班牙内战爆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公开支持主张法西斯独裁的佛朗哥部队和苏联支持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军队交战，这次双方冲突也成了德国和意大利测

试新型武器与作战方式的地方，最终佛朗哥部队于1939年初成功赢得内战。1936年10月，德国和意大利组成了柏林-罗马轴心。1个月后德国和日本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意大利则在隔年也加入其中。这时中国也发生了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同意停火并组织统一战线来反对日本入侵。

战前事件

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5年—1936年）

第二次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战争是一场十分简短的殖民地战争（Colonial war），1935年10月意大利王国军队从意属索马里兰和厄立特里亚发动对阿比西尼亚帝国的军事入侵，最终于1936年5月成功完成军事占领并将之并入意属东非作为殖民地。这次军事冲突也暴露出国际联盟缺乏维护和平的力量，尽管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皆是国际联盟的成员，而意大利也明显违反了国际联盟所订定的第十条规范，但是国际联盟仍无法阻止意大利的作为。直至1941年盟军在此击败意大利侵略军，埃塞俄比亚才得以复国。

西班牙内战（1936年—1939年）

德国和意大利为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领导的国民军提供军事支持，并且协助打击当时受到苏联支持、而明显朝向左派倾斜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政府。德国和苏联也借由这次代理人战争作为契机，不断拿这次冲突来测试新型武器和战术。其中1937年4月德国秃鹰军团蓄意轰炸格尔尼卡而受到当时社会的关注，这也使国际社会担心未来的重要战争将会把平民居住区也纳入轰炸范围内。1939年4月国民军赢得内战，佛朗哥接掌政权并成为独裁者。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同盟国和轴心国都进行了交涉，但没有达成任何重要的协议，不过他仍然派出志愿军前往东线为德国作战，但在总体上仍然保持中立，不允许任何一方借道或进驻西班牙国土。同一时间，葡萄牙由安东尼奥·萨拉查推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承认西班牙

的佛朗哥法西斯军事独裁政权，并镇压葡萄牙共产党及其他反对派，签署反共宣言，扩大并巩固海外殖民地，并且建立葡萄牙青年团（Mocidade Portuguesa）与国家军团（Legião Nacional），仿效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的黑衫队进行军队训练。

日本全面侵华（1937年始）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起七七事变，七月底，日军便攻下中国过去曾数次作为首都、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北平，然而日本此时也已经把整个中国纳入其军事行动的最终目标。在中国与德国随时都有可能结束彼此间的合作关系时，中国选择与苏联迅速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苏联也开始提供军需物资以支援中国对日作战，而已经转往支持日本作为的德国则在年底停止与中国的贸易合作关系。日本攻占北平后，于1937年8月中旬进攻上海。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决定部署自己辖下素质最佳的部队防卫上海，结果在3个月战斗以后上海于11月遭到日军占领。日军之后不断逼使中国军队往西方后退，1937年12月13日日军成功占领首都南京，并屠杀大量中国平民和缴械军人。

1938年6月，中国军队为了阻止日军继续由河南向前推进至湖北，而故意造成黄河泛滥。同时中国将拖延下来的时间拿来继续加强武汉市的防御工事，但是到了10月时日军仍成功占领武汉当地。然而日本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如日军希望般瓦解中国政权的抵抗，相反地中国政府在迁往位于内陆的重庆市后仍继续坚持作战，并定都当地。

日苏冲突（1938年—1939年）

1938年7月29日，日本于张鼓峰事件中首次入侵苏联领土，苏联部队也随即与日军展开交战。虽然这次战斗是以苏联胜利作为结束，然而日本也因为这次军事冲突而有了外交谈判的机会。稍后在1939年5月11日，日本决定将武力部队移动到蒙古边境哈拉哈河附近。尽管日本最初成功击败蒙古红军

的防卫，但是在苏联的支援下最后日本关东军仍然战败。

在几次与苏联的军事冲突后，日本政府深信他们应该尽可能与苏联政府透过外交手段调解，以避免苏联稍后对日方于中国的战场有所干预。两年后世界局势剧变，苏联深深地感到了来自德国的压力，双方便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同时日本也决定将之后的军事目标转往由美国和欧洲掌握的南太平洋地区。另一方面，这次作战也促使数名经验丰富的苏联军事领导人得到提拔，例如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便是在之后莫斯科战役中成了关键性的角色。

欧洲局势及协定

在欧洲德国和意大利的举动更加变得大胆，1938年3月德国并吞了奥地利，然而这件事只自其他欧洲列强中得到一点反应。这鼓舞希特勒希望能够将过去作为索赔的对苏台德地区重新纳为德国领土，并且以该块土地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内作为少数民族的德意志族群主要生活地区而要求合并。法国和英国很快就在慕尼黑协定中承认苏台德地区应该归德国所有，在种种压力之下使得捷克斯洛伐克只能接受领土移交的要求。但是不久之后，德国和意大利仍继续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割让更多领土，这也使得邻近的匈牙利和波兰也开始备受威胁。到了1939年3月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尚未统一的部分，随后在德国安排之下将捷克斯洛伐克分成德国管辖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和和亲近德国的附属国斯洛伐克共和国。

英国和法国对于德国的举动感到震惊，但是希特勒仍进一步要求但泽利伯维尔与其合并，这促使法国和英国向波兰保证支持其独立。而当意大利在1939年4月攻占阿尔巴尼亚后，英国和法国同样保证会支持罗马尼亚和希腊。稍后不久英法与波兰陆陆续续结为同盟，而德国也与意大利正式签署了交互合作的《钢铁条约》。希特勒控诉英国和波兰试图“包围”德国，并宣布废除《英德海军协定》和《德波互不侵犯条约》。

1939年8月，德国和苏联秘密签署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时双方也秘密于条约签署时分配各方之后在“领土与政治重新安排”中所获得的利益，也对之后如何处理波兰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双方约定由德国占领波兰和立陶宛西部地区，而苏联则是占领波兰东部领土、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比萨拉比亚等地。这一协议对希特勒来说相当重要，因为它保证了德国在击败波兰之后不必如在一战中一样两面作战。

8月末德国继续向波兰边境进行动员，局面逐渐演化为全面危机。在与意大利外长齐亚诺伯爵的私人会谈中，希特勒表示波兰是一个“不稳健的中立国”，必须服从德国的要求，否则就应当予以“清算”以免日后在同西方国家的战争中消耗德国的兵源。同时他不认为英国和法国会介入这一冲突。8月23日希特勒下令于8月26日进攻波兰，但在听说英国与波兰达成了正式的互助协定以及意大利将保持中立之后，决定延迟进攻。作为对英国希望直接谈判的回应，德国于8月29日要求波兰派出代表来到柏林，商讨关于割让但泽和波兰走廊以及保护波兰境内德意志族裔的事宜。波兰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在8月31日晚间，德国宣布谈判破裂。

战争过程

欧战爆发（1939—40年）

1939年9月1日德国和其附属国斯洛伐克一同进攻波兰。9月3日法国、英国和英联邦成员国纷纷正式向德国宣战，但实质上给予波兰的支援则十分少，只有在法国萨尔当地发起萨尔攻势。不过9月3日时英国和法国也派遣海军部队封锁德国外海，期望能够破坏德国的经济发展并给予战况有些许支援。1939年9月15日，苏联在与日本就日苏满蒙边界战争签署诺门罕停火协议之后，9月17日也紧接着入侵波兰，波兰领土随即被纳粹德国和苏联瓜分，而立陶宛和斯洛伐克也获得一部分土地。但尽管如此波兰政府始终没有宣布投降，相反地另外组织波兰地下国和波兰救国军，继续在之后连同布署在波兰周遭各条战线的盟军部队一同作战。此外大约有100,000名波兰

军事人员则撤退到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国家，这些士兵后来也加入抵御德国部队进攻的行列，而著名的波兰军情处密码局则带着有关破解密码的资料撤离到法国。同一时间日本则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中国城市长沙市首次发起攻势，但是在9月下旬被中华民国国军击退。

在对波兰和立陶宛政府进行干预后，苏联依照《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强迫波罗的海国家“协助苏联军队于他们国家内进驻”。然而在1939年11月芬兰拒绝苏联近乎割让领土的要求，随后双方爆发军事冲突即冬季战争，最终在1940年3月由芬兰作出让步签署《莫斯科和平协定》。在这之期间尽管法国和英国已经向德国宣战，但是仍尽可能援助芬兰抵御苏联的入侵，而苏联也因为这入侵举动而被国际联盟剔除。

而在西欧，英国开始将其军队部署到欧洲大陆，但由于英国部队始终没有和德军发生军事冲突，这使得这段时间又称“假战”。一直到1940年4月开始，德军再发起大规模入侵的情况下才有所交战。1940年2月时，苏联和纳粹德国除战前协议外另外签署《德苏经贸协定(1940)》，由苏联提供各式原料来换取德国的军事和工业设备，而德国也能够借此回避盟军对其的原料封锁。

1940年4月德国为了避免盟军借由威尔弗瑞德行动来阻挡瑞典出产的铁矿砂运往德国的路线，决定入侵丹麦和挪威以确保原料的运输。丹麦立即宣告投降，而尽管盟军提供协助予挪威，德军仍然在2个月内攻占挪威。1940年5月为了避免德国抢先攻占，英国随即入侵冰岛以实施军事管制。同时因为挪威战役的失败，温斯顿·丘吉尔于1940年5月10日取代内维尔·张伯伦，成为英国新任首相。

轴心国推进

西欧（1940—41年）

1940年5月10日，德国开始策划入侵法国、比利时、荷兰与卢森堡，在几天内德军便以闪电战和空降战术成功攻下荷兰和比利时。法国所设下的马奇诺防线使得法军认为透过天然屏障能让德军装甲车辆无法突破，然而德军则先攻占防御较为薄弱的阿登森林后随即攻击位在比利时的盟军侧翼。最终到了同年6月初时，英国军队放弃其运到欧洲大陆的重型装备并将军队自敦刻尔克紧急撤离。而6月10日时意大利也跟着德军入侵法国，并且向法国和英国宣战，12天过后法国政府便宣布投降。向轴心国投降的法国一部分领土很快便被纳入德国和意大利占领区，而法国本土则是由残存国家身份的维希法国所管理着。7月3日英军则袭击停泊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法国舰队，以防止德国将法军舰队纳入自己的海军中。

同年6月在法国战役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天，苏联也强行并吞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国家，同时也吞并了罗马尼亚具有争议性的比萨拉比亚地区。与此同时，纳粹德国也和苏联在政治与经济合作上逐渐陷入僵局，这使得德国和苏联开始为彼此交战进行准备。

在成功瓦解法国后，德国开始尝试借由空中优势来发起取得英国上空的制空权，同时也发起海狮计划即一项空降与海上登陆的计划，准备入侵英国。然而德国空军的作战行动并没有达成目标，损失不少飞机，且无法夺取制空权，这使得入侵计划在9月时便宣告取消。而尽管德国开始将其占领的法国港口作为其新基地，但是德国海军对于仍保有一定实力的英国皇家海军并没有获得收益，这使得德国决定改以U型潜艇在大西洋巡逻并对英国航运展开攻势。另一方面意大利则将重点放在地中海及东非周遭地区，于6月时开始围攻马耳他、8月意大利占领英属索马里兰，并且在1940年9月时意大利入侵埃及。日本则在9月时开始强化对中国的封锁，派遣部队进驻位在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数个基地。

在此期间态度保持中立的美国决定采取新方案，即租借法案，以协助中华

民国和西方盟国作战。1939年11月美国政府就中立法案进行修订，允许盟军以“现购自运”的方式来购买军事物资与装备。在1940年时德国成功攻占巴黎后，美国海军也借由《两洋海军法案》（Two-Ocean Navy Act）开始显著扩大其规模；而在日本入侵印度支那后，美国则对日本实施有关铁、钢和机械零件的禁运。到了同年9月，美国还同意英国购买原本于美国基地封存的驱逐舰。但尽管如此，一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前大部分的美国公民仍继续反对美国对任何军事冲突直接干预。

而为了对付于背后支持同盟国的美国，1940年9月底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签署《三国同盟条约》正式组成轴心国集团，并建立口号（欧洲新秩序）。

《三国同盟条约》中规定除了因应苏联主动进攻而另外处理外，任何国家都必须协助任何虽未参与战争但仍被攻击的轴心国国家。在这段期间，美国则继续通过了租借法案来支援英国和中国作战；美国也授权美国海军保护英国所购买的物资和装备运往大西洋中间的安全区，之后由英国舰队接手进行管理。也因此德国和美国在1941年10月陆续在大西洋北部和中部发生数次海战，但是美国在官方立场上仍然持续保持中立。

地中海（1940—41年）

1940年11月时，轴心国开始大规模扩展自身的势力。1940年10月时意大利尝试入侵希腊，但是在几天内便被击退到阿尔巴尼亚地区而陷入僵局。至1940年11月，匈牙利王国、罗马尼亚王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相继加入了轴心国行列，而大英帝国所组成的部队也开始对对位在埃及和东非的意大利军队展开攻势。到了1941年年初，意大利军队已经被大英帝国部队逼到利比亚，而丘吉尔也将下令派遣部队前往非洲的动作称为“光采行动”，并且借此加强正在与希腊交战的意大利王国部队的压力。意大利于战争中遭受了十分惨重的损失；皇家海军派遣航空母舰攻击位在塔兰托的意大利部队，在这次的攻击中也导致3艘意大利的战列舰受损，而之后在马塔潘角海战中意大利又损失更多艘军舰。

因此德国便决定介入此战事并协助意大利对英作战。希特勒于2月时将部分德国军队派遣前往利比亚当地，并且在3月底时已经对德部队便已经数次发动小规模进攻。而到了4月时，以德军部队为首组成的联军成功推进到埃及周遭，甚至对盟军发起了托布鲁克围城战。之后大英帝国部队于5月时发起简洁行动，6月时再度发起了战斧行动，但这2次针对轴心国部队的攻势随后都面临失败。而3月初时保加利亚王国签署加入轴心国集团，以及南斯拉夫王国发生退出轴心国的政变，这促使纳粹德国决定要对巴尔干地区进行干预，随即入侵希腊和南斯拉夫并另外组织政府。轴心国部队在巴尔干地区很快获得进展，在5月底德军部队攻占希腊克里特岛后，成功迫使同盟国军队于此处撤退。6月中旬，由德国及意大利扶植的傀儡政权克罗地亚独立国加入轴心国。

不过处于劣势的盟军，在这段期间也有获得少数胜利，德国占领法国及扶植维希政府后，本来希望法属叙利亚托管地能够在中东参与对英国的作战，然而同盟国部队成功破坏在维希法国空军基地内的德军，进而阻止叙利亚于伊拉克后方发动叛乱。稍后在自由法国部队的协助下，同盟国部队也接管法国在中东的托管地叙利亚和黎巴嫩，以防止这类事件再度发生。同时，英军在1941年向意属东非反攻，成功夺回索马里及埃塞俄比亚等东非地区的控制。而在大西洋，英国成功击沉了德国旗舰俾斯麦号，这使得日益低迷的民众士气再次受到鼓舞。同时英国皇家空军也在不列颠空战中成功抵御了德国空军的轰炸，最终德国于英国上空的主要空袭行动在1941年5月宣告结束。

亚洲

而在亚洲战区，尽管双方都互有发起攻势，但是在1940年时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陷入僵局。日本为了增加对中国所施加的压力，决定开始优先攻占重要位置以阻止供应路线，同时准备与西方列强展开战争。这一时期，日军也继续占领了印度支那南部地区并给予军事管制。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华北一带成功发起攻势打击日军部队，作为报复日本则决定在占领区内对共产党党员和一般民众实施严厉的三光政策，希望能够借此方式有效减少共产党游击队的人力补充和物资供给。另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之间仍持续存在着互相牵制的气氛，到了1941年1月双方爆发武装冲突后便宣布结束彼此的合作关系。为了能够成为之后欧洲和亚洲稳定之后的霸主，德国、日本和苏联开始对之后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进行准备。尽管德国与苏联正逐渐处于紧张的局势，日本考虑到一方面德军在欧洲战场上仍占有优势，而另一方面自身的目标则是夺取欧洲国家殖民下的东南亚地区及其丰富资源，为此日本与苏联2个强盛国家在1941年4月签署了《苏日中立条约》。但是在另一方面，德国则逐步在苏联边境布署军事武力，准备在之后直接攻击苏联。

全球冲突

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起巴巴罗萨行动，联合其他欧洲轴心国集团的成员国以及芬兰共同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目标是期望借由兵分三路快速突击攻占波罗的海地区、莫斯科和乌克兰，北方主力由里布元帅的德国北方集团军和芬兰军进攻，中路由博克元帅的德国中央集团军进攻，南方由伦德施泰特元帅的德国南方集团军下辖曼斯坦因等名将和罗马尼亚军进攻。最终战略目标则是在1941年末攻下从阿斯特拉罕至阿尔汉格尔斯克所连结的AA战线以内范围，并且能够有效掌握里海和白海的周遭交通。希特勒的目标是借由发展成为军事大国的德国来消除苏联本身以彻底消灭共产主义，并且借由驱赶当地居民的方式来获得所谓的“生存空间”；同时德国也希望能够攻占苏联的重要地区，并且借由当地的战略资源进而能够击败德国的其他对手。

虽然苏联红军在战争之前亦有准备战略反攻计划，但是轴心国部队发起的巴巴罗萨行动仍迫使苏联最高统帅部只能采取战略防卫作战。到了夏日期间，轴心国成功进占大量的苏联领土并且也造成苏联军方巨大的人员和

物资损失，交通几乎瘫痪。然而到了8月中旬德国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决定让渐趋劳累的德国中央集团军中止发起对于苏联的包围作战，并且连同第2装甲军团（2nd Panzer Army）一同向乌克兰以及列宁格勒推进。德军在对基辅的攻势中获得压倒性的成功，导致一共有4个苏联集团军遭到围剿和歼灭，这也让德军得以更早占领克里米亚到乌克兰东部的工业发达地区。

将近75%的轴心国部队以及绝大多数原本布署于法国和地中海中部的空军部队陆陆续续转移到东线，这促使英国政府重新思考其大战略计划。同年7月英国和苏联一同组成反对德国的英苏协定，同时英国和苏联也一起入侵伊朗，以确保波斯走廊（Persian Corridor）和伊朗当地油田不会落入德军占领之下。到了8月英国和美国则一同签署《大西洋宪章》。

到了10月，芬兰军队入侵苏联占领冬季战争前被夺去的领土并发起攻势更进一步占领了彼得罗扎沃茨克，并威胁摩尔曼斯克和整个卡累利亚，大量苏军被芬兰牵制；在东线南方，罗马尼亚军队靠着德军闪电战的威力夺回巴撒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等过去割让给苏联的领土。并在敖德萨战役重创苏军并占领该市，乌克兰西南部部分领土被罗马尼亚占领，在稍后德罗联军成功攻陷塞瓦斯托波尔，并且将主要的兵力改调往莫斯科以展开进攻。在经过两个月的激战后，德军部队几乎达到莫斯科外围地区，并随即包围莫斯科，莫斯科为苏联情报及交通中心，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经过思考决定死守城市，莫斯科战役展开，然而经过长期行军而疲惫不堪的部队也迫使德军暂缓进攻，而且遇上严寒士兵冻伤十分严重。尽管轴心国部队成功攻占广大的领土，然而在这次交战中并没有达成主要目标；许多重点城市仍然在苏联坚持抵抗下始终无法击溃（如列宁格勒），这也使得苏联在之后仍保留相当程度的军事潜力，德国暂停攻势也让苏联有喘息的机会，而在巴巴罗萨行动宣告结束之后，也意味着欧洲战场的闪击战阶段也已经结束。

12月初古德里安的德军下令停止对莫斯科的包围，而苏联亦正式动员所有

后备部队并准备与轴心国部队展开作战。苏联开始依据理查·佐尔格等间谍所搜集的资讯陆陆续续将军队移往欧洲东线准备作战，期望能够防止轴心国集团继续往苏联领土进攻，而面对日本关东军则只布署最少的兵力来作为警戒用。同时因德国开始受到阻滞，日本放弃了北进。到了12月5日开始苏联发了大规模的反攻作战，对布署战线长达1,000公里的德军展开攻势，并成功往西推进100公里—250公里之处。

德国1940到1941年在欧洲所获得的一连串胜利，在某些程度上也鼓励日本对欧洲各国政府施展压力。已流亡英国的荷兰政府同意继续供应日本由荷属东印度所制造的石油，但是拒绝将该殖民地的控制权移交给日本政府。相反的维希法国则同意日本继续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到了1941年7月，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决定以日军试图占领中南半岛为由而冻结所有来自日本的资产，而提供日本近80%石油的美国也决定严格实施石油禁运政策。这项石油禁运政策促使得日本可能必须放弃其在亚洲的野心计划、并且逐一暂缓对中国所发起的战争；或者是以武力攻占领土的方式来获取所需要的自然资源。

对此日本军方完全舍弃第一个方案，并且许多军官认为石油禁运实际上就是对日本展开的潜在“宣战”。

对于这种情势，日本计划迅速以武力的方式攻占欧洲位于亚洲的殖民地地区，并随即建立一个延伸至太平洋中线的大型防卫圈。随后日本便会尽可能使用在东南亚所获得的资源，来对遭受第一波攻击的同盟国军队展开防御作战。为了防止之后美国对于日本的作法展开干预，日军从一开始便策划对于防卫圈外围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展开歼灭性攻势。于是计划突袭美军夏威夷的海军基地，珍珠港。

1941年12月8日（北美地区为12月7日），日本同时对由英国与美国所掌握的东南亚周遭地区和太平洋岛屿展开攻势，在这其中也包括有偷袭位于珍珠港的美国舰队、攻占泰国和马来西亚地区以及占领香港等等。

这一系列的袭击促使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中华民国和其他同盟国国家正式对日本宣战，纳粹德国、意大利王国和其他签署《三国同盟条约》的成员国也作出回应并向美国宣战。1942年1月美国、英国、苏联、中华民国和另外22个小国或者流亡政府一同签署《联合国宣言》，在内容中再度申明《大西洋宪章》的观点。然而苏联本身出自利益考虑，并没有完全遵守《联合国宣言》的内容，除了继续依照过去与日本签署的协议而对于日军保持中立的态度，同时本身对于自决原则也没有表达正面支持。而从1941年斯大林陆陆续续要求丘吉尔以及罗斯福在法国展开“第二战线”。其中欧洲东部战线当时已经成为欧洲战区的主要战场，苏联在这次军事冲突中有将近数百万的伤亡者，相反的同时作为同盟国成员的西方国家则大约损失数十万人。不过丘吉尔和罗斯福则表示他们需要更多的准备时间，在其他同盟国始终无法确保优势的情况下使得苏联只能够继续单独抵抗德军攻势，这也使得苏联在战后不断以此来向西方国家要求赔偿。

日军进犯马来亚吉隆坡

1942年4月日本与其合作国泰国已经几乎完全占领缅甸、马来亚、印尼、新加坡和拉包尔等地，盟军部队在日军攻势下普遍造成严重的损失，同时日军也俘虏大量的囚犯。尽管日军在科雷吉多岛当地遭遇强硬抵抗，1942年5月菲律宾最终仍然遭到日军占领且逼使得菲律宾自治政府被迫流亡。而日本海军也在在南海、爪哇海和印度洋中获得胜利，并且成功轰炸盟军部队位于澳大利亚的重要海军基地达尔文。这段时间中盟军对于日本唯一取得的胜利则是中华民国于1942年1月上旬爆发的第三次长沙战役，而获胜主要原因在于日本过度自信能够轻易取下胜利，而对于国军并无完善的准备。

面对美国海军开始大力协助英军运补作业，纳粹德国海军决定主动对美国大西洋沿岸所有运输船只展开攻击。尽管德军已经造成苏联极大的人员与物资损失，但欧洲轴心国成员停止对于主要布署在俄罗斯中部和南部地区的苏联军方展开攻势；相反地开始强化自身对于所占领领土的控制能力。

而在北非战场方面，德军于1月时对英国展开大规模攻势，一直到2月初英军才勉强在加查拉战线中抵御德军进攻。尽管轴心国集团暂缓部队的进攻速度，以德国为首的欧洲轴心国仍加紧准备以投入下一波攻势。

轴心国停止攻势（1942–43年）

太平洋

早在1942年5月日本开始发起两栖作战的MO作战，准备占领莫尔兹比港来阻断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通讯以及物资流动。然而盟军成功在珊瑚海海战之中，阻止了日本海军持续往前推进。在美军成功空袭东京之后，日本计划占领中途岛并引诱美国航空母舰在周遭作战，期望能够一次彻底击溃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与此同时为了能够吸引美军的注意，日本也另外派遣部队占领隶属于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岛。日本军方将大规模的攻击计划设定在6月初展开，然而美国于5月下旬时成功破解日本海军的通讯密码，在充分了解计划内容和部队安排后美军成功凭借著资讯优势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大日本帝国海军在中途岛战役后也势力大为削减许多。

在积极策划的中途岛战役反而损失大量航空母舰后，日本改将重点放在自陆地上发起攻势占领位于巴布亚领地（Territory of Papua）的莫尔兹比港。而美军则是计划对位在日本所罗门群岛南部的军事基地展开反击，陆陆续续准备布署兵力前往瓜达尔卡纳尔岛，同时美军也希望能够另外发起攻势打击日本在东南亚重要基地的拉包尔。

美军两项计划于7月开始展开，然而9月中旬时日本将瓜达尔卡纳尔岛列为优先保卫的目标。日本首先将于布纳-哥纳当地与美国和澳大利亚部队作战的日本新几内亚部队撤离，陆陆续续开始将大量兵力从莫尔兹比港地区移往北部省当地支援。而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成为双方激烈争夺地区后，双方的支援部队与物资开始纷纷尝试借由船舰运送的方式提供。最后到了1943年，日本决定不再继续增加支援部队并开始规划准备撤离。同一时间，盟

军也开始在缅甸发起数起攻势。首先在1942年年底之针对若开邦发起作战行动，然而反遭到日军的反击并损失大量人力与物资，最终在1943年5月重新撤退回到印度。另外缅甸战区的盟军也派遣缅甸远征军特种部队

（Chindits）在日军势力范围处展开骚扰作战，并在4月下旬成功获得些许战果。

东线

而位在德国东线战场部分，轴心国集团成功在刻赤半岛和哈尔科夫中击败苏联反攻。1942年6月时，德军决定对于苏联南部地区发起大规模的蓝色行动，希望借此占领高加索地区的油田与库班沙特，同时继续维持在保北方和中部地区的占领区统治。为此德国南方集团军将自身兵力分成两大部分，分别是负责攻占顿河的A集团军（Army Group A）与占领高加索东南侧窝瓦河一带的B集团军。另一方面，苏联则决定于德军极有可能攻占的斯大林格勒进行驻防。

11月中旬时尽管德军已经攻下斯大林格勒，然而之后所面临的城镇战却使得德军遭遇苦战，这时苏联也开始准备第二次的冬季反攻计划。其中苏联部队成功在天王星行动包围德军绝大多数的部队势力，但是在稍后展开的火星行动中苏联却反而获得大量的损失。不过在一连串反攻计划下在1943年2月上旬德国陆军已经难以继续维持战线，其中原本占领斯大林格勒的德军部队宣告投降，而轴心国集团也将前线往回撤到夏季攻势前的位置。不过同样在2月下旬，随着苏联部队的撤离行动反而让德国对哈尔科夫发起攻势，最后轴心国部队在库尔斯克建立了较为突出的前线阵地。

西欧/地中海

另一方面在1941年11月时盟军于北非发起反攻，在十字军行动（Operation Crusader）中成功收复原本德国和意大利的占领地区。而为了避免日军占领维希法国所统辖的马达加斯加作为基地，1942年5月上旬英军发起占领攻

势。稍后轴心国集团成功自利比亚发起攻势击败同盟国部队，同时逼使盟军被迫退回到埃及，双方最终于阿拉曼当地陷入胶着情况。而在欧洲大陆这一部分，尽管同盟国战略性派遣突击队攻占迪耶普的重要设施，但最后仍然遭到拥有优势兵力的德军部队所击溃。这次作战也使得同盟国部队了解除非有更好的计划策划、武器装备以及后续规划，否则西方同盟国并无法发动大规模的入侵行动。

1942年8月，盟军成功击溃德军对阿拉曼发起的第二次攻势，但在面临重大损失以及需要物资补给的情况下英军发起基座行动援救马耳他。两个月后盟军自埃及发起大规模作战行动，成功逼使轴心国部队撤离利比亚而于更西方北非基地驻守。同一时间英国与美国联合部队也跟进占领法属北非，这也促使统辖该地区的殖民政府决定加入同盟国行列。面对法国殖民地改投靠同盟国集团的作为，希特勒决定派遣部队占领维希法国。虽然对于这违反停战条约的军事行动法军并没有抵抗，然而法国仍特意破坏自己的海军舰队以防止纳粹德国将其收归使用。随后德意志非洲军开始自突尼斯当地撤离北非战场，到了1943年5月同盟国军队则成功占领该地。

盟军反击（1943—44年）

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结束之后，盟军针对日本于太平洋地区的部队开始展开反击行动。1943年5月，同盟国军队前往阿留申群岛与占领当地的日本部队进行交战。之后盟军将其目标转往拉包尔并开始尝试占领周遭岛屿以阻碍日军的补给路线，同一时间也针对太平洋中部日军所占领的吉尔伯特及马绍尔群岛展开反击。1944年3月底时盟军成功完成这两个目标，此外也瓦解了日本于加罗林群岛的重要根据地特鲁克岛。到了4月时，同盟国部队决定优先夺回西新几内亚地区。

东线战场方面，德国和苏联在1943年春季和夏初都没有进行作战，相反的彼此都计划于苏联中部展开大规模攻势来化解僵局。1943年7月4日，德军自其战线突出的库尔斯克地区展开大规模攻势行动；然而在苏联故意吸引

德军深入再歼灭以及优良的防御措施准备下，德军持续一个礼拜的攻势后便开始被迫撤离。尽管德军在这次会战中有数次成功取得战术性成功，然而，在希特勒的强烈介入之下反而使得行动提前宣告结束。在这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西方同盟国于7月9日对西西里岛展开入侵行动，而在这之后一个月后同盟国部队成功击溃意大利军方，并且开始大规模追捕墨索里尼。

1943年7月12日苏联则发起自己的反攻作战，这次行动成功消除了位于东欧的德国部队期望能够继续保持僵局战况的期望。而自库尔斯克会战是以苏联胜利结束后，除了意味着德军于东线的优势逐渐消逝外，同时也给苏联东线战场的主动权地位。虽然德国试图匆忙强化布署的黑豹-沃坦防线（Panther-Wotan line），然而苏联军仍然自斯摩棱斯克和第聂伯河展开攻势，并成功突破德军于东线的防备。

1943年9月西方盟军入侵意大利本土后，意大利政府随即开始与盟军协商停战事宜。在面临即将失去意大利部队协助的情况下，德国派遣部队试图夺取意大利部分地区且实施军事管理，并且另外设立一连串的防线驻守。同时德国特种部队也在橡树行动中成功救出墨索里尼，并且尽快将其送往德国占领地区内，另外成立新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而在意大利本土经过数场战斗后，一直到11月中旬西方盟国的主要部队才开始与德军设立的冬季防线交战。

德军与大西洋海上的作战也开始受到阻挠。自1943年5月开始盟军新开发的反潜设备成功阻挡德国潜艇的攻势，而大量德军潜艇损失也迫使德国海军暂停在大西洋海上的攻击行动。1943年11月，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与蒋中正于开罗召开会议，在会议上首次确认了有关日本所占领土的解决方案。稍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则也召开德黑兰会议继续讨论战后问题，其中西方盟国约定将在1944年入侵欧洲大陆，而苏联则是同意在德国战败后3个月内向日本宣战。

从1943年11月日本与中国爆发持续7周的常德会战。在这之中中国政府希望

能够迫使日本在战争中必须付出极高昂的代价，并且期望同盟国部队能够协助中国继续维持作战能量。1944年1月盟军针对意大利战场的防线发起了一系列攻势，甚至希望能借由两地包抄的方式瓦解德军防线。同样在东线战场，苏联在1943年年底开始尝试对包围列宁格勒地区的德军展开攻势，并在这攻势中成功结束历史上持续最长且最致命的围攻作战。随后苏联展开列宁格勒-大诺夫哥罗德攻势以逼使德国北方集团军撤离波罗的海地区，但是在纳尔瓦战役后成功占领过去德国所统治的爱沙尼亚后短暂停止进攻，并且协助爱沙尼亚流亡政府重新掌握政权，而之后针对波罗的海国家作战时苏联也多以这种模式处理。1944年5月下旬，苏军成功攻占克里米亚，这成功促使位在乌克兰的轴心国部队纷纷开始向西方后撤；然而在同一时间苏联入侵罗马尼亚时，则反遭到当地驻守的轴心国部队所击退。而同盟国部队亦在意大利战场上获得战略性胜利，成功促使德军部队往北方防线撤离，到了6月4日时成功攻占罗马。

然而在亚洲战区上同盟国部队却始终没有获得更加进一步的进展，其中1944年3月时日本决定从两个地区展开反击。首先针对英属印度边境地区发起乌号作战，并且一度使得英军部队在英帕尔与科西玛遭到围困。不过在1944年5月时英国军队发起反击，成功逼使日军撤回缅甸，而在1943年年底时进攻缅甸北部的中华民国部队也成功将日军围困于密支那地区。另一方面日本也决定强化对于中国入侵行动的进展而发起一号作战，除了一方面借此攻势确保日本所占地区的交通运输外，另一方面也期望彻底破坏同盟国提供中国物资的机场设备。到了6月时日本已经占领了河南省，并且针对湖南省与长沙一带展开大规模的攻势。

盟军逼近（1944年）

1944年6月6日西方盟军开始大规模入侵法国北部。同一时间布署在意大利的数支盟军部队在重新划分单位后继续袭击法国南部地区。伴随着登陆计划的成功，驻守在法国的德国陆军部队始终无法有效阻挡同盟国的攻势。

盟军8月25日宣告成功解放巴黎；而在整个下半年间，西方同盟国陆续逼迫其他驻守于西欧各国的德国军队撤离。但是尽管盟军部队从西欧往东进攻的计划并无遇到大规模阻挡，然而当盟军部队企图空降荷兰当地的市场花园行动却以失败作结束，这使得盟军原本打算另外自德国北部攻击的计划只能暂止。在此之后西方盟军逐渐往德国逼近，并在尝试穿越卢布河（Rur）时遭到德军较大规模的攻势阻挡。而原本计划从意大利往北进攻的盟军部队，同样被最后一个德军所设下的哥德防线所阻挡。

6月22日，苏联则发起巴格拉基昂行动来向白俄罗斯展开主动进攻，并几乎摧毁了德国中央集团军的主要兵力。而在这之后，苏联部队则开始向乌克兰西部和波兰东部的德国军队展开攻势。苏联的快速进展促使许多波兰家乡军成员开始展开暴风行动（Operation Tempest），其中又以华沙和斯洛伐克南部地区的反抗声势最大。然而在苏联没有积极提供协助的情况下，这些反抗行动纷纷遭到德军部队的镇压。随后苏联红军战略性包围并歼灭了布署在罗马尼亚东部的德国南乌克兰集团军（Army Group South Ukraine）部队，并促使8月23日罗马尼亚王国国王米哈伊一世政变拘捕亲德总理安东内斯库。9月8日保加利亚王国当地发生政变：苏联支持下的保共推翻了保加利亚王室，年仅7岁的沙皇西美昂一世被驱逐，摄政王基里尔王子则被枪决。随后苏军占领的这两个国家便宣告加入同盟国的行列。

1944年9月苏联部队提前进入南斯拉夫，这项作法一方面成功逼使占领希腊的德国部队迅速撤离外，另一方面也促使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轴心国部队遭到孤立。为此自1941年开始领导共产党游击队的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开始进行更大规模的游击行动，最终成功掌控南斯拉夫境内并且阻止德国部队的进占。另外苏联也提供少数资源协助在塞尔维亚北部的游击队反抗塞尔维亚救国政府部队，最终两者在10月20日时一同解放首都贝尔格莱德。几天过后苏联发动大规模进攻，并于1945年2月攻陷德国边境并占领匈牙利的重要城镇布达佩斯。但相较于苏联在巴尔干半岛地区获得的一连串胜利，苏联在针对芬兰所发起的攻势之中始终遭遇芬兰反抗势力的

反击而无进展，双方并在卡累利阿地峡随即陷入胶着。最后芬兰同意以和平且不并吞为前提的情况下于1944年9月签署莫斯科停战协定，放弃所有冬季战争前的领土，随后芬兰随也转移到同盟国阵营的行列。

而自7月开始，位在东南亚的英国部队成功击退日本发起的大规模攻势，同时将日军逼往钦敦江地区驻守。而中国部队也成功夺回密支那；但是在中国本土则遭到日本严重打击。日军在6月中旬时成功攻下长沙、并在8月初占领衡阳。不久之后日军南下入侵广西一带，在11月底时成功击败中国军队主力并且占领桂林与柳州一带。而到了12月底时，日本已经成功建立了联结中国与印度当地作战的兵力联系。

不过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则渐渐获得优势，并且不断自太平洋往日本周遭岛屿逼近。1944年6月中旬，美军开始针对马里亚纳群岛及帕劳等地发起一连串的攻势，并且在菲律宾海海战中对日本海军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一连串的战事失败逼使得东条英机辞去日本首相一职，同时美国陆航队也开始自周遭基地对日本本土发起密集的袭击。10月下旬美军部队成功占领菲律宾莱特岛，而在作为历史上最大规模之一的莱特湾海战成功获得关键性胜利。

轴心国崩溃，同盟国胜利(1944-45年)

1944年12月，德国开始集结剩下的部队以及后备武力并于阿登发起大规模反击攻势。德军希望借由夺回安特卫普港口来让以占领大多数土地的西方盟军暂缓攻势。在这之后德国政府希望能够促使同盟国集团提前分裂，借由政治的手法来让德国在进行谈判时能够获得有利地位。然而到了1月时德军的攻势遭到击退，而德军也没有获得实质上的战略目标或者是收益。在意大利战场上，盟军部队仍然迟迟无法击败德军所布署的防线。1945年1月中旬苏联从波兰维斯瓦河发起进攻，很快的，苏联军队便往前推进到德国奥德河处，并且成功占领东普鲁士。2月4日，美国、英国与苏联领导高层展开雅尔塔会议；除了同意德国投降后将采取分区统治外，苏联也再次确

认将会向日本宣战。

到了2月时苏联入侵西里西亚与波美拉尼亚，而位于西线的盟军则将战线成功推进到莱茵河处。3月时，盟军部队分别自莱茵河北部、莱茵河南部以及鲁尔地区渡过莱茵河，并且随即在鲁尔成功包围德国B集团军；另一方面，苏联红军则迅速将东部战场推进到维也纳。4月初时盟军部队终于突破位在意大利的防线并将战线推往德国西侧，而在4月下旬时苏军部队则成功进入柏林外围。4月25日时，同盟国部队首次在易北河会师。到了1945年4月30日德国国会大厦遭到苏联红军占领。纳粹德国整个军事行动失败。

在同盟国集团快速往德国推进期间，各国政府的重要领导人也有所变化。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于4月12日逝世，改由副总统哈瑞·杜鲁门继任职位。意大利法西斯领导人墨索里尼则是在4月28日时，遭到意大利抵抗运动（Italian resistance movement）成员逮捕并击毙。两天之后希特勒自杀身亡，德国政府则改卡尔·邓尼茨继任。而轴心国部队也开始纷纷向盟军投降，其中在4月29日时驻意大利德军正式投降，5月7日美英法苏四国攻入柏林后德国政府则前往汉斯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不过正式的文件则是5月8日于柏林重新签署，5月8日这一天也因此订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战胜利纪念日。不过苏联在签署投降书后仍然遭到德国中央集团军反击，并一直到5月11日才宣告结束。

另一方面太平洋战区美军部队则获得菲律宾自治领部队的协助，其中盟军于1945年1月登陆吕宋岛，并且在3月时成功攻下马尼拉。在这一系列战役中，虽然美军在总兵力上处于劣势，但在战斗力上处于绝对优势，日军在此阶段遭受了极为巨大的伤亡，残余日军纷纷退入菲律宾吕宋岛、棉兰老岛等人烟稀少岛屿。

1945年5月，以澳大利亚为主的同盟国部队登陆婆罗洲，并且借此成功获得当地的油田。英军、美军和中华民国部队成功击败布署于缅甸北部的日本部队，而到了5月3日时英军成功进占仰光。在1945年4月6日到6月7日爆发

的湘西会战以中国军队的胜利结束后，中国军队开始策划大规模的反击行动（某些地区更发起了对日军的局部反攻作战）；而美军也在3月到6月底这段期间开始进一步往日本本土逼近，陆陆续续占领硫磺岛和冲绳岛。美国也不断对日本本土施加压力，除了派遣大量轰炸机炸毁日本主要城镇外，同时美军潜艇也在日本近海封锁其对外的物资进口。

7月11日时，盟军领导人前往德国召开波茨坦会议。其中在《波茨坦协定》中除了确认有关先前签署的德国战后处理外，同时也重申日本必须接受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不过在这次会议之中由于英国进行国会大选，使得英国首相改由艾德礼接替丘吉尔的职位。但是由于日本迟迟没有正面回应《波茨坦协定》的内容，美国政府决定对广岛市以及长崎市展开核子轰炸。与此同时苏联则依照雅尔塔会议的内容进攻日本控制的伪满洲国，并且顺利击败关东军，此外还占领了库页岛与千岛群岛等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并于9月2日在美国最后一艘战列舰密苏里号甲板上签署《日本投降书》，这也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宣告结束。

战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同盟国陆续在奥地利和德国实施统治。其中同盟国在1955年允许奥地利成为永久中立国家，将不会与任何政治集团有所密切交流。而同盟国则将德国领土分成数块，其中西部由西方盟国所统治、东部则由苏联所管辖。同盟国也强烈要求德国社会必须去纳粹化，同时开始起诉纳粹战犯以及对前纳粹党成员进行审判，不过在政权转交给西德之后大多是安排赦免，并且尝试将这些成员重新融入社会环境中。同时德国也被要求归还自1937年战争爆发以来所占领的四分之一领土，其中位在东部地区的西利西亚、诺伊马尔克与波美拉尼亚归属波兰统辖，而东普鲁士的领土分配则引起波兰与苏联的争执。随后有将近900万名德国居民纷纷自归还区中撤出，同样在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则有300万名德国民众也被迫搬回德国居住。根据1950年代的统计，平均5名德国民众中有一名为来自

东部占领区的居民。此外苏联也分别自波兰寇松线以东地区、罗马尼亚东部、芬兰东部以及3个波罗的海国家中获得部分土地，但这也至少让近2万名波兰民众被迫远离自己的住家。

参战双方不论战胜或战败皆为战争已经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同盟国集团为了能够真正维持之后世界秩序的和平，于1945年10月24日正式成立联合国，并在1948年通过《世界人权宣言》来作为各个会员国的共同标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胜利的国家在联合国获得庞大权力，其中美国、苏联、中华民国、英国和法国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虽然今日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所提到的地区仍然没有改变，但实际上管辖的政权则有所变化。其中中国席位则在1971年所通过的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中，确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华民国原席位；而1991年苏联解体后，则由作为苏联继承国家的俄罗斯担任常任理事国委员员的职位。在战争结束后，西方同盟国与苏联之间的结盟关系渐渐恶化，甚至德国在“事实上”很快便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两个独立国家政权。双方开始将彼此的占领区划下统治权边界，欧洲国家也纷纷被划分到西方世界或者苏联的势力范围。其中东欧和中欧国家纷纷纳入苏联势力范围内，这使得苏联开始介入其所占国家的政权结构，并且建立以共产党进行领导的合作政府。波兰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东德纷纷成为苏联的附庸国；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则因为坚持完全的独立而与苏联陷入紧张局势。很快战后世界便分成是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两个正式的国际军事同盟，双方随即陷入长期政治紧张和军事竞争的冷战时期；同一时间也促使了军备竞赛以及代理战争概念的出现。冷战让全世界都笼罩在核战争的阴影下，美国和欧洲盟国经常举行核战争演习，长期的军备竞赛严重影响各国经济增长，且东西方的民间交流和往来被阻隔长达半个世纪，这些情况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后才得以改变。

战后中欧的边界变化和共产主义东方集团的创立

在亚洲地区方面同盟国则达成协议苏联能够吞并库页岛和千岛群岛，而由美国领导战后日本的发展以及统辖过去日本所占领的西太平洋岛屿。但另一方面过去由日本统治的朝鲜，则在盟军托管时期以38度线划分成苏联管辖的北部地区和美国统辖的南部地区。之后在1948年时这两个以38度线划分的地区纷纷宣布自己为朝鲜的合法政府，最终导致了韩战的爆发。在中国自1946年开始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再度引发国共内战，最终由中国共产党赢得内战并于中国大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民国政府则于1949年时搬迁到台湾。在中东方面，阿拉伯国家拒绝联合国大会181号决议中将巴勒斯坦土地重新分配并建立以色列；以色列才刚建立随即爆发第一次中东战争，而战争的结果反而更加促使随后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间的冲突。虽然欧洲殖民列强仍然试图保留其部分过去殖民帝国，然而战争期间所损失的声望与资源使得这些欧洲国家无法继续维持统治权力，最终导致亚洲与非洲的非殖民化进展。大英帝国、葡萄牙帝国等老牌欧洲殖民帝国也在这一时期逐渐瓦解。

受到战争的影响导致全球各国或多或少都受到影响，其中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经济并没有受到严重威胁，也进而促使战后婴儿潮的出现。而在1950年时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发展比其他政府还要来得高，同时美国也有更多能力来主导西方世界的经济走向。在1945年到1948年时，英国和美国强烈要求德国西部工业应该响应裁军政策；然而由于国际贸易彼此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导致欧洲经济一度停滞且让其延迟几年复苏。一直到1948年中期西德进行货币改革政策时逐渐恢复其经济发展，同时马歇尔计划也成功促使欧洲经济政策的自由化。之后1948年西德经济的快速复兴得到“德国经济奇迹”之称，同一时间包括意大利和法国的经济也逐渐恢复正常。但与此相反的是英国则处于经济崩溃的状态，同时在这之后持续10年的经济衰退。另一方面尽管苏联经历了庞大的人力和物质损失，然而在战争结束后生产快速增长。在亚洲地区，日本经济也经历了快速增长，并

在198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之一，而中国则直到1952年才恢复为战前工业生产水平。

影响

人员伤亡与战争罪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伤亡人数统计

有关战争所导致的总伤亡人数各方估计皆不相同，因为很多人在因故死亡后并没有留下相关记录。绝大多数资料估计大约有6,000万人在战争中丧生，其中包括约有2,000万名士兵和4,000万名平民，其中许多平民分别死于传染病、饥饿、大屠杀、轰炸和蓄意的种族灭绝政策。根据估计损失最大的苏联在战争中失去将近2,700万人，其中包括有870万名军事人员和1,900万名平民丧生。1941年初苏联人口统计数为1.967亿（包括新兼并地区），而1946年仅余1.67亿，因此苏联的实际死亡人数应该大于俄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其中因军事行动而丧生最多的民族则是5,756,000人逝世的俄罗斯人，稍后排名第2名的民族则是损失1,377,400人的乌克兰族，平均每4名苏联公民便有1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或者受伤。另一方面德国最终则损失530万名军事成员，其中绝大多数是于德苏战争和在德国最后几场战役中丧生。

而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亡比例来说。轴心国集团其丧生人数大约有15%，而剩余的85%则是同盟国部队的丧生人数；在这之中主要是苏联和中国的人民，其中许多人是由于德国和日本部队于占领区实施的战争罪行所导致的。根据估计大约有1,100万名至1,700万名平民直接或者间接死于纳粹思想的政策中，其中包括大约有600万名犹太人因而遭遇系统性的种族灭绝式大屠杀，另外还有500万名罗姆人、同性恋者、斯拉夫人以及其他种族与少数民族也遭到杀害。此外南斯拉夫乌斯塔沙则与轴心国集团合作杀害大量作为少数民族的塞尔维亚人、罗姆人和犹太人，而在战争结束后克罗地亚

平民则对此展开报复。另外大约有300万名到1,000万名中国平民则是在日本占领地区及双方交战区域因各种原因非正常死亡，在这之中最有名的事件则是南京大屠杀，其中有数十万名中国军民因而遭到杀害，冈村宁次所制定实施的三光政策，则导致有200多万名中国群众非正常死亡。日本的入侵导致中国年均人口增长数由1927—1937年间大约350—360万降至1937—1945年期间的约310多万。

轴心国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有限度的使用生物和化学药剂，例如意大利军方在第二次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便尝试投入芥子气作战，而大日本帝国陆军则在与苏联的早期冲突、入侵并占领中国时也使用生物或化学武器协助作战。此外德国和日本也针对平民施放药剂来测试武器效果，在某些情况下也于战俘身上进行实验。

虽然许多轴心国的违法行为陆续被送往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法庭进行审判，然而苏联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犯下许多战争罪行。这其中包括苏联的人口转移政策，严责行动（Operation Keelhaul）、战后对德意志人的驱逐、占领德国期间的强奸罪行以及卡廷大屠杀。另外一些大饥荒的死亡人数也可以归因于战争爆发，这包括1943年的孟加拉饥荒和1944年至1945年的越南饥荒。

集中营、奴役和屠杀

在纳粹大屠杀中主要有600万名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遭到杀害，另外在蓄意灭绝计划中也导致200万名波兰人民以及400万名包括身心障碍、精神病患、苏联战俘、同性恋者、共济会成员、耶和华见证人与罗姆人等“不值得活的生命”遭到杀害。另外以东欧为主有1,200万名民众被迫成为劳工，并且强迫在德国各家工厂内进行劳动。

而除了纳粹统治下设立的集中营导致大量人员遭到杀害，苏联古拉格于各地设立的劳动营也导致德国战俘以及包括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与爱沙

尼亚等占领区公民丧生，甚至一些苏联公民也因为被怀疑与纳粹主义有关而遭到迫害。根据统计在战争期间有60%的德国战俘于苏联丧生，而理查·奥弗里（Richard Overy）则表示有将近570万名战俘丧生，其中大约有57%、约360万人因故丧生或者遭到击毙。另外苏联也将过去遭到德军俘虏者或者自他处遣返平民视为潜在与纳粹主义合作者，其中一些受到怀疑的人在经过内务人民委员会审查后往往遣送古拉格处理。

日本所设立的战俘营与劳改营中也有着极高的死亡率，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调查发现西方囚犯的死亡率高达27.1%，其中美国战俘甚至有37%的死亡率，这个比例比美军遭到德国和意大利俘虏者的死亡率多出7倍。

在日本投降后所有获释的囚犯中，有37,583名来自英国、28,500来自荷兰以及14,473人来自美国，但中国囚犯仅有56人未被杀害而成功获释。

根据统计在1935年到1941年间，在兴亚局的规划下有至少500万名来自中国北部和满洲国的平民被迫劳动，这包括在矿山以及军工厂内劳动；在1942年以后，日军强迫中国民众劳动的人数更迅速增加到1,000万人。美国国会图书馆在报告中提到在爪哇岛有近400万到100万名劳动者被日军强制工作，随后日军将其中270,000人强迫迁往其他日本占领的东南亚地区工作，仅留下52,000名劳动者继续进行先前的工作。

日军在中国大量使用化学武器和其七三一部队进行活人细菌战实验去发展生物武器，日军轰炸机对中国城市狂轰滥炸，大批中国平民死于空袭当中，还把大批中国妇女作为慰安妇，作为日军士兵的性奴隶，很多还被虐待至死。

军事占领

在欧洲大陆，轴心国集团的占领行动分成两种非常不同的形式。包括法国、挪威、丹麦、低地国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等西欧、北欧和中欧国家，纷纷改从德国的经济政策。其中纳粹德国成功赚取695亿马克，而

这还不包括于战争期间掠夺的工业制品、军事设备、原料物资和其他大量货品等。针对这些占领国家，德国向各国收取超过40%的税收收入；随着战争的进行，德国有将近40%的资金收入都是由其他被占领国家提供。

在东欧地区，德国或多或少期望能够于此获得更多生存空间，然而苏联所实施的焦土政策使得作为侵略者的德国无法获取资源。与对待所占领的西方国家相比，纳粹德国自身的种族政策鼓励部队向苏联人们展开暴行，并且不断强调拥有斯拉夫血统者即为所谓的“次等人类”，这也让德军往往在作战的同时展开大规模的处决行为。无论是在西欧或者东欧的占领区都陆续有抵抗组织出现，但一直到1943年底以前他们并没有显著阻碍德国的军事行动。

在亚洲地区，日本不断向其所占领的国家宣传有关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并且将日本的霸权主义塑造成是为了能解放居住于殖民地的人民。尽管最初许多遭到欧洲殖民统治的地区将日军作为解放者欢迎，然而日本占领后实施的严格社会控制以及对于资源的掠夺往往使得当地居民想法改观。其中，日本在盟军部队撤离后所占领的东南亚地区获取近4,000,000桶石油。到了1943年时，在荷属东印度的石油生产量增加到5,000万桶，整整比1940年的生产比率高出76%。

大后方与经济

在战争爆发前，西方同盟国集团无论是在人口和经济都有重要优势。包括英国、法国、波兰以及英国自治领等西方同盟国相较于德国和意大利等轴心国集团人口多出30%，同时国内生产总值两者作比较也高出30%。如果将殖民地包括在内，其中同盟国在人数上比例获得优势性的五比一，而国内生产总值上也有将近二比一的优势。在亚洲地区，尽管中国比起日本有高出将近六倍的人口优势，其国内生产总值却仅仅只高出日本89%左右。随着日本对外扩展殖民地后中国人口优势下降到只剩三倍，同时日本的经济成长速度使得中国仅高出38%。

尽管同盟国有着经济和人口的优势，德国和日本最早展开的快速袭击行动成功降低这些因素的影响力。一直到1942年美国 and 苏联陆续加入同盟国集团后，优势性的经济实力与人口数量才成为战争的关键，随着战争的发展开始双方开始走向消耗战的趋势。此外盟军最终能够赢过轴心国部队的原因，除了同盟国能够比起轴心国获得更多自然资源外，其他如德国和日本不愿投入妇女作为劳动力、盟军战略性轰炸以及德国战争后期经济瓦解也影响到胜负结果。另外在一开始德国和日本皆知道自身并不适合进行持久战，因此期望能够以攻占领土的方式来获取更多谈判空间。但随着战争进行为了应付武器装备的生产，德国和日本也纷纷投入数百万名劳工强制工作，其中德国自东欧地区获得1,200万名的劳动人力，而日本也在亚洲各地强迫将近1,800万人投入生产行列。

科技与战争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使许多军事科技的快速发展，这包括有航空、舰以及陆上武器的发展与应用改革。其中在航空武器方面，各式军机开始陆续担负侦查、战斗、轰炸以及地面支援等任务，同时随着任务角色的确定促使飞机开始专业化发展。同时对于飞机于战场的任务性质更加多元，例如开始投入运输机协助快速运输高价值性的物资、装备以及人员等，或者是针对平民区与工业区的战略轰炸来尝试瓦解对方的士气等。而随着针对地面设施的轰炸渐趋频繁，相关的防空武器也陆陆续续改进或者开发，这包括有以雷达、高射炮与面对空导弹为主的防御系统架构，或者是德军88毫米高射炮的开发等。此外喷气式机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首次开发，尽管由于发明过晚而对于战局没有立即影响，但是后来喷气式引擎成为之后全世界各国空军的标准配备。

在海上武器上，航空母舰与潜艇的运用成为之后海战的主轴。包括针对塔兰托、珍珠港与中国南海等突袭行动意味着海上航空武器开始发展，而到了珊瑚海海战后具有优势的航空母舰开始被视为战舰的继承者。大西洋护

航航空母舰的出现证实是盟军运输船队能够有效抵御德国海军的一部分，除了能够扩展四周的保护半径外，也能够有效封锁整个中大西洋海域的通行。同时由于航空母舰并不需要配备厚重的装甲防护，且攻击的主力是以较低成本的战斗机为主，这使得大量航空母舰的投入相比之下较为经济许多。另一方面潜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经被视为高经济利益的武器之一，双方都将相关的技术列为之后战争的重要关键之一。稍后德国海军成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凭此获得一定优势，而英国则随即将以声纳为主的反潜武器与船队战术列为重点开发对象，德国则不断尝试提高技术层面来开发VII级潜舰，并且继续改进狼群战术的协同作战能力。但随着盟军陆续开发出针对潜艇交战的利式探照灯（Leigh light）、刺猬炮、乌贼（Squid）和马克24型鱼雷（Mark 24 Mine）等设备，最终同盟国逼使得德国潜艇舰队无法维持优势地位。

陆地作战方面则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采取的静态前线，改往更加强调移动性能和兵种合作的战斗模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火力支援的坦克，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演变成为主要作战武器之一。其中从1930年代后期到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坦克的设计相较过去更为先进许多，同盟国与轴心国不断尝试为自己的坦克改良速度、装甲和火力等重点项目。在战争刚爆发时大多数指挥官认为遭遇具有完整配备的坦克时应该要避免作战，这除了是因为早期小型反坦克武器无法有效贯穿坦克装甲外，同时也是受到德国避免进行坦克或者反坦克直接作战的学说影响。在德国结合各式兵器投入战场之后，成功促使德军自波兰到法国战役中都能够以闪击战获得胜利。但随着战争的进展，包括间接打击（Indirect fire）、战车炮、自走炮或者是反坦克地雷等反坦克战术开始盛行，使得在大规模机械化作战的情况下步兵仍然是重要元素。尽管在整个战争期间大多数步兵的配备仍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无重大差别，但是战争促使如能够便利携带的MG42通用机枪等机枪设计、以及适合城镇或丛林作战的冲锋枪类型的快速发展。战争后期所发展的突击步枪则结合了步枪与冲锋枪的许多功能，并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成为许多武装部队的标准武器之一。

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能够获得优势，陆陆续续投入自身的科技协助作战。例如大多数主要交战国家开始不断试图破解对方复杂的密码，并且尝试透过密码本等设备强化自己的通讯安全。例如在波兰军情局密码处（Biuro Szyfrow）的技术协助下英国成功破解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密码 ULTRA、以及日本海军所使用的通讯代码，这些经由破解获得的信号消息（Signals intelligence）成功促使盟军掌握对方动向。盟军也使用大量欺骗的手法来妨碍德军获得正确的军事情报，这之中包括英国策划的肉馅行动与保镖计划（Operation Bodyguard）等。

其他投入战争的工程计划还包括有Z3、巨人计算机与电子数值积分计算机等早期电脑设备、V-1导弹和V-2火箭的作战计划、发展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针对军事作战进行分析的作业研究以及协助物资运输的桑椹码头（Mulberry harbour, 人工港口）与冥王作战（Operation Pluto , 英吉利海峡下的输油管道）等。青霉素是第一次大规模生产并在战争期间使用。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有少量文字润色与删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粗略地说，正是德国体系引致和发动了一战与二战这两场人类历史上涉及人数最多、范围最广、最惨烈残酷的战争；也正是英美两国的强大经济力量与幅员辽阔的人力物资力量，与俄国等一起，把世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法西斯奴役政权统治下拯救出来。

【引述 《美国故事》】

一战和二战之前的西方

中世纪简史

+++++=+++++

+++++

+++++

【引述 《从金刚经说起》 基督教信仰的简史】

（1.D）基督教信仰文化思想与文明体系的冲击

然而，近代两三百年来，随着中国与西方文明的交互、冲突、摩擦、交往等等影响，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以圣经为核心与根基的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思想的冲击。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冲击，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尽管儒家思想所提倡的文化信仰，在许多方面有非常良好积极的内容与效果，但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缺陷或漏洞，就是，它丝毫无法涉及到任何关于超自然的信仰的内容。

换言之，儒家思想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关于“生”的问题，但是，却无法回答关于“死”的问题，即，人在死后的去向的问题，以及人生是否真的有超越生死的价值与真实性的问题。这些关乎生死的问题、关乎人生的终极价值意义的问题，一直在中国上千年古代历史中，由佛教与道教思想的回答作为对于儒家教义的、非主流的补充。

这里请注意，当说到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思想与文明体系的时候，我们并不一定是在谈论基督教信仰本身的、或是圣经本身的内容。事实上，所谓的西方文明，既不是铁板一块，也绝非等同于基督教信仰本身。

的确，在过去两千年的历史中，基督教信仰在西方文明中早已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在今天整个西方文化中，圣经的原则、基督教信仰的精神、以及耶稣基督之救恩对于世人生命的救赎与深刻改变，等等这些根深蒂固而广泛的影响，在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医疗体系、公共教育、婚姻制度、甚至科学技术领域、文化艺术领域、哲学领域、历史学领域等等范畴中，早已随处可见。

不但如此，西方文明在近代五百年以来的大发展，在科技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等，对于整个人类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以至于，基督教信仰今天已经遍及全世界，无论是非洲、南美洲、北美洲还是亚洲等地区，都有至少数以亿计的基督徒。今天，世上总共有约三分之一的人类总人口、约23亿的名义上的基督徒，是相信以圣经为根基与核心的基督教信仰，并声称以耶稣基督为自己生命的救主。

（1. E）基督教信仰与西方文明之间无法划等号

不过，虽然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思想与文明体系影响如此广泛，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文化思想与文明体系简单地当成了基督教信仰本身，或者，如果我们简单地仅仅把西方文明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划等号，那么，我们就犯下了严重的、望文生义、不认真负责、偏离事实的错误。

事实上，我们只要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近三百年来，虽然有很多好的事情，比如现代科技革命的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民主自由制度、法治、自由经济、平等贸易、社会大分工协作、医疗、教育等等，还有无数的、具体的科学技术发明，都是来自西方；但是，也有很多坏的事情，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神论主义、进化论哲学、性解放、放荡主义、离婚泛滥、家庭破碎、甚至同性恋等等，也都是来自西方。

显然，如果我们刨根问底、认真查考、追本溯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明白，西方世界绝不是铁板一块，西方人也绝非全都是纯洁无辜的、敬虔谦卑的圣徒。

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化的优

异成分；看不到西方文明给人类所作出的、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看不到现代人要在何等广泛而深刻的程度上，感谢——培根、波义耳、牛顿、等等无数科学家、哲学家，以及源自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现代医院体系、现代教育体系、现代经济法律制度等等；看不到在西方的无数的、大批的、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们，在科学、文化、政治、法律、医疗、教育、服务、信仰领域，为社会、为人类所作出的可歌可泣的杰出贡献；看不到在西方各国有那么多、数量巨大的信仰敬虔、谦卑诚实、热忱真挚、敬老爱幼、爱人如己、勤奋工作、热心服务于大众和全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真诚基督徒们；——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没有良知、没有诚实态度的人。

另一方面，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明中的错误、缺憾、谬误成分，比如，在诸如法国为首的、遍及西方各国的、打着人文主义旗号、放荡不羁的淫乱主义、性解放主义；在诸如德国为首的、遍及许多国家的民族自大主义、好战主义；在诸如俄国为典型代表的信仰虚伪主义、专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起源于英国等国学术领域的达尔文进化主义，和盛行于德国的唯物主义、泛神主义、自然神主义、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不是仔细思考与观察、真诚寻求真理的人，而仅仅是盲目崇拜西方的武力与物质繁荣，而在心中没有正义、没有饥渴慕义之心的人。

事实上，即使我们撇开这些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历史、哲学史等历史领域的角度不谈，单单从宗教信仰、基督教教会的历史与现状来看，西方文明体系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甚至分裂的、内部景况；——这也从侧面再次证明了，西方文明体系绝非简单地、直接地等于基督教信仰本身。

=====

（1. F）基督教会的简史

在基督教信仰的传播与教会历史中，在大约公元15世纪以前，基督教会一直分为东西两大部分。

（1. F. 1）天主教与东正教的由来

东方教会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是从大约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归依基督教信仰以后，把罗马帝国从罗马迁都至当时的拜占庭市开始的。拜占庭市位于欧洲与亚洲陆路交通的重要枢纽节点。它后来被改名为君士坦丁堡。这个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以基督教信仰为国教的东罗马帝国，被后世的历史学家称为拜占庭帝国；她从公元四世纪一直延续到公元十五世纪，存在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没有改朝换代的重要国度之一。公元八世纪左右，这个以希腊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基督教国家，开始不断地把信仰传播到后来称为俄罗斯等、以斯拉夫民族为主体的各个国家。俄罗斯这些国家曾经在很长时期一直处于农奴制度状态（俄罗斯的农奴制度一直到后来十七世纪彼得大帝改革、效法西

方工业革命等等的时候，才开始被完全消除）；然而从公元八世纪开始，基督教信仰已经逐渐把社会文明和人道关怀制度带给俄罗斯等的广袤土地。

西方教会以罗马为中心，在君士坦丁大帝迁都君士坦丁堡以后，延续和保持了从公元一世纪下半叶（注：耶稣基督于大约公元元年左右降生，于公元三十三年左右被钉十字架）、使徒彼得时代以后建立的教宗制度。在从公元四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的上千年历史中，以罗马教宗制度为核心、以拉丁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西方众教会，与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以拜占庭帝王为政权中心、以希腊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东方众教会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在公元一千年以前，东西方教会基本上是兄弟般的关系。他们——都以圣经新旧约全书为共同的信仰根基与中心教义的基础；都相信和承认，圣经、也只有圣经，是上帝的全备话语、是上帝亲自的、超自然的启示与默示；都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都信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

但是，在公元一千年之前，在东西方教会之间，也一直存在着既合作、又有纷争的状态。两者在各自教会权威、教义细节等方面都有很多争议、互相对对方不服气。这种状态持续到公元一千年，终于矛盾完全爆发，互相之间彻底决裂，互相否认对方的信仰合法性。

（1. F. 2）中世纪

公元十五世纪，君士坦丁堡被后来称为土耳其人的突厥民族攻陷。君士坦丁堡被改名为伊斯坦布尔；这个名字是源于突厥人的伊斯兰信仰。从此，拜占庭帝国正式覆灭。然而，东方教会，此时已经自称为东正教，逐渐开始向莫斯科方向迁移、直至后来以莫斯科为其中心，继续与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天主教会体系分庭抗礼。大约在同时，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体系（自称为天主教系统），于公元十五世纪开始了被后世称为文艺复兴的一种近现代文化革命运动。

值得指出的是，从大约公元四世纪至十五世纪的一千年，被后世称为的所谓“中世纪”，其实并非人们所常常误以为的、专制主义压迫的黑暗时代。事实上，任何诚实的历史学家都会承认，尽管在这期间发生了几次针对中东的十字军东征、回击伊斯兰的进攻和劫掠，但是，总体而言，在这大约一千年的漫长历史年代中，整个欧洲，包括西方教会影响下的西欧，和东方教会影响下的东欧，在政治与军事上，基本上是处于和平时期，几乎很少有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很少有兵荒马乱、生灵涂炭、改朝换代的时期。在许多乡间、市镇、经贸中心，人民安居乐业，许多地方治安良好、常常夜不闭户。

在中世纪的长达一千年中，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教会与罗马为中心

的西方教会，各有特色、短长、优缺点。

东方教会所处的拜占庭帝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帝王及其家族笃信基督教信仰。东方教会分成各个教区，众教区的各级牧者、长老等等围绕着拜占庭帝王，彼此和谐，处于互相和平、长达几乎一千年的安稳状态中。事实上，拜占庭帝国这个名称，是后世的历史学家给起的；当时的人们从未曾这样称呼。他们这个国家，一直自称为“基督之国”、或“东罗马帝国”。

而在西方教会，随着罗马帝国时代在公元四世纪、公元五世纪的解体与破败，罗马教宗体系饱经风霜、生死存亡、无数的患难、危机。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一本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著名的基督教圣徒、奥古斯丁，以及他的《上帝之城》。这本书讲述了，根据圣经、耶稣基督的教导，所谓上帝的国度、上帝之城，究竟是什么意思。在长达上千年的中世纪历史中，西欧从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但是，却有一个统一的教会体系，就是以罗马教宗为首的天主教教会体系。

我们会在其他文字中，继续深入讨论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历史之间的比较，以及他们两者之间的短长、利弊、得失；并从中反思，基督教信仰的教义，以及，基督教信仰与世上国度、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文明体系之间的深刻关系，应当是怎样的。

（1. F. 3）中世纪与近现代之间的分水岭

公元十五世纪是西方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正式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近现代历史的开始。此时，一方面，君士坦丁堡被伊斯兰的突厥人攻陷，因而，整个欧洲大陆与东方地区之间的贸易枢纽、中枢节点被强行隔断。从此，西欧各国开始大兴海上贸易，从而使得曾经位于西欧文明边缘地带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成为海上强国，纷纷在经济政治上依次崛起。

另一方面，从公元十五世纪，以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城邦为中心，因着一个开始于美第奇家族的长达约两百年左右的统治，开始了——被后世称为文艺复兴的艺术文化运动，以及，与此同时的、罗马天主教体系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和影响。美第奇家族供养了许多后来极为著名的艺术家，包括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人。这些艺术家回归基督教信仰临到欧洲之前的时期的希腊艺术风格，以绘画和雕塑人体为美、为荣。美第奇家族积极地涉足政治与宗教领域，甚至有的家族成员自己成为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教皇。美第奇家族的奢靡与腐败之风，加重了罗马天主教本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的弊病。

（1. F. 4）天主教与东正教的谬误

自从公元四世纪开始，当圣经新旧约全书被从原文（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翻译成罗马的官方语言、拉丁语以后，罗马教宗系统就开始逐渐把圣经束之高阁，使普通人无法轻易接触到、阅读到圣经。在公元十六世纪以前的长达一千年中，西欧各国绝大多数人民，都只能从教会的神职人员那里聆听基督教信仰的教义，而没有机会自己去阅读圣经、上帝的话语。

在教义方面，天主教系统添加了许多圣经本身没有、甚至是圣经明文反对的内容，例如，不恰当地高举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地位，甚至称之为圣母、上帝之母，以及，把历世历代的许多基督教使徒们、圣徒们当作偶像崇拜、向他们顶礼膜拜、祈祷、祈求庇佑（在这些方面，东正教与天主教存在着同样的谬误，即，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圣经本身的教义和教导，而在后世添加了一些违背、偏离圣经内容的教导、信条）。而且，天主教还在后世自行添加了一些伪经、次经，以及向所谓圣母玛利亚祈祷、敬拜的玫瑰经，等等。

好在，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纷争与分裂状态，虽然是一件很不好、极其令人伤心的事情，但是，这种状态却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可信地保证了，圣经新旧约全书本身，一直被精心地、忠实地保存着，直至后世，因为天主教与东正教双方之间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互相监督、有力督责的效果。

并且，尽管天主教与东正教中存在许多谬误和偏差，但是，我们仍然要说，他们的主流信仰、主干教义、主要信条，例如“使徒信经”等对于基督教信仰教义的总结，是正确的。所以，在天主教与东正教里面的信众，如

果真心地、真诚地、热忱地寻求和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的以耶稣基督为自己生命的救主，那么，我们仍然可以说，他们是良善的、真诚的基督徒——尽管，我们应当诚实指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

（1. F. 5）圣经的广泛翻译传播，以及近现代时代的开始

公元十五、十六世纪，随着君士坦丁堡被突厥人攻占、拜占庭帝国灭亡，东方教会保存的希腊文的圣经原典以及许多其他希腊文写成的著名基督教历史文献和著作，被教会人士抢救、传播到西方教会体系。这些希腊文的文献以及圣经原典，开始让西欧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罗马教会的圣经拉丁语译本，在一些重要教义方面的词汇概念上，存在着一些翻译上的失误或偏差。

几乎与此同时，欧洲发生了许多历史意义影响深远的事情。我们仅举以下三件极其重要而著名的事情为例。

第一件事情是，金属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大规模、迅速地、廉价地印刷、传播纸质书籍在技术上成为可能。

第二件事情是，罗马教宗的教义上的谬误，以及财物方面的奢侈腐败作风，终于激起了教会各级神职人员以及普通基督徒们的反抗。以德国的马丁路德为代表，一大批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反抗教廷、传播圣经、传播真正纯正的福音与基督教信仰教义。马丁路德把圣经翻译为德语，极大地推动了圣经在社会中的普及化、广泛传播。

第三件事情是，英国的丁道尔开始把圣经翻译成英语。这些圣经翻译运动本身，直接导致了现代德语书面语、现代英语书面语等等的诞生，因为在那之前，西欧的书面语言只有一种，就是拉丁语。

圣经的广泛传播，使得欧洲的无数普通人开始真正地、详尽地明白基督教信仰的真正主旨、原则、精髓；这些基督教宗教改革运动，深刻地革新、更正了欧洲各国人民在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方面的许多认识与观念。这样的革新与更正，直接地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开启；以及，现代民主自由政治运动、法律、经济等等许多方面的变革，如火如荼地在各地展开。（关于这些有关方面的内容，我们会在其他书籍中专门展开阐述）。

这些事情，推动了、构成了过去五百年来的欧洲近现代史，并进而，对于全世界的文明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影响作用。今天，每一个出门坐火车汽车飞机、早上吃牛奶面包、上班穿西服革履、住在高楼大厦或四季温暖如春之庭院别墅里的人，都要感谢培根、牛顿、波义耳等现代科学的开启者们，更要感谢那些舍生忘死地传播圣经、传播基督福音的敬虔基督徒们。

（1. F. 6）基督教会简史的总结与反思

从上面的简史中我们可以看见，在耶稣基督降生以来两千年的历史中，每当人们贴近圣经、寻求圣经、明白圣经话语的时候，他们就展现出热忱、敬虔、谦卑、真挚、积极的信仰，他们的生命就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社会与国家就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也发生极其巨大的改变；上帝的祝福就极大地、温暖地、令人震撼地临到他们。

反之，当人们沉浸在自己的罪性与私欲中，沉浸在彼此的纷争中，当人们没有真诚地、认真地、热忱地寻求上帝的话语、信仰的真理的时候，那么，他们的生命就显出冷漠、消极、倦怠的样式，他们的道德就不断滑坡，他们整个社会与国家就充满了许多动荡、败坏之事。

从基督教会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反思。

第一，上帝的国度，虽然表现在地上的教会中，但是，从终极的意义与层面而言，基督的国度不属于这地上的任何地方，而是属灵的、属乎天上、那永远的国度与家乡。

第二，然而，这并不是说，基督教信仰在这个地上就没有：——确定的、明晰的、任何人都无可否认的见证。事实上，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人道主义、人的生命与自由被极其重视，到艺术文化、经济与科学的大发展等等，——在无数的层面上，现代人类文明都被深深地刻下了基督教信仰的烙印。（读者可以阅读《基督教的果实》《基督教信仰之大众证据》《基督教信仰之证据的反思》《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论民主》《论婚姻家庭》等系列书籍，进一步查考这些方面的事实与信息。）

第三，但是，在基督教信仰与西方文明之间，是无法划等号的。前者固然在极大程度上深刻影响了后者，但是，后者中包含着许多其他方面的成分与因素，甚至包含了无数的糟粕、不义、败坏、奢侈、贪婪、淫乱，等等。

那些感叹“为什么基督教信仰没有全部改变欧洲人、使全体西方人都成为基督教圣徒，或是为什么没有彻底消灭那些罪恶的恶人”的人们，并不明白：——上帝是公义、圣洁、慈爱与恩典的，他的终极道德审判必将来临，他的终极惩罚是永远的；然而，他以恩典与慈爱，给世人悔改己罪的时间与机会，使他们真心地、真诚地、而不是被强迫地，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上帝的无限公义与权柄，到那终极的审判日，必将昭然地显明在一切世人的眼前。

第四，那么，为什么有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对于基督教信仰和西方文明不太了解、不求甚解的人，常常把这两者看为同等呢？

这一方面是由于，许多世人并不了解基督教信仰的真正主旨、福音的真正涵义：——“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人在世上应当勤勉而敬虔地生活、工作，但是却不应当把心系于这个世界，以这个世界、或其中任何被造之物为心灵的归依”；尤其是不了解基督教信仰、与世上之国关系的教义：——“基督的国度属乎天上，而不属乎地上；真诚、谦卑的基督徒应当在这个世上作盐、作光，把基督的爱带给世人，见证福音的真实，见证耶稣基督伟大、圣洁的爱；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温柔的福音，是圣洁的福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烛火他不吹灭。”

另一方面是由于，世人因着自己生命中的罪性，因着自己的心系于这世上的国度与荣华，所以，常常误以为，神的作为和果效，是要终极地显示在这个地上的世界中。他们把世上的荣华璀璨、建筑物的宏伟绚丽、人群的华盖云集，错误地当成了天国里的永远荣耀。他们总是以为，非得要通过外在的、表面光鲜的“荣光”，来看待那些属灵的、属天的、属乎道德的事情。

第五，基督教信仰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影响最大，特点也最独特的宗教信仰。它虽然指出，我们不应当以这个被造的世界或是其中任何被造之物、被造之人作为我们心灵的依归，而是要单单地敬拜那位创造宇宙天地、创造我们生命的主；但是，它不是像佛教那样抱着虚无、万事皆空、不垢不净、不生不灭、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诸相皆虚妄的态度，以否定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一切世事。它告诉我们，应当积极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以谦卑、温柔、真诚、和平的心，以勤勉、专诚的工作，去面对一切事情、一切世人。

它虽然指出，只有上帝才是我们的造物主、生命之主、永生之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上帝是我们道德律法的颁布者、是圣洁公义而全能的终极道德审判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道成肉身，耶稣基督谦卑地降身为
人，生在马槽里，生在律法下，取了奴仆的样式，甚至谦卑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救恩，使一切相信他、接受他救恩的人，得到永生，得以进入那永远的天国、得享那永远的幸福与美好。

它不是像伊斯兰教那样用火与剑传教、荼毒劫掠，而是用谦卑、慈爱、怜恤与和平的方式，把福音向世界分享。它不是像伊斯兰教那样推行、奉行政教合一的教义与制度，更不是要在地上建立起什么伟大的、属世的国家；它不是要以严刑峻法来统治臣民，更不是要让整个社会万马齐喑、丧失活力与创造力。在圣经福音书中，耶稣基督清楚地说道：“我的国属乎天上，而不是属乎地上”。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基督教信仰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良善影响是最大的，也是有目共睹的。

+++++

+++++

+++++

+++++

十六世纪，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一大批敬虔基督徒们，在德国等欧洲国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基督教改革运动与文艺复兴运动一起，给欧洲各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也将要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给全世界的整个人类发展进步局面带来深刻的、甚至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直接地导致了一大批基督徒思想家们，例如弗兰西斯·培根、牛顿、波义耳等人，开启了现代科学思想体系的爆炸性发展，导致了英国皇家科学院的建立【详情请见《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也直接地导致了约翰洛克、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政治经济领域思想家们为现代民主自由政治制度以及现代经济制度所奠定的思想基础。

但是，从十六世纪开始，随着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逐渐发展，因着贯穿于人类整个历史中的、世人在生命本质中的罪性，因着人类自古以来历史中的【而不仅仅是十六世纪以后；更是在中世纪、在公元前、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许许多多世人在很多世事中充满罪性的言语行为，在欧洲各国中，开始相继出现了很多大国主义、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的思想。十六世纪以前，在中世纪的主要时期内，在欧洲的很多地区，例如德国等地，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紧密连接的国家体系，而是由很多城市、邦国所组成的松散联盟体系。然而，十六世纪以后，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因海上贸易的发达而相继崛起，在欧洲内陆，在德国、法国、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等地，也开始不断地发展出许多以多样重组整合的

国家为基础的大国沙文主义、爱国主义思潮。

这种民族主义、所谓爱国主义，成为了十六世纪以后数百年中，欧洲大陆中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彼此纷争、甚至不断地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并不是在这里说，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本身就一定是错误的。而是，欧洲的惨痛历史教训，无可置疑地告诉了我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绝非是至高无上的真理；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之上，必须有公平、正义、圣洁、仁慈、公义的道德法则，必须建基于敬虔、真挚、谦卑的、对于那宇宙天地之主、道德律法颁布者的信仰。否则，所谓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就一定会成为欺谎、不义、专制、暴戾、杀人、战争、生灵涂炭、罪恶的借口，并必将给整个人类带来巨大的痛苦、磨难和灾祸。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很大程度上，给人类带来巨大灾祸、生灵涂炭的一战与二战，都与德国日耳曼民族的傲慢自大、民族主义、欺谎不义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其他参战方，例如俄罗斯、法国、等就是无可指责的；但相对而言，德国民族的骄傲与自大，正是最直接的导火索与火药库】。而德国民族的这种骄傲自大，也与——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德国学术界的各种泛神主义、自然神主义、甚至无神主义思想、等背离基督教信仰的谬误，——与他们高举所谓人性的光辉与伟大，等等这些思潮【正如尼采所说：上帝死了】，——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世人在心中背离了那创造宇宙天地之主、创造世人生命之主的时候，他们就会在自己的心中为自己塑造出很多超人，来顶礼膜拜；对于二战中的德国人来说，这个人就是希特勒；对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人来说，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欧美简史

十六世纪上半叶，马丁路德开启了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之后，加尔文更成为一位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的集大成者，出版了很多重要的关于基督教信仰的著作，例如《基督教要义》等书籍系统性地总结了以圣经为根基的基督教信仰主旨和内容。同时，英国的丁道尔也完成了英语圣经的翻译。之后英王亨利八世正式脱离天主教，英国正式开始了基督教改革运动。英语圣经得以在英国合法地广泛出版和传播，并被人们广泛地诵读。十六世纪下半叶，英国清教徒运动开始兴起，同时，在圣经的启发和激励下，弗兰西斯·培根等思想家们开始思索人类究竟应当怎样去努力地认识和发现自然世界的规律【并因而开始深刻认识到，在整个中世纪中，天主教所秉持的亚里斯多德、托勒密宇宙世界观是错误的，以及为什么是错误的；那些错误的观念，其实不但与圣经毫无关系，而且从根本上，从方法论哲学而言，是与圣经相违背的。为此，培根等人提出，正如圣经中所说，人若不悔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就不能进入天国；同样，人若没有小孩子的心思和样式，就也不能认识这个世界】。

十七世纪上半叶，尤其是1620年，发生了两件开启了后世的民主与科学的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

第一个事件是，1620年，培根出版了《大变革与大复兴》之《新方法论》；这本书对于十七世纪的英国基督徒思想家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大约70年后的牛顿与波义耳著作的出版，开启了现代物理科学与现代化学科学；培根的思想后来也对法国等欧洲基督徒思想家们、科学家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培根被称为现代科学之父之一【详情请见《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培根就是那位说“知识就是力量”的人】。这也直接导致了十七世纪下半叶的英国皇家科学院的成立。英国皇家科学院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成立的、政府支持的机构、专门致力于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与进步。在过去数百年中，尤其是二十世纪以前，英国皇家科学院对于人类现代科学技术的开启、启动、爆炸性发展做出了伟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很多成员，都是现代很多科学分支的创始人、现代科学分支之父，例如生物学、遗传学、气象学、电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等等数不胜数的领域。像英国皇家科学院这样的机构，正是培根毕生的梦想。

第二个事件是，1620年，五月花号清教徒们（共102人；登陆第一年冬季以后还剩下50人）来到北美。事实上，在1620年以前，在大约十多年前，在培根的大力推动下，英国政府官方就派了一些人（共几百人）来到北美弗吉尼亚，在那里种植庄稼。五月花号船的目的地本来是弗吉尼亚，但被海上风暴吹到了北方、今天麻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即今天波士顿以南很近的一个地方。1620年的时候，弗吉尼亚与五月花号的这两批人，成为了后来美国南方与北方不同文化之间的分水岭。在南方，很多人来到北美仅仅是为了寻找经济利益；他们在宗教信仰上属于英国国教教会【即，仍然是采取神职人员金字塔式的多层级权力结构】；他们在信仰的实际景况中，其实往往并不热忱真挚。而在北方，五月花号清教徒以及后来几十年中、源源不断地来到麻萨诸塞加入他们的大批英国清教徒中间，则信仰非常真挚、热忱、纯洁。正是在这些美国北方、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们中间，建立起了所谓会众主义教会。会众主义教会【现代世界中的大多数基督教会，例如浸信会、卫理公会等改革宗教会，都是脱胎于十七世纪的会众主义教会的模式】对于现代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的起源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因为，在会众主义教会中，教会管理人员不是来自于一个什么金字塔式权力结构中、由上至下的任命，而是来自于从下至上的选举。在教会中，牧者与执事等等职事，都是由教会全体基督徒会众，在平等、自由的条件下，选举所产生的。从某种意义而言，这正是现代民主制度的雏形。这种会众主义教会的模式，就一般性而言，在新英格兰地区，从1620年起，到1776年美国正式建国之前的大约150年间，基本上就已经在广泛实施了。换言之，在美国正式建国之前，民主制度就已经成为一代又一代新英格兰地区等地的居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了。正是这种教会中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文化土壤，孕育了美国的成功的、成熟的民主制度。美国建国以后，法国政治学者托克维尔来到美国观察和记录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运行，并写作了著名的经典书籍《美国的民主》。这本书在过去数百年间，被多次再版，成为今天西方各个大学中的政治学系所普遍使用的、给大学生的重要经典教材或参考书。在该书原著版本中的重要一章，就是记述了托克维

尔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教会中所看到的，基督徒们敬虔、热忱、谦卑、纯洁的敬拜活动。【关于基督教信仰与现代民主主义制度之间的深刻关系，详情请见本书作者所著《论民主》】。

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年间，在美国南方与北方各地区逐渐发展的同时，英国国内在不断地进一步实行基督教改革，以及议会民主政治的变革【期间，英国有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件是通过了著名的《威斯敏斯特信条》，清楚系统地、简明地阐述了基督教信仰要义；另一件事情是英国光荣革命完成了君主专制制度向君主立宪议会民主制度的和平转变；总体而言，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来说，在这两百年间，英国的发展是迅速、平稳、和平的】。

然而同时，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的发展却并不顺利。十六世纪的时候，当马丁路德掀起的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波及到法国的时候【法国毗邻意大利，历史上有很多敬虔的、主流天主教人士们的影响】，由于法国基督教改革人士的一些急躁冒进、不谦卑的态度，导致法国的基督教改革运动与天主教之间发生了一些武力冲突而人员伤亡。这进一步导致了法国国内长达数十年的宗教战争，数百万人在战争中丧生；使得最终——法

国的基督教改革人士被赶逐出法国；法国归回到天主教的势力影响之下。从此，普通法国人仍然无法接触到圣经、无法容易方便地习读圣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上半叶。

十八世纪下半叶，大约在同一个时代，美国发生了独立战争，不久之后法国发生了推翻法国君主的大革命。但是，历史事实毋庸置疑地告诉了我们，——前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后者却引致了巨大的失败，甚至为后来的欧洲大陆内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深刻而复杂冲突留下了深深的伏笔。

在西方近现代历史上，尤其是在欧洲大陆的各个国家中【英国处于外岛上，不在欧洲大陆之内，相对而言比较超脱、中立；但也会在很多方面、相当程度上受到欧洲大陆影响，并与欧洲大陆互动、相互作用】，在重要思想政治文化领域中，一直有着本质迥异的两条发展线索。第一条线索就是，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一大批敬虔基督徒们所掀起的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第二条线索就是，发源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起源于、兴起于十五世纪】以及后来的所谓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两条发展线索中，在其内部、深层次内涵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甚至本质性的矛盾之处。

在上述两条发展线索中，前者【即，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所强调的，是回归到圣经之中，以上帝的话语、旨意、启示，以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为唯一的根基、归依、盼望和主旨【即所谓，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上帝的荣耀】；谦卑、真挚地，承认己罪、悔改己罪、单单地倚靠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以基督的义为义；真诚而纯洁地承认，在我们世人自己的里面，一无所是，一无所夸；人生命的职分与价值意义，就应当是按照圣经所教导的那样，第一，就是要尽心、尽力、尽性、尽意地爱主我们的上帝；第二，就是要爱人如己。在这两条圣经律法的总纲中，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根基、前提条件；后者是前者的表现和必然反映。只有当我们心中有对于上帝的敬畏和热忱之爱，我们才可能会有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的饶恕之爱。人与人之间的爱，固然包括物质性、属世利益的方面，但更是指向那心灵与灵魂的层面；因为人生命的本质，正是在于心灵与灵魂。若没有人心对于上帝的敬畏、信仰、信靠，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爱也必然不会真挚、长久。

请注意，在这种信仰敬虔的生命品格中，一个谦卑热忱的基督徒，不应当是整日坐在那里慵慵懒怠、好逸恶劳，更不应当是整日坐在那里盲目迷信、闭着眼睛不去儆醒而勤奋地面对一切世事。恰恰相反，应当是积极地、谨慎地、认真细致地、竭尽全力、殚精竭虑地去努力做好一切所当行的良善之事；并且，在这一切事情的过程中，以谦卑、儆醒、祷告、祈求的心，去面对一切事情与局面。在属灵的争战中，跟随上帝的引领；以祷告祈求的心，俯伏在上帝的面前。

+++++

+++++

+++++

【引述 人应当怎样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是敬虔热忱的信仰】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要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不是为了要用自己的斗争和努力，去为自己挣得所谓的公义、平等、正义，或是自以为替天行道、悬壶济世。这样的心态看似光辉伟大，但实际上，却是出于自高、自大、自傲、自以为义的心理，是出于“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狂傲之心。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为了要荣神益人，在一切事情中归荣耀于上帝，在一切事务上努力地做有益于世人之事。我们应当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地爱主我们的上帝，并要爱人如己。我们应当以谦卑、诚实、

勤勉、谨守的心，去面对一切世事与世人。我们应当在内心深处，紧紧地倚靠于上帝，以他自己为我们心灵、灵魂、生命的归依。

我们人生的价值与目的，就应当是跟随天父的旨意与呼召，尽职尽责地、殚精竭虑地、用尽一切努力地、去做好各样应当做好的事情。这样，我们才是上帝的忠心仆人，是他良善而忠实的管家；这样，才显明了，我们在内心深处对他的信靠与仰赖。

+++++

+++++

+++++

+++++

+++++

马太福音25章

1“那时，天国好象十个童女，拿着她们的灯出去迎接新郎。2她们中间有五个是愚蠢的，五个是聪明的。3那些愚蠢的拿着灯，却没有带油；4但那些聪明的拿着灯，也把油装在瓶里带来。5新郎很晚还没有到，她们都打瞌睡，而且睡着了。6半夜，有人喊叫：‘新郎来了，快出来迎接他。’7那些童

女都醒过来，整理她们的灯。8愚蠢的对聪明的说：‘请把你们的油分一点给我们，我们的灯快要灭了。’9聪明的回答：‘这些恐怕不够我们大家用，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地方去买吧！’10她们去买油的时候，新郎来了；准备好了的童女就和他一同进去参加婚宴，门就关上了。11后来，其余的童女也来到，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吧！’12新郎却回答：‘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13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那日子和那时间。

14“天国又像一个人要出外远行，就叫自己的仆人来，把产业交给他们。15他按照各人的才干，一个给三万个银币，一个给一万二千个银币，一个给六千个银币，然后就远行去了。16那领了三万的马上去做生意，另外赚了三万。17那领了一万二千的也是这样，另赚了一万二千。18但那领了六千的，却去把地挖开，把主人的钱藏起来。19过了很久，那些仆人的主人回来了，要和他们算帐。20那领了三万个银币的，带着另外的三万前来，说：‘主啊，你交了三万给我，你看，我又赚了三万。’21主人对他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哪，你作得好！你既然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22那领了一万二千的也前来，说：‘主啊，你交了一万二千给我，你看，我又赚了一万二千。’23主人对他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哪，你作得好！你既然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24那领了六千的也前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个严厉的人，没有撒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散播的地方，你要收聚。25所以，我就害怕起来，去把你的钱藏在地里。你看，你的钱还在这里。’26可是主人对他说：‘你这个又可恶又懒惰的仆人，你既然知道我要在没有撒种的地方收割，在没有散播的地方收聚，27那你就应该把我的钱存入银行，到我回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28你们把他的六千银币拿去，交给那个有六万的。29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他就充足有余；凡是没有的，就算他有甚么也要拿去。30把这没有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

【马太亨利圣经注释】

1-13节

I。这个比喻一般性地讲述了，天上的国度，福音的本质，基督国度的外在表现、治理、以及成功。基督的一些其他比喻（比如马太福音13章）讲述了福音怎样在当前的时候，进入人的心里。而这里的比喻，则告诉我们，当神的奥秘完全显明、神国度完全彰显的时候，是怎样的。在这个比喻中，记述了两种人——那些为最后审判以及基督再来而预备好的人、以及没有预备好的人；神的国度，已经为神国的臣民显明。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就像是这个比喻中的十个童女，在这里被区别开来。

II。这个比喻的背景，是一个婚礼。按着犹太人婚礼的习俗，新郎要在朋友们的陪伴下，在晚上来到新娘的家里；新娘以及陪伴的童女们要在家里等待新郎的到来；等新郎来的时候，她们要拿着手里的灯烛，到外面把新郎迎进屋来，一同庆祝婚礼的正式进程。在这个比喻中——

1. 新郎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诗篇45篇，雅歌，以及新约的很多处，都明确地讲到了这一点。基督爱他的教会；基督的爱是卓越的、无与伦比的；基督与他百姓之间的恩典之约，是信实的、不可改变的、忠贞的。所有信从基督的人，都归入基督的恩典之约（何西阿书2章19节）。在那基督再来的日子，是神圣婚礼完成的日子；那时，新娘、羔羊的妻，将要是完美的、完全的（启示录19章7、9节）。

2. 十个童女代表了一切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是教会的成员；不过这里称他们为陪伴的人（诗篇45篇14节），就像在其他地方被称为儿女（以赛亚书54章1节）、教会的装饰（以赛亚书49篇18节）一样。那跟从羔羊的，被称为童女（启示录14章4节）；这代表了他们的纯洁和美丽；他们在基督面前如同贞洁的童女（哥林多后书11章2节）。新郎是王；而这些童女是荣耀的女子，是不计其数的（雅歌6章8节）；不过这里被称为十个。

3. 童女们的职分，就是要迎接新郎；这是一个极其幸福的职分。当新郎来的时候，她们要前来事奉他；为此，她们要切切地等候、盼望他。这就是基督教的本质。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1）服事基督，把荣耀归给他、我们的荣耀新郎；我们要称颂他的名，尤其是当他要来把荣耀归给属他之圣徒的时候。我们必须跟随他，正如仆人跟随他们荣耀的主人一

样。约翰福音12章6节。我们要高举基督的名，称颂基督的名；这就是我们的职分。（2）我们要切切地等候主盼望基督的再来。作为基督徒，我们不仅要相信基督的再来，并为之预备好；而且，我们更应当热爱、渴慕基督的再来；我们一切的行动、言谈、生命，都要聚焦在这一点上。基督之再来，是我们信仰中的各项教义的汇聚点；我们的生命，都应当以对此的盼望为核心。

4. 她们最大关切的事情，应当是，时刻保持手上的灯烛是燃亮着的；只有这样，在她们等待前来事奉新郎的时候，才能归荣耀于他，才能真正地服事他。基督徒们应当是光明之子。福音是光；那接受福音之光的人，不仅要自己被光照亮，而且，要像光一样闪耀出来（腓立比书2章15、16节）。

关于这十个童女，我们看见——

（1）她们的品格非常不同，并各自相应地显出明显的证据。

【1】她们的品格是，其中有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蠢的（2节）。智慧

胜过愚蠢，正如光明胜过黑暗。传道书2章13节。在同样的外在信仰形式下、在同一个信仰组织内，人们的品格在神的眼中会非常不同。那些真诚的基督徒，是聪明的童女；虚伪的基督徒，则是愚蠢的童女；——正如基督在另一个地方用聪明的、以及愚蠢的、盖房子的人来比喻他们。一个人是否真正地聪明，或者，是否真正地愚蠢，——通过他如何对待自己的灵魂之事，可以清楚地显明出来。真正的、真诚的、热忱的、衷心的信仰，是真正的智慧。罪是愚蠢的；虚伪之罪尤其是最愚蠢的，因为虚伪之人总是用自己的聪明来自己欺骗自己。虚伪之人是最恶的罪人，因为他们把自己伪装成正直的人。当我们评判自己的时候，要知道，天国的门是窄的，进去的人很少——因而我们要谨小慎微，谦卑谨守，不可自觉安稳；当我们评判别人的时候，要知道，我们救恩的元帅领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

【2】她们品格显出的证据，就是在她们职分的工作里面；她们也要按着内心的真实光景而受到审判。

（第一），愚蠢的童女手里拿着灯，却不预备灯油（3节）。她们的灯油仅仅够现在用一会儿的；仅仅是为了现在的表现；——显得她们看起来好像是要等候新郎、服事新郎似的；但是，她们却不预备多一些灯油，以防新郎耽延——从而显出她们虚伪的内心，即，心中并不是真地愿意迎接新郎。

——1. 她们的生命里面，并没有真实的、根深蒂固的、坚实的原则。她们手上虽有表现出她们信仰外在形式的灯盏，但是，在她们的内心深处，并没有储藏着健全的知识、根深蒂固的挚情、决心、定意。只有那些内心深处、灵魂深处的东西，才能使人经历服事与试炼。她们行事是凭着外在的影响和诱惑，但里面却没有属灵的生命；就像一个商人，没有仓库；或像一个落在石头地里的种子，没有根。

——2. 她们对未来没有打算、也不作预备。她们手上的灯只是为了现在好看，却没有灯油为以后做准备。这种对于未来的、缺乏预备的状态，毁了许多只有表面信仰的人。他们关切的事情，仅仅是在邻舍的身上；他们现在可以时时与邻舍交谈，但是，他们却并不在意要得到基督的悦纳；——尽管，他们未来要面对基督自己。他们看一件事情是否有益处，完全取决于此事在当下是否有价值。如果对他们讲述未来的事情，那就像是罗得对女婿讲说今夜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一定会被他们以为是戏言。他们不为以后着想，就像蚂蚁不为冬天预备一样。提摩太前书6章19节。

（第二），聪明的童女，手上拿着灯，器皿里面预备着灯油（4节）。她们在生命深处有着良善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对她们信仰的巨大支撑。——1. 心灵就是我们的器皿；我们要把智慧装在那里面；心里面有良善的宝藏，从那里发出良善的言语行为。根若腐烂了，花朵也会很快变成灰尘。——2. 神的恩典，是我们装在器皿里面的灯油；以色列的会幕中总是要常备着

灯油（出埃及记35章14节）。我们的灯光必须要借着我们的良善行为在人的面前燃亮；但是，若我们的心中没有稳固、坚定、活泼的原则——没有在基督的里面坚定的信心，没有对神、对我们邻舍的爱；那么，我们的好行为就不能持久。我们所作的每一件事情，必须是出自我们坚定的信仰；我们的眼目，必须要注目于那将要来到的事情。——3. 聪明的童女在器皿里面预备了灯油——这意味着，她们设想，新郎有可能会耽延。我们应当为持久的等候盼望而做好打算。但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灯油必须是来自耶稣基督的金灯台，来自那伟大的、良善的橄榄树；这是撒迦利亚书4章2、3、12节所表明的异象；约翰福音1章16节也对此作出了解释。我们从基督的完全里得到一切，从基督的恩典里得到恩典。

（2）她们共同的错误；当新郎耽延的时候，她们都打盹睡着了（5节）。

【1】新郎耽延了；即，新郎没有像童女们所想象的那么早来到。当我们看一件确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那很快会发生；在使徒时代，有很多人以为基督很快就要再来，但事实并非如此。基督虽然在我们的眼中看似耽延，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耽延（哈巴谷书2章3节）。新郎没有像童女们所想象的那样很快就来到——这是有良善原因的；有许多心意和目的要成就；——选民要被呼召和招聚；神的忍耐要彰显出来；圣徒的坚忍品格要经受试炼；正如地上的收获，要等待庄稼成熟——同样，天国的收获也要等待禾稼的成熟。然而，虽然按着我们的时间，基督看似耽延；但是，他的再来一定不会晚于神所定的最佳时间。

【2】当新郎看似耽延的时候，那些等候他的童女们开始变得不专心，忘记了她们所应当事奉的事情；她们都打盹睡着了；——就像她们不再等候新郎了一样。因而，当人子来的时候，他没有找到忠信的人（路加福音18章8节）。那些认为事情很快就发生、心情急躁的人，当意识到事情没有很快发生的时候，当觉得事情耽延的时候，往往会失去信心。聪明的童女打盹了，愚蠢的童女睡着了；这之间有一点区别；不过，她们都犯了错误。聪明童女的灯还是亮着的，但她们自己却打盹了。许多良善的基督徒，当他们在信仰中很长时间以后，会渐渐冷淡了为基督再来而作的预备之心；他们的爱心变小了，热情变淡了，恩典不再那么突出地显明在他们的生命里；他们的工作，在神面前也不再那么好；虽然他们还没有失去全部的爱，但是，起初的爱心已经失去了很多。如果说，门徒们等候基督一个时辰都是很困难的事情，那么，等候一生就更为困难了。“我想睡一会儿，尽管我的心还是醒着的”。他们先是打盹，然后睡着了。轻忽、松懈的心态，会导致更大程度的疏忽。打盹的人，很难不继续睡着；因此，属灵之中的松懈，在一开始的时候要尤其小心。

（3）半夜有人声喊着说，新郎要来了（6节）。【1】虽然基督的再来看似耽延很长时间，但却最终一定会来到。虽然基督的再来看似缓慢，但却是确定无疑的。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在以色列民、神百姓、属神之人的漫长的盼望、等待以后才来到的；虽然等待和盼望的时间是漫长的，但是，在所定的时间成就的时候，基督必定就来到。同样，在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也将会如此；虽然看似耽延很久，但主却一定不会忘记。基督的

仇敌会发现，神的忍耐，并不等于免罪；基督的朋友会满心安慰地知道，神所定的时间，一定会成就，绝无虚谎。得赎的日子是确定的、不会改变，一定将要来到。【2】基督的来到，是在我们半夜的时间，是在我们最没有想到的时候，也是在我们最想休息睡觉的时候。对于神的百姓而言，基督的安慰与救赎是在那看似最不可能的时候来到的。对于基督的仇敌而言，基督的到来、审判惩罚，是在他们最不以为然的时候来临的。当年，埃及头生长子被杀、以色列得赎的日子，也是在半夜的时候（出埃及记12章29节）。死亡，常常在人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临到；路加福音12章20节记述了，那个半夜被神收取灵魂的人。神来到的时间，是按着他自己的旨意和意志，而不是按着人的意思；这显明了神的主权；神不告诉我们他来的时间，这是要把我们的职分教导我们。【3】当基督来到的时候，我们必须出去迎接他。基督徒们必须要跟随基督的所有行动，在基督的事工中，与他相遇。当我们死亡的时候，基督与我们在死亡中相遇；我们必须从我们的身体出去迎接他，从世界中出去迎接他；我们要以深挚的情感、灵魂中的作为去迎接他；这样，我们才能看见他的恩典与荣耀。【4】“你们要出去迎接他”——这是强有力的呼召，是对预备好之人的有效呼召。这个呼召，使人惊醒。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什么人太注意；那时，基督到世界来，世人却不认识他；然而，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一切世人都将看见、都将注意；每一双眼睛都将看见他。从天上将要有大喊的声音；他将在巨大的声音和荣耀中降临；死人也要从坟墓中起来，接受神终极的审判；地上也要有呼喊的声音，有对山和岩石呼喊的声音（启示录6章16节）。

（4）童女们对喊声的回应（7节）；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1】聪明的童女为迎接新郎做好恰当的预备工作。那预备好离世见

主的人，当最后时刻的时候，仍然有工作要做；他们要切实地预备好，这样，才会有平安（彼得后书3章14节），才会被主看见他们是在辛勤工作（马太福音24章46节），才不会显得赤身露体（哥林多后书5章3节）。那将是鉴察的日子；我们应当思想，在我们见主的日子，我们想让主怎样鉴察我们；我们应当让主看见我们在做什么。当我们看见那日临近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以郑重的心来做好我们离世前最后的工作；我们要再次清理我们的心，悔改我们心中的罪；更新我们与主的约；向这个世界道别；我们的灵魂要恰当地交在主的面前。【2】愚蠢的童女，错误地以为自己也可以迎接主；她们的心里，是虚浮的、虚伪的信心；她们处于自欺欺人的状态，以为自己是良善的；她们以为自己已经为那另一个世界做好了准备。虚伪的信心，使人们装作是好像也得到了神的恩典；在他们离世的时候，也表现得好像可以见主似的；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生，都是活在这样的虚伪信仰之中。虚伪信仰之人的虚浮盼望，在他们面临死亡的时候，会燃烧得更加旺盛，就像死前的回光返照一般。

（5）愚蠢童女所面临的困境；她们没有灯油了（8、9节）。这说明了，【1】即使在死亡的这边一侧，虚伪信仰之人也会面临悲惨的困境；神会让他们看见自己的愚妄；他们将要在自己右手的谎言之中灭亡。【2】更重要的是，在死亡的那边一侧，在终极审判的日子，他们将要面临真正的悲惨困境。在那审判日的时候，他们的虚伪信仰——虽然在此世中看起来似乎不错，然而，却不能给他们在神的审判下带来任何真正的益处。

（第一），她们的灯要灭了。虚伪信仰之人，即使在此世中，灯也会常常

熄灭；他们的信仰，开始于“认识”基督耶稣，然而却被世界的肉体血气缠住，以至于在内心离开了真正的信仰（彼得后书2章20节）。他们的信仰枯萎了，他们的价值丢失了；他们的盼望淡去了；他们的安慰消失了；恶人的蜡烛，常常在这个世界上被熄灭（约伯记21章17节）。然而，还有许多信仰虚伪之人，就像这些愚蠢的童女一样，伪装到最后一刻；他们信仰中的盼望与安慰，似乎一直在伴随着他们；可是，当神要取去他们灵魂的日子，会怎么样呢？约伯记27章8节。虚伪之人的蜡烛，即使在他们去世前、一直没有熄灭，那么，也会在他们离世、死亡的时候，与他们一同灭亡（约伯记18章5、6节）。他们将要倒毙在无尽的痛苦之中（以赛亚书50章11节）。当面临终极审判的时候，虚伪之人的信仰，并不能对他们有任何帮助（马太福音7章22、23节）。“她们的灯要灭了”——这就是虚伪信仰之人的真实光景；他们的虚伪信仰，就像是蜘蛛的网（约伯记8章11节等），就像是恶人气绝（约伯记11章20节），就像是押沙龙的骡子把他留在橡树那里。

（第二），她们的灯要灭了，是因为她们没有灯油。那些生命中没有真正的神恩典的人，迟早会自己认识到这一点。外在的信仰形式，或许会使一个人伪装得很久，并能陪伴一个人走很远的路程；但是，却不能使人经过那最后的审判；虚伪的信仰，能够使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显得很光鲜耀眼，但是，当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他们的灯却要熄灭。

（第三），愚蠢的童女，此刻迫切地想要从聪明童女的器皿那里分得一些灯油。“请给我们一些你们的灯油”。当审判日来临的时候，属肉体血气的

信仰虚伪之人，会非常想要表现得与信仰真诚之人一模一样。那些在此生中憎恨信仰的严格要求的人，在死亡与审判的时候，会非常想要得到信仰的真实安慰。那些不想像义人一样生的人，却非常想要像义人一样死。那些在此生中藐视、轻看谦卑圣徒的人，在审判日的时候，却会非常想要和他们拉近乎，想要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最好朋友、最好帮助者；——尽管，在此生中的时候，他们常常虐待这样的人。“请给我们一些你们的灯油”；可是，——1. 她们的要求，是出于感官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内心真实的深处。许多人在末日、不得不哀求的时候，会想要得到神的恩典来救自己的肉体血气的生命；然而，他们在此生的时候，却不愿意因着那恩典而成圣、并接受福音的管辖。——2. 她们的要求，已经太晚。如果虚伪信仰之人，在此生中及早悔改，在来得及的时候，接受救恩，那么，神愿意把恩典的膏油赐给他们；但是，当审判来临的时候，当末日的帷幕降下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够再得到救恩了。

（第四），愚蠢童女们的要求，被聪明童女们拒绝了。良善之人对她们的拒绝，是一个令人悲哀的预兆，显明了，她们也将要被神自己拒绝。聪明童女没有武断地、不分青红皂白地拒绝说：“不可以”；而是，她们宁愿给出理由，表明她们为什么没有这个能力。“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地方去买吧”。——1. 人若想要得救，必须要自己的生命里面有神的恩典。尽管，我们会在与圣徒的交通中得益，别人的祷告与信心会使我们得到极大的益处；但是，我们自己的成圣必须是出于我们自己灵魂中所得的神救恩。义人必要因信得生。每一个人都要交出自己的账；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显明自己的信心与工作；当审判日的时候，人不能请别人来给自己添加神的恩典。——2. 那有最多神恩典的人，却一点也不能把这恩典分给别人。

我们所有的一切，并不能足以使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站立；最良善的人，也必须要从基督那里得到白白的救恩；最良善的人，也无法把这恩典越俎代庖地分给别人。罗马教廷以为，可以通过额外的工作、以及归罪于圣徒的义，来使普通人得到救赎；但是他们却忘了，那些聪明童女都能够明白的事情——她们的灯油，只够自己用的，并没有办法分给别人。——3. 不过我们注意这里，聪明童女并没有指责愚蠢童女说，“你们为什么把这么大的事情都给疏忽、忘记了”；她们也没有夸口、说自己事先很有预备；或者，她们也没有告诉愚蠢童女，很可能将要临到的绝望状态。而是，她们把最好可能的建议告诉愚蠢童女：“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那在灵魂之事上愚蠢的人，应当值得我们的同情；但是，我们不可欺辱他们；因为，“是谁使你不同的呢？”牧师传道人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不真正认识神、也不在意自己灵魂的人；他们要到临死之前、在病榻上，才会想起要来忏悔、归主；传道人仍然应当引导他们悔改、祈求神的救恩——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在基督面前，只要人内心的悔改和祈求是真诚的，那么，真诚的悔改就不会太迟；不过，人在临死前的忏悔、悔改、归主，很少是出于真心诚意的相信；因而，传道人应当像这些聪明童女在这里所说的话一样，——把最好可能的建议告诉他们。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尝试着，努力得到最好的结果。倘若能行的话，假若不是太晚的话，牧师传道人就要把当行的事情告诉人：“到神自己那里，去得到神恩典的膏油”。但是，人若故意拖延、不去神那里寻求救恩；那么，人是否能够在天国之门关闭之前、在死亡之门打开之前、仍然抢在最后的时刻、得到基督救恩，那就是一件语言所无法表达的危险之事了。我们应当趁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趁还有时间的时候，到神自己那里去，得到圣灵的恩典与灯油。人若想要得到恩典，就必须自己到神的面前，得到那来自于神自己的救恩，并服事于那拯救的福音。见（以赛亚书55章1节）。

(6) 新郎的到来，以及聪明童女和愚蠢童女的境遇。

【1】她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故意拖延信心与服事、想要把救恩推到最后一刻的人，最大的可能性是，他们已经没有时间了。得到恩典，是一件严肃的事、一件花费心神和时间的事；不能够草率忙慌地、轻轻忽忽地完成。罪人在病榻上，通过忏悔和祷告，在慌忙迷乱之中想要得到救恩的时候，很难说目的是什么、应当做什么；死亡迅即来临了，神的审判临到；罪人就这样面临永远的沉沦与惩罚。我们需要灯油的时候才去买、需要恩典的时候才去临时抱佛脚，是没有用处的。

新郎来到了。当那终极审判日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他的百姓这里来，就像是新郎一样；他来的时候，将要穿着圣洁华贵的衣服，被朋友们环绕着、事奉着；现在，新郎不在这里、我们当禁食（马太福音9章15节），但到那日的时候，我们将要有永远的筵席。那时，新郎将要把新妇带到家里，使她与他永远同在（约翰福音17章24节），并要永远悦纳她（以赛亚书52章5节）。

【2】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第一），我们与基督进入那永远的荣耀，就是与他一同永远地坐席，与他亲密地在一起，与他在永远的安息中交通，并得到无限的、永远的喜乐与丰富。（第二），

那些预备好了的人、也只有那些预备好了的人，才能够进去与他一同坐席；——就是那些有圣灵凭据的人（哥林多后书5章5节）。（第三），如果我们预先准备好了的人，那么，死亡的突然临到，基督的出人意外的来到，并不会成为我们得到幸福的阻碍；反而，会使我们进入那永远的幸福。

【3】“门 就 关 了”。——正如：在婚礼上、当所有宾客都到齐以后，大门就关了一样。（第一），门关了，使里面的人安稳、安全；他们是神殿的柱子，再也不会出去（启示录3章12节）。亚当在乐园里的时候，门是开着的，因而他的灵魂离开了；然而，当荣耀的众圣徒进入天国的时候，他们会永远地在里面，幸福而安稳。（第二），门关了，使外面的人再也不能进来。圣徒的性质、与罪人的性质，将要处于永远也不会改变的状态；那些被关在外面的人，将要被永远地关在外面。现在，天国的门虽然是窄的，但仍然是打开的；但是那时，天国的门将要关闭；在天国与地狱之间，是永远也不可跨越的鸿沟。这正如挪亚的日子，当挪亚方舟的门被关闭的时候，挪亚一家被保全在方舟之中，而外面的人则被永远地弃绝。

【4】愚蠢的童女来的时候，已经太晚（11节）；门关了以后，那些其余的童女才来。（第一），当时间已经太晚了的时候，将有许多人来到天国的门口，想要进去；正如褻渎的以扫，当他放弃了长子名分以后，才想起来要到父亲那里继承祝福。这些罪人们在时间太迟了的时候，才想起来乞求神；这固然更加彰显神的荣耀、显明了信仰的宝贵价值，然而，太迟了的乞求，并不能使这些罪人得救。那些现在藐视信仰、轻看祷告、不愿祈求

的人，当时间已经太晚的时候，飞速地想要跑到神的面前来乞求，可是，却没有用处。（第二），虚伪信仰之人，有一种错误的乐观想法；他们以为自己能够得到幸福，能够进入天国。但是，当他们来到天国的门口、要求进去的时候，却被拒绝、被关在外面。在这地上，他们以自欺欺人的心态，仰望天国，以为自己将来会进去；但最后，他们却被投进地狱。

【5】他们被弃绝，正如以扫当年那样（12节）；“我不认识你们”。当我们还可以寻求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应当来寻求他，祈求他的恩典和救恩；因为时候将到，——等到太迟的时候，主就不能再被寻求得到了。现在的时间是，主仍然向我们敞开怀抱，并把应许赐给我们——“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然而，时候将到，当终极之日来临的时候，就不再有救恩的机会；对于这些在外面的童女们来说，已经太迟了。这个审判是庄严而严肃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对于在此生不悔改的刚硬罪人以及虚伪信仰之人来说，这就是神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得进入神的安息。这里的经文，显明了神坚决的定意；一切的罪人，在神的审判面前都要哑口无言。

最后，在这个比喻的结尾，再次警告我们：“所以你们要儆醒”（13节）。我们在前面的马太福音24章42章曾看见这个警告，这里，再次郑重地警告和劝诫我们。1. 我们最大的一个职分，就应当是儆醒；我们要以最大的勤奋和谨慎，来对待关乎我们灵魂的事情。要醒起，要谨守。2. 我们之所以要儆醒，是因为有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主来的日子，对我们而言，是不确定的；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日子，什么时辰。因此，我们在每一

天、每一刻都应当儆醒、预备好；不可在任何时刻、任何日子松懈、忘乎所以。在每一天中、在年年日日中，都应当敬畏主。

=====

14-30节

这一段的比喻，讲到了三个仆人。上面的那个比喻讲述的是，我们必须预期主的到来；而这个比喻讲述的则是，我们必须处于工作和服事的状态中。我们要在工作和服事中，不断地勤奋和努力，这样才能预备好见主。所以，我们必须激励起来，努力服事，这样才能有益于我们自己的灵魂；以此，我们更归荣耀于神，并对他人有所助益。

在这个比喻里面，1. 主人就是基督；他是我们一切所有的主人和拥有者；尤其是，他是教会一切所有的主人和拥有者。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他的手中。2. 仆人是基督徒，是基督自己的仆人；他们生在基督的家中，被基督买来，被基督使用，并归颂赞于基督。

我们在这个比喻中可以看见三件事情。

I。仆人们所受到的信任和交托；他们的主人把一些恩赐分别赐给他们；基督差派他们作工（基督不会让他的仆人们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基督给他们一些资源和才能，使他们能够以此为基础来作工。1. 基督的仆人们所拥有的、所得到的一切，都是来自于基督的赐予；他们本身一无是处、一无所值，除了他们自己的罪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他们自己的。2. 我们从基督那里得到恩赐，是为了让我们来服事他，作服事的工作。我们所得的一切惠利，都是为了要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为主做工。我们每一个人得到圣灵的恩赐，都是为了要服事主、荣耀主。3. 不论我们得到了什么恩赐用来服事基督，我们所得到的这些恩赐，仍然是属于基督的；我们只是他地中的租户，是他百般恩赐的管家（彼得前书4章10节）。

（1）为什么要交托这些仆人：——主人要到遥远的外国去。以弗所书4章8节。当基督升到高天之上的时候，他把恩赐赐给众人。【1】当基督去天上的时候，就像是一个人到遥远的外国去；即，他要去很久，并有确定的目的和意义。【2】当他去的时候，他把很多恩赐交托给教会，使他们有充足的必需。他把真理、法则、应许、能力、权柄交托给教会；这是那伟大的托付（提摩太前书6章20节）（提摩太后书1章14节）；主把那良善之事托付给我们；他差遣圣灵，来使门徒们能够教导真理，谨守法则，经历应许，践行权柄，使用能力。

(2) 所交托的不同数量的恩赐。【1】他把不同数量的银子交给三个仆人。基督的恩赐是宝贵而丰富的，价值珍贵；正如基督的救恩是他用宝血为我们所赎买来的。【2】他给一些人多一些，另一些人则少一些；有的人有五千银子，另一个人两千银子，还有一个人是一千银子。每个人按着各人的能力得到不同的恩赐。神的旨意安排在不同的人之间，使他们有不同的能力；在头脑上、身体上、产业上、亲族上、兴趣与利益上，每个人的能力都不同；同样，神的恩典把不同的属灵恩赐放在不同的人身上。无论是人的能力、还是属灵恩赐，都是来自于神自己的赐予。（第一），每一个人都至少有一千银子；卑微的仆人不应当为自己所得的恩赐多少而羞愧、或自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灵魂，这是神所交托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的生活、生命、工作、言语行为、所思所想，都应当于我们的灵魂有益。人的职分，应当是对他周围的人有益；他应当有益于尽可能多的人；有益于世人的灵魂。（第二），每一个人得到的所有恩赐加在一起，是不一样的；正如每一个人的能力和机会也不都一样。神是完全的自由意志者，他按着自己的旨意和心意做事，把不同的恩赐分给各人。有的人擅长做这种服事的工作，有的人擅长做那种服事的工作；正如一个身体上的不同肢体。当家主安排好了这些事情以后，他就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吩咐的话语告诉使徒们以后，就升到了天上。

II. 这三个人对待所托付之事的的不同态度（16-18节）。

1. 两个仆人做得很好。

(1) 他们都很勤奋、信实；他们去做买卖；他们把那些所托付的银钱拿来使用（这就是银钱的本来用处和目的）；——用于买卖商品，获得回报。他们的主人一走，这两个仆人就开始工作。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很多的服事工作要做，因此，不要浪费时间，而是要抓紧光阴，努力勤奋地、信实地、诚实地工作。他们去做买卖。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一个属灵的商人。贸易商业是一件复杂的、极其需要心思和精力的事情；属灵的敬虔之事，也是如此。基督徒所从事的属灵商业，是一个生产、工作的商业；我们要全心全意地从事这项工作，为了他人的益处而努力辛勤。这是一个贸易的商业；我们要舍弃那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事物，而得到那些价值弥足珍贵的、对我们灵魂有极大益处的事情。这是一个智慧的商业；箴言3章15节；马太福音13章45节。一位诚实勤奋的商人，是把全部心思、时间、精力都专注于所要做之工作上的人；他努力地学习，严谨地做事，尽一切力量去上进，以事业为生活的中心，并从商业的利益中得到收获。这样，一位真诚的基督徒也是如此；他在信仰的服事工作上也是这样殚精竭虑、专心致志；我们仓库中所用于贸易的，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而全部都是来自于主。我们头脑中的能力——理性、学识、认知，必须要被使用、服务于我们的信仰；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惠利——产业、声誉、利益、权力、爱好，必须被用来服事于基督，归荣耀于他。福音与圣礼，我们在教会与福音中的服事，圣经，牧养的工作，安息日，圣餐、洗礼，等等，这些事情，必须要被用于其所应当用的目的；从中，我们与神交通；以此，圣灵的恩典与恩赐在我们的生命中实践出来、显明出来；这就是我们用主赐的银钱所应当作的买卖。

(2) 这两个仆人的工作都很成功；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双倍的收获。那有五千银子的，很快就又赚了五千。勤奋之人的手，能够通过良善的工作，得到丰盛的果实；他们能够得到许多属灵的恩惠、安慰与财宝。在信仰中，有许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勤奋地去努力工作。

他们的收获与恩赐是成比例的。

【1】那有五千银子的，也收获了五千；那撒种丰富的地方，也结实丰富。人的恩赐越大，就越要辛勤努力地工作，并在工作中使用这些恩赐的能力和条件。【2】那有两千银子的，也收获了两千。一个人所作的良善之事，不在于他的外在表现和结果，而在于他是否尽力地使用了自己已有的才能、能力和机会；尽力的人，虽然他的工作果实可能没有别的人那么显著、那么效果巨大，然而他仍会得到神的悦纳。

2. 第三个仆人做得不好（18节）；那得了一千银子的人，去把主的银子埋在地里。虽然这个比喻里面，不好的人只有三分之一，但在现实中，这个比例可能很大；路加福音17章17、18节讲述了，十个被医治好的大麻风病

人中，只有一个回来献上感谢；其他九个人都把所得的恩赐“埋在地里”了。那个只有一千银子的仆人，是一个不信实的仆人；无疑，这世上一定有很多拥有五千银子的人，也是这样把银钱埋在地里，——荒废自己的丰富能力、优势、资源和机会；他们浪费神的恩赐，不做良善的事情。不过，这里基督在比喻中特别强调了这一个一千银子的人，这告诉我们，（1）若这荒废仅仅一千银子的人，尚且要被弃绝、扔在外面彻底的黑暗之中；那么，那些荒废、践踏更多银钱的人，那些浪费更多能力、优势、资源、机会的人，将要受到怎样的惩罚呢？（2）那些看似能力最小、最没有机会资源来服事神的人，他们的愿意服事之心，往往也最小。他们以自己没有能力、没有资源为理由，来给自己的懒惰寻找借口。由于他们能做的事情不多，所以，他们就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因而，这更加显明了他们的懒惰之罪；——他们只需要去做一千银子的工作就可以；——可是，他们连这点事情也不愿去做。

他去挖了一个坑，把这一千银子埋在地里，好像担心怕被偷似的；他没有去乱花、乱用这些钱，也没有侵吞、挥霍这些钱，而是把钱藏了起来。钱就像是粪一样（就如同我的老师、培根所说的），堆在一起的时候毫无用处，而必须要被分散开；可是，我们在日光之下常常看见的一个罪就是，钱财被堆聚在一起（雅各书5章3节）（传道书6章1、2节）；这些被堆聚的钱财，对任何人没有好处；属灵的恩赐也是如此；许多人拥有属灵的恩赐才能、机会和资源，但是，却不按着它们所应当使用的用途去使用它们。那有产业的人，没有把产业用于敬虔与慈善的事情；那有权力与利益的人，没有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去推动和促进敬虔的信仰；牧师传道人有能力和机会去做良善之事，然而，他们却不愿意激动心灵、努力做工；这些人，就是那慵懒的仆人；他们看重自己的事情，远远胜过他们看重基督

的事情。

他把主人的钱埋藏了起来；如果这些钱是他自己的，那么，他可以随己意使用它们、或是不使用它们。但是，不论我们有什么能力、才能、优势、身体、健康、资源、机会、时间，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只是神所恩赐给我们这些东西的管家；而且，终有一日，我们都必须要为这些东西向我们的主人交账；——因为那些本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仆人的慵懒，在其他两个仆人的辛勤劳动的映衬之下，显得更加罪恶；他们的勤奋与热情，本应当使这第三个仆人也辛勤地劳动起来。别人辛劳，难道我就可以无所事事、懒惰吗？

III. 交账与算账（19节）。1. 过了许久的时间，主人才来算账。这并非是由于主人疏忽、忘记了算账的事情，也不是由于神耽延了他的应许的成就（彼得后书3章9节）；神已经准备好、将要审判（彼得前书4章5节）；但万事各有其时。2. 虽然过了许久的时间，但是，算账的时间终于来到了；仆人们的主人要来和仆人们算账。神百般恩赐的管家，要在主的面前交账；要汇报自己作为管家的工作，是否诚实、信实、辛勤。我们所有人都将要交账——我们为自己的灵魂做了哪些有益之事；我们为他人做了哪些有益之事；我们怎样使用了我们的恩赐、才能、能力、身体、健康、时间、机会、资源。见（罗马书14章10、11节）。

(1) 信实仆人们的交账。

【1】这两个仆人向主交账（20、22节）；“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你交给我两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我又赚了二千”。

（第一），基督的信实仆人，诚恳地、感恩地承认，自己的所有都是来自于神。——1. 我们应当清楚地知道并承认，我们从神那里所得到的恩赐；我们应当记念这些所得的恩赐；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的职责是什么，主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这样，我们才能相应地做出有益的工作。——2. 我们必须不可夸耀自己的工作，而是要深刻地明白神对我们的恩惠；神放在我们身上的荣耀，交托给我们的事情与恩赐，赐给我们的恩典，这些都是在我们生命里面一切良善之事的源泉。事实是，我们为主服事的越多，我们就越应当祈求主来更多地使用我们、赐给我们能力来更多地服事他。

（第二），他们提供了信实的证据，就是他们的收益。神的良善管家，应当有证据表明他们的勤奋；“用你的行为，表明你的信心；一个良善的人，应当表明出他的良善”（雅各书3章13节）。如果我们在属灵的“商业”工作中勤奋认真努力，那么，工作的效果很快就会表明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

工作的果效将一直跟随着我们（启示录14章13节）。并非是说，圣徒在审判日的时候会在神的面前夸耀自己的好行为；不，基督会为他们诉说（35节）；但这里表明了，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忠信的仆人将能够坦然来到基督的面前、神的面前（约翰一书2章28节至4章17节）。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那只有两千银子的仆人，也和那五千银子的仆人一样，欢欣地报告自己所得到的收获果实；在那交账的日子，我们的安慰，在于我们的信实，而不在于我们的业绩；在于我们的真诚，而不在于我们的成功；在于我们心里的正直，而不在于机会的程度。

【2】主人对他们的悦纳和称赞（21、23节）。

（第一），主人称赞他们：“你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们做得好”。耶稣基督的忠心良善的仆人，他们的勤奋与正直，当主再来的时候，必会得到赞扬、荣耀、荣誉（彼得前书1章7节）。那现在归荣耀于神的人，必将会很快就得到神的荣耀；那现在归向神的人，必将会很快就得到神的悦纳。——1. 神将接纳他们；神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忠心良善的仆人。主现在就知道他仆人在这个世界上的诚实，并将要在审判日的时候为他们作见证；那被主称为信实的，的确的确是信实的人。他们或许在这世上被很多人指责、挑剔，就像义人常受世人的逼迫一样；但基督自己会见证他们的正直品格，就是良善与信实。——2. 他们的工作也得到主的悦纳；“你们做得好”。只有那些做得好的人，才会被主称为是良善的仆人；我们应当在良善的工作中，以坚持和忍耐，寻求属神的荣耀；若我们寻求，就必寻见；若我们行善，就必得主的称赞。这世上有的主人总是阴沉着脸，不愿意夸

奖手下的仆人们；不论仆人们的工作做得有多好，他们的嘴里都没有一句好话；但是，基督欢欣地称赞他的仆人们。若我们从主人那里得到了称赞，那么，别人怎么说我们其实并不重要；若主说我们做得好，那么，尽管别人会贬损我们、藐视我们，其实都没有关系。反之，人如果自夸，或是受到邻舍的夸奖，但却没有得到主的夸奖，那么，一切都是徒然。

（第二），主人奖赏仆人们。基督的信实仆人们不仅仅是得到夸奖和称赞而已；他们的劳苦与爱心将要得到极其丰厚的奖赏。

这个奖赏在这个比喻里面用两个方式来表达。

——1. “那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的，将要被主差派管理更多的事情”。在王宫里或是大家庭中，那些在低层级别上工作信实的人，会被提拔到更高级别、更加重要的工作上。基督喜悦谦卑的仆人们。那归荣耀于基督的人，将要得到来自基督的荣耀；——冠冕（提摩太后书4章8节）、宝座（启示录3章21节）、国度（马太福音25章34节）。他们在这里是乞丐，但在天国中他们是统管者。正直人必将执掌权柄；基督的仆人们，都必将作王。

看这里，仆人们所得的奖赏与其工作成就是不成比例的。他们仅仅是在不多的事情上良善忠心、归荣耀于神，然而，神却将要在许多的事情上，把荣耀赐给他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神给我们的职分，神交付给我们的工作，与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之事相比，都是很小很小的。我们所有的服事、患难、辛劳、良善、果实，统统加在一起，都仅仅是很少的事情，几乎是虚无的，不值得一提；与神所将要启示给我们的荣耀，都远远不能相比。

——2.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1）蒙福的状态，是喜乐的状态；不仅是因为我们的眼泪都将被擦干，而且更因为，我们一切安慰的泉源、喜乐的泉源，都将被打开。当我们与神同住、在神里面完美、圣洁的时候，当神所有蒙福的百姓都欢聚一堂的时候，那是无以言表的、完全喜乐。——（2）这是我们主人的快乐；这是主基督自己所赎买来的，并赐给一切赎民的；神的百姓，被救赎主从忧伤患难中赎买来，进入永远的欢乐。这是主人自己的快乐；是基督在忍受十字架患难、忍耐罪人的蔑视时，所瞩目的、所渴盼的快乐。希伯来书12章2节。基督是那喜乐的源泉，也是那喜乐的中心。这是我们主的快乐，也是我们在主里面的快乐，是极大的、无限的快乐。——（3）荣耀的圣徒们将要进入那快乐，将要得到那完全的、全部的快乐；正如那进入神的产业、进入那婚礼筵席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主的喜乐进入圣徒们的心中；圣徒们得到圣灵的激励、安慰、鼓舞、支撑；在那天国里面，圣徒们更要很快地进入永恒的喜乐幸福之中。

（2）慵懒仆人的交账。

【1】他向主人交账并自辩（24、25节）。虽然他仅仅有一千银子，但是，也同样要为此在主人面前交账。我们所拥有的条件、才能、能力、身体、生命、健康、资源、机会，虽然可能不多、只有很少，但是，我们仍然要为此交账。每一个人的交账，都不会超过他本身所应有的职分、所曾得到的恩赐、所应当做并能够做的事情。不管我们有什么，我们都要为我们所有的一切而向主交账。

（第一），他的自信。他来到主的面前交账，带着自信和把握的心情；他指望，自己的申辩能够使自己得到安稳的结局。“主啊，看这里是你曾交给我的东西；虽然我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赚取更多，但是，我可以说，我也并没有损失什么”。他以为，这样的申辩，就算不能使自己得到什么奖赏，但是，至少会使自己得到安全。

许多人都是这样自信满满地走到神的面前，接受神的审判；他们以为，自己的辩护是有效、合理的；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神并不会接受他们这些徒劳的、虚浮的自辩。慵懒的信仰者，不想为神做什么良善之事，但是，却希望自己能够和那些在信仰中付出一生巨大代价的、真正的信仰者一样，得到永生的归宿。因此箴言26章16节描述慵懒的人时，说到

“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这个仆人觉得，自己能够通过主的算账和评断；因为他对主人说：“你的东西都还在这里”。他的意思是说：“主啊，我没有挥霍我的资产，没有消耗我的时间，没有亵渎安息日之礼，没有反对良善的牧师传道人，没有抵抗良善的讲道；主啊，我没有嘲笑圣经，没有嘲笑信仰，也没有用权力迫害任何良善人；我从来没有丢失什么东西，也没有浪费主的好资源，也没有醉酒荒淫，也不记得曾经去害过什么人”。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们，都是这样，把自己进入天国的盼望，建立在这些自辩的话语中；然而，这些话语，不过都是这里这句话的翻版：——“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就好象，自己的生命没有什么职分、没有任何可期待之事一样。

（第二），他所承认的事情。他承认，自己把那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了。他口中说这句话的时候，看起来似乎并不觉得，这是一件什么过错；甚至，他可能还以为，主人说不定会夸奖他，因为他谨慎地把银子藏在安全的地方、一点也没有挥霍、或使之置于险地。世人对于审判日所将面临的审判，常常是一种轻飘飘、无所谓、“没什么大不了”的态度。又或者，这个慵懒的仆人自觉心虚，知道自己的慵懒会受到主人的严厉审判。——总之，不需要找寻给他们定罪的证据，因为他们自己的口就定了他们自己的罪。

（第三），他为自己寻找的借口。“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严厉的人，所以我害怕”。人若以良善的看法来看待神，就会产生爱；爱就会使人勤奋地、信实地来服事神。人若认为神是忍心的、严厉的，自己就会产生害怕、疏

远的心情；这种害怕使人变得慵懒、懒惰、不信实。他的借口，说明了一

—

——1. 他的心里面，是一种敌人的情绪；“我知道你；你是一个忍心的人”。这就像是以西结书18章5节所记述的，以色列家中的恶人说，主的道是不公平的。因而，这个慵懒仆人的自辩，也是对神的反击。罪人愚妄地在罪恶的道路上刚硬顽梗；然而，好像他们以为自己可以摆脱罪责似的，反而在心里面埋怨神。他们或许以为，通过反责神，就能使自己逃罪。正如亚当在犯罪后企图掩饰自己，于是对神说，“你所给我造的那个女人，把我陷在了罪中”。罪人的属肉体血气的心，对神的看法是谬误的、罪恶的；而这样的谬误看法，反过来使他们在罪恶的道路上更加刚硬顽梗。看这个仆人说到主人的时候，口气是多么自信；“我知道你是这样的人”。他怎么知道主人是这样的呢？他从哪里知道主人是这样的呢？我们、或是我们的父辈先祖，在神的身上看见什么恶事了吗？耶利米书2章5节。神做什么事情使我们厌烦了吗？神欺骗我们的什么工价了吗？弥迦书6章3节：“我的百姓阿，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神对我们而言，什么时候是旷野了呢？什么时候是黑暗之地了呢？神长久以来掌管这个世界，能够比撒母耳更加理直气壮地问：“我诈骗过谁呢？我欺压过谁呢？”难道，全地的人不是都知道吗：——神不仅不是一个忍心的人、严厉的人；恰恰相反，全地都充满了他的良善；神不仅不是一个没有播种、只顾收割的人；恰恰相反，即使在那颗粒无收的土地上，神也曾经播撒过许许多多的良种。神使阳光普照大地，使雨水如同甘霖一样滋润世界，使日头、雨露临到好人、也临到歹人；对于那些说“主啊，请离开我”的人，神使他们心里干旱化为春雨，得着饱足与喜乐。

这个恶仆的话语，代表了恶人对神常有的心态；他们似乎总想把自己的罪与毁灭，赖到神的身上；他们故意责怪神，说，神没有把恩典给他们；但是，任何信实地接受神普遍恩典、并以此为基础来努力地事奉神的人，都不会缺乏神的特别恩典，也不会灭亡在永远的刑罚里；也没有人能够显明，还有谁比神更加能够以忍耐恩慈的心，来对待那不结果子的葡萄园了。神并不挑三拣四；不，在神的约里，神所要求我们的事情，也恰恰是神所应许我们的事情；所以，若我们灭亡，那么，我们就无可辞咎。

——2. 他的心里面，是奴隶的心态。人对神的这种错误态度，是来自于他对神的错误认识；没有什么，是比奴隶的害怕心态，更不配神的荣耀，也更加阻碍我们来向神尽职分的了。这是一种捆绑与折磨的心态，是与诫命中关于爱的内容完全相反的。人若对神有这样负面的想法，那么，就会疏远神，并会在服事神的工作中心情焦躁、心不甘情不愿。人若以为自己不可能得到神的喜悦，若以为自己服事他的工作都是徒劳的，那么，就不会热忱地在信仰中来服事他。

【2】主人对他的回答。他的申辩不但没有成功，而且，被他的主人推翻；他自己口中的话语，成为给他定罪的证据；他在主人的驳斥面前哑口无言。这里，我们看见他所受到的定罪与审判惩罚。

（第一），对他的定罪（26、27节）。他在两件事情上被定罪。

——1. 慵懶和懶惰；“你这又恶又懶的仆人”。懶惰的仆人，就是罪恶的仆人；在主人的眼中，这两样被看作是一类。那在工作中懶惰的人，忽略了神所吩咐的、应当去作的良善之事，“与浪费人为兄弟”（箴言18章9节）；这就等同于，他们在做神所禁止的恶事——浪费。在服事神的工作中粗心大意、慵懶、懶惰、满不在乎的人，就等同于，忙于从事撒旦的工作一样。不做良善之事，就是要招致严重的后果。疏忽、不做良善之事，是罪，必须要受到审判；懶惰之罪，引向更加邪恶的罪行。所有人都是污秽的，因为没有人行善（诗篇14篇3节）。当房子空了的时候，污鬼的灵会进来占据。那在灵魂之事上无所事事的人，不仅是在游手好闲，而且是在做更恶的事情（提摩太前书5章13节）。

——2. 他的自相矛盾（26、27节）。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罪人对神的负面看法，虽然是错误的、是不义的，但是，这并不能因而成为罪人犯罪的借口，反而要更深地加重罪人的罪责。——（1）“就算我是一个忍心的、严厉的主人，难道你不就应该更加勤奋地、关切地工

作，来得我的喜悦吗？就算你的工作不是出于爱，那么，即便是出于害怕，难道你不更应该关心你的工作，更应该来尽力吗？”若神的公义如烈火，那么，我们应当仔细思想，怎样了努力地服事他。——（2）或者，“如果，你认为我是一个忍心的、严厉的主人，所以不想去努力工作赚钱，——因为你害怕亏本、害怕我让你承担损失；那么，你为什么不想把这钱放给兑换银子的，这样就可以收取红利呢？”我们不能把我们没有能力做的事情，当作借口，来为自己的懒惰、不做任何事情之态度辩解；因为，这显明了我们不愿意去做那些我们本可以做之事的心态。如果说，我们的心里不愿意去做那些冒险、费力的事情；那么，难道我们就可以蜷缩在角落里，甚至不愿意去做那些安全而容易的事情吗？做事，总比不做事好；有胜于无；如果我们没有勇气去做那些勇敢的事情，那么，我们至少要显明愿意诚实服事的心；在审判日的时候，我们的主不会轻看那些卑微、微小的事情。——（3）或者，“就算我在没有播种的地方收割，然而，你却是我所曾播种的；你的银钱是我托付给你的，——不仅要你保管，而且要你从中得利”。在交账的日子，恶仆与懒惰仆人都无可辞咎；他们的辩解将要受到主的驳斥；他们将哑口无言；那些现在自以为义的人，将要在审判日的时候，无以言对。

（第二），这个懒惰恶仆人所受到的审判惩罚。

——1. 懒惰仆人的银钱要被夺走（28、29节）。一开始的时候，这些银钱都是主人按着他自己的旨意和意愿分给各人的，因为他是有着完全权柄的主；然而现在，这位主人更是一个审判官；主人要把银钱从不信实的仆人

那里拿走，惩罚恶仆，并把银钱交给信实的仆人。“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1）这个话语，可以适用于此生之中的祝福：在世上、在属世的财富上。神把属世的产业和财富交在我们手中，要让我们把这些事情用于神的荣耀，用于他人的益处，归荣耀于神。这样去做的人，会得到神的祝福，并得到更加丰盛的财富与产业，更重要的是，会得到更加丰盛的安慰与美好；但是，那些没有这样去做的人，即，那些吝啬的、抠门的，不愿意周济人、帮助人的，不愿意行良善之事的；——他们手中已有的也会被夺去。吝啬的人，他们手中有的，就和没有的是一样的。箴言11章24节：“有施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把我们所有的，分给穷人，我们就必得丰盛的回报；我们的粮仓会充满，油桶会满溢；但是，若我们吝啬、冷漠、小气、不慈善，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财富也都将败亡；（传道书5章13、14节）。有时，神的意旨安排会奇妙地把不愿行善之人的财富，转移到慈善之人的手中；货财，为那怜恤穷人的人而积聚（箴言28章8节）（箴言13章22节）（约伯记27章16、17节）（传道书2章26节）。——（2）这个原则，更可以适用于神赐下恩典的方式。人若勤奋地服事、抓紧所有的机会来做良善之事，那么，神就会使他们昌大，在他们面前开门（启示录3章8节）；但是，人若慵懒，那么，平安就会在他们眼前隐藏。“去看神在示罗所作的事情”（耶利米书7章12节）。——（3）这个话语，适用于圣灵的普遍恩赐。那有圣灵恩赐、并愿意使用圣灵恩赐才能的人，会得到圣灵的更加丰富的恩赐。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些恩赐，必须要经常使用，才会愈来愈彰显。在真诚的信仰中，我们做得越多，得到的就越多，也就越有更大的能力做更多的事情。但是，那些懒惰、慵懒的人，那些不愿意使用才能、不愿意使用恩赐的人、不愿意发挥自己能力的人，他们的恩赐会生锈、衰残、逝去，就像是一个没有人在意的生命一样。那灵魂中没有神恩典原则的人，连他所有的普遍恩赐，也会失去；正如前面比喻中的那些愚蠢童女，由于没有灯油，所以她们的灯烛都熄灭了（本章8节）。一个慵懒的、

无用的牧人，双手抱胸，眼睛微闭，无心工作；撒迦利亚书11章17节讲到，这样的无用牧人，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

——2. 他要被扔到外面的黑暗中（30节）。

——（1）他的本质，就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懒惰的仆人，是一个无用的仆人；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本是要去做神所交付他们的良善之事；然而，他们的此生，既没有回应他们生命本来应有的价值与意义，也没有归荣耀于神、并有益于他人的生命与灵魂；他们更不在意他们自己灵魂的救赎之事。一个懒惰的仆人，就像是一个身体上枯萎的肢体，一个葡萄园里的枯树，一个蜂房里的懒惰蜜蜂，没有任何用处和益处。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都是主面前无用的仆人（路加福音17章10节）；我们不能使神得利（约伯记22章2节）。但是，对于他人来说，对于我们自己的灵魂来说，我们必须要是有用的、有益的。否则，基督就不会接纳我们为他的仆人；我们不伤害人是不够的，必须要行良善之事，必须要结出果实；虽然神不会因我们工作得利，但是，他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得荣耀（约翰福音15章8节）。

——（2）他的结局是，被扔到外面的黑暗中。这里正如前面所讲到的、信实仆人的结局一样，主耶稣在这个比喻的结尾，画龙点睛地指出了整个事

情的关键所在，就是这整个比喻的主旨。外面的黑暗，以及其中的哀哭切齿，在基督的讲道中，总是一致地指向了地狱的永远惩罚和刑罚。——

【1】那里的状态是非常可怕的。那是外面的、彻底的黑暗。黑暗是让人恐惧、难受的：这是埃及所受的灾祸之一。在地狱里面，是捆索（彼得后书2章4节）。人在黑暗里面不能做任何工作；因而，黑暗是对那慵懒仆人的公义惩罚。这是那外面的黑暗，是与光明的天国相隔绝的，是与主的快乐相隔绝的，是与主的筵席相隔绝的。比较马太福音8章12节、马太福音22章13节。——【2】那里的状态也是非常可悲的。罪人要在那里永远地哀哭切齿。那里是永远的痛苦与恼恨。这就是懒惰仆人的分。

=====

++++
++++

++++
++++
++++

+++++

+++++

我们在这里继续讲述，在西方近现代历史中的、两条发展线索中的、第二条线索。

【重述一下上文关于这两条西方近现代历史中的发展线索】：——在西方近现代历史上，尤其是在欧洲大陆的各个国家中【英国处于外岛上，不在欧洲大陆之内，相对而言比较超脱、中立；但也会在很多方面、相当程度上受到欧洲大陆影响，并与欧洲大陆互动、相互作用】，在重要思想政治文化领域中，一直有着本质迥异的两条发展线索。第一条线索就是，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一大批敬虔基督徒们所掀起的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第二条线索就是，发源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起源于、兴起于十五世纪】以及后来的所谓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两条发展线索中，在其内部、深层次内涵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甚至本质性的矛盾之处。

在上述第二条发展线索中【即，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其集大成者，就是以法国为中心的思想文化体系。几百年来，法国一直自诩为启蒙运动的旗手和大本营。但是，这种思想启蒙运动，或所谓人文主义，其核心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它与第一条发展线索之间有什么异同呢？

公道地说，这个第二条线索【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第一条线索【基督教改革与回归圣经的；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之间，其实有着相当程度的重合或共同之处。

第一，它们都是对于天主教在很多具体教义与信仰实践方面的反对【虽然，天主教是正确地持守着《圣经新旧约全书》的正典典籍，并且也持守着《使徒信经》等等正确的基督教信仰教义总结；但是，在天主教中，谬误地添加上了很多圣经里面所没有的、甚至是直接违背圣经教义的教导；例如，关于炼狱的教义，关于敬拜所谓圣母玛利亚的教导，关于对马利亚和历史上基督教圣徒祷告，以及，关于教皇的属灵权威与圣经的属灵权威同等；——等等，这些都是明显错误的、违背圣经的。在这些方面，东正教也有着同样类似的错误问题】。无论是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还是人文主义、启蒙运动，都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天主教的许多教导构成了反对。

第二，它们都主张，人与人之间应当彼此平等、互相相爱，并应当重视诚实的思考与理性等等。

但是，在这两个线索之间，却有着本质性的、甚至是天壤之别的差异。简言之，人文主义启蒙运动，就相当于，把圣经律法中的两条总纲【即，第一，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你的上帝；第二，要爱人如己】，除去了第一条，而只保留了第二条。

事实上，上述特征【即，只有对人的爱，却没有对于上帝的爱；仅强调人道主义，但却故意无视、忽视、甚至蔑视——世人所应当有的、对于那宇宙天地之主、创造世人生命之主的敬畏和热忱敬拜】，不仅是西欧人文主义、启蒙主义的深刻弊病所在，而且也正是现代世界中的“白左”【即，白人左派】的深刻弊病和症结所在。

在过去数百年来，以法国、德国等地的文化土壤为中心，有许多人高举所谓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启蒙主义、文艺复兴的大旗；但是，事实上，他们所作的，却是费尽心机地失去了上帝；并且，这些思想文化给他们所在的国家和文化土壤带来了巨大的混乱、甚至巨大的灾难。

关于这一点，我们仅仅从美国独立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不同结局与发展就能够清晰地看见端倪。美国自从1776年建国至今，在1788年首次宪

法通过以后，历届政府【包括总统行政部门、以及参众两院的国会立法部门，和联邦法院体系】就一直沿袭着起初宪法所制定的政府框架，直到今天。期间，虽然宪法也有所更新和发展，但总是以补充条款的形式（即 amendment，中文不是很恰当地翻译成“修正案”），以合法的、有序的、渐进的方式和平进行。相比之下，同一年代中相隔时间不长的法国大革命【1789年至1799年】，虽然成功推翻、并彻底废除了法国的君主政体【法国暴民们以暴力、喧嚣的方式，屠杀了法国皇室；而不是像英国那样，和平地、谨守地保留了君主政体，并以君主立宪、渐进转让权力的方式、实行议会民主】，但是，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今天为止，法国的近现代史就充满了混乱、喧嚣、动荡、甚至生灵涂炭。从法国大革命至今，法国共经历了十五次大的革命或重大政治变化。每一次新的革命，就推翻了上一次的政府架构体系。每一次重大政治变动，就会导致社会上的巨大混乱甚至灾祸。1799年，在十年法国大革命运动以后【实际上是十年极其混乱糟糕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期间充满了人性的丑恶、不义、争竞、武力、流血、骄傲、自义、自大、等等】，法国政坛终于被一个野心勃勃、心狠手辣的独裁者、拿破仑所掌控；法国因而从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又重新进入了专制主义的时代。

拿破仑在法国的上台，正显明了一个清晰的、无可置疑的事实：——所谓民主制度，其实并非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真理，更不是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万灵药【正是由于法国大革命中的所谓民主政府制度、实际上是喧嚣混乱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才导致了拿破仑的专制政府的上台；法国人以十年大革命的时间谋求民主制度，却无法彼此和平相处，而是彼此纷争不断、好勇斗狠、争风吃醋】【在一个国家社会中，只有当人们心中有敬虔的信仰、有圣洁而诚实的道德品格的时候，所谓民主，即人民的自我治理的政

治组织形式才会取得成功；否则，一个国家社会就一定会在混乱的无政府主义与压制性的专制独裁主义两个极端之间摆来摆去。关于基督教信仰与现代民主主义制度之间的反思，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本书作者所著《论民主》】。

在拿破仑上台之前的十年中，法国许许多多故意忽视或轻看基督教信仰的、所谓人文主义者、文艺复兴者、启蒙主义者、理性主义者们，想要高举起人性光辉的伟大旗帜、人类理性主义万岁的伟大理想。因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很多人积极地想要废除、停止包括天主教在内的基督教信仰活动，废除教堂、教会、等等。但是，法国大革命所导致的十年动乱让很多普通法国人看见，基督教信仰对于一个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关于这一点，即使后来通过武力上台、成为独裁者的拿破仑，在自己晚年、当自己身陷囹圄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

拿破仑上台以后，为了巩固自己在国内的专制独裁、政治统治地位、以及其他原因，悍然发动了针对欧洲诸国的战争行动。在这位军事天才、拿破仑的率领下，法国军队所向披靡，一度攻陷、统治了欧洲的很大部分领土，并于1812年与俄罗斯之间进行了极其惨烈的战争。不过，由于各种复杂原因，法国军队最终失败于滑铁卢战役，1815年败于英、荷、普鲁士联军，从而导致了拿破仑时代的结束。

拿破仑的军事侵略与战争，以及国内的专制统治政权，进一步激发了整个欧洲大陆各国、各民族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为后世的德国体系以及俄罗斯体系等等的兴起、内部统一、壮大，起到了刺激和促进作用。

在十九世纪以前，德国地区还是由一些邦国所组成的松散邦联组织所构成。

十八世纪、十九世纪是德国体系中的思想学术界、尤其是哲学界的“黄金”时期。但是，这个“黄金”时期所结出的，却往往是苦涩的果实。以下是一些著名的德国哲学家（或思想家）及其生卒年代：

康德，1724-1804年

黑格尔，1770-1831年

叔本华，1788-1860年

费尔巴哈，1804-1872年

马克思，1818-1883年

尼采，1844-1900年

在上述著名哲学家中，康德是第一位有所重要建树的思想家。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或许康德最著名的名言就是：——有两样事情，让康德心中产生敬畏，就是浩瀚的星夜，以及人心中的道德律【宇宙的浩大，显明了上帝的全能；道德法则的存在性，显明了那位道德律法颁布者的公义圣洁与大能】。

然而，我们从上述德国哲学家、思想家的思想脉络与演变轨迹中，能够清晰地看见一件无可置疑的事实，那就是，敬畏上帝，是人智慧的开端【否则，人若不敬畏上帝，那么，不论他看起来多么地“聪明”，却仍然是没有真正的智慧】；——如果人离开对于上帝的信仰和敬畏，而是凭着自己的心思意念为根基去认识和思考这个世界，那么，——我们会清晰地看见，这世上的世人不能凭自己的智慧认识神；他们所作的，只是费尽心力地失去了神。从康德、到黑格尔、叔本华、费尔巴哈、马克思，我们看见了一个清晰的思想脉络，即，从对于圣经中所启示之上帝的敬拜和敬虔思考，逐渐地变为自然神主义哲学【即，倾向于认为上帝在创造了这个宇宙世界以后就撒手不管了，而仅仅是凭着自然规律来掌管这个世界】、再变为泛神主义哲学【即，认为上帝是无位格的，或者说，这个宇宙世界本

身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世界本身；上帝仅仅是一种泛化的律则、法则、能量、因果、“道”等等无位格的东西（即上帝不一定能听、能看、能言；例如上帝仅仅是无知无觉的因果律而已）】、直至最后变为无神主义哲学。等到了尼采的年代的时候，他已经绝望地喊出“上帝死了”。

上述德国哲学界的发展，与法国文化中的浪漫主义、人文主义、甚至放荡主义、享受主义的人生哲学，相辅相成，在很多方面、在很大程度上，离开敬虔的基督教信仰越来越远。这些思潮的发展，对于欧洲许多其他国家，包括俄罗斯、东欧、南欧等很多国家的学术界、思想界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与上述德国哲学界发展的同时，更为令人震惊的是，在德国所谓“自由派神学界”中所兴起的所谓“圣经文本批判”以及“高等圣经批判”的、明显背离圣经、亵渎圣经、破坏圣经权威与无误性的，所谓自由派神学的学术研究活动。

以下段落引述自一些基督徒网络上的文字（文字有所编辑以增加可读性和清晰性）：——

+++++

+++++

18世纪的中期至末期，欧美各地掀起了一个很大的浪潮——属灵复兴运动。宣道团体纷纷建立，宣道运动或培灵聚会到处可见。但这时期，仇敌撒但的工作也非常活跃。马有藻写道：“…因上时期理性主义的遗毒，在此时期像‘定时炸弹’般爆发起来；故这时期正统信仰，包括其权威——圣经——亦受极严苛的攻击和批判，在哲学方面、文学方面、科学方面、社会学方面等皆加以白眼、或冷箭、或明枪，使正统信仰在此有时只有招架之力，有时才有还击之能。故史称这时亦是‘批判时期’(Age of Criticism).”抨击与破坏圣经权威的圣经批判学也由此而生。

根据达拉斯神学院博士邵叶尔(M. James Sawyer)，圣经批判学(Biblical Criticism)兴起于德国19世纪中叶至晚期，对更正教信仰“唯独圣经”的根基，以及‘后宗教改革时期’的圣经无误论，进行全面的攻击。经文鉴别学(textual criticism, 另称“低等批判”, lower criticism)的兴起，动摇了许多人对于圣经准确传递和保存的信心。更甚的是，文体批判(literary criticism, 另称“高等批判”, higher criticism)将分析世俗文学的方法应用在圣经之上。由于批判学者存着先入为主的预设，所以他们拒绝任何超自然的可能性。在新约研究方面，德国的包珥(Ferdinand C. Baur, 1792-1860)、施特劳斯(David F. Strauss, 1808-1874; 注：施特劳斯是包珥的学生)等一大批学者著书立说。(引文结束)

+++++

+++++

18、19世纪的这些德国所谓自由派神学家、思想家、圣经批判家们，从一些主观的角度，甚至是空想和臆想性质的角度出发，来对圣经的作者、起源等等进行一些、没有任何实质性根据的、妄加猜测【例如，他们仅仅根据圣经创世纪等书中对于上帝的不同称谓，或是新约圣经中的一些文字用法，就主观臆断地认为其作者是相同的人、不同的人、或是一个人还是多人，等等，虚妄地进行猜测和非议】【这些德国所谓神学家们，其实对于圣经的内容和真义，根本不了解、也根本不真正地明白】。而这些荒谬的说法，在本来的信仰景况就不是很敬虔的德国日耳曼民众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普通德国人都逐渐地、堂而皇之地、振振有词地、自信满满地、放弃了对于圣经的敬虔尊重，放弃了敬虔的基督教信仰。

正是在这样的、一系列的不敬虔、自义、自大、愚妄的精神文化思潮的土壤、背景下，欧洲进入了二十世纪，并很快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

接下来，我们继续介绍一战、二战以前的宏观历史背景。

=====

十九世纪的历史

十九世纪对于很多欧洲人来说，是一个充满了乐观情绪的世纪。英国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都是处于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之下。在这一百年中，英国因着科技与经济贸易等等的大发展，国力继续大幅度增强，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不但如此，英语世界中的各个国家也都取得了极其巨大的发展，对全世界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以下引述维基百科：

维多利亚女王（英语：Queen Victoria；1819年5月24日－1901年1月22

日），全名为亚历山德丽娜·维多利亚（Alexandrina Victoria），1837年6月20日即位为联合王国女王，1876年5月1日即位为印度女皇。

维多利亚是肯特与斯特拉森公爵爱德华亲王之女。爱德华与其父乔治三世皆于1820年去世，维多利亚在母亲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公主维多利亚的严格监督下成长。1837年，因为父亲三个长兄生前都未留下婚生子，年仅18岁的维多利亚继承王位。

1840年，维多利亚女王与表弟萨克森-科堡-哥达的阿尔伯特亲王结婚。他们的女儿因为多场政治婚姻，散布到欧洲王室，开枝散叶，使维多利亚得到了“欧洲祖母”的外号。阿尔伯特在1861年去世后，维多利亚开始了隐居。因此，共和主义暂时得势，但是维多利亚女王于在位后期重新出现在公众场合。维多利亚的登基五十周年、六十周年的大典都相当隆重。

维多利亚在位时间长达63年7个月，是在位第二长的英国君主，也是世界上在位第二长的女性君主，这一时期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这是英国一个工业、文化、政治、科学与军事都得到相当大发展的时期，亦伴随着大英帝国的大幅扩张。维多利亚也是英国汉诺威王朝末代君主，她的长子、继任英王爱德华七世属于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很多中国人所不知道的是，英国中所谓的各种王朝（例如维多利亚的所谓英国汉诺威王朝），其实跟中国的王朝完全不同。在中国历史中，每一个王朝的改朝换代，都一定会伴随着血雨腥风、战争甚至生灵涂炭。但英国王室却实际上是所谓万世一系的。即，现今的英国王室，就是远古时代的英国王室的嫡系后代。只不过，由于英国历史上有许多女王，而这些女王的姓氏又都是随从丈夫，因而导致了在英国历届国王或王后的序列中，会有不同的姓氏变化；而每一个姓氏被称为是一个王朝。这样，所谓英国王室的王朝的变更，仅仅是女王的继位而已，期间基本上都是和平的继承过程，而并没有什么战争、更没有什么生灵涂炭。

整个十九世纪，对于英国历史而言，基本上是一个民主制度不断取得进步、国家不断取得大发展的世纪。但在欧洲大陆，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欧洲的人文主义等思潮，使得很多人更加一步地远离敬虔基督教信仰；另一方面，很多国家在不断地向专制主义、民族自大主义、国家主义的方向前进。在这其中，德国体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谓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是这样历史中的典型。

以下引述维基百科文字：

奥托·爱德华·利奥波德·冯·俾斯麦（德语：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年4月1日－1898年7月30日），俾斯麦-申豪森公爵（Graf von Bismarck-Schönhausen；1865年），俾斯麦亲王（Fürst von Bismarck；1871年），劳恩堡公爵（Herzog zu Lauenburg；1890年）。出生于德意志邦联申豪森，逝世于奥米勒弗里德里希斯鲁。于1867年至1871年出任北德意志邦联宰相。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时成为德意志帝国宰相，直至1890年辞职告终。

作为一名政治人物，他首先为普鲁士地区以容克阶级为主的保守派利益发声，并成为他们的代表，借此拓展自己的名声。随后在保守时代中成为一名外交官。1862年普鲁士宪政危机期间，他被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任命为首相。在与自由派的斗争中，俾斯麦无视议会的存在，在1864年到1866年间连续对丹麦、奥地利开战，让普鲁士为主的小德意志变成德国问题的解答。借由1870年到1871年的普法战争，他促使了德意志帝国成立。

作为宰相，俾斯麦为新生的德意志帝国制定了许多新颖的政策，尤其是其“铁血政策”，更因此被史学家和人们称作“铁血宰相”（德语：Eiserner Kanzler；“铁”指武器，“血”指军人的鲜血，可指战争）。于1862年至1890年（于1873年短暂中断）担任普鲁士首相，为德意志帝国贡献良多。对外

他致力于欧洲的权力平衡。

俾斯麦在1861年掌权后，其国内政策可以粗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与温和派自由主义者结盟，并推行许多政治改革，包括引入民事婚姻等，以此与天主教会相对抗。1870年开始，俾斯麦开始与自由主义者划清界线，转向实施保护政策和经济干预政策，并建立社会保险系统。在1880年代时，更推动社会党人法压制社会主义者。俾斯麦与1888年登基的威廉二世，一直有着诸多不合，使得俾斯麦在1890年被后者解职下台。

1862年9月23日，威廉一世召回俾斯麦，并任命其为首相兼外交大臣。成为首相的俾斯麦在9月26日的下院首次演讲中坚定的对议会发表“铁血演说”：“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派决议所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从此俾斯麦被冠上了“铁血宰相”的绰号。随后国王对俾斯麦说：“我很清楚结局，他们会在歌剧广场朕的窗前砍下你的头，过些时候再砍下朕的头。”而俾斯麦则回应道：“既然迟早要死，为何死得不体面一些？……无论是死在绞架上抑或死在战场上，这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必须抗争到底！”从此，国王和他的首相间形成了十分特别的牢固关系。

在俾斯麦就任首相后，并未能解决与议会的冲突，为此，他便欲以德国统一的大业来转移议员的视线，并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来抗衡资产阶级自由派。很快地，他便开始筹划三场统一战争。

1801: 拿破仑·波拿巴开始入侵莱茵河以东的德意志国家。

1804: 奥地利领导的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弗朗茨一世宣布建立奥地利帝国。

1806: 拿破仑将德意志国家合并为法国附庸国莱茵邦联。

1815: 拿破仑战败后，维也纳会议将日耳曼诸邦国团结为德意志邦联 (Germanic Confederation)，由继承神圣罗马帝国帝位的奥地利帝国领导。

1819: 卡尔斯巴德法令禁止一切形式的泛日耳曼民族的德意志活动以避免“德意志国”的出现；普鲁士王国则同其他邦联国家成立了关税同盟。

1834: 普鲁士领导的关税同盟发展为德意志关税同盟，包括几乎所有德意志国家但不含奥地利。

1848: 骚乱席卷德意志邦联（包括柏林、德累斯顿和法兰克福），迫使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立宪。同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召开，试图宣布德国统一，但腓特烈·威廉四世予以拒绝。关于统一德国应当采取“小德意志方案”（不包括奥地利）或是“大德意志方案”（包括奥地利）的争论浮现出来。

1861: 威廉一世成为普鲁士国王，

1862: 威廉一世任命奥托·冯·俾斯麦为宰相。俾斯麦倾向于通过“铁血政策”建立普鲁士领导的统一德意志。

1864：普鲁士反对丹麦王国吞并石勒苏益格，普丹战争爆发。俾斯麦有意将奥地利帝国拖入这场战争。奥地利-普鲁士的胜利使北部的石勒苏益格归于普鲁士管辖，南部的荷尔斯泰因归于奥地利管辖（《维也纳和约》）。

1866：俾斯麦宣称奥地利在石勒苏益格制造骚乱。普鲁士军队进入荷尔斯泰因，并占领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全部。奥地利对普鲁士宣战，普奥战争（七周战争）爆发。奥地利迅速战败，《布拉格条约》签订，德意志邦联正式解散，普鲁士建立北德意志邦联，包括所有德意志国家，但不包括支持法国的南部国家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

1870：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要求获得莱茵兰地区领土以作为他在普奥战争中保持中立的报偿。俾斯麦利用西班牙王室继承问题及埃姆斯密电（1868年）试图将南部国家并入邦联。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宣战。

1871：普鲁士军队开进法兰西第二帝国首都巴黎，普法战争结束。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在《法兰克福条约》后加入北德意志邦联。俾斯麦拥戴国王威廉一世为统一德意志（德意志国）的领导人。德意志军队驻留在巴黎，拿破仑三世宣布法兰西帝国解体，阿道夫·梯也尔领导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

德意志统一发生于1871年1月18日。拿破仑时代的今德国地区为法国的一个新行省，在经历了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后，普鲁士日益壮大。在法国于普法战争中战败投降之后，德意志诸侯于此日来到法国凡尔赛宫镜厅，普鲁士国王威廉加冕为德意志皇帝，德意志诸国正式在政治上和行政上统一为德意志帝国这一民族国家。事实上在很早之前德语人口即已通

过贵族之间正式与非正式的联盟逐渐联合起来。自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和1804年—1815年拿破仑战争期间民族主义崛起，贵族之间便不断尝试进行联合，但由于各自利益关系不一致，这一联合过程频繁受阻。

日耳曼人民的神圣罗马帝国曾拥有超过500个诸侯国，而在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后，皇帝弗朗茨二世宣布退位（1806年8月6日）放弃了“罗马人皇帝”的封号，改称奥地利帝国皇帝，帝国事实上解体。帝国的解体导致了法律、行政和政治上的混乱，但旧帝国日耳曼语地区的人民仍然保有共同的文化和法律传统，而这一传统也通过参与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共同经历而得到了巩固加强。这些独立国家有各自的统治阶级、封建制度、传统以及地方法律。欧洲自由主义思潮挑战了王朝制度和专制制度下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为统一提供了思想上的基础；这一思想的德意志版本强调了一个地区内的人民传统、教育和语言统一的重要性。经济上，普鲁士于1818年创立关税同盟，并于日后扩张至全日耳曼邦联(Germanic-Confederation)中，减少了各国间的竞争。新的交通运输方式为公务和娱乐提供了便利，在中欧推动了德语使用者之间的联系，但有时也带来一定的冲突。

在拿破仑战争之后，1814-15年的维也纳会议建立了外交上的势力范围体系，支持奥地利在中欧的霸权。然而维也纳的与会者却没有意识到普鲁士在德意志诸国中实力日益增强，因此也没有预料到日后普鲁士将会就德意志的领导权问题向奥地利发起挑战。加上因为奥地利皇帝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且奥地利同为日耳曼民族。普鲁士于是向奥地利这一“德意志二元”问题为统一提出了两个方案：“小德意志方案”，即没有奥地利的德意志；“大德意志方案”，即有奥地利的德意志。

对于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本人是计划将1866年北日耳曼邦联扩大并包含所有日耳曼邦国，从而建立一个统一体，还是仅仅希望扩张普鲁士王国的国际力量，史学界存在争议。史学家认为俾斯麦的“现实政治”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导致了一系列近代政治制度的建立，并推动了19世纪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关系的重组。对丹麦和法国民族主义的回应为德国统一提供了问题的聚焦点。在三场区域战争中的军事胜利（尤其是普鲁士的胜利）推动了统一的热情，增强了民族的自尊。这一经历与拿破仑战争中的共同成功遥相呼应（尤其是1813-14年的解放战争）。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整个十九世纪，欧洲既是处于一个在政治经济很多方面大发展的时代，也是处于一个埋藏了许多危机和政治经济“定时炸弹”的时代。其中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德国的统一以及法国在自由主义、人文主义思潮方面的进一步发展。然而，这两件事情都不是使人更加贴近敬虔的基督教信仰，而是恰恰相反，使人更加远离敬虔的、谦卑真挚的基督教信仰。

在德国，在本来就不是很敬虔真挚的、反而是常常傲慢自大、好勇斗狠的日耳曼民族中间，在国家统一的政治背景下，在战胜法国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进一步提升，并逐渐演变为所谓的爱国主义、国家主义、集体主义。在这些冠冕堂皇的口号与主义之下，人们更进一步地失去寻求公义、寻求信仰的心灵，而是沉浸在属世的政治经济竞争、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而争风吃醋上。人们不再那么关心公义、怜恤、敬虔、信仰，而是追求自义、骄傲之心。

在法国，自由主义、人文主义、启蒙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即，把科学错误地当作成了人生与世界的终极真理；详情请见《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等等进一步发展；许许多多人进一步地远离敬虔的基督教信仰。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法国的很多主要思想人物都不是敬虔的基督徒，而是反对宗教信仰【在他们的眼中看见的所谓宗教信仰，就主要仅是天主教的很多谬误而已；他们往往并不真的明白圣经里面在说些什么，也并不真正地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与主旨是什么】的所谓“自由思想者”。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这些所谓自由思想者，或许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很多浪漫主义文学，但是，他们却既没有带给我们真正的理想、信念、盼望、幸福、信仰，更没有带给我们真正的生命。以下，我们仅仅简述伏尔泰与雨果。

以下引述关于伏尔泰与雨果的相关维基百科文字：

伏尔泰（法语：Voltaire，发音：[vɔl.tɛʁ]，1694年11月21日－1778年5月30日），原名弗朗索瓦-马里·阿鲁埃（法语：François-Marie Arouet，法语发音：[fʁɑ̃.swa ma.ʁi aʁ.wɛ]），法国启蒙时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启蒙运动公认的领袖和导师。被称为“法兰西思想之父”。他不仅在哲学上有卓越成就，也以捍卫公民自由，特别是信仰自由和司法公正而闻名。尽管在他所处的时代审查制度十分严厉，伏尔泰仍然公开支持社会改革。他的论说以讽刺见长，常常抨击天主教教会的教条和当时的法国教育制度。伏尔泰的著作和思想与托马斯·霍布斯及约翰·洛克一道，对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主要思想家都有影响。

对于天主教，伏尔泰把天主教教宗比作“两足禽兽”，传教士是“文明恶棍”，天主教是“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骗人罗网”。他号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与骇人听闻的宗教狂热作斗争，一些人咬住他的耳朵；另一些人踩住他的肚子，还有一些人从远处痛骂他。”

维克多·马里·雨果（法语：Victor Marie Hugo，法语发音：[viktɔʁ maʁi ygo] 聆听，1802年2月26日－1885年5月22日），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和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法国文学史上卓

越的作家。雨果几乎经历了19世纪法国的所有重大事变。一生创作了众多诗歌、小说、剧本、各种散文和文艺评论及政论文章。代表作有《钟楼怪人》、《九三年》、和《悲惨世界》等。在法国，雨果主要以诗集纪念，如《静观集》和《历代传说》。他创作了4000多幅画，积极参与许多社会运动，如废除死刑。

年轻时，雨果倾向保皇主义，但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成为共和主义的积极推动者；他的作品触及时政、社会和艺术潮流。雨果被葬于巴黎先贤祠。他的遗产被各种方式纪念，包括法国钞票上的肖像。

雨果的宗教观点在他一生中改变巨大。年轻时，受母亲影响，他认同自己是天主教徒，承认教会制度和权威。尔后，他成为冷淡教友，越来越多地发表反天主教和反教权主义观点。在流放时，他常常研习唯灵论（他常参加Delphine de Girardin夫人主持的降神会），晚年，他转信伏尔泰的理智主义自然神论。1872年，人口普查询问雨果是否是天主教徒时，他回答：“不是，是自由思想者”。

1872年，雨果还是反感天主教会。他认为天主教对工人阶级的苦难、对王朝压迫无动于衷。另一可能是他对教会禁书十分不满。就天主教会《悲惨世界》的批判，雨果数了740出。当雨果的儿子夏尔和弗朗索瓦-维克多去世时，他坚持墓地不要十架苦像，不叫神甫。在遗嘱中，他也做出同样的要求。

不过，他相信来世，每天早晚都会祷告，在《笑面人》中，他写道：“感恩有翼，飞向正地。祷告比你更加识途”。”

雨果的理智主义可以在《托尔克马达》（1869年，宗教狂热主义），《教皇》（1878年，反教权主义），《宗教和宗教》（1880年，反对教会实用性），以及后世出版的《撒旦末日》和《神》（1886年和1891年，其中他将基督教比喻为狮鹫、理智主义为天使）。文森特·梵高将名言“宗教将会消失，但是上帝仍然存在”归于雨果，其实是儒勒·米什莱所言。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

+++++

+++++

+++++

+++++

+++++

+++++

+++++

+++++

【【【【引述 基督教之大众证据 关于伏尔泰等近现代西方非基督徒思想家们与基督徒们的生命、思想、面对死亡、等等的对比】】】】

基督教之大众证据

原著：DANIEL WILSON

原著出版日期：1829年

=====

II。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思想和意见是自相矛盾的，是前后不一致的。

我们如果稍微仔细观察分析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之人的反对缘由，就会发现他们的意见中包含着许多自相矛盾、混淆、谬误之处。对于许多真实的事实，他们往往有很多深刻的误解。有时，在某些方面，他们承认基督教信仰的正确性、真理性；有时，在另外一方面，他们却又激烈地反对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各种反对基督教信仰的理由，在不同的时代常常变迁，而且互相针锋相对，以至于我们甚至可以什么都不做，就让他们彼此之间驳倒对方好了。从那些臆想性质的各种不同意见中，我们也可以想到，基

基督教信仰真的是真实可信的，是真理；因为在数千年中，在历世历代中，尽管常常有针对基督教信仰的许多逼迫，但是，却从未曾有过什么针对基督教信仰的有效辩驳。

1. 我们如果仔细检查那些不信之人所提出的反对意见，就会看见其中充满多少混淆、误解以及错误的缘由！在他们的反对意见中，没有什么内容是清晰、具体、公平思辨、论据恰当的。这些不信之人的反对意见，无视造物主在宇宙自然中、道德世界中的一般启示，否认历世历代人们的见证，扭曲道德原则的基本根基。他们的反对意见，与其说是出于理性和思考的结果，不如说是人生命中无知与堕落性质的表现。

他们忘记了，基督教信仰的证据是由很多方面的累积性证据所组成的，其中包含了很多种类，各自有独立的信息源，分别从各个角度和层面上阐证了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真理性。不仅它们之中的每一个都能够足以使任何一位谦卑诚实的世人信服于基督教信仰，而且，它们彼此交叉联接在一起，成为一个极其强有力的证据网络。它们合在一起的力量，是那些孤立、支离破碎、零散的反对基督教信仰的意见所无法撼动的。

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往往是基于错误的信息，基于对基督教信仰的误解，或是根本不了解那些基督教信仰的证据。在他们的反对意见中，充

满了许多谬误。

众所周知，在法庭的庭审和辩论过程中，如果有大量的证人、大量的证据、丰富详实的证据网络、交叉印证，那么，法庭的定案就是压倒性的、明确的、结论性的、毋庸置疑的。面对这样丰富的证据、证人网络，那些反对之人所针对其中某一个细枝末节的、空乏的言语争竞，怎么能撼动整个定案的结论呢？对于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而言，即使他们能够否定本书中所阐述的一般证据，那么，本书中关于基督教信仰的另一半证据，也足以使任何一个谦卑诚实的人毫无疑问地相信基督教信仰。或许，如果我们单单强调其中的一个要点——比如，主耶稣基督的完美品格——那么，我们也足以说服一个真诚的求问者，使他相信整个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真理性。

然而，在本书中所讲述的所有证据都是清楚明确、斩钉截铁、毋庸置疑的。没有人能够否定它们。而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之人臆想性的、针对零散细微末节的、孤立的、支离破碎的、没有事实根据的、没有历史证据的反对意见，就像是拍打着根基稳固的磐石的海水浪花一样，丝毫不能撼动那磐石的稳定性。

2. 更进一步说，在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之人的言辞中，他们的偏离真理、虚伪不诚的表现如此明显，以至于他们的反对意见中毫无理性和思考的力

量。他们悍然否认那些证据详实、文献丰富的历史；谬解很多重要的真理与真相；虚构、歪曲或抹煞那些历世历代中辩护基督教信仰之人们的言辞与论证；谬引他们的论述；曲解很多重要的文字；修改很多重要的教会历史学家以及世俗历史学家的文字记述——那些怀疑主义者们的虚伪、欺谎性的文字著作，让每一个诚实、坦率、明白真相的人都感到震惊和厌烦。

难道，这种肆无忌惮的欺谎、歪曲、欺瞒、谬解，就是我们所谓理性时代的表现吗？可是，这就是在法国革命时期所广泛传播的、针对基督教信仰的反对意见的主流内容。请看一看吉本、休谟、伏尔泰（VOLTAIRE）、罗素等人的著作——在那些书籍中，针对基督教信仰的反对意见，都是臆想性的、猜测性的、假设性的、不诚实的，其中所讲到的关于基督教信仰的事情，很少不是歪曲的、误解的或凭空杜撰的。

在法国革命时期所流行的无神主义文化，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其文字著作中的普遍不诚实、欺谎、败坏。他们的几乎每一个出版物中，从光怪陆离的小说，到篇幅巨大的百科辞典，都充满了这样的道德上的不诚实。事实上，谎言与谬解，正是一切恶行的两个翅膀。在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著作书籍中，我不知道有哪一位作者，是基于诚实无欺的事实真相基础，而在进行公平、理性、诚实、前后一致的分析与思考。

3. 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对于基督教信仰的证据事实是部分地接受、部分地反对的，因此造成了许多自相矛盾、前后不一。

那些不信之人所接受的事实本身，其实就足以证明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他们无法否认福音的事实。福音在起初的三百年的传播历史也是无可否认的。圣经新约的朴实无华的记述、诚实无伪的文字是众所周知的。那些不信之人虽然泛泛地想要否认神迹，然而却无法推翻福音书中的基本内容和事实，因而也就实际上等于不得不承认了福音的神迹性。另外，关于整本圣经中的预言，今天的犹太人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圣经旧约的真实性，以及圣经预言的令人震惊的真实。

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真实性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耶稣基督的道德圣洁性，以及他的恩慈与纯洁的高尚品格。

所有的政治家、国家与社会的统治者们，都承认基督教信仰对于人生与社会幸福的重要意义。

吉本自己的著作也不得不承认，基督教信仰传播的过程包含着神迹一般的、令人震惊的事实。

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意见和著作，与其说是辩论，不如说是充满了谬误、误解、无知的喧嚣；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臆想；与其说是平静的思辨，不如说是人身攻击和情绪宣泄；与其说是慎思明辨，不如说是急躁、焦躁、鲁莽的盲目论断。这样的反对意见是不值一驳的。其本身的表现形式，就显明了其中的内容和立场的谬误。

4. 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和著作，没有稳定的内容和基础，而总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立场不断地变化、迁移。

每一个时代的观点和立场，都不一样。今天还在采取的反立场，几年之后就被抛弃了。赫伯特（HERBERT）在十七世纪的反对观点，到了十八世纪就被佩恩给抛弃、拒绝了。霍布斯以及沙夫茨伯里伯爵（SHAFTESBURY）所批判的，现在又被很多人奉为圭臬。很多时候，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士，常常披着各种新教义的虚伪外衣，表面是修正主义，实际上是在歪曲和反对。

相比之下，基督教信仰本身的正统教义，在近两千年中从来没有改变。它的真实性、属神性、权威性、内在卓越性始终如一。今天，人们在辩护基督教信仰的主旨内容与方式，与近两千年前的游士丁和拉克坦提乌斯 LACTANTIUS是一样的。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是始终不变的。圣经从近两千前一直到今天，是始终如一、无可增减的。

综上所述，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思想与意见是充满矛盾的，是没有事实与根据的，是臆想性的。因此，我们根本不当受到它们的搅扰，被它们分心。亲爱的朋友，现在，你在本书这里已经全景式地看到了关于基督教信仰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角度的证据。你看见，这些互相独立、又密切相关的证据中，每一个都足以显明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真理性。你也充分地看见了基督教信仰的内在卓越性。对你来说，那些没有根据的臆想性反对意见是无足轻重、毫无力量的。在你的心思意念中，已经有了良好的信心基础。你的心里得到了平安和安宁，也不会受到那些鼓噪之人的搅扰。你的信心与盼望，就像是灵魂的锚，又稳当又坚固（希伯来书6章19节）。当你面对那些或许使人犹疑的诡辩的时候，你会坚定地回到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来，回到美好的信心中；你会在基督教信仰的美好果实与一切外在与内在的证据网络中，清楚地明白真理在哪里；你会沐浴在自由与平安的阳光里；你会始终如一地坚固信靠上帝的启示、圣经的话语。

=====

2. 接下来让我们对比，不相信基督教信仰的人，与真诚的基督徒在家庭与社会事务上的区别。即，他们不同的道德原则如何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在那些不敬虔之人的生活中，能够看见各种的虚浮与骄傲、自私与情欲、恶意与冤冤相报、躁怒与悖逆、淫荡与不纯洁、背叛与缺乏诚实、不满与反叛、歧视与敌意、鄙陋与不忠诚等等数不胜数的恶劣现象。

我不是在说哪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般性的一整类人。我请读者们去看那些法庭的庭审记录，看我们的官员与掌权者，也请大家去看历史中的人心。

无疑，有一些例外的个别人，比如某些自然神主义者，由于心中的自傲以及对于知识的追逐、文学的野心或是其他的原因，因而生命没有表现出很恶劣的样子。但是，即使在这些人的生命中，他们的道德原则中也充满

了淫荡和情欲、自私与冷漠，等等。

相比之下，谦卑诚实的基督徒生命，与上述情况完全相反。他们的品格是温和的、仁慈良善的、纯洁的、忠诚的、舍己的，而不是喧嚣躁乱的。

在这里，我仅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来说明这种鲜明的对比和趋势。一个反面的典型例子是托马斯佩恩。这里，我不必详述他众所周知的欺谎、作假、残忍、自私、诡诈、自傲、背叛、不敬虔、褻渎、淫荡和奸淫。我也不必去讲述他对自己国家的背叛，对于和平的憎恨，对于法律、秩序、道德、信仰等一切事情的憎恨，等等。我也不必详述他的醉酒、放荡不羁，甚至蔑视那些跟随他自己的人们，等等。

另一个反面的典型例子是法国的伏尔泰。在过去的六十年中，他引领了背离基督教信仰的风潮，吸引、败坏了许许多多跟随他的人。我承认伏尔泰有非凡的才能。他有着很丰富的想象力，能够把很多事情阐述得很有吸引力。他也非常勤奋，从不倦怠。他在文学上很有才干，对大众的观点很有影响力。但是，我想问的是，他的道德与信仰方面的品格是怎样的呢？在他反对基督教信仰的思想与著作中，有多少是出于他真诚的寻求真理的心志呢？才能如果与道德分离的话，就毫无真正的价值。没有道德的才干，往往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根据伏尔泰的传记记载，伏尔泰的一生充斥着各样的不敬虔、虚伪、嘲讽、虚假、背叛、亵渎的事情。当他步入老年的时候，他的对于基督教信仰的反对立场已经根深蒂固。他的不敬虔的态度已经变成了系统性的、侵犯性的。他的世界观中，充满着不可抑制的恶意和怒气。对他来说，任何与信仰作对的事情都是值得支持的。他毫不隐瞒自己攻击基督教信仰的动机。他多次地公开说，我要以一人之力推翻基督教信仰。他的私生活极其混乱，充满了奸淫和淫荡的事情，并且，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丝毫不加隐瞒。那些放荡不羁、黑暗、道德败坏的内容，构成了他作品的一个主要部分。

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真理根本就不重要。他对于基督教信仰的反对，与其说是他思辨的结果，不如说是他鼓噪、讽刺、嘲笑的形式。这样的人对于基督教信仰的反对，与其说是削弱了基督教信仰的说服力，不如说是客观上从反面更加有力地显明了基督教信仰的荣耀和真理性。

与上述两个例子相对，我们可以举出另外一个在欧洲同时期的著名人物，就是现代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波义耳。我们很难讲，波义耳在哪一个方面更加著名，因为他既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又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自然哲学家。

波义耳的贡献是杰出的、有目共睹的。他心思宽阔，判断严谨，著作丰富，道德纯洁，秉性温和，对穷人恩慈良善，待人友好，做事诚实。他从早年起，就对基督教信仰有着坚固稳定的信心。他的一生都在见证着他诚实的信仰。他一生致力于寻求真理，尤其是自然世界中的定律，成为许多人仰慕倾佩的对象。他待人温柔，不重名利，对造物主有着极其崇高的敬意。

从像波义耳这样的人生中，我们能够看见一个人对于真理、真相的谦卑而诚实的执著追求。波义耳的著作包括《关于人的智慧以及对于上帝的最高敬意》以及《基督教信仰使人有真正的智慧》。这正如圣经中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9:10）

所有的真诚基督徒们的人生，虽然或许没有像波义耳那样有名、受万众瞩目，但在内容和实质上却都是一样的。无论在哪里，只要有真诚的基督徒的地方，我们就能够看见良善的父亲、恩慈的母亲、顺服的孩子、信实的家人、可以信赖的政府官员、有良心的公务人员、诚实的政治家、热爱自己国家与臣民的君王。

从基督教信仰刚开始传播的时代开始直到今天，在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这种基督徒们的生命与世人生命之间的鲜明对比，都是有目共睹的。一个没有真诚信仰的人，或许有很多属世的聪明，但心里面却充满了虚伪、败坏、恶意、黑暗；这样的人，不认识真理，也不关心、不在乎真理。他们的这些品行与品性，在他们的人生中、日常生活中会清晰地显明出来。在这样的人所组成的人群、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会充满矛盾、争竞、不道德之事。这种冲突，甚至会激烈得导致整个社会解体。

是的，不敬虔的、没有真诚信仰的人生与人群，本身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他们给这个世界、各个社会、各国家民族，已经带来了罄竹难书的破坏作用。相比之下，基督教信仰不仅使社会更加清洁、人们彼此更加宽容和饶恕，也抑制、削弱了社会中许多矛盾、争竞、冲突的因素。

在一个真诚基督徒的言语行为中，你能够看见和平的纽带、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家庭的温暖，以及上帝放在我们人身上的所有道德职分。是的，基督教信仰是关于真理的宗教信仰；它的教导塑造和改变了那些真诚信仰之人的生命。每一个真诚基督徒的生命，都是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顺服的生命。

II. 在那些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书作之间的比较。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写作出版了许多书籍。从他们的文字中，我们也能够看出他们的心灵光景；可以比较他们的价值观念与世界观、人生观。

在那些非基督徒所写的书籍中，其主要特征是什么呢？他们对于基督教信仰，以及任何其他宗教信仰，都表现出深深的蔑视。然而，他们提出了什么理论体系呢？他们给人的心灵与灵魂带来了什么支柱、慰藉和盼望呢？他们去哪里寻找道德原则的基础呢？他们到哪里为世人寻找幸福呢？他们怎能让人勤奋、谨守、舍己，离弃愚昧、无知、不义、懒惰呢？当世人面临重重人生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他们从哪里给人提供源源不断的人生奋斗的动机和动力呢？他们怎能让人有坚毅忍耐、百折不挠的心志，为了那远大甚至遥远的目标，而奋斗终生呢？

的确，非基督徒的学者、作者、思想家们，建立起了许多理论体系。在社会与人生的事务上，他们也做出了许多影响巨大的努力。但是，他们的理论体系，不过是去除了世人心中的绝对道德原则和标准。他们的努力，不过是给世界带来了无休无止的革命、动乱、无政府主义、对权威的藐视、不满、埋怨、以及家庭与社会中的无数悲剧。他们有很多领袖。但是，他们的领袖的生命品格基本上都是没有高尚道德的、刚愎自用的、充满恶意的、叛逆的。他们的所谓榜样和模范，都是一些虚伪、虚假的人和事；是阿谀奉承、性格弯曲的人；是许多充满野心与苦毒的人生品格。

非基督徒的作品与思想，很少会去涉及那些关乎全人类的利益与福祉的事情。当然，有一些个人从自己的思考出发，在一定范围内，针对一些具体的事情试图做出一些有益影响的事情。但是，他们并没有系统性的、全方位的、稳固的道德原则体系。他们更不会去追寻上帝的荣耀，不会去寻求关乎一切世人生命与灵魂的永恒性的福祉。

有很多非基督徒的学者、思想家、作家，等等；他们很有聪明、才能、勤奋精神、优秀的写作风格。但是，他们的作品所反映出的，是怎样的道德原则与品格特征呢？他们的目标、目的、意义是什么呢？当他们提出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臆想性观点的时候，他们的动机中，有多少成分是出于追求真理的诚实之心呢？他们的道德与信仰的情感是什么呢？他们真的认识基督教信仰、了解基督教信仰的真谛吗？他们是坦诚、诚实、谦卑的，还是欺谎、充满偏见的？他们真的愿意得到真理，并在真理中得到自由吗？

就以我们国家中十七世纪末期那些风起云涌的许多出版物为例。请查考查布、廷德尔TINDAL、霍布斯、伍石顿（WOOLSTON）、博林布鲁克或是柯林斯（COLLINS）等人的著作。再请看一看伏尔泰作品中的主旨和目的内容。请观察狄德罗（DIDEROT）、戴勒姆波特（DALEMBERT）、罗素还有其他一些法国无神论者的书作。再请看一看我们本国的当代一些著名作者的书作，比如休谟、吉本、拜伦、夏普里（SHALLEY）、佩恩、卡莱尔（CARLILE）等人的作品。

他们的书作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自我中心和自大主义。他们都是很有抱负心的人，都有着一股气吞山河的派头。他们的视野很伟岸，志向很宏伟。他们所推崇的，就是他们自己的荣耀，以及世人的荣耀。他们总是轻看谦卑与贞德。

他们追逐的是虚浮的名声、炫耀的外表。他们的原则是败坏的。他们并不真的渴求真理。对于任何忤逆他们喜好的事情，他们都以敌意视之。他们不喜欢别人的批评与指责。

对于基督教信仰，他们心中怀着深深的敌意和仇视。他们的心思意念，激进的做事方式、理念和主义，与基督教信仰的谦卑、温和与平静的特质完全相反。

他们罔顾事实的真相与真理，藐视世上那些庄严的事情。伏尔泰毫不知羞耻地做出许多虚假、背誓之事。为了自私的目的，他发誓赌咒地否认自己所曾经写过的书籍。

他们的心里充满了亵渎。他们藐视上帝，藐视他的旨意和启示。他们不仅罔顾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真理性，而且嘲笑这世上的任何宗教信仰。他们肆无忌惮地亵渎那创造宇宙天地的主宰，那无限全能的上帝。

他们拼命混淆良善与恶意之间的本质区别，试图抹去绝对道德原则和标准中的基本界限与底线。他们嘲笑人生中那些贞德、贞操、美德之事。他们以恶毒的心，去推测别人的善意；以鄙陋的态度，去对待别人的温柔；以荒谬的理由，去谴责别人的慷慨和善行。他们不但自己喜欢罪，也喜欢别人都沉浸在放荡不羁的罪性与生命中。他们高举人性主义，却闭眼不看人生中本质性的罪性与罪行，罔顾人生与社会中因罪而引致的许多悲惨之事。

面对这些非基督徒的书作，我们会毫不奇怪地认识到——怪不得，他们对于基督教信仰有那么深的、非理性的、毫无事实根据的、臆想性的反对意见。他们喜欢的，是放荡不羁的生活，而不是道德的价值与约束。

对于这些非基督徒的书作（不论是出自我们的国家，还是来自欧洲大陆），我们要指出他们三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我们要指出，他们扭曲了很多事实，误引和篡改了许多关于基督教信仰的涵义与教义。无论是休谟，还是吉本，还是伏尔泰，在关于基督教信仰的话题上，他们的书作中都充满了很多谬引和歪曲。他们习惯性地怀疑和扭曲基督教信仰，然后在错误信息的基础上对之加以肆意的嘲讽。

第一，他们的书籍里面误引了很多信息，连很多基本的、关于基督教信仰的事实都没有搞清。他们的态度是不公平的，是充满偏见的，是不诚实、不认真的。

第二，我们要进一步说，他们的书籍里面常常故意地、不为人察觉地，用一些貌似科学的思维方式，来包装他们针对基督教信仰的、肆意的、非理性的、无事实根据的、臆想性的反对意见。他们狡猾地、虚假地、偷偷地发动起一场思想上的争战。他们背叛了真理与诚实的精神。休谟与吉本所写作的书籍，居然在我们的国家中很流行、影响了许多人，这实在是对我们国家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文化的羞辱。

第三，他们的作品所反映出的，是极其不纯洁、放荡的品格特征，正如同古代罗马帝国时期和希腊文化时期所流行的荒淫无耻的罪恶一样。他们的艺术、文学、思想常常就是以性、放荡为主题，反映出他们真实的道德面貌与心灵光景。他们的心思意念，充满了属肉体血气的自傲与情欲。

简而言之，我们想要强调的就是这一点——他们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书作，并不是公平地、认真仔细地、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他们的态度并不是谦卑、诚实的。他们不是敬虔、正直、认真、严肃、诚恳、热忱、心无偏邪、追求真理的人。

相比之下，我们在诚恳的基督徒书作中，看到的则是良善诚挚的内容。那些基督徒作者们的主旨是什么呢？他们向公众宣传的是怎样的理念呢？他们怎样表现出他们“荣神益人”的人生格言呢（即：“归荣耀于上帝、以勤勉的服事有益于世人”）？他们怎样表达他们心中所认识的、那来自于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呢？

请大家通过仔细的考察、比较、阅读，来思考以上问题的答案。是的，我想说，每一个真诚的基督徒，都是欢欣地服事世人的人。他不仅秉持道德与信仰的原则；他不仅在社会与家庭中承担着每人应有的职分和责任；他不仅以热忱仁爱的心，在各项慈善的事情中忙忙碌碌；而且，他在世上一生的目的，就是为了他人的真正益处而努力去做各样的事情。在他的心中，有圣洁的道德原则，有美好的人生意义，有高尚的职分与责任。他不在困难面前退缩，也不因各样阻碍因素而气馁。在他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都是以真正的慈善为中心目的。

请看教会里面的那些牧者、传道人们。在历世历代中，他们的生命光景是怎样的？他们对于现实以及永世之中的世人福祉，有着怎样的热忱？他们的劳苦与不停歇的服事工作，是怎样的？

请思考那些各种各样的基督徒的人生。比如，以那些传道人的生命品格为例。请看斯沃茨、齐根伯格ZEIGENBALD、布莱纳（BRAINERD）、艾略特ELIOT、格里克（GERICKE）、克劳多斯·布坎南（CLAUDIUS BUCHANAN）、马丁（MARTYN），等等。他们默默地辛劳，努力服事，在这世上度过了谦卑、诚实、有益、可贵的一生。

请看基督徒们在各行各业的生命榜样。请看他们怎样在世俗的工作中，彰显出他们信仰的价值与职分。请看他们怎样在各行各业的服事工作中，显出他们属灵的祝福与贞洁的道德品格。

再请看在无数家庭生活中，那些基督徒妇女们谦卑顺服、勤勉服事的生命品行。她们以忍耐谦和的心，见证出她们的真实信仰。与古代社会相比。基督教信仰不仅使她们在社会中、在家庭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而且更使她们的生命得到建立、升华，并有益于家庭、社会乃至整个国家、人类。

基督教信仰给各种各样的人生，都带来了无比的益处。圣经对我们的教导

就是，在这个世上应当爱人如己。

基督徒作者所写的书籍，与非基督徒作者所写的书籍，构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前者的主旨是谦卑；后者的主旨是自大。前者是舍己，自知不配上帝、救主的荣耀；后者是虚浮，喜好声名。前者是仁爱、良善、恩慈、友好、坦诚、信念坚定、没有自私的情感；后者是恶意、藐视与亵渎。前者是诚实、直面事实、敬虔、敬畏上帝；后者是虚假、不敬虔、蔑视。前者清晰地指出美德与恶意之间的区别，指出对与错、正确与谬误之间的区别；而后者则抹煞道德的绝对原则和标准，对错不分。

在这里我想问，为什么——我们在那些基督徒的书作中常常能够看到明显的谦逊纯洁品格，但在那些非基督徒的书作中，却看不见他们口中所自我声称的人文主义光辉美德呢？那些非基督徒作者的道德教义系统究竟在哪里呢？他们的著作，为什么与我们基督徒先辈们的书作，或是那些注释圣经的当代作品，或是书写教会历史的书作，或是那些基督徒道德散文，或是牧者的讲道集，等等其他基督徒书籍，相差如此巨大呢？他们的著作，为什么无法与历史上或当代中那些最著名的基督徒书作相比呢？——比如，塞浦路斯、克里索斯托、奥斯丁、布莱纳、胡克（HOOKER）、朱欧尔（JEWEL）、路德、麦兰顿（MELANCTHON）、帕斯卡、牛顿、皮尔森（PEARSON）主教、巴克斯特（BAXTER）、莱顿（LEIGHTON）主教、霍尔（HALL）主教、多德里奇（DODDRIDGE）等人的伟大书作。

在那些基督徒书作面前，世俗作品、非基督徒书作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在那些伟大的基督徒思想书作面前，非基督徒的思想书作就像是死一般的安静。我找不到一本基督徒书作不谈论道德、真理、纯洁、真诚。我找不到一本非基督徒书作以这些事情为主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不必再深入展开讨论。我想请读者作出诚实的比较，并得出中肯的结论——在那些公共书籍中，基督徒的书作中是否杰出地讲述了属天的信仰、道德的根基、生命的源泉，而非基督徒的书作中是否以虚假、不诚实、自大、叛逆、黑暗为主要内容与风格？

在那些基督徒书籍的作者中，有很多是从前不相信基督教信仰、但后来认识并相信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杰出作者们。他们从前是不认识上帝的人，曾经沉浸在肉体血气的罪中，沉浸在骄傲自大的心态中，但是，当他们真正明白福音的时候，内心就全然翻转过来。他们从前是虚浮、傲慢、鄙陋、放荡的，但是，当他们成为敬虔的基督徒以后，他们的品格就成为了纯洁而高尚的品格。他们公开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忏悔和悔改自己的罪，讲述自己从前的悖逆和谬误。比如，公元四世纪的奥古斯丁就是最著名的例子。从他们的书作中，我们能够看见，基督教信仰是多么宝贵、真实、伟大，而那些针对基督教信仰的反对立场，是多么错误。

=====

III。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死亡，有着什么样的不同。

当面对死亡的时候，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生命，就会显出更加巨大的差别。一面是黑暗，另一面是光明。

不论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或是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在道德原则、言语行为、慈善品格、公共事务、书籍作品等等方面有多么大的差别——当他们趋向死亡的时候，两者之间的对比都更加明显、尤为突出。

一个躺在病榻上、没有信仰的人，会如何面对死亡呢？在这个庄严的时刻，他会怎样看待自己的一生呢？他的良心会怎样对他说话呢？他在扪心自问的时候，会说“我这一生是渴求真理的一生”吗？可叹！死亡的阴云就这样笼罩着、警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一个没有信仰之人的心中，不论他的内心怎样狡辩、怎样为自己寻找借口、怎样在这个世上凭己意随

心所欲地行事，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的良心会见证他自己的罪恶、背叛、悖逆、虚谎。

从那些非基督徒晚年的书作中，从他们将要临死前的文字中，我们能够读到——他们在临死时的懊悔和迷惘；或是自私、顽梗、不顾念别人；或是骄傲、自大；或是轻忽、不严肃；或是对他人怒气冲冲、遗恨不已、心态绝望；或是自暴自弃，自我毁灭。

相比之下，我们在基督徒晚年的书作中，从他们临死前的文字中我们能够看见——他们对于天国的谦卑盼望；他们的平静与坦然；他们回首往事的幸福；他们对于他人的顾念和恩慈。

这些对比，都能够让我们明白，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思想和意见，是出于人心中对于上帝的悖逆，是人生命本质罪性中所泛起的泡沫和渣滓。而真诚的基督徒在死亡面前，则见证了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真理性，见证了基督教信仰的真诚、圣洁；见证了上帝的救恩、道德的管理是何等伟大而奇妙。

1. 请注意，那些非基督徒在病榻前或死亡前的懊悔和迷惘。我看见，BURNET回忆自己早年的放荡生活，并承认，正是那些放荡之事，使自己堕入了骄傲自大、没有信仰的可悲境地。我听见，许多死刑犯为自己没有信仰的生命而痛苦不已。他们当初犯罪，也正是因为没有对于上帝的敬畏。

相比之下，我们曾经看到过哪一个基督徒在死前为自己相信福音而懊悔不已的吗？有哪一个信靠基督救恩的人，在临死前的时候会感到迷惘与羞耻的呢？

2. 还有许多非基督徒，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则是顽梗、刚硬、没心没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心态。我看见那些将死的非基督徒们，即使在死亡之前的最后时刻，考虑的也仍然是世俗之事；他们计算着自己还剩下多少时间，但却一点也不去想那些关乎永恒的事情。他们既不回首往昔，也不为未来祈祷。对于那些关乎上帝的公义和审判的事情，他们完全麻木不仁。他们的心完全是刚硬的；即使从理性的角度，或是从人性的意义而言，他们的这种心态也是荒谬的。

与此完全不同的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临死之前的心态。基督徒把死亡看作是一个路径。他为那将要来到的永生而作准备。他省察、反省自己的内心和生命。他呼求那位救赎他的生命的主。他承认自己在过往所犯下的每一个

罪。他饶恕别人对他所作出的一切伤害。在死亡的威胁面前，他镇静自己的心，准备完成这最后的属灵争战。他信靠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他的恩典。他把自己的儿女和家人交托在那恩慈而大有能力的天父手中。他在和平中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的良心、道德的情感以及宇宙自然和道德世界的一切，都在告诉我说，这个安宁死去的人是对的——而那个没有信仰而死去的人，却必将面临永远的可怕毁灭。

3. 还有的非基督徒在死去的时候，心中仍然是自大而骄傲。而与此相对的，则是基督徒在死去的时候心中满含谦卑。

我看见GIBBON在死去的时候，心里仍然是虚浮的心思意念与算计。就在他临死前的二十个小时内，他还想要再活15年。他在死亡面前一点也不害怕，仍然为自己的生命而自大骄傲。我听见罗素在死前的时候，宣称他拥有造物主的看顾，宣称他的灵魂和他出生的时候一样纯洁。他一点也不为自己的人生而有任何愧疚，更不会为什么事情而忏悔。他以为自己配得上帝的看顾，配来到那位上帝、造物主的面前。

基督徒在死前的时候则完全不是这样。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内心是谦卑的。我看见帕斯卡在辛劳一生、完成了许多基督徒书作以后步入晚年。在患病期间，他的心里满有慈善和忍耐。他如此谦卑，以至于想让一个穷苦患病的人也住到他的病房里面来，得到和他一样的照顾。当他在牧者那里领主圣餐的时候，他说道：“是的，这是我的全人全心所信靠的。”他在死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愿上帝永不离开我。”他以感恩的心，安息在救主的怀中。

4. 还有一种非基督徒，在死前的时候，轻轻乎乎，满不在意。而基督徒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则是庄严肃穆的。让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在这两种态度中，哪一个是对的。

休谟在临死前的阶段，言语中越来越充满轻浮和讽刺的语气。他嘲笑卢奇安，卡隆（CHARON），斯堤克斯（STYX）；他开各种各样轻浮的玩笑；他甚至玩和别人掰手腕的游戏。在最后的阶段，他不断重读自己从前的著作。在病榻上的最后时期，他写作关于自杀的文章；在其中，他以亵渎和不敬虔的口吻，鼓励人们在绝望的心情中去自杀。这就是休谟死去时的光景。这是一幅多么轻浮而夸张的表演场景！这是一种在死亡面前多么满不在乎、没有自省的心态！死亡本是因着人生命本质的罪性而临到这个世界的，本是要把人带到上帝终极的公义审判面前。然而，这样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在死亡面前竟如此毫无愧疚和畏惧！这种心态，即使从上帝在宇宙

自然和道德世界的一般性启示而言，即使从世人良心中所知道的而言，也是明显不对的。

这就是休谟，那个被世人视为极聪明的怀疑主义大师吗？这就是那个以冷血的态度来面对美德的人吗？这就是那个以自己的一生来否定道德终极价值的人吗？无论是《出埃及记》中法老的刚硬内心，还是无神论者、怀疑主义者在死前如此轻浮和无知的心态，都显明了上帝的公义和圣洁，是何等地真实——上帝任凭他们刚硬地死在他们自己的罪恶当中而不能悔改。

胡刻（HOOKER）的死则与休谟完全不同。胡刻的思想与智慧能力，在各个方面都超过休谟很多；但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胡刻的道德与信仰。他在死前最后的话语是：“我活了这一生，看见这世界充满了焦虑与不安。我早已做好准备离开它。我已经得到安慰，并将要与上帝同在。现在，我已经离他越来越近了。虽然我从小就爱他，就敬畏我的主，但是，主啊，若我曾经做错什么，曾经在什么地方得罪你，愿你向我施恩慈怜悯。我不求自己的义，但求你赦免我的不义。愿你的饶恕恩典借着那为我而死的基督临到我。”

5. 还有一种非基督徒，在死前的时候坠入愤怒、绝望的心态里。而相比之下，一个信实基督徒的死亡是喜乐、得胜的。

在PAINE所著的《理性时代》一书的下卷中，他夸口说，有一次他得了重感冒，大家都以为他要死了；但是当时他想到了自己所写的该书的上卷内容，于是安慰大家说：“理性的人，不会觉得死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后来，等到他真的接近死亡的时候，却变得非常气急败坏，怒气冲冲。当他的医生让他忏悔、承认自己一生中的错误言语行为的时候，他断然拒绝了。一个曾经被他引诱通奸的有夫之妇向自己的邻舍哭诉：“我为了这个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庭、朋友、财产和信仰。可是，他现在却告诉我，他教我的那些东西根本没什么用。”

伏尔泰的最后时光是怎样的呢？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光的时候，会表现出极大程度的虚伪与害怕。当伏尔泰意识到自己快要死了的时候，他对人哭诉说：“我不想让我的尸体被丢在臭水沟里。”他又说：“我想有一个天主教的葬礼，并想请求上帝的饶恕，也想请求教会的饶恕。”当死亡临近的时候，恐惧深深地抓住了他。他对朋友不断发怨言。他一会儿卑躬屈膝地向上帝乞求，一会儿又怒气冲冲地咒诅上帝。伏尔泰的那种绝望与虚伪的样子，让旁边的很多人都非常恐惧和难受。

现在，再让我们把眼目转过来，思想那些基督徒的死亡。让我们看一看那些基督徒殉道者怎样面对死。让我们听一听坡旅甲在临死的时候怎样赞美

主。让我们看一看圣布兰蒂纳（BLANDINA）怎样以信心得胜。让我们思想英国宗教改革的先驱里德利和拉蒂默。他们两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彼此鼓励。里德利对拉蒂默说：“弟兄，让我们以一颗良善的心来面对死。上帝会熄灭那火焰，或是使我们有力量持守到底。”然后，他平静地祷告说：“天父啊，我把我感恩的心献给你，因为你呼召我见证你的名，甚至一直到死。主啊，我恳求你，愿你的恩慈临到英格兰。愿你把你的百姓都从罪中拯救出来。”LATIMER也在临死的时候说：“天父啊，愿你接纳我的灵魂。”

基督徒们不仅在殉道的时候能够坦然面对死亡，而且在病榻上即将离世的时候，也会平安地面对死亡。让我们来到病室中，听一听基督徒们在死亡面前的得胜，以及他们在即将进入永生时的喜乐。班德拉罗奇（BAN DE LA ROCHE）的敬虔牧者奥柏林（OBERLIN）作了六十年的牧师。他与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是诚挚的好友；他是穷人的帮助者，是全体教会爱戴的对象，是许多书籍的作者，是幼儿学校的创建者，是主的忠心仆人。他不仅是一个牧者、一个传道人，而且还是一个校长、耕地者、机械工、医生。当他自己的死亡临近时，他在祷告中为教会的每一位成员祈求；他渴望进入那幸福的永生之地，谦卑地倚靠基督的救赎。他在死前最后所说的话语之一是：“主耶稣啊，请尽快带走我！然而，愿你的旨意成就。”他拉着一位年轻牧者的手说：“愿主祝福你，也祝福一切你所亲爱的人！愿主每日都与你同在！”当他最后离世的时候，他手牵着那年轻牧者的双手，举目望天，脸上充满了信心、喜乐与爱的表情。

6. 更进一步，我想指出，在那些非基督徒中间，常会有很多自杀的事情。

然而，基督徒们却会以谦卑和忍耐，面对患难与痛苦。

是的，非基督徒心中的骄傲和虚浮之心常会使他们自暴自弃，使他们在挫折面前常常想要自我了断。他们心中没有圣灵的恩典；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己所编织的谎言。尽管，当他们与基督徒辩论的时候，常会用一般性的敬神畏天的信仰来反驳基督徒们所说的来自于圣经的特殊启示；但是，当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却早已把那些一般性敬神畏天的信仰忘到脑后。非基督徒心中的一切追求、习惯、原则，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都是强调自己的重要性，都是对这事不满、对事那不满、憎恨他人；他们的生命是以肉体血气为基础，充满了骄奢淫逸的情欲，而极其轻看道德的原则和终极价值。

他们平时蔑视他人，而到了自己身经患难的时候，却没有可寻安慰的地方。他们的患难，常常是由于自己的罪性与罪行导致的。当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常常会想到自杀。很多人在工作事业失败的时候，或是生活中遭遇挫折的时候，他们骄傲的心无法承受失败，因此就会轻易地选择自杀。

相比之下，基督徒们有着一颗谦卑和忍耐的心。当身处困难、疾病等等之中的时候，他们能够把自己的生命仰望交托在那位全能者的手中。在那位仁慈、无限智慧的上帝面前，基督徒们能够祈求安慰，并得到真正的平

安。是的，基督徒们不但不会自暴自弃、失去盼望，反而会以完全的信心和倚靠来到上帝的恩典中。他会对上帝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一切事情都按着你的意思，而不是我的意思。”

我不必引述公共的历史记录，也不必引述历世历代众圣徒的生平传记。我只是想让我的读者在现实生活中去看一看那些真诚的基督徒们是怎样面对死亡，是怎样步入晚年、回首一生。

你会看见一位受人尊敬的一家之父，在操劳了一生以后，以忍耐和谦卑，经历疾病的痛苦，来到死亡的门口。你会看见他在上帝面前有一颗温柔安宁的心，有一种稳定、谦和、坚定的心态。你会看见他坚定地倚靠主，信心毫不动摇，完全地顺服于上帝的旨意；他对生命毫无抱怨，对死亡毫无畏惧；他坚定地知道，有那属天的安息在等待着他。他平静祥和地离开这个世界，给自己的儿女们留下了馨香的生命榜样。

你会看见一位年迈的、受人爱戴的慈母。她虽然身体极其虚弱，然而，在经年累月中，她从不停歇地等候盼望主。她常常身处病痛之中，然而，当她身体经受苦难的时候，心灵却沐浴着圣灵的恩典；她的生命彰显出温柔顺服的品质，彰显出道德的芬芳，彰显出对于上帝旨意的完全顺服。当那属灵的争战结束的时候，她将要与那位爱她的主完全合一，她将要永远在

上帝的爱中找到幸福。

你会看见一位妻子，虽然历经多年的病痛，但却仍然是孩子们的可敬母亲，仍然是丈夫的可爱伴侣。她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从未衰残。她的生命彰显出忍耐和坚毅的精神。她对天国的盼望，使得眼前的坟墓变成了一个美好之地。她虽然身体和心灵会感受到疾病所带来的痛苦和哀愁，但是，她灵魂里充满了来自于上帝的极大恩典和慰藉。她总是不停歇地祷告。她常常以正直和恩慈的话语，教导、警诫儿女们。她总是渴想着天国的幸福；那美好的永生盼望，使得眼前的患难根本算不得什么。

你会看见那可爱的儿女，虽然年纪轻轻，却患了重病。然而，你在他年轻的生命里，看见了那伟大信仰的奇妙力量。那信心，就像是他灵魂里面的锚，支撑着他，正如光明照进黑暗里，带来属天的平安与盼望。他虽然还在这个地上，但是却好像已经来到了天上，得享那永生的美好与无以言传的幸福。

上述这些场景，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社会中，发生在千千万万人的生命里。每一个真诚基督徒的家庭里都会有这样的感人故事。这些点点滴滴、虽看似渺小、但却无比伟大的人生故事，都仿佛在向我们诉说基督教信仰是何等伟大、真实、意义重大。

更进一步，我想强调，在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不仅是在此生的生命中以及面临死亡的时候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而且，当他们进入那永恒状态的时候，其差别就更将是如同天壤之别。请您思考，在上述两种人中间，哪一种是最理性地、最智慧地、最有效地为未来做好了充足准备的呢？他们中间，哪一个实现了自己人生的目的，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呢？请您仔细思考、对比他们的人生。请您公正不倚地、没有偏见地考察一下，看他们如何面对死亡；然后请告诉我，他们中间哪一个有可能会得到那永远的生命、永远的幸福呢？

我想，上述问题的答案是不言自明的。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之人的生命，究其本质而言，是没有原则的。他们的言语行为，就好象是毫不在意自己的灵魂一样。他们虽然是人，但却像野兽一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他们完全忽视真正的理性与智慧，无视道德的终极价值。他们在心灵深处离弃那位宇宙天地的造物主。

一个人人生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归向那创造他生命的主；热爱他，服事他，敬拜他，得他的喜悦，荣耀他的名。因而，一个人若不认识、寻求、归向、敬拜那位创造他生命的主，那么，他的生命价值就是丧失的。这样的人，沉浸在肉体血气的情欲中，沉浸在眼目的情欲与今生的骄傲中，却蔑视那些高尚、隽永、属天的事情。这样的人，舍弃那真正的、属天的幸福与平安；对世人既没有博爱，也没有恩慈。他既不把道德当成纯洁、终极价值的事情，也不想要得到上帝的爱。他的眼目看不见永恒。他所思想的尽是这地上的短暂之事。他的心里满了败坏、堕落。他把自己拴在这地上，把自己的心系于那些低俗、可鄙之事。他的生命里满了欺谎与腐败。他在死亡面前毫无安慰。他的良心见证他的罪恶与堕落。他的灵魂里总是得不到满足，总是无比贪婪。他在这个世上的生命、在死亡的面前充满了凄惨和悲哀；更何况，他将要面临上帝的公义审判与地狱的永远刑罚。

而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和死亡却不是如此。他的一生是不完美、充满缺陷的；他曾经经历和面对过许多罪的引诱试探。然而，他的生命中却从未缺少过一个最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和信靠。他人生价值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他的目的和归宿是在哪里。他在这世上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为提升他、炼净他、祝福他。人的灵魂是不朽的，是非物质性的，并将要面临那即将来到的终极审判。基督徒在此生所经历的一切事情，都是为永生而预备好自己，可以承受那永远的国度与快乐。他在心里深深地尊敬上帝，热爱上帝，以上帝为自己的终极审判者、救赎者。这些信念与原则，反映在他每日的生活之中，反映在他一切的言语行为里。他努力地去除己罪、悔改己罪。他的一切追求，他在信仰中的一切职分，他的一切交谈、读书等等，都是为了这件事情。他看重自己的灵魂，远胜过看重自己的身体。他看重未来的美好之事，远胜过看重此生的短暂

欢愉。他渴慕上帝，并在自己的职分中勤勉地服事。基督的恩典、救恩，圣灵的恩膏和影响，使他可以欢欣地盼望那即将到来的永恒天国。他的心中充满了对上帝的爱，充满了对于耶稣基督的挚爱和倚靠盼望。他在各样的事情上，大大地得着能力与力量。无论是什么事情，他都能够在其中得到属灵的幸福。

以上，就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在面对永恒之事时的巨大差别。他们的生命，都是完全地受到他们不同理念的深刻影响。这种不同的影响效果，在他们将死的时候，清晰地、彻底地彰显出来。一个非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越长，就会在这个世界上陷得越深，在死的时候就会越舍不得、越挣扎。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越长，就会越做出美好的生命信仰见证；就会越渴慕那美好的永生国度；死的时候也会越平静安详，满有恩慈。

此世的时光，使一个非基督徒的生命沉陷，使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提升；使一个非基督徒的生命充满忧忧戚戚，使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充满喜乐感恩。在临死的时候，一个非基督徒拼命地、徒劳地想要抓住这个世界；一个基督徒则更加渴盼那美好的目的地，那属天的国度。

还有什么，是比上述不同的鲜明对比更加能够显明，在非基督徒与基督徒

之间哪一个有真理呢？！在他们两者之间，一边是光明，另一边是黑暗！无论一个非基督徒声称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什么，有一点他是根本不确定知的，那就是——死后的生命、未来的世界将会怎样。他可以炫耀自己在这个世上的成就以及荣耀，然而他却永远也不会知道，在那永生的国度、上帝的国度，将会是何等幸福而美丽。他活着的目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满足自己自私的欲望，财富的欲望，肉体的情欲，属世的野心。而在另外一边，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目的，不是为了此世的物质性财富、情欲与骄傲，而是为了那永恒之中的美好。他所盼望的目标，是那更高尚、高贵、纯洁的目标。他的生命中刻着属天、属神的印记。当他面临死亡的时候，永生的盼望使他满有欢欣。

上述对比是清晰、毫不含糊的。我们从那些实际的人生中，从他们的书作中，从他们的死亡中，都能够看见这个清楚的结论。我们在上面考虑的是两类纯粹的例子，即，那些完全离弃上帝的人，以及那些完全信靠上帝的人。从他们的生命与死亡中，我们能够看见清晰的趋势，即，基督教信仰在人生命中的巨大的美好影响。我们越详细地考察他们的人生，越近距离地观察他们如何面对死亡，就越能够看清楚基督教信仰是何等宝贵，其中包含着多么伟大的真理。

我能够看见，一个谦卑基督徒的心中有着何等的喜乐。他随时随地都能够与他的造物主、救赎主交谈、交通；他有着完全的自由，不惧怕痛苦，也不担心环境时事的变迁；他的生命总是日臻完美；圣灵在他生命中结出美好的果子。他总是尽己所能地去行良善之事；在职分的道路上享受上帝同在的美好。相比之下，那些没有信仰之人的生命，是何等可悲、可怜、可鄙。

无疑，那些非基督徒在面对死亡时的悲惨光景本身，就恰恰证明了基督教信仰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多么宝贵；圣经的启示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甜美。

请想一想在每一个时代那些智慧良善的人们，以及那些遥远地区和国家的人们；他们中有很多人都一致地来到圣经的面前，聆听上帝的启示话语。他们中有很多人严肃认真、满有才华、思想深刻、内心公正。他们竭尽全力地想要明白基督教信仰中的真理。他们的圣洁生命、在患难中的忍耐、幸福的死亡（很多是为殉道而死），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他们以自己的

生命见证了他们真诚的信仰。

而在每一个时代、以及那些遥远地区和国家中，也有很多离弃上帝的人。请看他们的秉性、犹疑、习惯、脾气、追求、罪恶的生命、可怕凄凉的死亡。请看他们的人生哲学，常常落入彻底的无神论之中。请看他们的心灵和灵魂，是多么匮乏贫瘠。请看他们的荒淫、讥讽、冷嘲热讽，言语行为之中的玩世不恭。请看他们心中的不纯洁、肉体情欲、骄傲、自大、虚伪、欺骗。请看他们所写的书是多么虚浮、没有真正的智慧，是多么显出他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请看他们的死亡。请把他们的死亡与基督徒的永生比较一下。

请告诉我，在他们中间，哪一个是拥有真理的呢？你觉得他们哪一个会得到上帝的祝福与同在呢？

一个相信圣经的人，与一个反对圣经的人，有着多么不同的人生！一个严肃认真查考和学习圣经，耐心地寻求真理的人，会得到何等的智慧与幸福！他在圣经中将要看见真理。圣经将要使他的生命成为圣洁的样式，使他成为一个有极大价值的人。圣经将要使他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也有平安。在这个风雨飘摇、混乱与黑暗的世界，圣经就仿佛是我们的磐石、指南针。请睁开眼睛，看一看这个世界以及我们人生的真实本来面貌是什

么。请思考本书中所讲述的那所有关于基督教信仰的证据。请以真诚和顺服的心来到上帝的救恩中。请思考我们应当怎样对待死亡。死亡已经临近了。无论一个人多么轻佻、玩世不恭；也无论一个人多么顽梗、刚硬、不思悔改；没有人能够躲避死亡。没有什么语言，能够真正地描述一个人面临死亡时的心境。那些心中没有信仰、没有上帝的人，是多么可悲。他们在此生没有平安，在死亡面前更没有任何盼望。

请记住，你若想在死中与义人联合，就必应当与他们在生中联合。你应当效法他们的生命榜样。你愿意作出怎样的抉择呢？请趁现在还有时间的时候就做出选择。请选择智慧与真理。一个不圣洁、污秽的生命，必定会远离上帝。基督教信仰使人趋向良善与圣洁。我们是否在上帝面前顺服，决定了我们最后会成为哪一类人。

我们本章的重点以及关于基督教信仰的所有内在证据，就是要宣告——那统管宇宙自然和人间道德世界的上帝，将要审判全地的人。人在生命中若没有真诚地归向上帝，人若没有真诚的基督教信仰，人的生命中若没有上帝的印记，那么，人就不能有上帝的赐福，更不能有上帝的同在。上帝喜爱人的美德，憎恶人的罪恶；喜爱人的谦卑，憎恶人的自傲。那背离上帝的人，成为自己的敌人；他的罪，成为了戕害自己的武器。因此，罪人的罪不能证伪上帝，而恰恰相反，正好证明了上帝的全能、圣洁，证明了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真理性。真诚寻求上帝的人是有福的。顽梗背离上帝的人，是不幸福、不智慧的；他的生命中没有终极的道德价值与原则。

一战鸟瞰

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西方世界、欧洲国家很多人处于乐观情绪之中。许多欧洲人在人文主义、自由主义【即，认为人类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而得到“自由”，不需要什么宗教信仰的“束缚”】的思想大潮中，乐观自信地认为明天会更好，人类会不断地自我进步、自我提高。然而，当他们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所看到的，却是经济大萧条，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上，经济大萧条、一战与二战，正是由于人的盲目自信、自义、自私、自利所导致的；正是出于人与人之间的贪婪、不公、傲慢、自大、罪恶。

引述维基百科

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次大战、一战，或称欧战；英语：World War I、WWI、Great War、First World War；法语：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德语：Erster Weltkrieg；俄语：**Перв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是一场于1914年7月28日至1918年11月11日主要发生在欧洲的大战，然而当时的列强殖民地互相牵扯下，战火最终延烧至全球，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被卷入这场战争，史称“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场战争被直接称为世界大战。由于主要战场于欧洲大陆，故此20世纪早期的中文经常称之为“欧战”。

战争过程主要是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的战斗。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及保加利亚属于同盟国阵营。英国、法国、日本、俄罗斯、意大利、美国、塞尔维亚、中国等则属于协约国阵营。战争的导火线是发生于1914年6月28日的萨拉热窝事件，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及其妻子索菲亚被塞尔维亚激进青年普林西普刺杀身亡。战线主要分为东线（俄罗斯对德奥作战）、西线（英法对德作战）和南线（包括塞尔维亚对奥匈、保加利亚作战的巴尔干战线，奥斯曼土耳其对俄国的高加索战线，奥斯曼土耳其对英国的美索不达米亚战线、奥斯曼土耳其对英国、阿拉伯的巴勒斯坦战线等等），其中以西线最为惨烈。这场战争是欧洲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战争之一，约6,500万人参战，约2,000万人受伤，超过1,600万人丧生（约900万士兵和

700万平民），造成严重的人口及经济损失，估计损失约1,700亿美元（当时币值），除美洲与亚洲外，欧洲各国均受到重创，特别是战败国如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等还要面对巨额赔款，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

二战鸟瞰

引述维基百科

第二次世界大战（英语：World War II，简称WWII或WW2；法语：Seconde Guerre mondiale；德语：Zweiter Weltkrieg；俄语：**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日语：第二次世界大戦だいにじせかいたいせん），简称二战；是一次在1939年至1945年所爆发的全球军事冲突，整场战争涉及到全球绝大多数的国家，包括所有的大国，并最终分成两个彼此对立的军事同盟——同盟国和轴心国。这次战争是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动员1亿多名军人参与这次军事冲突。主要的参战国纷纷宣布进入总体战状态，几乎将自身国家的全部经济、工业和科学技术用于战争之上，同时将民用和军用的资源合并以便规划。包括有犹太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肃清大屠杀、卡廷森林屠杀案、马尼拉大屠杀、战争中日军对中国军民进行细菌战、以及最终美国对日本首次使用原子弹等事件，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有纪录以来最多大规模民众死亡的军事冲突，全部将近有6900万人因而死亡，让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了人类历史上死伤人数最多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世界局势，英国、法国等欧洲殖民帝国衰落，美国 and 苏联则取代欧洲殖民帝国的地位成了新的超级大国并在战后形成两强格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

在1931年9月，日本便侵占中国东北，建立傀儡国家满洲国。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更爆发抗日战争。不过大多数人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定为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开始，这次入侵行动即导致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然而德国在入侵波兰后开始尝试在欧洲建立一个帝国，自1939年到1941年为止，发动一连串战争使德国几乎占领欧洲大部分的地区，并和意大利、日本签署三国同盟条约。而保持中立的苏联在和德国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后，也开始侵略，陆续占领或吞并在欧洲边界的6个国家，在这之中也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所占领的波兰领土。英国及英联邦的成员则持续与轴心国作战，并在北非和大西洋海上爆发多次军事冲突，而这也使英国成了欧洲少数仍继续抵抗德军入侵的主要武力之一。1941年6月，欧洲的轴心国决定撕毁和苏联的合作约定，联合入侵苏联，这次攻势也使得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地面行动爆发，也就是巴巴罗萨行动，但在之后让几乎统辖整个欧洲地区的轴心国投入大量军力来维持

作战优势。

到了1941年12月，亚洲轴心国的大日本帝国为了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获得领导地位，发动珍珠港事件，袭击位于太平洋的和落下的英美殖民地，导致美国向轴心国宣战，很快地于西太平洋和东亚战区获得了主导权。但到了1942年时，日本开始在一系列的海战中战败，在中途岛海战损失四艘航空母舰，欧洲的意大利也陆续于北非战役及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败退，这些都使暂时轴心国停下进攻的脚步。1943年时，意大利在西西里岛战役被同盟国部队经其殖民地突尼斯登陆打败投降，推进至意大利南部，国内政变，首相墨索里尼失势，导致分裂成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德军在库尔斯克会战战败后失去对于东线的主动权，同时美国在太平洋战区中获得了一连串的胜利，自此轴心国逐渐失去主导权并开始将布署于各地的前线部队进行撤退。到了1944年时，盟军决定登陆法国诺曼底以开辟第二战场，而苏联除了收复过去被占领的领土外，也开始转往进攻其他轴心国。在苏联部队攻入柏林后，德国元首希特勒自杀，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最终在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的情况下宣告结束。而另一方面美国在1944年和1945年成功击败了日本海军部队并陆续占领数个重要的西太平洋岛屿，这使得日本列岛随时面临同盟国部队入侵的危机。最后在美国分别于广岛市和长崎市投下原子弹并造成大量日本平民死亡。1945年8月8日苏联进攻日本控制下的中国东北地区，8月14日日本跟进宣布愿意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条件，而随着亚洲战事的停息也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1945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胜利宣告结束。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一战中的美国

以下引述美国国务院网站文章“美国的参与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进程”

美国曾一度置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之外。这对竞选连任的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总统在1916年11月大选中的险胜起了一定作用。但在五个月后，威尔逊总统呼吁美国向德意志帝国 (German Empire) 宣战，他说，“为了民主必须让世界安全。……我们不图私利。我们无意征服，无意主宰”。

100年后的今天，美国重温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关键作用；美国的参与使这场造成欧洲生灵涂炭的战争走向结束。

1914年，一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刺杀了奥地利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 (Archduke Franz Ferdinand)，由此触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军队占领了比利时和法国部分地区，期待速战速决，一举获胜。但这场战争变得旷日持久，并且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

美国虽然同情英国、法国及其盟国，但在战争最初几年里保持中立。美国与协约国 (Allies) 国家保持着有力的商业关系，英国海军努力通过保障对海上的控制，阻止德国获取重要物资。德国试图利用潜艇 (U-boats) 突破协约国海军的封锁，并击沉了军舰、商船和客轮，其中包括1915年击沉丘纳德轮船公司 (Cunard) 邮轮“卢西塔尼亚号” (Lusitania)，导致1198名乘客丧生，其中有128名美国人。

促使美国做出参战决定的最后因素，是德国重新展开无限制的潜艇战【即，德国的潜艇无限制地击沉大西洋上的许多美国民用商船、客船、等等】以及被截获的齐默尔曼电报 (Zimmerman Telegram)。

当美国于1917年4月开始参战时，美国陆军 (U. S. Army) 只有13万人，并且没有坦克，飞机也寥寥无几。联邦国会迅速批准了兵役法以扩充兵源。一位德国海军上将曾嘲笑说，有德国潜艇在中途拦截，不会有多少美国作战部队抵达欧洲。

但美国军队成功登陆欧洲。一位美军上校在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 (American Revolution) 的法国侯爵拉法叶 (La Fayette) 位于巴黎的墓前宣告：“拉法

叶，我们来了”。

长远影响

持续三年多的堑壕阵地战使协约国兵力损伤极其惨重。美国在战争的最后一里，尤其是在德国军队发动最后进攻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远征军(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的到来，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巩固了协约国的阵线，严重打击了德军士气。

当时共有400万美国人在军中服役，其中200万被派往欧洲战场，140万在前线作战。他们在第二次马恩河战役(Second Battle of the Marne)中协助挫败了德军的进攻，并参加了康蒂尼镇(Cantigny)、蒂耶里堡(Château-Thierry)、贝劳伍德(Belleau Wood)和圣米耶勒等著名战役。

威尔逊总统的传记作家斯科特·伯格(Scott Berg)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美国：美国人参战纪实》(World War I and America: Told by the Americans Who Lived It)一书中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永远地改变了美国的民族性格。在战争初期向遥远国度提供了人道救援之后，美国基于道义而采取了进一步行动，为和平与自由而举国投入。”

这场战争确定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在国内，战争扩大了政府的规模和权限，在成千上万妇女从军或接替辛苦的工厂岗位后，妇女获得

了选举权。曾在法国英勇作战的非裔美国人(African-American)，回国后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反种族隔离斗争。

终极奉献

截止1918年11月11日的“停战日”(Armistice Day)，共有900万军人和500万平民死亡——不仅是战火，流行病和饥馑也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

虽然美国作出的牺牲不能与其他主要参战国相提并论，但美国的阵亡将士达116516人，其中包括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President Theodore Roosevelt)的小儿子、在法国上空被击落遇难的空军上尉昆廷·罗斯福(Quentin Roosevelt)。

欧洲和美国各地城乡都建有纪念当地阵亡将士的纪念碑。1921年11月11日，沃伦·哈丁(Warren Harding)总统在阿灵顿国家公墓(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为“无名烈士纪念碑”(Tomb of the Unknown Soldier)举行落成典礼，一位远征军步兵的遗体被安葬于此。哈丁总统说，“我们不知道他的家乡在哪里，但我们知道，身为一名为国捐躯的美国人他的荣光永在”。

(引文结束)

二战中的美国

我们在本书前文已经有对此方面的详细记述和引述，就不在此重复。

A 10x20 grid of small circles. The circles are arranged in 10 rows and 20 columns, forming a rectangular pattern. Each circle is small and black, and they are evenly spaced both horizontally and vertically. The grid is composed of 200 circles in total.

.....

.....

.....

.....

.....

.....

.....

美国与二战后的世界秩序

=====

二战后的世界政治秩序

二战以后，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中心的西方自由世界，与以华沙条约组织为中心的苏联共产国际，形成了冷战。在军事力量方面，北约略占优

势；但苏联竭力地研究和制造核弹与导弹，妄想与西方争霸，并在全世界范围内，拼命想要推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暴政模式。苏联在政治统治上实行专制独裁，在内部进行大清洗，大规模抓捕和屠杀各界人士、反对派；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在苏联的铁蹄暴政下失去性命；更多的苏联人民承受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邪恶的马克思主义暴政；思想、言论、生活都被严密控制和封锁。在对外关系上，苏联在全世界范围内到处煽风点火，支持和资助那些实行暴政的马列主义国家；支持和煽动了北越、北韓分别对于南越与南韩的侵略战争；支持和援助了古巴卡斯特罗的专制政权；更在中国内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内战过程中，大力支持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导致中共以暴力战争的形式，夺取了整个中国的政权，并以马列主义暴政奴役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人类历史中文明最悠久的国家之一，直至今日。

在西方自由世界中，主要包括美国以及西欧国家。二战以后，美国以马歇尔计划等大规模经济金融援助措施来大力扶持西欧国家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并在政治制度上广泛而普遍地实行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二战以后，北约国家很快发展为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的引领者，为民主自由政治制度在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奠定了良好基础，起到了优秀的表率与榜样作用。在这期间，西方自由世界内部并非是完美的，而是恰恰相反，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例如，社会道德风气下降、性解放、离婚率大增、许多人愈来愈远离敬虔基督教信仰、嬉皮士文化、毒品泛滥、等等。但是，总体而言，在这些西方自由世界的国家中，精神面貌总的来说是好的、是积极健康向上的；尤其是在美国，仍然是以敬虔的基督徒们占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人们仍然是以敬虔的信仰和勤奋的工作为生活的主要核心内容。正是这样的敬虔信仰与思想面貌，勤奋工作的精神，使得美国等西欧国家带领

全世界人民后来终于赢得了冷战，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地区战胜了专制暴力政权的统治。

第三世界国家主要包括非洲、亚洲、南美洲等国家，以中小国家为主。二战以后，第三世界众多国家也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在二战以前，美国罗斯福与英国丘吉尔签订了大西洋宪章；二战以后，在美国的主导下，世界上成立了联合国并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在大西洋宪章精神的框架下，诸多第三世界国家取得了独立，在联合国中与世界各国一样取得了平等独立的地位。在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中，非洲诸国，尤其是非洲南部诸国，基本上是以基督教信仰为主体；在二战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基本上一直是和平的。在亚洲的东南亚地区，成立了东盟组织；以新加坡为首、在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地区，享受了二战以后的和平时光，在经济上都取得了巨大的飞跃性发展。相对而言，南美洲诸国的政坛不是很平稳，常常会爆发革命与政治动荡，一个政府很容易被人民推翻。不过，总体来说，在这些地方并没有爆发什么战争；人民基本上一直处于和平生活的年代。

=====

二战后的世界经济秩序

二战以后，在以美国为首、包括西欧众多国家、以及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另外也包括南美、中东一些国家等）、主要以实行自由民主政治为主体的国家地区中，广泛地实行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不断地增进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框架下的国家之间经贸合作。在发达国家内部不断推动科技进步、自由世界不断推行自由贸易的大背景下，在美国领导下，世界上绝大多数加入到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的国家，都在二战以后实现了经济上的巨大腾飞。二战以后，以自由世界为代表，整个世界范围的经济发展规划，超过了人类有史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的发展。在东亚和东南亚，日本、以及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所谓亚洲四小龙，都在与美国和西方紧密贸易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腾飞。北欧、西欧、南欧各个国家的经济也都发展迅速。

然而，相比之下，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国家，以及中国、北韩、越南、古巴等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专制暴政的国家中，经济却步履维艰，甚至于一直处于极其贫穷落后的境地。

中共在建政十年以后，就与苏联反目，并基本上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的境地，经济发展极其落后。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毛泽东1976年去世的时候。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夜，中国的人均经济发展水平与台湾、香港、

韩国、日本、新加坡等这些二战以前昔日经济水平大约相当的地区相比，已经落后了十倍以上。

=====

自由世界

所谓二战以后的自由世界是指，以美国为首的，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国防安全框架的，以西欧国家、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为主体的，主要是实行民主自由政治制度的国家集合体。在这些国家中，虽然其政治体制各有不同的具体细节，其文化体系也可能互相有很多不同特点，但是，总体来说，在这些国家中，人民是自由的，即，他们真正地、在很大程度上享有言论、思想、信息、等等的自由。他们的心灵与眼睛不被蒙蔽，言论与思想不被钳制；他们能够自由地阅览各样书籍，并能够相对而言在很大程度上真实地知道关于这个世界整体的、以及各样具体局部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并从中能够看见事情的真实实际、看见事物的真实本质与真理。他们拥有信仰的自由，能够自由地、不被压制和逼迫地，去寻求信仰的真理、人生的真理、世界的真理、道德的真理。他们能够自由地、真诚地、谦卑地、热忱地敬拜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之主。在自由世界的这些文明国家中，大多数国家都是以基督教信仰为其中大多

数人民的信仰内容。

请注意，我们本非是在这里说，自由世界中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文化现象，每一个人就是完全正确的、纯洁无瑕的。恰恰相反，在这些国家中，其实存在着许多内部危机与罪恶，也存在着许多谬误与纷争的事情。但是，自由国家与专制暴政国家的一个最大不同是，至少迄今为止，那些自由国家中的人民能够自由地接触到关于各样事物的信息、并能够以一颗诚实的心从中进行冷静客观比较、从而辨别出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谬误的。而相比之下，在专制国家里面，人民则是一直处于被残暴践踏、压制、蒙蔽、欺骗的状态之中。

=====

北约

以下引述维基百科：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英语：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缩写为NATO；法语：Organisation du Traité de l'Atlantique Nord，缩写为OTAN），简称北约组织或北约 或音译纳托，是欧洲及北美洲国家为实现防卫合作而建立的国际组织。 北约拥有大量核武器和常规部队，是西方的重要军事力量。这是二战后西方阵营军事上实现战略同盟的标志，是马歇尔计划在军事领域的延伸和发展，使美国得以控制以德国和法国为首的欧洲的防务体系，是美国实现超级大国领导地位的标志。 1949年3月18日，美国、英国及法国公开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于同年4月4日在美国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后正式成立。为与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国成员相抗衡。及至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宣告解散，北约成为一个地区性防卫协作组织。北约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北约理事会。理事会由成员国国家元首及政府高层、外长、国防部长组成。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最新成员北马其顿于2020年3月27日加入，至此北约总共有跨域欧洲和北美的30个国家组成。北约军事开支占世界国防开支的70%以上，成员们一致认为，到2024年要达到或维持至少占GDP 2%的国防开支目标。

公约第5条规定成员国受到的攻击一旦被确认，其他成员国将作出即时反应。该条款被理解为各国部队将自动参战，并不再次需要各国政府的参战授权。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欧盟

欧洲联盟（英语：European Union；西班牙语：Unión Europea；法语：Union européenne；德语：Europäische Union），简称欧盟（英语：EU；西班牙语：UE；法语：UE；德语：EU），是欧洲多国共同建立的政治及经济联盟，现拥有27个成员国，正式官方语言有24种。规范欧盟的条约经修订，目前欧盟的运作方式依照《里斯本条约》。政治上所有成员国均为议会民主国家（2008年《经济学人》民主状态调查）；经济上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德国、法国为欧盟两大核心成员国；军事上除瑞典、芬兰、爱尔兰、奥地利、马耳他与塞浦路斯六国以外（其中前五国在国际上为永久中立国），其余21个欧盟成员国均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

欧盟的历史可追溯至1952年建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当时只有六个成员国。1958年又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67年统合在欧洲各共同体之下，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后转变成欧盟，并且渐渐地从贸易实体转变成经济和政治联盟。同时，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后来的欧盟在1973年至2013年期间进行八次扩大，成员国从6个增至最多时有28个。起初推动欧盟建立的动机，是渴望重建二战后损失惨重的欧洲，以及

担忧欧洲会再度陷入战争泥潭。

欧盟的主要机构有欧洲理事会（成员国家首脑组成）、欧盟理事会（成员国家部长组成的欧盟的上议院）、欧盟委员会（欧盟的行政机构）、欧洲议会（欧盟的众议院，唯一的直接民选机构）、欧洲法院、欧洲中央银行等。此外，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也在欧洲共同体的管辖范围之内，但在法律上是独立于欧盟的国际组织。

欧元由27个成员国中的19个采纳为流通货币；《申根条约》取消部分成员国之间的边境管制，目前已有22个欧盟成员国和4个非成员国实施，欧盟公民在各国之间也直接享有工作权，甚至一部分的政治参与。在外交方面，具备欧洲公民权的可申请使用标记欧盟标注的成员国护照，同时也享有所有成员国的领事保护资格。

目前欧盟的主要议题有欧洲联盟扩大、落实《里斯本条约》、全球暖化问题、非欧元区成员国加入欧元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欧洲移民危机等。

2012年10月12日，欧盟获颁诺贝尔和平奖。2020年1月31日，经过多年的谈判，欧盟重要成员英国退出欧洲联盟。（维基百科）

英国退出欧盟的主要原因是，欧盟内部的许多经济政策被大量的非民选官

员把持，许许多多的贸易壁垒妨碍了科技与经济进步，并造成了地区间不平等，缺乏公平正义，有很多根深蒂固的痼疾等。对于这些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内部体系之中的根深蒂固痼疾的情况，我们将要在本书最后一章深入分析和记述。

=====

英国

英国本土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即，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在二战以前，英国的势力在全球范围内极其庞大，一度曾经号称为日不落帝国，因为英国势力范围遍及全球，在任何一个时间，都会是有的地方处于白天、有的地方处于黑夜。二战以后，英国原来的势力范围内的各民族人民逐渐在和平的方式下，取得平等和独立。很多英国原来的领地，成为比较松散的英联邦国家组织的一部分，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等国家。英国的本土是属于岛国的环境，土地面积与人口在世界上的主要国家中其实并不算是大国；因此，二战以后，英国的势力相对于美国而言大大减弱。英国在内政上，逐渐向左翼转向；国家经济特征中，愈来愈具有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后来，撒切尔夫人上台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私有化经济改革，使得英国经济又在一定程度上焕发活力。到今天为止，英国仍然

是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科技研发中心、教育中心、法律中心、等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很多前苏联国家的国民（例如波兰）移民来到英国，在这里工作生活，为英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

东欧

东欧各国包括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捷克、乌克兰、等一系列的、主要是斯拉夫民族体系的国家。在中世纪历史中，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以基督教信仰体系内的东正教【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的教义其实并无本质区别；两者之间主要是在教会体系的管理组织系统上有分歧意见，例如对于罗马天主教的教皇应当怎样看待，等等问题】为主要宗教信仰形式。二战中，由于苏联红军从东线进攻德国纳粹部队，所以，二战胜利以后，苏联红军在东欧各国赖着不走【正如，1900年俄罗斯军队从中国东北向北京进发、与从天津登陆的英法等军队前往北京、解救被清朝军队与义和团围攻的所有驻华使团的时候一样。当时，战事过去以后，其他西方国家的军队全都撤走了，唯有俄罗斯军队一直赖在中国东北不走，长达三年之久；后来，日本军队与俄罗斯在中国东北爆发大战，日本彻底战胜俄国；这又为后来的日本在中国东北扶植势力与投注资金，并进而导致1930年代的中日

矛盾冲突以及后来的中日战争等等，埋下了伏笔】。二战后，苏联共产国际在红军枪炮坦克的挟持下，在东欧各国建立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残暴专政统治。一直到1990年代初期以前，东欧各国人民都生活在愚蠢、邪恶、欺骗的专制主义政府统治之下，经济发展极其落后。1989年，经过了自从1978年的十年改革开放与开明政治以后，中国发生了呼吁进行民主改革的全国性政治抗议示威游行活动。1989年6月4日，北京爆发了举世震惊的、中国野战军在中共中央的指挥下，用枪炮坦克屠杀示威游行人群的丑恶事件。数万人在屠杀中丧命。这些罪恶的画面经由世界各国驻京新闻记者、电视转播镜头，传遍了全世界，也传遍了当时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政策”统治下的苏联以及东欧各国。这些血腥的画面与事件，再次让全世界人民、尤其是苏联人民与东欧人民看清了，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多么邪恶的思想、主义和统治。1990年代初，东欧各国以及苏联爆发了连续性的、大规模的民间游行和抗议。那些国家的政府领导人试图用军队暴力镇压，就像北京天安门屠杀一样。但是，这受到了那些国家军方、政府官僚体系、以及广大人民的普遍抵制。终于，东欧与苏联人民的反抗，导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那些国家的彻底失败与解体。在这些国家中，从1990年代以后，逐渐地、陆续建立起程度不同的民主自由政治体制。

从1990年代以来，东欧各个国家在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民主自由政治制度以后，变得更加开放而自信。很多国家陆续加入了欧盟以及北约组织。但俄罗斯相对而言一直具有强烈的专制特色。在俄罗斯人民心中，民族自大主义盛行；普京总统长期把持国家权力；经济一直是依靠自然资源。总体而言，在发展与进步的道路上，东欧各国以及俄罗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至少，他们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摆脱了专制暴政的统治；人民在很大程度上享有思想与言论等等自由，而不是像北韩、中国、古巴等国那样、直

到今天都继续受到邪恶的蒙蔽与欺骗。

=====

俄罗斯

在整个冷战中，以俄罗斯为首的苏联共产国际中的国家集团一直试图与以美国为领导的西方自由世界争竞。在长达几十年内，战争、甚至是核毁灭的阴影，一直笼罩在欧洲、美国、亚洲、以及世界人民的头上。如果不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军事上一直占据上风，尤其是在核实力上一直占据领先地位，那么，否则的话，苏联很可能就会悍然直接向西方发动战争了。事实上，苏联不仅煽动和支持了北韓侵略南韩、北越侵略南越、古巴革命暴力推翻原有政权、等等，而且，在1970年代初，若没有美国的强力反对、甚至以核打击报复苏联作为威胁【当时美国与中国还没有建交，没有任何外交联系或经贸关系】，那么，苏联几乎马上就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

1990年代初，持续数十年的冷战终于结束了。苏联的残暴统治，不仅给全世界许多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正是在苏联军事力量等等的长期支持下，中共才得以在抗日战争以前没有被国民党政府军队全部剿灭，并在二战以后，在国共内战中胜过国民党政府军队】，而且也给俄罗斯自身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整个苏联统治期间，有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人民、包括各层官员、知识分子、科学家、艺术人员等等社会精英以及普罗大众被清洗、屠杀、放逐。多年的战乱与灾祸，使俄罗斯民族人口不断地负增长，国家实力不断地下降。到冷战末期，俄罗斯的国家力量甚至远远小于美国加州。

苏联解体以后，伴随着议会民主政治制度的改革，俄罗斯经济大规模地进行私有化改革。但是，直到今天，俄罗斯经济体系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腐败、拖沓、不平等之事；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政治统治架构中的威权主义、专制主义文化与习惯，积重难返。如今，俄罗斯的专制主义统治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换汤不换药，走了共产主义，来了普京主义；仍然是同样的欺骗、诡诈、无耻、压制。

=====

二战以后，中国作为英美的同盟国，本来可以享受多年战乱之后的和平年代，甚至在经济发展上融入自由世界、西方文明体系，取得长足的社会进步，并使人民能够得到幸福、明白人生与信仰的真理。但是，仅仅在二战日本投降以后不久，中共军事力量就从陕西奔赴东北，接受那里苏联占领军的军事援助，并以此为立足点，与民国政府军队展开大战，直至1949年把民国政府打到了台湾。如果不是中共建政后在苏联的怂恿下出兵北韩，导致美国等军队继而出兵台湾、保护中华民国政府、防止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在亚洲扩散，那么，否则的话，中共军队也早已在1950年代攻陷台湾。

1949年建政以后，中共跟随苏联，与整个西方断绝外交关系与贸易往来，并且建国仅仅大约十年以后，又与苏联反目，从而使得中国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状态，长达数十年之久。紧接着，中共又在国内发动愚蠢的大跃进等运动，导致数以千万计人口死于饥荒。在接下来的政治斗争中，毛泽东又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把城市里面总共数以亿计的年轻人赶逐到农村乡下，剥夺了整整一代人的、将近十年中的、全中国年轻人上大学、甚至上高中的教育机会。这些经济与人文方面的社会浩劫，在1970年代达到顶点，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1970年代，在巨大政治经济压力以及苏联巨大军事威胁下，中共领导层不得不尝试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交好。尼克松时代，中美领导人正式破冰会晤。1976年，毛泽东去世。1978年，邓小平全面掌握政治权力，中国开始实行经济改革政策。从1978年至今的四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78年的时

候，中国的人均收入、人均居住面积等等，都处于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水平。1978年的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农业、工业、制造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除了一些很个别的落后重型工业以外；1990年代以后，中国国内的一些犬儒文人们，为了想要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好处，极力辩解说，1949至1978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在能源、重工、等方面有很多建树；但是，他们却故意无视、忽视的是，那些能源重工方面的发展，仅仅是自然的简单扩大再生产的经济模式，而几乎没有任何科技进步；并且，那些东西是畸形的、浪费型的经济结构；如果没有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那么，在闭关锁国状态下，即使再过一百年，中国也会和晚清一样，不但远远地落后于外面的世界，而且更对外面的世界与科技进步、人类社会发展一无所知】、金融行业、信息产业、等等。

1978年中国的经济科技水平，其实仅仅是相当于停留在二战以前。当时的上海，由于二战以前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因此，这种状态一直保持到1978年；整个上海的经济产出，几乎一度大约等于全中国的三分之一。只有上海的工厂能够生产一些所谓自行车、机械手表、缝纫机、等“现代化”产品【这些科技其实是在二战以前的上海相关工业行业就有的】。1978年以前的中国，完全没有世界上二战以后所普遍流行的技术革命成果，根本不知道生产诸如电子表、磁带录音机、集成电路芯片、计算机、先进发动机、精工制造仪器、等现代工业产品。

2020年，经过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远超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等国家的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的国家实力。相比之下，俄罗斯整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还不如中国的一个省份的经济规模。

中国在这四十年中的巨大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既取决于中国人民的勤劳、坚忍、聪明、刻苦的精神，也取决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对于中国的帮助，包括大量的科技生产技术的转让，等等。从起先的欧洲援助的海尔电器，到后来的珠三角大规模外资企业进入；从各种先进塑料加工业技术，到电脑手机等大规模电子产品生产线技术；从上海大众汽车生产以及通用汽车工厂，到风起云涌的互联网产业；等等等等；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从西方发达国家中所学到的大量科学技术发明与创造革新。

然而，遗憾的是，中国虽然在过去四十年中学习到了无数先进科技知识，但是，在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却仍然与1949-1978年期间在本质上别无二致。甚至，中国的四十年改革开放运动，从根本上说，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洋务运动中的所谓“同光中兴”【同治、光绪年间的晚清经济水平，因洋务运动而大发展】，并没有什么区别。一方面，这样的“洋务运动”使得中国经济水平产生了腾飞性质的大发展、大跨越、大进步，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体制局面仍然腐朽、落后、腐败、混乱不堪，并最终必将导致——国家社会政治体制的崩解、甚至如二十世纪初的、晚清灭亡前后的、长达数十年的、1900-1930年代、喧嚣混乱的国家政治局面。

究其本质，过去四十年的中国改革开放运动，与一百多年前晚清的洋务运动，在一个根本层面上有共通之处，那就是，两者都在骨子里面信奉所谓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两者都并不真正地尊重西方现代文明体系，而仅仅是想要在物质文明层面上，效法西方，得到一些功利主义的目标而已；——而对于西方政治文明、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等等，不但不感兴趣，更有甚者，由于统治者们的自私、邪恶、无知、短视、谬误，——而对包括民主自由政治制度在内的西方文明体系极其排斥、仇视、污蔑、抹黑、憎恨。

+++++

+++++

+++++

+++++

+++++

+++++

+++++

+++++

+++++

【引述 《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下）》 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的想法与误解的原因】

=====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另一方面，大批的、主流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虽然屈服于以严复为代表的、大批中国留学生们【这些中国留洋学生，以及受到他们影响的、新学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大中城市里院校的毕业生们，包括了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毛泽东、江泽民、胡锦涛、等等无数从事政治、干革命、深深改变了中国近现代史的政治家们、军事家们】从西方所引进介绍的斗争哲学、进化论思想、等等“现代人类科学文明与先进思想”；——但是，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他们却从未放弃过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八个字出自晚清洋务运动时期。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内容：—— 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提出，“中学为体”，是强调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西

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 、武备 、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以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百度百科）

在过去的一百八十多年中，在大批的、主流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家国梦想中，其实在道德意义上，他们从未真正重视、了解和尊敬过西方文明。

之所以如此，有许多众所周知的、但却非常复杂的深刻原因。在这些原因中，往往好坏参杂；有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值得肯定；有的则有深刻的错误，需要清楚地指出。

中国自身文化的生命力

第一，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有深刻思想传承的、以儒释道为主体的、复杂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的思想文明体系。

中国的历史与欧洲的历史非常不同。中国是一个有着强烈中央集权色彩的国家，是一个坚定而稳固的思想文明政治体系。欧洲则是一个不断分分合合、吵吵闹闹的众多小国所组成的大家庭。中国历史上称外国人为“夷人”，正如古罗马帝国称北方民族为“蛮族”一样。在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后，直到近现代以前，其实就没有真正的、平等的外交政治，因为中国的那些邻国、外国，在政治经济影响上，在人民文明与富裕程度上，都是中国人眼中所谓的蕞尔小国。自古以来，华夏汉族自视为中央帝国，而外族都是前来朝拜、万国来朝的、偏远地区的、尚未完全开化的百姓而已。

中国有着光辉的思想文字历史，有着像《论语》《老子》《周易》《诗经》那样古老的、深邃的、明哲的人生哲学思考与历史文化遗产。这些古代文字所代表的深刻思想，所表达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孝敬、忠诚、诚实、顺服、忍耐、坚韧等等精神，对于社会、家国、人间道德社会的纲常秩序等等，有着极其重要的、显然的、无可置疑的重大意义。这些古代文字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对于人生思考的重要助益，在人类历史上，绝不亚于古希腊罗马的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西塞罗、托勒密等哲学家的思想，甚至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或许，它们的重要意义、深远价值、重大教益，就人类整体历史而言，仅仅次于圣经本身。

中文是一种表意文字，而不是像西方文字那样是字母拼写文字。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境内，虽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绵延辗转数千里，虽然有许许多多的方言，甚至每一个省份、每一个县市、隔着大山的不同村落，都有自己的口音方言，但是，却“书同文、车同轨”。相比之下，西方的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等，由于都是以字母拼写为形式，因此逐渐地，各自发展成为独立、平等的语言、邦国、文化体系。

中文的表意文字，相比于西方的拼写文字，虽然对于孩童来说更加艰深难学，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导致高文盲率，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导致文字出版和印刷自动化更加困难复杂，但是，却是一个重要的、意义重大的文化和政治纽带。这个纽带使得整个大中华主义成为一种不可分割的、不可断开的思想文化整体，成为一个有机的、生命力极强的文化传承体系。

力量与真理

第二，虽然，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中，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曾经有过大量的碰撞、摩擦、互动过程，以至于今天的中国早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革命与变化；但是，其实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从未进行过真理层面的、坦诚的、直接的冲突与对话。

虽然，中国在近现代史中，曾经多次是西方军事的手下败将，甚至曾经是西方文明的“学生”、日本的手下败将，但是，恰恰因此，那些复杂的中国近现代政治军事历史，没有导致中国人在道德意义上尊敬、重视西方文明，反而是，更加极大程度地增强了中国知识分子们、乃至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忧国忧民、同仇敌忾的心志。

历史上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中日之战、以及一系列的被迫开放国门的条约，甚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中国的八年抗日战争，等等复杂的近现代历史，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内心伤痛、满怀屈辱。

这些复杂的、许多因素缠绕其中的、饱受屈辱的近现代中国历史，一方面

让中国人对于当年的清朝政府、民国政府、腐败官员、糊涂政治决策等等痛恨得咬牙切齿，另一方面更让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以及深受西方文明影响、明治维新之后“以西方为师”的日本，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态。

今天，在普通中国人心中，尤其是在那些见识过外面世界、内心诚实而开放的普通中国人心中，人们对于西方文明的复杂心态，包含着互相矛盾的、很难调和的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人们认识到，西方文明思想体系是璀璨的、是博大精深的，是对全人类有重大贡献与巨大影响的，是文明的。看起来，西方文明中包含着很多好的“哲学”，很多好的思想、内容、政治体制、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科学、等等。因此，许多功成名就的家庭都梦想着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常青藤大学去留学、接受深造，等等。

第二个方面是，人们不可能忘记那些屈辱的近代历史，不可能忘记那些窝囊的战役、羞辱的条款，更不可能忘记，中国的大门正是被洋人的枪炮所打开的。换言之，在许多中国人心中，从道德意义层面而言，中国文明从未曾真正地被西方文明打败过。那曾经打败中国的，仅仅是枪炮与科技而已。这正如，在五胡乱华的时代，或是华夏文明败于蒙古成吉思汗、忽必烈，以及败于满清八旗军队的时代，那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并非是因为蛮

夷人有更高的文明、有更温良恭谦让的仁爱，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更加野蛮而已。

虽然，在现代中国人的文化氛围里，人们常常在表面上推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但是，每一个中国人在良心深处中都知道，其实，强权、力量、武力，绝不简单地等于真理。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里，都认为，中国文明在近现代历史中从未曾被真理打败过，而仅仅是被强权、力量、武力打败过。这样的历史，既绝不能够说明中国文明不好，也绝不能够说明西方文明好。恰恰相反，对于许多重视民族主义、有强烈家国梦想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正说明了中国文明好，西方文明不好。

在这里，我们不必去分析所谓鸦片战争的复杂来龙去脉，也不必去探讨八国联军侵华的起源，而仅仅是在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可的历史文化层面上，探索为什么中国人至今对西方怀有敌意或蔑视，以及，这样的心态正确在何处，错误在何处。让我们接下来继续分析。

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第三，当面对西方文明的时候，当思考如何吸收西方先进科技与文明体制的时候，中国人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普通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思想家们，却从未认真地想到过、反思过、辩论过，在西方思想文明体系中，究竟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以及为什么。更进一步说，甚至，中国人很少去认真思想，所谓西方思想文明体系，到底是什么。

中国人常常大而化之地以为，所谓西方文明的精华，就是那些器物层面的，科学技术发明等等。一些内心开放的中国人，还会把民主自由、宪政、法律、经济等等方面的内容，也看作是西方文明的精华。但一般而言，这就仅此而已了。

而关于西方文明的糟粕，中国人则常常误以为是，自由散漫、贪生怕死、贪图享受、个人主义、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吃苦，或者从更深层意义说，也包括西方历史上曾经有的宗教专制、封建愚昧等等。在这方面，很多现代中国年轻人追随、仰慕西方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个人解放，甚至性

解放、性自由等等。

简言之，中国人很少去深刻地、公道地、客观地研究，西方文明究竟是什么，其中的内在机理是什么，主要构成要素是什么，等等。甚至，中国人大多数虽然都听说过、知道，基督教信仰对于西方文明的核心意义，但是，却对基督教信仰的内容了解极少、乃至不知所云。

这固然由于，西方文明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动态有机体，而绝非是一个单纯的、静态的、内容一致的铁板一块；但也是因为，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历史的局限、现实政治环境、思想环境的局限性等等原因，从而导致了，那种对于西方文明的全面认知，还没有、或很少在中国出现。这样的隔阂状态，不仅是在中国大陆如此，即使在资讯自由流通的香港和台湾，也往往是如此。例如，我们从现代著名文化人南怀瑾的著作中，就能够看出，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文化人对于西方的了解和认知，仍然有着很多主观臆断；这些主观臆想，与实际的西方现状、文明状况等等，有着很大差异。

中国古代文明看起来并没有什么错

第四，在过去一百八十年中，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互动、来往等等过程中，中国人其实并不真的觉得，中国古代文明有什么错。

当清朝灭亡以后，很快就爆发了五四文化运动。五四文化运动直接催生了现代中国白话文书面语言的正式诞生与系统性普及。五四运动期间，一个重要的主旨就是，要砸烂孔家店，反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精髓，反对以孔子论语为核心代表的儒家思想。清末民初，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强烈的反孔的情绪，是因为人们实在痛恨和反感清朝末年的官吏腐败、政治专制、政策愚蠢的局面。人们常常把这些专制弊端归因于孔子的儒家思想。

但是，这种反孔子、反传统的情绪是肤浅的、也是短暂的；很快，到了1920年代以后，社会上就重新兴起了对于曾国藩等传统儒士著作以及整个儒释道中华思想传统的重视。从根本上说，很多中国人并不觉得，在近现代史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冲突，是由于中国古代文明传统的系统性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事实也的确如此。

人们在切身生活感受上，仍然感受到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性。即使是那些把儿女送到海外留学的父母们，也不希望儿女因抛弃了传统价值，而失去了顺服、听话、孝敬、尊老爱幼等等品德。

人们在国家凝聚力上，仍然深刻地、警惕地认识到，传统文化价值体系、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等的重要性。

在近现代历史上，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文明而言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这也让中国知识分子们更加迫切地感到应当加强和强调传统价值思想体系的重要性。因此，他们不愿意在西方文明面前，抱以重视和尊敬的态度；反而是，有意无意地贬低西方文明的重要地位，而特别地强调中国传统文明价值的伟大意义。

凭什么因为需要尊敬别人的技术、需要学习那些技术，所以就要尊敬和学

习别人的思想体系呢？

第五，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中，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中国需要认真、勤奋、扎实、痛下决心地尊敬和学习别人的科学技术。这一点，很少有中国人会怀疑。但是，很不显然的却是，凭什么因为要尊敬别人的技术，所以就也要尊敬别人的思想体系呢？

这正如，汉人在历史上曾经要学习胡人的骑马射箭技术，但是，汉人却从来没有必要学习胡人的什么思想体系。事实上，华夏民族的思想体系，论语的仁义礼智信，道德经的深邃，要远远地胜过胡人的思想文化传统。

换言之，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技术与思想体系之间，并不一定有什么必然联系。学习和效法先进的技术，绝不等于要学习和效法别人的思想体系。这对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常识来说，都显然是正确的思路。正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很深刻，至今在中国人心中仍然刻下深深的烙印；——尽管，我们今天或许很少直接用这八个字来表达我们对待西方时的想法与政策方针。

对于一个普通正常人的思维方式来说，显然，技术与科学是一回事，文化哲学思想体系则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两件事之间并不一定非得有必然的联系不可。不但如此，事实上，在人类的历史上，常常是那些不文明、野蛮的民族和国家，才往往长于技术，尤其是那些杀人放火的军事技术；而那些文明程度更高的民族和国家，则看起来，往往是和平的、是与世无争的；——至少，在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的眼中，就常常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虽然，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中，中国知识分子们看到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因此都认识到、都同意，需要认真而勤奋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这绝不等于说，主流中国知识分子们就因此而重视和尊敬西方文明，——尤其是关乎道德意义上的文明而言。

凭什么一定要服气

第六，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的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中国虽然经历了许多失败、羞辱、挫折、失落，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来说，我们凭什么就要因此而在心灵里投降、就要因此而在西方文明面前俯身膜拜、就要因此而服气呢？

难道，中国人的心灵与精神中，没有坚强的脊梁吗？我们岂能有奶就是娘呢？我们固然可以接受和学习别人先进的技术、科学、甚至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管理经验等等，但是，难道我们接受西方，就等于要摒弃文明老祖宗的光辉而璀璨的文明礼制、思想传统吗？

如果说，当面对西方的时候，我们不但不应当摒弃我们自己的文明思想体系传统，反而应当更加坚持和发扬那些古老的文明与悠久的历史、品德、信仰；——那么，这难道不就正意味着：——我们不应当在西方文明面前卑躬屈膝，也不需要道德意义上重视他们、尊敬他们。

技术体系与思想体系的根源关系

第七，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的近现代中国历史中，虽然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们都认识到科学技术的深远而伟大的意义，但是，却很少有人认识到、也很少有人同意、甚至很少有人会想到有这种可能性，即：——那些科学技术与西方思想体系本身之间有着什么深刻的根源性关系。

人们常常说的一句话是：“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因此，若有人说，在科学与西方文明思想体系之间，甚至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性的、根源性的关系，那么，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匪夷所思、令人难以同意的说法。

所以，当人们说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类的、对待西方文明体系所应当采取的策略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们往往会点头称是。但是，当听说“现代科学的开启与爆炸性发展，与西方思想文明体系，尤其是与基督教信仰之间，有着深刻的本源性关系”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们往往会立刻声色俱厉地反驳说道：——中国古代也曾经有非常璀璨的科学技术历史，并且，在西方历史上，宗教信仰正是压制科学技术诞生的重大阻碍因素。

不卑不亢，亦或是应当俯视还是仰视？

第八，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们在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上，常常是有两种极端态度，而很少有中肯的、平衡的、不卑不亢、实事求是的、公道公平的态度。这两种极端态度分别是，主流的、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往往对西方文明抱着俯视的态度；而少部分中国人则抱着崇洋媚外、甚至试图要全盘西化的态度。

一般而言，那些越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思想体系熟悉并深感骄傲的人们，就越会以鄙视的态度、俯视的心态，去面对西方文明，甚至根本不愿意静下心来去了解一下，所谓西方文明，到底是什么。

反之，那些越是想要崇拜武力、喜欢时髦、看重力量、喜好外在物质的人们，则就越会以仰视的心态，去看待西方文明，而把自己的中华文化看得

一无是处。

上述两种立场，其实都不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明哲的心态。他们两者，也其实并不真的懂得，所谓西方文明，到底是在说什么。

直至今日，许多中国人都肤浅地把所谓西方文明看作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骑士精神、资本主义、个体主义、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百花齐放、自由烂漫等等的代名词。很多人喜欢西方的那些故作高深的哲学，还有的人喜欢西方的竞争与创新，更多的人则仅仅是把西方看作是物质经济发展比较发达的地区而已。

至于圣经、基督教信仰，很多中国人或是对此完全无视、忽视，或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既没有兴趣、也没有信息资源去了解，基督教信仰的内涵、外延、历史，与欧洲国家历史的演化有着什么深刻而内在的关系。还有的人，则简单地把基督教信仰与西方文明划上等号，大而化之地把西方文明体系看为是铁板一块，大而化之地用中国人在传统文化体系中所熟悉的那种念经敲木鱼的宗教观念，去看待和揣摩基督教信仰，甚至鄙夷地把基督教信仰看作仅仅是洋教而已，等等。

涉及到现实民主政治与权力斗争

第九，在过去大约一百八十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们不重视、不尊重、不了解西方文明体系内涵的另一个非常重要而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在漫长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在经历着自古以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局。动荡的政治现实与权力斗争，阻碍了知识分子们深刻思考历史、反思文明的客观环境条件。

过去的一百八十年的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满清政府、民国政府、以及中共政府。在专制政权的环境下，政治宣传的目的往往是为了维护本政权的生存与稳定性，为此，许多政治宣传内容就是有意识地进行反西方的信息灌输。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政治宣传对人思想的毒害影响至深，使人无法认识到历史、事实与世界的真相。

麦子与稗子

第十，在西方世界内部，存在着复杂的、好坏参杂的情况。

马太福音

13:24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

13:25 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

13:26 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

13:27 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阿，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

13:28 主人说，这是仇敌作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

13:29 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

13:30 容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惟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13:36 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

13:37 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

13:38 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13:39 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13:40 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13:41 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

13:42 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13:43 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

+++++

+++++

+++++

+++++

【【【引述 《从金刚经说起》中的内容 西方文明与基督教信仰之间不能划等号】】】

虽然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思想与文明体系影响如此广泛，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文化思想与文明体系简单地当成了基督教信仰本身，或者，如果我们简单地仅仅把西方文明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划等号，那么，我们就犯下了严重的、望文生义、不认真负责、偏离事实的错误。

事实上，我们只要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近三百年来，虽然有很多好的事情，比如现代科技革命的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民主自由制度、法治、自由经济、平等贸易、社会大分工协作、医疗、教育等等，还有无数的、具体的科学技术发明，都是来自西方；但是，也有很多坏的事情，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神论主义、进化论哲学、性解放、放荡主义、离婚泛

滥、家庭破碎、甚至同性恋等等，也都是来自西方。

显然，如果我们刨根问底、认真查考、追本溯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明白，西方世界绝不是铁板一块，西方人也绝非全都是纯洁无辜的、敬虔谦卑的信徒。

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化的优异成分；看不到西方文明给人类所作出的、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看不到现代人要在何等广泛而深刻的程度上，感谢——培根、波义耳、牛顿、等等无数科学家、哲学家，以及源自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现代医院体系、现代教育体系、现代经济法律制度等等；看不到在西方的无数的、大批的、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们，在科学、文化、政治、法律、医疗、教育、服务、信仰领域，为社会、为人类所作出的可歌可泣的杰出贡献；看不到在西方各国那么多、数量巨大的信仰敬虔、谦卑诚实、热忱真挚、敬老爱幼、爱人如己、勤奋工作、热心服务于大众和全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真诚基督徒们；——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没有良知、没有诚实态度的人。

另一方面，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明中的错误、缺憾、谬误成分，比如，在诸如法国为首的、遍及西方各国的、打着人文主义旗号、放荡不羁的淫乱主义、性解放主义；在诸如德国为首的、遍及许多国家的民族自大主义、好战主义；在诸如俄国为典型代表的信仰虚伪主义、专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起源于英国等国学术领域的达尔文进化主义，和盛行于德国的唯物主义、泛神主义、自然神主义、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不是

仔细思考与观察、真诚寻求真理的人，而仅仅是盲目崇拜西方的武力与物质繁荣，而在心中没有正义、没有饥渴慕义之心的人。

事实上，即使我们撇开这些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历史、哲学史等历史领域的角度不谈，单单从宗教信仰、基督教教会的历史与现状来看，西方文明体系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甚至分裂的、内部景况；——这也从侧面再次证明了，西方文明体系绝非简单地、直接地等于基督教信仰本身。

基督教会的简史

在基督教信仰的传播与教会历史中，在大约公元15世纪以前，基督教会一直分为东西两大部分。

天主教与东正教的由来

东方教会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是从大约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归依基督教信仰以后，把罗马帝国从罗马迁都至当时的拜占庭市开始的。拜占庭市位于欧洲与亚洲陆路交通的重要枢纽节点。它后来被改名为君士坦丁堡。这个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以基督教信仰为国教的帝国，被后世的历史学家称为拜占庭帝国；她从公元四世纪一直延续到公元十五世纪，存在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没有改朝

换代的重要国度之一。公元八世纪左右，这个以希腊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基督教国家，开始不断地把信仰传播到后来称为俄罗斯等、以斯拉夫民族为主体的各个国家。俄罗斯这些国家曾经在很长时期一直处于农奴制度状态（俄罗斯的农奴制度一直到后来十七世纪彼得大帝改革、效法西方工业革命等等的时候，才开始被完全消除）；然而从公元八世纪开始，基督教信仰已经逐渐把社会文明和人道关怀制度带给俄罗斯等的广袤土地。

西方教会以罗马为中心，在君士坦丁大帝迁都君士坦丁堡以后，延续和保持了从公元一世纪下半叶（注：耶稣基督于大约公元元年左右降生，于公元三十三年左右被钉十字架）、使徒彼得时代以后建立的教宗制度。在从公元四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的上千年历史中，以罗马教宗制度为核心、以拉丁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西方众教会，与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以拜占庭帝王为政权中心、以希腊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东方众教会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在公元一千年以前，东西方教会基本上是兄弟般的关系。他们——都以圣经新旧约全书为共同的信仰根基与中心教义的基础；都相信和承认，圣经、也只有圣经，是上帝的全备话语、是上帝亲自的、超自然的启示与默示；都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都信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

但是，在公元一千年之前，在东西方教会之间，也一直存在着既合作、又有纷争的状态。两者在各自教会权威、教义细节等方面都有很多争议、互相对对方不服气。这种状态持续到公元一千年，终于矛盾完全爆发，互相之间彻底决裂，互相否认对方的信仰合法性。

中世纪

公元十五世纪，君士坦丁堡被后来称为土耳其人的突厥民族攻陷。君士坦丁堡为改名为伊斯坦布尔；这个名字是源于突厥人的伊斯兰信仰。从此，拜占庭帝国正式覆灭。然而，东方教会，此时已经自称为东正教，逐渐开始向莫斯科方向迁移、直至后来以莫斯科为其中心，继续与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天主教会体系分庭抗礼。大约在同时，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体系（自称为天主教系统），于公元十五世纪开始了被后世称为文艺复兴的一种近现代文化革命运动。

值得指出的是，从大约公元四、五世纪至十五、十六世纪的一千年，被后世称为的所谓“中世纪”，其实并非人们所常常误以为的、专制主义压迫的黑暗时代。事实上，任何诚实的历史学家都会承认，尽管在这期间发生了几次针对中东的十字军东征、回击伊斯兰的进攻和劫掠，但是，总体而言，在这大约一千年的漫长历史年代中，整个欧洲，包括西方教会影响下的西欧，和东方教会影响下的东欧，在政治与军事上，基本上是处于和平时期，几乎很少有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很少有兵荒马乱、生灵涂炭、改朝换代的时期。在许多乡间、市镇、经贸中心，人民安居乐业，许多地方治安良好、常常夜不闭户。

在中世纪的长达一千年中，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教会与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各有特色、短长、优缺点。

东方教会所处的拜占庭帝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帝王及其家族笃信基督教信仰。东方教会分成各个教区，众教区的各级牧者、长老等等围绕着拜占庭帝王，彼此和谐，处于互相和平、长达几乎一千年的安稳状态中。事实上，拜占庭帝国这个名称，是后世的历史学家给起的；当时的人们从未曾这样称呼。他们这个国家，一直自称为“基督之国”、或“东罗马帝国”。

而在西方教会，随着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时代在公元四世纪、公元五世纪的解体与破败，罗马教宗体系饱经风霜、生死存亡、无数的患难、危机。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一本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著名的基督教圣徒、奥古斯丁，以及他的《上帝之城》。这本书讲述了，根据圣经、耶稣基督的教导，所谓上帝的国度、上帝之城，究竟是什么意思。在长达上千年的中世纪历史中，西欧从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但是，却有一个统一的教会体系，就是以罗马教宗为首的天主教教会体系。

我们会在其他文字中，继续深入讨论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历史之间的比较，以及他们两者之间的短长、利弊、得失；并从中反思，基督教信仰的教义，以及，基督教信仰与世上国度、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文明体系之间的深刻关系，应当是怎样的。

中世纪与近现代之间的分水岭

公元十五世纪是西方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正式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

近现代历史的开始。此时，一方面，君士坦丁堡被伊斯兰的突厥人攻陷，因而，整个欧洲大陆与东方地区之间的贸易枢纽、中枢节点被强行隔断。从此，西欧各国开始大兴海上贸易，从而使得曾经位于西欧文明边缘地带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成为海上强国，纷纷在经济政治上依次崛起。

另一方面，从公元十五世纪，以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城邦为中心，因着一个开始于美第奇家族的长达约两百年左右的统治，开始了——被后世称为文艺复兴的艺术文化运动，以及，与此同时的、罗马天主教体系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和影响。美第奇家族供养了许多后来极为著名的艺术家，包括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人。这些艺术家回归基督教信仰临到欧洲之前的时期的希腊艺术风格，以绘画和雕塑人体为美、为荣。美第奇家族积极地涉足政治与宗教领域，甚至有的家族成员自己成为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教皇。美第奇家族的奢靡与腐败之风，加重了罗马天主教本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的弊病。

天主教与东正教的谬误

自从公元四世纪开始，当圣经新旧约全书被从原文（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翻译成罗马的官方语言、拉丁语以后，罗马教宗系统就开始逐渐把圣经束之高阁，使普通人无法轻易接触到、阅读到圣经。在公元十六世纪以前的长达一千年中，西欧各国绝大多数人民，都只能从教会的神职人员那里聆听基督教信仰的教义，而没有机会自己去阅读圣经、上帝的话语。

在教义方面，天主教系统添加了许多圣经本身没有、甚至是圣经明文反对的内容，例如，不恰当地高举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地位，甚至称之为圣母、上帝之母，以及，把历世历代的许多基督教使徒们、圣徒们当作偶像崇拜、向他们顶礼膜拜、祈祷、祈求庇佑（在这些方面，东正教与天主教存在着同样的谬误，即，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圣经本身的教义和教导，而在后世添加了一些违背、偏离圣经内容的教导、信条）。而且，天主教还在后世自行添加了一些伪经、次经，以及向圣母玛利亚祈祷、敬拜的玫瑰经，等等。

好在，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纷争与分裂状态，虽然是一件很不好、极其令人伤心的事情，但是，这种状态却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可信地保证了，圣经新旧约全书本身，一直被精心地、忠实地保存着，直至后世，因为天主教与东正教双方之间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互相监督、有力督责的效果。

并且，尽管天主教与东正教中存在许多谬误和偏差，但是，我们仍然要说，他们的主流信仰、主干教义、主要信条，例如“使徒信经”等对于基督教信仰教义的总结，是正确的。所以，在天主教与东正教里面的信众，如果真心地、真诚地、热忱地寻求和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的以耶稣基督为自己生命的救主，那么，我们仍然可以说，他们是良善的、真诚的基督徒——尽管，我们应当诚实指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

圣经的广泛翻译传播，以及近现代时代的开始

公元十五、十六世纪，随着君士坦丁堡被突厥人攻占、拜占庭帝国灭亡，东方教会保存的希腊文的圣经原典以及许多其他希腊文写成的著名基督教历史文献和著作，被教会人士抢救、传播到西方教会体系。这些希腊文的文献以及圣经原典，开始让西欧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罗马教会的圣经拉丁语译本，在一些重要教义方面的词汇概念上，存在着一些翻译上的失误或偏差。

几乎与此同时，欧洲发生了许多历史意义影响深远的事情。我们仅举以下三件极其重要而著名的事情为例。

第一件事情是，金属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大规模、迅速地、廉价地印刷、传播纸质书籍在技术上成为可能。

第二件事情是，罗马教宗的教义上的谬误，以及财物方面的奢侈腐败作风，终于激起了教会各级神职人员以及普通基督徒们的反抗。以德国的马丁路德为代表，一大批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反抗教廷、传播圣经、传播真正纯正的福音与基督教信仰教义。马丁路德把圣经翻译为德语，极大地推动了圣经在社会中的普及化、广泛传播。

第三件事情是，英国的丁道尔开始把圣经翻译成英语。这些圣经翻译运动本身，直接导致了现代德语书面语、现代英语书面语等等的诞生，因为在那之前，西欧的书面语言只有一种，就是拉丁语。

圣经的广泛传播，使得欧洲的无数普通人开始真正地、详尽地明白基督教信仰的真正主旨、原则、精髓；这些基督教宗教改革运动，深刻地革新、更正了欧洲各国人民在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方面的许多认识与观念。这样的革新与更正，直接地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开启；以及，现代民主自由政治运动、法律、经济等等许多方面的变革，如火如荼地在各地展开。

这些事情，推动了、构成了过去五百年来的欧洲近现代史，并进而，对于全世界的文明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影响作用。今天，每一个出门坐火车汽车飞机、早上吃牛奶面包、上班穿西服革履、住在高楼大厦或四季温暖如春之庭院别墅里的人，都要感谢培根、牛顿、波义耳等现代科学的开启者们，更要感谢那些舍生忘死地传播圣经、传播基督福音的敬虔基督徒们。

基督教会简史的总结与反思

从上面的简史中我们可以看见，在耶稣基督降生以来两千年的历史中，每当人们贴近圣经、寻求圣经、明白圣经话语的时候，他们就展现出热忱、敬虔、谦卑、真挚、积极的信仰，他们的生命就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社会与国家就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也发生极其巨大的改变；上帝的祝福就极大地、温暖地、令人震撼地临到他们。

反之，当人们沉浸在自己的罪性与私欲中，沉浸在彼此的纷争中，当人们没有真诚地、认真地、热忱地寻求上帝的话语、信仰的真理的时候，那么，他们的生命就显出冷漠、消极、倦怠的样式，他们的道德就不断滑坡，他们整个社会与国家就充满了许多动荡、败坏之事。

从基督教会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反思。

一，上帝的国度，虽然表现在地上的教会中，但是，从终极的意义与层面而言，基督的国度不属于这地上的任何地方，而是属灵的、属乎天上、那永远的国度与家乡。

二，然而，这并不是说，基督教信仰在这个地上就没有：——确定的、明晰的、任何人都无可否认的见证。事实上，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人道主义、人的生命与自由被极其重视，到艺术文化、经济与科学的大发展等等，——在无数的层面上，现代人类文明都被深深地刻下了基督教信仰的烙印。（读者可以阅读《基督教的果实》《基督教信仰之大众证据》《基督教信仰之证据的反思》等系列书籍，进一步查考这些方面的事实与信息。）

三，但是，在基督教信仰与西方文明之间，是无法划等号的。前者固然在极大程度上深刻影响了后者，但是，后者中包含着许多其他方面的成分与因素，甚至包含了无数的糟粕、不义、败坏、奢侈、贪婪、淫乱，等等。

那些感叹“为什么基督教信仰没有全部改变欧洲人、使全体西方人都成为基督教圣徒，或是为什么没有彻底消灭那些罪恶的恶人”的人们，并不明白：——上帝是公义、圣洁、慈爱与恩典的，他的终极道德审判必将来临，他的终极惩罚是永远的；然而，他以恩典与慈爱，给世人悔改己罪的时间与机会，使他们真心地、真诚地、而不是被强迫地，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上帝的无限公义与权柄，到那终极的审判日，必将昭然地显明在一切世人的眼前。

四，那么，为什么有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对于基督教信仰和西方文明不太了解、不求甚解的人，常常把这两者看为同等呢？

这一方面是由于，许多世人并不了解基督教信仰的真正主旨、福音的真正涵义：——“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人在世上应当勤勉而敬虔地生活、工作，但是却不应当把心系于这个世界，以这个世界、或其中任何被造之物为心灵的归依”；尤其是不了解基督教信仰、与世上之国关系的教义：——“基督的国度属乎天上，而不属乎地上；真诚、谦卑的基督徒应当在这个世上作盐、作光，把基督的爱带给世人，见证福音的真实，见证耶稣基督伟大、圣洁的爱；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温柔的福音，是圣洁的福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烛火他不吹灭。”

另一方面是由于，世人因着自己生命中的罪性，因着自己的心系于这世上的国度与荣华，所以，常常误以为，神的作为和果效，是要终极地显示在这个地上的世界中。他们把世上的荣华璀璨、建筑物的宏伟绚丽、人群的华盖云集，错误地当成了天国里的永远荣耀。他们总是以为，非得要通过外在的、表面光鲜的“荣光”，来看待那些属灵的、属天的、属乎道德的事

情。

五，基督教信仰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影响最大，特点也最独特的宗教信仰。它虽然指出，我们不应当以这个被造的世界或是其中任何被造之物、被造之人为我们心灵的依归，而是要单单地敬拜那位创造宇宙天地、创造我们生命的主；但是，它不是像佛教那样抱着虚无、万事皆空、不垢不净、不生不灭、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诸相皆虚妄的态度，以否定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一切世事。它告诉我们，应当积极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以谦卑、温柔、真诚、和平的心，以勤勉、专诚的工作，去面对一切事情、一切世人。

它虽然指出，只有上帝才是我们的造物主、生命之主、永生之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上帝是我们道德律法的颁布者、是圣洁公义而全能的终极道德审判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道成肉身，耶稣基督谦卑地降身为一人，生在马槽里，生在律法下，取了奴仆的样式，甚至谦卑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救恩，使一切相信他、接受他救恩的人，得到永生，得以进入那永远的天国、得享那永远的幸福与美好。

它不是像伊斯兰教那样用火与剑传教、荼毒、劫掠，而是用谦卑、慈爱、怜恤与和平的方式，把福音向世界分享。它不是像伊斯兰教那样推行、奉行政教合一的教义与制度，更不是要在地上建立起什么伟大的、属世的国家；它不是要以严刑峻法来统治臣民，更不是要让整个社会万马齐喑、丧失活力与创造力。在圣经福音书中，耶稣基督清楚地说道：“我的国属乎天上，而不是属乎地上”。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基督教信仰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良善影响是最大的，也是有目共睹的。

+++++

+++++

+++++

+++++

+++++

人的罪

第十一，毋庸置疑的是，在每一个世人的生命本质之中、在心灵深处，都充满了骄傲自义、自私自利等等各样的罪性与罪行。因此，当人所属的原有思想观念体系受到冲击的时候，他们就会倾向于，本能性地抗拒、排

斥、反抗。

在人的心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往往就是自以为义；即，人总倾向于认为自己所处的境况、所属的团队是好的、正义的，包括自己的家庭、社群、祖国、思想传统等等。当人遭遇失败、挫折、落于下风的时候，往往会怨天尤人，而很少会反思自己；甚至，人常常会迁怒于外界各样的因素；以仇恨、苦毒、猥琐、自私、自义、心骄气傲的心理去看待世界。很少有人愿意接受挫折和失败。很少有人愿意面对痛苦的反思与深省。

地上的国与神的国

第十二，当人的心背离上天、上帝、那宇宙天地造物之主的时候，就会把自己的心灵与灵魂系于这个世界，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并且，世人常常会有一种深刻的误解，就是认为，上帝的圣洁国度和地上的国一样，充满外在的虚浮样式。

因此，这就往往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常常会把基督教信仰与西方政治混为一谈；而且，会把西方政治中的某些缺陷、不完美、不好的地方当作借口，对基督教信仰嗤之以鼻；并且，不但如此，反过来也对西方文明抱着蔑视的态度。

+++++

+++++

+++++

=====

二战以后的美国国内简况

二战以后，大量退伍军人返回家乡，结婚、成家、生子，因而导致了1950

年代的社会生育率大增，产生了婴儿潮一代。然而从1950、1960年代起，在艾森豪威尔等几任总统期间，美国经历了一些很明显的社会自由化变化趋势。1960年代，最高法院通过一个著名的判例，认定中小学等公立学校内、校方主持的学生自愿祷告的做法是违反宪法的。从1960年代以后，美国中学生早恋、怀孕比例大增，社会离婚率也大增【在1950年代以前的美国社会中，离婚曾经是一件非常罕见、以至于让人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1960年的民权运动以及反种族歧视运动，在给美国社会带来一些有益变化的同时，也使整个社会进一步向左转，抛弃传统，大量流行着性解放、毒品泛滥、嬉皮士文化等等。1980年代，里根总统上任；社会保守主义兴起。2000年以后，布什总统在反恐怖主义行动中，进攻伊拉克、但却没有找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在美国内部产生了很大争议。2016年起，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开始正面思考如何应对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文化所产生的挑战。今天的美国社会，尽管在各方面仍然有很大的生机活力，但是，在国家债务上，在宏观经济上，在社会人文文化上，在民情上，在信仰与属灵的境况方面，都充满了许多危机和矛盾。我们对此将会在本书后面章节继续讨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下继续追溯，1937年至1945年的中国近现代史。

国军抗战历史

本章前文已经详述了1937-1940的国军抗战历史。这里继续概述1941-1945的中国抗日战争历史。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41%E5%B9%B4%E4%B8%AD%E5%9B%BD>

1941年中国

纪年： 辛巳年（蛇年）、中华民国30年

大事记

1月

1月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王乾元为第三十四军代理军长。

1月12日——皖南新四军指战员在叶挺指挥下坚守石井坑，黄昏周围阵地相继失守，晚上叶挺决定分散突围。

1月13日——新四军军部在突围中又遭国军包围，当时尚集中2,000余人几度冲锋，下午国军进攻大康王新四军阵地，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阵亡；叶挺和饶漱石商定派人与国军谈判，并派军部参谋2人前往第五十二师师部联系。

1月14日——叶挺前往第五十二师师部谈判被扣押，随后新四军各阵地被国军占领；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最后分散突围，2,000余人陆续到达江北和苏南，副军长项英和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到茂林以南大山中隐蔽，3月14日被杀。

1月16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刘祁祺为第十七军副军长，张言传为第七十军副军长；国民政府设计局正、副秘书长张群、顾翊群辞职照准，遗缺由王世杰、陈伯庄兼任。

1月17日——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称新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其番号，并将“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是为“皖南事变”；军事委员会任命杨宏光为新编第三军军长。

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之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军事委员会任命陈章为第六十三军副军长；行政院会议议决派蒋复璁为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

1月2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郭希鹏、王天任为骑兵第三军军长、副军长；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致电军令部长徐永昌，请即派兵东进援助该部袭击苏北新四军。

1月25日——日军发动豫南会战；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

1月26日——豫南战场中路日军攻陷确山，右翼日军攻陷正阳，左翼日军攻陷泌阳。

1月3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赵锡庆为第五十三军副军长，王育瑛为第五十四军副军长。

2月

2月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卫立煌兼任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孙良诚为副总司令，王懋功为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毕泽宇为第六十九军军长，冷欣为第八十九军军长，顾锡九为第八十九军代理副军长。

2月4日——豫南日军攻陷南阳。

2月8日——行政院经济会议正式成立，蒋介石任主席，孔祥熙为副主席，贺耀组为秘书长。

2月10日——豫南会战结束，日军退回信阳，恢后战前态势。

2月26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陈大庆为第二十九军军长，王廷瑛为新编第五军副军长。

2月28日——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撤退。

3月

3月2日——国民参政员、南侨领袖胡文虎离开重庆前赴香港；日军在北海

市强行登陆，攻陷北海。

3月6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梁培璜为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为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为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刘奉滨为第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

3月14日——日军发动上高会战。

3月1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孙良诚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

3月28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召棠为第十九军代理军长，梁春溥为第二十三军军长，于镇河为第三十三军军长，施北衡为第七十五军军长，柳明七十五军副军长，孙福麟为第八十三军代理军长，张兴仁为新编第三军副军长。

3月31日——上午，上高会战国军第九战区第二挺进总主力由高安东北冲入城内，克服高安，日军不支。

4月

国民政府为实行对滇缅公路统一管理，特设特种运输管理委员会，由何应钦兼任主任委员，交通部、财政部、经济部、贸易委员会等机关均派代表参加。

4月2日——第九战区第四十九军第一〇五师王铁汉部援军第七十军第一〇七师宋英仲部合力克复新奉，午后王铁汉部收复万寿宫，日军退回原阵地，上高会战结束，共歼日军1.5万人，俘日军100余人。

4月4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彭杰如为新编第七军军长。

4月10日——国民政府特任郭泰祺为外交部部长；国民政府追故空军驱逐司令兼第四大队队长高志航为空军上将。

4月24日——上海四行仓库孤军营第五二四团团团长谢晋元，在给士兵训话后，被其部下士兵赫鼎诚、张文清、龙耀亮等用匕首、铁镐猛击殒命。

4月25日——谢晋元遗体大殓仪式在孤军营礼堂举行，凭吊者约3,000人，林森、蒋介石、何应钦、孔祥熙、朱家骅、顾祝同等题词致哀；蒋介石通令全国悼念谢晋元，发特恤国币5万元，并请由政府明令褒扬，所遗子女由国家抚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何浩若辞职获准，由该部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少谷兼任。

4月2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杨彬为第七十一军副军长。

5月

5月1日——戴笠、杜月笙在上海成立人民行动委员会。

5月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筹设贸易部、粮食部，原隶属财政部之贸易委员会、全国粮食管理局应予撤销。

5月4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陈继淹为第五十九军副军长。

5月6日——军事委员会任何柱国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为副总司令，高树勋兼任新编第八军军长，李绳武为新编第十二军副军长，温怀光代理骑兵第一军军长，徐梁为骑兵第二军军长。

5月7日——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调集6个师团又2个独立混成旅共10余万在日本航空兵支援下，分东、北、西三方面进攻山西南部中条山；国军第一战区、第二战区所部7个军共16个师守卫中条山地区，以第八十军、第三军、第十七军守卫中条山西部，以第四十三军、第九十八军、第十五军守卫中条山北侧，以第九军守卫中条山东侧。

5月8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故第八十八师团长谢晋元，并追赠为陆军少将，令称：谢晋元率孤军八百守四行仓库，“环境驱迫，异常艰困，卒能坚

定不移，始终如一，洵足保持革命军人之人格，为长期抗战之矜式”，交军事委员会从优恤。

5月9日——国民政府特任顾维钧为驻英国特命全权大使，魏道明为驻法国特命全权大使；原驻英国大使郭泰祺另有任用，应免本职。

5月10日——重庆各700余人开会追悼谢元，蒋介石派贺耀组代表致祭。

5月20日——行政院增设粮食部，国民政府明令特任徐堪为粮食部部长。

6月

6月3日——国民政府特任吴尚鹰为立法院秘书长，任命蒋复璁为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

6月4日——国民政府特任张知本为司法院秘书，调立法院立法委员程中行为监察院秘书长，任命曾彦法院立法委员。

6月5日——日机轰炸重庆，制造较场口大隧道窒息案；军事委员会任命荣光兴为第五十五军军长。

6月6日——蒋介石视察“六五大队道窒息案”现场，指示重庆市市长吴国桢今后采取凭证入洞办法，避免死伤。

6月13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黄琪翔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

6月18日——国民政府明令免立法院立法委员吴尚鹰本职，命袁世斌继任。

6月19日——国民政府令免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本兼各职，任命熊斌为陕西省政府主席。

6月24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张弥川为新编第八军副军长，6月26日任命刘广济为第一〇〇军军长。

6月27日——郭泰祺由英国经美国返抵重庆，6月28日晋謁蒋介石，6月29日晋謁林森；上海特一法院宣判谢晋元被害案，凶犯郝俊等4人判处死刑。

7月

7月1日——全国公路由交通部移转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接管，以何应钦兼督办，俞飞鹏、张嘉璈为会办；军事委员会任命周体仁为第三军军长、李世龙为副军长；德国、意大利宣布承认“汪精卫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外交部向中外记者宣读德、意绝交宣言，并电令驻德大使及驻意代办撤退回中国。

7月3日——国民政府任命叶秋原、陈紫枫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7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为纪念抗战四周年宣言》。

7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中英两国关于撤销不平等条约之换文，中方文称：“本月四日贵大使照会以英国政府拟俟远东和平恢复时，与中国政府商讨取消领事裁判权，交还租界，并根据互惠平等原则修改条约等由，业经阅悉，中国政府对于英国政府此种友谊，表示深为欣慰。”

7月15日——国民政府以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出任驻法国大使，特派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代理行政院秘书长。

7月20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航空委员会顾问陈纳德，商谈美国空军志愿兵援华事宜。

7月22日——行政院决定成立全国水利委员会，任命薛笃弼为主任委员，各有关部、会长员为委员，将原有之黄河、长江、珠江、导淮各水利机关均归该委员会。

7月28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程树芬为第七军副军长，莫德守为第四十八军副军长。

7月3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贺维珍为第三十一军军长、黎行恕为副军长。

8月

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将陈纳德指挥下之美国志愿空军正式组成中国武装部队（即飞虎队），由陈纳德任总指挥。

8月2日——韩国光复军第五支队队长罗月焕奉韩国临时政府命到重庆述职，并报告该部前方工作情形。罗在中国北战场组织韩侨参加对日作战并深入敌后破坏二年。

8月4日——郭泰祺在重庆中枢纪念周报告近来国际形势，指出：“日本是侵略集团链锁中最弱的一环”，“只要民主国家坚持并加强对它的经济封锁，它就会走向崩溃之途”，“民主集团的胜利一定会从远东开始，毫无疑义。”

8月12日——国民政府设立外汇管理委员会，特派孔祥熙兼任委员长，派俞鸿钧等12人为委员，并指定俞源鸿钧、陈辉德、陈行、贝祖贻、席德懋为常务委员。

8月20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潘文华为第五十六军军长，8月21日任命忠言为第一〇〇军副军长。

8月24日——军事委员会命李觉为第二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陈孔达为第七十军军长，康翔为新编第五军副军长。

8月2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王敬久为第十集团军总司令。

8月26日——国民政府任命冯钦哉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派张含英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

8月28日——国民政府明令改组福建省政府：原省政府主席陈仪另有任用，应免本兼各职，任刘建绪为省政府主席。

9月

9月2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练惕生为第六十二军副军长。

9月4日——蒋介石派俞飞鹏兼任运输总局局长。

9月5日——国民政府令：外交部常务次长曾镕甫免职，特派为行政院驻缅甸代表。

9月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郑洞国为第八军军长。

9月16日——国民政府特任许崇灏为考试院秘书长。

9月17日——日军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

10月

10月1日——长沙附近日军各师团开始退却。

10月3日——军事委员会任刘希程为第九十三军副军长。

10月9日——国民政府令：兼福建省保安司令陈仪另有任用，应免兼职，任刘建绪兼福建省保安司令。

10月1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顾锡九为第八十九军代军长，10月12日任命史克勤为第四十九军副军长。

10月16日——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开幕，蒋介石主持会议并致开会词，会议主要内容是检讨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失误。

10月19日——据《大公报》讯：蒋介石拨款5万元在中央军校建筑四行孤军团长谢晋元纪念碑；运输统制局西南运输处改组为中缅总局，俞飞鹏任局长，陈体诚及美国公路运输专家威尔士任副局长。

10月23日——蒋介石指派康泽为主任，负责筹备设立“战时青年训导团”。

11月

11月2日——蒋介石以日军集结越南，将进攻云南，切断滇缅公路，是日电请罗斯福总统利用影响，使英国与中国通力合作。

11月11日——白崇禧巡视桂南，是日检阅防守桂边军队，发表训话称：日军进攻昆明时，或将由越南重入桂省，广西军民应与云南军民协力合作，防守边界。

11月12日——蒋介石会见周恩来，希望中共自动出席参政会，说过些时候可以给叶挺自由，但现在不能放。

11月1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丁友松为第八十军副军长，米文和为第六十九军代理军长。

11月16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曹日晖为第九十军副军长。

11月18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王育瑛为第八十七军副军长，11月20日任命刘希程为第九十八军军长。

11月2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宋希濂为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张轸为副总司令，吕瑞英为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梁培璜为第六十一军军长。

11月26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张凌云为第五十九军副军长，陈继淹为第七十七军副军长。

11月30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多荃为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锺彬为第十军军长。

12月

12月1日——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发表谈话，表示美国如与日本作战，中国亦将对日宣战，无论在任情况下，中国决不与日本单独媾和。

12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布告，明确宣布：“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国民政府以热河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缪澂流另有任用，免本兼各职，命刘多荃继任

12月17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赵世铃为第四十三军代军长，王铁汉为第四十九军军长。

12月23日——日军第40师团主力自湖北南部岳阳地区向湖南北部新墙河岸推进，突破第九战区守军第一三四师一部在河北岸之前沿阵地，第三次长沙会战开始；军事委员会任命陶广为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

12月27日——国民政府特任宋子文为外交部长，到任前由蒋介石兼任，沈鸿烈为农林部长、贾景德为铨叙部长、陈仪为行政院秘书长。

12月29日——蒋介石兼理外交部长职。

12月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组织中国战区，以提高中国之地位。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42%E5%B9%B4%E4%B8%AD%E5%9B%BD>

1942年中国

纪年： 壬午年（马年）、中华民国31年

大事记

1月

1月2日——军事委员会公布，中国军队已开入缅甸，协同盟军履行防守任务；国民政府成立工作竞赛委员会，隶属国防最高委员会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谷正纲、李中襄分任正、副主任；蒋介石电覆美国总统罗斯福，允就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1]:6699。

1月3日——同盟国宣布，推蒋介石任盟军中国战区（包括泰、越）最高统帅，1月5日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陆空联合总司令[1]:6700。

1月5日——蒋介石调蒋鼎文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1]:6701。

1月9日——国民政府令免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本兼各职，任命牟中珩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免河南省政府主席卫立煌本兼各职，任命李培基为河南省政府主席[1]:6706。

1月15日——长沙战场日军退过新墙河，至1月16日恢复原态势，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1]:6711。

2月

2月1日——经济部物资局成立，下设农本局、燃料管理处和平价购销处[1]:6725。

2月3日——同盟国发表公告，宣布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并任命史迪威中将为中国战区参谋长[1]:6728。

2月4日——蒋介石偕宋美龄，与王宠惠、张道藩、董显光及前英大使卡尔

（己离华驻苏）由重庆飞往印度访问，当晚抵腊戍[1]:6729。

2月5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及随行人员由腊戍飞抵印度之加尔各答[1]:6729。

2月8日——蒋偕宋美龄及随行人员由加尔各答乘火车赴新德里，2月9日抵新德里[1]:6732-6733。

2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贷给中国5亿美元法案[1]:6737。

2月17日——英王赠蒋介石爵位[1]:6740。

2月26日——行政院组成敌产处理委员会，张平群任主任委员[1]:6748。

3月

3月1日——蒋介石由昆明乘飞机至缅北腊戍，同时下令以林蔚为首之中国参谋团指导入缅作战事宜[1]:6751。

3月3日——蒋介石在腊戍接见缅甸总督史密斯，交换对缅甸防务意见，又会晤韦维尔将商讨战略；国民政府任命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1]:6752。

3月4日——蒋介石与“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在腊戍商谈空中侦察，与在缅甸使用空军计划，商谈结束后蒋即飞返昆明；美军中将史迪威抵达重庆，就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1]:6753-6754。

3月5日——蒋介石由昆明飞返重庆[1]:6754。

3月6日——蒋介石接见史迪威，史迪威转达罗斯福总统对欧、亚战场同等看待及美国加强对华空援之意见，并报告其到中国之使命首要是指挥在中、缅、印之美军；中央图书馆将《四库全书》影印本分赠英国、加拿大、印度、缅甸图书馆[1]:6755。

3月8日——中国远征军先遣第二〇〇师附骑兵团及工兵团之一部，作为先头部队到达缅甸同古（亦称东瓜），3月9日接收英军防务[1]:6756。

3月9日——蒋介石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紧急建议：仰光陷落后，“缅甸作战不能不重定计划，尤其中、英两国必须指挥统一方能收效。英军在缅兵力只有残余两个师，而我中国派往缅甸各军皆归史迪威指挥，其兵力总数超过英军四倍以上，则英军亦应归史君指挥方为合”[1]:6757。

3月10日——蒋介石再次会见史迪威，并委派他担任中国入缅部队之指挥官，同再三说明第五、第六两军是中国之精锐部队，这次入缅助战，只能胜不能败；如果日军乘中国军队调往缅甸时从越南袭云南，中国入缅部队或须调回，史迪威一一允诺，次日史迪威从重庆飞缅甸[1]:6758。

3月15日——蒋介石调西安行营主任卫立煌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遗缺派朱绍良兼任[1]:6762。

3月18日——史迪威从缅甸飞重庆，3月19日会见蒋介石，建议使用西汤河域之中国军队发动攻势，目的在截断仰光日军，蒋指示中国第五、第六军是中国精锐部队，不允受挫，惟目下应取守势[1]:6765。

3月29日——是日为革命先烈纪念日，中枢纪念周举行纪念会，李文范报告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在同古，日军陆空协同，施放毒气，猛烈攻击，第二〇〇师陷于苦战，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决心放弃同古，同古战斗历时13日，双方伤亡均重；陈纳德奉召到重庆，与蒋介石夫妇、史迪威、毕赛尔等会商美国军志愿队并归美军问题，最后同意陈纳德于7月4日解散[1]:6773-6774。

4月

4月1日——史迪威返抵重庆晋见蒋介石，汇报3月19日至月底在缅甸军事失利情况，抱怨在缅之国军不服从他之指挥[1]:6778。

4月6日——蒋介石在梅曲约见缅甸英军司令亚历山大与史迪威两将军，商谈战务，指示作战目标；国民政府财政部将整理田赋委员会改为田赋管理委员会[1]:6782。

4月19日——蒋介石以极沉痛之电飭宋子文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呼吁，美国对中国与其他国家之待遇应相同[1]:6795。

4月25日——国民政府特任卫立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1]:6803。

4月30日——蒋介石电令中国远征军将领固守畹町；史迪威、罗卓英率司令部人员转至印度，新编第三十八师主力追随其后，其余部队均失联系[1]:6807-6808。

5月

国民政府在重庆磁器口成立“中美种技术合作所”军统局长戴笠任主任，美国战略服务局远东盟调主任梅柴斯任副主任[1]:6843。

5月1日——国家总动员会议成立，吴铁城、陈仪、贺耀组为常务委员，秘书长端木恺[1]:6810。

5月8日——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奉蒋介石命布置该军撤退回中国，杜聿明自率直属部队及廖耀湘新编第二十二师自印道入野人山，官兵死亡枕藉[1]:6819。

5月11日——日军攻陷云南西部腾冲[1]:6823。

5月15日——浙赣会战开始[1]:6828。

5月25日——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山西辽县南艾铺附近十字岭上被日军炮弹击中身亡，6月21日《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撰写悼念文章〈左权同志精神不死！〉[1]:6836。

5月26日——中国远征军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在缅北茅邦村因重伤不治，10月16日国民政府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10月29日美国国会授权美国总统罗斯福颁戴安澜懋绩勋章[1]:6837。

5月28日——日军攻陷金华[2]:142。

6月

6月1日——蒋介石以兼理外长身份，会见印度驻华总代表沙福莱，6月10日沙福莱拜会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1]:6844。

6月6日——是日为工程师节，中国工程师学会、国父实业计划研究及工程师学会重庆分会在重庆举行纪念会[1]:6851。

6月9日——宋子文获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6854。

6月14日——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甘地致函蒋介石，对中国人民为求国家之自由与完整而英勇战斗与无穷牺牲，深表同情与钦佩；声言决不致以牺牲中国自由而换取印度自由，及保证愿以印度为抵抗日人侵略之基地[1]:6860。

6月15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接见史迪威，史再次提出整改军队问题，因此议及到军权，蒋未可置可否[1]:6860。

6月17日——国民政府特任万福麟为军事委员会委员[1]:6862。

6月22日——地政署在重庆成立，郑震宇任署长，内政部地政司取消[1]:6867。

6月24日——蒋介石会晤史迪威，再次商谈军队整改问题[1]:6868。

6月26日——史迪威谒见蒋介石，报告第十航空队轰炸机开往开罗事，蒋对此决定甚为不满[1]:6870。

6月29日——蒋介石下令撤销中国远征军长官部，另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任副总指挥，驻印军共8,000余人，改编后在加尔各答西北之兰姆加训练[1]:6871。

7月

7月1日——财政部设专卖司主管各种专卖，朱偁为司长，除了盐专卖由盐务司统筹外[1]:6874。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行政院例会决议任命朱章赓为中央卫生实验院院长[1]:6881-6882。

8月

8月10日——汪精卫政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武汉行营成立[1]:6908。

8月15日——蒋介石由重庆飞兰州处理新疆各项问题[1]:6912。

8月24日——蒋介石由兰州飞西宁，并在西北各地视察[1]:6918。

8月27日——是日为教师节和孔子诞辰纪念日，教育部与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举行孔子诞辰座谈会[1]:6920。

9月

9月1日——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进行改组，原在理事会下之战时金融、战时经济两委会会并为战时金融经济委员会，下设贴放、农贷、储蓄、汇兑4个小组；社会部劳动局成立，局长贺衷寒、副局长史维焕；是日为记者节[1]:6924-6925。

9月8日——国民政府授予欧震晋、张德能、陈侃、周庆祥、朱岳、方先觉、董煜、李棠三等宝鼎勋章，陈沛三等云麾勋章，罗奇四等云麾勋章[1]:6931。

9月11日——国民政府明令胡适免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职，次日特任魏道明为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1]:6934。

9月1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任马思聪为中华交响乐团团长[1]:6934。

9月16日——日军占领缅甸全境，入缅中国远征军10万人仅有4万人撤回中国，大部在撤退中伤亡，第一次入缅作战至此结束[1]:6937。

10月

10月1日——驻美大使魏道明首次拜会美国国务卿赫尔：美国总统罗斯福特别代表威尔基由兰州飞抵成都访问，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设欢迎茶会[1]:6947。

11月

11月1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在蒋介石私邸开最高干部会，蒋介石、陈诚、张治中等出席，讨论非中国国民党系诸党派之反政府活动，决定以对付中国共产党之异党活动办法对付各民主党派，11月2日闭会；湖北省政府在老河口成立鄂北行署，何绍南为主任[1]:6972。

12月

12月2日——中央党政机关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机关人事训练，由中央训练团班主任吴思豫办理军事部分，由中央政治学校班主任吴铁城办理党政部分[1]:6999。

【1】李新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韩信夫、姜克夫主编（编）。《中華民國史大事記》。北京：中华书局。2011。

ISBN 9787101079982.

【2】李守孔. 《中國現代史》. 台北：三民书局. 197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43%E5%B9%B4%E4%B8%AD%E5%9B%BD>

1943年中国

纪年： 癸未年（羊年）、中华民国32年

大事记

1月

1月1日——川康公路正式通车[1]:7026。

1月2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方靖为暂编九军军长[1]:7026。

1月6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李楚瀛为第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侯镜如为第九十二军军长，杨勃为第九十四军副军长，李棠为第三十七军副军长[1]:7029。

1月10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黄杰为第六军军长[1]:7032。

1月14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和鼎为第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张义纯为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史迪威出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官，着手重开陆上供应线[1]:7035。

1月2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朱鼎卿为第七十五军副军长[1]:7042。

1月28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杜聿明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黄杰为副总司令，邱清泉为第五军军长、余恺为副军长[1]:7044。

1月2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郑洞国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军军长，刘嘉树为第八十八军军长，何绍周为第八军副军长[1]:7045。

2月

2月1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准备前赴昆明组训新军，史迪威在昆明成立组训新军办事处负责训练及装备；军事委员会将铁道运输司令部改为铁道运输处，隶属后方勤务部，并以陇海铁路局长陆福廷兼任处长[1]:7046-7047。

2月3日——“华北政务委员会”决定自2月9日起一律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禁止用五色旗[1]:7048。

2月4日——国民政府批准《中美新约》及换文，2月1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中美新约》及换文；[1]:7048-7049。

2月5日——国民政府定是日为农民节[1]:7049。

2月10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邓鄂为第六十四军副军长[1]:7052。

2月12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张琼为第十五军副军长[1]:7054。

2月13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李明灏为第九十七军军长[1]:7056。

2月17日——宋美龄抵达华盛顿访问，次日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1]:7058。

2月18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张雪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为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马励武为第二十有军军长，赵公武五十二军军长，张

华棠为第三十军副军长，傅翼为第七十二军军长，倪祖耀为第八十五军副军长[1]:7059-7060。

2月19日——国民政府任蒋介石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原校长顾孟余辞职照准[1]:7060。

2月21日——军事委会任命裴昌会为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米文和为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1]:7061。

2月23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黄琪翔为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孙连仲为第六战区代司令长官，刘汝明代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孔令恂为副总司令，区寿年为第三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1]:7062。

2月24日——国民政府明令给予钱泰景星勋章；军事委员会任命罗广中为第十八军副军长，王卓凡为第五十七军副军长[1]:7063。

2月28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李仙洲为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1]:7065。

3月

3月1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决议设新疆省监察区监察使署，罗家伦、王籍田分任正、副监察使，次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宋美龄抵纽约访问，次日在纽约麦迪逊广场发表演说，参加者1.7万余人[1]:7067。

3月5日——宋美龄在纽约招待记者，促请美国派遣远征军赴华[1]:7070。

3月6日——国民政府令外交部长宋子文出国期间派政务次长吴国桢代理部务[1]:7070。

3月8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王公亮为第十三军副军长[1]:7071。

3月10日——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发行，宣扬“一个政府、一个党、一个领袖”，中共及其领导军队和抗日根据地是“军阀和新式割

据”[1]:7072。

3月1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马继援为第八十二军代军长，杨震南为第五十一军副军长；美驻华空军改编为第十四航空队，在驻中缅印美国陆军总司令之下，由陈纳德指挥，陈纳德晋升为少将[1]:7073-7074。

3月14日——军事委员会撤销第三集团军建制（9月28日宣布重建），任命曹福林为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张雪中为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张际鹏为第十四军军长，汪之斌为第七十三军军长，李用章为第一军副军长[1]:7075。

3月15日——蒋介石赴贵州视察[1]:7076。

3月16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张德能为第四军军长[1]:7077。

3月17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彭位仁为第三十集团军副总司令，陶柳为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尚志为第三十九军军长，王甲本为第七十九军军长[1]:7077。

3月1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罗卓英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1]:7079。

3月22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彭善为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1]:7081。

3月23日——蒋介石核定云南练兵具体计划，命令有关部队向云南集中，共11个军31个师，随后蒋介石与史迪在指挥权限及提供人力、武器上发生分歧[1]:7081。

3月29日——三青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开幕，到会代表400人，蒋介石主持开幕式，会期4月12日闭幕[1]:7086。

4月

4月1日——西北公路酒泉至敦煌线通车[1]:7090。

4月8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覃异之为第五十二军副军长[1]:7095。

4月12日——三青团第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大会通过决定3月29日黄花岗烈士纪念日为中国青年节，全后全体代表入中央训谏团受训[1]:7078。

4月1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多荃为第二十五集团军副总令，梁恺为第五军副军长，柴济川为第九十二军副军长[1]:7101。

4月17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石觉为第十三军军长，黄祖坝为七十六军副军长[1]:7102。

4月23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刘汝珍为第七十八军军长[1]:7107。

4月24日——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在河南林县临淇地区作战中被俘[1]:7107。

4月2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张耀明兼第五十四军军长，韩文英为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唐子长为第十九军副军长，唐冠英为第一〇〇军代副军长[1]:7108。

4月26日——日军包围太行山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总部，总司令兼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被俘，胁往新乡[1]:7108。

4月28日——国民政府颁给张群、庞炳勋一等云麾勋章，孙魁元（孙殿英）三等云麾勋章[1]:7110。

5月

5月5日——国民政府令给予张定璠二等云麾勋章，魏益三、郑冰如、孙立人各三等云麾勋，孙蔚民七等云麾勋章；陈诚拟定中国远征军作战计划，预计月底完成整后，以恢复中、印、缅水陆交通，及协助英、印盟军收复缅甸为目的，攻击缅甸日军；凌晨日军向洞庭湖北岸进攻，鄂西会战（日

军称为“江南歼灭战”或“宜南作战”)开始[1]:7116-7117。

5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陆军部长史汀生赠蒋介石以最高统帅勋章、证书和奖状[1]:7119。

5月17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石觉为第十三军军长[1]:7126。

5月26日——国军常德守军奉命开赴鄂西宜都、长阳前线，余程万部第五十七师接替常德城防[1]:7133。

5月30日——鄂西国军第六战区所部全面转入攻势，至5月31日日军伤亡过重，开始后撤，日军第13师团主力被围困于宜都附近[1]:7135。

5月31日——鄂西日军全线撤退，鄂西湘北战役大胜[1]:7135。

6月

6月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举行中、美、英、苏四国首脑会议，6月6日蒋介石婉拒罗斯福邀约，6月30日罗斯福再邀蒋于今年秋会谈[1]:7141。

6月8日——鄂西日军大溃退，恢复5月5日前原态势，鄂西会战至此结束，据日军公布战果：国军死30,766人、被俘4,279人，日军死711人，伤2,746人[1]:7144。

6月13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赖汝雄为第二十九军副军长[1]:7146。

6月15日——国民政府明令免去河北省政府主席庞炳勋本兼各职，任命马法五代理河北省政府主席；宋美龄抵加拿大访问，6月17日返回纽约[1]:7147。

6月20日——常德国军第五十七师命令开所有城门，在外常的常德民众开始返回[1]:7150。

6月22日——汪精卫政权“国民政府”任命庞炳勋为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为副总司令[1]:7151。

6月24日——宋美龄由纽约抵华盛顿，三度访问白宫，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辞行，并就战后远东和平与善后处理诸问题与罗斯福详加商讨[1]:7152。

6月29日——宋自1942年11月18日离开重庆赴美国就医，2月康复，访问美、加4个多月，是日宋美龄离开美国，经巴西、南非、印度，于7月4日抵达重庆[1]:7152。

6月30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蒋鼎文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王文彦为第三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李正先为第十六军军长，袁朴为第八十军军长，周志冕为第九十一军军长，张占魁为第三十六军副军长[1]:7155。

7月

7月3日——国民政府派图布升吉尔格勒代理伊克昭盟盟长和保安长官，并指定其为绥远省境内各盟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1]:7158。

7月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电约会晤蒋介石，7月8日蒋介石告以会时间以9月以后为最适宜[1]:7159。

7月8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刘进为太行山游击区总司令[1]:7163。

7月13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胡璉为第十八军副军长，朱鼎卿为第八十六军军长[1]:7167。

7月1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徐启明为第七军军长，张光玮为第八十军军长[1]:7170。

7月20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施北衡为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宋肯堂为第二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1]:7171。

7月22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王雷震为暂编第三军副军长[1]:7173。

7月28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陶景奎为暂编第九军副军长[1]:7176。

8月

8月1日——下午7时4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庆山洞双河街官邸逝世，中国国民中央常务委员会立即举行临时会议，决定蒋介石即日起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任命刘汝明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马滕蛟为第八十一军副军长[1]:7180。

8月3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罗广文为第十八军军长，梁恺为第五十二军副军长，方天为第五十四军军长[1]:7182。

8月4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王耀武为第五集团军副总司令，蔡洪范为新编第七军副军长[1]:7182。

8月14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陈金城为第三十六军副军长，李忠毅为第四十二军副军长[1]:7188。

8月15日——国民政府任命黄季陆为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李运华为国立广西大学校长[1]:7188。

8月17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刘振三为第五十九军代军长[1]:7189。

8月21日——宋子文就《改组中国战区方案则》一件，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初步交换意见，罗斯福表示已有召回史迪威之拟议；国民政府令免张含英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职，特派赵守钰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1]:7191。

8月24日——军事委员会令免陈瑞河第九军军长，10月23日任命第三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韩锡侯兼任[1]:7192。

8月2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甘登俊为第七十九军副军长[1]:7195。

9月

9月4日——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飞抵重庆述职，9月30日飞返迪化[1]:7199。

9月6日——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整编中国全国军队之计划和扩大远征军之指挥权限，史、蒋矛盾加深[1]:7200。

9月7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潘左为第二十一军副军长，田锺毅为第五十军军长[1]:7201。

9月1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何文鼎为第六十七军军长[1]:7206。

9月16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笙鸣涛为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耿幼麟为第三十军副军，余程万为七十四军副军长，何基沣为第七十七军军长，萧冀勉为第八十八军副军长[1]:7207。

9月17日——军事委员会任命佟毅为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1]:7208。

9月22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方天为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黄杰为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马敦静代理第十一军军长[1]:7211。

9月23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曾夏初为第二十八军副军长[1]:7211。

9月24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汤恩伯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为副总司令，孙元良为第二十八集团副总司令，王仲廉为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1]:7212。

9月27日——日本大本营准予进行常德作战[1]:7215。

9月28日——军事委员会决定重建第三集团军，任命李铁军为总司令，郭希鹏、于达为副总司令，马步芳为第十集团军总司令、马步青为副总司令，周士冕为第二十七军军长，廖昂为第六十七军军长，贺光谦为骑兵第三军

军长[1]:7215。

10月

毛泽东、任弼时、彭德怀赴南泥湾，视察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展大生产运动之情况[1]:7239。

10月1日——中美空军混合团在印度正式成立，中国空军有第一、第三、第五大队参加[1]:7219。

10月2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姚黎天代理骑兵第三军副军长[1]:7219。

10月4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方靖为第六十六军（由暂九军改编）军长，陈式正、未瑞珂为副军长[1]:7220。

10月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张文清为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徐梁为第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李楚瀛为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石祖黄为第十八军副军长，黄百韬为第二十五军军长，孙黼为第四十四军副军长，曹颜式为第四十八军副军长，吴绍周为第八十五军军长，陈武为第九十七军副军长，廖运泽为骑兵第二军军长[1]:7222。

10月6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太行分局与中共北方局、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与八路军总部分别合并，撤销太行分局，保留第一二九师番号[1]:7222。

10月7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左世允为第二十二军副军长[1]:7223。

10月9日——国民政府授予陈诚、吴奇伟、罗广文、胡璉等青天白日勋章，10月10日又授予何应钦、程潜、白崇禧、徐永昌、陈绍宽、俞飞鹏、阎锡山、李宗仁青天白日勋章；军事委员会任命李善宝为第七十七军副军长[1]:7224。

10月1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黄永安为第九军副军长，沈澄年为第七十五军副军长[1]:7226。

10月14日——军事委员会任阙汉騫为第五十四军副军长[1]:7228。

10月1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胡伯翰为新编第八军军长[1]:7228。

10月21日——军事委员会命李明扬为鲁苏战区副总司令[1]:7233。

10月23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王晋为第九十一军军长[1]:7234。

11月

11月1日——蒋介石接美国总统罗斯福电，拟于11月20日至11月26日间，在开罗附近与彼及英国首相丘吉尔会晤，次日蒋覆电罗斯福将如约前往开罗会晤；行政院批准广东韶关市正式设立，任命萧冠英为市长；军事委员会任命姚北辰为第十五军副军长；汪精卫抵东京参加大东亚会议，次日汪精卫、周佛海同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会谈，东条表示日本政府不直接同重庆接和平，希望南京对重庆劝和，并联系日本与重庆之沟通[1]:7241。

11月2日——常德会战开始；军事委员会任命陈守锋为第七十五军副军长[1]:7242。

11月3日——中美空军混合大队成立，由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兼任队长[1]:7243。

11月6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唐星为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1]:7245。

11月1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李宗昉为第四十七军军长[1]:7252。

11月17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王世和为第七十六军副军长[1]:7252。

11月23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卫立煌代理中国远征司令长官[1]:7257。

11月2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马润昌为第八军副军长[1]:7259。

12月

12月1日——美、英、中三国首脑签署之《开罗会议共同宣言》，在德黑兰会议上征得苏联首脑同意，是日在重庆、伦敦、华盛顿同时公开发表；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及王宠惠一行返抵重庆[1]:7270。

12月3日——日军攻陷常德。

12月7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张文清为第二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1]:7278。

12月8日——国军收复常德[2]:143。

12月10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马法五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1]:7281。

12月13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马步銮代理第八十二军副军长，谭何易为第八十四军副军长，顾锡九任为第八十九军军长，王照堃为骑兵第二军副军长，马呈祥代理骑兵第五军军长[1]:7283。

12月14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马润昌为新编第八军副军长[1]:7283。

12月18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潘左为第五十军副军长，王光汉、孙启人为第八十九军副军长，刘鉴秋为第九十二军副军长[1]:7284-7285。

12月19日——汪精卫在南京日本陆军医院施行手术，取出八年前中国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时，被南京晨光社记者枪击之背部残留子弹[1]:7286。

12月2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高倬之为第三十四军军长[1]:7287。

12月22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王克俊为第四十九军军长，万保邦代理第六十军军长[1]:7288。

12月23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彭立仁兼第七十三

军军长[1]:7288。

12月24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谢辅三为暂编第四军军长，张信成为副军长[1]:7289。

12月2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陈颐鼎为第七十军副军长，张言传为第八十六军副军长；国民政府授予宋美龄青天白日勋章[1]:7289。

12月27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高建白为第十七军副军长[1]:7290。

12月29日——国民政府免去沈鸿国家总动员会议秘书长，特派端木恺代理国家总动员会议秘书长[1]:7291。

12月30日——国民政府令授予卫立煌青天白日勋章，刘峙一等云麾勋章、俞济时三等云麾勋章[1]:7292。

【1】李新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韩信夫、姜克夫主编（编）。《中華民國史大事記》。北京：中华书局。2011。ISBN 9787101079982。

【2】李守孔。《中國現代史》。台北：三民书局。197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44%E5%B9%B4%E4%B8%AD%E5%9B%BD>

1944年中国

纪年： 甲申年（猴年）、中华民国33年

大事记

1月

1月1日——国民政府颁布授勋令：给予孔祥熙、孙科、居正、戴传贤、于右任、王宠惠、何应钦、宋庆龄一等卿云勋章，给予张人杰、邹鲁、冯玉祥、阎锡山、张继、熊克武、柏文蔚、李烈钧、叶楚傖、覃振、朱家骅、刘尚清、钮永建、李文范、王伯群、单嘉、马麟、沙克都尔札布、胡毅生、刘哲、麦斯武德、宋子文、陈果夫、许世英、周鍾岳、吴忠信、翁文灏、陈树哲、陈立夫、陈大齐、贾景德、林云陔、魏怀、张嘉璈、熊式辉、蒋廷黻、商震、陈布雷、张伯苓、莫德惠、王世杰、邵力子、张群、龙云、陈诚、薛岳、吴鼎昌、顾维钧、魏道明、傅秉常一等景星勋章；公布宋美龄、何应钦、程潜、白崇禧、陈绍宽、徐永昌、俞飞鹏各受青天白日勋章，何成濬、刘峙、商震、钱大钧各受一等云麾勋章[1]:7299-7300。

1月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郭忏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吴剑平为第八军副军长，谢辅三为暂编第四军军长、张信成为副军长[1]:7305。

1月8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彭位仁兼第七十三军军长，张言传为第八十六军副军长[1]:7307。

1月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陈大庆为第十九集团军代总司令[1]:7307。

1月1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刘位三为第五十九军军长[1]:7309。

1月12日——国民政府明令授勋：吴敬恒、丁惟汾、李石曾各给一等卿云勋

章；熊秉坤、吴铁城各给一等景星勋章[1]:7310。

1月16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陈沛为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1]:7313。

1月18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史泽波为第十九军军长，董其武为第三十五军军长，刘赐熙为第三十九军副军长，袁庆荣为骑兵第四军军长[1]:7314。

1月23日——国民政府明令是日为中国妇女节[1]:7317。

2月

2月2日——国民政府明令追赠陈调元为陆军一级上将[1]:7325。

2月3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蒋当诩为第十二军副军长，李伦为第四十七军副军长，王毓文为第八十五军副军长[1]:7326。

2月9日——国民政府明令陆军中将、上将衔薛岳晋升陆军上将，叙第二级[1]:7331。

2月1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赵寿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耀明为第三十八军军长[1]:7335。

2月12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黄杰为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梁华盛为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1]:7335。

2月2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王耀武为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彭位仁为副总司令，沈发藻为暂第二军军长[1]:7343。

2月2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赖汝雄为第七十八军军长[1]:7346。

3月

3月4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施中诚为第七十四军军长，李天霞为第一〇〇军军长[1]:7351。

3月6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王缙绪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仲芳为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廖震为第三十集团军副总司令；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以3月29日为“青年节”[1]:7353。

3月25日——行政院正式核定9月1日为记者节[1]:7369。

4月

4月14日——国民政府给予沈宗濂三等景星勋章，4月15日沈赴拉萨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职[1]:7384。

4月1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周体仁为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李世龙为第三军军长[1]:7385。

4月18日——日军大举进攻河南，豫中会战开始[1]:7387。

4月20日——日军攻陷郑州；军事委员会任命丁德隆为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刘安祺为第五十七军军长[1]:7389-7390。

4月2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施北衡为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方天为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1]:7398。

5月

5月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刘祖舜为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郑洞国为驻印军指挥部副总指挥，孙立人为新编第一军军长，廖耀湘为新编第六军军长；日军攻陷许昌[1]:7401。

5月8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张耀明为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唐永良为第三十二军军长[1]:7408。

5月9日——三民主义学会在重庆成立，名誉理事长蒋介石在成立大会上勸勉该会以“信”、“解”、“行”、“证”之精神；国军第二十集团军奉命下达反

攻怒江之作战命令，要求攻击军及防守军之加强团一律于5月11日开始渡河攻击[1]:7409-7410。

5月11日——云南西部中国远征军发起反攻怒江作战[1]:7412。

5月1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何绍周为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1]:7419。

5月20日——豫中战场攻陷陕县日军包围国军第三十六集团军总部，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中弹殉职[1]:7421。

5月25日——日军攻陷洛阳，豫中会战结束[1]:7428。

5月27日——日军分三路大举南下，向长沙方面进攻，长衡会战开始[1]:7429。

5月31日——蒋介石下达长衡会战计划[1]:7432。

6月

6月1日——全国行政会议闭幕，蒋介石致闭幕词，强调抗战期间最重要者为实行全国总动员，会议通过各项提案70余件[1]:7434。

6月3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赵锡田为第一〇〇军副军长[1]:7436。

6月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陈金城为第九军军长，张弛为第六十四军军长[1]:7438。

6月6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刘戡为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1]:7439。

6月14日——日军攻陷浏阳[1]:7446。

6月18日——日军攻陷长沙[1]:7450。

6月20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陈大庆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1]:7452。

6月26日——湖南战场日军将衡阳国军第十军包围，并转入攻势[1]:7458。

6月30日——美国陆军部决定晋升史迪威为上将，并赞扬他克服种种困难，在缅甸组建一支中国部队有战斗力[1]:7463。

7月

7月3日——军事委员会特派陈诚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及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1]:7465。

7月10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孙元良兼第二十九军军长，张文心任八十五军副军长[1]:7474。

7月20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郭寄嶠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张雪中为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刘祖舜为第二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鲁应禄为第三十三军副军长，阙汉騫为第五十四军军长，陈表农为第九十七军军长，撤销刘恩茂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职务[1]:7480。

7月25日——国民政府特派潘公展为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1]:7485。

7月27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欧震兼任第四军军长[1]:7486。

7月2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李兴中为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1]:7487。

7月31日——国民政府授予何键一等云麾勋章[1]:7488。

8月

8月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晋升史迪威中将为上将，8月2日蒋介石致电祝贺史迪威[1]:7490。

8月3日——国民政府晋给孙连仲一等云麾勋章，薛岳一等宝鼎勋章，郭忏青天白日勋章，王敬久、周晷二等云麾勋章，冯治安、王耀武二等宝鼎勋章[1]:7491。

8月5日——中国驻印军与美军攻占缅密支那[1]:7492。

8月8日——日军攻陷衡阳，长衡会战结束，衡阳国军守47天伤亡共1.5万余人，日军死伤1.938万人[1]:7494。

8月9日——军事委员会以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在豫中会战中指挥失利，予以撤职[1]:7495。

8月11日——国民政府授予何应钦一等景星勋章，程泽润二等景星勋章[1]:7496。

8月13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胡璉为第十八军军长，罗广文为第八十七军军长[1]:7497。

8月14日——是日为空军节，国民政府授予周至柔、张廷孟、王叔铭、毛邦初、高又新青天白日勋章[1]:7498。

8月24日——军事委员会制定桂柳会战各战区作战指导要纲[1]:7504。

8月29日——国民政府明令裁撤新疆省边防督办公署，盛世才调任农林部部长，吴忠信为新疆省政府主席，未到职前派朱绍良暂行兼办；军事委员会任命宋瑞珂为第六十六军军长，方靖为第九十七军军长[1]:7508。

9月

9月4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高树勋为冀察战区代总司令[1]:7514。

9月8日——滇西中国远征军攻克松山，松山战役结束[1]:7517。

9月12日——国民政府派罗良鉴代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日军攻陷廉江，桂柳会战开始[1]:7522。

9月14日——滇西中国远征军克服腾冲；军事委员会任命王毓文为暂编第一军军长[1]:7524。

9月20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孙蔚如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1]:7533。

9月22日——于斌在梵蒂冈天主教皇，被任为教廷行政官[1]:7535。

10月

10月3日——国民政府晋予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杨爱源一等云麾勋章[1]:7545。

10月7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李玉堂为第十军军长[1]:7548。

10月10日——日军攻陷桂林[2]:143。

10月18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决定正式宣布召回史迪威[1]:7558。

10月21日——史迪威飞离重庆：美国政府任命赫尔利代替高思为驻华大使，任命魏德迈代替史迪威为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兼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之参谋长[1]:7561。

10月23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傅立平为暂编第九军军长[1]:7562。

11月

11月1日——国民政府任命吴忠信兼新疆省保安司令[1]:7569。

11月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鲁崇义为第三十军军长[1]:7580。

11月10日——日军攻陷桂林[1]:7583。

11月11日——日军攻陷柳州，桂柳会战结束[1]:7584。

11月16日——兵役部及战时生产局正式成立[1]:7589。

11月23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张雪中为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裴昌会为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1]:7596。

11月24日——日军攻陷南宁[1]:7597。

12月

12月4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事务繁冗，不能兼理院务”，由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院长，仍兼外交部部长[1]:7605。

12月13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李汉章为暂编第五军军长[1]:7611。

12月19日——行政院议决定盐政司、盐务局合并改组为盐政局[1]:7615。
同日，鸭绿江口发生6.8级地震[3]。

12月26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陈武为第九十七军军长[1]:7619。

12月27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李玉堂为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方先觉为副
总司令兼第十军军长[1]:7619。

[1]李新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韩信夫、姜克夫主编，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北京：中华书局。2011。
ISBN 9787101079982.

[2]李守孔. 《中國現代史》. 台北: 三民书局. 1973.

[3]M 6.6 - China-North Korea border region. 美国地质调查局.

[2019-02-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12-06) (英语).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45%E5%B9%B4%E4%B8%AD%E5%9B%BD>

1945年中国

纪年： 乙酉年（鸡年）、中华民国34年

大事记

1月

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颁授郑洞国、霍揆彰、萧毅肃、周福成、何绍周、王凌云、孙立人、廖耀湘以青天白日勋章，颁授卫立煌以一等宝鼎勋章，颁授巴梯斯达以特种大绶卿云勋章，颁授萨拉里架以特种大绶景星勋章[1]:7626。

1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委员长行辕江西赣州，经办第三战区、第七战区、第九战区军需补给事宜[1]:7633。

1月12日——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部在安徽立煌成立，李品仙、王懋功等就任长官、副长官职[1]:7634。

1月18日——国民政府特任吴鼎昌为国民政府文官长，原任魏怀免职
[1]:7637。

2月

2月1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后方勤务司令部在昆明成立，受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之指挥，并与美军供应处联系[1]:7651。

2月3日——蒋介石任命龙云兼中国陆军副总司令[1]:7652。

2月7日——国民政府任命陈继承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1]:7656。

2月8日——日军会师于江西新城，覆灭中国赣南空军基地及打通粤汉铁路
[1]:7657。

2月9日——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何应钦任总司令
[1]:7658。

2月10日——国民政府特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汉中行营主任；特派王缙绪为重庆卫戍总司令，原任刘峙调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1]:7658。

3月

3月1日——蒋介石派彭位仁为青年军编练总监部副监，戴之奇为青年军第二〇一师师长[1]:7672。

3月2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奉令裁撤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黔桂湘边区总司令部、滇越边区总司令部，与第一、第九、第十一、第十六、第二十、第二十四、第三十五等集团军番号及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部，任命卫立煌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王耀武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司令官；蒋介石令调俞济时为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1]:7673。

3月4日——是日为童子军节[1]:7675。

3月8日——中国驻印军克复腊戍[1]:7676。

3月9日——青年远征军政治部主任蒋经国，由青年军第二〇一师师长戴之奇陪同，抵四川铜梁视察青年军，对训练情形颇表满意[1]:7678。

3月21日——豫西鄂北会战开始[1]:7685。

3月30日——缅北滇西作战结束[1]:7689。

4月

4月1日——蒋介石任蒋经国为青年远征军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主任，胡轨为副主任[1]:7692。

4月9日——湘西会战开始[1]:7698。

5月

5月1日——日军攻陷衡阳[1]:7711。

5月12日——湘西会战，国军获胜[1]:7718。

5月27日——国军收复南宁[1]:7725。

5月31日——豫西鄂北会战结束[1]:7728。

6月

6月3日——蒋介石在重庆会见苏驻华大使彼德罗夫，详谈东北问题，并明白表示中国之态度，“务须达成我抗日目的，即求得东北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彼得罗夫表示不难友好解决，并希望行政院长宋子文尽快访问苏联[1]:7730。

6月16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孙蔚如、孙连仲、傅作义为第六战区、第十一战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1]:7738。

6月26日——国民政府任命吴奇伟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原任薛岳免职；任命孙连仲兼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原任马法五免职[1]:7746。

6月30日——国军克复柳州[1]:7748。

7月

7月8日——蒋介石核准军事委员会设置战地政务委员会[1]:7758。

7月23日——国民政府授予方先觉青天白日勋章，以表彰其保卫衡阳血战之攻[1]:7767。

7月25日——国民政府特任俞鸿钧兼中央银行总裁，原任孔祥熙免职，宋子文兼领四联总处副主席，原任孔祥熙免职[1]:7767。

7月28日——国军克复桂林[1]:7769。

7月30日——国民政府特任张厉生为内政部长，王世杰为外交部长，陈诚为军政部长，俞鸿钧为财政部长，翁文灏为经济部长，朱家骅为教育部长，俞飞鹏为交通部长，谷正纲为社会部长兼农林部长，徐堪为粮食部长，谢冠生为司法行政部长，鹿鍾麟为兵役部长[1]:7769-7770。

8月

8月1日——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到部视事[1]:7772。

8月5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由昆明迁驻柳州，另于南宁设置指挥所[1]:7775。

8月10日——最高统帅部立即电令全国各部队，听候命令，根据盟邦协议，

执行受降之一切决定，对第十八集团军之军令曰：“所有该集团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作战地域之部队，并应接受各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勿再擅自移动。”[2]:147

下午7时，日本投降消息传出，重庆百万市民拥到街头欢呼跳跃[1]:7779。

8月11日——朱德以“延安总部”名义，连续发布7道命令，指示各地方军全面行动[2]:147。

8月14日——朱德、彭德怀致电最高统帅部，公开拒绝8月10日之命令[2]:147。

8月15日——同盟国经由瑞士政府之通知，获悉日本天皇裕仁已颁敕令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各项规定宣布无条件投降，于是中国、美国、英国、苏联首都同时正式宣布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同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对日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指出“正义必然战胜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它最后的证明，这亦就是表示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要求人民“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只认日本黠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人民为敌[1]:7785-7786。

朱德自称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致电冈村宁次，饬其命令所属日军向中共投降，被日方所拒绝[2]:147。

8月18日——“满洲国”在通化大栗子沟召开“重臣会议”，“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宣读“退位诏书”，至此“满洲国”政府垮台[1]:7792。

8月19日——中、美、英、苏盟国代表在马尼拉接受日本降使副总参谋长河边虎四郎签定初步投降书，中国代表徐永昌等参与此项接受日使初步投降仪式[1]:7792。

8月2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由重庆赴芷江，即在芷江成立前方司令部，接受日军投降；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北方局，成立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任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同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任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1]:7793。

8月21日——日军今井武夫一行八人飞抵芷江，即由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召晤，并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面交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中字第一号备忘录》，指示日军投降应行准备之事项[1]:7794。

8月22日——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身份电麦克阿瑟，授予英军司令官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之权限[1]:7795。

8月24日——国民政府隆重举行《联合国宪章批准书》签署典礼，蒋介石亲莅签署批准书，王世杰副署；毛泽东电覆蒋介石称：“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时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覆。”[1]:7797

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同赫尔利、张治中以及周恩来、王若飞等同机飞重庆[1]:7802。

8月29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会谈，下午毛、周、王与蒋介石会谈，晚间又和张治中、王世杰、张群、邵力子作长时间谈话[1]:7803。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中国陆军总部奉蒋介石之命，将原属中国方面受降之香港及九龙日军投降改由英国接收，并授权英国海军少将哈考脱全权受降，另派罗卓英中将为中国代表、威廉逊上校为美国代表参加香港受降[1]:7803。

9月

9月1日——国民政府特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1]:7809。

9月5日——宋美龄自美国返中国抵达重庆[1]:7817。

9月8日——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统一主办对敌伪党政及物资接收事宜[1]:7820。何应钦由芷江飞南京受降[2]:146。

9月9日——上午9时，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中外代表千余人出席，何应钦主持[1]:7821。何应钦代表最高统帅主持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2]:146。

9月10日——何应钦召见冈村宁次，指示处理日军投降事宜，冈村宁次表示：自签订降后，“就脱离日本政府之节制，完全听从何总司令之命令”[1]:7823。

9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官邸约毛泽东、周恩来共进午餐，张群、张厉生、邵力子作陪；何应钦令冈村宁次取消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之名义，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命令，自是日起伪钞一律停用，沿用法币，并规定伪币与法币之兑换率为200：1[1]:7825-7826。

9月13日——蒋介石召派张治中赴新疆处理“伊宁事变”，是日张治中由重庆飞抵迪化[1]:7826。

9月14日——中国各战区、方面军自是日起开始解决除日军武装，至次年2月13日止缴械基本结束，总计俘虏日军128.3206万人；张治中在迪化会见苏联驻迪化代总领事叶谢也夫，征询对“伊宁事变”意见[1]:7827。

9月16日——张治中晋謁蒋介石，报告解决新疆伊宁事变之途径，建议请苏联政府调解伊宁事变[1]:7830。

9月17日——国民政府任命商震为国民政府参军长[1]:7832。

9月2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向蒋介石请示后答复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

对苏联政府愿意协助伊宁事变表示感谢，并请苏驻伊领事代为通知与介绍伊宁领事代为通知与介伊宁事代表到迪化晋谒张治中，商洽进行和平解决办法[1]:7835-7836。

9月22日——毛泽东会见中国青年党领导人蒋匀田，说：商谈近20日，时间白费，我们触及到两个问题，军队分配比例问题，我们管理地区自治问题，没有一个问题得到协议，“可说商谈已经失败了。”[1]:7837

9月26日——宋美龄受任为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1]:7840。

10月

10月1日——中国空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廷孟奉蒋介石之命，携国旗一面单机飞赴台北，与驻台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交涉，要求降下台北“日本台湾总督府”上之日本国旗，升起中国国旗，日军同意，张廷孟亲手升起中华民国国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结束，所有业务分别移交国民政府文官、参军两处接办，参军处增设军务局，文官处增设政务局，办理侍从室第一、第二两处工作[1]:7845。

10月2日——蒋介石下令龙云着即免除本兼各职，特任龙云为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1]:7846。

10月3日——国民政府明令白崇禧晋任为陆军一级上将，张治中、张发奎均晋任为陆军二级上将，胡宗南特加陆军上将衔[1]:7847。

10月5日——台湾前进指挥所主任葛敬恩、副主任范诵尧率领接收人员80名由重庆飞抵台北，即次日成立台湾前进指挥所[1]:7848。

10月10日——《双十协定》签字；国民政府令授予蒋介石及何应钦、吴敬恒、戴季陶、张伯苓、胡适等7,278人胜利勋章，方觉先、端木杰、刘膺古等1,822人忠勤勋章，肖勃、宋锬、王可襄等12人云麾勋章；日本女间谍川

岛芳子（前清肃亲王善耆之女）在北平被捕[1]:7851-7854。

10月11日——毛泽东由王若飞和张治中陪同自重庆飞返延安，在重庆机场答记者说：“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不过困难都可以克服。”[1]:7854

10月12日——上党战役结束[1]:7857。

10月14日——何应钦赴徐州、郑州视察，次日在郑州召集军政长官会议后，乘机经开封返回南京[1]:7858-7859。

10月16日——国民政府改组原“昆明防守司令部”，组成“东北保安司令官部”，首先调其所属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转运东北[1]:7860。

10月18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及警备总司令部在台北开始办公[1]:7864。

10月20日——外蒙古举行外蒙古独立公民投票，历时3天日，将于10月22日完毕[1]:7868。

10月24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陈仪，偕同行政长官公署交通处处长严家淦等，由上海飞抵台北履新[1]:7871。

10月25日——同盟国于台湾地区的受降仪式在台北公会堂举行，陈仪为受降主官，日方投降代表为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1]:7872。苏军放弃营口[2]:1469。

10月29日——蒋介石在重庆会见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1]:7877。

10月30日——国军自秦皇岛登陆[2]:149。

11月

11月1日——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继续谈判避免冲突、恢复交通，政府代表将对中共10月30日所提四点提案之覆案交给中共代表；财政部派陈果夫为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原任孔祥熙免职[1]:7882。

11月6日——中国军队在老挝解除日军武装完竣[1]:7889。国军东出山海关[2]:149。

11月24日——马林诺夫斯基正式向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提出要求，视东北工业设备为战利品，并开列一154种企业，要求中俄共同管理[2]:150。

11月26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2]:152。国军进驻锦州[2]:149。

11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不了解中共之本质，任命对中国政情隔膜之马歇尔为特使到中国，希望马歇尔尽量利用美国之地位，促成国共之停战[2]:152。

12月

12月1日——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1]:7912。

12月7日——蒋介石决定派蒋经国前赴苏联访问[1]:7917。

12月9日——马林诺夫斯基与张嘉璈、蒋经国商定苏军撤退日期再展至明年2月1日[1]:7920。

12月13日——蒋介石在北平接见蒋经国、傅作义，听取东北与绥远局势报告，并任命陈继承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国军进驻沈阳[1]:7923。

12月14日——国军空运抵长春[1]:7924。

12月16日——马歇尔抵达北平[2]:152。

12月17日——马歇尔谒见蒋介石，提议组织一小组委员会，商讨停止冲突及其他有关事项[2]:152。

12月18日——蒋介石由北平飞抵南京[1]:7929。

12月20日——国民政府任命程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余汉谋为衢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为郑州绥靖公署主任；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到上海飞抵南京，蒋介石派何应钦赴上海迎接[1]:7931-7932。

12月21日——美国特使马歇尔偕魏德迈由上海飞抵南京，蒋介石夫妇新往机场迎接[1]:7932。

12月25日——蒋介石应苏联政府要求，并经马歇尔同意，派蒋经国为其私人代表，前往莫斯科交换中苏合作之看法[1]:7936。

12月27日——国共恢复谈判[1]:7937。

12月28日——行政院长宋子文在北平视察，并与行营主任李宗仁会晤，召集军政首长汇报[1]:7938。

12月29日——广州湾易名为湛江市，郭寿华任首任市长[1]:7939。

12月31日——海军总司令部奉令撤销，该部业务由军政部海军处接管，原陈绍宽总司令专军事委员会委员[1]:7941。

【1】李新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韩信夫、姜克夫主编（编）。《中華民國史大事記》。北京：中华书局。2011。ISBN 9787101079982。

【2】李守孔. 《中國現代史》. 台北：三民书局. 1973.

【3】武月星主编（编）. 《中國現代史地圖集》.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9. ISBN 7503118776.

【4】是胜利的顶峰，还是失败的深渊？ 理查德·伯恩斯坦《中国一九四五》. [2018-11-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11-03）.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有少量删节）

汪伪政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AA%E7%B2%BE%E5%8D%AB%E6%94%BF%E6%9D%83>

汪精卫政权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响应近卫声明而与大日本帝国合作的一个政权，正式名称依然为“中华民国”，执政党为汪精卫另立的中国国民党，最高机关是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1940年于南京市成立国民政府，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代主席及行政院长，以陈公博、周佛海、李士群等为主要成员。1944年11月汪精卫死后，陈公博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长。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该政府终结。

汪精卫政权被认为是抗战时期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合并“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傀儡政权的辖地，外交上除了纳粹德国、大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等《反共产国际协定》缔约国外，并无受到国际上的普遍承认。

名称

汪精卫政权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名，又被称为汪精卫国民政府或汪国民政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不承认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及行政院长职务，故称之为“汪伪政府”或者南京“伪国民政府”。日本则称之为“南京国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亦不承认该政权合法性，称之为“汪伪政权”。

标志

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国旗，1943年2月5日之前，在其国旗上附加有“和平反共建国”六字的黄底黑字三角旗，1943年2月5日开始，则取消“和平反共建国”六字，与重庆国民政府一样；采用青天白日徽加上红圈作为国徽，以示区别；《三民主义歌》为国歌。

历史

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先后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蒙古军政府、中华民国

临时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等政权。而南京政权的领导人汪精卫原是中国国民党成立初期的主要人物，拥有一定的影响力。

1940年3月，汪精卫离开重庆政府并与日本方面寻求合作，在南京建立政府，称为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接管原“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辖地，但是“临时政府”改组后的华北政务委员会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1940年3月30日，南京举行国民政府还都仪式，发表《和平建国十大政纲》。日本政府对汪政权发表宣言：“决定给予全力协助和支援。”

直到汪精卫与日本合作后，于南京成立国民政府，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制的“华北政务委员会”，撤销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以及由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合并察南自治政府及晋北自治政府而成立的蒙疆联合委员会进行统合。成立之初，汪政权仍奉重庆的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本人作“代主席”，兼领行政院长及中国国民党总裁，同时有五院院长设置及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恢复战前一切体制。

除日本和满洲国最早承认汪政权合法性外，承认该政府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及政府还有纳粹德国、意大利王国、匈牙利王国、罗马尼亚王国、保加利亚王国、丹麦保护国政府、西班牙国、克罗地亚独立国、斯洛伐克、泰国及维希法国等独裁法西斯或君主专制国家。

汪政权收回部分日租界。如：1943年3月与日本签约收回苏州、杭州、天津等八市（福州、沙市等地的日租界其实并未真正设立）的日本租界，7月收回上海法租界，8月收回上海公共租界。10月，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中日基本条约》。

汪精卫在日本的支持下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1943年1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对英美宣战，受到南京和上海市民上街游行举起横幅支持参

战，挂起“拥护国民政府参战”、“民国三十二年一月九日 国民政府对英美两国宣战了”的字条。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于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去世。11月12日，南京“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陈公博为行政院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兼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于11月20日正式就职。陈公博就职时称，将坚持奉行汪精卫手订之政策，无论战争如何推移、时局如何迫切，都不会动摇。周佛海继陈公博之后，于1945年1月就任上海市市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16日下午4时，陈公博、周佛海在南京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宣布取消国民政府及其所有机构，成立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陈公博自任两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任两委员会副委员长；南京国民政府存在五年零四个半月，最后终结。

汪精卫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域

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1940–1945）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虽在名义上统有华北政务委员会及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然而事实上仅直接管辖江苏、淮海、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东、中原、福建（部分日本占领地区）等省份及南京、上海、汉口、厦门等特别市，再者，除了江苏、淮海、安徽三省的形势较为完整外，其他省区往往仅占有少数县；另曾设置浙东行政公署、苏北行政公署及苏淮特别行政区等3个省级特别区。

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管辖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京（后改回北平）、天津、青岛等三个特别市；实际上尚管有河南省及江苏长江以北地区；后另设立华北政务委员会第一直辖行政区[注 10]及冀东行政公署等2个直辖省级特别区。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则管辖巴彦塔拉、察哈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等五个盟与察南、晋北两政厅，并先后设立厚和、包头、张家口等3个特别市，合计10个省级单位。

1940年6月20日，汪兆铭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第11次会议决定对南京特别市政府实行改组，并定为首都。

政府

1940年：

中央政治委员会

国民政府主席：

汪精卫（1940年3月－1944年11月）

陈公博（1944年11月起至投降）

行政院长：

汪精卫（1940年3月－1944年11月）

陈公博（1944年11月起至投降）

行政院副院长：

褚民谊（1940年9月－1940年12月）

周佛海（1940年12月起至投降）

内政部（部长陈群）

外交部（部长褚民谊）

财政部（部长周佛海）

军政部（代理部长鲍文樾）

海军部（部长汪精卫，任援道兼代）

教育部（部长赵正平，无党无派）

司法行政部（部长李圣五）

工商部（部长梅思平）

农矿部（部长赵毓松，青年党）

铁道部（部长傅式说，无党无派）

交通部（部长诸翔，国社党）

社会部（部长丁默邨）

宣传部（部长林柏生）

警政部（部长周佛海。1941年8月16日裁撤）

振务委员会（部长岑德广）

边疆委员会（部长罗君强）

侨务委员会（部长陈济成）

水利委员会（部长杨寿楣）

陈公博于1944年11月接替汪精卫成为南京政府主席

立法院院长：

陈公博（1940年3月－1944年11月）

梁鸿志（1944年11月起至投降）

立法院副院长：

朱履𩊦（1940年9月－1941年2月兼）

缪斌（1941年2月－1942年8月）

诸翔（1942年8月起至投降）

司法院院长：

温宗尧（1940年3月起至投降）

司法院副院长：

朱履𩊦（1940年3月－1945年4月歿）

最高法院（院长张韬）

行政法院（院长林彪）

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朱履𩊦）

考试院院长：

王揖唐（1940年3月－1942年3月）

江亢虎（1942年3月－1944年11月）

陈群（1944年11月起至投降）

考试院副院长：

江亢虎（1940年3月－1942年3月）

焦莹（1942年3月起至投降）

铨叙部（部长江亢虎）

考选委员会（委员长焦莹）

监察院院长：

梁鸿志（1940年3月－1944年11月）

顾忠琛（1944年11月－1945年7月歿）

监察院副院长：

顾忠琛（1940年3月－1944年11月）

夏奇峰（1944年11月起至投降）

审计部（部长夏奇峰）

军事委员会（1941年起）

参谋本部（部长杨揆一）

军事参议院（院长任援道）

军事训练部（部长萧叔萱）

政治训练部（部长陈公博）

调查统计部（部长李士群，政务次长杨杰，常务次长夏仲明；1941年8月16日增设。1943年9月9日，李士群被日军毒毙，调查统计部撤销，改设政治部，任命黄自强为部长）

军事

由于日本方面反对汪精卫建军，因此只得接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所遗留之武装力量，将维新政府绥靖军任援道所部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改编为南京和平建国军，后又招收军统游击队，编为两个步兵旅。此外，由日本顾问影佐祯昭移交华北治安军计七个旅和一个团。

南京和平建国军直辖6个方面军（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鲁苏战区新编第一师师长，1943年1月18日，率所部约4万人在山东沂水地区投汪，被编为山东方面军总司令，7月29日改称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并任命山东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宁春霖为副总司令，郭受天为参谋长；第六方面军孙殿英：冀察战区新编第五军军长，1943年4月被俘投汪）及4个绥靖公署；华北治安军则最高曾辖有14个集团军；蒙疆的蒙古军最高曾辖有10个师。

1940年，汪军总数8.8万人，而到1945年春已扩大到40余万人。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和平建国军由蒋介石国民政府收编。

外交

1940年8月31日，日本帝国与南京国民政府缔结了《中日基本关系条约》。1940年12月10日，汪精卫派特使、外交部长徐良到满洲国首都新京，向溥仪递交国书。1941年1月和8月，满洲国与南京国民政府互派大使。1941年7月1日，纳粹德国、意大利王国与汪精卫国民政府建交，以此希望日本能够北上进攻苏联。以德意两国为首的欧洲轴心国匈牙利王国、罗马尼亚王国、保加利亚王国、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独立国亦在当天承认南京国民政府，而西班牙国和丹麦保护国政府8月初也承认南京国民政府。1941年11月22日，汪精卫国民政府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随后泰国及日本的其他傀儡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缅甸国、菲律宾第二共和国也相继承认了南京国民政府。1943年1月9日，汪精卫国民政府在南京对英美宣战。

中共的壮大

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的真相》

作者谢幼田，明镜出版社出版

第一卷 自序

“。。。。在我眼前展现的竟然是令人难以想像的历史事实，任何一个中国人知道这些都会愤怒地拍案而起。。。。”

【注：在谢幼田所著《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全书之中，详尽地讲述了中共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怎样狡诈阴险地、冠冕堂皇地、厚颜无耻地、系统性地大规模欺骗、权谋、“鸠占鹊巢”、“借壳上

市”、崛起于乱世、等等的细节故事。本书就不再在此赘述。简单地说就是：——中共自1920年代成立之日起就长期地利用苏联的经费、技术、组织、物资资源支持；——利用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之下的喘息之机，消极抗日，积极地保存实力、并大规模地壮大自己、收编或消化中国北方地区权力真空下的各种半武装力量；——利用日本占领区的华北、华东、东北的广大农村地区的权力真空与政治虚弱状态；——利用当时大量中国人抗日救亡的迫切的民族心理；——利用中共自身的严密组织形态以及高超的政治宣传、和复杂的政经武力等阴谋诡计之技巧；——在八年的中国抗日时期内，成功地实现了近乎百倍的人力扩增；更重要的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在占据东北之苏联的暗中支持下，中共获得了重要的武装资源，为之后的三次国共决战打下了重要基础。在解放战争时期，林彪的军事才能固然为中共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就1936年以后中共壮大的整个过程而言，毛泽东的高超政治权谋斗争的手段（为了达到政治集团自身的高度团结的目的，用尽各种冠冕堂皇的手段消灭党内与党外的对手和敌对势力，并且让输者百口莫辩、有口难言），以及周恩来的聪明辅佐、忍辱负重甚至厚颜无耻的能力（为了某种理想而决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杀人越货、愿意做任何欺骗与不要脸之事、等等），等等政治权谋、军事斗争技巧因素，是中共之壮大与胜利的重要导致原因。在这些所有人事因素之上，最重要的政治原因是在于，中共之首要意识形态因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阶级斗争理论等等，对于当时大批中下层中国人民的巨大吸引力与鼓动力。——这是中共之壮大与胜利的重要背景和思想原因。】

苏联与中国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B%8F%E5%85%B3%E7%B3%B>
B

中苏关系是指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华民国和苏联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大致以1949年界分为民国大陆时期和共和国时期两个阶段。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苏关系由中俄关系所代替。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1912-1949）

自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中国陷入地方割据和军阀混战。当时北洋政府为国际承认，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与俄国签订《中俄声明》。自此，俄人势力入侵外蒙古。

1919年7月25日，苏维埃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签署《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通称《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写道：“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以后，立即建议中国政府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协议及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1920年9月

27日，苏维埃政府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

1921年，苏联开始为中国国民党提供资助。在1923年，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签订军事协议。

1922年，共产国际认定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核心，制定借助中国国民党以发展之策略，指示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8月中国共产党放弃排斥中国国民党之态度，同意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惟中国国民党必须依民主原则改组。孙中山为领导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北伐，1923年与苏俄建立良好关系，签订《孙文越飞宣言》，确立联俄容共政策，但确定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1924年，蒋介石回广州后，向孙面陈对国共合作之意见。孙认为蒋对中苏关系顾虑过甚，不合于当时革命现实。

苏联亦派员协助国民政府组织北伐军。1927年，蒋介石于上海清党，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破裂。苏联特使及人员被驱逐。

外蒙古独立

外蒙古原是中国领土，1911年在俄国策划下，外蒙古宣布独立为蒙古国。苏联成立后，继续支持外蒙古独立。1918年7月，苏联外交委员翟趣林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声明，放弃沙俄在满洲抢夺之一切物资，重新恢复中国在满洲之主权。7月4日，苏俄政府宣称将放弃沙皇政府以各种口实对中国人民所加负担，撤回沙皇政府对驻在国领事馆所设武装部队，并将中国各种赔款中俄国赔款交还中国。

1919年7月，苏联副外交委员加拉罕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愿意废除一切秘密条约，无条件交还中东铁路，放弃庚子赔款及废除一切特权，文书至1920年3月递至北京，立即引起舆论热烈欢迎。其中有一段说：“苏维埃政府不要求任何补偿，而交还中东铁路，以及一切采矿权、伐木、开采金矿、及其他为沙皇政府、俄国军人、商人和资本家从中国取得的权

利。”1920年9月，加拉罕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前次宣言之原则，但已非无条件放弃在华权益。

苏联并与日本订立秘密协议日本承认外蒙古独立，苏联亦承认满洲独立。1946年1月，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1953年又因苏联违约，于联合国提出控苏案以25票同意，24票弃权，9票反对，2国未出席，通过提案并且不承认外蒙古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6日宣布与外蒙古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61年，在中华民国弃权下，联合国接纳外蒙古为成员国。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

1917年3月15日，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3月30日，中华民国驻俄全权公使刘镜人约见俄国临时政府外交部副部长，宣布承认该政府。11月7日，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即共产党）在列宁领导下举行革命，推翻俄国政府，成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1918年8月22日，中国作为协约国成员发表《海参崴宣言》，拒绝承认苏维埃俄国，随后出兵西伯利亚，不久又撤出。1919年3月，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成立于莫斯科，是世界各地共产党之联合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及策动世界革命。1921年夏，苏俄在新疆伊犁、迪化、塔城、喀什等处派驻领事馆。1920年春，共产国际派维丁斯基（又称吴廷康，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之代表）等人到中国，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鼓吹组党。1921年，共产国际派代表马林（1923年返回莫斯科）到中国指导组党事宜。1922年8月，苏联政府派遣特使越飞到中国，一面公开与北京政府开展外交活动。越飞为驻华全权代表，与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谈判，想先达成建交目的，顾维钧仍要求苏俄先从外蒙撤走红军，谈判未果。然后越飞致函在洛阳军力最强的吴佩孚将军，希望建立合作关系，吴佩孚拒绝。1923年1月，越飞到上海与孙中山会谈，到了月底，发表《孙文越飞宣言》（简称“孙越

宣言”）。

1924年5月31日，曹锟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不辱使命，与苏俄政府代表加拉罕在北京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但是此协定并没有落实。

1926年，中苏双方举行会谈，商议重新划界，谈判无果而终。

《奉俄协定》

1924年9月20日，苏联为落实《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简称《中苏协定》）和《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关于中东铁路问题，与奉天的张作霖地方政府签订协议。北京中央政府照会俄国代表加拉罕，表示不承认《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省政府与苏维埃社会联邦政府之协定六条》（简称《奉俄协定》）。但是最终在1925年3月18日表示承认。

中苏断交（1929-1932）

1927年12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因广州事变发布对苏联断绝邦交令。此时北洋政府还存在，该断交令无效。

1929年7月17日，因中东铁路事件，苏联政府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绝交，撤回苏联驻中国使馆及侨务代表。

1932年12月12日，中苏恢复外交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对华军援重型武器曾超德国，并先后分别对华贷款3笔，共计2.5亿美元。先后共多苏联空军志愿人员来华，其中200多人在华牺牲；从1937年8月至1941年，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共击毁日机1,049架。1940年11月，新疆省军阀盛世才与苏联秘密签订《新苏租借条约》。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联承认满洲国，日本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全面停止援助中

国，直到1945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苏联才出兵中国东北地区。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政府同意外蒙古公投独立、允许苏联在东北和新疆享有特殊权益，苏军洗劫整个东北工业设备和财富，中国损失20亿美元。

苏联战争罪行

1945年在雅尔塔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三国领袖达成《雅尔塔协议》，要求苏联进军中国东北。苏联于1945年8月8日日本投降前夕对日本宣战，进军东北。占领城市后最早动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城市的重要冲，兴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苏联红军对战败的日本人进行抢掠施暴。苏联屠杀日本战俘和日本侨民，许多来不及撤回日本的侨民被苏军屠杀。典型的例子有牡丹江事件、麻山事件和葛根庙屠杀。此外还有来不及撤退的日本人，一同送往西伯利亚集中营强迫奴役或非人道虐待(殴打、强奸、处死、酷刑)。

同时，苏联亦对中国东北的平民进行骚扰。当时，苏联占领军统帅部是设在长春市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内，其首领为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而沈阳市的防卫，则是由俄国城防司令卡尔可夫少将负责。然而，苏联军队军纪败坏，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洗劫来往行人，在市内，一入黄昏，便人人自危。因为俄军会随意用卡车搬走老百姓的东西，再怎么喊叫、呼救都没有用，反而会被一脚踢倒在地上，撞得头破血流。年轻的妇女们，早把头剃得光光的，胸部也紧束起来，穿上男人装，以求自保。苏联士兵甚至使用机关枪射杀，对孩童施暴。龙应台对此评论道，在纪念碑落成、要求“长春各界人士”向红军致敬的同时，红军正在城里头烧杀掳掠。在大街上对妇女施行强暴；连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也因制止苏联红军抢劫而遭枪击致死。而苏联军队任意进入住宅，以刀枪威吓强夺物品与奸杀妇女。苏联当地进行的抢劫和强奸妇女的行为引起了当地人的恐慌，造成了

恶劣的影响，当时东北人均抱怨：“走了个小鼻子，来了个大鼻子。”当地人对苏联红军的厌恶远超过日本殖民者。在此期间苏军的行为甚至影响了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

国共内战时期

1947年

1947年1月11日，国民政府与苏联在南京谈判中长铁路业务问题，中国方面主张以前中东铁路产权为限，苏联方面则要求应包括南满铁路之产权。1月12日，外交部长王世杰照会英、美、法、苏四国外长，声明：一、将来和会必须由五国外长（即中、美、英、法、苏外长）召集；二、莫斯科外长会议，在未经中国外长同意前不得讨论德、奥和约以外之问题。3月1日，苏联驻汉口领事馆是日起暂行裁撤。

3月，苏联答复美国，准备交还大连，中国外长王世杰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具体商洽接收大连问题，苏联同意中国组团考察。4月1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大使要求接收旅顺、大连。5月4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覆中国外交部，重申拒绝中国派军接收旅顺、大连。5月5日，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再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驳斥有关大连受军管等问题。5月7日，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谈判中国军警能否随同接收人员进入旅顺、大连。5月18日，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呈外交部，报告与苏联外交部次长玛利克商谈中国军警自由进入大连问题。6月2日，董彦平、张剑非率领之接收旅大视察团自沈阳赴大连调查。6月4日，接收旅大视察团乘“长治号”炮舰抵旅顺。6月，国民政府派员至大连视察，市内军、警、行政，皆由解放军把持，无法接收。6月12日，旅大视察团结束视察，离开旅顺回沈阳。

6月22日，孙科就接收旅大问题对《新民报》记者发表谈话称：中国之东北现已成为国际问题，苏联显然违反中苏友好条约。6月25日，中国外交部根据旅大视察团报告发表声明，说明旅顺、大连接收交涉经过及“种种障

碍”，宣布暂停开放大连港，并提请苏联政府遵守条约，中国政府派遣军警接收旅顺、大连行政之权，既无条件限制，中国政府自得随时决定行使全权；外交部向苏联政府提交照会一件。7月11日，塔斯社发表公报，声言苏联政府从未反对在旅顺、大连设立中国行政机构。8月4日，苏联驻华大使馆代办费德林照会中国外交部，申辩未协助旅大视察团事，称查与事实不符。8月28日，塔斯社声明苏联船只有进入大连港权利。

6月3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访外交部长王世杰，就在华白俄团体之反苏活动提出抗议；王世杰亦抗议苏联报纸及通讯社之反华言论。6月20日，苏联塔斯社声明否认美国及中国通讯社所刊苏联指挥中共军队在满洲之攻势。8月28日，孙科在广州发表谈话，称日本对中国威胁已消失，代之而起者为苏联。

6月5日，中国与蒙古在中蒙边境新疆北塔山地区武装冲击，中国外交部于6月11日称“此事并非寻常边界冲突事件，我政府极为重视”，中央社电讯称苏联亦卷入其中；中方向苏联、蒙古两国抗议，苏联、蒙古两国声明否认中方指责。蒙古骑兵入侵中国新疆北塔山，中国向苏联及外蒙古提出严重抗议。6月21日，苏联答复中国外交部抗议，否认苏联飞机参加北塔山战事。7月8日，中国外交部就外蒙军队入侵新疆制造北塔山事，致苏联驻华使馆照会，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电令驻苏联大使傅秉常照会外蒙驻苏联大使，要求外蒙军队迅速从中国境内撤退。

9月5日，外交部驻沪办事处主任陈国廉称，苏联轮船“伊里奇号”由大连载运客货至沪，“未经特许擅入暂停开放之港口，并侵犯沿海贸易权”，外交部向苏联大使馆提出抗议。11月28日，苏联答复中国政府提出召开对日和约预备会议之建议，并通知美、英政府，建议明年1月在华举行四国外长特别会议，讨论对日和约筹备事项。

1949年10月以后

中华民国外交部在1949年11月7日《与苏联断绝邦交之声明》，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中国政府一向恪守该条约产生之一切义务。但是苏联却支持中国共产党。

国民政府“为顾虑美国关系，迟未采取行动”，直至1953年2月20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对国会正式否认雅尔达秘密协定的存在，国府才于1953年2月23日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1953年2月25日，外交部正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91）

1949年10月2日，苏联政府照会，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当毛泽东从机要秘书手里接过苏联照会看过以后，同机要秘书握手。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北上专列，前往莫斯科，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访问，陈伯达、师哲、叶子龙、汪东兴等随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在华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柯瓦廖夫陪同。12月16日，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第一次同斯大林见面。刘少奇接到毛泽东来电，12月20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次日刘少奇起草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名义给毛泽东电报：“大家赞成如果苏联同意现在签订关于旅顺、借款、航空及通商诸协定，恩来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12月21日，毛泽东应邀出席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12月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二次会谈。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李富春、叶季壮、伍修权、吕东、张化东、欧阳钦等一行离开北京赴莫斯科，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等会谈。2月6日，中华民国空军轰炸上海（二六轰炸），中共要求苏方提供空军保护，斯大林同意，但提出苏中签订一个秘密协定，规定苏联远东边疆和中亚地区、中国东北和新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不许第三国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投资的工业、金融、商业和其他企业、机关、公司

和组织从事活动”，毛泽东不肯签订此文件，但同意把它作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废除。

对华经济援助

1952中国访问团访问苏联莫斯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重要外交活动，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前往莫斯科访问两个月。主要目的是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并争取苏联经济援助，双方同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重新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中苏同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上依赖苏联。

可是，中苏条约谈判的反复使斯大林和毛泽东心存芥蒂。如果不是4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在苏联最需要援手时出兵朝鲜，苏联履行各项经济协定程度不一、中苏经济关系发展难以预料。

而朝鲜战争期间，苏方向中国提供不少军事援助，包括一千架米格15型飞机，以及对东北和中国运输系统军事工业援助，由苏方援助中国现代化和机械化武装部队，一直在朝鲜停留到停战之后，中国生产出模仿和复制的苏式重型大炮和坦克，在苏联许可下开始自行生产米格飞机，同时中国海军配备由苏联提供后由中国仿制潜艇。但是由于关系不稳，这一时期苏联大量向中国提供较先进军事技术及中国仿制苏式武器，很大程度是因为苏联高层争夺斯大林继承所致，苏联对中国援助仅主要集中在建国初期。

1950年2月14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12亿卢布（合4亿美元）贷款协定，年息1%，期限5年，规定用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苏联交付给中国的机器设备与器材的支付。1950年全年这笔贷款支付2.4亿卢布。在三年恢复时期中国中央政府总投资62.99亿元中，这项苏联贷款所占比例14.3%。

1951年2月1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苏联向中国贷款12.35亿卢布，用以购买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需要的军事装备弹药和铁路器材。规定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入朝作战以前的以全价付款，以后的军事装备和弹药以半价付款，铁路器材以75折付款。1951年4月10日、9月12日毛泽东与斯大林在电报中商定两笔用于抗美援朝的追加军事贷款约10亿卢布。1952年11月9日，中国向苏联签订10.36亿卢布贷款协议，购买60个师装备。

另外，苏联政府帮助援建恢复经济急需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50个重点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因情况变化，撤消1个项目，合并2个项目，实际建设项目为47个。涵盖以下行业：一、能源工业，二、原材料工业，三、民用机械加工，四、国防军工，五、造纸工业，按国家统计局1953年3月11日统计报告，3年累计实际进口46974万卢布，完成合同68.7%。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急需得到中国共产党支持。据俄罗斯解密档案记载，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礼物。果然，在这次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庆典期间，赫鲁晓夫改变斯大林过去大国沙文主义做法，废除中苏关系中一些不平等约定，议定从旅顺撤军和交还基地，在谈及撤军时毛曾说“我认为苏联军队此时撤出旅顺和大连是不合适的”（当时的考虑是因为怕美国可能会再开战），但因赫态度坚决而作罢。对于提供常规武器，苏联也改变斯大林时期主要提供已淘汰旧品的做法，改为提供现役新装备样品和生产技术。

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重点是称为“156项”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而提供技术是免费的。1952年中国制定“一五”计划时，斯大林同意帮助建设141项重点工程，1954年赫鲁晓夫又追加15项并提升质量，成为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著名“156项”。后来落实工程共150项，其中44项是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制造厂。赫鲁晓夫时代对中国提供最重要援

助，是帮助建造核弹、导弹生产企业并提供相应技术。

1956年10月21日，苏共中央通知中共中央，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当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波兰问题，由于情况紧急，讨论结束时毛泽东立即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毛泽东答复尤金同意派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议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于10月23日赴莫斯科。10月22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一次约见尤金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10月23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20万人参加之示威游行；当晚中共代表团在住处同赫鲁晓夫交谈，赫鲁晓夫称了解到中国方面之意见，所以改变方针，准备承认波兰新领导；波兰问题在中共中央之积极推动下，比较稳妥解决。同时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纳吉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10月25日政治局会议又选举卡达尔担任中央第一书记；10月23日晚中共代表团得到匈牙利发生暴乱之消息，刘少奇立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从10月24日到10月31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之电话联系。10月29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林加宁3人来到中共代表团住处，再次就波匈事件与中共代表团会商；谈话中间，毛泽东与刘少奇通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刘少奇在向苏方转达上述

意见时还说：“我听毛泽东同志说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0月30日，在中苏方会谈基础上，苏联发表《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采纳中共关于社会主义之间也应该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意见，苏联自我批评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之错误，中国政府立刻在11月1日声明支持苏联政府之宣言。10月30日，中共代表团从米高扬来自匈牙利之报告中，了解到匈牙利纳吉政府已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多党制，并解散保安队和保安机关，暴乱分子烧死、绞死、活埋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人，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共代表团经过讨论认为，一个是进攻之方针，即用苏联之军队压下反革命；一个是退让之方针，即苏联从匈牙利撤军；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我们是不是把这两个意见都提出来同苏方商量？”毛泽东同意，同时提出暂时不忙作决定，看多少天以后再说；如果采取进攻政策，要等更多反革命暴露、人民看清楚之时，比较适当；中共代表团向苏方提出意见：在还可以挽救的时候，是不是尽最后的力量把它挽救一下，匈牙利问题同波兰问题性质不同，应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苏联领导对匈牙利已经完全绝望，一致认为匈牙利政变已经完成，没有采纳中方之意见。10月31日晚，赫鲁晓夫等人到机场为中共代表团送行，说苏共主席团已经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之方针；11月4日，以卡达尔为总理之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同日应卡达尔请求，苏军重新回到布达佩斯。11月1日刘少奇、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当晚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汇报；11月2日和11月4日，毛泽东分别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乘专机飞往莫斯科，是毛泽东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11月6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纪念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午赫鲁晓夫作长篇报告，下午毛泽东第一个讲话。11月1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中，毛泽东在赫鲁晓夫宣布开会后第一个讲话；11月16日会议结束，通过会议宣言（又称《莫斯

科宣言》)；11月19日，除南斯拉夫以外，12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在宣言上签字。11月16日，召开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1月19日结束。11月21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回到北京。

据前些年已经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记载，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从1957年末起，苏联开始履行协议，对华提供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事业起步最早样品。翌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千名专家，建成湖南和江西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核实验场，中国进入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新阶段。

1953年至1957年，赫氏上台之初，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重要时期。中国通过等价交换的外贸方式，接受苏联和东欧国家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建设以“156项”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一大步。以“156项”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限额以上项目）为重点工业建设，中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从1950年第一个项目开始建设，到1969年“156项”实际实施150项全部建成，历时19年。其中建设高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至1957年底，“156项工程”中有一半以上项目已按期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在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要求中苏共同在中国南部沿海建设一座大功率之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信之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以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之潜艇；苏方提出建设费用由中苏分担，中方出资30%，苏方出资70%。6月12日，彭德怀覆函马利诺夫斯基，表示中方同意建台，但全部费用应由中方负担，所有权属于中国，技术方面可请苏联专家协助，建成后可由中苏共同使用。7月11日，苏方对中方要拥有电台之全部所有权这一原

则性立场不予重视，于中方提出之协议草案中仍坚持由中苏双方共建和管理；对此，中方提出修改意见。毛泽东强调说明：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提出苏联要求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两国建立“共同核潜舰队”，毛泽东当即拒绝；毛泽东看作是苏联企图控制中国之严重步骤；7月22日毛泽东约见尤金，历数苏联对待中国之老子党作风和大国作风。毛泽东之态度使赫鲁晓夫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动身，秘密来华向毛解释。7月31日赫鲁晓夫抵达北京向毛泽东解释共同舰队问题时，曾就长波电台问题向中方表示，电台最好由中方自己搞，所有权是中国的，苏联可以提供贷款和技术。毛泽东在和赫鲁晓夫会谈期间，只字未提计划炮击金门；不过，赫鲁晓夫秘密访华，引起美国种种猜测；8月3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双方就目前国际形势下两国所面临的在亚洲方面和欧洲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充分地交换意见，并且对于反对侵略和维护和平所应采取的措施达成完全一致的协议。”8月3日，两国国防部长在北京签订相应之协定和有关订购设备和聘请专家之合同。

1959年年6月，赫鲁晓夫通知中国“暂缓两年”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制造技术。1960年7月16日，苏联照会中国，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专家。至1960年9月1日全部召回1390名苏联专家。苏联援建中国的304个项目，到1960年苏联撤离专家前，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149项，尚未完成的有155项。

苏联技术援助还是大大加快中国“两弹”事业进程。在不到10年时间内，中国以几十亿元人民币费用就建立起配套国防工业基础，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创造成本最低和规模速度空前纪录。

1950年代，苏联对中国贷款共13笔，总计56.76亿卢布。

经济建设贷款共四笔12.5亿卢布；

抗美援朝贷款共七笔44亿卢布；

苏军自旅大撤退时剩余物资一笔7.23亿卢布；

移交中苏合营公司的苏联股份贷款一笔2.78亿旧卢布。

至1960年，中国已经向苏联出口72亿卢布的货物用于偿还贷款与延期付款的苏联援建中国重点工程项目的费用，还需要继续出口79亿卢布的货物以全部还清（其中贸易欠款20亿卢布，其它为贷款本息）。1961年3月苏联对中国的50万吨古巴蔗糖贸易贷款3.296亿1961版新卢布（1新卢布等于4.45旧卢布）。1961年4月，中苏双方达成协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中国在1965年主动提前还完所欠苏联债务。苏联对中国的贷款总计约为80亿旧卢布，加上利息，自1950年以来，中国对苏联的债务86亿人民币。

关系破裂

1960年代，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苏联政府于1960年7月1日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之苏联专家，而且不等中国答复，在7月25日就通知说，在中国工作之全部苏联专家都将在7月28日到9月1日期间全部撤走。当时苏联专家共1,300多名，分布在200多个经济、国防、文教、科研企业和部门；专家全部撤走，使中国设计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建设项目停工，试验生产不能按期投产，对中国经济困境雪上加霜。7月31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周恩来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资问题向会议作报告。

1961年10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正式中苏决裂。中国共产党最后一次出席苏共大会。中苏决裂后，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也大大减少直至终止。而1970年代后期起中国与日本走得很近，因此中国官方媒体支持日本要求北方四岛的运动。苏联逼债也成为在中国民间家喻户晓的事件。苏联于1972年对其远东地区地名进行变更。

关系缓和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紧临中国的苏联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塔什干讲话”，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被认为是勃列日涅夫政府的对外政策变动的讯号。

1989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会见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等领导人，是自中苏交恶三十年来两国领导人首次正式会谈。这时正值六四事件前夕，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大批群众，接待仪式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改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陪同戈尔巴乔夫在停机坪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后中苏关系由中俄关系继承。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8%87%E4%BF%84%E5%9C%A8%E4%B8%AD%E5%9C%8B>

简介

《苏俄在中国》初稿仅4万字，由陶希圣执笔。蒋中正在阅读后拍案叫绝，不断下令增加篇幅，一再补充至15万字，分为“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反共斗争成败得失的检讨”、“俄共‘和平共存’的第一目标及其最后的构想”及“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等四部分。

1956年12月1日，蒋手著《苏俄在中国》一书宣告完成。1956年12月25日，在台湾出版。曾任蒋中正秘书的楚崧秋表示，蒋中正曾以一年半的时间完成此书，他所花的精力和时间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一篇原约五、六万字的文章，经过蒋中正不断地增补、修改，到定稿出书，竟成为多达24万字的巨著；“一字一句，无不是蒋公心血的结晶。”

1956年，沈剑虹出任总统府秘书，翻译《苏俄在中国》一书为英文。

1957年6月24日，《苏俄在中国》再版，英文版由美国纽约 Farrar, Straus and Cudahy（法拉尔史特劳与贾德希公司）出版。同时在台湾再发行一次中文版，中国国民党同时在台湾与美国展开宣传工作；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指示党员、军人“认真研读”，并组织座谈会发表心得。日本《每日新闻》还刊出20篇摘要。

1969年，行政院新闻局取得法拉尔史特劳与贾德希公司同意，交由中国出版公司再版《苏俄在中国》英文版及其后各种外文版13种，销行全球。

译本

《苏俄在中国》英文初版，由沈剑虹翻译，出版时间：1956年。

《苏俄在中国》英文再版，由沈剑虹翻译，美国纽约法拉尔史特劳与贾德希公司出版，出版时间：1957年6月24日。

《苏俄在中国》日文版，由寺岛正翻译，日本时事通信社出版。在中正纪念馆有展示。

《苏俄在中国》韩文版，由中国学会翻译，韩国隆宇社出版。在中正纪念馆有展示。

http://www.ccfed.org.tw/ccfed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id=169&Itemid=256

《苏俄在中国》

- 第一编 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
- 第二编 反共斗争成败得失的检讨
- 第三编 俄共“和平共存”的第一目标及其最后的构想
- 补编 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

http://www.ccfed.org.tw/ccfed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id=172&Itemid=256

第三编 俄共和平共存的第一目标及其最后的构想

第一章 俄共世界革命的战略及其战争方式的演变

第二章 俄共战争思想的来源及其基本原则

第三章 俄共世界革命战略中和平共存的最后构想及其进行的方略

第四章 结论——世界和平之路与我们反共的信心和立场

=====

（以下引述《苏俄在中国》第三编第二章部分相关文字）（全部原文请见上述网址链接）

http://www.ccfid.org.tw/ccef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092:2014-06-12-01-22-17&catid=171&Itemid=256&limitstart=0

第一节 战争目标与战争型态

我们首先检讨侵略者与反侵略者的战争目标。克劳塞维茨以为战争规模及其努力的大小，乃决定于战争的目标，即战争之政治目的。克氏以为在战争的相互作用来说，双方所用的力量，作战的规模，以及其所追求的战果，应该是猛烈无比的竞争，没有限界的。但在现实战争中，由于政治目的之不同，而战争亦即有各种范围和程度。有些战争不过是对敌人的威胁或示威，而促使其谈判。有些战争不过是要占领敌人的一部分领土，而迫使其接受某种条件。这种战争，都是有限战争。反之，如果战争具有强大的政治目的，例如占领敌人全部领土，或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则其战争即可呈现绝对战争或无限战争的状态。（注）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轴心国作战的政治目的，在瓜分世界，而其战争即为绝对性的无限战争。同盟国的战争目标，是要求轴心国无条件投降，而其战争亦为一种无限战争。

但在同盟国之中，民主国家与苏俄虽并肩作战，而其战争目标，却各有不同。当时盟军最高统帅美国故罗斯福总统所抱的战争目标，乃是一个世界永久和平的理想，而联合国组织及其宪章，就是他实现这一理想的具体方案，我中华民国政府竭力赞助这个方案，而且是联合国组织草案的起草国之一，也是联合国组织发起国之一。直至今日，我中华民国始终是基于正义的原则而为联合国忠实的支持者。

但是苏俄的战争目标，却是一个无限战争的现实性的计划。他对西方，要分裂复国，并吞东欧；对东方要毁灭日本，来打开他东侵太平洋的窗户，并且并吞中国，来实现其从北平经加尔各答，向欧洲迂回的野心。从德黑兰会议到雅尔塔会议，都是他为了战后的世界战略而奋斗的外交战场。不料在这外交战场上，同盟国的战后理想方案，乃为苏俄的战后扩张侵略计划所击败。

一九四五年四月和八月，德国与日本皆无条件的相继投降，一般同盟国皆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胜利了，民主国家的无限战争也就结束了。但是，同盟国的胜利，只是军事的胜利，而同盟国的战争目标，却被苏俄雅尔塔密约所毁灭，致使这一军事的胜利，同时就是政治的失败。而第二次大战也就没有真正结束。民主国家的原子武器虽然提早了日本的投降，却没有挽救其政治的失败，更不能阻止苏俄的侵略野心。于是苏俄在大战中所制造的逆流，到了战后，乃就发展为其对自由世界的无限战争，而长期的延

续下去。

纳粹法西斯主义与布尔雪维克两者同在第一次大战末期以后发展，亦同为极权侵略主义，同为民主政治的仇敌。纳粹主义者的战争思想就是对其国内组成极权政府，来对世界进行其总体战。他对敌国施展其闪击战以前，亦要先用神经战使其敌人陷入心理矛盾，政策动摇的状态。他就敌国进行其武力战之时，更要指使其第五纵队，制造其奎士林式的傀儡政权，且大肆宣传其建立世界的「新秩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欧洲是这样做，近卫和东条对亚洲也是这样做。他们这一战法是与俄共相同的。但是俄共与纳粹主义政治作战的战术，却有其大不相同的处所。第一、纳粹主义采取民族斗争的方式，反之，俄共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纳粹主义的民族优越感，表现为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压制与征服；反之，俄共的大斯拉夫主义，则标榜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于是俄共乃以控制世界各国共产党为工具，来统治整个世界。第二、纳粹主义直接攻击民主政治，而煽动民主国家之内的反民主的运动，来破坏民主国家的组织。反之，俄共则在民主国家之内，利用「民主与自由」，使民主政治陷于混乱与瘫痪的状态。第三、纳粹主义使用其本国军队直接作战，侵入敌国。反之，俄共并不使用其本国军队直接作战，而指使其第五纵队，煽动敌国内部的阶级战争，或挑起民主集团内的利害冲突，相互斗争，特别煽动其东方民族对西方旧殖民地主义的民族战争，使其替俄共间接作战。俄共的侵略战争有了这三个特点，所以民主集团如以其对抗轴心国坐待错误的心理来对抗共产集团自铸错误，那必将招致不能自拔的错误。

过去轴心国的侵略无止境，今日俄共的侵略更是无止境的。但是过去轴心国以其军队直接作战，而侵犯民主国家所不能放弃的盟邦，或袭击民主国家的领土，民主国家乃起而应战。于是希特勒终于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

而招致最后的失败。 今日俄共决不愿重蹈纳粹主义的覆辙。 他并不使用其本国军队直接侵入敌国或其敌国的任何盟邦，而采用其迂回战略与间接作战，就是一面利用其政治战术与和平攻势来麻醉其敌国，而一面又利用中立主义，来瓦解自由世界反侵略的盟约，同时指使其第五纵队即各国共产党，在中立主义国家及其敌国和他的与国之内，制造其「和平转变」。所以俄共决不像纳粹那样，先使用其本国军队，直接袭击其敌国或任何民主国家的领土，而是施展其和平攻势与中立战术，从其外部来孤立他，从其内部来瘫痪他，到了最后俄共使用其本国军队，对民主国家实行奇袭之时，这个国家已经在政治与心理战场上完全失败，而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或某一种武器所能挽回的了。 所以民主集团等待俄共的军事袭击，再施行报复，是与其等待共产集团的内部自动崩溃，来求取和平，一样不能阻止俄共的侵略，保障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所以我在本章中，要对共产集团无限战争的特点，以及民主集团应该采取的对策，加以研讨。

（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八篇，第六章，第九〇至九六页。

第二节 共产集团的战争目标与民主集团对苏俄政策的对照

苏俄对自由世界的侵略行为，目的是什么呢？ 他的战争思想和政治目的，将在下一编中详加研讨。

兹先就其侵略的行为和目的，略予分析如下：

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实施其全民武装和长期动员；

二、以共产主义，建立其集体经济和奴役社会，摧毁一切资本主义；

三、以国际性阶级斗争，摧毁世界各国民族主义和民族文化；

四、以唯物主义，消灭人性与一切宗教信仰，箝制学术与信仰的自由；

五、以共产帝国的苏维埃制度，为政治组织的典型，毁灭其它一切国家的组织，而统治整个世界。

俄共为达到他这狂妄无比的征服世界的目的，采取了无限战争的绝对型态。他对自由世界的战争，没有时间的限期，亦没有空间的限界；他可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战场，从一个方式转换为另一方式；向敌人的内部展开其渗透、宣传、组织、政治谋略、颠覆工作，乃至武装暴动，而与其对敌人的正面所施行的经济、外交、文化、政治、心理的攻击，协调呼应；他每一行动都是为了配合其最后军事决战，他每一进展，都是从其最后决战的影响上估计其价值；如此继续不断无限度的向其最后决战的目标推进，不达其终极而不止。

今日自由世界与共产集团的斗争，乃是人性与兽性，光明与黑暗，真理与魔术之斗争；而不是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赌存亡，决生死。如果共产国际与共产主义一日不能消灭，则世界人类不仅无和平安全可言，而且人的生命与生活永陷于黑暗地狱，万劫不复，亦就无人生之可言了。由此可见，民主集团对于世界人类所负的任务之重大，是史无前例的，但其对苏俄集团所持的目标，却与其所负的任务完全不能相称。民主集团所负的使命是什么呢？

一、消弭侵略世界战争的威胁，保持世界的永久和平。

二、保持全人类生活方式的自由，及其经济社会的和平发展。

三、保障世界各国的独立，及其民族文化的交流。

四、维护学术思想与宗教信仰的自由。

五、解放共产铁幕，消灭共产主义征服世界的祸根，使国际社会成为国家自由、民族平等的世界。

但是民主集团今日反侵略斗争的目标和计划却是有限的。就是只要求其能

维护现状，求得苟安而已。 由于其所采取的现状政策与苟安心理，所以他有时虽能争取局部的主动，但终久是仍陷于被动的地位，他虽亦可以局部的阻止共产集团的军事进展，却不能防制其政治颠覆和经济的侵略。 以下各节，将对民主集团所持的几个观念，及其所面对的几个问题，加以商榷。

第三节 新殖民地主义与旧殖民地主义之争的结果

前节说到俄共对自由世界作战的最后目标，是摧毁资本主义，破坏民族主义，消灭民主主义，箝制人类自由。 但在其无限战争进行的过程中，他对于东方民族主义，仍然尽力利用，作为其政治作战的重要资本。 俄共说道：

「在世界各地飞扬的无数火花之中，我们不知那一火花将要燃起大火。 我们必须努力工作，把一切的一切，即令其为最古老的，最陈腐的，以及似乎没有希望的东西，都要搅他起来。」

「我们不应该放过敌人政策之中，可以浸穿石头的任何一滴水。」（注）

欧洲帝国主义者的旧殖民地主义，在东方所激起的民族主义，今日是在继长增高之中，而其所拥有的繁殖人口，又是俄共所认为强大的后备军。 那我们就不难想象俄共要怎样来利用他，作为他打击这旧殖民地主义的主要

武器了。

三十年来，俄共侵略世界计划以我们中国为其第一目标，。。。。。。
(本节引文以下略)

第四节 东方民族主义彷徨歧路——共产集团与西方集团对东方民族政策的区别

。。。。。。(本节以上引文略)

(乙) 俄共对民族主义的两个政策

西方人以为东方民族的文化，是与共产主义不兼容的。而且东方人，就是我个人，亦一向认为共产主义决不能赤化中国的。然而苏俄共产主义今日竟能在亚洲很快的发展，尤其是他在中国的赤化，为什么会如此容易呢？如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先研究苏俄对铁幕内和他对铁幕外的民族政策及其方法，有什么特殊的奥秘没有？这个问题最好的说明是列宁一九一三年对民族主义的两个答案：其一、对于一个民族，应否反抗其它民族的压迫，他的答案为「绝对的是」；其二、对于一个民族，应否为了他的文化

而求民族的发展，他的答案则为「绝对的否」。（注一）今日苏俄就把这二种性质相反的答案，却使用他的辩证法，给他巧妙地运用得十分成功。故其苏俄今日对于铁幕外旧殖民地的民族，应用这个第一答案的方法，就不去破坏其铁幕外东方各民族的固有文化，亦不来直接发展其共产主义的文化。不仅如此，而且他们唯恐东方各民族觑破其共产侵略主义的本质，拆穿其援助民族独立的幻术，所以他积极伪装起来，极端的要隐蔽其共产主义的一切真相，使他们这些民族，都不觉得共产主义对他们有什么危险或不利的地方。即使他们对当地的共产党的破坏其经济，摧残其文化的行动有所不满，但苏俄并不承认是与他有什么关系，这亦就是他今年所以要解散其共产国际情报局的一个最大原因。因之，苏俄对于东方民族，只有利用其固有文化，来反抗西方旧殖民地主义，而决不表示其有任何轻侮的态度。同时他对于东方各国现有的经济与生活，亦并没有直接加以剥削，而且只是为其经济与生活现状大抱不平，来支持其反旧殖民地主义的斗争。但是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一朝沦入其共产帝国铁幕之内，那就是要实行其列宁的第二答案，非在其莫斯科的民族政策，即其所谓「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公式之下，完全变成为斯拉夫的奴隶不可了。

（注二）

至于今日共产铁幕外的东方民族，其急迫的要求，第一是政治独立，第二是经济解放与生活自由，第三是他们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潜在于其民族感情之中，而力求保卫其固有文化。第二次大战之后，西方国家对于其东方的殖民地大部分的放弃，使其在政治上皆能成为独立国家。当然这是旧殖民地主义者，对亚洲政策的重大进步。。。。。（略）

因之，俄共的统一战线与中立主义的战术，乃得以投其所好，乘机施逞，使东方民族的心目中，认为中立就是独立，而又得到苏俄的援助，与中共的支持，在「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地主义」的口号之下，放手对西方国家作坚强的斗争。而在斗争中，民族主义的感情，愈加激昂，更顾不到将来有什么关进铁幕的后果。我要在此提出一个苏俄在中国事实的先例，当民国十三年夏秋之间，我们国父在广州建立革命政府，其根基未臻稳定期间，就有香港银行的买办陈廉伯，筹集大量武器和金钱，接济广州反动商团，企图叛乱，来颠覆我们革命基地，苏俄乃自动提议愿以无代价的供给我们军械。后来反动商团实行武装叛乱时，苏俄武器亦正在这个时候运到了广州。第一批步枪八千枝，随后第二批包括野炮六门，步枪三千枝以及其它机关枪手榴弹等，共计总数为三千吨，这是苏俄与我们第一次和平共存时期在广州所供给我们武器的总数。后来在二十六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苏俄根据易货协议，至三十年春季为止，供给我们大小各种飞机八百四十九架，还有其它高射炮，七六口径野炮等少数武器，这是苏俄在我们抗日战役中以易货的代价所接济的东西。当然，这对于我们当时孤军苦斗，单独抗战的四年期间，是有其相当效力的。但是我们在这北伐和抗战两大战役中，接受了苏俄这些武器的援助，其结果究竟如何？实际的经历告诉我们：苏俄与我们中国在这两次和平共存期间的援助，亦就是他的第五纵队——中共对我们这北伐和抗战的战役中，进行其政治渗透和武装颠覆阴谋的媒介。他对我们的渗透和颠覆工作，乃是与其对我们和平共存时期中的援助，同时开始。他决不让我们从反旧殖民地主义的斗争中获得独立自由，他是要乘我们反殖民地主义的斗争中，扩张他第五纵队——中共的势力，来颠覆我们的国家，奴役我们的人民。这就是我们中国在其和平共存中所得到的教训。这一教训，使我们对于今日苏俄中共对中东和南亚的整个阴谋，看了格外寒心，我希望亚洲和中东的非共国家，对我这一段现实的经历，乃能有所了解，而知所警惕。

今日苏俄对中东和南亚的非共国家，提出军事和经济援助，同时中共，在其俄帝指使之下，口口声声都是「和平共存五原则」，尤其是所谓「互尊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更未曾暴露其共产侵略主义的狰狞面目。于是俄共新殖民地主义乃乘机向这横亘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广大地区，进行其政治经济的渗透。而「和平」与「中立」的口号，乃构成这一道桥梁，竟使东方民族一方面才脱离旧殖民地主义残余的势力，而一方面又走到共产帝国铁幕的边缘，堕入其新殖民地主义的深渊，亦不知自悟了。

以上的说明，乃是根据共产主义在我中国进展的过程，亦是我们在大陆上所亲历的教训，并且体认俄共三十年来，在亚洲侵略行动的辩证规律中所得结论。恐怕西方国家和东方民族，到今天都还不甚了解这些历史的事实吧？

（丙）东方民族的敌人是谁？——西方国家与东方民族如何协力互助来抵抗其共同敌人。

今日俄共的迂回战略，把他的侵略的锋外交部，从中国转到南亚和中东。这一广大地区的非共国家，成为冷战的对象，而共产集团乃是这一冷战的主体。共产集团进行冷战的目的，就是要转移中东民族主义到共产集团的那一边，改变侵略者与反侵略者双方实力的对比，并且改变其亚洲和中东战场的战略形势。

大家知道苏俄乃是西方国家在亚洲和中东的敌人，因为他利用东方民族主

义来打击西方国家。但在实际上，苏俄亦是东方民族的真正敌人，因为他要驱逐西方势力于中东之外，才能对东方民族施行其和平转变的政治战术，和各个击破的军事战术，来完成其在亚非新殖民地的铁幕奴役政策。这就是说，西方国家与东方民族的共同敌人乃是苏俄。但是他们双方却在这个共同敌人的和平共存与中立战术的安排之下，互相斗争。这亦就是今日中东危机之所在，而实为自由世界反共战争中，所应首先解决的根本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西方国家对于东方民族，乃有重新研究其整个亚洲政策的必要。

如前所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共产铁幕以外的东方民族，已经多数得到他政治独立，现在不过要求其经济的解放和主权完整。而在共产铁幕以内的东方民族，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归还其统一的祖国，解放其被奴役的生活。这铁幕外的民族主义运动，与铁幕内的反共革命运动，实为自由世界中反共产反侵略的最大潜力，而且这也正是东方时代精神的焦点。。。。。（本节引文以下略）

（注一）列宁全集第十七册，第一四六页。陶斯特「苏俄的政治权力」第五四至五五页引用。

（注二）苏俄一九二五年所定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民族文化是什么？就是一个文化——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其目的在教育群

众以国际主义，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陶斯特「苏俄的政治权力」第八七页引用）

第五节 共产集团心目中的民主集团的战争思想

俄共对自由世界进行其无限战争，而其胜利的希望，乃寄托于民主集团所犯的错误，已如前述。在俄共的心目之中，民主集团错误的根源，就是寄托于他西方旧式的现实战争和有限战争思想上。并且这一旧式现实战争和有限战争思想，又构成下列几种错误观念：

（甲）在军事上，唯武器论的思想

军队的组织，战争的原则，都是社会政治的产物。战争胜败的结果，多半是取决于社会经济政治学术和心理的条件，不是单纯取决于军事，而军事作战的胜败，亦不是单纯取决于武器，这是俄共军事教育的要则。因之他苏俄及其国际共产党，对于其敌国，必先渗透其社会，影响其舆论，动摇其国家政策，打击其军队士气，结果乃使其虽有精锐的武器，亦不能在战场上发挥威力，争取胜利。在俄共的心目中，西方这唯武器论乃是唯军事论的末流，决不适于对抗他俄共今日间接路线和迂回战略的战争。

。。。。。（略）

（乙）在政治上裁军谈判与裁军运动

当第二次大战初告结束之时，民主国家努力复员。斯大林不仅申述其二十年至三十年没有战争的意见，并且利用其与中英法各盟国所订二十年或三十年和平友好的协议，（注一）来加速民主国家的复员工作，使其及早完成。而苏俄则乘此时机，推行其膨胀政策，几乎是从心所欲。但是到了他发动侵韩战争的时期，民主国家不得不宣布紧急状态，并加强其军备竞争。于是苏俄乃在韩战结束之后，一方面在联合国组织之内，进行其裁军谈判；一方面又在西方国家的内部，重新煽起其裁军运动。

一、先说明国际裁军谈判。我不拟在此讨论西方与苏俄双方裁军方案的细目，只是依据民国三十五年间，中国政府与共党谈判整军的经历，来推论将来俄共对于裁军谈判所采用的斗争方式。

（子）在谈判裁军问题时，共党最后必另提政治问题为裁军的先决条件。民国三十五年，中共与我们谈判整军时，他同时提出政治问题，就是要成立政治协商会议与改组国民政府，但是他最后又要在国民政府委员会中持有否决权。（注二）。。。

（丑）在谈判军队数字时，共党必使其对方减低其所保留的军队数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亦可减低他自己的数字。等到其对方实行缩编其军队的时候，他的军队并不缩编，且更加紧其军事动员。民国三十五年，中共与

我们所商定的第一期台军从354师缩编为90个师，共军缩编为18个师；第二期台军再缩编为50个师，共军再缩编为10个师。 我们政府就照这样实行了。 但是他不仅没有缩编为他自己承诺的十八个师乃至十个师，反而加紧动员，尽量扩编。（注三）。。。。

（寅）在谈判撤兵时，共党只求其对方从其所保持的阵地撤退。 到了对方已实行撤退时，他却提出一个政治条件，作为他拒绝撤退的口实。 这个政治条件就是他撤兵之后，必须维持他占据时期的政治权力。 民国三十五年，中共与政府谈判苏北问题时，他答应从苏北撤兵，但要求政府承认他在苏北的行政组织。（注四）今日苏俄所提的裁兵方案，要求美国从北大西洋公约国撤退其基地，他才撤退其华沙公约国的驻军。 我们可以预料，如果美国实行撤退其在欧洲的基地，则苏俄亦可撤退其东欧驻军，但是他必将保持东欧的共产铁幕与附庸政权。 这样他就可一面撤军，一面仍可随时进兵和增兵。 这种谈判即令其达到协议，对于世界和平与安全，究竟是否有实际利益？ 还是更使其加速大战的爆发呢？

（卯）在谈判国际观察时，共党必使国际观察的组织，有共党份子参加，可以供他利用来作宣传，并刺探其对方的军事部署。 到了国际观察团体要进入他的铁幕时，他就要借口政治问题来拒绝了。 民国三十五年，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出的军事调处小组，到我们台军的阵地来执行任务时，都得到我们台军的协助。 但是那派到赤峰、张家口，以及东北和苏北等地的小组，就被大陆的匪军拒绝或驱逐了。（注五）这共党不仅是三十五年在韩国如此，而其对于目前在韩国的停战监察委员会的实际情形，恐亦不能例外吧！ 。。。。

总之，共产党的裁军谈判会议这一斗争方式的目的，在一方面是瘫痪其对方动员备战的努力，改变其军力的优势为劣势；另一方面是掩蔽他自己的扩军备战，并准备他第二步的军事攻略，简言之，这是他和平共存的政治战术中之另一方式而已。

。 。 。 。 。

（丙） 在战力上，火力重于人力的思想

一、今日科学极度发达时代，本来在工业上，机器愈是进步，愈可节省其劳力。在军队中，武器愈是精良，愈可紧缩其兵员。在战场上，火力愈为雄厚，愈可制压其敌人。这一原则本是合理的。所以我认为民主集团今日准备机动的世界战略部队，拥有进步的核子武器与强大的火力，准备在未来对敌人的最后决战中，予以制命的打击，这一战略亦是正确的。但是共产集团正因为西方国家注重人道主义，重视人的生命，所以只有使其火力来代替人力的不足，于是他乃更不惜以人力消耗其敌人的火力，而尽力利用其人海战术。因为他是视人民为刍狗，为草芥，对于人的生命是毫无怜惜的；而且他今日控制着欧亚大陆这样繁殖的人力，更可用以设计更多的方法来对付你的火力了。所以俄共认为西方这一火力重于人力的思想，决不能对抗他的人力与空间居于绝对优势的无限战争思想。

。 。 。 。 。

三、在韩国战争中，联军虽能以火海战术打击中共匪军的人海战术，但是今后俄共集团决不使这一段历史重新上演。中共在韩战中所以不能对抗联军的火力，是因为第一、中共侵入韩国，以客军的地位作战，其人海战术受了后方交通的限制，不能发挥其绝对战争的效用。第二、中共在韩国作战，当时没有充分的火力，尤其是没有强大的空军，与其人力互相配合。这是他所以招致失败的两个基本原因。。。。。

。。。

。。。

（注一）苏俄于1942年5月26日，与英国订立为期20年之合作互助条约。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日，与法国订立同样条约。此在大战后均有效。至1955年4月9日，莫斯科竟宣布取消两约。

注2：本书第1篇第4章第21节，第1〇39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六节，第1029至1030页；第24节，第1045至1048页。

（注4）本书第1篇第4章第21节，第1〇39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节，第一〇三七至一〇三九页。

第六节 民主集团反侵略的基本政策和战略之检讨

我们在检讨反侵略的基本政策时，应该首先研究的，并不是对苏俄军事上如何作战的方法，而是在军事作战没有开始以前，他俄共对于自由世界的政策及其所施展的政治战术是什么？我认为他最大的一个法宝，就是其世界革命基本的政治战术——和平共存的欺世幻术。这个幻术亦就是他列宁传统的间接作战迂回战略所产生的。这是民主集团讨论对俄共的基本政策以前，必须特别加以注意的一点。现在我们要讨论民主集团已经实际采取及可能采取的各种政策。

。。。。（以下略）

美国与中国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7%BE%8E%E5%85%B3%E7%B3%B5%E5%8F%B2>

中美关系史是指中国和美国的 bilateral 关系的历史。美国于1783年正式独立建国，此时中国为清朝乾隆四十八年。

清朝

1784年，仅成立不到一年的美国，为开拓被英国所封锁的海外贸易路线，派遣战舰所改装的武装商船中国皇后号载着以人参、皮毛为主的货物，出发前往澳门港与清廷进行贸易。船只进港后鸣炮十三响作纪念，并挂起13星的美国国旗，是为美国国旗第一次在中国范围挂起。也很有可能是第一批拥有美国国籍的人进入中国范围。是为中美关系之始。

1843年，顾盛担任首任美国驻华专员，驻地在澳门。1844年，顾盛签署了美国与中国的第一个条约《望厦条约》。1858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后与美国签订《中美天津条约》。1862年，美国在北京东交民巷建立驻华公使馆。1878年，大清国在美国华盛顿设立永久性驻美公使馆，首任公使陈兰彬。

1882年5月6日，美国总统切斯特·艾伦·阿瑟签署的一项法案《排华法案》，成为《美国法典》的一部分。是1880年对《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的修订，允许美国暂停华人移民，美国国会根据修订的条约，很快就制定了这项法案。

1901年，清政府与美国等十一国签署了《辛丑条约》。1902年，美国政府

抗议俄国在义和团之乱之后拒不撤兵满洲违反了门户开放政策。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取代俄国取得满州南部，美国和日本共同承诺要维持在满洲的平等，但美国承认日本在华特殊利益（蓝辛-石井协定）导致减低门户开放政策的约束力。在金融上，美国努力维护门户开放政策，成立了一个国际财团。中国的铁路贷款通过它实现各国货币之间的兑换。1908年，美国免除部分庚子赔款，用于游美学务处的建设。三年间共组织三批近200人赴美留学。

中华民国

大陆时期

1913年5月2日，美国承认以袁世凯为大总统的中华民国，开始与北洋政府建立外交关系。1921年11月11日至1922年2月6日，召开华盛顿会议，签署九国公约，再次确定了通过门户开放政策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然而，这一次由美国、英国、日本、法国，以及中国共同签署的协定缺乏任何的实施细则；1931年日本侵略了满洲并建立起满洲国，门户开放政策也随之不存在了，使各国减少了约束力。

1928年4月4日，在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就南京事件分别在南京和华盛顿发表《宁案中美协定》。7月25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与国民政府代表财政部长宋子文在北平签订《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条约的签订意味着美国已正式承认国民政府。1935年，美国在华投资2亿美元，日本5亿美元；英国则是10亿美元，在上海最多，又是对外贸易最大港口。二战时期，美国对华进行援助。

1941年后美国与日本谈判，希望促使中日议和，蒋中正电告美国政府不得牺牲中国以谋求对日妥协，要日本从中国撤兵及归还侵占中国之土地。美国政府随后停止对日本供应战略物资，并要日本只承认蒋中正领导之国民政府，无条件退出全部中国领土。

1943年1月11日于华盛顿签订《中美平等新约》，分为中文及英文版本，两文效力相同。美国朝野普遍认为中国政府是中国民主化之希望所在。虽然中国推行训政与美式民主差距很大，但由于同为同盟国盟友，当时美国政府、国会、一般民众对于中国颇有好感；此时，中国抵御日本获列强正视与钦佩，国际地位提升。

1948年1月3日于南京签定《中美经济援助协定》，分为中文及英文版本，其中最特别是美方代表司徒雷登以中文签名。8月5日协助成立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即今中华民国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前身。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正式名称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特别着重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九年的阶段》，书中表示，国民政府在国共内战的失败，是中华民国政府本身的领导问题，与美国无关，美国在战后中国情势已尽力而为，最后失败应由国民党负起全责，是为“袖手旁观”政策。白皮书发表后，美国停止对中华民国的军事援助，严重打击了中华民国政府战斗的士气。

台湾时期

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于发表“不介入台湾海峡争端”的声明。但在1950年6月，因为韩战的爆发，让美国决定把台湾纳入西太平洋防御体系。7月29日，美国国务院指任命蓝钦（Karl L. Rankin）为驻华公使。

1953年2月27日，宣布任命蓝钦为美国第36任大使。1954年12月2日，于华盛顿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分为中文及英文版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

很多美国人对打着共产主义旗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信任，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会成为东亚的霸权国家，挑战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也有人质疑中国的人权状况、网络审查等，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人权保护薄

弱的国家。美国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夺取台湾，这里有意识形态和军事战略双重因素。同时，不少中国人认为，美国有意削弱、分裂中国，并通过对台军售、导弹防御系统等方法来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因此具有强烈的反美情绪。

虽然两国之间有很多分歧，两国关系还是有许多保持稳定的因素。中美两国是主要的贸易合作伙伴，在反对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虽然冷战的结束使两国失去了共同的目标，反恐战争的开始则令恐怖主义成为两国的新敌人，一定意义上起到了改善两国关系的作用。

建国初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头三十年中，美国从未外交承认这个政府并继续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保持外交关系，维持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是台湾海峡两岸的唯一合法政府。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华南之时，美国的驻华大使馆也随中华民国政府一起撤往台北，不过部分驻华领事官员们仍留在中国大陆，直到1950年才全部撤离。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建交的可能性也随之破灭。1950年年底，中共在中国发动“仇视”、“鄙视”及“蔑视”美帝国主义的三视教育运动，以清除当时中国社会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朝鲜战争后，中国共产党政权和美国的关系急速恶化，但双方都意识到对方的存在，1954年到1970年，北京政权和美国之间在瑞士日内瓦以及波兰华沙共举行了136次大使级会谈。

1970年代

1960年代末，由于苏联的威胁，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都意识到，改善双边关系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1969年3月中苏爆发珍宝岛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持续处于敌对状态，而中美关系则开始正常化。

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台后，为了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下令宣布

放宽对华的贸易限制。

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博士已经对北京进行了一次秘密访问，而他本人已经受邀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杭州以及上海，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尼克松返国前，中美共同签署了《上海公报》，这是一份表达双方对外交事务看法的声明。在公报中，两国承诺会为外交关系的完全正常化努力。美国认识到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并对此不表异议）支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将逐步减少在台美军设施和武装力量。这使得两国之间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台湾问题——被暂时搁置，使得重新开启两国在贸易以及其他领域间的接触与合作成为可能。

1973年5月，在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的努力下，美国政府在北京设立在华联络办事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在华盛顿设立类似的办事处。从1973年至1978年间，大卫·布鲁斯、乔治·布什、托玛斯·盖茨和伦纳德·伍德科克等美国大使级外交官先后担任过联络处负责人。

1975年福特总统访华，再次确定美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愿。1977年卡特总统上台后不久便重申上海公报的重要性。1978年12月15日两国政府宣布，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1980年代

1979年1月1日，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在《中美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公报》中，美国宣布断绝与中华民国（后美国称其为“台湾治理当局”）的外交关系，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再次重申上海公报中所提到的一个中国政策，认知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则表示同意美国人民继续与台湾人民保持商务、文化以及其他非官方的往来。美国国内的《台湾关系法》则

对现行法律进行修改，以鼓励台美之间的非官方往来。中美建交也对中华民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国民党召开11届3中全会应对此次冲击，决定与中共誓不两立、反共复国到底。

1979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美，开启了两国之间一连串重要、高级别的交流，这些交流活动一直延续到1989年，期间是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两国之间签署了多个双边条约，特别是在科技与文化领域的交流活动以及贸易交流。自1979年初开始两国就在《科学技术合作条约》的框架下进行了数百个合作研究项目。

1979年3月1日，两国正式在北京和华盛顿设立大使馆。1979年8月，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对邓小平副总理的访问进行回访。这次访问使得两国在1980年9月签署了在海洋领域、民航连接等方面的一些条约。

1980年代，直到1989年前，期间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期。随着1980年双方高层与工作层级接触的加深，两国开始在更广泛的议题上进行对话，包括全球与地区战略问题、政治、军事问题、裁军问题、联合国以及其他多边组织事务等。两国的关系在1981年美售中华民国武器后出现短暂危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面强烈反对美国出售武器予中华民国政府。1981年6月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访问北京，试图解释美国在与台湾维持非官方往来方面的政策。1982年5月，副总统老布什再度访华。两国在1982年8月17日签署的联合公报。在这第三个公报中，美国承诺将逐渐减少对台的武器出售，而中方则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中方的基本原则。1984年美国总统一雷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进行了互访，赵紫阳总理是首位访问美国的中国政府首脑。

1985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访问美国，这是中国国家元首对美国的首次访问。1985年10月副总统老布什再度访，并且设立了美在华的第四个总领事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1985年至1989年间双方进行了多次内阁层级的交流，1989年2月美国总统老布什再度访华。两国之间所进行

的文化交流活动令两国人民都对对方的文化、艺术以及教育成就都有更深的认识。许多中方的访问学者以及官派留学生到美国进行学术交流。

1989年六四事件后，绝大多数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对北京政府的行为表达了强烈谴责。美国停止高层和官方的交流，禁止出售武器给中国大陆，宣布对中国大陆实施多项经济制裁。在1990年夏天的七国集团高峰会上，西方国家敦促中国大陆在政治经济领域进行进一步的改革，特别是在人权领域。六四事件使得很多投资者对北京政府丧失信任。美国政府也在1989年6月5日和20日颁布命令与法令，停止了与中国的部分投资、贸易活动。部分制裁以立法通过，一些是行政命令，包括：

美国贸易与发展局（TDA）：自1989年6月起停止在中国大陆开展新的活动。这项禁令直到2001年1月才由克林顿总统宣布撤销。

海外私人保险公司（OPIC）：1989年6月起停止在华开展新活动。

发展银行贷款 / IMF贷款：美国不支持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进行贷款，除非要求贷款的项目与改善人权状况有关。

军需品出口：不向出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需用品发出许可令，除非出口被认为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

武器进口：禁止从中国大陆进口武器、酒、烟草以及枪炮；这项禁令在1994年5月26日被解除。

1990年代

1996年3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华民国第一次总统直接选举前夕举行军事演习，被解读为试图干预在中华民国总统选举——亦有人认为是表达对中国国民党候选代表李登辉的不满。选举期间美国出动了两个航空母舰舰群到台湾海峡。在台海危机解除后，两国关系也开始逐渐回暖，高层交流

增加，双边会谈取得进展，双方在人权、核不扩散以及贸易领域进行双边谈判。

1997年江泽民访问美国，这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是次访问中双方签署了官员贯彻1985年的和平利用核能源合作的有关协议等多份协议。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回访中国，走访了中国多个城市，并与中国人民直接接触，发表演说，向中国人民传播美国的理想与价值观。

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引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众游行示威。直到1999年末双方关系才恢复。1999年10月两国就赔偿伤亡家属及财物达成协议。美国仅承认是由于使用三年前的卫星地图导致误炸，但是大陆民众普遍认为以美国的军事、科技实力不会出现如此低级失误，并不接受误炸的解释。

2000年代

2001年4月中国一架歼-8II战斗机监视美国EP-3E侦察机对中国的侦察活动，两架飞机在南中国海区域相撞，美方侦察机迫降于中国海南省，中方战斗机撞毁，飞行员跳伞后失踪（后经确认丧生）。经过磋商后美国总统布什写信慰问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即“两个表示遗憾的信件”。美方人员在被拘留11天后返国。两国关系也随着此次事件的降温以及此后的一系列事件而重新恢复。

在911事件后中美关系从本质上发生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强烈支持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支持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支持美国等联军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并在塔利班政权垮台后向阿富汗提供了1.5亿美元的人道救助。911之后中美开展了反恐方面的双边对话。

201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也共同在地区问题上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朝鲜核问题上与美国进行紧密合作，中方在朝鲜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后表示强烈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希望维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努力下，朝鲜与美国开始了有关核问题的多边谈判，亦即六方会谈。然而到2009年朝鲜宣布退出六方会谈后，会谈已经终止，后多年朝鲜进行了核试爆和导弹试射，朝核问题至今仍然尚待解决。

2020年代

2020年5月28日，特朗普政府宣布中止对香港的关系税优惠政策。

2020年7月21日，美国要求中国在7月24日16时前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强烈谴责，并表示将做出反应。7月24日，中国宣布撤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设立和运行许可。

202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前总统尼克森的纪念图书馆发表演说，指责中国造成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扩散并实施“暴政”威胁美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自由、国家安全和民主，呼吁改变中共威胁自由世界的行为。蓬佩奥亦批评“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个破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真正信仰者”（英语：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is a true believer in a bankrupt totalitarian ideology），呼吁中国人民改变中共。2021年1月2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特朗普政府国务卿蓬佩奥等28人实施制裁。

（以上引文有部分删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8%88%87%E7%BE%8E%E5%9C%8B%E9%97%9C%E4%BF%82%E5%8F%B2>

北洋政府时期（1912年—1928年）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2月12日，清末代皇帝宣统帝退位。由于美国暂未承认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任命原清廷驻美使臣张荫棠为驻美国外交代表。1913年5月2日，美国承认以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开始与北洋政府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设立公使馆。1935年，两国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并升格为大使馆。1921年，召开华盛顿会议，签署九国公约，再次确定通过“门户开放政策”以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然而此次由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及中国共同签署的协定缺乏实施细则；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满洲并建立满洲国，门户开放政策随之不存，使各国减少约束力。

南京政府时期（1928年—1937年）

1928年7月25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与国民政府代表财政部长宋子文在南京签订《中美关税新约》，条约签订意味着美国已正式承认南京政府。中国抗日战争初期，美国不愿卷入中日战争；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7年9月14日宣布禁向中日两国运送军火。

重庆政府时期（1937年—1946年）

1939年6月17日，蒋介石接见美国大使约翰逊，促美国政府对日本封锁天津英、法租界事作严正表示。6月20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演说，指责日本

封锁天津租界及轰炸中国各地。9月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美国远东政策不变。

1941年8月26日，罗斯福宣布，美国将派遣军事代表团到中国，以实现《军火租借法案》之目的，该团由马格鲁德为团长，在陆军部长史汀生指导下执行任务。11月2日，蒋介石以日军集结越南，将进攻云南，切断滇缅公路，是日电请罗斯福总统利用影响，使英国与中国通力合作。11月26日，宋子文偕驻美大使胡适谒见美国总统罗斯福，谈中美关系问题。12月9日，罗斯福发表演讲，谴责日本背信弃义，进攻美国，并宣称：战争为长期、艰苦的战争，美国决不中途停止，决心作战到底；罗斯福致电蒋介石，美国已对日宣战，并申述加强美中友谊与共同奋斗，征服暴日，直至取得彻底胜利。

1942年1月4日，蒋介石电在华盛顿之宋子文，要求罗斯福派遣一位可资信赖之高级将领到中国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1月19日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推荐史迪威担任此职，1月23日美军总参谋长马歇尔通知史汀生表示同意。中国外交人员几经努力，1942年之前美国对华提供1.7亿美元贷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全力援华，1942年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无偿援助，并根据《租借法案》对华租借大量军事物资，包括“驼峰空运”。共产国际通过其自觉和不自觉之盟友，在中美摩擦中起很大作用；由于在重庆和后来在南京的记者反面报导，也由于共产党和他们的同路人同美国人和美国组织积极努力建立“统一战线”，蒋介石和美国盟友之间关系分歧不断加深。美军派员来华参战，包括“飞虎队”、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和第二十轰炸机队，以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所有上述援助合计，中国在抗战中所获美援总额达16.02亿美元，是所有国家中对华援助最多。

1943年1月11日，于华盛顿签订《中美平等新约》。1944年5月7日，蒋介石电告罗斯福，派商震将军为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

1945年1月，美国派赫尔利为美国驻华大使。4月，中国与美国、英国、苏

联在旧金山主持联合国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由副总统杜鲁门继任。6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奉总统杜鲁门之命，将雅尔塔会议关于中国方面之秘密协议转达中方，并促请中国与苏联成立谅解。中、美、英、法等50国代表在旧金山会议中，签订《联合国宪章》。7月，中国与美、英三国对日本提出劝降牒文。迈克阿瑟代表同盟国于9月2日在米苏里舰受降，中国派徐永昌参加签证。10月，美国定双十节为“中国友谊日”。11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12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希望中国和平统一，实行民主宪政。马歇尔奉派来华调解国共问题。

【注：由于本章的重点仅是1937年-1945年期间的中国，所以，对于其他时间的中美关系，这里并不深入分析。关于1945年以后至今的历史阶段，我们将会在本书后面章节中继续深入思考。】

日本与中国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China%E2%80%93Japan_relations

tions

中日关系史

中国和日本通过贸易，文化交流，友谊和冲突有着悠久的历史。1600年以前的跨文化交往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写作体系，建筑，文化，宗教，哲学和法律，其中许多是由百济王国引入的。贸易始于1860年代。在1912年推翻中国帝国之前，许多中国学生在日本接受了政治活动家的训练。1880年至1945年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战争和对抗，日本占领了台湾，满洲和中国大部分沿海地区。日本在1945年被击败并退出了中国。自1950年以来，由于朝鲜战争和冷战，两国关系一直很紧张。贸易在21世纪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日本在中国历史记录中的第一个证据（公元1–300年）

第一次提到日本列岛是在中国历史文本《后汉书》。从那时起，日本开始偶尔在中国历史文本中被记录。随着日本在该地区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大国，最终被不断记录下来。

日本公元600–900年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介绍

在隋朝和唐朝，日本派出许多学生到中国。

从中国带回的重要元素（以及一些通过百济传播到日本的元素）包括佛教教义，中国习俗和文化，官僚机构，建筑和城市规划。日本和服与唐朝的服装非常相似，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日本人开始穿着唐朝皇室所穿的长

袍，最终使服装与日本文化相适应。根据中国长安首都的风水因素，还计划了首都京都。在平安时代，佛教与神道教一起成为主要宗教之一。

到了10世纪，中国的帝国政府模式被停止使用，被日本传统的家族和家族对抗所取代。

首次记录中日战争

公元663年，发生了百济会战，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中日冲突。

这场大战的背景是新罗（朝鲜王国之一）试图通过与唐朝结盟来统治朝鲜半岛，唐朝试图击败高句丽。这场持续的冲突可以追溯到隋朝。当时，高句丽与朝鲜第三大王国百济结盟。大和日本以3万名士兵支持百济，并派遣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将军在日本东部和北部与阿伊努人作战。作为新罗征服百济的努力的一部分，唐朝，百济，新罗和大和日本之间进行了百冈之战。

这场战斗本身对大和军来说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新罗-唐联合舰队摧毁了大约300艘大和号船，数量是该舰队总数的一半。因此，日本对百济的援助在海上失败了，对陆上的援助无济于事。此后不久，百济（Baekje）在同年倒台。

百济被击败后，新罗和唐都专注于难度更大的对手高句丽，而高句丽在公元668年倒台。在大多数情况下，新罗曾与百济竞争，也对大和日本怀有敌意，后者被视为百济的兄弟国家。在新罗统一了大部分新罗邦之后，这一政策得以延续（大约在公元670-730年之间停顿了一段时间）。新罗统一了朝鲜，并从现在的朝鲜半岛击退了唐朝。大和日本被孤立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不得不与亚洲大陆建立新的联系渠道，因为它受到敌对者新罗的阻挠。

海上贸易的繁荣600-1600

中日之间的海上贸易已有很好的记录，许多中国文物都可以发掘出来。百济和新罗有时扮演中间人的角色，而中日之间的直接商业联系却更兴旺发达。

663年（同盟国百济沦陷）之后，日本别无选择（面对新罗的敌视，而新罗则受到唐帝国的排斥），直接与中国朝代进行贸易。起初，日本人缺乏自己的远程航海专业知识，但最终（可能是在在沦陷后逃离祖国的百济侨民的帮助下），日本人改善了海军实力并建造了船只。

宁波和杭州的港口与日本有最直接的贸易联系，并且有日本居民做生意。明朝宣布，宁波是唯一可以建立日中关系的地方。因此，宁波是这一时期许多日本使团的目的地。进入宁波后，他们又去了中国的其他城市。1523年，日本将两个敌对使团送往宁波；日本当时处于内战状态，即战国时期。其中一位使者是中国人宋素青，他早些时候曾移居日本。在十五，十六世纪，有一百名日本僧侣来访，他们与宁波，北京，杭州，苏州，南京，淮河和天津的汉族文人保持联系。宋素青开始与一个敌对的日本贸易代表团发生分歧。这导致了宁波事件，日本人在宁波附近掠夺，然后乘被盗的船只逃离，在途中击败了明朝的追赶舰队。为了报复，宁波港对日本人关闭，直到明朝结束为止。1633年后，日本决定关闭与外国的所有直接联系。德川幕府限制了与中国的直接贸易，但长崎除外。长崎拥有荷兰和中国的贸易站。萨摩省的岛津氏族还通过琉球群岛和北海道的阿伊努人进行了一些贸易。

日本在中国沿海的海盗和蒙古入侵1200–1600

从十三世纪直到丰臣秀吉在十六世纪末对朝鲜的入侵失败之前，日本的海盗（或“倭寇”）一直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不仅对中国和朝鲜，而且对日本社会都是一个问题。日本海盗通常来自日本社会的不良地区。日本人也非常讨厌他们，希望（在大多数情况下）摆脱他们（当时，日本遭受内战的摧残，因此，在朝鲜，中国和蒙古帝国享有相对和平、繁荣和财富

的同时，日本却处在艰难时期）。

丰臣秀吉在1592–1598年入侵朝鲜期间的明朝

丰臣秀吉是日本的三个统一者之一（另外两者是织田信长和德川家康）。征服毛利氏族和岛津氏族后，秀吉曾梦想最终征服中国，但需要穿越朝鲜。

丰臣秀吉在被高丽拒绝他穿越整个朝鲜进入明朝中国的要求的时候，便入侵了高丽。在1592年入侵的第一年，日本人在加藤清正（Katō Kiyomasa）的控制下到达了满洲（Manchuria），并与建州女真人（Jianchen Jurchens）作战。善祖（朝鲜国王）要求明朝提供援助，但明朝最初只派出了少量部队，而日军的进展则非常快。1592年冬在平壤进驻的小西幸永（Konishi Yukinaga）首次遇到并击败了一支5,000名中国士兵的部队。1593年，在中国李如松将军的率领下，有45,000人的中国人参加了更大的战事，并用炮兵占领了平壤，把日本人赶到了朝鲜半岛南部。但日军在Byeokjegwan战役中击败了他们。

1593年之后，中日停战了大约四年。在那段时间里，明朝想要撤退，并授予丰臣秀吉“日本之王”的头衔。但丰臣秀吉觉得这侮辱了日本天皇。作为退军条件的一部分，丰臣秀吉还希望明朝万利帝把女儿嫁到日本。中日关系因而进一步恶化，战火重新燃起。但是，日本第二次侵略朝鲜的战争，对丰臣秀吉来说远没有成功。这一次，中国人和朝鲜人准备得更加充分，迅速地将日本人困在朝鲜半岛南部，并包围了他们，直到他们最终被驱逐出海并被朝鲜海军大将伊孙申击败。此次战争对于日本而言固然是一次重大失败，但由于战争中的大量平民伤亡（在被占领的朝鲜城市中也屠杀了日本平民），朝鲜的城市，文化和乡村也受到严重破坏。此次中日之战还耗尽了明朝的国库，使明朝对满族无能为力。后者最终摧毁了明朝并于1644年创建了清朝。

此后，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采取了孤立主义政策，直到1850年代美国海军佩里准将使得日本被迫开放。

明清江戸时代德川日本

中国男人们向日本介绍了中国菜，美味佳肴，甜品和糖果；他们教会了他们的日本女友如何制作它们。在元禄时代（1688-1704年），一个中国人指示他的女友如何制作梅花形糖和米粉的软糖，称为“**kōsakō**”。Kagetsu Entertainment (Kagetsuyokyō) 的小册子中包含着这些有关中国男子教给日本女友的歌曲的信息，表明他们是用hu-kung（两弦小提琴）这样的乐器在Tōsō-on唱歌的；另外还有七弦琴（七弦扬琴）和yüeh-ch'in（琵琶）。长崎的日本女性被教导舞蹈，歌曲和中国传统的音乐。小精灵（yüeh-ch'in）被用来演奏这些Kyūrenhwan的歌曲。Kankan-odori舞，伴随着其中一首在江戸和京都演奏的歌曲，因而一举成名。最初的中国式舞蹈在江戸流行，因而幕府高桥樱卫门（1785-1829）派遣长崎官员来管理中国事务和艺妓。

明治维新和日本帝国1868-1931年的崛起

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展示了西方海军力量，这导致了《神奈川公约》和日本对西方贸易的开放。Senzai Maru 1862年前往上海的旅程告诉日本，关闭边界和拒绝改变的危险。从长远来看，它激发了人们的视野变得开阔，并激发了向外界学习的需求。日本领导人意识到有必要进行现代化，以避免中国在1840年代和1850年代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遭受的屈辱。从这些教训中，日本从孤立主义过渡到改良主义。在1850年代的明治维新时期，旧的德川幕府被推翻后，日本进行了结构性改革，导致了以西方帝国主义大国为蓝本的快速现代化，工业化，军事化和帝国主义。

与此同时，中国的满族领导人没有吸取相应的教训。1871年，北方大电报公司开通了连接上海到香港，新加坡，长崎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

的电缆，并连接到印度和欧洲。中国与外界的通讯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座座机电报于1881年在上海和天津之间开放。1871年，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与日本签署了第一份现代商业条约。作为外交开放的一部分，中国在东京，伦敦，柏林，华盛顿，马德里和圣彼得堡建立了使馆（1877-1880年）。每个人都对与中国数亿消费者的高利润贸易抱有乐观的期望。但是，这没有发生。到1890年，中国所有进出口总额的总价值仅为5000万英镑，低于许多较小的国家。中国太穷了，太自给自足了，太缺乏铁路来建立有利可图的贸易关系。

1880年以后的冲突

随着日本现代化建设并建立起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与中国的摩擦越来越频繁。这些摩擦热点包括，琉球群岛，台湾和韩国。日本建立了稳定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拥有一支规模不大但训练有素的陆军和海军，并且技术先进得多，以其在1894-95年第一次中日战争中的轻松胜利震惊了世界。日军在辽东半岛占领旅顺港后屠杀了中国人。在1895年4月严厉的《马关条约》中，中国被迫承认朝鲜的独立，并割让台湾、澎湖群岛和辽东半岛给了日本。中国还支付了2亿银两的赔偿，开放了五个新的国际贸易港口，并允许日本（和其他西方大国）在这些城市设立和运营工厂。但是，俄罗斯，法国和德国在条约中处于不利地位，在三重干预中迫使日本退还了辽东半岛。对中国而言，唯一的积极结果是这些工厂带动了中国城市的工业化，催生了当地的企业家和熟练技工阶层。

日本军队参加了外国军队联盟，在1900年镇压了义和团运动。中国人再次被迫支付另一笔巨额赔偿。但在美国压力下，日本只接受了少得多的赔偿金额。八国联盟内部之间的竞争，以及美国在中国所主张的门户开放政策，使得中国无法被划分为多个殖民地。

1905-1907年，日本在中国进行了进一步扩张，以扩大其影响范围，包括福建。日本试图获得法国的贷款进行投资，同时也试图避免美国在中国所主

张的“门户开放政策”。然而，巴黎虽然提供了贷款，但条件是日本必须尊重门户开放主义，并且不得侵犯中国的领土完整。

在1907年的日法协约中，巴黎确保日本承认法国在“中华帝国邻近领土的地区”所享有的“主权，保护或占领权”的特殊利益，这意味着法属东南亚以及法国在中国南部三个省份（云南，广西和广东）的势力范围内的殖民地财产。作为回报，法国承认日本在韩国，南满州和内蒙古的势力范围内的利益。

日本政府以本岛为基地，对中国的反清分子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在不同的时间，它以四种不同的方式对待孙中山：为他的事业提供支持，保持中立距离，迫使他离开日本，或是压制他的革命倾向。在最有利的阶段，日本政府提供的运作支持，使得孙中山和其他成员们成立了同盟会。从而，日本帮助他们于1912年推翻了清朝，并建立了中华民国。在孙中山于1915至1916年试图罢免袁世凯的过程中，日本也提供了支持，但孙的努力失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1条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军远征军迅速占领了太平洋上的所有德国人的产业。日本占领了德国的青岛殖民地，并占领了山东省的部分地区。中国在财政上混乱不堪，在政治上高度不稳定，在军事上非常薄弱。中国最大的希望是参加战后和平会议，希望在其中找到友国，以此有助于阻止日本扩张主义的威胁。中国于1917年8月对德国宣战，以此来使它有资格参加战后和平会议。北京计划向西线派遣一支作战部队，但从未如此。

英国外交官们担心美国和日本会取代英国成为对中国的经济贸易的主导力量。英国人力图在日本和美国之间挑起争端，同时又保持英、美、日三个国家对德国的合力对抗。

1915年1月，日本秘密向中国政府发出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最后通牒。《21

条》要求中国允许日本立即控制从前德国人在华的权利，以及在满州南部99年的租约、对钢厂的利益和对铁路的特许权。这些要求将使日本在中国境内具有强有力的影响，并使日本实际上成为中国的保护国。中国公布了要求，同盟国对此感到愤怒。华盛顿和伦敦成功地向东京施压，要求日本放弃这些要求。但是，日本试图坚持将福建省置于日本势力范围内的规定。然而最终，日本的收益微乎其微。它没有接管福建，并且在华盛顿和伦敦失去了声望。中国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中国被拒绝关于收复德国从前在山东青岛等地势力范围的要求，并且不得不继续对西方列强进行长期的让步。中国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对这一屈辱的主要反应是，五四运动中所表达的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中国的愤怒一直持续到21世纪。

第二次中日战争

在1920年代，日本试图通过条约制度来确保其经济利益，这一政策在1931年变得毫无意义，当时，随着满洲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人采取了更具侵略性的殖民兼并战略。1926年，昭和时代初期，日本人就想占领满洲资源。由于中国的脆弱性，日本人能够通过间谍，外交和使用武力在该地区赢得影响。1928年，日本人暗杀了控制满洲的中国军阀张作霖。1931年，日军发动了奉天事件，以此为全面入侵满洲和建立伪满洲国的理由。

在1931年至1937年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之间，日本人与中国各种部队之间发生了断断续续的冲突和交战。日本政府将这些活动统称为“事件”，以淡化现有的紧张局势。这主要是为了防止美国将冲突视为一场真正的战争，从而根据中立法案对日本实施禁运。这些事件也给中国施加了压力；日本要求中国签署各种协议以满足日本利益。其中包括：上海非军事化，《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这一时期对于中国民族主义者来说是动荡的时期，因为中国政府陷入了与中共内战的泥潭，并与残余的军阀保持了不安的休战。后者名义上与北伐战争后的蒋介石结盟。在此期间，中国国民党

在苏维埃和后来的德国顾问的协助下，对国民革命军进行现代化的改造。

1937年7月，在日本与中国军队在卢沟桥上发生的重大冲突之后，争端升级。这标志着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开始。中国民族主义力量通过与日本在上海的战役进行了报复。在上海的战役历时数月；中国完败；战役于1937年11月26日结束。

在这场战斗之后，日本继续向南和向西前进。在这些日本战役中，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严重战争罪行。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强奸南京；当时日军对民众实施抢劫，大规模强奸，屠杀和其他犯罪。在日军前进期间还犯下了其他（较少公开的）暴行；据估计有数百万中国平民丧生。

从1938年起这场战争演变为，中国人使用游击战术来阻止日军前进，并在必要时撤退到深处。由于供应线的限制，这最终限制了日本的进军—日本人无法充分控制偏远地区，但实际上确实控制了所有主要城市和港口以及空域。

第二次世界大战

到1938年，美国越来越致力于支持中国，并且在英国和荷兰的合作下，威胁要针对日本进行资源禁运。此时特别是，日本战机等战争机器亟需石油等重要材料的供应。日军在惨败于苏联军队后，想避免与苏联开战，尽管它本来可以帮助德国对苏联发动战争。日益受到石油供应中断威胁的日本海军坚持要求日本政府与美国开战；他们警告说，否则，中日战争将是一场高风险的战争，日本可能会败北，或者一定会成为三等军事力量，并且会丧失中国和满洲。日本皇帝正式做出了决定；1941年11月5日，一位重要的文职官员告诉他：

“从我们国内的政治局势和我们的自我保护的角度来看，不可能接受美国的所有要求。……我们不能让目前的局势继续下去。如果我们错过了开战的机会，我们将不得不服从美国的命令。因此，我认识到，我们不可避免地

必须决定对美国发动战争。我将相信所听到的一切：即，战争初期一切都会好起来；尽管随着战争的进行，我们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但仍有一定的成功前景。”

随着军方越来越多地控制日本政府与军队，日本皇帝开始对战争发狂。首相近卫被东条英机取代（1884年至1948年），日本内阁转变为战时内阁。日本于1941年12月在珍珠港以及英国和荷兰的东南亚属地上发动了进攻。美国主要的战斗舰队被击溃；在接下来的90天里，日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军事成功，其中包括荷兰东印度群岛，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在珍珠港袭击和美国进入战争之后，在后来的战事中，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东南亚和西南亚的战斗中大大削弱了日本人的军事力量。

美军占领日本

在广岛和长崎发生原子弹爆炸以及苏联入侵日本占领的满洲之后，日本投降了。在1945年至1952年的美国占领期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领导下的美国官员监管了日本政府。所有外交关系都由美国控制，所有在国外的日本外交官都被带回了家。日本内部的共产党受到了容忍；它支持毛泽东在中国正在进行的内战。毛泽东在1949年获胜，日本左派则与中国进行了小规模接触，特别是利用工会和艺术团体。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六百五十万公民被困在亚洲和太平洋岛屿。其中包括350万军事人员和300万平民。在中国有260万日本人，其中在满洲有110万日本人。所有这些日本公民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内被重新安置回日本。然而，成千上万的日本技术人员被留在中国东北，直到1953年被遣返。中国共产党以农民为基础，并利用这些熟练的日本技术人员来更新技术，培训当地工人以及重建工厂，矿山，铁路，和其他工业设施。

日本投降后，按照同盟国在1943年开罗会议的决定，台湾归属中国，由中华民国受降。1949年12月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移到台湾，并继续在中国大陆

与中共内战。当日本在1972年最终实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时，中国人同意不追究赔偿问题。

（翻译自英文维基百科，个别字句有所整理和删节）

二战期间的国共两党关系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cond_United_Front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指，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抵御日本侵略的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暂停中国内战。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从1937年至1941年。

背景

1927年，随着国民党在上海扫荡共产党成员，中国共产党正式与国民党决裂。这也标志着，国民党与苏联的四年联盟关系的结束。苏联曾经在国民党的北伐战争中帮助国民党。之后，国民党打败军阀，统一中国。

1931年，日本人开始了对满洲的入侵以及随后的占领。领导中国中央政府的蒋介石决定，由于国内动荡和准备不足，中国必须避免与日本进行全面战争。因此，他“在谋求真正的民族团结的同时，采取了使日本满意的战略，并期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能有足够的力量来对抗日本帝国军。这项绥靖政策持续了六年”。尽管他对共产党的围剿导致中共的撤退并减少了共产党90%的战斗能力，但蒋介石仍无法完全消灭共产党的部队，而且他的“内在和平先于外部抵抗”的政策：“攘外必先安内”，在中国人民中非常不受欢迎；蒋介石的政策引起了中国人对执政的国民党领导及其地区军阀盟友的广泛不满。

西安事变

1936年，蒋介石指派“年轻元帅”张学良镇压中共红军。与红军的战斗给张军带来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但蒋介石没有为其军队提供任何支持。

1936年12月12日，心怀不满的张学良在西安绑架了蒋介石，以结束国民党与中共之间的冲突。为了确保蒋介石获释，国民党被迫同意暂时结束中国内战，并于1936年12月24日，在中共和国民党对日抗战方面，正式形成统一战线。

中国民主同盟，包含三个小政党和三个小政治团体，也同意参加由国共两党所形成的抗日统一战线。

抗战期间的合作

1937年7月，民国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下令红军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支持抗日前线。

由于国民党与中共之间的停战，红军改组为新四军和八路军，并由国民革命军指挥。中共同意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并开始从国民党领导的中央政府那里获得一些财政支持。中共与国民党达成协议，成立了陕甘宁边境地区和山西-察哈尔-河北边境地区。它们由中共实际控制。

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后，共产党军队在太原战役中与国民党结盟，1938年在武汉战役中达到了合作的高峰。

然而，共产党服从于国民革命军的指挥系统只是名义上的。共产党人独立行动，几乎没有与日本人进行任何常规战斗。但在游击战中，中共军事力量被证明是有效的。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协同作战与合作实际上极少。

分裂和后果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仍在“自由中国”（即那些未被日本占领或由伪政府统治的地区）中争夺领土优势。由于共产党通过吸收敌后的中国游击队力量、积极扩大军事实力的努力，这种不稳定的国共联盟在1938年末开始瓦解。对于拒绝向中共效忠的中国民兵，中共会称他们为“合作者”，然后发动进攻以消灭他们的部队。例如，1939年6月，由贺龙领导的红军在河北进攻并歼灭了由张寅吾领导的中国民兵大队。

1940年12月，蒋介石要求中共新四军撤离安徽和江苏省。尽管面临巨大的民国政府压力，新四军指挥官仍然违抗中央政府命令，前进到未经授权的地区，而且向相反的方向进发，并且错过了民国政府所设定的最后撤离期限。此外，共产党于1939年8月袭击了河北国民党部队，并于1940年10月对江苏国民党部队发动了进攻。因而，共产党人的新四军在1941年1月被国民党军队伏击并打败。这场冲突被称为“皖南事变”。这场事变减弱了共产

党在华中的武装力量，但并没有完全终止中共在华中的地位。但是，这场事变有效地终止了国共合作，结束了为抗击日本人而成立的国共第二次联合统一阵线。

此后，国民党和中共军队在日本占领的省份内和敌军后方进行交战，共产党人最终消灭或吸收了国民党的游击队力量，或将其驱赶成为服务于日本的伪军。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也开始将他们的大部分精力集中在建立势力范围上，无论机会出现在哪里。共产党人主要是通过农村群众组织，通过有利于贫困农民的行政、土地和税收改革措施、等等，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国民党则派出其正规军的许多师对中共地区进行军事封锁，以企图消灭共产党的影响力，直至抗日战争结束。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和毛泽东试图进行和谈。这项努力失败了。到1946年，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内战。共产主义者得到苏联缴获的日本武器，并借此机会与已经弱化的国民党进行接触战。1949年10月，毛泽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蒋介石则退居台湾岛。

满洲国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nchukuo>

满洲国

状态 傀儡国家/属于日本帝国掌控

首都 长春（直到1945年8月9日）

通化（从1945年8月9日起）

最大的城市 哈尔滨

通用语言 日语，满语，汉语，蒙古语

宗教 日本神道教，满族民间宗教

政府 君主立宪制下的极权主义 军事独裁统治

首席执行官 •1932年–1934年 溥仪

皇帝 •1934–1945 溥仪

总理 •1932年至1935年 郑孝胥

•1935–1945 张景辉

立法机关 立法委员会

区域

1940年 1, 192, 081平方公里

人口 •1940年 43, 233, 954

货币 满洲国元

伪满洲国，在1932-1934年正式称为满洲国，在1934-1945年正式称为满洲帝国，是一个日本帝国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所控制的傀儡国家。

从1932年直到1945年，它建立于1932年后日本所侵略下的满洲； 1934年成为君主立宪制。在日本事实上的控制之下，它在国际上的认可度很有限。

该地区曾是满族的老家，包括清朝的皇帝。1931年，在奉天事件之后，日本占领了该地区。一年后，亲日政府成立，末代清朝皇帝溥仪成为名义上的摄政王和后来的皇帝。1945年，日本帝国投降于盟国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满洲国也崩解。伪满洲国占领的领土于1945年8月在苏联入侵满洲的时候被苏军占领，然后在第二年开始被移交给中国政府。

满族在满洲国中是少数民族，其最大的族群是汉族。伪满时期，满洲领土内的韩国人、日本人，蒙古人、白俄和其他少数民族也都有所增加。满洲国西部的蒙古地区在承认蒙古传统的情况下受制于略有不同的制度。辽东半岛的南端（今大连）一直由日本直接统治为关东租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历史

背景

1644年，满族军队从满洲（现代中国东北）进入中国取代了顺和明王朝。满族皇帝用杨柳栅栏将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家园与辽宁汉族分开。这种民

族分隔一直持续到19世纪。清朝在19世纪的“闯关东”时期鼓励汉人大量移民，以防止俄国人从清朝夺取该地区。在征服明朝后，清朝将汉人和满族人都视为“中国人”；将中国定义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包括满洲，新疆，蒙古，西藏和其他地区），并宣布汉族和非汉族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清政府在正式文件，国际条约和外交事务中都用“中国”来指清。“中文”是指汉语，满族和蒙古语；“中国人民”一词是指清朝的所有汉族，满族和蒙古族等。清朝在朝廷律令和《尼布楚条约》中明确指出，满洲的土地属于“中国”。

清朝时期，满洲地区被称为“三省”：1683年，吉林和黑龙江分开，尽管直到1907年它们才变成了实际的省。满州地区于1907年由清末政府改制为三个省。从那时起，“东北三省”正式由清政府在中国使用以指代该地区，并设立了东北三省的总督职位来负责这些省。

随着北京清廷统治权力的削弱，许多边远地区要么自由挣扎（例如新疆喀什），要么沦陷于帝国主义权力的控制之下。在19世纪，俄罗斯帝国对清帝国的北部地区最感兴趣。1858年，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北京补充条约，俄罗斯获得了对名为满洲里的一块大片土地的控制权。但是俄罗斯并不满足，随着清朝继续衰落，它进一步努力控制了满洲的其余地区。1890年代，随着穿越哈尔滨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的中国东部铁路的建设，内满洲受到了俄罗斯的强大影响。

日本极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黑龙会支持孙中山反对满清的活动，认为推翻清朝将有助于日本占领满族土地，而汉族人不会反对这一侵略扩张行动。该会的领导人认为，日本人可以轻易接管满洲，而孙中山和其他反清革命者则不会抗拒，甚至会帮助日本人接管并扩大清朝的鸦片贸易（而清廷则试图摧毁鸦片贸易）。日本右翼人士一直支持孙中山和反满族革命者，直到清朝崩溃为止。该会支持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反满、反清革命活动，并支持日本接管满洲。反清同盟会成立于日本，许多反清革命者聚集在此。

这些日本人一直试图团结由汉人组成的反满族团体，以对抗清朝。他们帮助孙中山团结所有反清、反满族革命团体的人。在反满族同盟会的革命联盟内部，也有像宫崎骏这样的日本人。黑龙会在其第一次会议上主办了同盟会。黑龙会与孙中山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与孙的联系由来已久，并提倡泛亚主义。孙有时会假扮成日本人。像黑龙会这样的日本团体对孙中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一位美国军事历史学家说，很多日本军官是黑龙会的成员。这些日本人帮助在东京安排孙中山举行的第一次国民党会议，并希望向中国倾销鸦片、欺骗中国人推翻清朝，以使日本得利。革命成功后，日本黑龙开始渗透中国，传播鸦片和反共情绪。黑龙会在1932年推动了日本对满洲的侵占。

起源

日俄战争（1904–05年）的直接结果是，日本的影响力取代了满洲内的俄罗斯。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中，日本动员了100万士兵在满洲作战，这意味着日本八分之一的家庭都有一名成员参与了战争作战。在日俄战争期间，日俄双方都损失惨重，日本承受了五十万人的伤亡。从日俄战争时期开始，许多日本人开始对满洲持独占态度，并认为日本已经为之流失了如此多的鲜血。

1906年，日本在俄罗斯从满洲里至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经哈尔滨修建的原中国东部铁路基础上建立了南满铁路，从哈尔滨到旅顺港、今天的大连建立了支线。根据《朴茨茅斯条约》的规定，关东军有权占领南部满洲，而该地区落入日本的经济影响范围。日本独资的南满州铁路公司的市值达2亿日元，使其成为亚洲最大的公司，不仅经营着满州南部的前俄罗斯铁路网，还拥有港口，矿山，酒店，电话线，以及其他业务，主导了满洲的经济。随着南满洲铁路（简称“满铁”）公司的建立与扩张，居住在满洲的日本人大幅度增长，从1906年的16612人，增加到1930年的233749人。满铁公司的广大蓝领员工是中国人，而日本员工大多是白领，这意味着居住

在满洲的大多数日本人都是中产阶级；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精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满洲成为俄罗斯、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政治军事的角力场。由于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的混乱，日本曾经侵入了满洲外地区（即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苏联的军事胜利和美国的经济压力迫使日本从该地区撤离；外东北（属于俄罗斯远东地区）在1925年回到了苏联的控制范围内。

在中国军阀时代，军阀张作霖元帅在日本的支持下进入了内蒙古。后来，日本关东军发现他太桀骜不驯了；于是，张于1928年被暗杀。日本关东军将领在暗杀张作霖时，期望满洲沦为无政府状态，并以此为日本夺取该地区提供借口。但是，少帅张学良接任以后，东北没有发生任何混乱事情；而东京内阁则拒绝关东军向满洲派遣更多部队的要求。对于张学良而言，鉴于关东军暗杀了他的父亲（而且张学良与父亲不同的是，这位少帅是一个中国民族主义者），因此，张学良有充分的理由不喜欢日本在满洲的特权地位。张学良知道自己的部队太弱了，无法将关东军驱逐出去，但是他与日本人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友好的。

1931年，日本侵略满洲。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傀儡政权，试图使满洲与中国分离。为了营造一种合法的气氛，中国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被邀请与其追随者一起来到满洲，并担任满洲的国家元首。溥仪的一个忠实同伴是郑孝胥，清代改革派和保皇党。

1932年2月18日“满洲国”宣布成立，并于3月1日正式成立满洲政府。日本首相犬养毅遇刺身亡后，日本政府通过“日满议定书”于1932年9月15日正式承认满洲国。这个满洲国的首都长春，改名新京。东北的中国人组织了志愿军抵抗日本，而这个新满洲政府则不得不进行持续数年的战争以镇压反抗。

日本最初于1932年设置了溥仪作为国家元首，两年后，他被宣布为满洲国皇帝。满洲国因此变成了“满洲帝国”。郑孝胥一直担任满洲国第一任总

理，直到1935年张景辉继任。溥仪不过是一个傀儡，真正的权威掌握在日本军方手中。一个皇宫专为溥仪皇帝建立起来。满洲国政府各部门的部长虽是中国人，但副部长都是日本人担任。后者做出所有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1930年代正式从中国剥离出了满洲国。因着日本的投资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该地区成为了工业强国。满洲国有自己发行的纸币和邮票。几家独立银行也成立了。

事实证明，征服满洲在日本人民中受到极大欢迎；他们认为征服满洲为其经济提供了急需的经济“生命线”；而此时，日本国内的大萧条正在给日本经济带来严重伤害。“生命线”的真实形象表明，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满洲对日本从大萧条中复苏至关重要。这说明了当时征服满洲在日本如此受到大众欢迎的原因，以及后来日本人民为何如此好战。日本人对任何迫使日本放弃满洲的建议都充满敌意。

当时，日本的审查制度远不如后来严格。美国历史学家路易斯·杨

（Louise Young）指出：“如果他们希望反战，那么，在1931年和1932年，日本新闻工作者和编辑们是可以表达反战意见的”。——但是，日本大众对于征服满洲的盛行观念意味着，最初反对战争的《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等报纸迅速转变为支持战争，以此作为提高销量的最佳方式。

1935年，满洲国从苏联购买了中国东部铁路。

外交承认

中国不承认满洲国，但两国在贸易，通讯和运输方面建立了正式关系。

1933年，国际联盟通过了《里顿报告》，宣布满洲仍然是中国的一部分，导致日本退出国联。满洲国的事态迫使美国阐明了所谓的《史汀生主义》，根据该主义，对于外国武力所造成的他国国土体系的变化，国际社会拒绝承认。

萨尔瓦多（1934年3月3日）和多米尼加共和国（1934年），哥斯达黎加（1934年9月23日），意大利（1937年11月29日），西班牙（1937年12月2日）都在外交上承认了满洲国。德国（1938年5月12日）和匈牙利（1939年1月9日）也先后承认满洲国。苏联于1935年3月23日事实上承认了满洲国，但当时曾明确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正式法律上的认可。然而，在1941年4月13日签署《苏日中立条约》后，苏联正式承认了满洲国，以换取日本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完整性。最初，苏联曾在满洲国保留了五个总领事馆；不过在1936–37年，这些领事馆减少到只有两个：一个在哈尔滨，另一个在满洲里。满洲国在布拉戈维申斯克（1932年9月）和Chita（1933年2月）开设了领事馆。

人们普遍认为，罗马教廷于1934年与满洲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罗马教廷从未这样做。这种观念部分是由于贝尔纳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1987年的电影《末代皇帝》中的错误提法，即罗马教廷在外交上承认了伪满洲。主教奥古斯特欧内斯特·皮埃尔Gaspais被任命为“天主教廷在满洲国之天主教会的代表”，由众德传信（负责纯粹宗教任务的机构），而不是由梵蒂冈外交部负责。后者针对的是国家与国家的外交关系。在1940年代，梵蒂冈与日本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但它抵制了日本和意大利要求承认满洲国和南京汪精卫政权的压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斯洛伐克（1940年6月1日），法国维希政府（1940年7月12日），罗马尼亚（1940年12月1日），保加利亚（1941年5月10日），芬兰（1941年7月17日），丹麦（1941年8月），克罗地亚（1941年8月2日）承认了满洲国。此外，所有受到日本以及德国轴心国控制的国家政权，包括汪精卫傀儡政府（1940年11月30日）、泰国（8月5日1941年）和菲律宾（1943年）也承认了满洲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人将满洲国定为殖民地，并以此为据点入侵中

国。1939年夏，满洲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边界争端导致了哈尔基辛·戈尔战役。在这场战斗中，苏蒙联合部队击败了由有限的满洲国部队支持的日本关东军。（这次战役彻底打消了日军在二战期间北进攻击苏联的想法，而使得日本专注于南下全面侵占中国与东南亚）。

1945年8月8日，苏联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协议对日本宣战，并从满洲里外蒙古和蒙古入侵了满洲国。在苏维埃发动进攻时，满洲国帝国军在名义上有20万人，但表现不佳，整个部队向苏军投降而没有开火；甚至发生了针对日军的武装暴动和叛变。康德皇帝（溥仪）曾希望逃到日本向美国投降，但苏联人俘虏了他，并最终将他引渡给中国政府；当时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上台执政，当局将他作为一名战犯与其他所有被捕的满洲国官员一同监禁。

从1945年到1948年，满洲在中国内战中成为人民解放军的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用满洲作为一个集结地，直到最后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伪满洲国的许多军队和日本关东军人员在中国内战期间帮助中国共产党军队向国民党军队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留在满洲国的150万日本人中的许多人，是由美国海军舰船于1946年至1948年从辽宁葫芦岛港口送回日本的。

行政区划

1932年时，满洲国分为五个行政区；1941年时分为19个行政区；另外还有一个北满特别行政区，以及两个特别的城市，新京特别市和哈尔滨特别市。北满历时不到三年（1933年7月1日至1936年1月1日），后来哈尔滨并入滨江省。龙江在1932年也曾是一个省，在1934年分为黑河，龙江和三江；安东省和锦州市与奉天分开；同年，滨江和建道与吉林分开。

政治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满洲是日本帝国的一个傀儡政权，由日本军方武力维护

并受到日本政府管理部门的严格控制。中国历史学家通常称该州为“伪满洲国”。一些历史学家将满洲国视为日本在亚洲大陆建立光荣之日本国家的努力；该国由于战争的压力而恶化。

满洲国于1932年2月18日宣布成立，并于3月1日正式成立。日本总司令暂时任命溥仪为摄政王，后来称他为满洲国皇帝，但溥仪无法使用曾经持有的大清帝国皇帝的头衔。满洲国于1934年3月1日被宣布为君主制，溥仪登基为康德皇帝。在溥仪政府中，国务院是政治权力的中心，由几位内阁大臣组成；每位内阁大臣均由日本副大臣协助。关东军统帅还担任了日本官方大使的职务。他的运作方式与欧洲殖民帝国的驻地官员类似，并具有对皇帝进行否决决定的额外能力。关东军领导层将日本副大臣放在溥仪的内阁中，而所有中国顾问则逐渐辞职或被解雇。

满洲国立法会主要是一个象征性的机构，类似于橡皮图章；决策在于国务院。在满洲国内唯一得到授权的政党是政府主办的满洲国协和会；不过，各流亡团体也被允许拥有自己的政治团体。

美国历史学家路易丝·杨（Louise Young）指出，满洲国最令人震惊的方面之一是，许多在满洲国上班的年轻日本公务员都在政治上倾向于左翼，或者至少曾经是左翼成员。在1920年代，日本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离弃了父母的价值观，并活跃于各种左翼运动中。从1925年的《维持和平法》开始（该法使人们“改变国情是犯罪”），日本政府一直在进行持续的运动，以试图消灭日本国内的所有左翼思想。然而，日本许多聪明的年轻人，以及活跃在日本左翼运动中的大学毕业生，前往满洲国担任公务员。路易丝·杨指出，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即，招募那些日本政府所正在积极寻求镇压的对象。为了统治满洲国，日本针对满洲的经济管理从一开始就具有非常强的国家主义经济性；因而，日本政府需要大量精通汉语的大学毕业生；而在1920年代至30年代，在日本，许多这些会汉语的人员就是那些参与左翼行动的“进步的大学毕业生”。满洲国的年轻日本

公务员拥有经济学，社会学等学位，他们曾经活跃于左翼运动，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满州国在社会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坚定左翼推力，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同样，日本公务员之间关于日本在1930年代在满州国应遵循的那种社会经济政策的许多辩论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来进行的；公务员们在争辩1931年9月之前的满州是否具有“封建”或“资本主义”经济。美国历史学家约书亚·福格尔（Joshua Fogel）谈到了伪满州国的日本年轻公务员：“在诸如中国经济本质之类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辩论，而这些辩论中的通用语总是马克思主义”。为了解决这场辩论，由五到六名年轻的公务员组成的研究小组在关东军的约20或30名士兵的护卫下，出去进行了满州国的实地研究，收集了有关普通百姓生活的资料；最后他们确定，满州国处于“封建”兼具“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1936年开始，满州国发布了《经济发展五年计划》，该计划以苏联的《五年计划》为蓝本。

在满州国，日本人正在创建一个理论上独立的全新国家，这意味着对新国家可以执行的政策种类没有任何限制；而且日本的许多大学毕业生认为他们可以在满州国那里实行改革，并可能会激发日本本土进行类似的改革政策；那些政策在日本由于日本本身存在的社会制度而常受到传统力量的反对。尤其是，因为思考“改变国情”的行为在日本实际上是犯罪，所以导致许多日本左翼大学毕业生到满州国去上班。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在满州国实现日本所无法实现的那种社会革命。

到1933年，日本政府在日本国内已通过大规模逮捕而基本上摧毁了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这导致许多日本大学生左派得出结论，改变在日本是不可能的，但在满州国还是有可能的；这是自相矛盾的：——右翼的日本关东军赞助了日本无法接受的那种左翼政策。此外，大萧条使日本的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这使得满州国获得高薪工作的前景对就业不足的日本大学毕业生非常有吸引力。在满州国，日本政府正在重新创建一个完整的政府，这意味着满州国迫切需要大学毕业生在其新成立的公务员系统中工作。此外，满州国的泛亚言论和日本帮助满州普通百姓的前景极大地吸

引了日本理想主义青年。路易丝·杨谈到在满洲国工作的年轻日本人：“那些日本的男人们，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一些日本的女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和抱负。在他们的努力下，为了重塑自己的生活，他们重建了一个帝国，他们以对现代性的关注和对乌托邦未来的梦想，对之进行了心血投资，推动它接受社会主义改革的理想主义言论，并根据中国民族主义的理想为自己辩护。他们把这些理念转变为对建筑物的炫耀和对殖民地消费的狂热奢侈感。他们使满洲国成为一个具有彻底变革性、试验性和充满各种可能性的项目。”

关东军宽容了满洲国的社会革命，因为这是从满洲国的汉族中获得支持的最好方式；那些汉族人不希望满洲国与中国切断联系。

不过，日本政府对这些左翼日本人员们展开了一个称为Tenkō（“更改方向”）的洗脑运动。这个洗脑运动非常成功；其目的就是要让那些日本左翼年轻人认识到，日本天皇真的是神，而日本人所能作的最好之事，就是服务于天皇。这个运动如此有效，以至于让许多左翼日本年轻人放弃了从前拒绝相信天皇是神的想法，而转变成为狂热的日本右翼分子；这些右翼分子们以激进的热情弥补了他们先前对皇帝神性的怀疑。一个著名例子就是白桦立，他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的汉学家；在他被捕并接受洗脑教育后，他成为狂热的日本右翼分子。他于1932年去了满洲国，宣称“五个种族”的理论是解决亚洲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并在他的著作中指出，只有日本才能从中国人身上拯救中国；这是他的立场观念上的完全转变；从前，他曾经极力地批评日本剥削中国。Ōgami Suehiro等其他左翼激进主义者并未完全接受Tenkō的影响，但仍在满洲国工作，他们认为有可能进行社会改革以结束满洲国的中国农民的“半封建”状态，并且他可以利用关东军在满洲国进行左翼改革。加米（Gami）在南满铁路公司社会研究部的“农业经济”部门工作，撰写了有关满洲国农村经济的报告，被关东军和满洲国政府所使用。Ōgami认为他的研究对普通百姓有帮助；他引用了他对满洲国农村用水的一项研究，其中他指出了缺水的村庄与“土匪”（抗日游击队的代号）

之间的相关性；他认为满洲国政府改善乡村供水的政策是由于他的研究的影响作用。1937年日本与中国的战争爆发，随着“全面战争”政策的出台，满洲国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这意味着对具有受过科学思考的大学学位的人的更加迫切需求。福格尔写道，几乎所有在1930年代末抵达满洲国的日本大学毕业生都是“左翼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这恰好是在日本，马克思主义几乎被禁止的时候；（如YamadaGōichi所说），如果书名中出现“ shakai（社交）”一词，通常会被没收。”

杨还提到了阿克顿勋爵的“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格言；对许多理想主义的满洲国年轻日本公务员来说，他们相信他们会影响“自上而下的革命”，从而使普通民众的生活更加美好；但是，他们在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中享有的绝对权力，使他们对自己去满洲国所想要帮助的人民表现出傲慢自大的态度。而且，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利用关东军实现“自上而下的革命”，但是，这只不过是“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一种“自负”。

关东军否决了满洲国雄心勃勃的土地改革计划，其原因恰恰是它可能会激发日本的类似改革。日本的地主往往来自曾经属于武士阶级的家庭，而日本帝国军的几乎所有军官都来自武士家庭，这使得关东军对任何形式的土地改革都充满敌意，因为那些土地改革政策会使得日本农民变得不安分而蠢蠢欲动。

1941年10月，以理查德·索尔格（Richard Sorge）为首的苏联间谍圈在东京被发现，这导致当局对苏联的间谍活动变得偏执，并导致了对左派的新一轮大规模镇压。1941年11月，南满铁路公司的社会研究部遭到了日本政府的突袭，该公司自1930年代初以来一直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温床，并逮捕了其中50名在社会研究部工作的人。在社会研究部门工作的人中，至少有44人因违反《维持和平法》而被定罪；该法使“改变国情”的思考在1942-43年间被判处长期徒刑；其中四人死于满洲国监狱的严酷条件环境。由于在社会研究部门工作的人在满洲国的经济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

且都是大学毕业生，所以日本历史学家Hotta Eri写道，相关审查拘押机构被下令“谨慎对待他们”，这意味着没有酷刑；而酷刑是那些审查拘押机构所通常在调查中使用的。

人口统计

1908年，居民人数为1583.4万，到1931年增至30,000,000，而到满洲国时期则为4300万（包含满洲国的所有领土例如部分蒙古地区与南满）。人口平衡仍然是123名男性对100名女性。1941年的总人数为5000万。其他统计数据表明，在伪满洲国时代，人口增加了1800万。

1934年初，满洲国的总人口估计为30,880,000，平均家庭为6.1人，每100名女性中有122名男性。这些数字包括29,510,000名中国人（96%，应该包括满州人口），590,760日本人（2%），680,000韩国人（2%）和98,431（<1%）其他国籍：俄罗斯白人，蒙古人等。大约80%的人口在农村。满洲国存在期间，除日本政府增加了在中国的朝鲜人口外，种族平衡没有显著变化。从日本获得的数字如下：1940年，龙江，热河，吉林，辽宁（奉天）和兴安省的满洲国总人口为43,233,954；或内政部的数字为31,008,600。该时期的另一数字估计总人口为36,933,000居民。满洲国的大多数汉族人认为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被动地或暴力地抵制了日本对满洲国是“多民族国家”的宣传。

俄国内战期间（1917年至1922年），数千名俄罗斯人逃到满洲；因而当1930年代的时候，满洲国内部已经存在俄罗斯人社区。居住在满洲的俄罗斯人是无国籍的，白人在满洲国具有模棱两可的地位；日本声称满洲国是泛亚国家，其官方的“五个种族”是中国人，蒙古人，满族人，韩国人和日本人。在不同的时间，日本人建议俄国人可能是满洲国的“第六种族”，但这从未被正式宣布。1936年，《满洲国年鉴》报道说，有33592名俄罗斯人

居住在哈尔滨市（“东方莫斯科”），其中只有5580名俄罗斯人获得了满洲国国籍。在某种程度上，日本帝国主义是基于种族主义的，而日本人则将自己称为“大和族”；但在日本人的思想中，始终存在基于血统的种族差异的意识形态与泛民族思想之间的某种二分法。日本的所谓亚洲主义是声称，日本人是所有亚洲人民的自然领袖。1940年，俄国人被包括在满洲国的其他国籍中，作为应征入伍后的军队的候选人。

英国作家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于1935年访问了满洲国。在他乘火车穿越满洲国的乡村时，一群日本殖民者误以其瑞士旅伴基尼（Kini）为俄罗斯难民，并开始殴打她。直到弗莱明能够向日本人证明她是瑞士人而不是俄国人之后，日本人才停止并道歉，说如果他们知道她是瑞士人，他们决不会殴打她，说他们殴打她时，真诚地相信她是俄罗斯人。弗莱明（Fleming）在满洲国观察到：“您可以殴打白人俄罗斯人，直到将之打得鼻青脸肿，因为他们是世界上没有地位的人，无处不在的公民”。弗莱明进一步指出，满洲国的日本人非常讨厌所有白人；而且由于满洲国的俄国人是无国籍人，没有哪国的使馆为这些俄罗斯人受害而进行抗议，因此日本人喜欢使他们受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满洲国的日本人往往不会骚扰那些持各国护照前往满洲的人，因为他们不愿处理东京大使馆关于虐待那些公民的抗议。

关东军在满洲国的一个秘密生化战部队，第731部队，对满洲人进行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实验，涉及到许多内脏受检者，以查看化学物质和细菌对人体的影响。

在1930年代后期，第731部队的医生要求更多白人受试者进行实验，以测试他们正在发展的炭疽和鼠疫菌株的效率，从而导致许多居住在满洲国的俄罗斯人成为不情愿的人类豚鼠。

与日本人一起工作的俄罗斯法西斯党绑架了居住在满洲国的各种“不可靠”俄罗斯人，以供731部队进行试验。

俄罗斯流亡者的孩子经常与汉人结婚，因此，这些孩子在满洲国总是被称为“混水”者，受到俄罗斯人社区和汉族人社区的回避。

不论是在当时还是以后，中国的说法都倾向于将生活在满洲的俄罗斯人描绘成所有妓女和小偷，并且几乎总是无视中产阶级俄罗斯人对社区生活的贡献。考虑到美国人和大多数欧洲人当时在中国享有域外权利的方式，在中国文学中有关居住在满洲国的俄国人及其“混水”孩子的说法经常表现出一定的讽刺意味，讲述了——“满洲国的俄国人通常如何在满洲国社会的边缘，生活在贫困中；而相比之下当地华人在经济上更加成功”。韩国历史学家奉仁英（Bong Inyoung）指出，在谈到“混水”人时，中国作家倾向于将他们视为不完全是中国人，但另一方面，他们愿意接受这些人为中国人，只要他们愿意放弃了俄罗斯的传统，完全拥抱了中国文化；从而使中国性与种族一样成为文化问题。

大约在苏联提倡跨越满洲国-苏维埃边界的西伯利亚建立犹太自治州的同时，一些日本官员调查了一项计划（称为“河豚计划”），以将犹太难民吸引到满洲国，作为其殖民努力的一部分，但从未得到采纳。在伪满洲国的犹太人社区并没有受到官方的迫害；而且日本当局查禁了当地反犹太主义出版物，如俄罗斯语期刊Nashput。但是，满洲国的犹太人是白人俄罗斯人中间的反犹分子骚扰的受害者；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是西蒙·卡斯佩的被杀事件。

1937年，由哈尔滨犹太社区领袖亚伯拉罕·考夫曼（Abraham Kaufman）博士主持成立了远东犹太人理事会。1937年至1939年间，满洲国的哈尔滨市是远东犹太社区公会的所在地。在1945年俄罗斯红军入侵满洲之后，考夫曼博士和其他几名犹太社区领袖被苏联逮捕，并被指控从事反苏活动，导致考夫曼在苏联劳教所被判入狱十年。

日本上田京介将包括满汉人在内的满洲三千万人口都标记为“满族”，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满族，而日本人则根据上田的主张写成“大满洲国”，

声称所有这三千万“满族人”有权获得独立，以证明从中国分裂满洲国是正当的。1942年，日本人撰写了《满洲国建设十年历史》，其中着重强调了日裔对满洲国的权利，同时试图使“满族”对满洲国作为其祖国的主张合法化；日本人说，大多数“满族”在清朝时期迁出，后来才返回。

主要城市人口

牛庄（1940年为119,000或180,871）

奉天（199,000年为339,000或1,135,801）

新京（196,000年为126,000或544,202）

哈尔滨（405,000或1940年的661,948）

安东（192,000年为92,000或315,242）

吉林（199,000或173,624，1940年）

齐齐哈尔（1940年为75,000）

资料来源：Beal, Edwin G（1945）。“满洲的1940年人口普查”。远东季刊。4（3）：243–262。DOI：10.2307 / 2049515。JSTOR 2049515。

日本人口

1931–32年，日本有100,000名农民；其他消息来源提到590,760日本居民。满洲国的其他数据表明，日本人口为24万，后来增长到837,000。在新京（长春），他们占总人口的25%。因此，到1936年的人口普查，日本满洲国人口中，有22%是公务员及其家庭。18%在南方满铁公司工作；25%的人到伪满州创业，而21%的人在工业界工作。在交通、政府和商业领域工

作的日本人往往是中产阶级，例如高管，工程师和经理等白领人士，而在满洲国工作的蓝领雇员则倾向于是熟练工人。

1934年，据报道，在满洲国工作的日本木匠，其经济不断发展，收入是日本的两倍。凭借其闪闪发光的现代办公楼，最先进的交通网络（如著名的亚洲快车铁路线）和遍及全国各地的现代化基础设施，日本这个最新的殖民地成为了中产阶级日本人的热门旅游目的地；他们希望看到亚洲大陆正在崛起的“勇敢的新帝国”。

日本政府制定了官方计划，计划在1936年至1956年之间把500万日本人迁移到满洲。在1938年至1942年之间，20万日本年轻农民来到了满洲；1936年后加入其中的有20,000个完整家庭。在满洲国的日本定居者中，近一半来自九州的农村地区。当日本在1943-44年失去对黄海的海空管制时，这种迁移就停止了。

当苏联红军入侵满洲国时，他们俘虏了850,000日本定居者。除了一些公务员和士兵外，这些人于1946-47年被遣返日本。日本政府把混乱中的许多日本孤儿留在了满洲，并被中国家庭收养。然而，许多这些人很好地融入了中国社会。在1980年代，日本开始为他们组织遣返计划，但并非所有人都选择返回日本。

在中国留下的大多数日本成年人是妇女；这些日本妇女大多嫁给了中国男人，因此被称为“搁浅的战争妻子”（zanryu fujin）。由于她们有与中国男人生的孩子，所以，这些日本妇女不被日本政府允许将中国家庭带回日本；因此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留下来了。日本法律只允许日本人生下的孩子才能成为日本公民。

少数族裔所受的虐待

在日本统治下，鄂伦春族的人口大量减少。日本人在其中分发了鸦片，并对该社区的一些成员进行了人体实验；再加上流行病的发生，这导致其人

口减少，直到只剩下1,000人。

日本禁止鄂伦春族与其他民族交流，并强迫他们从事狩猎动物，以换取有时不足以维持生命的口粮和衣服；从而导致许多鄂伦春族人因饥饿、暴晒等原因而死亡。日本人把鸦片分发给18岁以上的鄂伦春族成年人，以此作为控制手段。当一名鄂伦春族猎人杀死2名日军时，日本人将40名鄂伦春族人毒死。日本在战争中强迫鄂伦春人为他们战斗，也导致鄂伦春人的数量减少。

即使是那些避免被日本直接控制的鄂伦春人，也发现自己面临着中共抗日力量的冲突，这也使得他们在此期间的人口减少。

在1931年至1945年之间，由于大量使用鸦片以及日本人残酷地迫害所造成的死亡（例如奴隶劳动和日本人的强迫搬迁），赫哲族人口减少了80%或90%。

法律制度

尽管满洲国本身是违法的产物（国际联盟裁定日本通过武力夺取满洲国而违反了国际法），但是，日本人付出了很多努力为满洲国建立了法律体系，并认为这是为满洲国赢得国际承认的最快方法。

对于日本人来说，一个特殊的特点是，满洲国总是被当作一种新型的国家来呈现：一个由日本人，韩国人，满族，蒙古人和中国人组成的多民族泛亚国家；以此纪念“新秩序”的诞生。日本关于满洲国的典型言论，被描绘成光荣的新文明的诞生。1932年3月1日日本新闻社发布的新闻稿，宣布满洲国“光荣降临”，“世界的目光转向它”；日本宣称，满洲国的诞生是“在世界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划时代事件，标志着政府，种族关系和其他具有普遍意义的事务的新时代诞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满洲国的存在

那样，迅速地完成过如此巨大的成就”。

日本人竭尽全力确保满洲国在各个方面都具有现代性的体现，因为它旨在向世界证明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可以取得什么伟大成就。满洲国的法律体系是基于1932年的组织法，该法以12条人权保护法和一个据称独立的司法机构来执行该法律为特色。

满洲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郑孝胥所提倡的“王道”；清朝的前臣郑孝胥呼吁，有序儒家社会能够促进正义与和谐；当时，这被看作是世界历史新时代的开始。

伪满洲国法律的目的不是保护个人权利，因为王道意识形态显然对个人主义怀有敌意；个人主义被认为是对亚洲不利的，是颓废的西方概念；满洲国法律所保护的，是国家利益；这一点，通过确保臣民履行对皇帝的职责来实现。“王道”意识形态对于集体的重视，甚于对个人的重视；“王道”要求，所有的人应当把未来的个人需要，溶于社会的需要之中。郑孝胥和日本法律学者石原汉次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抨击西方提倡个人主义的法律传统，他们声称这种传统导致了自私、贪婪和唯物主义；并认为，对个人的无视是一种道德上的高尚传统。

看似理想主义的满洲国《人权保护法》所强调的，却是国家权利；这与人权相抵消。这种状态，正与日本国情一样。

“王道”推动儒家道德和精神思想；正因为如此，在满洲国法律体系中要求，人民应当服务于皇帝溥仪，并以之为精神思想的对象；溥仪作为理论上的国家元首则可以随己意改变法律。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满洲国立法院仅具有协助皇帝制定法律的权力，其权力甚至远低于日本的帝国国会，后者有权拒绝或批准法律。当时经常有人提出，伪满洲立法院是日本帝国国会的典范；日本天皇裕仁对此表示同情，但从未接受。裕仁最终选择了他的祖父在1889年通过的《明治

宪法》，因为它赋予了日本天皇最终的权力；与此同时，帝国主义政府与日本首相以及他的日本内阁组成的政体，也赋予了天皇出问题时的替罪羊。【二战战败以后，日本政体被全面改造，但天皇制度却得以保存下来。】

最初，张学良时代的法官体系被保留；但在1934年，由日本法官古田昌武（Furuta Masatake）领导的司法法学院在长春成立，并于1937年被规模更大的法学院所取代。法学院申请人数大大超过了应聘人数；法学院的第一批学生名额只有100个，但是有1,210名学生申请。

训练学生的法律制度是模仿日本法律制度的；日本法律制度是模仿法国法制的；但是满洲国有许多特殊之处。满洲国法律系学生接受过有关“满洲国五族和睦理论”，“君王之路的政治理论”，“领事管辖权和治外法权的实际区别”等主题的论文的培训，以及如何最好地实现“王道治理”。当学生们表示希望“王道”是亚洲人对现代世界问题的独特解决方案时，日本教授对学生们在这些主题上写的论文的“热情”感到“惊讶”。而满洲国所代表的，无非就是在不久的将来会导致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新文明的开始。日本教授们对他们的学生的儒家理想主义印象深刻；但注意到，他们的学生都使用了大量八股文式的语言与陈词滥调，以至于很难在他们的论文彼此之间进行区分。这些论文引用了许多古代中国明智法官的例子，但却常常忽略了最近的情况与

法律发展。这些论文用很多冗长的叙述来表达理想的陈述，说明王道如何促成完美的社会；但却缺少思考与语言来解释如何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

日本对满洲国法律制度的影响程度的一个例子是，每期《满洲国法律咨询杂志》总是包含日本最高法院最新裁决的摘要，以及日本最高法院在这些

情况下作出裁定的原因。

但是，满洲国法律体系与日本法律体系之间存在一些差异。在日本国内，为了结束西方列强公民享有的域外权利（治外法权）的努力，废除了体罚。但是，在朝鲜和台湾的日本殖民地，法律制度体系中则仍然保持着体罚。相比之下，体罚，特别是鞭刑，是满洲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官非常倾向于对被判犯有轻罪的低收入中国男子施加鞭刑；而同样罪行在日本则通常只处罚款或短期监禁。

1936年，在满洲国任职的日本法官小野治男在法律期刊上撰文，对以鞭刑作为对较轻犯罪的惩罚感到遗憾，但他指出，这对满洲国的3000万人是有必要的；“一半以上的人是一无所知和完全文盲的野蛮人”，他们太穷了，无法支付罚款，而且数量太多，无法入狱。

在台湾和韩国，日本法律至高无上，但是这两个殖民地的法官都必须尊重家庭法方面的“当地习俗”。但在以汉人占多数的满洲国，尽管意识形态宣告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满族人和蒙古人的“五个种族”是平等的，然而在实际中，导致了各自不同的几项家庭法所尊重的、不同的“当地习俗”；这包括“五个种族”的不同情况，以及俄罗斯和回族的少数民族。

满洲国警察有权不加指控地逮捕任何一个从事于模糊界定的“破坏国家”罪行的人。满洲国拥有四级法院，由中日两国法官组成。所有法院都有两名日本法官和两名中国法官，其中中国人担任名义上级法官，日本人担任初级法官，但实际上，日本法官是主人，而中国法官则是傀儡。尽管日本人宣称，满洲国的法律制度比张学良时代的法律制度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满洲国的法院效率低下且运行缓慢。只要可能，满洲国的法院便会被日本人控制的满洲国政府执行机关忽略。

在亚洲，法治和先进的法律制度通常被视为“文明”的标志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和满洲国媒体对张元帅所管理的混乱和腐败的法律制度大加诋毁

的原因。在1930年代初期，随着日本泛亚理想主义者前往满洲、并以建立世界一流的法律体系为目标，满洲国从日本吸引了许多法律人才。由于关东军在满洲国拥有最终权力，因此，到1930年代后期，日本最好的法官都不愿意去满洲国，因为满洲国法官的决定可能会常常不算数；而只有二等法官才去了满洲国。

到1937年，满洲国的日本法官和律师要么成为幻灭了泛亚理想主义者，要么成为更加愤世嫉俗的机会主义者和庸俗的黑手党；他们都是一些没有才能在日本本土取得成功的人。

相比之下，满洲国最好的华裔法学院毕业生都选择成为满洲国司法体系的一部分；这表明许多中产阶级家庭准备接受满洲国政府体系。

从1938年5月的满洲国《宗教法》开始，一种类似于天皇崇拜的宗教敬拜在满洲国帝国中广为流行；日本的裕仁天皇被奉为永生神。

就像在日本一样，满洲国学童开始上课时 would 向皇帝祈祷，而皇帝的手稿和皇帝的王权成为与神皇建立联系的神圣圣物。同时，由于溥仪皇帝是活着的神，他的意志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法律的目的被严格地简化为服务于皇帝的意志，而不是坚持价值观和规则。

就像在日本一样，统治满洲国法律哲学的想法是，皇帝是活生生的上帝，他对无人负责，并且将其部分权力下放给纯粹的人类，这些人有义务服从神皇的意志。在日本和伪满时期，神皇的举动总是公正和道德的，因为神永远都不会做错事，而不是因为神皇为了维护先验存在的道德价值观而行事。

继日本制度之后，1937年又引入了一种新的“思想犯罪”类别，宣布某些思想现在是非法的，那些具有这些所禁止之思想的人则是“思想罪犯”。因此，人们被定罪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而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思想。

1937年7月与中国的战争爆发后，满洲国宣布了一项“紧急法”，将其置于一种戒严令之下；该禁令暂停了当时存在的理论上的公民自由，下令动员社会进行全面战争，并增加了镇压的措施；有关“思想犯罪”的法律只是最生动的例子。

1938年4月，为被控五种“思想犯罪”的人建立了一种新型的特别国家安全法院。

1941年8月26日，新的安全法裁定，在特别安全法院受审的人无权上诉，也无权寻求辩护律师。

在1942年至1945年之间，锦州的一个特别安全法院判处约1,700人死刑，另外2600人因“思想犯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一数字似乎很具有代表性，是特别法院的一般样式。

警察经常使用酷刑使嫌犯认罪；在特别安全法院受审的人，无权检查针对他们的证据。

从1943年开始，尽管死刑判决数量保持稳定，但被法院审判和定罪的人数急剧增加。被定罪的人数增加是由于满洲国的工厂和矿山需要奴隶劳动，因为来自中国北方的传统奴隶劳动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干扰；所以，大多数被定罪的人被判处去工厂和矿山从事强制性劳动。

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大卫·杜波依斯（Thomas David Dubois）写道，伪满洲的法律体系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1年至1937年，当时日本人想向世界展示一个拥有超现代法律体系的国家，向在兄弟般的友谊中共同努力的亚洲人致敬；第二个阶段是1937年至1945年，当时法律制度已成为集权主义动员社会进行全面战争的工具。

经济

满洲国的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制度日新月异。20世纪20年代，在日本陆军的影响下，日本社会的“布防状态”理论普及；日本国防军已经开始主张自己的“布防状态”理论版本，即，极权主义“国防状态”；这将调动整个社会在和平时期为战争做准备。

日本所受到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来自于苏联；当时，反资本主义的苏联正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提供了，没有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工业也能够快速增长的一个例子。

关东军在1931年夺取满洲的至少部分原因是，想要将其用作建立面向“极权主义国防状态之国家”的经济体系的实验室。满洲殖民地为关东军进行急剧经济变革提供了可能性；而这在日本是不可能的。从一开始，陆军就打算将满洲国变成帝国的工业中心地带。从1932年开始，陆军发起了一项强制性工业化政策。该政策与苏联的五年计划相仿。由于不喜欢资本主义，财阀被排除在满洲国之外，所有重工业工厂都是由陆军拥有的公司建造和拥有的。

1935年，“改革官僚”岸信介被任命为工业发展部副部长，情况发生了变化。岸信介说服陆军允许财阀在满洲国进行投资；并认为，否则，日本国进行满洲国的整个工业化会花费太多钱。岸信介率先提出了一种精英主义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像他这样的官僚们制定经济计划，而财阀必须执行这些计划。岸信介成功地在非常强大的国家主导型经济体系中高效地利用了私人资本，以实现他的目标，即大大提高工业生产；同时对在满洲国工厂劳作的被剥削的中国工人表现出完全的冷漠。美国历史学家马克·德里斯科尔（Mark Driscoll）将岸信介的系统描述为“坏政治”的系统；在该系统中，中国工人实际上被视为巨大工业机器中的非人性齿轮。

岸信介在满洲的国家引导型经济中率先采用的系统（即，财阀公司根据政

府命令进行投资）后来成为日本1945年后发展的模型，尽管其残酷剥削程度不及满洲国。

到1930年代，满洲国的工业体系成为最先进的工业体系之一，使其成为该地区的工业强国之一。伪满洲的钢铁产量在1930年代后期超过了日本。

满洲国时期，许多满洲城市都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但是，该国的大部分经济生产活动通常都服从于日本的利益；在战争期间，原材料流入日本以支持战争。传统土地被征用并重新分配给日本农民；当地满洲国农民被安置并被迫在较小的土地上进入集体耕作。

运输

日本人建立了高效而令人印象深刻的铁路系统；该系统至今仍然运转良好。这家大型公司被称为南满洲铁路公司或“满铁”，在该地区许多工业项目中拥有大量股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满铁人员积极参与了针对被占领之中国的安抚行动。

满洲国的大多数铁路线理论上归国家所有；尽管该铁路在理论上是独立的，但完全由满铁管理和运营。

军事

满洲国军是满洲国的军队，人数多达17万至22万，1945年达到峰值。陆军和海军成立于1932年4月15日。部队包括由日本人培训和领导的满洲国所有主要民族的成员。

尽管日本人为提高帝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和在其部队中灌输满洲国的爱国精神而进行了许多尝试，但是，日本军方仍认为其大部分单位是不可靠的。

他们的主要作用是与继续抵抗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国民党和共产主义叛乱分子进行战斗。有时，伪满帝国军也参加了针对中国国民革命军和苏维埃

红军的行动（通常是为了支持日本帝国陆军）。最初它的成员是张学良元帅的军阀部队以前的士兵；他们在日本入侵满洲时投降到日本。

由于张学良的前部队在很大程度上不忠于新政权，并且对镇压抗日游击队的行动表现不佳，因此，伪满洲国新政府采取了努力，招募了新兵，并在以后持续征兵。

1934年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只有经过满洲国政府培训的人员才能担任军官。

1937年5月13日的《军事物资征用法》允许日本和满洲国当局强行征召劳动者入伍。不过直到1940年，大规模全民征兵才开始；那时所有年轻人都得到了身体训练，而10%的年轻人被选拔入伍。

在1938年至1940年之间，建立了几所军事学院，为帝国军队提供了新的军官团，其中包括一所专门为蒙古族人开设的学校。

在1930年代初至中期与叛乱分子作战之后，满洲国军在内蒙古针对中国军队的行动中起了主要的支持作用。有新闻报道称，满洲国的一些部队表现良好。后来，它在苏日边界冲突中与苏维埃红军作战。1939年5月，满州骑兵与蒙古骑兵之间的一场冲突升级，双方都增援并开始了诺门罕之战。尽管日本人在整体战斗中表现不佳，但日本人认为满洲国军的行动足够体面，足以保证扩大伪满军。

在整个1940年代，满洲国军的唯一军事行动是对付共产党游击队战士和其他叛乱分子；日本人选择仅依靠更为精锐的部队，而大多数人则用于驻军和安全职责。

尽管日本努力为满洲国部队配备一些大炮（除了它从张学良的前军队继承而来的种类繁多的武器）以及一些老式的坦克和装甲车，骑兵仍是帝国军队中最精锐的有效和强壮的分支。

1945年8月苏联入侵满洲时从欧洲战线转移过来的76个经过血腥奋战的红军师所面对的力量，就是这些满洲国军以及消耗殆尽的日本关东军。骑兵部对红军的行动最多，但是其他满洲国军及其疲惫不堪的日本关东军很快就被苏军的进攻歼灭了。

尽管有些满洲国军部队仍然忠于日本盟友并努力抵抗苏军，但许多满洲国军部队反抗了他们的日本顾问，而另一些部队则简单地当了逃兵、融入了农村。由于中国国民党将处决与日本的前合作者，因此，这些满洲国军队中的许多人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这成为该地区共产党人的重要人力和设备来源。

满洲国军其他两个分支机构，即伪满洲国皇家空军和伪满洲国海军，规模较小且不发达，主要作为象征性部队存在，以使伪满洲国政权合法化。空军于1937年2月成立。日军从伪满帝国军中选拔了30名飞行员，在哈尔滨日本关东军飞机兵库接受训练（最初，关东军对伪满军人信任不足，而仅在此训练日军飞行员）。满洲国帝国空军的前身是满洲国航空运输公司，这是一家成立于1931年的准军事航空公司，负责日本军队的运输和侦察任务。第一个空中部队设在长春，只装备了一个单座法式战斗机；后来又扩充了九一式战斗机和川崎的88型轻型轰炸机。另外，又成立了两个空军部队。但是当一百名飞行员谋杀日本教官们、并乘飞机叛逃时，满洲国空军的扩张遭受了挫折。

尽管如此，从1942年第一批学员开始就组成了三个战斗机中队，除了Tachikawa Ki-9和Tachikawa Ki-55教练机外，还配备了Nakajima Ki-27战斗机以及一些三菱Ki-57运输机。

1945年，由于要抵抗美国针对日本本土的轰炸行动，他们被派遣驾驶中岛Ki-43战斗机前往参加战斗，以更好地拦截B-29超级堡垒轰炸机。一些飞行员参加了针对美国轰炸机的行动，其中至少一名Ki-27飞行员在神风敢死队的袭击中将飞机撞向B-29，从而击落了一架B-29。

由于苏联的入侵，满洲国空军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但出现了一些伪满洲国飞机攻击苏军的事例。

伪满洲国海军主要以小河船队的形式存在；主要由小型炮艇和巡逻艇组成，其中包括了一些所俘获的中国舰艇，以及日军所配备的船艇。

从1937年到1942年，老旧的日本驱逐舰喀什（Kashi）被借给了满洲国舰队，改名为海威（Hai Wei），但后来被返还给日本帝国海军。这些船大多由日本船员操作。

除了这些，还有几个特殊军事单位。其中包括，负责保护皇帝康德（溥仪）和高级官员的军事卫队，以及军事仪仗队。

在整个1930年代，大约6,000名蒙古族新兵成立了“蒙古独立军”，并与土匪进行了战争，取得了一些成功。它在1938年进行了扩建，但在1940年与正规满洲国帝国军队合并，尽管蒙古部队仍然表现良好。

1937年，在朝鲜裔商人们的倡议下，成立了一个特别的朝鲜支队；这个单位很小，但是在对抗共产主义游击队方面表现出色。日本人夸赞其军事精神；它成为为数不多的赢得日本上级尊敬的傀儡单位之一。

满洲国的战争罪行

根据历史学家Juzhifen Ju, Mitsuyochi Himeta, Toru Kubo和Mark Peattie的联合研究，在日军“兴亚院”的监督下，关东军动员了超过一千万中国平民在满洲国从事奴隶劳动。

中国奴隶工人经常因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而患病。为了避免医疗开支，一些重病工人被直接推入万人冢；而世界上最严重的矿难，即为本溪湖煤矿，发生在满洲国。

从1932年至1936年，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在北宁河、哈尔滨市附近对平民进

行了细菌学实验；而在满洲国另一地点则直到1945年为止。受害人大多是中国人，俄罗斯人和韩国人，他们接受了活体解剖，有时没有麻醉。

贩毒

2007年，吉田丽治（Reiji Yoshida）在《日本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日本在伪满洲的投资，部分是通过销售毒品筹集的。根据该文章，吉田发现的一份文件显示，“兴亚院”直接与为伪满洲国、南京和蒙古政府的利益向中国的毒贩提供资金有关。

该文件证实了东京法庭先前分析的证据，该证据指出：“日本从事毒品贩运的真正目的远比使中国人放荡更加险恶。日本已经签署并批准了禁止鸦片公约，保证不会从事毒品贩运，但她在所谓的伪满洲虚假独立中发现了一个方便的机会，可以进行全世界的毒品贩运并使该傀儡国蒙罪.... 1937年，国际联盟指出，世界上所有非法白色毒品中有90%是与日本有关...”

警察

满洲国政府还成立了一支警察部队，负责一般执法活动。它还包括一支水警。

社会与文化

国家符号

除了国旗外，据说溥仪最喜欢的花是兰花，因而兰花也成为该国的皇家的花，类似于日本的菊花。

根据1933年4月的一项法令，高粱花也成为了国家的花朵。

“一个联盟下的五个种族”被用来当作是国家座右铭。

教育

满洲国建立了有效的公共教育体系。政府建立了许多学校和技术学院。在满洲国建立了12,000所小学，200所中学，140所师范学校（用于准备教师），以及50所技术和职业学校。该系统总共有600,000名儿童和年轻学生以及25,000名教师。当地的中国孩子和日本孩子通常在不同的学校上学，而上过同一所学校的孩子则按种族隔离，日本学生则被分配到设备更好的班级。

孔子的教育在满洲国的公立学校教育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农村地区，对学生进行了实践现代农业技术培训以提高产量。教育的重点是对男孩的实际工作培训和对女孩的家务劳动培训。所有这些都是基于对“王道”的服从，并强调对皇帝的忠诚。满洲国政府设立了许多节日、体育赛事和仪式来提高公民的忠诚度。

最终，除了满洲国学校教授的中文外，日语也成为了官方语言。

电影

摄影部是南满铁路的公共关系部门的一部分，成立于1928年，旨在为日本观众制作有关满洲的简短纪录片。

1937年，满洲国电影协会由政府 and 南满铁路在吉林省的一家制片厂成立。它是由甘粕正彦（Amakasu Masahiko）创立的；甘粕正彦也帮助了李香兰（原名为山口淑子Yakako **Ōtaka**，也被称为Ri Koran）成为演艺明星。他还试图确保满洲国拥有自己的电影产业，并将这些电影主要迎合于满洲国观众。这些影片通常会宣传满洲国政府与日本人的观点。

甘粕正彦将军拍摄了各种各样的“纪录片”，展示了精心编排的场面，例如，溥仪皇帝在他的首府新京市（现代长春），面对着成千上万的欢呼群众，检阅着他的军队游行。这些电影都旨在让观众们接受伪满洲独立合法化的观念。二战结束以后，相关的电影设备与档案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春电影制片厂使用。

着装

长衫和旗袍，不管是不是来自于满族传统礼服，在伪满洲国都被认为是民族服装。

在满洲国协和会的一次会晤中，组织者于1936年设计了所谓的满洲国协和会服装或kyōwafuku。甚至日本人，例如Amakasu Masahiko和Ishiwara Kanji都采用了它。它是灰色的，是日本帝国军制服的民装版本。这类似于二战期间的日本平民服装，或是中山装。其领子上戴有满洲国国旗的徽针或带有满洲国本色的五角五色星的徽针。

宫廷服装类似于当时的明治时代的日本服装。

体育

满洲国国家体育协会成立于1932年，旨在促进体育运动。

满洲国还拥有一支国家足球队。足球被认为是该国事实上的国家体育项目。为此还成立了满洲国足球协会。

满洲国主办并参加了与日本队的棒球比赛。一些城际棒球邀请赛在全国举行，并与各地球队比赛。

伪满洲国参加了1932年夏季奥运会，但是打算代表伪满洲国的运动员之一刘长春拒绝加入该团队，而是成为了加入奥运会的第一位中国代表。

日本当局曾试图让满洲国参加1936年奥运会，但奥委会坚持了不让不知名国家参加奥运会的政策。满洲国本有机会参加计划中的1940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奥运会无法举行。

伪满洲派遣运动员参加了日本帝国在东京举办的1940年东亚运动会，以代替已取消的1940年夏季奥运会。

邮票和邮政历史

伪满洲国于1932年7月28日开始发行邮票，直到1945年8月日本帝国投降后才停止、取消。最后一次的伪满洲国邮票是发行于1945年5月2日。

抗战期间的中国文化与思想

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在日本占领下的华北、华东、江浙、广东等地区，以及共产党统治和影响的区域，还有重庆为中心的国民政府地区，都有着很多蓬勃的文化与思想现象。其中有很多著名的文人、学者、著作、电影、歌曲等等。本书就不在此赘述。

这里，我们在下文引述一篇网上的公开文章，出自一本近期的书籍，讲述了蒋介石在1949年以后对于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之兴起的反思。虽然五四运动本身，是以反对传统儒家思想、提倡民主与科学为口号，而在表面上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深切的直接关系，但是，从政治

发展、动员、组织干部等等而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五四运动又的确与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和坐大有着重要而千丝万缕的直接关系。很多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干部，乃至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许多高级核心中共干部，都是受到了五四运动的重要直接影响。五四运动影响下的很多年轻热血学生，后来都投入了延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之中。

那么，在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兴起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从很多角度而言，五四运动直接地促进了中国左翼思想运动的兴起。所谓左翼思想运动是指，那些同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主张帮助贫苦百姓、均贫富、促进社会平等、推崇和依靠劳苦大众、等等为重要核心理念的政治思想运动。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尤其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之所以能够坐大，在诸多复杂政治原因中，左翼思想文化运动的兴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间接的、背景性原因。【当然，中共兴起的直接原因是在于：（1）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导致了蒋介石国民中央政府无法集中精力针对中国共产党的颠覆政权的武装行动；（2）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大量资金、资源、组织等等支持；（3）中国共产党本身的严密组织性，以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极其高超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技巧和勇气，甚至包括谎言、无耻、诡诈、欺骗天下、等等各种政治手段；（4）以林彪为代表的广大中国共产党军事将领的军事才能，以及广大中国共产党军人和士兵的艰苦作战的精神与勇气；（5）等等其它重要原因】。正是中国左翼思想文化运动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兴起，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在

1949年以前一直有着源源不断的年轻新鲜血液的加入，并得到了广大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以及国共内战期间的支持与拥护。这些左翼思想文化运动，包括各种电影、歌曲、文章、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政论文章、宣传文章、报刊杂志、等等，对1920年代至1940年代的中国普罗大众，尤其是很多知识分子与年轻学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而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与暴力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支持动力。

甚至，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所谓“推崇、帮助和依靠劳苦大众”的左翼政治思想【当然，在政治现实上，中共的作为常常是挂羊头卖狗肉、说一套做一套；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共的欺谎，以及中国人民对于谎言的高度容忍性，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共今日的成功】，仍然在中国有着巨大的思想号召力；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统治至今虽然已经七十多年，虽然其丑陋、愚昧、罪恶的政治政策体系早已是天下皆知、路人皆知，但是，在其民族主义、排外主义、仇视西方之口号的号召之下，在其强大政治宣传攻势之下，在其言论与思想的严密钳制之下，在其残酷铁蹄镇压之下，在其繁荣的经济表象之下，中共的统治似乎仍然很严密扎实。

本书在前文已经深刻反思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深刻缺陷、谬误、甚至罪恶之处。我们就不再在此赘述。简而言之，在一般性的左翼思想中，“帮助与扶持劳苦大众”本身，并非是错误的。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固然应当努力地爱人，但是，我们也同样重要地，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我们应当“憎恨

罪、爱罪人”。换言之，我们必须应当“首先，应当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我们的上帝，其次，应当爱人如己”。

在思想领域、政治领域、文化与生活领域，如果，我们仅仅是看到了上面的第二条，而忽视了第一条；如果，我们离开了圣洁公义的、普遍客观的、权威而隽永的、任何世人在良知中都清晰知道的普遍道德法则；如果我们离弃了那创造宇宙天地与世人生命之造物主；如果我们离开了敬虔、真挚、真理性的、超越一切的、谦卑、热忱的信仰；——那么，我们口中的“博爱”就成了空中的海市蜃楼，虚无缥缈的口号与谎言；我们就生活在欺谎之中；因为我们对于世人心灵中、生命中、言语行为中的无处不在的“罪”故意视而不见。真正的信仰，必然使我们既憎恨罪、但又爱罪人。

同样，五四运动以后，深植在中国人灵魂之中的“民主与科学”本身，也并非是错误的。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民主与科学的真正起源与根基，是在于什么。对于这两个问题，本书作者在《论民主》《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两书中曾经有深入的反思和阐述，我们也不再在此赘述。简而言之，它们都与基督教信仰有着深刻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关于十九世纪末以来，贯穿于二十世纪、直至今天仍然盛行于中国思想界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立场，本书前文也曾经有

深刻的反思。这里不再赘述。

我们仅是想要通过下文指出，五四运动的所谓“民主与科学”“自由主义”等等精神，固然并非不对，但实际上是无灵魂的；对于这一点，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许多思想深刻的伟人，都曾经有深刻认识。在这一点上，蒋介石是正确的：从五四运动，到左翼思想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坐大，的确有着一定程度的、思想层面的内在联系。

五四运动所带来的灵魂真空，被左翼思想文化运动所代替，被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思想、唯物论所填满。就这样，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一方面，在中国有着越来越多的敬虔信仰的基督徒们；另一方面，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在背离那宇宙天地之主、永生之神的思想道路上，越行越远。

+++++

+++++

+++++

+++++

+++++

+++++

+++++

《思想史9：五四百年专号》：蒋介石认为五四运动所主张的民主与科学「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口号」

文：黄克武

【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的纠结：1950年代港台朝野的五四论述】

（前略）

四、蒋介石的五四论述及其转折

蒋介石对五四的看法分成几个阶段。首先，他在年青时曾受到新思潮的影响，是《新青年》、《新潮》与《东方杂志》等刊物的读者。1919年至1920年，他多次记载阅读《新青年》，读了「易卜生专号」。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他受到强烈的震动，称赞五四运动的爱国精神，认为中国人民表现出的斗争精神与爱国热情是中华民国复兴的希望，1919年9月24日的日记记载：

至今尚有各界代表群集总统府门前，要求力争山东各权利。各处排日风潮，皆未稍息。此乃中国国民第一次之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吾于是卜吾国民气未馁，民心不死，中华民国当有复兴之一日也。

这种对五四爱国精神的肯定一直延续到北伐成功。

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他对青年运动开始有不同的看法，由正面转向负面。他指出这主要因为革命的阶段不同、对象不同（以往是打倒勾结帝国主义的北洋军阀的时代）。1930年10月中央大学学潮，「校务延弛，学风嚣张」，以致贻害青年。学生受共党之煽惑及之利用，罢课游行，以肆要挟。蒋开始主张限制青年运动，希望青年努力求知，不要造成社会的动荡。这种态度至抗战开始之后，变得更为强烈。他说「现在抗战尚未胜利，敌人尚待驱除，如果有谁在政府对外抗战的时期起来扰乱社会的治安，破坏政府的威信，那就是阻挠革命，破坏抗战，就是汉奸，就是出卖国家的罪人！政府对于汉奸和罪人，当然要依法制裁，毫不姑息！这种极简单而明显的道理，一经说出，一般学生和文化界教育界的人士，一定可以明了，不致为共产党所迷惑！」。

1938年5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学生不准许参加任何政治团体，颁行禁律，无论任何团体，如有此学生运动，应作内乱罪处置」，同时他也着手组织青年团，希望更有效地管控、动员青年。

抗战时蒋介石不但反对学生运动，也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1941年，他批评五四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只有五分钟热度，缺乏哲学基础，以致除了白话文之外，其他如民主、科学方面均成效不彰：

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青年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实在，不彻底，大家都是仅凭一时的热情，动一下子就算了事！所谓「只有五分钟的热度」，中国过去一切事情，都是如此，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中心的思想与理论来领导，更没有根本哲学作基础，所以不能持久一贯的努力！结果，在时效方面，不过是昙花一现，而流弊所及，反而使一般青年彷徨无主，害了国家，也害了自己！可知无论我们从事何种运动，如果没有一贯的哲学思想作中心，就必不能有正确的方向，必不能够持久贯彻，发生伟大的功效。

他更质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

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是指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他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祇求解放自身，不顾国家社会，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太便易，而且太危险了！老实说：当时除了白话文对于文学与思想工具略有所贡献以外，其他简直无所谓新文化。

抗战期间他对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看法不曾改变。1943年，他在接替顾孟余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之后，看到中大校园内匪谍渗透、校园内纪律不佳，对五四运动更为不满，称之为「亡国的五四运动」：

委员长对现行教育深为不满，尤不满于五四运动，尝称之为亡国的五四运动，并谓五四运动较之军阀尤甚，每谈及教育现状，莫不痛惜。

抗战胜利后出现国共内战，他又看到「共匪」鼓动学潮，反对内战，因而对青年运动更加防范。

蒋介石对五四的态度也影响国民党人对五四的看法。1949年之前，在国共斗争的背景下，国共对于五四话语权有不同的态度。共产党积极掌握五四话语，并将之纳入自身思想体系，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国民党在北伐成功之前肯定五四的爱国精神，然而其后出于对青年运动的负面观感，则一直想要放弃五四话语权。简单地说，国民党人对五四并无一致之观点。1943年王世杰的日记有一段话可以反映，不少的国民党人认为五四并非由国民党所领导的一个运动，王世杰对此有所感慨，他提到：

晚间北大同学约请在渝北大旧教师假中央党部客厅聚餐，到者如顾孟余、沈尹默、马衡、王抚五、蒋梦麟诸人，均于二十余年或三十年前开始在北大教课。青年团代表大会日前开会，有人主张以「五四」为青年节日；有人反对，谓「五四」运动非本党所领导。予戏谓在会之罗志希、周枚

荪、段书贻诸人曰：「五四运动，实际上出自本党总理中山先生之策动，本党老党员蔡子民先生之领导。君等今日或为中央委员，或为中央团部干事监察，在五四当时固皆运动中之急先锋也”。

王世杰的话主要是因为1938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武昌成立后不久曾将「五四」定为青年节。1943年三月，三青团在重庆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每年阳历3月29日为「青年节」，以纪念黄花岗起义殉难的七十二烈士。这样五四作为青年节就被废除了。1944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六届年会又将5月4日定为文艺节，并于1945年5月4日举行庆祝活动，此举得到国民党的认可。由此可见国民党只承认五四在文艺上的意义，而要切断它与青年之关系。相对来说，中共一直抓紧五四与青年的联系，从1939年，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时，即将五四定为青年节。国共两党对五四态度明显不同，一消极、一积极；一重文艺、一重青年。

1949年之后，国民党人大致维持上述的立场。蒋介石也基本上延续前期对青年学生运动、新文化运动的负面观感。然而1949年国府迁台，蒋对此深切反省。迁台之后，他密切地观察海内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言论。笔者认为，蒋一方面在政治上必须联合海内外的反共势力，另一方面在思想上，他必须同时接纳胡适所代表的自由民主理念，与新儒家所肯定的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在此一情势之下，蒋的「五四论述」结合了上述自由主义者与新儒家的部分观点，而有一番新的面貌。

在这方面我们不容易在蒋的史料中找到直接的证据，然而有两点思想上的

因素很值得注意，首先，他和新儒家与部分自由主义者一样，强调五四导致中共的坐大，并成为1949年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挫败的一个原因。其次，他同意新儒家对五四的批评，指出民主、科学是不足够的，应加上伦理，而其重要性在民主、科学之上。蒋介石因此将伦理、民主与科学三者与三民主义配合，使之成为「三民主义的本质」，而完成三民主义理论的建构。此一理论是台湾在两蒋统治时代文化、教育政策的理论基础。1966年开始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之主旨即在实践伦理、民主与科学。以下详述蒋氏在这两方面的看法。

蒋检讨失去大陆的各种原因，指出奸匪教师与职业学生煽动、破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说五四的民主与科学与反传统的观念结果适以促成我们被打出中国。1958年4月10日，蒋介石与胡适两人在中研院院长就职典礼上的一个争执可以反映出蒋的看法。这一件事情的经过在《中央日报》或《胡适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之中都看不出来（胡适日记则未记载）。《中央日报》的标题是：「总统期勉中研院同仁发扬民族伦理道德，复兴中华历史文化，提高人性尊严与发展学术研究，建立以科学伦理民主为基础的民族文化，担负起反共抗俄复国建国任务」。根据该报，当天胡适院长致词毕，即恭请总统训示，「总统致训约五十分钟，以恢复我国固有伦理道德，发展科学及学术研究，期勉全体院士及学术界人士。总统训示后，胡适院长曾致词答谢，表示将向着反共复国的目标而努力」。双方互动似乎十分和谐。

然而在蒋介石的日记之中呈现的情景却不然。他于4月9日晚上就在构思隔日的致词要点，他在日记中规划「对中央研究院胡适院长就职时讲词要旨」、「说明西学为用、中学为体之张之洞思想，应作哲学（文化）为体、科学为用的解释」。不过10日当天蒋并没有谈到原先想说的「体用」

问题。 他说了其他的一些话，导致胡适当面的反驳，而让蒋十分不快。

4月10日的日记记载：

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辞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 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个妄人，就又增我一次交友不义之经验，而我之轻交过誉、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惟余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世为虑也。

当天究竟发生什么事情让蒋回家之后勃然大怒，甚至无法入眠？ 蒋在日记里记载：

朝课后，手拟讲稿要旨，十时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参加院长就职典礼致词约半小时，闻胡答辞为憾，但对其仍以礼遇不予计较，惟参加安阳文物之出品甚为欣慰。 午课后阅报..... 入浴晚课，膳后车游回寝，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安眠。

两天之后，蒋又更详细地记载当天发生的事情：

胡适就职典礼中，余无意中提起其民国八、九年间彼所参加领导之新文化运动，特别提及其打倒孔家店一点，又将民国卅八、九年以后，共匪清算

胡适之相比较，余实有尊重之意，而反促触其怒（殊为可叹），甚至在典礼中特提余为错误者二次，余并不介意，但事后甚觉奇怪。

对照《长编》之中有关胡适的答辞，只看到胡适表示他并非要对总统的话加以「答辩」，但他觉得「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然后他花了很长的时间说明共产党为何要清算胡适。从胡适答辞之记录，仍然看不出来胡适与蒋介石的争执为何。

我们对照其他几个史料可以发现争执点在于蒋在致词时提到五四打倒孔家店，以及五四运动与中共的关系。第一个史料是中研院民族所李亦园的回忆：

在历任院长中，李亦园说他最佩服胡适，胡适在47年4月10日接任院长当天，蒋故总统中正说：「五四运动造成共产党坐大，最后政府只好退来台湾」。胡适竟当场指正说：「总统，你错了，五四运动是民国八年的事，共产党坐大，是十几年后的事，跟五四运动无关」。胡适这番话让当时在场所有人「脸色发白」。老总统当场没有说什么，只是直到逝世，都未再到中研院。

第二个史料是史语所陈仲玉的回忆，他当时在就职典礼的现场，并因工作要求，听了中国广播公司的全程录音：

我现在想起来，录音带里有蒋总统讲的满长一段话，而且大家都觉得他是没有稿子的。我不是记得很清楚谈话细节，只记得他提到胡院长提倡五四运动、五四的价值、打倒孔家店等等。蒋总统一开始称赞胡院长的人格高尚，后来讲到自由主义在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他年轻时也满同意的，但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可能跟自由主义有关。

第三个史料是近史所吕实强的回忆，他当时也在场。根据他的记忆，胡适反驳蒋的地方在于：他认为五四运动中的自由主义者要打倒孔家店，是要打倒其中权威性、神秘性之处，这是对传统的反省，并无不当。

无论如何，上述三人的回忆都显示，胡适认为五四运动并未受中共操纵，自由主义也不是中共坐大与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湾的一个原因。他也似乎要表示中共批胡有其思想上的因素，并非蒋所隐含表示为自作自受的结果。不过对蒋来说，他认为两者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

其实蒋早在1951年9月3日的训词之中就曾谈到五四所提倡的民主、科学造成人们精神的空虚，使中共的唯物论乘机而起：

大家都知道，从前五四运动是以民主与科学为口号的..... 当时我们虽以民主与科学推翻了北洋军阀和封建势力，但是以后就没有真实的民主与

科学运动继起，来充实这个民主与科学的内容，以巩固我们国民革命的基础。因之，我们所谈的民主只是没有分际的民主，所谈的科学亦只是没有实质的科学，于是民主与科学失其精神的依据，乃至为共匪的唯物论乘机利用，所以后来就越发走了样，竟以虚假的民主来就是要丧国民的民族精神，以伪装的科学来麻醉青年的思想，戕贼国民的人性，共匪就利用这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来作其出卖我国家、消灭我种族的工具，能不为之警惕戒惧？

对蒋来说五四所主张民主与科学的缺失就在于它们「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口号」，缺乏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伦理与救国为其精神之依据：

所以我们今后革命，除了这「民主」与「科学」二个口号之外，还需要增加一个「救国」的口号，来替代民族主义，就是「民主」、「科学」与「救国」三个口号，以补充五四运动不足的缺点。所以我们今后教育更要强调民族主义救国的口号，来发挥民族独立的精神，加强国民爱国的道德。我刚才讲过，四维八德，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传统的精神和立国的基础，「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所以我们要复兴民族，首先就要确立教育制度，改革教育风气，更要实践尊师重道的良法美意。必须恢复我们固有的道德，发扬我们传统的精神，切合于反共抗俄的需要，而能为大家共同所遵循，然后民主与科学才有所凭借，而能健全的发展。

至此蒋介石在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三民主义的本质——伦理、民主、科学的理论架构。其后蒋则致力于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之论述，先后完成了〈三民主义的本质〉（1952）、〈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1953）等作品，订正《科学的学庸》（1962- 63）。1966年，因

大陆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文化上批孔、破四旧，摧毁传统文物。 1967年7月28日上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于阳明山中山楼举行发起人大会，并宣告正式成立。大会通过敦请蒋介石担任会长，孙科、王云五、陈立夫等三人为副会长，钱穆、孔德成等18人为常务委员，严家淦等76人为推行委员，并聘请谷凤翔为秘书长，谢然之、陈裕清、胡一贯为副秘书长，专责推展中华文化复兴工作。「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主旨为了对抗中共文革，并同时反省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具体的作法则是实践伦理、民主、科学，以重建一个修明伦理、伸张民主、发展科学的现代社会。

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思想史9：五四百年专号》，联经出版

作者：思想史编委会

《思想史9：五四百年专号》收录论文13篇，本期的专号是「五四百年」，特稿有陈永发的〈毛泽东如何绑架五四历史？〉和吕芳上的《当「五四」成为启蒙与革命的复合体：百年学运省思》，以及黄自进的〈日本驻华使领馆对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观察〉、李达嘉的〈重新思考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潘世圣的〈重估五四新文学的发生 与日本——以周作人、鲁迅及郁达夫为线索〉、黄克武的〈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的纠结：1950年代港台朝野的五四论述〉四篇论文，另有Peter Zarrow的“Adventures of ‘Utopia’ in Republican China: Setting the Stage

+++++

+++++

+++++

+++++

+++++

+++++

+++++

+++++

+++++

+++++

+++++

+++++

+++++

+++++

+++++

+++++

+++++

+++++

=====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另一方面，大批的、主流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虽然折服于以严复为代表的、大批中国留学生们【这些中国留洋学生，以及受到他们影响的、新学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大中城市里院校的毕业生们，包括了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毛泽东、江泽民、胡锦涛、等等无数从事政治、干革命、深深改变了中国近现代史的政治家们、军事家们】从西方所引进介绍的斗争哲学、进化论思想、等等“现代人类科学文明与先进思想”；——但是，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他们却从未放弃过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八个字出自晚清洋务运动时期。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内容：—— 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提出，“中学为体”，是强调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以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百度百科）

在过去的一百八十多年中，在大批的、主流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家国梦想中，其实在道德意义上，他们从未真正重视、了解和尊敬过西方文明。

之所以如此，有许多众所周知的、但却非常复杂的深刻原因。在这些原因中，往往好坏参杂；有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值得肯定；有的则有深刻的错误，需要清楚地指出。

中国自身文化的生命力

第一，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有深刻思想传承的、以儒释道为主体的、复杂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的思想文明体系。

中国的历史与欧洲的历史非常不同。中国是一个有着强烈中央集权色彩的国家，是一个坚定而稳固的思想文明政治体系。欧洲则是一个不断分分合合、吵吵闹闹的众多小国所组成的大家庭。中国历史上称外国人为“夷

人”，正如古罗马帝国称北方民族为“蛮族”一样。在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后，直到近现代以前，其实就没有真正、平等的外交政治，因为中国的那些邻国、外国，在政治经济影响上，在人民文明与富裕程度上，都是中国人眼中所谓的蕞尔小国。自古以来，华夏汉族自视为中央帝国，而外族都是前来朝拜、万国来朝的、偏远地区的、尚未完全开化的百姓而已。

中国有着光辉的思想文字历史，有着像《论语》《老子》《周易》《诗经》那样古老的、深邃的、明哲的人生哲学思考与历史文化遗产。这些古代文字所代表的深刻思想，所表达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孝敬、忠诚、诚实、顺服、忍耐、坚韧等等精神，对于社会、家国、人间道德社会的纲常秩序等等，有着极其重要的、显然的、无可置疑的重大意义。这些古代文字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对于人生思考的重要助益，在人类历史上，绝不亚于古希腊罗马的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西塞罗、托勒密等哲学家的思想，甚至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或许，它们的重要意义、深远价值、重大教益，就人类整体历史而言，仅仅次于圣经本身。

中文是一种表意文字，而不是像西方文字那样是字母拼写文字。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境内，虽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绵延辗转数千里，虽然有许许多多的方言，甚至每一个省份、每一个县市、隔着大山的不同村落，都有自己的口音方言，但是，却“书同文、车同轨”。相比之下，西方的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等，由于都是以字母拼写为形式，因此逐渐地，各自发展成为独立、平等的语言、邦国、文化体系。

中文的表意文字，相比于西方的拼写文字，虽然对于孩童来说更加艰深难学，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导致高文盲率，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导致文字出版和印刷自动化更加困难复杂，但是，却是一个重要的、意义重大的文化和政治纽带。这个纽带使得整个大中华主义成为一种不可分割的、不可断开的思想文化整体，成为一个有机的、生命力极强的文化传承体系。

力量与真理

第二，虽然，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中，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曾经有过大量的碰撞、摩擦、互动过程，以至于今天的中国早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革命与变化；但是，其实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从未进行过真理层面的、坦诚的、直接的冲突与对话。

虽然，中国在近现代史中，曾经多次是西方军事的手下败将，甚至曾经是西方文明的“学生”、日本的手下败将，但是，恰恰因此，那些复杂的中国近现代政治军事历史，没有导致中国人在道德意义上尊敬、重视西方文明，反而是，更加极大程度地增强了中国知识分子们、乃至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忧国忧民、同仇敌忾的心志。

历史上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中日之战、以及一系列的被迫开放国门的条约，甚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中国的八年抗日战争，等等复杂的近现代历史，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内心伤痛、满怀屈辱。

这些复杂的、许多因素缠绕其中的、饱受屈辱的近现代中国历史，一方面让中国人对于当年的清朝政府、民国政府、腐败官员、糊涂政治决策等等痛恨得咬牙切齿，另一方面更让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以及深受西方文明影响、明治维新之后“以西方为师”的日本，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态。

今天，在普通中国人心中，尤其是在那些见识过外面世界、内心诚实而开放的普通中国人心中，人们对于西方文明的复杂心态，包含着互相矛盾的、很难调和的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人们认识到，西方文明思想体系是璀璨的、是博大精深的，是对全人类有重大贡献与巨大影响的，是文明的。看起来，西方文明中包含着很多好的“哲学”，很多好的思想、内容、政治体制、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科学、等等。因此，许多功成名就的家庭都梦想着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常青藤大学去留学、接受深造，等等。

第二个方面是，人们不可能忘记那些屈辱的近代历史，不可能忘记那些窝囊的战役、羞辱的条款，更不可能忘记，中国的大门正是被洋人的枪炮所打开的。换言之，在许多中国人心中，从道德意义层面而言，中国文明从未曾被西方文明打败过。那曾经打败中国的，仅仅是枪炮与科技而已。这正如，在五胡乱华的时代，或是华夏文明败于蒙古成吉思汗、忽必烈，以及败于满清八旗军队的时代，那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并非是因为蛮夷人有更高的文明、有更温良恭谦让的仁爱，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更加野蛮而已。

虽然，在现代中国人的文化氛围里，人们常常在表面上推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但是，每一个中国人在良心深处中都知道，其实，强权、力量、武力，绝不简单地等于真理。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里，都认为，中国文明在近现代历史中从未曾被真理打败

过，而仅仅是被强权、力量、武力打败过。这样的历史，既绝不能够说明中国文明不好，也绝不能够说明西方文明好。恰恰相反，对于许多重视民族主义、有强烈家国梦想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正说明了中国文明好，西方文明不好。

在这里，我们不必去分析所谓鸦片战争的复杂来龙去脉，也不必去探讨八国联军侵华的起源，而仅仅是在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可的历史文化层面上，探索为什么中国人至今对西方怀有敌意或蔑视，以及，这样的心态正确在何处，错误在何处。让我们接下来继续分析。

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第三，当面对西方文明的时候，当思考如何吸收西方先进科技与文明体制的时候，中国人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普通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思想家们，却从未认真地想到过、反思

过、辩论过，在西方思想文明体系中，究竟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以及为什么。更进一步说，甚至，中国人很少去认真思想，所谓西方思想文明体系，到底是什么。

中国人常常大而化之地以为，所谓西方文明的精华，就是那些器物层面的，科学技术发明等等。一些内心开放的中国人，还会把民主自由、宪政、法律、经济等等方面的内容，也看作是西方文明的精华。但一般而言，这就仅此而已了。

而关于西方文明的糟粕，中国人则常常误以为是，自由散漫、贪生怕死、贪图享受、个人主义、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吃苦，或者从更深层意义说，也包括西方历史上曾经有的宗教专制、封建愚昧等等。在这方面，很多现代中国年轻人追随、仰慕西方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个人解放，甚至性解放、性自由等等。

简言之，中国人很少去深刻地、公道地、客观地研究，西方文明究竟是什么，其中的内在机理是什么，主要构成要素是什么，等等。甚至，中国人大多数虽然都听说过、知道，基督教信仰对于西方文明的核心意义，但是，却对基督教信仰的内容了解极少、乃至不知所云。

这固然由于，西方文明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动态有机体，而绝非是一个单纯的、静态的、内容一致的铁板一块；但也是因为，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历史的局限、现实政治环境、思想环境的局限性等等原因，从而导致了，那种对于西方文明的全面认知，还没有、或很少在中国出现。这样的隔阂状态，不仅是在中国大陆如此，即使在资讯自由流通的香港和台湾，也往往是如此。例如，我们从现代著名文化人南怀瑾的著作中，就能够看出，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文化人对于西方的了解和认知，仍然有着很多主观臆断；这些主观臆想，与实际的西方现状、文明状况等等，有着很大差异。

中国古代文明看起来并没有什么错

第四，在过去一百八十年中，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互动、来往等等过程中，中国人其实并不真的觉得，中国古代文明有什么错。

当清朝灭亡以后，很快就爆发了五四文化运动。五四文化运动直接催生了现代中国白话文书面语言的正式诞生与系统性普及。五四运动期间，一个重要的主旨就是，要砸烂孔家店，反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精髓，反对以孔子论语为核心代表的儒家思想。清末民初，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强烈的反孔的情绪，是因为人们实在痛恨和反感清朝末年的官吏腐败、政治专制、政策愚蠢的局面。人们常常把这些专制弊端归因于孔子的儒家思想。

但是，这种反孔子、反传统的情绪是肤浅的、也是短暂的；很快，到了1920年代以后，社会上就重新兴起了对于曾国藩等传统儒士著作以及整个儒释道中华思想传统的重视。从根本上说，很多中国人并不觉得，在近现代史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冲突，是由于中国古代文明传统的系统性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事实也的确如此。

人们在切身生活感受上，仍然感受到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性。即使是那些把儿女送到海外留学的父母们，也不希望儿女因抛弃了传统价值，而失去了顺服、听话、孝敬、尊老爱幼等等品德。

人们在国家凝聚力上，仍然深刻地、警惕地认识到，传统文化价值体系、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等的重要性。

在近现代历史上，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文明而言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这也让中国知识分子们更加迫切地感到应当加强和强调传统价值思想体系的重要性。因此，他们不愿意在西方文明面前，抱以重视和尊敬的态度；反而是，有意无意地贬低西方文明的重要地位，而特别地强调中国传统文明价值的伟大意义。

凭什么因为需要尊敬别人的技术、需要学习那些技术，所以就要尊敬和学习别人的思想体系呢？

第五，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中，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中国需要认真、勤奋、扎实、痛下决心地尊敬和学习别人的科学技术。这一点，很少有中国人会怀疑。但是，很不显然的却是，凭什么因为要尊敬别人的技术，所以

就也要尊敬别人的思想体系呢？

这正如，汉人在历史上曾经要学习胡人的骑马射箭技术，但是，汉人却从来没有必要学习胡人的什么思想体系。事实上，华夏民族的思想体系，论语的仁义礼智信，道德经的深邃，要远远地胜过胡人的思想文化传统。

换言之，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技术与思想体系之间，并不一定有什么必然联系。学习和效法先进的技术，绝不等于要学习和效法别人的思想体系。这对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常识来说，都显然是正确的思路。正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很深刻，至今在中国人心中仍然刻下深深的烙印；——尽管，我们今天或许很少直接用这八个字来表达我们对待西方时的想法与政策方针。

对于一个普通正常人的思维方式来说，显然，技术与科学是一回事，文化哲学思想体系则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两件事之间并不一定非得有必然的联系不可。不但如此，事实上，在人类的历史上，常常是那些不文明、野蛮的民族和国家，才往往长于技术，尤其是那些杀人放火的军事技术；而那些文明程度更高的民族和国家，则看起来，往往是和平的、是与世无争的；——至少，在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的眼中，就常常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虽然，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中，中国知识分子们看到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因此都认识到、都同意，需要认真而勤奋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这绝不等于说，主流中国知识分子们就因此而重视和尊敬西方文明，——尤其是关乎道德意义上的文明而言。

凭什么一定要服气

第六，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的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中国虽然经历了许多失败、羞辱、挫折、失落，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来说，我们凭什么就要因此而在心灵里投降、就要因此而在西方文明面前俯身膜拜、就要因此而服气呢？

难道，中国人的心灵与精神中，没有坚强的脊梁吗？我们岂能有奶就是娘呢？我们固然可以接受和学习别人先进的技术、科学、甚至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管理经验等等，但是，难道我们接受西方，就等于要摒弃文明老祖宗的光辉而璀璨的文明礼制、思想传统吗？

如果说，当面对西方的时候，我们不但不应当摒弃我们自己的文明思想体系传统，反而应当更加坚持和发扬那些古老的文明与悠久的历史、品德、信仰；——那么，这难道不就正意味着：——我们不应当在西方文明面前卑躬屈膝，也不需要道德意义上重视他们、尊敬他们。

技术体系与思想体系的根源关系

第七，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的近现代中国历史中，虽然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们都认识到科学技术的深远而伟大的意义，但是，却很少有人认识到、也很少有人同意、甚至很少有人会想到有这种可能性，即：——那些科学技

术与西方思想体系本身之间有着什么深刻的根源性关系。

人们常常说的一句话是：“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因此，若有人说，在科学与西方文明思想体系之间，甚至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性的、根源性的关系，那么，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匪夷所思、令人难以同意的说法。

所以，当人们说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类的、对待西方文明体系所应当采取的策略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们往往会点头称是。但是，当听说“现代科学的开启与爆炸性发展，与西方思想文明体系，尤其是与基督教信仰之间，有着深刻的本源性关系”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们往往会立刻声色俱厉地反驳说道：——中国古代也曾经有非常璀璨的科学技术历史，并且，在西方历史上，宗教信仰正是压制科学技术诞生的重大阻碍因素。

不卑不亢，亦或是应当俯视还是仰视？

第八，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们在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上，常常是有两种极端态度，而很少有中肯的、平衡的、不卑不亢、实事求是的、公道公平的态度。这两种极端态度分别是，主流的、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往往对西方文明抱着俯视的态度；而少部分中国人则抱着崇洋媚外、甚至试图要全盘西化的态度。

一般而言，那些越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思想体系熟悉并深感骄傲的人们，就越会以鄙视的态度、俯视的心态，去面对西方文明，甚至根本不愿意静下心来去了解一下，所谓西方文明，到底是什么。

反之，那些越是想要崇拜武力、喜欢时髦、看重力量、喜好外在物质的人们，则就越会以仰视的心态，去看待西方文明，而把自己的中华文化看得一无是处。

上述两种立场，其实都不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明哲的心态。他们两者，也其实并不真的懂得，所谓西方文明，到底是在说什么。

直至今日，许多中国人都肤浅地把所谓西方文明看作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骑士精神、资本主义、个体主义、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百花齐放、自由烂漫等等的代名词。很多人喜欢西方的那些故作高深的哲学，还有的人喜欢西方的竞争与创新，更多的人则仅仅是把西方看作是物质经济发展比较发达的地区而已。

至于圣经、基督教信仰，很多中国人或是对此完全无视、忽视，或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既没有兴趣、也没有信息资源去了解，基督教信仰的内涵、外延、历史，与欧洲国家历史的演化有着什么深刻而内在的关系。还有的人，则简单地把基督教信仰与西方文明划上等号，大而化之地把西方文明体系看为是铁板一块，大而化之地用中国人在传统文化体系中所熟悉的那种念经敲木鱼的宗教观念，去看待和揣摩基督教信仰，甚至鄙夷地把基督教信仰看作仅仅是洋教而已，等等。

涉及到现实民主政治与权力斗争

第九，在过去大约一百八十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们不重视、不尊重、不了解西方文明体系内涵的另一个非常重要而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在漫长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在经历着自古以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局。动荡的政治现实与权力斗争，阻碍了知识分子们深刻思考历史、反思文明的客观环境条件。

过去的一百八十年的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满清政府、民国政府、以及中共政府。在专制政权的环境下，政治宣传的目的往往是为了维护本政权的生存与稳定性，为此，许多政治宣传内容就是有意识地进行反西方的信息灌输。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政治宣传对人思想的毒害影响至深，使人无法认识到历史、事实与世界的真相。

麦子与稗子

第十，在西方世界内部，存在着复杂的、好坏参杂的情况。

马太福音

13:24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

13:25 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

13:26 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

13:27 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阿，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

13:28 主人说，这是仇敌作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

13:29 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

13:30 容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惟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13:36 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

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

13:37 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

13:38 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13:39 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13:40 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13:41 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

13:42 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13:43 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

+++++

+++++

+++++

+++++

【【【引述 《从金刚经说起》中的内容 西方文明与基督教信仰之间不能划等号】】】

虽然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思想与文明体系影响如此广泛，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文化思想与文明体系简单地当成了基督教信仰本身，或者，如果我们简单地仅仅把西方文明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划等号，那么，我们就犯下了严重的、望文生义、不认真负责、偏离事实的错误。

事实上，我们只要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近三百年来，虽然有很多好的事情，比如现代科技革命的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民主自由制度、法治、自由经济、平等贸易、社会大分工协作、医疗、教育等等，还有无数的、具体的科学技术发明，都是来自西方；但是，也有很多坏的事情，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神论主义、进化论哲学、性解放、放荡主义、离婚泛滥、家庭破碎、甚至同性恋等等，也都是来自西方。

显然，如果我们刨根问底、认真查考、追本溯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明白，西方世界绝不是铁板一块，西方人也绝非全都是纯洁无辜的、敬虔谦卑的圣徒。

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化的优异成分；看不到西方文明给人类所作出的、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看不到现代人要在何等广泛而深刻的程度上，感谢——培根、波义耳、牛顿、等等无数科学家、哲学家，以及源自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现代医院体系、现代教育体系、现代经济法律制度等等；看不到在西方的无数的、大批的、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们，在科学、文化、政治、法律、医疗、教育、服务、信仰领域，为社会、为人类所作出的可歌可泣的杰出贡献；看不到在西方各国有那么多、数量巨大的信仰敬虔、谦卑诚实、热忱真挚、敬老爱幼、爱人如己、勤奋工作、热心服务于大众和全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真诚基督徒们；——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没有良知、没有诚实态度的人。

另一方面，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明中的错误、缺憾、谬误成分，比如，在诸如法国为首的、遍及西方各国的、打着人文主义旗号、放荡不羁的淫乱主义、性解放主义；在诸如德国为首的、遍及许多国家的民族自大主义、好战主义；在诸如俄国为典型代表的信仰虚伪主义、专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起源于英国等国学术领域的达尔文进化主义，和盛行于德国的唯物主义、泛神主义、自然神主义、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不是仔细思考与观察、真诚寻求真理的人，而仅仅是盲目崇拜西方的武力与物质繁荣，而在心中没有正义、没有饥渴慕义之心的人。

事实上，即使我们撇开这些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历史、哲学史等历史领域的角度不谈，单单从宗教信仰、基督教教会的历史与现状来看，西方文明体系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甚至分裂的、内部景况；——这也从侧面再次证明了，西方文明体系绝非简单地、直接地等

于基督教信仰本身。

基督教会的简史

在基督教信仰的传播与教会历史中，在大约公元15世纪以前，基督教会一直分为东西两大部分。

天主教与东正教的由来

东方教会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是从大约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归依基督教信仰以后，把罗马帝国从罗马迁都至当时的拜占庭市开始的。拜占庭市位于欧洲与亚洲陆路交通的重要枢纽节点。它后来被改名为君士坦丁堡。这个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以基督教信仰为国教的帝国，被后世的历史学家称为拜占庭帝国；她从公元四世纪一直延续到公元十五世纪，存在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没有改朝换代的重要国度之一。公元八世纪左右，这个以希腊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基督教国家，开始不断地把信仰传播到后来称为俄罗斯等、以斯拉夫民族为主体的各个国家。俄罗斯这些国家曾经在很长时期一直处于农奴制度状态（俄罗斯的农奴制度一直到后来十七世纪彼得大帝改革、效法西方工业革命等等的时候，才开始被完全消除）；然而从公元八世纪开始，基督教信仰已经逐渐把社会文明和人道关怀制度带给俄罗斯等的广袤土地。

西方教会以罗马为中心，在君士坦丁大帝迁都君士坦丁堡以后，延续和保持了从公元一世纪下半叶（注：耶稣基督于大约公元元年左右降生，于公元三十三年左右被钉十字架）、使徒彼得时代以后建立的教宗制度。在从公元四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的上千年历史中，以罗马教宗制度为核心、以拉丁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西方众教会，与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以拜占庭帝王为政权中心、以希腊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东方众教会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在公元一千年以前，东西方教会基本上是兄弟般的关系。他们——都以圣经新旧约全书为共同的信仰根基与中心教义的基础；都相信和承认，圣经、也只有圣经，是上帝的全备话语、是上帝亲自的、超自然的启示与默示；都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都信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

但是，在公元一千年之前，在东西方教会之间，也一直存在着既合作、又有纷争的状态。两者在各自教会权威、教义细节等方面都有很多争议、互相对对方不服气。这种状态持续到公元一千年，终于矛盾完全爆发，互相之间彻底决裂，互相否认对方的信仰合法性。

中世纪

公元十五世纪，君士坦丁堡被后来称为土耳其人的突厥民族攻陷。君士坦丁堡为改名为伊斯坦布尔；这个名字是源于突厥人的伊斯兰信仰。从此，

拜占庭帝国正式覆灭。然而，东方教会，此时已经自称为东正教，逐渐开始向莫斯科方向迁移、直至后来以莫斯科为其中心，继续与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天主教会体系分庭抗礼。大约在同时，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体系（自称为天主教系统），于公元十五世纪开始了被后世称为文艺复兴的一种近现代文化革命运动。

值得指出的是，从大约公元四、五世纪至十五、十六世纪的一千年，被后世称为的所谓“中世纪”，其实并非人们所常常误以为的、专制主义压迫的黑暗时代。事实上，任何诚实的历史学家都会承认，尽管在这期间发生了几次针对中东的十字军东征、回击伊斯兰的进攻和劫掠，但是，总体而言，在这大约一千年的漫长历史年代中，整个欧洲，包括西方教会影响下的西欧，和东方教会影响下的东欧，在政治与军事上，基本上是处于平时时期，几乎很少有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很少有兵荒马乱、生灵涂炭、改朝换代的时期。在许多乡间、市镇、经贸中心，人民安居乐业，许多地方治安良好、常常夜不闭户。

在中世纪的长达一千年中，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教会与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各有特色、短长、优缺点。

东方教会所处的拜占庭帝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帝王及其家族笃信基督教信仰。东方教会分成各个教区，众教区的各级牧者、长老等等围绕着拜占庭帝王，彼此和谐，处于互相和平、长达几乎一千年的安稳状态中。事实上，拜占庭帝国这个名称，是后世的历史学家给起的；当时的人们从未曾这样称呼。他们这个国家，一直自称为“基督之国”、或“东罗马帝国”。

而在西方教会，随着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时代在公元四世纪、公元五世纪的解体与破败，罗马教宗体系饱经风霜、生死存亡、无数的患难、危机。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一本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著名的基督教圣徒、奥古斯丁，以及他的《上帝之城》。这本书讲述了，根据圣经、耶稣基督的教导，所谓上帝的国度、上帝之城，究竟是什么意思。在长达上千年的中世纪历史中，西欧从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但是，却有一个统一的教会体系，就是以罗马教宗为首的天主教教会体系。

我们会在其他文字中，继续深入讨论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历史之间的比较，以及他们两者之间的短长、利弊、得失；并从中反思，基督教信仰的教义，以及，基督教信仰与世上国度、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文明体系之间的深刻关系，应当是怎样的。

中世纪与近现代之间的分水岭

公元十五世纪是西方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正式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近现代历史的开始。此时，一方面，君士坦丁堡被伊斯兰的突厥人攻陷，因而，整个欧洲大陆与东方地区之间的贸易枢纽、中枢节点被强行隔断。从此，西欧各国开始大兴海上贸易，从而使得曾经位于西欧文明边缘地带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成为海上强国，纷纷在经济政治上依次崛起。

另一方面，从公元十五世纪，以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城邦为中心，因着一个开始于美第奇家族的长达约两百年左右的统治，开始了——被后世称为文艺复兴的艺术文化运动，以及，与此同时的、罗马天主教体系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和影响。美第奇家族供养了许多后来极为著名的艺术家，包括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人。这些艺术家回归基督教信仰临到欧洲之前的时期的希腊艺术风格，以绘画和雕塑人体为美、为荣。美第奇家族积极地涉足政治与宗教领域，甚至有的家族成员自己成为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教皇。美第奇家族的奢靡与腐败之风，加重了罗马天主教本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的弊病。

天主教与东正教的谬误

自从公元四世纪开始，当圣经新旧约全书被从原文（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翻译成罗马的官方语言、拉丁语以后，罗马教宗系统就开始逐渐把圣经束之高阁，使普通人无法轻易接触到、阅读到圣经。在公元十六世纪以前的长达一千年中，西欧各国绝大多数人民，都只能从教会的神职人员那里聆听基督教信仰的教义，而没有机会自己去阅读圣经、上帝的话语。

在教义方面，天主教系统添加了许多圣经本身没有、甚至是圣经明文反对的内容，例如，不恰当地高举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地位，甚至称之为圣母、上帝之母，以及，把历世历代的许多基督教使徒们、圣徒们当作偶像崇拜、向他们顶礼膜拜、祈祷、祈求庇佑（在这些方面，东正教与天主教存在着同样的谬误，即，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圣经本身的教义和教导，而在后世添加了一些违背、偏离圣经内容的教导、信条）。而且，天主教

还在后世自行添加了一些伪经、次经，以及向圣母玛利亚祈祷、敬拜的玫瑰经，等等。

好在，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纷争与分裂状态，虽然是一件很不好、极其令人伤心的事情，但是，这种状态却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可信地保证了，圣经新旧约全书本身，一直被精心地、忠实地保存着，直至后世，因为天主教与东正教双方之间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互相监督、有力督责的效果。

并且，尽管天主教与东正教中存在许多谬误和偏差，但是，我们仍然要说，他们的主流信仰、主干教义、主要信条，例如“使徒信经”等对于基督教信仰教义的总结，是正确的。所以，在天主教与东正教里面的信众，如果真心地、真诚地、热忱地寻求和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的以耶稣基督为自己生命的救主，那么，我们仍然可以说，他们是良善的、真诚的基督徒——尽管，我们应当诚实指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

圣经的广泛翻译传播，以及近现代时代的开始

公元十五、十六世纪，随着君士坦丁堡被突厥人攻占、拜占庭帝国灭亡，东方教会保存的希腊文的圣经原典以及许多其他希腊文写成的著名基督教历史文献和著作，被教会人士抢救、传播到西方教会体系。这些希腊文的文献以及圣经原典，开始让西欧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罗马教会的圣经拉丁语译本，在一些重要教义方面的词汇概念上，存在着一些翻译上的失

误或偏差。

几乎与此同时，欧洲发生了许多历史意义影响深远的事情。我们仅举以下三件极其重要而著名的事情为例。

第一件事情是，金属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大规模、迅速地、廉价地印刷、传播纸质书籍在技术上成为可能。

第二件事情是，罗马教宗的教义上的谬误，以及财物方面的奢侈腐败作风，终于激起了教会各级神职人员以及普通基督徒们的反抗。以德国的马丁路德为代表，一大批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反抗教廷、传播圣经、传播真正纯正的福音与基督教信仰教义。马丁路德把圣经翻译为德语，极大地推动了圣经在社会中的普及化、广泛传播。

第三件事情是，英国的丁道尔开始把圣经翻译成英语。这些圣经翻译运动本身，直接导致了现代德语书面语、现代英语书面语等等的诞生，因为在那之前，西欧的书面语言只有一种，就是拉丁语。

圣经的广泛传播，使得欧洲的无数普通人开始真正地、详尽地明白基督教信仰的真正主旨、原则、精髓；这些基督教宗教改革运动，深刻地革新、更正了欧洲各国人民在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方面的许多认识与观念。这样的革新与更正，直接地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开

启；以及，现代民主自由政治运动、法律、经济等等许多方面的变革，如火如荼地在各地展开。

这些事情，推动了、构成了过去五百年来的欧洲近现代史，并进而，对于全世界的文明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影响作用。今天，每一个出门坐火车汽车飞机、早上吃牛奶面包、上班穿西服革履、住在高楼大厦或四季温暖如春之庭院别墅里的人，都要感谢培根、牛顿、波义耳等现代科学的开启者们，更要感谢那些舍生忘死地传播圣经、传播基督福音的敬虔基督徒们。

基督教会简史的总结与反思

从上面的简史中我们可以看见，在耶稣基督降生以来两千年的历史中，每当人们贴近圣经、寻求圣经、明白圣经话语的时候，他们就展现出热忱、敬虔、谦卑、真挚、积极的信仰，他们的生命就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社会与国家就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也发生极其巨大的改变；上帝的祝福就极大地、温暖地、令人震撼地临到他们。

反之，当人们沉浸在自己的罪性与私欲中，沉浸在彼此的纷争中，当人们没有真诚地、认真地、热忱地寻求上帝的话语、信仰的真理的时候，那么，他们的生命就显出冷漠、消极、倦怠的样式，他们的道德就不断滑坡，他们整个社会与国家就充满了许多动荡、败坏之事。

从基督教会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反思。

一，上帝的国度，虽然表现在地上的教会中，但是，从终极的意义与层面而言，基督的国度不属于这地上的任何地方，而是属灵的、属乎天上、那永远的国度与家乡。

二，然而，这并不是说，基督教信仰在这个地上就没有：——确定的、明晰的、任何人都无可否认的见证。事实上，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人道主义、人的生命与自由被极其重视，到艺术文化、经济与科学的大发展等等，——在无数的层面上，现代人类文明都被深深地刻下了基督教信仰的烙印。（读者可以阅读《基督教的果实》《基督教信仰之大众证据》《基督教信仰之证据的反思》等系列书籍，进一步查考这些方面的事实与信息。）

三，但是，在基督教信仰与西方文明之间，是无法划等号的。前者固然在极大程度上深刻影响了后者，但是，后者中包含着许多其他方面的成分与因素，甚至包含了无数的糟粕、不义、败坏、奢侈、贪婪、淫乱，等等。

那些感叹“为什么基督教信仰没有全部改变欧洲人、使全体西方人都成为基督教圣徒，或是为什么没有彻底消灭那些罪恶的恶人”的人们，并不明白：——上帝是公义、圣洁、慈爱与恩典的，他的终极道德审判必将来到，他的终极惩罚是永远的；然而，他以恩典与慈爱，给世人悔改己罪的时间与机会，使他们真心地、真诚地、而不是被强迫地，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在

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上帝的无限公义与权柄，到那终极的审判日，必将昭然地显明在一切世人的眼前。

四，那么，为什么有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对于基督教信仰和西方文明不太了解、不求甚解的人，常常把这两者看为同等呢？

这一方面是由于，许多世人并不了解基督教信仰的真正主旨、福音的真正涵义：——“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人在世上应当勤勉而敬虔地生活、工作，但是却不应当把心系于这个世界，以这个世界、或其中任何被造之物为心灵的归依”；尤其是不了解基督教信仰、与世上之国关系的教义：——“基督的国度属乎天上，而不属乎地上；真诚、谦卑的基督徒应当在这个世上作盐、作光，把基督的爱带给世人，见证福音的真实，见证耶稣基督伟大、圣洁的爱；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温柔的福音，是圣洁的福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烛火他不吹灭。”

另一方面是由于，世人因着自己生命中的罪性，因着自己的心系于这世上的国度与荣华，所以，常常误以为，神的作为和果效，是要终极地显示在这个地上的世界中。他们把世上的荣华璀璨、建筑物的宏伟绚丽、人群的华盖云集，错误地当成了天国里的永远荣耀。他们总是以为，非得要通过外在的、表面光鲜的“荣光”，来看待那些属灵的、属天的、属乎道德的事情。

五，基督教信仰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影响最大，特点也最独特的宗教信

仰。它虽然指出，我们不应当以这个被造的世界或是其中任何被造之物、被造之人为我们心灵的依归，而是要单单地敬拜那位创造宇宙天地、创造我们生命的主；但是，它不是像佛教那样抱着虚无、万事皆空、不垢不净、不生不灭、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诸相皆虚妄的态度，以否定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一切世事。它告诉我们，应当积极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以谦卑、温柔、真诚、和平的心，以勤勉、专诚的工作，去面对一切事情、一切世人。

它虽然指出，只有上帝才是我们的造物主、生命之主、永生之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上帝是我们道德律法的颁布者、是圣洁公义而全能的终极道德审判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道成肉身，耶稣基督谦卑地降身为一人，生在马槽里，生在律法下，取了奴仆的样式，甚至谦卑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救恩，使一切相信他、接受他救恩的人，得到永生，得以进入那永远的天国、得享那永远的幸福与美好。

它不是像伊斯兰教那样用火与剑传教、荼毒、劫掠，而是用谦卑、慈爱、怜恤与和平的方式，把福音向世界分享。它不是像伊斯兰教那样推行、奉行政教合一的教义与制度，更不是要在地上建立起什么伟大的、属世的国家；它不是要以严刑峻法来统治臣民，更不是要让整个社会万马齐喑、丧失活力与创造力。在圣经福音书中，耶稣基督清楚地说道：“我的国属乎天上，而不是属乎地上”。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基督教信仰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良善影响是最大的，也是有目共睹的。

+++++

+++++

+++++

+++++

+++++

人的罪

第十一，毋庸置疑的是，在每一个世人的生命本质之中、在心灵深处，都充满了骄傲自义、自私自利等等各样的罪性与罪行。因此，当人所属的原有思想观念体系受到冲击的时候，他们就会倾向于，本能性地抗拒、排斥、反抗。

在人的心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往往就是自以为义；即，人总倾向于认为自己所处的境况、所属的团队是好的、正义的，包括自己的家庭、社群、祖国、思想传统等等。当人遭遇失败、挫折、落于下风的时候，往往会怨天尤人，而很少会反思自己；甚至，人常常会迁怒于外界各样的因素；以仇恨、苦毒、猥琐、自私、自义、心骄气傲的心理去看待世界。很少有人愿意接受挫折和失败。很少有人愿意面对痛苦的反思与深省。

地上的国与神的国

第十二，当人的心背离上天、上帝、那宇宙天地造物之主的时候，就会把自己的心灵与灵魂系于这个世界，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并且，世人常常会有一种深刻的误解，就是认为，上帝的圣洁国度和地上的国一样，充满外在的虚浮样式。

因此，这就往往是因为，很多中国人常常会把基督教信仰与西方政治混

为一谈；而且，会把西方政治中的某些缺陷、不完美、不好的地方当作借口，对基督教信仰嗤之以鼻；并且，不但如此，反过来也对西方文明抱着蔑视的态度。

=====

=====

=====

=====

=====

=====

=====

=====

=====

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过去一百八十年中，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师夷长技以制夷”一直是被很多中国人所认同的、与西方人打交道的原则和战略战术。直至今天在许

多中国人心中也是如此。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仍然没有去认真、谦卑、诚实地去思想，西方人的长技究竟在于什么，其背后的原因、起源在于什么。

不但如此，直至今天，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仍然莫须有地、不实事求是地、不认真考察地、主观臆想地认为，在西方世界，存在着一股反对中国人的强大势力。【值得指出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在西方人反对中国人的历史中，固然有许多错误和弊端，但是，西方人往往并非是因为对方是中国人而反对中国人，而是因为针对对方各样的错误言行而反对。】

因而，一百八十年以来，虽然屡败屡战，但是，中国人的战略出发点、战略原则、战略目标，从骨子里就一直是想要怎样制夷，——怎样打败、制服、压过那些西方来的“野蛮人”。

如果，中国人不深刻地、不真诚而诚实地面对客观事实（尽管客观事实或

许非常复杂），那么，即使《大学》中所说的心诚、格物、致知，也必将令中国人羞愧。

=====

改革开放，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经验与科学技术：——结果是什么

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又一次进入了类似于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的改革开放运动。其中的主旨，仍然是类似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只不过这一次在很多名义上都换了称呼，号称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然而，在骨子里面，中国仍然是抱着对于西方所谓亡我之心不死的、莫须有的敌意（这在很大程度上，固然是出于当政者的政治私利而导致的政治性宣传和欺骗，也实际上与普罗大众的骄傲和排外情绪深有关系），在国内进行信息资讯的封锁与政治宣传，使中国人在内心思想上，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敌意越来越深。这样的罔顾事实、缺乏公正与公道的集体心态，必将把中国政治又一次带入崩溃与混乱之中，重蹈百年前的秩序崩塌的覆辙。

[illegible]

+++++

+++++

+++++

+++++

+++++

+++++

抗战期间中国的基督教信仰的发展

以下引述网上的公开学术资料以及相应回忆文字。

+++++
+++++
+++++

+++++

（选摘）

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基督教

摘要：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各地疯狂地烧杀抢掠。河北基督教会也蒙受了很大损失，许多教堂被抢、被占、被毁，教职人员和信徒被逮捕、被杀害的惨剧也经常发生。在全国人民的抗日洪流中，河北基督教团体以各种方式从事救亡运动，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抗日战争；基督教；河北

中图分类号：E 2 9 6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0 0 9 — 3 4 5
1 （2 0 1 0）0 3 — 0 0 1 4 — 0 7

作者：刘海涛，民族出版社编辑，博士

从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到三十四年（1 9 3 7—1 9 4 5）的全面抗战八年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并在这些地方烧杀、抢掠，国家和人民遭受着巨大的苦难，基督教也不例外。在河北，基督教的教堂、学校、医院或被日军占领，或被抢劫一空，或被炸毁；教职人员和信徒被逮捕、被杀害的惨剧也时有发生。在全国人民的抗日洪流中，河北基督徒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相关资料受到了严重损毁，因此，详细而具体的情况很难描述，只能从一些教会人士的回忆录、大后方基督徒办的《公报》等资料中，摄取一些相关讯息。

一、战争对教会的冲击

在全面抗战初期，日本侵略者并未逮捕教会人士，教会房产亦未被公然强占。但实际上，日本当局对教会的管制并没有放松。如北平、天津两地敌宪兵队及敌特务机关长，表面上均以温和手段对付教会，接洽事务。他们召集西方传教士谈话，容许他们在城市中自由往来，有存款者每月可领取五百元生活费。另外，他们有时亲自参与中国教会的活动，有时举办座谈会、讲演会，邀请教会人士参加，目的是改造他们的思想，促使他们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效力。

民国三十年十一月（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对待教会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封锁了所有敌占区英美系统的基督教会，查封接管了所有教会的教堂、学校和医院，把英美传教士及其侨民集中到山东潍坊集中营看押，遣散部分中国籍教职人。同时，为了利用教会，把基督教直接控制在手，他们对中国传道人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以支持“中华教会自立，脱离英美羁绊”为借口，企图使基督教在组织上、形式上完全日本化。为了“外以应付环境，内则保卫教会财产与工作之安全”，华北各地教会的教牧人员在北平成立伪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总会，推荐周冠卿为会长。这个机构表面上是一个华人基督教社团，处于敌特务机关长、兴亚院以及伪政府的监督之下，实际上是代日本人管理教会的机构。“每次礼拜及大小聚会，必先将讲题内容，详细呈报敌宪兵队，其批准以，始能举行。届时，并有敌方宪警到场监视，听取报告。由是，正义之福音不能宣扬，宗教之自由完全失掉。”⁴日本人将这个所谓“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视为“合法”的机构，要求其他教会都加入这个团体，否则予以封闭。后来，因日本国内教会改为“日本基督教团”，日方也命“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改组为“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民国三十一年九月初六日（1942年10月15日），河北、山东等华北四省三市基督教会代表800多人，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大会，正式成立伪华北中华基督教团。规定教团宗旨为“上面联络当局、幸赖友邦襄助”，“为大东亚战争服务”，推选卫理公会监督江长川为主理，邀请日本牧师村上治、织田金雄为特邀委

员。为应付政局，华北各地教会纷纷成立基督教团分会。伪河北基督教团分会会长由叶保罗担任，特约委员为日本牧师稻田浩。分会下设保定道、燕京道、真定道、津海道、冀东道、渤海道、顺德道、冀南道八个区会，分别由叶保罗、刘子明、胡景森、霍培修、杨德全、康馨、宋正义、许贵宾担任区会长。另外，日本牧师小川秀一在张家口组织“伪蒙疆基督教团”，由姚树德牧师为团长。承德基督教英籍传教士被日本人“优待管束”，日本牧师福井二郎直接接管承德教会主教堂，统领承德各地基督教会。基督教团在日本人的授意下，多次组织和平祈祷，以掩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对于华北各地的教会学校，日本侵略者曾经一度封闭，经过移交和改组手续以后，始行启封。所有大学一律改为市立，由伪教育行政机关统治，将学校与教会绝对分开，并禁止一切宗教活动。学生必须宣誓效忠于“大东亚战争”，方准入学，并强迫学生进行游行或宣传。功课方面，减少英文，增加日文；学校行政方面，由日本教官操持最高权力。校长一职形同虚设，时人称之为“奴化教育”。

日本侵略者还下令将华北教会的房产器物以及教友数目造册具报，严加管制。民国三十二年（1943），伪华北基督教团对所属各地教会进行调查统计：河北省基督教会共计301处。其中，城市教会109处，乡村教会192处，较民国二十六年（1937）教会锐减三分之二。牧师237人、传教士281人，信徒总数41763人。其中，正式信徒28363人（男15883人，女12480人），慕道信徒13400人（男8167人，女5233人）。全省基督教教产总计257处，占地1957799.640平方米，房间10758间。其中，楼房131所，房间1345间；瓦房321所，房间8257间；灰土房59处，房间1156间；价值总额15793251元。被日伪政府各机关租借使用教产32处。

战争期间，河北基督教会教产蒙受了很大损失。许多教堂被抢、被占、被毁，教务活动无法举行。一些教会教友，甚至传道牧师，因为生计困难还有在街头摆摊的。据统计，日本侵略军炸毁了昌黎、密云等地教会，纵火焚烧了完县、安新、涿县、迁安、束鹿、灵寿等县几十处教堂，强行侵占了行唐、广宗、邯郸、安新、迁西、丰润、安次等上百处基督教教产，许多设施被毁坏一空。日本侵略军还查封了易县、定兴、固城、广宗等几十处教堂。新城、肃宁、河间、高阳、丰润、赞皇、肖张、沧州等地，因部分传教士撤走，教会组织涣散。河北基督教教务活动被限制在一些城市内，许多基督教信徒、教牧人员在日本侵略军的扫荡中惨遭杀害。

总而言之，全面抗战期间，河北教会或为日军所直接占领，或由日本直接操纵的“教团”所控制。西方教会的经济来源被冻结，本土教会也陷入重重困难之中。据沈亚伦在“庆祝南京金陵神学院建校40周年”纪念特刊上发表《四十年来的中国基督教会》一文说：“河北省的整个教会，只有北平、保定、顺德三处，借着日本牧师，有教团组织得存在，其余乡下教会，完全瓦解了。”

二、教会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初期，一些基督教界人士的认识是模糊的。但是，战争教育了人民，他们积极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作为中华民族成员的基督徒，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他们同样具有强烈的民族和国家意识，这既反映在他们要求自立的愿望方面，也表现在他们对于民族和国家危难的态度方面。当日本侵略者大举进逼，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之时，他们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感情，并没有因为他们的信仰来自于外国而有所改变。燕赵大地是抗日的主战场之一，河北省的广大基督徒和全省人民一起奋起抗击，积极投身到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中。河北青年会的表现是比较突出的。民国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1933年2月22日），日本外务省向中国提出备忘录，要求划长城以外地区为“中立区”，

中国军队必须从热河撤离，同时，日军开始向热河进犯。二月初四日（2月28日），青年会仿效第一次世界大战服务华工的“成例”，以总干事梁小初为执行干事，成立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战区服务全国委员会”，要求全国各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一律参加，“为前线军人做慰劳、娱乐、教育、及救济等工作”。委员会分总部和城市青年会、学校青年会两部分。总部负责筹划全局工作，各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负责具体工作。总部成立后的很短时间内，就在全中国形成了天津、遵化、蓟县、密云、唐山、张家口、北平、通县、保定、榆次、阳泉及大同12个分区。可见，分会的80%分布在河北境内，这主要是由于当时日本军队从东北向华北进犯，河北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青年会的战区服务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各项：“①普通招待处：招待普通往来军队及军用车夫，提供休息地点和茶水等。②伤兵招待处：为伤兵提供休息地点、茶水及简单药品等。③伤兵俱乐部：代写家信，分发慰劳品，引导娱乐、体育，提供图书和娱乐设备、方法。④军官俱乐部：提供消遣娱乐的书籍和设备，提倡体育、卫生新方法等。⑤军人俱乐部：设于前线附近，提供前方军人换防休息处所、设备，工作与军官俱乐部相同。⑥游行工作：成立游行工作队，携电影机、幻灯机等分赴各区映演；或组织演艺队到各处表演节目，使军人了解战争近况，鼓舞士气。⑦协助工作：救护伤兵，救济难民，协助布道及分发慰劳品。⑧慰劳工作：购办与分发慰劳品。在码头、公路、铁路沿线，军人服务部朝气蓬勃接待来往军队，供应茶水，提供食宿和救护工作，设伤兵招待所及换药站。在前线，他们不畏枪炮流弹，敌机轰炸，奋不顾身，不辞劳苦，不分昼夜从事战伤救护等服务工作。”

随着战争形势变化，青年会战区服务全国委员会仅历时6个月就结束了，但重要的是它开创了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战时服务军人的先例，形成了随战区的变化而延伸、以服务官兵为宗旨的工作方式。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帷幕。七月（8月）中旬，青年

会全国协会电召当时在济南的北平青年会总干事萧洄千到上海商讨开展战地服务事宜，决定由青年会全国协会募集经费，组建“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由萧洄千（化名肖奉元）任总干事。萧洄千立即联合北平、天津、保定、济南、郑州、太原等地青年会干事，在济南正式成立了“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以这批骨干干事为基础，招收大批战区青年和学生，迅速扩大组织，组成卫生列车服务工作队和随军服务工作队，工作活动中心大都集中在华北区铁路干线。总部下设支部，支部服务于某一指定部队或工作点，还设有“游行工作队”，分为电影组、戏剧组、歌咏组等，巡回各地慰劳军队。至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1937年12月），在河北的服务站有保定、正定、石家庄、顺德、彰德、邯郸六处，约占服务站总数的40%。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一般是这样形成的，军人服务部总部根据战争发展的局势，就近或特别委任某青年会干事任某支部总干事组建新支部。这位总干事一般都在当地的报纸或大街上刊登招聘服务人员的广告，欢迎有志抗日救亡的青年朋友加入。青年听说是为抗日服务，或因学校解散或停办，或当时并无稳定工作，或熟悉刊登广告的青年会干事，或熟人介绍，或因同学参加，或被青年会干事的爱国热情所感染，愿意投身到抗日救国事业当中，便报名参加。可见，当地群众通过参加青年会这一抗战组织，参与了抗日战争。他们并不计较工资的多寡，因为青年会干事的工资是比较低的，开始还能领到20元津贴，后来战事紧张，只能领到3元。至于服务员，每日须步行往返，只能供应午餐一次。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1938年1月），主战场逐渐南移，军人服务部总部也随之不断转移，内部设置不断变化，但是各地的工作一直在坚持。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时，共有50个支部和5个游行工作队，工作深入到全国14个省，数量和人员达历史最高峰。在河北，主要的工作据点有保定、正定、石家庄、顺德、邯郸和东明6处。后来，随着国共两党矛盾加剧和抗战日益困难，有些军人服务部或因经费困难，与总部失去联系，相继自行解体；或因当地国民党政府以“思想左倾”等理由，宣布解散，或“限期离境”，甚至以“奸党嫌疑”名义，拘捕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干事。全盛时期的5

0 个支部和 5 个游行工作队，到民国三十一年（1942）底，只有广西支部和滇缅区部了。综观抗日战争中青年会工作的历程，河北青年会的工作一直是积极的，在全国青年会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可是，由于战时的具体工作很难统计，也就没有太多具体的资料保留下来。现根据后来回忆等资料，青年会工作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

（一）救济伤兵。战争的残酷，使得军人伤兵容易出现过激行为，听书看戏不买票，吃饭喝茶不给钱，打架骂人等现象时有发生。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便对他们进行救济、教育、服务等工作，主要包括：设立俱乐部、招待处、换药站，为军人提供简单医药、图书、电影、幻灯、话剧等；出墙报、画宣传画、讲故事、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根据伤兵不同的籍贯，演唱家乡曲调）；组织妇女为军人洗缝衣物；举办“负伤将士作业成绩展览”，展出将士书法、绘画、手工编织、从前线带回来的战利品、伤愈重返前线将士写来的信件、照片、伤兵自己保存的血衣等。

（二）编辑相应的战地读物，如《阵中读物》，包括小说、图画、大鼓词及其他通俗娱乐性文字；鼓励有文化的战士，将自己作战经历写出来，帮助修改，联系相应刊物发表；还编有军人消遣丛书 20 余种，如游戏集、谜语集、故事集、歌曲集等。

（三）到商业发达的地方，运回适合战地的物品，卖给人地生疏的军人。所有这些不外乎可以愉悦将士身心，医疗“作战之痛苦”，“增益卫国之勇气”，使他们明白在民族抗战之中，受伤光荣，鼓励将士伤愈之后，再上前线保卫祖国 14]。引导军人运用适当的娱乐设备和方法寄托精神，增长知识，“进而养成其守秩序及重法纪之精神”。如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后，以前总唱的“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就很少再唱了。

此外，青年会还利用它是国际性组织的有利条件，四处奔走，八方联络，呼吁各国支持中国抗日战争，发动国际通讯运动。天津青年会还参加了中

华基督教全国协进会救灾会天津区工作，救济河北省 17 个县灾区；举办难民工读学校两年，请专门技师来教授一些技术性工作，面向女性的有缝纫、刺绣、护理等，面向男性的有糊信封、制纸盒、厨师、电工、水工等。

青年会军人服务部虽然曾得到政府一定程度的支持，但终究是一个民间性服务组织。工作因资金、人员的不稳定以及其他政治军事原因而不能长期坚持，经常处于解散和重建的状态中。但它确是抗日战争期间规模最大、服务地域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社会团体。它没有波澜壮阔的气势，没有歼敌千万的喜讯，但细声润物，温暖着每个战区的官兵。当然，抗日战争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基督教青年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河北，保定军人服务处职员何茂龄、保定军人服务处工人陈孝儿等为国捐躯。

除了青年会的抗日工作外，民国二十二年（1933），在通州潞河中学，华北公理会组织了伤兵医院。同时，永清县存实中学、保定市同仁中学等教会学校师生多次发动并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极大地鼓舞了各界的抗日热情。中华圣公会安国牧区医院院长杜大夫率领 12 名医生、护士，参加了八路军白求恩医疗战地医院。该院护士长何明清（凯瑟琳·霍尔，新西兰籍）女士，支持白求恩大夫的医疗战地医院，建立了一个从北京向晋察冀边区秘密运送药品、伤员的联络网。她的忘我服务精神，得到宋庆龄、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度评价，聂荣臻同志称赞她：“救死扶伤、忘我献身、支援抗战、青史永存。”另外，投奔解放区、参加白求恩大夫抗日医疗工作的，还有圣巴拿巴等医院的周之望、袁自兴等一批医护人员。武献义牧师、耿光民牧师等基督教爱国人士，掩护八路军，帮助爱国志士逃离敌占区。民国三十一年（1942）冬，馆陶县教区的张昆山牧师，为保护八路军三八六旅，死在了日军屠刀之下。褚惠慈、刘光耀等基督

徒，也为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总之，河北基督徒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

（选摘）

论抗战初期中国基督教会的爱国救亡活动

王淼

（湖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浙江湖州313000）

摘要：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基督教会积极投身于抗日爱国救亡运动。教会展开人道主义活动，救济和帮助难民。中国基督徒通过多种形式支援政府抗战，还利用与国外宗教和政治团体的联系，广泛宣传中国抗战的正义性，争取国际援助。中国基督教会在抗战初期的爱国救亡活动有力地支持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关键词：抗日战争；基督教会；救亡活动

中图分类号：K264.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1009-3907（2015）03-0105-04

收稿日期：2015-01-07

基金项目：湖州师范学院2014 年校级科研项目成果（2014XJKY02）

作者简介：王淼（1984-），男，江苏泗阳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抗日战争史研究。

第25 卷第3 期

2015 年3 月

长春大学学报

JOURN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Vol. 25 No. 3

Mar. 2015

长春大学学报第25 卷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社会各界都纷纷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一向被视为文化侵略和帝国主义代表的基督教会，也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投入到抗日救国的大潮中。目前学界对于抗战时期基督教会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成果，但对于战争初期基督教会的救国活动仍有探讨空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基督教会为了应对战时局面，大都制定了“非常时期”计划，维持战时特别是在沦陷区各项事业。中国基督教会所组织的爱国救亡运动在战时各地区如沦陷区、大后方、前线均曾展开，时人曾将战时教会新开展的活动概括为6 个方面，其中属于爱国救亡运动有难民救济与服务、基督徒的救国运动、军人服务、国外宣传与联络工作、边疆服务工作等五大方面。本文就按照这五个方面，对教会的爱国救亡活动作一简单叙述，主要描述抗战爆发一年内的情形。

1 难民救济与服务

抗战全面开始后，中国社会各界纷纷组织各种爱国救亡组织，教会也同样成立了众多类似组织。这类组织一般是以城市或地区为中心，集合各大公会和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等机构，共同开展工作。1937年8月1日，开封地区的教会组成“开封基督徒战时服务团”，以教堂为组织单位，共计有内地会、信义会、圣公会、浸信自立会、浸礼会、循理会等15个教派参加，其主要活动为救济、医疗救护、慰劳军队。杭州地区在基督教青年会与各教会的共同合作下，于8月9日开始轮流救济过境难民。并在清泰路崇一堂设立难民收容所，由各教会共同负责。其它地区也有很多类似的组织如广州地区基督徒组织国难服务委员会、武汉中国基督徒国难救济会、厦门基督教团体国难救济会、香港基督教国难筹赈会。其中组织较为完备的要数湖南基督徒后援会，该会由全省各地基督徒组成，立有详细章程，且经湖南省政府备案批准成立。全国性的基督教救济组织则有基督教协进会成立的全国救济委员会。在协进会的推动下，各地也有响应而成立专门的难民救济组织，江西南昌成立的基督教救济难民会就是专门救济难民的。基督教难民救济工作以设立避难所、供给食物、提供日用品及医疗服务为主。如上海在“八一三”之后，成立上海基督教联合会，专门从事救济、医疗等事业。联合会在上海先后设立18处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15万人，历时7个月，至1939年初仍有400余人住在难民收容所中，联合会还通过慕尔堂发放粮食，领粮者达到30万人。而基督教大学在战时也为难民提供了很大帮助，南京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南京沦陷后成为国际安全区，先后收留了25万人，广州的岭南大学救助了8000名难民，杭州之江大学的救济中心则收留了75000名难民，其他教会大学也提供了医疗服务。除了教会联合组织的难民救济活动外，各大公会也有自行进行救济的事业，其中以专门在下层民众中活动的救世军较为突出。截止1938年1月，救世军在上海的法租界、公共租界和交通大学设有3所难民收容所，内有难民2万多人。除了给难民提供食物、衣物和住宿外，在难民所还有卫生诊所、产妇医院、儿童学校等机构，提供必要的医疗、教育服务。救世军在天津、北京、济南、青岛等地也设立了类似的救济机构。

各种救济活动需要大量资金，各地区教会组织了形式多样的募款活动。如江苏常州教会共同议决“教友按月以一日所得捐助国家，记分两种：‘（甲）月薪满三十月者一元，余类推，（乙）守府者以一日之消耗捐助国家，按月缴款，至迟月底缴，由牧师转交前方，或后援会转解’”。在推动捐款方面声势最为浩大的当属基督教协进会发起的“分文救济运动”，号召全国基督徒和基督教机关工作的非基督徒参加，“每人决定日捐一分钱，作为救济之用”，运动在全国各地推广后得到各地教会和基督徒热烈反应，很多社会人士也纷纷捐款。

教会开展的另一项难民服务工作是通过设立职业培训机构和难民工厂，一方面可以减轻教会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也为难民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机会以解决其生计。在上海地区“医院中渐愈之伤兵及各收容所中之难民，均给以普通教育，同时并授以职业教育，以期难民离所后，得以维持生计。”救世军对收留的孤儿进行培训，“教以缝工，织机，制鞋，木工，及制造其他日用品手工艺，已售出二千余元。多数收容所中作工之难民，均已获有技能，用以维持生活”，其他地区教会也曾组织类似的活动，如江西零都在1938年建立基督教难民工艺所，两百多人中有90多人可以自食其力，“湘西的桃源中华基督教会，曾设立难民服务处，开办难民工厂及学校等，有计划有组织的从事难民服务”。

2 基督徒的救国运动

教会的救亡运动形式与一般民众团体有相似之处，主要有演讲集会、文字宣传、募捐筹款等。其中文字宣传也涉及军事常识，像基督教协进会印制散发的《防空学识》就属于此类。当时众多救亡活动中比较有特色的是刘良模组织的抗战歌咏活动。刘良模长期任职青年会，1934年冬在上海组织歌咏会，传唱抗战爱国歌曲，并到驻在绥远的傅作义部队中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抗战全面爆发后，刘良模随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在苏州、长沙、金华等地服务，也将这一活动带到了各地。而具有基督教特色的是各地教

会组织的爱国祈祷会，以集会祈祷和平为主，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是1938年2月6日呼应国际反侵略运动而在武汉组织的国难祈祷典礼。当时国民党要员冯玉祥、王宠惠、邵力子等人出席，何应钦代表蒋介石到场，有3000余名基督徒参加典礼。会前通电全国教会希望响应此一祈祷会，会后则通电全球基督徒并致电蒋介石。基督教青年会针对青年学生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抗战宣传活动，如长沙青年会组织抗战歌咏团，参加者有3百多人，还组织初高中学生进行抗战论文比赛和抗战演讲比赛，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比赛内容均与抗战密切相关。如论文比赛高中组题目为“抗战与中国”，初中组为“抗战与学生”，演讲比赛高中组为“长期抗战中青年应尽的责任”，初中组为“我们为什么要抗敌”。一般来说，教会组织的活动以地区或宗派为限，且多在未沦陷地区，以大后方居多。冯玉祥领导的基督教全国联合会是为数不多的全国性组织。1938年3月6日，中华全国基督教全国联合会在武汉成立。联合会的目的是“在政府领导之下，与全世界基督教各机关及国内外各战时服务团体通力合作”“实行战时服务，准备战事善后工作，并联络全世界基督徒合力建立国际间真正永久之和平”。联合会选蒋介石为名誉会长，会长冯玉祥，副会长钟可托、沈文卿、诚静怡、张伯苓、沈子高、谭沃心、张凌高、刘湛恩、吴贻芳，总干事范定九，都是中国教会内的领袖人物。联合会下设精神动员委员会、经济合作委员会、青年训练委员会、伤兵服务委员会、难民垦殖委员会、国际宣传委员会、财务委员会。此外还有众多国民党要人和中国教会领袖挂名为委员，并在全国各地设有分会，展开了形式多样的救亡活动。武汉沦陷后迁往重庆，曾领导了全国基督徒献金救国运动。

3 军人服务基督教青年会的军人服务部和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是抗战时期两个专门性的军人服务组织，服务对象是前线的军人和伤兵。青年会在战时军人服务可溯源至一战时在支援欧洲的华工中服务，正式组织活动则在1933年热河战事期间。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初在济南正式成立“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随着战事不断发展，总部相继迁移

到郑州、许昌、汉口和重庆。服务部在全国划分成大的工作区，在各地设有服务支部，鼎盛时期有50个服务支部和5个游行工作队，活动遍及全国10多个省，数十个城市。军人服务部的目的是慰劳军人、提高军人士气，所以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救济、教育和服务等工作，如医药救护、文艺活动、抗战宣传、改善军人生活等。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是在中华基督教会总会西籍干事高伯兰（A. R. Kepler）倡议下发起成立的，高伯兰在目睹战场上中国军队中伤兵不能得到及时医治，于1938年初在汉口发起成立这一专门救治服务伤兵的组织。伤兵服务协会得到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邀请到孔祥熙、冯玉祥、颜福庆、王宠惠等国民党要员挂名任正副会长，实际的主持者则为教会内中外领袖如高伯兰、范定九等人。协会初期主要组成流动服务队，在伤兵集中区域进行医护活动。后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建议下在各战区的重要公路附近设置伤兵招待所，收治过往伤兵，为他们提供食宿及医疗服务。协会救治了大量伤兵，仅仅1938年一年就照顾了460754人。除了这两个专门性的救护伤兵组织外，英国公谊会后来曾组织汽车救护队，在战场上从事抢救伤病的工作。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曾命令各伤兵医院，邀请当地教会，对负伤将士予以精神安慰，有些地方的教会，在伤兵医院从事宣道，娱乐，教育及代缝衣服，代写家信等工作。”另外，各地教会也曾和当地政府及社会服务机关合作设立“伤兵之友”和“新兵之友”，提供食物及其他各种慰劳服务。

4 国外宣传与边疆工作

由于中国教会与英美差会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基督徒在国外宣传与联络方面有着先天优势。在战争爆发后，很多中国教会都向英美等国母会发去电文，说明教会的情况请求经济援助，并呼吁母会推动国际社会制裁日本阻止日本侵华。国外援助对中国教会战时各项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如“一九三七年八月底起至一九三九元旦为止的一年又四个月中，协进会的战地救济费收到各方的捐款共计二十七万九千三百十五元七角。虽然其中大部分系由海外捐来”。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中有很多要员是基督徒，他们也曾

利用这一身份呼吁请求国际援助，最为著名的是宋美龄。在抗战期间，宋美龄多次以基督徒的身份向世界基督徒和美国基督教会团体发表电文和演讲，抨击日本侵华的残暴呼吁世界各国对华援助，在1938年就通过媒体或无线电分别致电美国监理会、伊利诺伊州基督教青年会、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大会、她的母校卫斯理学院。而她1941年访美掀起的“宋美龄旋风”也充分利用了其基督教信仰。

边疆服务特指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于1939年12月在西南边疆川康地区发起的边疆建设活动。中华基督教会的边疆服务部主要是适应战时建设大后方需要而展开的专门活动，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对于改变原先经济、文化、社会较为落后的边疆地区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实，在战争爆发后，很多教会或基督教机构都将重点转向原先不受重视的西南和西北地区。如1938年基督教青年会在失去沦陷区的太原、大同、焦作、威海卫、南京、芜湖6个市会同时，在贵阳和桂林建立了新的市会。

以上所述的均是中国教会所组织的非军事性的爱国救亡活动，这种不直接参加战争的活动是绝大多数基督徒都认可并且赞同的，因而得到教会的支持可以有组织的进行。至于抗战期间基督徒个人从军的例子也有很多，比如一位名叫陈建新的基督徒就在1941年参军，入伍后还在部队中传教。不过，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尚没有看到教会或基督徒有组织的大规模参加军队，唯一可以见到的是比利时籍的天主教神父雷鸣远所组织的天主教徒便衣队，在山西武乡地区参加作战。

5 简短的结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基督教会积极投身于抗日爱国救亡运动。教会组织力量在战区和后方展开人道主义救援活动，通过各种方式救济和帮助难民。中国基督徒通过演讲集会、文字宣传、募捐筹款等多种形式支援政府抗战，对于受伤的中国军人则组织了专门的伤病救护协会，还利用与国外宗教和政治团体的联系，广泛宣传中国抗战的正义，争取国际援助。在

战争爆发的第一年，很多在沦陷区的基督教会还将组织向后方转移，也有一些基督徒参加军队，以实际行动回击日本侵略者。中国基督教会在抗战初期的爱国救亡活动是战时中国反抗

日本侵略的一部分，有力地支持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

（选摘）

基督徒抗战救国略记

当日寇大举进逼，国难临头、山河破碎之时，诸多中国基督徒积极投身于抗战救国活动中。窥观当时中国基督徒抗战救国活动，至少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 成立各种援助与推动抗战救国组织

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各界爱国人士纷纷组织成立各种团体，研究抗战救国问题，例如“东北社”、“时社”等，诸多中国基督徒也积极参与其中。同时，中国基督徒亦成立抗战救国组织，开展抗战救国活动。一些全国性的教会组织利用其特有条件，成立了一些全国性的抗战救国组织。如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成立“基督教军人服务处”，吸收一批有志报国的青年出入于前线后方，为伤病军人护理、喂饭、洗衣、读报、书写家信、演出文艺节目、放映进步影片、教唱抗战救亡歌曲等，大大鼓舞了前线将士的斗志。又如中华基督教会总会组织“负伤将士服务会”，以“奉献自己，服务困苦的义胞和忠勇卫国的将士”为口号，奔走于晋、豫、川、湘等地，照料留下来的伤病员，后来该会还参加了“边疆服务

工作”。在上海、广州、南京、洛阳等大中城市， 基督教各教派自动联合， 成立“基督教非常时期服务委员会”、“基督教国难救济会”、“基督教战事服务部”等抗战救国组织， 推动当地抗战救国活动。

二、揭露日军侵略暴行， 广泛宣传抗战救国

中国基督徒成立抗战救国组织， 开展抗战救国活动， 揭露日军侵略暴行与广泛宣传抗战救国。如上海部分牧师与信徒组织“上海基督徒救国会”， 编印《东三省事件与上海事件真相》， 揭露日军侵略暴行， 广泛宣传抗战救国。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等基督教团体及一些基督教刊物， 纷纷发表《告全国基督徒》之类的文告， 唤起基督徒抗战救国之心。1933年3月18日，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举行国民自新大会， 张伯苓、陈宝泉、王文典作救国家于危亡的演讲。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全国各地再度兴起抵制日货运动。1933年， 在上海、天津等地， 国货团体纷纷组织提倡国货大会、国货展览会等， 提倡国货， 振兴实业。同年10月10日至11月8日，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举办“扩大提倡国货大会”， 陈列工业原料、机电工业、化工、食品、教育用品、艺术品、医药、手工制造品、纺织品等国货， 展品达七千余件。宋则久等基督徒围绕“提倡国货是同胞天职， 好用洋货是灭亡道路”的主题， 发表演讲。“有极多人士得悉中国已有之国货， 从此立志购用， 不再取诸外人。日限虽浅， 喜其收效甚宏也。”基督教青年会战区服务委员会干事刘良模于1934年， 开始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组织、教唱抗战救亡歌曲， 从事推广与传唱抗战救亡歌曲工作。1936年6月14日， 在上海公共体育场， 刘良模组

织五千余人参加民众抗战救亡歌咏大会， 其中有千余人是他的歌咏队成员。大家浩浩荡荡一路高歌：“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走在上海的大街上。其场面浩大， 十分振奋人心， 许多人激动地流下眼泪。1937年8月， 刘良模成为基督教青年会军人

服务部第十支部(京沪支部)负责人，其支部特点为推广与传唱抗战救亡歌曲。刘良模及其支部走遍天津、广西、湖南、浙江等地，宣传抗战救国。抗战伊始，各地基督徒皆响应捐献活动。最普遍的是捐赠寒衣。因入冬后，军队往往缺乏给养，各地女基督徒踊跃缝制棉背心或鞋袜，支援前线将士。上海、镇江、郑州等地教会医院与医生，踊跃参与救护伤病员工作。有的教会号召基督徒捐献一天工资所得，有的妇女杂志号召女基督徒捐献金银手饰。当时，国民政府发行五亿元救国公债，各地基督徒踊跃购买。尤其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劝买活动，在短短半个月中超额完成十万元任务。华北一教会女子中学的学生将一冬的烤炉费充作航空救国捐献。救济难民亦为一重要方面。上海“基督教非常时期服务委员会”，推动全市教堂腾出场所，救济闸北、虹口一带因毁于战火而流离失所的难民。著名儿童教育家、基督徒陈鹤琴和知名人士、基督徒赵晋卿等，深感对难民儿童实施教育之责任，约同一些社会人士组织街童教育会。1936年7月，基督教青年会全国总干事会议决议令各城市青年会尽力救济难民。随后，诸多城市建立难民收容所，不仅帮助解决衣食问题，还普及基本教育，训练生产技能等。因这些工作皆卓有成效，广东曲江、陕西华阴等地政府部门，要求基督教会接办当地赈济工作。1936年冬，全国人民开展援助绥远军队抗战活动。中华基督教会立即组织战区视察团前去慰问，北平、广州、南京等地亦纷纷组织义演音乐会或游艺会，宣传抗战救国，向社会募捐。同年，闽人旅沪教会还自编自演短剧《爱国路》，宣传抗战救国。北平(今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萧洵千奉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之命，与各地派遣的青年会干事组成“全国基督教青年会战区服务部”，到前线为官兵服务，演出文艺节目，放映《秋瑾》等进步影片，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救亡歌曲。在祖国西北旷野，唤起全体官兵的爱国热情与勇气。

+++++

(选摘)

论抗战时期基督教大学与国民政府之关系

刘家峰

[摘 要] 抗战期间基督教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比以前更加紧密，基督教大学对国家的忠诚、为国家所做的服务以及在美国进行的关于抗战宣传，得到了政府肯定和表彰。作为回报，政府对基督教大学宗教教育管制有一定程度的放松，基督教大学特别是在宗教教育领域因而得到了较战前更大的发展空间。但随着政府对大学控制的加强，基督教大学面临失却原有特色和办学自由的危险，导致基督教大学与政府之间出现一系列的紧张。为了教育自由和通识教育理念的追求，基督教大学努力与政府沟通、对话。

[关键词] 基督教大学；国民政府；抗战时期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1873
(2004) 0320077208

[作者简介] 刘家峰，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430079

中国基督教学校在经历了1922- 1927 年间“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后，不得不适应民族主义的潮流，加快本土化步伐，任命中国人做校长，并向中国政府立案。抗战前，13 所基督教(新教) 大学中，除圣约

翰大学外，均已在南京国民政府以私立大学名义立案。正如金陵大学老校长包文博士(A rthu r J. Bow en) 评价那样，基督教大学与中央及地方政府有着真诚而密切的合作，它们不再是“外来”机构，而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员。抗战军兴，基督教大学和整个国家一样，面临生存危机，特殊的时代环境使基督教大学的国家认同得到进一步加强，而且为适应国家战时需要，双方合作更加紧密。但战时国民政府对全国高等教育的控制也逐步加大，使基督教大学面临失却原有特色和办学自由的危险，导致了基督教大学与政府教育政策之间的一系列紧张。基督教大学为了谋求发展，不得不再思基督教教育与一般大学教育理念的差别，并努力与政府沟通，寻求理解和支持。

一 基督教大学对国家的忠诚

九·一八事变时，基督教大学师生的爱国情怀就表现得毫不逊色于国立大学，一二·九运动时，燕京大学更发挥了先锋作用。抗战一开始，政府号召大学生以从事军训、宣传、救济、服务等活动来表达爱国之心。基督教大学积极响应政府这一号召，如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把所有学生都投入到附近农村做民众动员。福建省政府要求全省所有初中以上学校都要以华南为模范，在1938 年头3 个月参加社会服务和宣传活动。福建协和大学的师生也深入内地进行民众动员，宣传“抗战建国”的意义，从1938 年1 月开始，大学负责8 个县的民众教育，宣传普通卫生知识等。随着战事逐步深入，基督教大学和公立学校一样纷纷内迁。齐鲁、金陵、金陵女子迁到成都，落户于华西协合，东吴和之江先后搬进上海公共租界，与圣约翰、沪江组成“上海基督教联合大学”。燕京则坚持原地办学，直到珍珠港事件后才迁至成都。华中先迁至桂林，后又于云南大理喜洲小镇定居。福建协和去了闽西邵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去了南平，岭南先迁香港，后又到曲江。整个抗战时期，13 所基督教大学中除华西协合不用搬迁外，其余12 所大学都作了迁移，距离从十几千米到几千千米不等。基督教大学如此大规模的迁移，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的继续生存，同时也是基于为国家保存教育命脉，

在政府看来，是一种国家认同及忠诚的体现，也是协助政府实施“抗战建国”方略。暂时留在沦陷区的基督教大学，象燕京和在上海的联合大学都是靠着美国国旗和治外法权的保护才得以生存的，难免要受到国人甚至校友的误解。司徒雷登1938年2月去上海会见一些校友时，发现他们用“某种严厉甚至不赞许的态度”看待他，怀疑燕京所以能平静地办理下去是因为在国家忠诚的基本原则方面妥协了。当时正在英国读书的费孝通也给司徒雷登写信，对燕大继续办学的政策持怀疑态度，建议在西北地区另开分校。这些大学以后的表现在说明它们并没有背叛国家利益，它们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仍保持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没有一家和日本或傀儡政权有任何正式的官方联系。司徒雷登面对抗战爆发后的复杂局势，提出办学的三原则：保持大学创办者、支持者的忠诚；保持对中国政府的忠诚；用适当的办法同日本当局保持友好关系。1939年4月，12所基督教大学的校长在香港召开会议，讨论基督教大学面对国家危机应采取的对策，他们发表了一致声明，认为应当维护基督徒的品格、学术自由和对国家的忠诚，为保护这些权利作出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沪江校长刘湛恩的例子更可以说明基督教大学师生的爱国之心。刘在抗战爆发后曾担任上海文化救亡协会会长，积极参与救亡运动。1937年9月30日他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向美国人民发表演说，控诉日寇暴行，呼吁美国民众支持中国抗战。他的抗日立场引起日方嫉恨。在几起日方策划的暗杀行动失败后，周围朋友都劝他去香港或汉口躲避，但他拒绝去任何地方。1938年4月7日，刘湛恩被杀害。国民政府对刘按照国葬规格下葬，以表彰他为国捐躯的英雄气概。基督教大学对国家的忠诚不仅表现在对敌态度上，更体现在它们在战时对中国所做的杰出服务。金陵和金陵女子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在校园保护和救济了数万平民百姓，这些教职员被南京20多万难民亲切称为“活菩萨”。之江、岭南在日军侵占杭州、广州时，也都曾以自己的校园作为成千上万市民的庇护所。华中在接到教育部要求接受华北和沿海逃难学生的指令时，积极准备房舍，接受了多名华北难民学生。华中师生还组织了战时服务团，在救护伤兵方面贡献很大。金陵在华西从事一百多个社会服务

项目，努力满足当时各方面的需要。华西协合在发展实用科学方面成绩也很显著，尤其在制革、印染、药材和畜牧业改良方面。福建协和等在后方从事的乡村建设事业对战时人民福利也有重大贡献。1939 年华西协合和齐鲁的医牙科学生作为军医直接参军，1941 年金陵等一批工科学生参军从事公路及兵工制造等工程。1943 年11 月，国民政府发动了“学生从军运动”。

成千上万的大中学生志愿服役，远远超过政府预料和接受能力，结果只有一小部分被录取。燕京学生参军热情甚高，共有79 人被录取，有66 人参加陆军或后勤部队，3 名男生参加了远征军，9 人参加了空军，1 人进了海军。入伍空军的9 人相当自豪，因为9 所大学的数百名报名者只录取了30 名。还有相当多的基督教大学学生成了美军翻译，有3 名福建协和学生在史迪威的缅甸作战军里担任翻译；相当一部分金陵女子和燕京的女生在成都附近的美国空军基地担任打字员、电报员或会计等地勤工作。

国民政府对基督教大学对国家的忠诚和战时服务作出了正面回应。1938 年4 月6 日，宋美龄在武汉一次传教士集会上发表演讲，盛赞传教士和基督教大学对战时中国的贡献：

你们对我们国家最有影响、最具价值的贡献不是这些工作本身，而是你们工作时表现出来的精神。我非常高兴告诉你们，那些很多年前批评基督教的人正是现在赞扬你们的人。你们通过工作赢得了他们的信任。语言不足以表达我对传教团体的感激之情，他们不畏日军要把他们赶跑的恐吓，坚守岗位，把许许多多中国妇女和孩子从濒临死亡中拯救出来。

宋在演讲中还提到，她和蒋介石都觉得有必要修改教育部禁止宗教教育的条款，如果教会要求，把宗教教育作为必修课是可行的。此番言论通过《纽约时报》和其他媒体广为传播，让关心中国基督教教育的美国教会人士大

为振奋。1939 年，一条新的关于宗教教育的条例建议案出台并被通过：在私立学校，如果开设宗教课程，学生可自由选修；宗教活动如果在课下举行，学生可以自由参加。虽然只是一个建议案，但它对在中国从事基督教教育的人士来讲是极大的鼓励。他们认为这至少表明政府领导人对基督教价值的赞赏，对宗教教育某种程度的认可。基督教大学在纽约的联合办事机构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为战时基督教大学持续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联合会非常重视与中国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每年年会都邀请中国驻美大使和其他著名人士参加，中国政府也借此机会表彰基督教大学。宋美龄曾出席1937 年年会并发表演讲。1938 年邀请驻美大使王正廷出席年会。次年邀请驻美大使胡适参加年会，胡因故不能出席，特在5 月31 日写信给组织者罗炳生(Edw in C. Loben st ine) 表示歉意，并赞扬基督教大学是“现代中国的开拓者”：

几十年来，基督教大学把新的生活观念、新的道德价值标准、新的生活方式带给了中国的家庭、学校和社会，他们是现代中国的开拓者。最近几年，他们集中财力和人力发展少数几个中心，其中一些已能够和国立大学在学术上一比高低。由于日军侵华，基督教大学师生不得不离开他们美丽的校园，迁入内地，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努力工作，这种伟大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永远值得中国人纪念。1939 年6 月30 日，基督教高等教育干事葛德基(E. H. Cressy) 写信给胡适，希望中国政府能对多年以来为中国基督教大学作出杰出贡献的几位美国人士给予特别表彰。11 月30 日胡适回信说，中国政府已经在双十节庆典上授予Paul D. Cravath 等四人蓝白玫瑰翡翠。1942 年联合会又邀请胡适出席年会，胡适回函表示他非常忙，加上离开中国太久，对国内情况不是很熟悉，不适合做“前进中的中国教育”演讲。但他对基督教大学的评论让基督教教育者们颇感欣慰：

你发现在所谓的非国立的外国教育即基督教教育中心，在战争来临时已经成为国家生活的中心，民族主义的训练中心。个别学校试图比国立学校还要民族主义。他们的学生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国家生活。跋涉数千里，

和国家脉搏一起跳动。政府十分赞赏这些学校，积极帮助他们闯过难关，并把他们极力展示给外面的世界，表明我们是欢迎而且需要这些学校的。

蒋介石和教育部长陈立夫也曾在不同场合发表声明，称赞并感激基督教大学对中国人民的贡献。

国民政府也从实际方面资助基督教大学在战时的发展。在战争初期，政府设立专门委员会，办理战区学生登记，不分公立私立，一律帮助安排迁移转学，发给贷金，很多基督教大学学生因此得以安全转移并复学。尽管战争使得军费猛增，但战前政府对基督教大学的资助仍继续保留，只是数目减少，大都只付70—75%。对基督教大学中比较实用的系科，尤其是与战争和国家建设相关的项目，如机械制造、农业改良、化工等方面，政府资助的力度还是很大。总的说来，抗战时期基督教大学与国民政府之间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基督教大学对国家的忠诚、为国家所做的服务以及在美国进行的关于中国抗战的宣传，得到了国民政府前所未有的肯定和表彰，政府对宗教教育管制的放松，也是对基督教大学的正面回应。但必须看到，国民政府对基督教大学的赞赏，与战时国民政府渴慕与美国修好、争取美援的实用主义外交策略也密切相关。而基督教大学在这宽松友好的氛围中得到了较战前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宗教教育领域，很多传道人可以借用大学的礼堂开布道会，甚至用教室作主日礼拜。战时基督教大学（也包括国立大学）的宗教生活与战前相比活跃很多。但基督教教育与国家教育之间并非总是那么和谐，基督教大学与国民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紧张，甚至是根本性的冲突，尤其是在教育理念和具体的教育政策与行政方面。

+++++

（选摘）

国内外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研究概述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是中国基督教会发展的重要阶段，目前学术界已经开始对这一课题发生兴趣并逐渐有一些成果涌现。本文梳理了海内外现有关于抗战时期基督教研究的概况，分

为宏观叙述与整体概况、抗战时期的传教士、抗战时期的中国基督徒、教会事业与区域研究四个方面进行综述。虽然论著不少，但是抗战时期基督教研究仍然是一个亟待深入研讨的课题。

关 键 词：基督教 抗日战争 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王淼，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

自从1807 年基督教正式传入中国以来，一直伴随着暴力冲突与流血事件，直至1900 年义和团运动达至顶峰。与“庚子教难”可相比拟的则是抗日战争对教会各项事业的影响。由于各种原因，海内外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的研究相当少。台湾著名基督教史家查时杰教授早在十多年前就慨叹由于资料的匮乏而无法深入研究此一时期历史。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对这一课题展开了初步的探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9 年在香港浸会大学召开的第六届中国近代基督教史研讨会就以抗日战争时期的教会为主题。本文即拟对目前海内外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史的研究做一全面的概述，以为进一步研究做一铺垫。由于既存研究不多，因而凡是笔者所见的海内外研究均列入其中，并按专题分为宏观叙述与整体概况、抗战时期的传教士、抗战时期的中国基督徒、教会事业与区域研究等四个方面。由于笔者阅读有限，难免

挂一漏万，敬祈方家指正。

一、宏观叙述和整体概况

抗战全面爆发后，传教士在华产业遭到战火严重破坏，当时有多种统计报告问世，其中和教会密切相关的是盖伦·M·费舍(Galen M. Fisher)编辑的《中日战争对美国在华教育和慈善事业的影响》，该报告详尽统计了日本侵华对美国在华教育和慈善事业的影响，教会事业是报告的最主要内容，对教会学校、医院、人员的损失均有统计，除此之外还对战时沦陷区和中国教会的情况作了描述，但由于报告完成于1939年11月，只反映了战争前两年的情况。在抗战快胜利时，教会圈内有一些回忆性的文字，其中较有价值的是余牧人《抗战八年来的中国教会》，尽管文章篇幅不长且多宏观论述而缺少细节描写，却对我们了解战时教会概况和中国基督徒的心态有很大帮助。美国著名教会史家贝德士(M. Searle Bates)曾撰《新教在华事业，1937～1949》(The Protestant Enterprise in China, 1937～1949)一文，从整体上介绍抗战期间新教在中国的情况，尽管贝德士引用的文献较少，但作为历史亲历者和训练有素的史学家，他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数据，对这一时期整个中国教会的发展脉络做出了细致描述，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帮助。

刘洁贞《抗日时期的基督教》一文虽较为简略，但能够利用一些原始材料，对教会在抗战时期的活动作了概括性描述。在各种基督教通史中，抗战时期均是不可或缺的一章，但是都较为简略，如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社会》、姚民权、罗伟虹的《中国基督教简史》和段琦的《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裴士丹(Daniel H. Bays)的《中国基督教新史》(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等。台湾学者查时杰教授的《民国基督教史论文集》对抗战时期教会活动有较详尽的介绍，但仍局限于史料的不足。在这些宏观性的叙述中，学者们大都强调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在抗战时期的社会救济和抗日救亡运动，段琦先生将教会活动

总结为救济难民、军人服务、救国运动、国外宣传与联络工作、边疆服务等五大方面。

二、抗战时期的传教士

卢沟桥事变后，有一部分传教士撤离沦陷区，或回国或到后方，但仍然有很多人选择留下。在战区的部分传教士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并用文字和图片将其记录下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传教士的记录。章开沅先生利用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发现的贝德士文献，再现了南京大屠杀期间在华传教士对日军暴行的揭露和谴责以及对中国难民的救助活动。章先生先后发表多篇论文、出版多部中外文论著探讨相关问题，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胡华玲对同时期在南京的美国女传教士华群(Minnie Vautrin)救助中国难民的活动有详细叙述。彭剑研究了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美国传教士心态，指出传教士之所以不惧危险、勇敢地留在南京救护难民、揭露日军暴行源于基督教的邻人概念和传教士的爱邻意识。王卫星则考察了由包括传教士在内的外国人在南京设立的国际安全区的过程。近年，查时杰教授利用中外教徒回忆录考察了战时情景和战火造成的破坏。

沦陷区传教士的另一项重要活动就是社会救济，当时教会成为很多人避难的首选地方。克雷(Gladys Robina Quale)的博士论文考察了美国传教士在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活动，其中抗战时期占了相当大的部分，虽然论文研究尚不够深入，却提供了大量可供参考的文献，为后来者作了很好的铺垫。

克里斯滕森(Erleen J. Christensen)则对河南的加拿大传教士在抗战时期的救济活动有较为细致的叙述。传教士与中外关系是基督教史研究的传统题目，在抗日战争进行过程中，不断有人推动中日议和，其中很多美国来华传教士参与了这一活动。杨天石教授对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和平调解活动作了考察。在美国的一些基督教活动家

也曾推动类似的和平谈判，克雷福特（Stephen G. Craft）和邓宁（Margaret B. Denning）有专文讨论，他们细致考察了传教士介入外交决策的整个过程，肯定了二战期间传教士在美国政府外交决策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指出传教士虽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建议，但是并没有被美国政府采纳而成为真正实行的外交政策。国内也有人对抗战期间美国传教士在中日两国的活动进行比较，认为在华的美国传教士相对在日本的传教士更多的影响了美国东亚政策和公众舆论。另外，葛林华特（Bruce Stephan Greenawalt）的博士论文对于在美推动援华活动的传教士有较多描写，这些人多是战争开始后从中国返回美国，他们在美国通过演讲、集会、文字宣传和募集资金等多种方式反对日本侵华，支持中国人民抗战。对于一些重要的来华传教士，在其传记和研究中也涉及到抗战时的活动，如何明华（H. O. Hall）和毕范宇（Francis Wilson Price）。

三、抗战时期的中国基督徒

中国基督徒的民族认同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而抗日战争这一宏大的历史事件恰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观察场景。姚西伊在《中国基督教唯爱主义运动》一书中，考察了1900～1949年之间中国教会内和平主义思潮，其中一章讨论“九·一八事变”后教会内部关于武力抵抗与和平唯爱的论争，他将教会内的人士分为武力抵抗派、中间调和派、保守-基要派，中间派立场在教会领导层影响很大，而随着时局的不断发展，武力抵抗派影响不断扩大，直到“七七事变”后武力抵抗成为教会里主流的声音。尽管未涉及到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基督徒的心境和思想变化，却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对比范例和研究视角。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步步紧逼、逐渐加深，中国教会也经历了由主张非暴力到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最终坚决武力抵抗的转变。刘家峰教授比较了中日两国和平主义代表人物徐宝谦与贺川丰彦，认为和平主义虽然美好却与当时中日两国占主流的民族主义思潮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很难为一般民众所接受，就是基督徒中也只有极少的支持者。邢福增讨论了深

处后方的陈崇桂在抗战时期内心激烈斗争的思想变化过程，他指出陈崇桂在神学思考和个人信仰之间出现张力，在思想认识上经过挣扎，即基要主义与爱国主义之间的碰撞，最终归向基要主义但同时赋予了抗战的正义性。邢福增对吴耀宗在抗战时期的思想转变同样做了深刻论证，他认为吴耀宗从“九·一八”后逐渐加深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而全面抗战爆发使得他对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吴耀宗转而信服并慢慢接纳共产主义而对基督教产生了不满情绪。邢氏关于沦陷区王明道的讨论则是观察战时中国基督徒心态的另外一个范例，在详细考察了王明道与华北中华基督教团之间的纠葛后，邢氏指出传统的爱国抵抗与通敌卖国的二元道德论无法解释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的形成和发展，而王明道对日伪的抵抗除了源自其个人内心的信仰之外，也和王明道背后的基督徒会堂有关，甚至是日伪及教团对王明道的容忍。事实上，除在个人信仰和民族认同之间的思考外，更多的中国基督徒是直接投身于抗日战争的伟大洪流之中。顾卫民粗线条的描述了中国天主教和新教教徒面对国难时的各种救亡活动。赵晓阳研究了基督教青年会在抗战时期组成的军人服务部的活动，她指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顺应时代要，改变了以演讲、体育、启发民智、传播西方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工作方式，发展出以军人服务、学生救济、难民救济的工作内容。陈智衡考察了后方的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梳理了协会发展进程、服务内容、与国共之间的关系等。其他有关抗战时期中国基督徒的救亡活动的文章还有很多，但多是介绍性质的，兹不赘述。

四、教会事业和区域研究

教育是传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侵华战争对基督教教育影响很大，其中高等教育是学界关注的中心。马敏考察了华中大学和湘雅医学院的内迁过程，余子侠从整体上论述了教会大学的迁移变化。而刘家峰和刘天路合著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则是该领域的第一部著作，系统研究了教会大学内迁过程、战时教育发展、战时社会服务及宗教教育与宣教活动，考察了战时基督教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认为基督教大学为中国

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教会大学也在抗战中进行着艰难的中国化。在各教会大学校史中也有关于抗战时期的记载，但多较为简略，鲁珍晞(Jessie G. Lutz)的《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 ~ 1950 年)》专辟一章叙述战争对教会大学的冲击。周东华考察了抗战对浙江基督教教育的影响，他认为浙江基督教各级教育机构均能在战火中坚持抗日救亡运动，或在流亡中办学，或严于律己抵制敌伪诱惑和后方安逸生活，修正了晚清以来“帝国主义走狗”的形象。张龙平讨论了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战时西迁、中学救助、大学规划、宗教建设等活动。教会各项事业虽然受到战争的影响，但是各教会和教会所属机构仍然在非常时期开展了大量工作。奥斯汀(Denise A. Austin)概述了救世军(Salvation)在战时中国的组织变化和各项活动，黎子鹏研究了抗战前期中国圣教书会的出版策略、资金来源、架构重组以及难民救济等工作，他认为通过这些战时活动圣教书会大大提高了在国内的影响力和社会地位，郭伟联讨论了战时学生布道运动。刘家峰教授在其研究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专著中，也讨论了战时这一运动的发展情况，他认为战争使得乡村建设运动遭到极大的破坏，特别是沦陷区很多项目被迫停止而转向西南大后方。抗战时期，由于日本占领和国内政治纷争，中国被分为沦陷区、后方和根据地。在沦陷区，教会受到日伪的严密监视和控制，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传教士被从教会里清洗出去。卜正民(Timothy Brook)以中华基督教会南京区会为个案，研究其在日本占领期间的艰难发展。他认为日本在占领区建立傀儡统治后为了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在沦陷区清洗英美等外国势力，而教会则是重点清理对象。在外国力量被清除以后，中国教会反而因此延续了战前自立、合一、本色的发展方向。尽管中国教会在战争期间承受了种种压力如日本人的教会侵入，经济上的不足，但是中国教会在战争中还是艰难的自我发展，最终迎来了战后的本土化进程，也为建国后的三自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东北地区在“九·一八”后就被日本人所占领，遭受殖民统治时间更长。徐炳三的博士论文以东北基督新教为研究对象，其中有一章专门考察1931 ~ 1945 年东北沦陷时期教会的境遇。他认为此时期日

伪政权对基督教的政策由宽松转而紧缩，进而开始全面的打击和控制，教会人士遭到迫害，西方传教士均遭拘捕并被遣返，各项教会事业遭灭顶之灾，日本教会势力乘机打入新教系统内部，实现了对东北原有教派的控制。闫超的博士论文则是专门研究沦陷时期的宗教状况的，其中就涉及到基督教。在华北地区，日伪组成了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对英美教会力量进行控制和改造，除了前引邢福增的论文之外，宋军和胡卫清教授分别有文章讨论。宋军从日文档案出发，详细考察了日军在教团组建过程中的影响，而胡卫清教授则主要利用中文档案考察了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形成的过程。裴士丹教授对战时山东基督教研究提出了一些初步的看法，陶飞亚教授在其研究耶稣家庭的专著里有一章讨论战时中国本土教会耶稣家庭的发展情况。

香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被日本人占领，相较其他地区沦陷的时间较短，陈智衡系统考察了香港沦陷三年多时间里教会的发展状况。他指出日本占领军对香港的宗教管理极为重视，通过“皇民化运动”和“宗教团体法”将宗派林立的基督教统合成为“香港基督教会”，加以操控和利用。在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下，香港教会损失惨重，信徒流失，财产被占，而西方传教士则被关入集中营，一些中国牧师和信徒被杀害。整个香港教会在日占时期，根本无力拓展教会事业，只能处于维持状态，而日本强力主宰下的“宗派合一”也只不过是一时之兴盛，至战后则恢复到战前宗派林立的状态。由于战争的影响，教会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后方，各项事业也都向后方转移。杨天宏教授及其学生细致清理了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的活动，他指出这场运动发生在抗日战争紧张进行之际，与国家亟需抵抗日本侵略、建设巩固的抗战后方这一急迫局势有关，在神学思想上则与中国教会受到社会福音思潮的影响而兴起的本色化有密切联系。在这种双重因素作用下，边疆服务在西南后方大规模展开，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是“抗战时期边疆服务能保持一定的社会参与度，实赖战时后方地位凸显及政府重视”，而在抗战胜利后，边疆服务运动迅速走向低潮，而中国社会缺乏基督

教信仰和传统是教会事业难以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华西地区是抗战的大后方，教会文字出版机构因为战争原因纷纷停止在沿海活动而迁往后方。陈建明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在华西的文字事工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几个重要的出版社和期刊社迁来华西，与本地出版社机构加强合作，成立了基督教联合出版社，成都成为抗战时期基督教出版业的中心城市。抗战结束，一些出版机构迁走，基督教在华西的文字事工走向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个社会阶层共同抗战，在根据地对教会的政策也有变化。陶飞亚指出抗战时期中共对基督教会的政策发生了引人注目的重大转变。抗战以前，采取的是反对、限制和打击外国在华教会的方针；抗战时期，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逐步转变了对传教士、教会的政策，展开了对基督教会的统战工作，在动员中外基督教人员团结抗战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王欣瑞则探讨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西方教会的政策。福克斯·伯特费尔德Fox Butterfield) 曾以美国公理会在华北差会的档案资料考察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共产党，其中有部分涉及到抗战时期传教士与共产党的交往。在他看来传教士与共产党经历了由敌对到温和最后变成盟友的转变，而传教士对共产党的评价非常重要，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内公共舆论。通过以上学术史梳理可以发现，尽管相关论著不少，但多是零散的单篇论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不多，已有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战时高等教育、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社会救济、著名中国基督徒等方面。从区域上来说，除了香港和东北目前已有一定研究外，绝大多数的成果集中在大后方，而沦陷区特别是华北近乎空白。从研究对象来说，目前对于日伪的基督教政策已有一定积累，主要是华北中华基督教团，而像沦陷区的英美差会、中国基督徒、中国本土教会等情况，可以说连基本的史实都还不是很清楚。因此，抗战时期基督教研究是一个亟待深入研讨的课题。

+++++

(选摘)

贝德士论抗战时局下的中国基督教

徐炳三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湖北武汉 4 3 0 0 7 9)

摘要 抗日战争时期, 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广泛论及中国基督教及政教关系. 他认为, 战时沦陷区教会人才流失、国统区人才过剩问题突出, 教会人士应坚守岗位.

战时社会服务和教会发展同等重要、相辅相成, 应齐头并进、相互促进. 沦陷区传教士应避免与日伪当局发生冲突, 以确保教会的正常运转, 但必须坚持正义和坚守底线. 少数日本基督徒带着真诚目的来华, 但多数立场与日军一致, 政治压力和民族主义是出现此种情形的主因. 贝德士在谴责日军暴行的同时, 坚持与日本基督徒友好往来, 努力促使其觉醒. 贝德士的战时书写, 为学界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大量史料; 贝德士的某些论断, 或可成为当下抗战基督教史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

关键词 贝德士; 抗日战争; 南京国际安全区; 基督教; 政教关系

近年来, 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宗教问题受到学界关注, 基督教因社会参与度较高, 尤其受到学者的重视, 学界推出不少相关成果. 然而总体而言, 相关历史仍存在巨大的研究空间, 很多基础史实尚未厘清, 某些重要问题尚无定论. 有鉴于此, 本文试以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的战时书写为素材, 探讨他笔

下的战时中国基督教及政教关系, 以希对现有研究有所推进. 本文除了为学界提供若干战时基督教的原始文献外, 更重要的是从一位亲历抗战的外籍传教士的角度, 观察当时的宗教生态和政教关系, 帮助我们从新的视角理解时人的见解和主张, 避免片面阅读史料而对历史, 尤其是时人心态产生误读. 虽然当事人的判断也不免有误, 但其独特视角对于当代历史研究仍有借鉴意义.

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 1897—1978), 美国传教士、历史学家, 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 1920年赴金陵大学任教. 初执教于政治系, 后长期担任历史系主任. 1933—1935年赴美进修, 获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重返中国后, 除1941—1945年被迫离华外, 多数时间均在南京工作, 直至1950年离开大陆. 日本侵华期间, 贝德士活跃于中国沦陷区, 一度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保护并救济了数十万中国难民. 1936—1941年他7次访问日本, 深入探究日本政治、社会和宗教状况. 1942—1944年参与战俘交换工作. 1946年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指证日军暴行. 特殊的身份和经历, 使贝德士对战时基督教及政教关系的认识比一般人更为深刻.

贝德士的抗战时期基督教记录, 主要保存在他已刊和未刊的文章及各类通信中. 贝德士的信息源, 有自身经历、考察访谈、友人通信、教会报告、媒体报道等多种渠道, 多为史料价值很高的原始文献. 不过, 本文无意面面俱到地论述贝德士战时书写的细节, 而是要概括贝德士关于抗战时期基督教的几个论点, 以期发现时人认知战时政教关系的独特性.

一、战时危局: 坚守还是撤离?

贝德士以大量笔墨, 记录日本侵华时期中国基督教会遭遇的沉重打击和巨大损失, 并由此引发一个问题: 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应该在危机四伏的沦陷区

坚守,还是撤离至敌后,乃至撤出中国?据贝德士描述,1937—1940年中国各地百余座教堂、医院和学校的财产损失达数千万美元。1941年260所新教医院中大约有1/4被摧毁,大多数学校也受损严重,只有1/13的教会大学还在原校区上课。据称有12位新教传教士死于枪弹,20—300名中国基督徒意外身亡,3位教育传教士因精神崩溃而自杀。这还只是通讯不畅条件下的保守估计,实际伤亡人数可能更多。战争导致的经济崩溃对基督徒而言更具毁灭性。沦陷区大多数会众极度贫困,饥饿笼罩着大部分家庭。贝德士的工作地南京,1940年米价上涨了8—9倍,即便这样也无法保证持续供应。沦陷区粮物资奇缺,民众生活无以为继。国统区同样不容乐观,该时期重庆物价是战前的90倍,工薪阶层中的基督徒普遍食物缺乏,健康状况堪忧。教会对医生和学生实施援助,但远远无法满足需求。从1941年以后,中国货币贬值60—90倍,许多传教士基督徒不得不变卖家当用来购买食物。不过,国统区至少不会受到日军的直接侵扰,而沦陷区大批教会财产遭到掠夺和破坏,大量教堂、学校、医院的建筑和设备被没收,基督徒个人财产被剥夺的情况也比比皆是,教会领袖不时遭到政治迫害。

面对此种危局,很多中国基督徒选择从沦陷区转移到国统区,尤其是教会领袖和知识阶层,他们认为只有在自由环境下才能发挥自身价值。教会人才源源不断地向西流动,导致基督教资源分配严重不平衡。贝德士对此深感失望,他在写给母国教会的信中称,沦陷区领袖的大量西迁导致国统区教会机构臃肿,许多优秀人才失去用武之地,这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这些教会领袖和骨干按理应该融入当地教会,但因为方言、风俗、教育程度的差异,他们与当地教堂及社团的关系非常尴尬。贝德士在另一封信中指出,沦陷区与国统区的信息交流渠道被破坏,双方的联系与合作等无法继续。任何穿过前线、从国统区进入沦陷区的人,都可能被怀疑是抗日分子。国统区教会也会想当然地认为,沦陷区的基督徒可能已经叛变国家,从而对交流产生顾虑。这种情形,难免会让国统区一些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来自沦陷区的基督徒。与国

统区人才过剩相对的,是沦陷区教会对人才的巨大需求.贝德士指出,沦陷区因教会领袖和骨干的流失,领导力量严重不足,教育界和医学界尤甚.包括传教士在内仅存的领导群体负担沉重,教会能做的事情也相较战前少了许多.这一结论可以从其他文献得到佐证,比如1935年东北长老会某传教士撰文称:“今天我们遇到最大的压力就是缺乏一流的基督徒领导阶层,教会似乎很难产生能够领导基督教事业的杰出的男女领导人.”1941年形势更为严峻,正如某传道人的记录:“传道人员中正式神学卒业者,不及全数之半,受过高中以上教育者十分之二强,未受任何正式教育者十分之一左右,半兼他职者十分之二以上,年龄在三十以下者不及十分之四,现已届退修年龄而仍在职者十分之一左右.再由信徒方面论之,依人数论,都市与农村各半.依普通教育程度论,以仅受过低级教育者为多,知识分子最少,青年尤少.”贝德士并不否认在沦陷区工作的困难和危险,但他认为,如果因为形势艰难就退却,那么基督教早就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失败了.这种困境和抉择同样适用于传教士.西方教会中有一种声音,认为战争期间对外宣教无利可图,应该终止对远东的传教活动和经济支持,贝德士对此坚决反对.他声称,在生命和自由遭到威胁、苦难和绝望随处可见时,人们最需要信仰和充满爱的团契.基督徒不应对此视而不见,更不应将世界交托给魔鬼.他进一步补充说:“在基督教工作的任何一个领域,本土教会都比差会狭义的利益更重要.暂停对差会的人员和资源援助,可能会严重阻碍教会发展.在大多数领域,包括从人类的意义来看,传教都不会失败.”就在华传教士而言,他们不仅可以撤到远离日军的敌后,而且可以撤到安全舒适的祖国,那么他们应该如何选择呢?贝德士给出的答案是坚守.1940年,欧美各国政府要求在华所属国妇女、儿童和非重要岗位的男性撤离.贝德士对此表示理解,但认为中国需要这些人,除非万不得已他们应该留下.他在写给美国教会的传阅信中说:“许多事情还悬而未决,但为了继续工作、维持教会服务以及我们的教友共患难,几乎所有男性和特定的一部分女性都打算无期限地待下去,除非我们的存在对他们构成了危险.”贝德士认为,即使传教士最终被赶走,但难忘的一页已经彪炳青史,而且可能会为将来的成就做出铺垫.截至1940年10月1日,仍有

75%的传教士留在中国,包括贝德士本人。学界新近研究表明,贝德士的态度确为当时多数传教士的共识。传教士不甘心放弃多年来的宣教成果,美国政府多次派员劝离却收效甚微。不过,大约有400名传教士申请转移到国统区继续工作,重庆政府也打算提供帮助,但美国政府却以路

途艰险为由加以拒绝。随着形势的恶化,1941年欧美国家对侨民再次发出撤离预警,部分传教士决定回国,美国政府也被迫同意了一些传教士的西迁请求。当然,传教士的决定并非都是出于自身安危的考虑,而是担心牵连中国基督徒。贝德士指出:“如果庞大的传教士团体不再保持中立地位,尽管能切断联系,他们也可能成为中国同事的负担和危险,甚至长期滞留下去会成为祸害。”贝德士的担心绝非危言耸听,据美国外交部档案披露,1940年10—11月,山西辽县13名基督徒因共产党嫌疑被日本人杀害,实则是要赶走美国传教士。报告指出:“最近几个月,日本人不断向中国教员和皈依者施压,以至于中国教徒觉得他们的处境非常危险,除非传教士离去。当然,这就是日本人想要的。”最终传教士被迫从山西撤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控制区的敌国传教士悉数被捕,仅中国被捕者就达800余人,超过亚洲其他地区的总和。在这种态势下,传教士继续在沦陷区服务几无可能。不过,该时期仍有2000多名传教士活跃于国统区,很多人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此时中国教会领袖也别无选择,将许多教会机构的总部,整体或部分地从沿海城市迁往西部。尽管教派矛盾在所难免,但相互合作和协调成为主流,只有这样才能在危局中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二、宣教与救济:孰轻孰重?

既然迟迟不愿撤离,那么传教士在炮火纷飞的中国做什么呢?他们与中国基督徒一起,积极投身于灾民救济和宣教运动中。这就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宣教与救济的关系两者孰轻孰重、应该如何平衡呢?贝德士对此给出的答案是齐头并进、相辅相成。1938年初,贝德士与同事全力投入到南京国际安全区的救济工作,但宣教工作从未停止。传教士要为25万难民提供食宿和

医疗服务,任务十分艰巨.安全区粮食不足,抢劫时有发生,难民被恐慌和焦虑所笼罩.安全区25座难民营中11座是教会财产,容纳了近2/3的难民.这些建筑损耗严重,仅金陵大学未来的修葺费用就达1万美元.宗教工作在有序开展,尽管南京全职牧师只有3位,但在基督徒的协助下效果甚佳.在恐怖达到顶峰的两周里,仍有5处教会的工作从未中断,另外6处短暂中断后恢复.这11处教会中的8处不仅可以较好地维持日常工作,而且有所拓展.1938年1—2月,近1000人参加教会服务和圣经课程,参加礼拜者达1400人.

中国其他地区与南京相似,数百万难民的救济工作很多是在当局领导下、由基督徒完成的,社会服务与宣教运动并行不悖.贝德士指出,经教会人士的努力,沦陷区基督徒数量在三年间显著回升.比如南京一度损失了3/4的教徒,但在1940年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中华基督教协进会还一度提供教材和教师,对工人基督徒开展培训.传教士修复了各地上百座被毁教堂,并增加了许多新教堂.教会对教师、医生、护士新成员训练如火如荼,之前的损失陆续被填补.1941年初,中国有牧师和传道人大约1.1万人,主日学学生25万人,西方传教士4000余人.青年与宗教合作运动成效显著,某场基督教运动有5万名学生参加,其中1137名成为慕道友.在另一场运动中,某传道人在十几所教会中学演讲,300人因此皈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教会顽强地维系着自身的运转,并持续服务于社会,贝德士同样给出很多例证.1942年,中国教会大学或搬迁,或合并,师生坚持在芦苇和泥巴搭建的教室上课.261所基督教中学的2/3被迫关闭,尚存者艰难维持.教会中小学很多经过简单修葺,重新投入使用.教会医院的1/4被炸毁或被迫关闭,但余者仍在坚持运转.一个教会伤兵救助组织,提供了约1000名全职工作人员和约5000名志愿者.20座城市的基督教青年会转移到自由城市,他们派遣450名工作者到前线棚屋照顾伤兵.其中一座棚屋被炸毁6次,又6次原地重建.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部分救济工作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立场相同,双方充分开展合作.1943年,国统区生活极其艰

苦,但贝德士认为宣教和救济工作非但没有受到严重影响,反而成绩斐然.该时期纸张价格上涨10—40倍,但每年仍能售出《圣经》23万本,福音书和其他经文500万本,达到战前最高水平.广学会、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华英书局等西迁机构实现联合出版,田家半月刊发行量达4万册,基督教经典的翻译也成果丰硕.学生福音传道工作取得显著成功,他们通过自我奉献投身基督教服务.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试图建立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联合中日学生维护国际正义与和平.对经济来源断绝的学生的救济工作,主要也由青年会负责.西迁的教会大学坚持正常授课和开展科研,某医科大学在敌机频繁轰炸中仍坚持有机化学显微实验项目.此时传教士依托西方在华救助组织开展工作.比如基督教对华救济委员会在14个省份活动,被20多个教派所认可,得到美国若干慈善组织和商业巨头的资助.教会还与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华中分会联系密切,传教士多为相关救济工作的领导力量.

1943年,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增设社工委员会,以协调工作人员开展紧急救济等工作.另有多位经验丰富的美国传教士在青年会、红十字会、工业合作委员会等机构担任主管.贝德士相信,该时期基督教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阶段.他举例说,蒋介石公开宣布,对于目前急需帮助的中国人而言,传教士显然是朋友.自1938年起,国民政府允许私立学校开设宗教课,据说这一变化与蒋介石夫妇对基督教的关切有关.大批教会学校学生争相参加福音会议和圣经课堂,宗教热情高涨.国民政府甚至暗中资助沦陷区教会学校,比如1940年农业部门拨款3万美金,用来支持金陵大学在沦陷区试验站的种子改良项目;教育部批准并资助三所燕京大学管理下的中学.值得一提的是,陕西一些基督教团体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互信也在增加.教会开始认可中共为大众谋福利的土地改革者和受欢迎的民族主义者,中共则不再称传教士是列强在华代理人,而是全人类的服务者.贝德士确信,如果中共的军事、政治影响力不断扩大,这种理解和互信将具有潜在的意义.

贝德士进一步指出,传教士和基督徒的战时表现,同样影响了中国民众对基督教的态度.某教会领袖称:“教会的战时社会工作和传教士对中国的忠诚,

使学生的反教声音销声匿迹。”曾对基督教表现出强烈敌意的《中国评论家》(TheChineseCritic)杂志发表声明:“目前战争导致的许多事情之一,就是人们开始意识到无论过去怎样怀疑,基督教在中国充分地证明了他们存在的意义。”作为中国知识界具有代表性的英文刊物,这一声明反映出中国主流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态度的变化。一位商人认为:“传教士在这里为服务人民所做的实事,比起十年讲道对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更有用。”贝德士也指出:“他们已经不是用言语传福音,而是通过对上帝的爱和对人的兄弟情谊的实践证明。他们已经在中国的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艰苦的时刻满足了人类的巨大需求。”从贝德士的表述看,他从未将灾民救济与宣教运动看成两项平行的事工,而是将两者融为一体,认为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不求回报地救济百姓,使民众对基督教的好感增加,有利于教会发展。贝德士发现,战时中国基督教并非如预期那样直线衰落,在某些阶段或某些地域还呈现上升趋势。而全方位开展的宣教运动,是基督徒社会服务的动力源泉,作为连接海内外救济组织的纽带,基督教会成为战时最有力、最有序的民间救援力量。战时教会的义举开创了国统区、乃至解放区政教关系的新局面,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的非基督教运动彻底终结,甚至教会学校不得开展宗教教育的条款都出现松动。

三、沦陷区教会:妥协还是抗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沦陷区的监视、威胁、控制以及随时可能到来的政治迫害,让传教士倍感压力。中国基督徒的处境更为艰难,他们遭遇政治打击的可能性远超传教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传教士的被捕,沦陷区教会完全被日本人控制。面对此种危境,教会人士如何应对呢?是妥协退让还是奋起抗争?抗战时期沦陷区教会政治处境艰难。在东北,大量书籍被查禁并焚毁,很多教会出版物赫然在列。英美传教士被认为在伪满扩大所属国的政治影响力,虽然暂时不会遭到直接伤害,但与之相联系的中国基督徒则不时遭到殴打、拘禁或驱逐。牧师走访信徒困难重重,一些传教点因长期疏于管理而关闭。有的基督徒被赶出教堂,且不许开设新的传教点。日本警察对教会的干涉

和迫害十分随意,有的传教站因反鸦片而被关闭,有的传教士因将圣经给本地商人而被驱逐。在华北,军警、宪兵队和领事馆均密切关注着教会人士的一举一动,并通过一些机构搜集教会成员信息。恐吓、逮捕和折磨屡见不鲜,当局通常宣称逮捕与政治无关,但偶尔也会表达对教会的仇视情绪。1940年前后,日本军警关闭了教会医院、封存了教产,驱逐了两个省的传教士,公开威胁中国教会领袖与传教士断绝关系。该时期华北很多地区也出现图书出版禁令,大量基督教书刊被禁止发行。南京传教士同样招致日军的强烈敌视,国际救济委员会成员多次被拘留或驱逐出境。虽然在美国的抗议下这一情况有所缓和,但贝德士认为,随着美日关系的恶化,传教士的安全堪忧。面对此种形势,贝德士的意见是,教会要尽可能避免与当局发生直接冲突,但要坚持正义和坚守底线。避免与日伪政权冲突是出于现实的考虑,是一种不得已的策略。贝德士在1939年5月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强调,教会肩负着双重责任,他们既要满足战时中国民众的急切需要,也要保持基督教事业的延续性,不做出妥协很难完成这些工作。日本和朝鲜教会已经以驯服的态度来确保安全,中国沦陷区教会也不得不如此。传教士被怀疑建立自己的权威,这种怀疑无法补救,但必须尽可能防范。贝德士的意见或许是主流传教士的共识,至少是贝德士同仁们的共识。南京的传教士随时与警方保持联系,以确保每件事情对警察公开,并表示欢迎警察随时来检查并接受约谈。传教士非常小心地处理任何事情,以避免被怀疑有反日倾向。贝德士认为,在政治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制定长期政策是不现实的,只能践行“紧急的机会主义”,“保持连续性当然是一个很危险的想法,这很容易退化为惰性,而丧失对今后机会的敏感性”。坚持正义是传教士内心的声音,随时表现在行动中。贝德士对日本在沦陷区的暴政表示强烈愤慨。他说:“在这种排除异己的军事压榨下,这个巨大的社群没有负责任的领导,没有社会道德,没有对正直思想的培养,没有为国际和平而付出努力。这是一个集权主义体系,他们早在欧洲人发明‘集权主义’一词之前就已经付诸实践。”贝德士及其同仁在给母国的信函中,详细记录并强烈谴责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并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大批难民。

1939年11月28日,贝德士发表文章《南京的毒品交易》,公开揭露

日军纵容沦陷区毒品买卖的行为。次日日本领事致信美国总领事,抗议贝德士“恶意宣传”。很快日本宪兵队派人登门质询并予以警告。对此,有的传教士批评贝德士给教会带来危险,也有人指责他滥用权利博取民众支持。面对压力贝德士却不为所动,他说:“最大的内在紧张源于,我们内心强烈反对邪恶,却找一个调整或和解的元素是与邪恶妥协,乃至助长邪恶。”从力避冲突和谴责恶行的两种表述,可以看出贝德士内心存在一定矛盾。理性告诉他服从日伪是最佳选择,但情感上却很难做到与邪恶妥协。这种情形同样并非贝德士所独有,而是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传教士的共同经验。他们虽然强调不与当局对抗,但底线不可逾越。以教育为例,南京传教士公开宣称,绝不允许教会学校沦为新政权的政治工具。他们坚称教会学校的目的是教育和基督化,而非政治;战时教会机构和财产的性质应该是中立的,不属于任何一方。贝德士内心很清楚,有关教育中立的言论必然会被视为对官方权威的挑战,日本人设置的伪教育部一定会对此加以干涉。在这种情况下,沦陷区基督教教育前途未卜。麻烦的是各沦陷区教会内部意见并不统一。面对当局可能推行的教育注册要求,各派分歧严重。圣公会等教派认为,在新政府注册是对旧制度的更新,有利于课程标准化和增强教会间的联系。而另一些教会人士声称,教会学校已经在国民政府注册,再向其他教育部门注册是不忠。华人教会同

工和教师则认为,应尽可能推迟注册,但如果学校因此被关闭还是要接受注册。还有一种声音是教会学校在不注册的情况下继续开办,直到被关闭为止。就贝德士本人而言,他并不在意注册本身,而是关注可能使教会学校发生质变的整体因素。他建议在没有明确的指导原则前,要避免随意行动。

贝德士的基本态度,是教会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适应战时高压环境,这种态度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依然持续。1942年10月,北京成立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华北主要基督教教派被强迫加入。教团董事会和委员会均有日本人加入,对警察和军政府负责,显然这个联盟是日本威逼利诱的产物。对于这个组织,贝德士并未带着情绪予以批判,而是努力发现其潜在价值。贝德士指出,这个教团组织内部关系复杂,许多线索表明教团领袖在设立

过程中故意松懈,比如基于夸大成员数量的预算、无法实现的培训项目,等等,似乎他们对当局的政策阳奉阴违.教团领袖江长川是蒋介石的施洗牧师,贝德士很放心让他承担此责.教团北京总部拟向当局请愿,建议日本军部将暂时不用的教产转给各地教会.在贝德士看来,教团规章充满了基督精神,并不包含可疑的政治表述.正如一位教会领袖的私下意见,尽管教团里有很多不受欢迎的人,但其中一些价值观念即便战后仍然应该延续.某主教在与女儿的通信中表示,虽然目前存在困难,但教会联合对于基督教发展仍具有价值,他希望这个联盟战后不要解散.基督徒唯一质疑的是,教会为何不是出于宗教情感自发地联合,而是要依靠异教徒政治势力实现.

。 。 。 。 。

+++++

<http://www.jonahome.net/files03/lishi3/zgjhs/diqi.htm>

第七课 从抗战开始到内战结束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积极投身抗战.基督教会爱国不落人后,也紧急行动起来,支援前线,救济难民.基督教青年会和上海各教会组成“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救死

扶伤，安置难民，分发医药和食品；又成立“战区服务全国委员会”，广泛开展慰问将士，征集、输送物资等战区服务工作。

许多西方传教士在大力支持中国教会进行战时服务、救济等工作的同时，又积极设法将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曝光。金陵大学教授毕范宇等美国传教士组织“中国通讯服务处”，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专门发布中国抗日战争的消息，并集中报导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和受难中国民众的悲惨境况，呼吁美国政府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禁运战争物资，呼吁美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1937年12月，中国首都南京失陷，入城的日军进行疯狂的大屠杀，三十万中国军民被淹没在滔滔血海之中。一些西方传教士义无反顾地坚持留在南京城里，竭力保护遭难的中国民众，并冒着生命危险用实录、摄影等方法记录下日军屠城的铁证。基督教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代理校长魏特琳在校园中收容了数千名中国妇女，使她们免遭日军的强暴；金陵大学附属医院的威尔逊，是全城唯一未逃走的外科医生，他日日夜夜在手术台前工作，救治了大批的中国难民。

抗战初期，华东、华北、华南各大中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纷纷落入敌手。在沦陷区，教会产业多被日军侵占，广大教牧人员和教友动辄得咎，出现无数悲剧。一些基督教知名人士被日本人和汉奸杀害。教会领袖、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曾任上海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抗日爱国立场坚定鲜明，1938年4月7日，被日本特务操纵的汉奸恐怖团体刺杀于上海静安寺路街头。对于英、美等国的传教士，日本人出于外交上的考虑，还不敢大胆迫害，但是不许他们去农村布道，只准在城市里活动。当时，城市里还有少许教堂在开放活动，乡村里的教会活动基本上停止了下來。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上午，北京等地各英美差会所属教会都被查封。所剩无几的几间教堂都由日本军方派日本牧师前去领导。日本军方为了便于控制，又强迫不同宗派的教会

进行合并，结果使教会的数目几近于零。河北一省，只剩下北平、保定和顺德三处教会。沦陷区所有的英美传教士约一千二百人，几乎全部被日本人投入集中营，其中包括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 L. Stuart）。英美传教士在集中营里饱受煎熬，不少人因条件恶劣、营养缺乏致病，也有人因身体衰竭而失去生命。伦敦会传教士、曾获1924年巴黎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四百米赛跑冠军的吕道牧师（Eric Liddell），在山东潍县的集中营中受迫害后因脑瘤致死。

抗战中期，日军想在短期内击溃中国军队、迫使国民政府投降的美梦已经破碎，正面战线基本稳定下来，在被称为“抗战大后方”的西南各省，教会活动有了一定的开展。

撤退到大后方的基督教会，除了支持抗战，从事救死扶伤和救济难民工作的同时，也大力发展教会自身。虽然烽火不断，狼烟冲天，教会在圣灵的带领下还是有很大的增长，新增加的信徒人数有十五万之多；一些教会还开始在西南各省的少数民族中传教，拓展了传播福音的新领域。与此同时，教会还积极进行内迁学生的救济工作，并向他们传播福音；为了帮助这批中国未来的人才，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和世界学生联盟携手合作，在英、美等国筹集到大批款项，并通过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送到他们手中。

抗战期间，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大专院校都迁到了大后方。教会所属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齐聚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所在地华西坝，使成都成为大后方实力最为雄厚的高等教育中心。这五所教会大学不仅开设了丰富的高水平课程，还运用其强有力的科研力量帮助大后方工农业的发展。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胜利结束，教会生活开始全面复苏。在战争中被日本人拘禁的西方传教士绝大多数返回原来的工作场所。中国教会配合抗战胜利的形势，加强了传播福音的力度：全国基督教协进会针对抗战胜利后中国重建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发起了“三年奋进运

动”；同时，向遥远之地、未得之民传福音的工作积极开展起来，许多基督教青年加入边疆布道的行列。据统计，1949年，中国基督教信徒达九十三万六千零七十七人，比抗战前的1936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七；教会达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二间（此外，还有其他崇拜点七千四百二十六处），比抗战前增长约一倍。圣经公会印行的中文版圣经，仅1946年一年间就分送三百万册。金陵神学院章文新博士主持编译的《基督教历代名著》五十三卷宣告完成。教会学校全面复课，仅1947年一个学年，申请上教会大学的青年人就有十一万之多。以上事实充分表明：中国教会正在发展的道路上迅跑。

可是，中国教会这一蓬勃发展的趋势被国内政局的剧变扼阻了。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国共两党内战重开。在抗战中被日本人打得焦头烂额的国民党，打不过在抗战中迅猛壮大的共产党，终于在1949年被赶出中国大陆。从此，中国教会的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作业（讨论题目）：

一. 中国教会和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抗战有何贡献？

二. 此一时期大后方的教会工作有何新发展？

+++++

【历史回顾】抗战时期中国教会的发展

作者：边云波

抗日战争首先是历练了神忠心的仆人。比如王明道先生，在抗战的八年时间里，在当时被日本侵占的北京，为神作了美好的见证。1937年日本侵占中国沿海一带以后，在日本侵占区成立了中国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后来改名叫基督教团，强迫中国的传道人加入。实际上是日本人利用、指派一些新神学派的人成立这个信仰混杂的组织，好加以控制。王明道先生冒着生命的危险，坚持真理，坚持正道，就是不肯加入日本人所控制的、信仰混杂的“基督教联合促进会”。

有位初立鹏弟兄讲过基督徒聚会处栾腓利弟兄的见证。栾弟兄当年在东北一个公司里做职员，同时也负责教会的工作。他也是不肯加入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有一天，栾腓利弟兄在办公室里忽然感觉到，这个地方很危险，应当马上离开这里，于是就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离开了办公室。走到公司门口的时候，他迎面遇见日本宪兵带着一些中国汉奸。这些人正是要来捉拿栾腓利，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他。他们拿着枪，对着栾腓利弟兄，凶狠地问：“栾腓利在哪里？”——基督徒是不能说谎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栾腓利弟兄，你该怎么回答？感谢主，那时栾腓利弟兄靠着主的恩典，心里面很平安，神给了他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用手指向楼上的一个办公室的窗户，镇静地对他们说：“刚才我在那个办公室的时候，栾腓利正好在那里。”那些日本兵一听，就吼叫着对他说：“你走开！”他们急忙上楼去抓栾腓利，而栾腓利弟兄就是这样脱险的。

神在抗日战争时期，藉着患难、艰难，历练了许多神忠心的仆人，即使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向神尽忠。

其次，抗日战争促使福音传向内地。福音最早传到的地方，是山东、福建，这都是沿海地区。后来东北、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福音逐渐兴旺起来，但也都是在东部地区。然而，由于抗日战争中这些地区被日本军队侵占，许多信徒迁移到四川、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地，就促使了福音传向内地，带来了当时教会空前的复兴。

第三，转变了许多学人归主。抗战以前，有些知识分子反对基督教，因而形成了一个“非基运动”。当年的确也有一定的声势。但是到了抗战时期，这个“非基运动”竟然再无声息，彻底地烟消云散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是神自己的工作。抗战时期，许多大学也迁到内地去，比如兰州师范学院、西安交通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是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大学联合在那里举办的一个大学），还有陕西南部的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医学院、西北工学院等等。（后来西北工学院逐渐改组，就成了中国发展航空、航天事业的教育中心。）此外中央大学，本来位于南京，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所培植的一个大学，后来迁到了重庆。复旦大学也由上海迁到了重庆。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爆发了日美的战争，从那以后，所有沿海一带由美国人所建立的教会学校也迁到内地去了，例如燕京大学迁到了成都的华西坝。这些学校里信主的老师、同学，也都跟着迁移了过去，他们向一些不信主的同学传福音，而由于生活艰苦，有些同学感于地上的苦难，也接受了救恩。这样当时便出现了许多学生归主的兴旺现象。当年在许多学校里，无论是不是教会学校，几乎都建立了基督徒团契。校园福音几乎是遍地开花了。那时有人估计，全国几乎每一个大学、中学，都有基督徒团契，都有基督徒学生建立的基督徒组织。（当年只有陕西的大学、

中学里，基督徒组织不叫“团契”，而叫“基督徒灵修团”。其实信仰和活动内容都是完全一样的。）

另外在那一时期，也有许多无名的传道者到处奔走传扬福音。在这里仅提两件事例。我在贵州亲眼见到的一个无名传道人，比我年长一代，名叫张复生。张复生弟兄很朴素，凭着信心步行到各处为主传道，他原名叫张丹溪，本来是一位共产党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革命者，信主以后改名叫张复生，到处传道。

1948年我在南京的郊区栖霞山传福音的时候也见到了一位四五十岁的传道人，他风尘仆仆，步行到一个个村庄去传福音，我们一见如故。后来谈起来才知道，他是凭着信心、靠着神的供给生活的；也就是说，只有信徒受到感动、自愿地供给他的时候，他才接受。他就是这样靠着神到处传道的。这位弟兄让我很受感动。中国当时已经有许多无名的传道者走出来了。

《教会》杂志微信

当年复兴的简况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0年代末那段时期，当中国大陆教会将面临大苦难、

大试炼的时候，神使中国教会有有一个较大的复兴，这真是神的恩典。当年的复兴情况，有人说是中国教会历史上少有的，我觉得这个说法并不过分。我们对神的作为，除了谢恩，就应当知恩、感恩、报恩。

◆ 山东等地的复兴祷告蒙神悦纳

早在抗日战争（1937年）之前，复兴的烈火就燃遍了山东，也带来了其他地区的复兴。当年山东的复兴祷告聚会，既不像现在某些教会不冷不热地作文章似的祷告；也不像某些教会高声歌唱大声祷告，甚至手舞足蹈，外表上喜气洋洋，却看不出他们在世人当中的见证。当年山东的复兴祷告聚会，是先彻底认罪，即便很小的罪都在神面前承认出来，若必要也在人面前认罪。这些弟兄姊妹们先在神面前求主的宝血洁净自己、被神看为圣洁，然后他们的祷告又很恳挚迫切，许多人为了将要丧亡的灵魂，常是情不自禁地流泪祷告。这些人的祷告，无形中先复兴了自己，而神必会将手洁心清的祷告的人和祷告的事一同悦纳。因此那样的祷告不仅带来了山东的复兴，也带来了全国各地的复兴。

◆ 知识分子的火热奉献影响全国

1945年，我休学一年到陕西洋县去传道。那年夏天，两位西北圣经学院的学生在暑假期间出来到各处传道实习，路过洋县，我们便短期在一起同工。这两位弟兄看到那里的学生聚会后说：“我们总是听说学生福音事工复兴了，却没有见到。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这么小的一个县城里，一般

的信徒只有二十几个，另外竟能亲眼看见好几十个学生在聚会。”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神所做的工作，不分地方大小，不分地域，在大城市小城镇里都看见了祂的作为。关于当年学生福音事工的复兴，会在以后的章节中详细叙述。

◆ 掀起了去往边疆传道的热潮

1940年代末期，有些人不仅奉献、响应主的呼召要以祈祷传道为业，还要往边疆去传道，往艰苦的地方、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去传扬福音；所以，就有往边疆传道的一个热潮兴起来了。那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天晚上跪下来，拿着一本代祷名册为这些往边疆传道的弟兄姊妹们祷告。

当时我有一个到英国留学的机会。有一位内地会的宣道士孔保罗师母（Mrs. Contento），她和她先生都在陕西城固的西北联合大学英语系教课。因为她任教的大学跟我传道的地方洋县很近，所以我们常常见面。1946年春天，她主动推荐我和滕怀智弟兄到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去，先读英国文学，然后再在那里读神学。（滕怀智弟兄1947年因主引导出国留学后，回到香港为主重用，就是滕近辉牧师。）我当年想不到孔师母会突然提出这一建议，感到很突然，就对她说这是件大事，我不能马上决定，只能先为这件事情祷告。后来我才知道，孔保罗夫人是爱丁堡大学校友基金会的理事，她有权推荐留学生，也有权审批奖学金，对我而言，这确实是个出国留学的机会。起初我也祷告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我每晚都按照去边疆的传道人的代祷名册，跪下来一个一个地为他们提名祷告，我觉得自己也几乎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员，就把去英国的事完全忘了。1947年夏天，第二届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会刚结束，我在上海内地会又巧遇孔保

罗师母，谈了几句话，她就又问起我：“你去英国的事，祷告的怎么样了？”我当时不好意思说自己把这件事忘了，就只好对她说：“依照现在的时局，我不知道中国的教会还有多长的时间可以传福音（当时的政治、社会形势变化很快），我觉得自己该留在中国国内抢时间传福音，所以爱丁堡我就不去了。”她当时的表情有些惊奇。实际上，我是被许多无名的传道者，被那些不怕苦难、完全献身的人所激励、带动起来的，只是她不太了解而已。

◆出现许多感人的诗歌

从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在当时面对或经历苦难的岁月中，是神自己感动了一些人，写出了一些鼓舞人、激励人的诗歌。其中一些诗歌的歌词将作为本书的附录之一，供大家参阅。这些诗歌是：

- (1) 《起来，我们走吧！》
- (2) 《主啊，我心爱你！》
- (3) 《举目向西展望》
- (4) 《靠吗哪度旷野生涯》
- (5) 《忠仆心语》
- (6) 《神家忠仆》
- (7) 《狱中思家》
- (8) 《西北之灵工》
- (9) 《漫漫十架归去路》

- (10) 《旷野虽黑不能永是夜》
- (11) 《今日我心》
- (12) 《灵修院院歌》
- (13) 《天国之大使》
- (14) 《十架归路》
- (15) 《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

◆ 面对苦难，多人作了献身的准备

那时候中国大陆存在着不少“吃饼得饱”的传道人，他们在社会上找不到合适的职业，混不下去了，就在西方传道人面前表示热心殷勤。西方的传道人不明真相，就帮助他们去上神学。上神学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有吃、有住、有零用钱，毕业后不但有职业、有薪酬，还有受人尊敬的牧师名衔，真是有益无害、有得无失。但是这样的传道人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提前6:5）”，“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腓3:19）”。这样的人怎么能传福音？怎么会爱护羊群？怎么会走十字架的道路？当时不信主的人都能看出他们的实质，称呼他们是“吃教的人”。由于这些假信徒、假传道的混淆，甚至一度连真信徒也被人称为“吃教”的。就我所知，当年有些献身的弟兄姊妹们，已经预感到只要政局一变，真正忠心向主的人不仅要面对执政者的重压，可能还要面对一些吃教的“该亚法”般的人物，他们为了保全自己，就可能伤害他人。所以在1948年问世的《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一诗中，就有两句诗词提醒献身事主的人，要充分准备“不顾希律的逼迫，不顾祭司们的杀害”。事实证明，后来在1950年代，成立“基督教三

自会”前后，那些冲在前面逼迫信徒、伤害教会的，正是这些吃教的人。

但是当年那些献身的人，明知有苦难，却甘向苦路行。因为这条十字架的窄路，即或再苦，我们的主却为我们的缘故早已在这条路上走过了！当年许多年轻的信徒，甘愿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把各样的东西：荣誉、前途、家产、不信主的恋人……全都放下，甚至于把自己的性命都摆在祭坛上，置生死于不顾。我个人觉得，这一方面是因为主救恩的激励，就如同圣经所教导的：主为我们死了，我们就应当为主活着；另外，像神的老仆人，例如王明道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把性命都能摆上，确实是对多人的激励。当时我们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就想：如果王明道先生把性命都能摆上，我们还有什么不能献上呢？在今天的世代，也还是这样，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是属灵的争战一点也没有止息。一方面，神用他的恩召呼唤我们，主耶稣基督用他舍命的救恩、流血的大爱激励我们为主而活；另一方面，撒但的引诱、搅扰和化装的欺骗，一时也没有停息，千方百计地拦阻我们与神亲近。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属灵的眼睛明亮起来，看到主为我们死了，我们就应当为主活着，正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但愿感动前一代人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们这一代的弟兄姊妹，像主耶稣被卖的那天夜里所说的话：“起来，我们走吧！”（约14:31）

下一节就列举一些在当年的复兴盛况中摆上自己甘走窄路的弟兄姊妹的事迹，不是为要荣耀人，而是见证神的恩典，也愿能激励现在为主而活的弟兄姊妹们。

（选摘）

+++++

+++++

+++++

朝鲜、台湾、港澳、南洋、等地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Korea

从1世纪开始，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开始控制朝鲜半岛和满洲，成为朝鲜三个王国（公元前57-公元668年），直到新罗在676年统一为止。698年，渤海国在高句丽的旧领土上建立，导致了渤海和新罗的北南时期（698-926）并存。

在9世纪末，新罗被划分为后来的三个王国（892-936），最后由高丽王朝统一。同时，契丹辽朝入侵后，渤海国陷落，包括最后一位皇太子在内的

难民移居至高丽，受到王太子的热烈欢迎并将其纳入统治家族，从而统一了高句丽的两个继承国。

在高丽时期，法律被编纂，公务员制度被引入，佛教影响下的文化蓬勃发展。但是到13世纪，蒙古的入侵使高丽受其影响，直到14世纪中叶。

在1388年推翻高丽政变后，李成吉将军在1392年建立了朝鲜王朝（1392-1910）。世宗大王（1418-1450）实行了许多行政，社会，科学和经济手段进行改革，在王朝初期建立了王室权威，并亲自创建了朝鲜字母。

在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和平时期之后，朝鲜王朝在1592年至1637年间面临着外国入侵和内部派系纷争。这些入侵中最著名的是日本对朝鲜的入侵。这标志着朝鲜王朝早期阶段的结束。中国明朝和朝鲜王朝的联合力量击退了日本人的入侵，但对国家造成了损失。从此以后，朝鲜逐渐变得越来越孤立和停滞。到19世纪中叶，朝鲜不愿现代化，然而在欧洲大国的侵略下，被迫与外国签署不平等条约。

1895年明成皇帝被暗杀，东鹤农民革命和1894至1896年的加博改革之后，大韩帝国（1897-1910）应运而生，标志着社会改革和现代化的短暂时期。但是，1905年，大韩帝国签署了一项保护国条约，1910年，日本吞并了大韩帝国。

朝鲜的抵抗运动起初表现为1919年3月1日广泛的非暴力运动。此后，在大韩民国临时流亡政府的协调下，抵抗运动在朝鲜和平示威的影响下蔓延到邻近的满洲。韩国人抵抗运动在中国和西伯利亚开始活跃起来。这些流亡组织的数量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朝鲜半岛发展将变得很重要。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盟军将朝鲜半岛分为北部地区（受苏联保护）和南部地区（主要由美国保护）。1948年，当大国们未能就成立一个单一政府达成共识时，该地区事实上成为了北朝鲜和南朝鲜的分治状态。朝鲜半岛在三八线上被划分：“大韩民国”创建在南方，与美国和西欧友

好；“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在北方，与苏联和共产主义中国的人民共和国友好。朝鲜新任总理金日成于1950年发动了朝鲜战争，试图在共产党统治下统一朝鲜。在巨大的物质损失和人员死伤之后，冲突于1953年停火而告终。2018年，两国同意努力达成最终解决方案，以正式结束朝鲜战争。1991年，两个国家都被接纳为联合国。

战后两国基本上都处于军事统治之下，但韩国最终实现了自由化。自1987年以来，它具有竞争性的选举制度。韩国经济蓬勃发展，现在被认为已全面发展，其资本经济地位与西欧，日本和美国相似。

朝鲜维持极权军事化统治，围绕金氏家族建立了一种人格崇拜。从经济上讲，朝鲜仍然严重依赖外国援助。继苏联解体以后，援助急剧崩溃。从那以后，该国的经济状况一直很微弱。

。。。。

韩国南部的人们在穆蒙早期（公元前1500-850年）采用了密集的旱田和稻田农业，并种植了多种农作物。由酋长领导的第一个社会出现在穆门省中部（公元前850-550年），最早的奢侈贵族墓葬可以追溯到穆蒙晚期（公元前550-300年）。公元前700年以后，青铜生产就开始在中部开始，并在礼仪和政治社会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松果里，大坪，伊江洞等地的考古证据表明，木门时代是首领崛起，扩张和瓦解的第一个时代。长途贸易的增加，局部冲突的增加以及青铜和铁冶金的引入，标志着公元前300年左右穆蒙的终结。

此外，在朝鲜半岛的南端发现了与日本类似的73座墓葬，据估计可追溯至公元前100年。这些墓葬表明了朝鲜半岛与日本的亲密关系。

朝鲜第一个王国，位于半岛和满洲的北部，后来与半岛南部的辰国并列。历史悠久的朝鲜王国是在公元前7世纪初的中国记录中首次提及的。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朝鲜已发展到在中国广为人知的地步，并且在此期间，它的首都迁往了平壤。

中国统治

公元前108年，中国汉王朝击败了朝鲜，并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了四个郡（军事区）。在几十年中，有三个郡（军事区）沦陷或向西撤退，但乐浪郡仍然是中国历代王朝的文化和经济交流中心，历时四个世纪，直到在公元313年被高句丽征服。

三国时代是指高句丽，百济和新罗。

第三和第四世纪的特点是中国人与鲜卑人的领土竞争，既有损失也有收益。高句丽在242年袭击了一个中国要塞，企图切断中国人进入朝鲜领土的机会，从而引发了高句丽-魏战争。在4世纪初，高句丽再次进攻中国人，以切断他们对朝鲜的入侵。这次成功了，然而，高句丽的扩张导致了与崛起的鲜卑人的对抗。鲜卑人在4世纪中叶摧毁了高句丽的首都。高句丽最终进行了重组，并在公元4世纪后期发动了反击。

高句丽在5世纪达到顶峰，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并成为东亚的大国之一。他们曾将这个国家扩大到内陆地区，内蒙古部分地区，俄罗斯部分地区；并从百济手中夺取了今天的首尔。高句丽经历了黄金时期，征服了百济和新罗，实现了朝鲜三国的短暂统一，成为朝鲜半岛最主要的王国力量。

高句丽是一个高度军国主义的国家。除了争夺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外，高句丽还与中国各朝代发生了许多军事冲突，最著名的是高句丽-隋战争，在此期间，高句丽击败了一支据称数量众多的庞大中国部队。

642年，强大的将军Yeon Gaesomun（渊盖苏文）领导了政变并完全控制了

高句丽。作为回应，中国皇帝唐太宗领导了一场反对高句丽的运动，但被击败并撤退。唐太宗去世后，他的儿子唐高宗与朝鲜新罗王国结盟，再次入侵高句丽，但无法胜过高句丽的严格防御，于662年被击败。然而，渊盖苏文于666年因自然原因去世后，高句丽被其儿子和弟弟的继任斗争所困扰，其长子投奔唐朝。他的弟弟叛逃到新罗。唐朝和新罗的联盟在667年叛逃者Yeon Namsaeng的帮助下发动了新的入侵，并最终在668年征服了高句丽。

高句丽崩溃后，唐和新罗结束了同盟，并争夺了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新罗成功地控制了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唐朝则控制了高句丽的北部地区。然而，高句丽灭亡30年后，一个由原来的高句丽王国的将军Joyeong创立的国家成功地把唐朝军队从大多数原高句丽领土内驱逐出去了。

百济

百济由高句丽王子，高句丽创始人的第三个儿子Onjo创立。它扩展到西南（忠清道和全罗半岛的省份），并成为显著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在此过程中，百济在其领土附近与高句丽和中国突击队展开了激烈的对抗。

百济在4世纪顶峰时期（近肖古王）统治下，吸收了所有的马汉邦，并征服了朝鲜半岛的大部分西部地区（包括京畿道，忠清，全罗等现代省份，以及黄海和江原道的一部分），成立了中央集权的政府。百济在扩张领土的过程中通过与南朝的海上接触获得了中国的文化和技术。

百济是一个强大的海上力量。它的航海技巧使之成为东亚腓尼基，在整个东亚传播佛教和将大陆文化传播到日本方面发挥了作用。百济在将文化发展（例如汉字，佛教，炼铁，高级陶器和礼仪葬礼）传播到古代日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百济被新罗-唐同盟军征服后，百济王室逃亡到日本，其文化的很多其他方面也随之传到日本。

百济在660年被新罗和唐军联合击败。

新罗

根据传说，新罗王国始于公元前57年。

到第二世纪，新罗已经成为一个大国，占领并影响着附近的城邦。

新罗是朝鲜三大王国中最小和最弱的一个，但它利用狡猾的外交手段与实力更强的其他朝鲜王国、最终与唐朝结盟，从而得到了巨大的优势。

660年，新罗在唐军的协助下征服了百济。661年，新罗和唐朝军队进攻高句丽，但被击退。后来，Muyeol的儿子和Kim的侄子，新罗国王Munmu于667年发起了另一场战役，第二年高句丽沦陷。

加雅

加雅邦（Gaya）是韩国南部那空河流域的一个小王国的邦联，它源于三汉时期的拜占汗邦联。加雅的平原富含铁，因此有可能出口铁工具，农业蓬勃发展。在早期的几个世纪中，南部邦联被领导的金官伽倻在金海地区。但是，到了五世纪以后，它的主导力量变成了高灵地区的大加耶。

加耶不断地与周围的三个王国交战，其发展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最终在562年被新罗吸收。

北部和南部各国

南北国家一词是指新罗和渤海国时代。当时新罗控制了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而渤海国则扩展到了满洲。在这段时间里，文化和技术有了很大进步，特别是在统一新罗地区。

统一的新罗

统一战争后，唐朝在前高句丽建立了哨所，并开始在百济建立和管理社区。新罗在671年攻击了百济和朝鲜北部的唐军。唐后来在674年入侵新

罗，但新罗在676年将唐军赶出了朝鲜半岛，以实现大部分朝鲜半岛的统一。

统一的新罗是艺术和文化的黄金时代。

在此期间，波斯地理学家伊本·霍尔达德贝（Ibn Khordadbeh）在《道路和王国大全》中记载了统一新罗和阿拔斯·哈里发之间的远距离贸易。佛教寺院，如世界遗产佛国寺和ram石窟，都是韩国先进建筑和佛教影响力的例子。这个时期的其他国家支持的艺术和建筑包括皇龙寺和芬皇寺。波斯人将新罗描述为位于中国的东端，并写着“在这个美丽的国家新罗，有很多黄金，雄伟的城市和勤奋的人们。他们的文化可与波斯媲美。”

统一的新罗继承了百济的海事强国地位，其作用就像地中海的腓尼基一样。它在第8和第9世纪主导东亚海域和中国、韩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此外，新罗人在中国的山东半岛和长江流域建立了海外社区。统一的新罗是一个繁荣富裕的国家，其首都京畿道是世界第四大城市。

新罗在八世纪末开始经历政治麻烦。这严重削弱了新罗，此后不久，前百济的后代建立了“后百济”。在北部，叛乱分子从后三个王国时期开始复兴了高句丽。

统一的新罗持续了267年，直到935年投降于高丽。

渤海国

渤海国成立于高句丽衰落之后；在698它始建于高句丽前领域之北部。渤海国控制了朝鲜半岛的北部地区，及满洲的大部分地区（尽管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并未占据辽东半岛），并扩展到了当今的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它还采用了唐朝的文化，例如政府结构和地域政治制度。

在该地区相对和平与稳定的时期，渤海国蓬勃发展。渤海国被称为“东方富

裕的国家”。但是后来，渤海国被严重削弱，并最终在926年被契丹辽朝征服。高丽接纳了大批难民，其中包括渤海国最后一位皇太子。从而在高句丽的两个继承国之间实现了民族统一。

渤海国的大多数历史记录都没有幸存；而辽国也没有记录渤海国的历史文献。虽然高丽吸收了一些渤海国难民，但是它也没有记录什么关于渤海国的历史。

后三个王国

后三个王国时期（892年至936年）包括统一的新罗、“后百济”和“后高句丽”。在9世纪后期，随着新罗政权的衰落和对人民的高额征税，全国各地爆发了叛乱，强大的地区领主崛起，以对抗衰落的王国。

“后百济”由甄萱将军于892年创立，首都设在万山州（现代全州）。该王国设在百济以前领土的西南地区。927年，百济进攻统一新罗的首都庆州，并在其王座上放置了一个傀儡。最终，甄萱因继承纠纷而被儿子驱逐，逃到高丽，在那里他继续担任将军，打败了他自己所曾经创立的王国。

“后高句丽”由和尚弓裔于901年创立。918年，高句丽世系的一位著名将领王建废了日益专制和偏执的弓裔，并建立了高丽。到936年，高丽击败了竞争对手，并实现了后三个王国的统一。

高丽王朝

高丽由王建于918年创立，并于936年成为韩国的统治王朝。由于高句丽贵族的后代王建认为该国是高句丽的继任者，故将其命名为“高丽”。王建将他的家乡开城（位于今天的朝鲜）设为首都。高丽王朝一直持续到1392年；政府在1170年至1270年之间由军事政权领袖控制。

在此期间，法律被编纂，并引入了公务员制度。佛教蓬勃发展并遍布整个

半岛。青瓷陶器在12和13世纪蓬勃发展。

1018年，契丹帝国是当时一个强大的帝国；它入侵高丽但被击败。高丽人击败契丹帝国后，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黄金时代，1231年，蒙古人在七次主要战役中开始了对朝鲜的入侵，但未能征服朝鲜。经过数十年的战斗，高丽精疲力尽，将王储送往元首都并宣誓效忠蒙古。忽必烈汗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了朝鲜王储。在随后的80年里，高丽在元朝的统治下生存。两国交织在一起长达80年，之后的所有朝鲜国王都与蒙古公主结婚。元朝的最后一位皇后是朝鲜公主。

在1350年代，由于内部斗争，元朝迅速衰落，使高丽恭愍王能够改革高丽政府。高丽恭愍王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解散亲蒙古的贵族和军事官员，持有土地的问题，以及制止佛教徒和儒家学者之间日益增长的敌意。在这个动荡的时期，高丽在1356年迅速征服了辽阳，在1359和1360年击退了红巾军的两次大规模入侵，并在1364年击败了元朝最终想要统治高丽的企图。在1380年代，高丽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倭寇威胁上，并利用海军大炮歼灭了数百艘海盗船。

高丽王朝持续到1392年。朝鲜太祖李成桂于1388年发动政变，并于1392年建立了朝鲜王朝。

朝鲜王朝

1392年，李成桂，后来被称为太祖，建立了朝鲜王朝（1392年至1897年）。朝鲜这个名字来自于古王朝的名称。新建立的朝鲜王朝以儒家思想为意识形态思想。在整个朝鲜王朝中，盛行的哲学是新儒学，其代表人物是善本阶级，他们放弃了财富和权力的地位，过着学习和正直的生活。

太祖将首都迁至汉阳（现为首尔）并建造了景福宫。1394年，他采用新儒学作为国家的官方宗教，并致力于建立一个强大的官僚国家。他的儿子和孙子泰宗国王和世宗大王在朝代初期实施了许多行政，社会和经济改革，

并建立了王室权威。

在15和16世纪，朝鲜享有许多仁慈的统治者，他们促进了教育和科学的发展。其中最著名的是世宗大帝（1418–1450年在位），他亲自创造并颁布了朝鲜语韩文。黄金时代取得了巨大的文化和科学进步，包括印刷，气象观测，天文学，日历科学，陶瓷，军事技术，地理，制图学，医学和农业技术。

此后的几年中，皇室内部的内部冲突，内乱和其他政治斗争困扰着该国。日本在1592年至1598年之间对朝鲜的入侵使局势更加恶化。丰臣秀吉编整了他的部队，并试图通过朝鲜入侵亚洲大陆；但是最终朝鲜军在义军和中国明朝的协助下击退了日军。后来，朝鲜还击退了满族人在1627年和1636年的入侵。然而，朝鲜的内部政治因自身的权斗而分崩离析。

势道政治时期

政府的腐败和社会动荡在1776年后盛行。政府在19世纪末试图进行全面的改革，但坚持严格的孤立主义政策，为韩国赢得了“隐士王国”的绰号。该政策最初是为防止西方国家而制定的，但朝鲜王朝很快就被迫开放贸易，并开始了进入日本统治的时代。

朝鲜民族的动荡始于Sedo Jeongchi（势道政治）时期，在此期间，朝鲜正祖去世。十岁的朝鲜新国王登上朝鲜王位，而行政当局的真正权力则由其摄政王担任。结果，朝鲜政府的混乱和公然腐败，尤其是在税收的三个主要领域—土地税，兵役和国家粮仓系统—给农民增加了更多的苦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地工作人员（Hyangni）的腐败，他们可以贿赂任命的行政人员，从而以官场的名义掩盖他们对农民的掠夺。官僚家庭以前被尊为贵族阶级，在“社会上和政治上”都拥有强大的势力，如今，他们被视为不愿承担起对平民百姓的社区责任。尽管政府在1801年为结束拥有奴隶的作法做出了努力，但直到1894年，韩国的奴隶制仍然合法。

反基督教势力

此时，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传教士在贵族中得到了很好的容忍，特别是在首尔及其周边地区。但是，保守阶层（Pungyang Jo氏族）对基督徒们进行了迫害，杀害了很多基督教传教士与信众。这些死难烈士被称为“朝鲜殉道者”。这使得朝鲜上层阶级许多人被迫退出基督教信仰。但是，基督教的平等主义对农民仍然非常有吸引力；不过此时基督教的影响主要在城市与郊区地带。

高宗国王，1864-1907年

高宗（1864- 1907年）在十二岁时登基，接替朝鲜的哲宗（1849-63年）。高宗的父亲作为事实上的摄政王，开创了深远的改革，以加强中央管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决定重建宫殿建筑并通过对居民征收更多税款为该项目筹集资金。他实施了坚定不移的孤立主义政策，以阻止西方思想和技术的日益入侵。1873年，他被弹劾，并被明成皇后的支持者迫退。

文化与社会

韩国的文化以新儒家哲学为基础，它强调道德，公义和实践伦理。对学术研究的广泛兴趣导致建立了私立学院和教育机构。关于历史，地理，医学和儒家原则的许多文件都被写成。艺术在绘画，书法，音乐，舞蹈和陶瓷中蓬勃发展。

这个时代最显著的文化事件是世宗大帝在1446年创建和颁布了朝鲜语字母 Hunmin jeongeom（后称Hangul）。在这一时期，文化，科学和技术也取得了许多其他进步。

在朝鲜王朝时期，存在着一种社会等级制度，该制度极大地影响了韩国的社会发展。国王和王室是世袭制的最高阶层，下一层是职或军事官员以及地主，他们为政府工作，并依靠农民和奴隶的劳动为生。

中产阶级是技术专家，例如抄写员，医务人员，科学相关领域的技术人员，艺术家和音乐家。平民，即农民，是韩国最大的阶级。他们有义务缴税，提供劳动力和在军队中服役。通过向国家缴纳土地税，他们可以耕种土地和耕种。最低的阶层包括佃农，奴隶，艺人，工匠，妓女，劳工，萨满教徒，流浪汉，流浪者和罪犯。尽管奴隶的身份是世袭的，但可以以官方设定的价格出售或释放他们，并且禁止虐待奴隶。

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这种以社会等级制度为中心的体系在17世纪后期开始发生变化。到19世纪，出现了新的商业集团，活跃的社会流动性导致新贵阶层扩大，导致旧阶级制度的弱化。朝鲜政府于1801年下令对政府所拥有的奴隶给予自由。朝鲜的阶级制度在1894年被完全禁止。

外来压力

朝鲜在1592年至1598年之间曾两次应对日本的入侵（临津战争和七年战争）。战争之前，韩国派遣两名大使进行侦察，以监察日本侵略朝鲜的意图。但是，他们回来时却提出两份互相矛盾的报告，导致政客们意见无法统一，因而没有采取积极预防措施。

但是最终，朝鲜击退了日军。

随后，朝鲜于1627年和1636年再次受到满族的侵略。后者继续征服中国并建立了清朝，之后朝鲜王朝承认了清朝的宗主权。尽管朝鲜尊重满族对中国的统治地位，但对于已灭亡的明朝始终保持忠诚，而对被视为野蛮人的满族很不屑。

在19世纪，朝鲜试图通过封闭边界来控制外国势力。中央政府规定，除了中国以外，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不能进入朝鲜。但是，1853年，美国船舰“南美号”（USS South America）访问釜山10天，并与当地官员保持了友好的联系。1855年和1865年在韩国沉船的几名美国人也受到了很好的对待，并被遣送到中国。朝鲜王室了解到与清朝有关的外国入侵和条约，以及第

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并采取了谨慎的与西方缓慢交往的政策。

尽管遭受了几次迫害浪潮，朝鲜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数量仍然增长迅速。1866年，朝鲜王室对此予以镇压，屠杀了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和朝鲜信徒。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法国入侵并占领了江华岛。朝鲜军队损失惨重，但法国人随后放弃了该岛。

1876年，朝鲜与日本签署了贸易条约，并于1882年与美国签署了条约，结束了几个世纪的孤立主义。

保守派王室与改革派系之间的冲突导致了1884年的“开平政变”。改革派试图通过宣扬社会平等和消除地主阶级特权来改革朝鲜人制度化的社会不平等。这些改革派得到了日本的支持，但被明成皇后所邀请来的清军挫败。随后，中国军队虽然撤离了，但袁世凯将军从1885-1894年驻留在朝鲜，掌控朝鲜事务。

1885年，英国皇家海军短暂占领了巨文岛，并于1887年撤退。

1888年，朝鲜通过中国所控制的电报线路网与中国政府建立起电讯联系。中国允许朝鲜在俄罗斯（1884年），意大利（1885年），法国（1886年），美国和日本建立大使馆。清政府提供了贷款。为了阻止朝鲜与日本商人的贸易往来，中国试图垄断朝鲜贸易。1888年和1889年朝鲜爆发了反华暴动，中国商店被焚烧。对于朝鲜而言，日本仍然是最大的外国社区和最大的贸易伙伴。

一个迅速现代化的明治维新的日本在第一次中日战争（1894-1895）中成功地挑战了中国，迫使它放弃了长期以来对朝鲜的掌控。

朝鲜现代化始于1876年日本强迫其开放港口；但是，多年以来，现代化的

力量不仅遭到统治朝鲜的精英传统主义的强烈反对，而且也遭到广大朝鲜民众的强烈反对。后者（朝鲜民众）普遍支持儒家官绅阶级的那种统治方式。日本则利用现代化运动来获得对朝鲜的越来越多的控制权。

1895年，日本参与了谋杀明成皇后。明成皇后生前，曾试图求助于俄罗斯来对抗日本；她死后，俄国人被迫从朝鲜撤退。

近代史

大韩帝国（1897-1910）

由于第一次中日战争（1894-1895年），中日之间缔结了1895年的《马关条约》。它规定废除朝鲜与中国的从属关系。朝鲜自1636年清朝入侵朝鲜以来，就一直是中国的附属国。

1897年，朝鲜改称大韩帝国，高宗国王成为高宗皇帝。帝国政府的目标是，通过实施国内改革、增强军事力量、发展商业和工业、以及考查土地所有权改革，来成为一个强大而独立的国家。此时在韩国内部，一些政治组织也团结起来主张诉求增加朝鲜人民的权利，但他们与主张绝对君主制权力的韩国政府发生冲突。

在这段时期，俄罗斯在韩国中的影响力很强；直到后来，俄罗斯在日俄战争（1904-1905年）中日本击败，俄罗斯在韩国的影响力才被终止。

韩国实际上是在1905年11月17日成为日本的宗属国。1905年日韩之间签署的《保护国条约》是在没有高宗皇帝的印章或委托的情况下所颁布的。

条约签署后，韩国许多知识分子和学者成立了各种组织和协会，着手争取独立。1907年，由于日本得知高宗想要秘密派遣特使参加“海牙第二公约会议”去表示抗议日韩之间的“保护国条约”，因此，日本采取强迫措施逼迫高宗退位。这导致高宗的儿子继位。

1909年，韩国独立运动家安重根暗杀了前任韩国统监府首长伊藤博文，因为伊藤博文入侵了韩国政治。这促使日本人禁止所有韩国政治组织，并着手进行吞并韩国计划。

日本占领期（1910–1945）

1910年，日本帝国通过《日韩合并条约》有效地吞并了朝鲜。1965年，此条约，以及朝鲜与日本之间先前签署的所有其他条约一并被确认为无效。

许多韩国人组成了义军，与日本的统治作斗争。

1910年开始，韩国被日本控制下的韩国总督府所统治，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于盟军、二战结束。

1910年吞并韩国后，日本开始压制许多传统的韩国习俗，甚至包括最终要废除朝鲜语本身。经济政策的实施则主要是为了日本的利益。在韩国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欧洲式的运输和通讯网络，以开发资源和利用劳动力（但是，大部分建筑与基础设施后来在毁灭性的1950年代朝鲜战争中被摧毁）。日本在韩国巩固了银行体系，废除了韩元。

日本取消了韩国的社会等级结构。景福宫大部分被毁，被韩国总督府取代。

高宗皇帝于1919年1月去世。因高宗中毒的传言，韩国人民于1919年3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独立集会，以抗议日本统治者（三一运动）。这一运动受到武力镇压，约有7,000人被日本士兵和警察杀死。尽管日本的记录声称参与人数不到五十万，但估计有200万人参加了和平的、支持解放的集会。这场运动的部分动力来自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 在1919年的讲话；威尔逊宣布支持民族自决权，并力图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各国殖民统治。

三一运动以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中国上海，以协调韩国人民的解放努力、并抵抗日本统治。临时政府的一些事迹包括，1920年的清山里战役，以及，1932年日本在中国的军事领导机构被伏击。

在日本占领时期，韩国学校课程被彻底修改，以消除韩国语和历史的教
学。韩国语被禁止，并且韩国人被迫采用日语名称；报纸被禁止以韩语出版。许多韩国文化文物被摧毁或送到日本。根据韩国政府的一项调查，有75,311处文化资产是从韩国手中夺走的。

一些韩国人离开朝鲜半岛流亡到中国、美国和其他地方。满洲的韩国人组成了抵抗团体，称为抗日军。他们进出中韩边界，与日军进行游击战。其中一些人会在1940年代聚集在一起，成为朝鲜解放军，并参加了在中国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的联合抗日行动。数以万计的韩国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国民革命军。

1945年日本被逐出韩国。当时，韩国的所有行政人员和技术专业人员（几乎都是日裔）几乎一夜之间消失。尽管1944年在朝鲜半岛的日本人只占韩国人口的2.6%，但他们是城市精英。朝鲜半岛最大的50个城市中，日本人所占比例为71%，而韩国人所占比例仅为12%。这些日本人在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有71%的韩国人在农场工作。

分裂与朝鲜战争（1945-1953）

在1943年11月22日的开罗会议上，美国、英国和中国同意“在适当时候，韩国将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在后来于1945年2月雅尔塔举行的会议上，同盟国同意建立对朝鲜半岛的四国托管权。1945年8月14日，苏军通过两栖登陆进入朝鲜半岛，得以确保对

韩国北方的控制。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向盟军投降。

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在全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纷争（即，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与英美西欧自由国家体系之间的纷争）导致朝鲜半岛被分裂成两个占领区。这种分裂状态从1945年9月8日正式开始。沿着北纬38度分割线，美国管理韩国南部，而苏联管理韩国北部。大韩临时政府被忽视了，主要是因为美国认为它与共产党结合得太紧密。

对于这个分裂状态的安排只是暂时的，目的是在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民国可以组建一个政府之后，将统一的韩国归还给其人民。

1945年12月，盟国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韩国的未来。该会议讨论了一个为期5年的托管制度，并成立了一个苏维埃和美国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在首尔举行了一些间断性的会议，但成员们在成立韩国国民政府的问题上陷入僵局（美国支持民主选举，但苏联阻挠民主选举）。1947年9月，美国看不到解决方案的希望，因此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韩国问题提案。1948年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承认大韩民国国民政府为韩国唯一合法政府。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北韩军队突破了北纬38度平行线入侵南韩。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暂时结束了任何和平统一的希望。战后，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未能采用统一韩国的解决方案。朝鲜战争中约有300万人死亡，就比例而言，平民死亡人数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越南战争更高；这可能是冷战时期最致命的冲突。此外，战争几乎摧毁了韩国的所有主要城市。

现代韩国（1953年至今）

从1948年李承晚开始，一系列南韩威权政府在美国的支持和影响下在韩国掌权。

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后，新的经济政策开始了。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实行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政策。朴总统通过一系列非常成功的五年计划发展了韩国经济。韩国的经济发展是由财阀，诸如三星，现代，SK集团和LG公司等家族企业带头的。财阀通过政府减税和廉价贷款获得了国家的支持，并利用了韩国廉价的劳动力来生产可用于出口的产品。韩国政府将教育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优先地位，以建立受过良好教育的、能够为经济做出积极贡献的民众。尽管偶尔出现政治动荡，但随后的近40年，即汉江奇迹时期，韩国经济出现了巨大的增长。无与伦比的经济奇迹，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将韩国从朝鲜战争后的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带入完全发达国家。

由于政治改革的普遍需求，韩国最终在1987年转变为市场导向的民主国家；随后于1988年主办了夏季奥运会；这是历史上在亚洲大陆所举行的第二次夏季奥运会。

从廉价的低价值轻工业出口经济继续发展，韩国经济最终转向了资本密集型的高价值工业，例如信息技术，造船，汽车制造和石油精炼。如今，韩国已成为领先的经济体和技术强国，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甚至可以与美国等国家匹敌。近年来，韩国流行文化也在国外蓬勃发展，这种现象被称为“韩流”。

由于苏联的影响，北朝鲜建立了具有世袭领导权的共产党政府，与中国和苏联有密切联系。金日成在1994年去世之前一直担任最高领导人，此后他的儿子金正日掌权。金正日的儿子金正恩是现任领导人，在其父亲于2011年去世后掌权。北朝鲜经济在1945年以前由于其丰富资源与工厂而一直强于南朝鲜；但是，1950年代朝鲜战争以后，北朝鲜经济一直停滞，不得不依靠苏联与中国的外援，而且越来越僵硬而落后。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北朝鲜经济一直走下坡路，目前经济严重下滑，主要依靠国际粮食援助和与中国的贸易。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Taiwan

1662年，明朝的忠臣郑成功（明朝于1644年失去对中国大陆主要地区的控制权）击败了荷兰人，并在岛上建立了政府据点。1683年，他的部队被清朝击败，台湾的部分地区因而日益融入清朝。在1895年第一次中日战争之后，清军将该岛与澎湖割让给了日本帝国。台湾生产的大米和糖将出口到日本帝国，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日本入侵东南亚和太平洋的基地。台湾实行了日本帝国主义教育，战争期间许多台湾人也为日本而战。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了台湾。1949年，国民党在中国内战中失去了对中国大陆地区的控制以后，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蒋介石宣布戒严。国民党统治台湾（连同台湾海峡对岸的金门群岛，乌丘和马祖群岛）为一党制威权政体长达40年；直到，始于1980年代的民主改革，导致有史以来第一次直接在1996年举行总统大选。战后，台湾经历了迅速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被称为“台湾奇迹”，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新石器时代的大盆坑文化突然出现，并迅速在该岛的沿海地区传播。他们的遗址以有纹陶器，抛光的石材陶器和板岩点为特征。居民种植水稻和小米，但也严重依赖海洋贝壳和鱼类。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种文化不是源于长滨文化，而是由今天的台湾原住民的祖先（他们属于南岛语系）所带来的。这些人中的一些人后来从台湾移居到东南亚诸岛，并由此迁移到整个太平洋和印度洋。从马达加斯加到夏威夷、复活节岛和新西兰，马来语-波利尼西亚语在很大的地区使用，但仅构成了南岛语系的一个分支；该语系其余分支仅在台湾可以找到。

大盆坑文化之后，整个台湾岛上相继出现各种文化，包括大湖文化和营埔文化。铁出现在此时代的初期，例如莺松文化。最早的金属人工制品是用来交换的物品，但到了大约公元400年，当地使用锻造技术生产了锻铁，这种技术可能是从菲律宾引进的。

早期的中国历史记录提到，中国大陆的人曾经到过东方的一些岛屿；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其中就包括台湾。中国的三国时代，吴国军队曾经于3世纪来到这里；那被称为夷洲。在隋书中记述到，公元7世纪初，隋炀帝派出三支

远征部队，来到一个名为“琉球”之地。后来，琉球这个名字指的是台湾东北部的岛链，但一些学者认为，隋朝时期它可能是指台湾。

葡萄牙水手于1544年从台湾经过，他们在航海日志中写下了福尔摩沙的名字，意为“美丽的岛屿”。1582年，在台湾岛上，葡萄牙沉船的幸存者与疟疾和土著居民作了十个星期的战斗，然后乘木筏返回澳门。

到16世纪，越来越多的中国渔民、商人和海盗前往该岛的西南部短暂停留。当荷兰人于1623年到达时，他们发现了大约1500名中国短暂滞留者和长期居民。

荷兰和西班牙统治

荷兰东印度公司（VOC）来到该地区寻找一个亚洲贸易和军事基地。他们于1622年在澳门战役中被葡萄牙人击败，试图占领澎湖，但被明朝当局驱赶。然后，他们在台湾西南海岸的大洋湾岛上建造了塞兰迪亚堡（即安平古堡；该地现在是主岛的一部分，在现代台南的安平）。在邻近的地方，他们建立了一个更小的砖堡，赤崁楼。当地原住民称之为北港（Pakan）；在一些旧地图上，台湾岛被称为北港（Pakan）。

1626年，西班牙帝国视荷兰人在台湾的存在对他们在菲律宾的治理构成了威胁，于是在台湾东北海岸（现代基隆）建立了一个定居点，建造了圣萨尔瓦多堡。他们还于1629年在西北部（现代“淡水”）建造了圣多明各堡，但在1638年将其废弃。这个小殖民地饱受疾病和当地敌对人口的困扰，几乎没有得到马尼拉的支持。在此期间，荷兰总督Pieter Nuyts与日本人Hamada Yahei发生纠纷。

1633年，中国人郑芝龙在料罗湾战役中击败了荷兰人。

荷兰人开始将台湾变成荷兰殖民地。其首要任务是惩罚那些暴力反对荷兰人的村庄，并团结那些愿意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结盟的原住民。

1642年，荷兰人从该岛北部驱逐了西班牙人。然后，他们试图建立起对西部平原的控制地带。在1645年进行了短暂但具有破坏性的战役之后，彼得·布恩（Pieter Boon）征服了该地区的部落，包括大肚王国。

荷兰东印度公司管理着该岛及其主要的原住民，直到1662年。他们建立了税收制度，开设了学校，教授罗马化的原住民语言文字，并传播基督教福音。尽管其控制主要限于该岛的西部平原，但荷兰人的制度被后来的占领者所采用。在荷兰统治期间，最早涌入台湾的移民是中国客家人和福建人；当时中国大陆沿岸的商人和实业家试图从荷兰人那里购买狩猎许可证，或躲在台湾原住民的村庄中以逃避清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大多数移民是年轻的单身男性，他们不愿永久性地留在岛上；当时的汉族人称台湾岛为“地狱之门”，因为水手和探险家们常常在此海域遭遇海难事故而丧命。

荷兰人最初试图将他们所建造的塞兰迪亚堡（台南安平古堡）当作中日之间的贸易基地，但很快就意识到了在台湾西部冲积平原上漫游的成千上万鹿群的巨大市场价值潜力。日本人对鹿的需求很高，因为他们愿意为用于武士盔甲的生皮付出高昂的价钱。鹿的其他部分则可以出售给汉族商人，以供肉食和医疗用途。荷兰人向猎鹿的原住民支付费用，并设法提高鹿的存栏数量以满足巨大市场需求。荷兰人还雇用汉族人来种植甘蔗和大米，以供出口。其中一些大米和甘蔗产品甚至运送到了波斯市场。

东宁王国

在中国大陆，满族军队于1644年突破了山海关，并迅速消灭了明朝。1661年，由明朝遗臣郑成功率领的海军舰队抵达台湾，从塞兰迪亚堡（台南安平古堡）驱逐了荷兰人，并在台湾建立了亲明基地。郑成功的父亲是郑芝

龙（一个中国商人兼海盗），母亲是田川氏（一个日本女人）。郑成功生于1624年，出生地是日本长崎县的平户。他在那里长大，直到七岁搬到泉州，即中国福建地区。在一个因航运和海盗而致富的家庭中，郑成功继承了父亲的从长崎到澳门的贸易网络。满族军队占领福建后，郑成功从他在厦门的据点撤退。

郑成功率领手下部队围攻台湾，以期希望在台湾建立战略基地，并将来反攻厦门。1662年，在经过9个月的围攻之后，郑成功胜利地攻占了荷兰堡垒，即塞兰迪亚堡（台南安平古堡）；台湾成为他的基地。

从前，台湾原住民与荷兰人结盟对抗中国人，在1652年郭怀一事件中打败了郭怀一的叛乱部队。但现在，台湾原住民在郑成功围困塞兰迪亚堡的战役中转而反对荷兰人，投奔加入了郑成功的中国军队。1661年5月17日，山区和平原上的原住民都投降并叛逃到中国人那里，庆祝他们免遭荷兰统治下的义务教育；他们追捕荷兰人，对他们实施斩首，而且毁掉他们的基督教学校教科书。

围攻塞兰迪亚堡的战役结束四个月後，郑成功去世了。有种种猜测称，当他的军官拒绝执行他的命令处死儿子郑经时，他突然发狂地死了；郑经与自己的乳母有染，并使她怀了一个孩子。其他说法更为直接，将郑成功的死亡归因于疟疾。

在郑成功死后，他的儿子郑经接管了郑政权，将剩余的7,000名效忠明朝的军队带到台湾。为了对付郑经部队的突袭，清政府下令将所有南部沿海城镇和港口的居民迁移到内陆地区（这些城镇和港口曾是郑舰队的突袭目标）。郑经部队曾经能够轻易在那些沿海城镇抢劫到很多物资，以加强自己军队的力量。但是，清政府的这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适得其反。在清朝下令的迁徙内陆政策与海禁政策所带来的严重苦难的刺激下，从这些大陆沿海城镇到台湾，发生了六次主要的移民浪潮。这些移民潮发生于1662年至1664年之间。为了有效地利用这种清朝的失误政策，郑经保证，新移民

可以在台湾东部自由土地上进行耕种，并拥有所开垦之土地的所有权。通过这些方式，郑经希望大力地促进从中国大陆到台湾的移民数量。郑经要求，台湾岛上的男性都有义务服兵役，以抵抗清军。

清朝统治

1683年，在与郑成功的父亲可信赖的朋友之一施琅将军进行海战之后，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投降于清朝。

汉族人一直将台湾视为化外之地。康熙皇帝也将台湾蔑视为没有文明的地方。直到1683年，台湾才出现在清帝国的领土地图上。

尽管付出了使台湾进入帝国领域的军事和外交运动的代价，但北京的总体想法还是矛盾的。清朝军事行动的重点是摧毁郑氏家族政权，而不是征服和统治该岛。康熙皇帝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他的大臣们向皇帝劝告说，该岛是一个“海外泥丸，不足为中国加广”，并主张将所有华人迁移到中国大陆并放弃该岛。只有施琅将军及其支持者极力说服皇帝不要摒弃台湾。到1682年，台湾只有7000名中国人与原住民结婚并在台湾拥有物业。郑成功统治时期延续了荷兰人的税收制度，也建立了学校和宗教建筑。

从1683年起，清朝就将该岛设为台湾府，并于1875年将该岛分为南北两个县。1887年，该岛被宣布为独立于福建省。

清政府试图限制汉人移民到台湾，并禁止汉人家庭前往台湾，以确保流民能够返回自己的家庭和祖先坟墓之地。非法移民仍在继续；许多人觉得战乱的福建省没有前景，因此在台湾当地结婚；故此，当地有句俗语“有唐山公[父亲]，无唐山妈”。清政府试图保护原住民的土地要求，但也试图将原住民变成纳税者。由于担心引起不缴税的高地原住民的愤怒和煽动叛乱，

当地清政府禁止汉人和应纳税的原住民进入覆盖该岛大部分地区的荒野。政府沿西部平原建造了一个边界，使用坑和土丘（称为“土牛”）建造，以防止百姓越界。

早期汉人定居者

从1683年到1760年左右，清政府限制汉人移民台湾。1760年代后，这种限制放松了。到1811年，台湾有超过200万中国移民。1875年，台北县府成立，隶属福建省。此外，中国移民之间也发生了各种冲突。大多数冲突发生在福建汉族与广东汉族之间、福建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汉族与客家定居者之间，或者只是不同宗族之间发生争执。由于这些汉人移民拥有强烈的各自省籍情节，清政府认为台湾在治理上很困难。

原住民经常屠杀西方船只的沉船船员。例如，1867年美国罗孚号船在台湾海域搁浅沉船后，其船上的所有船员被台湾原住民杀害。当美国人派遣福尔摩沙远征队进行惩罚报复行动时，原住民击败了美国人，并迫使他们撤退。

在中法战争期间，法国人在1884年的基隆战役中企图入侵台湾。领导台湾防御的刘铭传招募了原住民，与中国士兵一道与法国人作战。法国人在淡水战役中被击败。清军在法国撤退之前，在长达八个月的攻势中将法国人压制在基隆。由于这些战役，清政府开始建立一系列的海防设施，并于1885年开始将台湾定为省，刘铭传是第一任总督。他将台湾分为11个县，并试图改善与原住民的关系。他还建设了从台北到新竹的铁路，在基隆建立了一个矿场，并建立了一个军械库，以提高台湾对外国人的防御能力。

1871年冬，日本的琉球号船在台湾东南端搁浅沉船；在此次八瑶湾事件中，台湾原住民（排湾族人）绑架并斩首了54名日本船员；日本人以此为借口，要求清国正式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主权，并测试清朝对潜在的日本扩张到台湾的趋势的反应。

日本人于1874年以3600名士兵的力量向排湾族人的村庄发起了一次远征。遇害的排湾族人数约为30人，而日本人则死亡6人。最终，日本人在得到清朝的巨额赔偿后退回了日本。这一事件使清军重新考虑了台湾在海上防御战略中的重要性，而更重要的是对旷野之地的军事控制能力。

在第一次中日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台湾岛约有45%的土地是在清政府的直接统治管理之下，其余的土地则由原住民活动区组成。在大约250万人口中，大约230万是汉族，其余20万被归类为各个土著部落的成员。

清末统治

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清帝国在1895年4月17日将台湾和澎湖两岛割让给日本，作为中日战争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台湾的丧失，将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焦点。

日本统治

日本帝国从1895年至1945年统治台湾。

历史上，日本曾试图取得对台湾的统治权。1592年，当丰臣秀吉进行海外扩张的时候，他试图向南和向西扩大日本的影响力；在西面方向，日本在那个时期入侵了朝鲜，甚至想要最终经过朝鲜半岛征服中国。在南面方向，日本最初入侵台湾的尝试，和随后跨越三个世纪的零星入侵尝试，均未成功；这主要是由于疾病和台湾岛上原住民的袭击所致。

日本占领

直到1894-95年第一次中日战争期间中国海军失败，日本才终于拥有了台湾的领土，并从此，亚洲的大国统治地位从中国转移到了日本。

马关条约于1895年4月17日签署，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这将使得日本统治该岛50年，直到它在二战战败。

在获得台湾统治权之后，日本人担心台湾人的军事抵抗。在甲午战争期间的一个短暂时间内，台湾人的当地精英曾建立了一个所谓“福尔摩沙共和国”。台湾本土精英们希望，通过宣布自己为共和国，世界将不会袖手旁观、不会允许一个“主权国家”被日本侵略，从而，世界或许会与清朝结盟，反对日本进驻台湾。但是，汉族“绿营兵”和“百越军”士兵掠夺和劫掠台湾各地，使得台湾本土精英们的计划很快陷入混乱。鉴于是在中国兵引致的混乱还是屈服于日本人之间做出选择，台北的精英们派遣辜显荣到基隆，邀请日军前往台北并恢复秩序。

总的来说，台湾人对于日本人的武装抵抗是零星的，尽管有时也很激烈；但到1902年，这些武装抵抗基本上已经被瓦解；不过，随后几年发生了较小的叛乱，包括1915年在台南县的西来庵事件。此后，非暴力抵抗运动开始取代武装叛乱，最主要的组织是成立于1921年的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抵抗运动是由几种不同的因素（例如“大正民主运动”）引起的。有些人被中国民族主义情节刺痛，而另一些人则怀有台湾人独立的心理。原住民对日本的某些强硬政策的抵制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初。最后一次主要的原住民叛乱，是1930年代末期由泰雅族人因对自己遭受的待遇感到愤怒而发起的叛乱起义。此次叛乱导致150多名日本官员被杀斩首。随后，在毒气的帮助下，2,000–3,000名日本军队士兵和原住民辅助人员对泰雅族人进行了镇压。

日本对台湾岛的殖民统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镇压和家长式统治的压迫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以同化为目标的统治期；在这个阶段，日本统治者提倡包含台湾地区各民族的“台湾人”概念；这样的理念中，灵感是来自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愿景的“民族自决”理念。第三个阶段，是所谓“皇民化”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皇民化”政策旨在使台湾人成为日本天皇的忠实臣民。

台湾民众对日本统治的反应不同。有些人认为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至关重

要，日本殖民当局也同意这样的主张。第二种台湾人渴望成为日本帝国臣民，他们相信这种举动将导致与日本国民同等的地位。第三种台湾人受到台湾独立理念的影响，试图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建立台湾本土统治。另一方面，第四种台湾人受到中国民族主义情节的影响，为台湾回归中国统治而斗争。从1897年起，这最后一种台湾人发动了许多叛乱，其中最著名的一位领导人是罗福星；他是同盟会成员；该组织由孙中山先生创立，是国民党的前身。

现代发展

日治时期，最初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快开展起来。台湾银行成立于1899年，以鼓励日本私营部门，包括三菱和三井集团，赴台投资。1900年，台湾第三任总督通过了一项预算，启动了从基隆到高雄的台湾铁路系统的建设。到1905年，岛上的日月潭湖中的水力就已经开始提供电力。在随后的几年中，台湾被认为是东亚第二大发达地区（仅次于日本）。到1905年，台湾在经济上已经自给自足，并且已经摆脱了日本中央政府的补贴。

在日本总督、后藤新平（Shimpei Goto）的统治下，完成了许多大型公共工程项目。连接南北的台湾铁路系统以及基隆港和高雄港的现代化建设已经完成，以便利原材料和农产品的运输。出口增长了四倍。大坝支持的灌溉系统覆盖了55%的农业用地。在1895年至1925年间，粮食产量增长了四倍，甘蔗产量增长了15倍，台湾成为服务日本工业经济的主要食品基地。与此同时，台湾广泛建立了卫生保健系统，几乎完全根除了传染病。到1945年，台湾居民的平均寿命将达到60岁。

嘉义神社（Kagi Shrine），是台湾建造的许多神道教圣地之一。

1935年10月，台湾总督举行了“纪念台湾执政40周年纪念博览会”，展示了日本统治下台湾现代化进程的成就。这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其中包括中华民国的国民党政权的注意。国民党派遣曾经在日本留学的陈仪前往台湾

出席这次博览会。他对日本政府在发展台湾方面的效率表示钦佩，并评论了台湾人民在这样有效的行政管理下生活的幸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陈仪后来成为中华民国首位台湾行政总裁，因其领导下的腐败而声名狼藉。

日本统治后期，当地精英受到了良好教育和组织。在1930年代，当世界各地许多其他民族都在努力争取结束西方殖民主义政治的时候，台湾人创建了几个地方自治团体；1935年，台湾人第一次选举了地方立法者。到1945年3月，日本国会匆忙修改了选举法，允许台湾人在日本国会中有代表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

当日本于1937年在中国发动全面战争时，它扩大了台湾制造战争物资的工业能力。到1939年，台湾的工业生产已经超过农业生产。同时，所谓“皇民化”的帝国化计划正在进行中，目的是向台湾居民灌输“日本精神”，并确保台湾人仍然是日本天皇的忠实臣民，随时准备在战时牺牲。台湾日治当局制定了包括——日语教育、让台湾人采用日语名称、加强台湾人对日本宗教的崇拜、——等等在内的各项措施。1943年，94%的儿童接受了6年义务教育。从1937年到1945年，有126,750名台湾人参军并在日本帝国军队中服役，而在1942年至1945年之间又有80,433人应征入伍。在这一总额中，有30,304人（即15%）死于日本在亚洲的战争中。

日本帝国海军在台湾海域进行了大量活动。“南进政策智囊团”是基于台湾的台北帝国大学（现为国立台湾大学）成立的。参加冲绳空战的许多日本部队都是以台湾为基地。日本在整个台湾重要的军事基地和工业中心，例如高雄，是美国轰炸的目标。

1942年，美国对日本开战。在中国方面，国民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废弃了在此日期之前与日本签署的所有条约；使台湾与满洲一样重返中国是战时的目标之一。在1943年的《开罗宣言》中，同盟国宣布台湾（包括澎湖列岛）返回中华民国是同盟国的若干要求之一。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并签署了投降书；并在1945年由联合国救济和复兴管理局将台湾置于中华民国政府的行政管理之下，从而结束了日本对台湾的统治。

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的规定，日本人正式放弃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领土主权，该条约于1951年签署并于1952年生效。中华民国和日本于1952年4月28日签署了《台北条约》，该条约于8月5日生效。

中华民国统治

戒严令下的台湾

开罗会议于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在埃及开罗举行；为解决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日本的处置，开罗会议作出关于战后亚洲的决定。开罗宣言的三个主要条款之一是：“日本从中国偷走的所有领土，例如满洲、台湾和澎湖，都应归还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于1945年9月成立台湾省政府，并于1945年10月25日宣布为“台湾光复日”。这是日军投降的日子。

在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和1946年4月25日之间，中华民国军队将居住在台湾的90%的日本人遣返了日本。在战后，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统治，与日本以前的统治相比，是压制性的，并且极度腐败，从而导致当地人民的不满。

1947年2月，由于一名卷烟销售商受伤、国民党当局不加选择地射杀一名过路人的事件，引发了台湾人反大陆人的暴力事件。在国民党政府随后进行

的所谓“2月28日事件”镇压期间，成千上万人被杀或被捕；该事件成为整个台湾戒严时代的讨论禁忌话题。

从1930年代起，中国内战在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之间进行。当共产党在1949年完全控制中国大陆时，主要来自国民党政府、军队和工商界的200万难民逃到了台湾。1949年10月1日，胜利的共产党人在中国大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几个月前，蒋介石在台北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首都，并将南京政府迁至台北。在国民党统治下，来自大陆的人员主导着台湾政府和公务员队伍。

经济发展

中国内战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以一百万旧台币的面额发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战后的经济状况加上持续的中国内战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而灾难性的货币改革和腐败则使情况更加恶化。不过，国民党随后在台湾进行了重建过程和新的改革。

国民党控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人拥有的台湾垄断企业。他们将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的约17%收归国有，并使台湾投资者持有的日本债券证无效。这些房地产资产以及美国的援助，例如《中国援助法》和中美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有助于确保台湾从战争中迅速恢复过来。国民党政府也将全部黄金储备从中国大陆转移到台湾，并利用该储备支持新发行的新台币来稳定新货币并制止恶性通货膨胀。

国民党当局1950年代在台湾实施了影响深远且非常成功的土地改革计划。

《375减租法》减轻了农民的税负，而另一项法案又在小农之间重新分配了土地，并向大地主提供了商品证书和国有企业的存货。尽管这使一些大型土地所有者陷入贫困，但其他人将其补偿金转化为资本，并创办了工商业企业。这些企业家成为台湾第一批工业资本家。他们与逃离中国大陆的商人们一起，再次复兴了台湾的繁荣，并使得台湾从农业向商业、工业经济

大幅度过渡、转型。

从1950年到1965年，台湾共从美国获得了1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2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1965年，台湾建立了坚实的金融基础后，所有美国援助都停止了。此后，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启动了诸如十大建设项目之类的国家项目；这些项目为建设强大的出口拉动型经济提供了基础设施。渐渐地，台湾已稳步发展成为主要的国际贸易经济体，双向贸易额超过2180亿美元，具有世界上最高的外汇储备之一。岛上巨大的繁荣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台湾惊人的经济发展使其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民主改革

直到1970年代初，中华民国被联合国和大多数西方国家确认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一直以戒严法统治台湾，直到1980年代后期。其既定目标是保持警惕，以防共产主义渗透并准备反攻、夺回中国大陆。因此，不容忍政治异见。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对于在台湾出生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动荡的时期，因为许多最初因经济变化而被压迫和抛弃的人成为台湾新的中产阶级的成员。自由企业让台湾本土人在尊重基本人权的要求中获得了强大的讨价还价筹码。美丽岛事件是对台湾民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在此期间，台湾在国际领域也面临挫折。1971年，中华民国政府退出联合国，不久之后，北京的中国政府获得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9年，美国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

蒋介石于1975年4月去世，其子蒋经国继任国民党领导人。

蒋经国政府逐步放松了对台湾社会的政治控制，推动威权政府向民主政府过渡，以及使政权朝向台湾本土化的方向前进。国民党的反对者不再被禁止举行会议或发表论文。

1986年，尽管反对派政党仍然是非法的，但当“民主进步党”成立为第一个反对党时，蒋经国总统并没有解散该组织，也没有迫害其领导人。民进党候选人正式参加党外运动中的独立选举。次年，蒋结束了戒严令，并允许台湾人民探访中国大陆的家人。蒋选择台湾出生的技术专家李登辉为副总统；李登辉成为蒋经国的法定继承人。此举是在继进行其他改革后，赋予台湾原籍公民更多权力的重要举措，并平息了台湾社会反国民党的情绪。

蒋经国于1988年去世后，他的继任者李登辉总统继续推进政府民主化。李将更多的政府权力移交给台湾出生的公民，台湾也经历了本土化的进程。在这种本地化过程中，台湾本地的文化和历史得到弘扬，以至于超过了泛中国的观点。李登辉基本上中止了“台湾省政府”的运作。1991年，国民党政府的1947国民大会被取消。这些团体最初是代表中国大陆选区创建的。李登辉还取消了关于在广播媒体和学校中使用台湾语言的禁止令。

民主时期

李登辉是1996年台湾首次直选的当选总统。这次台湾民主直选，促使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了一系列导弹试射，以恐吓台湾选民。中国激进的军事策略促使美国总统克林顿援引《台湾关系法》，向台湾南部海岸附近的地区派遣了两个航母战斗群来监视局势；因而，中国的导弹试验被迫提前于原来计划的时间之前结束。这起事件被称为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

2000年总统大选标志着国民党统治的结束。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赢得了选举。陈获得39%的选票。泛滥阵营由于宋楚瑜（被国民党开除以后，仍然执意参选）与连战（作为代表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之间的分裂而输掉选举。

2004年，陈总统再次当选总统；在选举之前，曾经发生暗杀陈水扁的事件；警方调查人员说，据信最可能的嫌疑人是陈义雄；这名凶手后来被发现死亡。陈水扁没有受到生命危险，但泛蓝阵营认为该事件使陈水扁获得

了足够的同情心，因而赢得选举。

那起事件可能还使陈总统有能力宣布紧急状态和戒严状态，据称这阻止了强烈泛蓝的警察和军方投票。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连战拒绝接受选举结果，指控投票违规。国民党和亲民党支持者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举行了大规模抗议活动。随后，国民党和亲民党将此案告上了法庭。高等法院下令重新计票，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来支持国民党和亲民党所提出的控告。法院认为选举结果是合法和有效的。

在2004年12月8日举行的立法院选举中，以国民党-亲民党为主导的泛蓝联盟立法委员们在选举中占微弱多数，导致陈水扁总统辞去了民进党主席的职务。

作为对陈连任总统的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了一项反分裂国家法，该法允许台湾中华民国政府在正式宣布独立的情况下对台湾使用武力。中华民国几乎所有政党和公众人士都强烈抗议这项法律，而西方国家对此表示反对。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当局在同年一月份澳门进行的谈判导致了农历新年期间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两岸直航包机。

在一系列事件中，陈总统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举行了一次峰会，具有独立倾向的陈总统表示，最终与中国大陆统一将是一个选择。为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反分裂法，陈总统与布鲁塞尔欧洲议会举行了电视会议，敦促欧盟不要取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器禁运。

由于国民党和亲民党在立法机关中占据了多数席位，陈政权时期的国内政治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政治僵局。

2014年3月和2014年4月，抗议国民党使用非民主方法的学生占领了议会大楼。最后，政府同意搁置与中国达成的一项协议的批准，之前，他们没有

经过适当的辩论就推动了这一协议的通过。这一事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改变了选民的态度。在2016年1月的选举中，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以56%的选票获胜；民进党在议会中也跃居获得绝对多数席位。这次选举标志着非国民党首次在议会中赢得多数席位。

2018年11月24日举行的选举导致民进党多数成员遭受重大挫折，并导致蔡英文总统辞任该党的领导人。国民党市长候选人在新北市，台中和高雄获胜；之前，高雄等地本来已成为民进党的政治据点达20年之久。

O O

.

[illegible]

○ ○ ○ ○ ○ ○ ○ ○ ○ ○ ○ ○ ○ ○ ○ ○ ○ ○ ○

0 0

[illegible][illegible]

○ ○ ○ ○ ○ ○ ○ ○ ○ ○ ○ ○ ○ ○ ○ ○ ○ ○ ○

0 0

0 0

[illegible][illegible]

o o

[illegible][illegibl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6%97%A5%E4%BD%94%E6%99%82%E6%9C%9F>

日本于1941年12月8日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数小时后，日本陆军向集结在香港边境的第23军下达命令执行“C作战”入侵香港。日军在酒井隆中将指挥下从宝安县进攻香港，香港保卫战爆发。香港守军主要由驻港英军及英属印度陆军、以及在11月中抵港增援的加拿大军组成；另外还有在香港本地组建的香港义勇防卫军及香港华人军团，还有晓士兵团民兵及香港警务处与各民防单位；另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出的军情人员进行情报交流。虽然香港政府多番宣传驻港英军有能力保卫香港以稳定民心，惟英国在欧洲战场及北非战场已自顾不暇，日本又早已控制台湾；包括广州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及海南岛于1938年10月及1939年2月先后沦陷；香港在地理上已经陷入日本势力三面包围。面对人

力物力俱占优势的日军，香港守军在孤立无援下落于劣势，多次反攻日军失败却伤亡惨重，无法扭转败局。日军更发动屠杀；香港总督杨慕琦于1941年12月25日下午决定投降，于晚上到达设于尖沙咀半岛酒店的日军第23军司令部，在烛光下签署降书，香港日占时期也随之开始。

日军占领香港后随即成立军政厅，由日军第23军司令酒井隆出任军政府最高长官，直至1942年2月25日。占领地首任总督矶谷廉介抵达香港即成立直辖于日本战时内阁的“香港占领地总督部”。

自日军入侵香港以来，日军便在香港虐待平民和战俘，又推行皇民教育；除了禁止使用英文及强迫使用日文外，在香港岛及九龙的主要街道与地区名称，亦被占领地政府更换为日式地名，例如皇后大道中被改成“中明治通”，又在香港掠夺物资支撑日军继续作战，并禁止香港市民藏有港币及强迫兑换军用手票，香港的民生及经济等各方面皆饱受摧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二战结束，占领地当局在盟军部队抵达前继续维持占领地的基本秩序。8月30日，由夏悫少将率领的皇家海军太平洋分遣舰队抵达维多利亚港宣告香港重光，英国官方在9月16日举行受降仪式，而香港也在百废待兴下展开战后重建。

香港保卫战

1937年7月7日发生七七事变，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占领华北及华东大部分地区。中国东部沿岸亦落入日军的控制范围，广东省一带的华南沿海地区成为中国从外地输入各种物资的重要地点。为切断这条补给线，日军于1938年10月1日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并迅速攻占邻近地区，广州在10月21日沦陷。而部分日军亦驻守于宝安的深圳河北岸，与英军为界。英国明白最终会与日本一战，于1937年后逐步加强香港的防卫。1938年7月，香港政府通过《紧急条例》，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积极备战。同年9月，

更举行大规模的海陆空演习。由于大量难民从内地涌入香港，香港人口从1936年的约100万，增加至1941年的160万。

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由1939年德国攻打波兰揭开序幕。1940年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盟。美国于1941年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日本终下定决心向英国、美国、荷兰开战，以排除欧美国家在东亚的势力，夺取东南亚的石油、橡胶和矿物资源。日本于夏威夷当地时间1941年12月7日上午8时（即香港时间8日凌晨2时）偷袭珍珠港的美军基地，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日军数小时后入侵香港，香港保卫战爆发。

日本在香港标准时间12月8日清晨进攻香港，8时空袭启德机场及深水埗军营，又越过香港边界入侵新界。12月11日攻克英军在新界和九龙之间的最主要防线——醉酒湾防线，使英军退守港岛，日军于12月13日占领九龙。日军曾派使团向港督发送劝降书，却遭到港督杨慕琦即时拒绝，日军随后连日猛烈炮轰及空袭香港岛，12月18日晚，日军利用炮轰造成的大火及浓烟掩护下，渡过维多利亚港登陆香港岛，沿岸防守的英军不敌有源源不断增援的日军，无力抵抗日军深入港岛，翌日双方在黄泥涌峡爆发激战，香港守军在黄泥涌峡及渣甸山激战一天已阵亡451人。日军在占领黄泥涌水塘及大潭水塘后拆毁抽水设施，使港岛的供水逐渐瘫痪；日军又在浅水湾及圣士提反书院等地屠杀战俘和护士，并威胁在入城后将对平民发动大屠杀，而人烟稠密的市区也爆发巷战。

12月25日下午，英军在湾仔的防线同时受到日军正面进攻及隔海猛烈炮轰，并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港督杨慕琦与守军司令莫德庇及辅政司詹逊等政府高层商议后决定投降。杨慕琦在晚上抵达被日军作为总司令部的半岛酒店签署降书。他与香港政府领导层及一万多名守军沦为战俘。香港进入日本占领的黑暗时期，此日因而被称为“黑色圣诞”。到1942年2月20日，日军中将矶谷廉介成为首任日占时期总督，香港成为日本东京政府直辖的

占领地。

政治

香港沦陷时期，香港汇丰总行大厦被征用为政府总部，顶楼改挂日本国旗。大厦前面的皇后像广场原本放着维多利亚女王铜像的地方，换成一块刻有占领香港告谕的石碑。

军政府时期

日占时期初期，酒井隆实施戒严令，日军于九龙尖沙咀半岛酒店发布行政指令。日本军政府（包括政治部、民事部、经济部、司法部及军事部等）制定严厉的法例及设立管辖全港市民的政府。共有7000多名战俘（包括英军及市民）被囚禁于深水埗和赤柱的战俘营，战俘备受饥饿、病患之苦。同时日本军政府封锁维多利亚港、控制海旁的货仓。

1942年1月，香港警察被征召成为宪兵。日本宪兵将警区分为5区，东香港、西香港、九龙、新界及水警。总部位于香港岛中环前法国外方传道会大楼（今前香港终审法院）。

民政时期

1942年2月20日，“香港占领地政府”正式成立，由日军矶谷廉介中将出任香港总督，结束军政府时期。政府总部设于香港岛中环的香港汇丰总行大厦，半岛酒店则改为日本占领军总部。日本在占领香港后，并未有如广州和南京般交给汪精卫政权管理，而是设立独立于中国占领地的管治机构，由东京政府直接委派香港占领地政府的领导层，“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成为香港最高的行政机关，亦是日本战时内阁的直辖机构之一。

日本人在新政府（包括民治部、财政部、交通部、经济部、报导部、管理部及外事部）占据多数重要职位，华人只可以担当一些中低级职位。但日

本为了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也成立“华民代表会”及“华民各界协议会”这两个华人组织。华民代表会为占领地总督的咨询机构，有委员四名（罗旭龢、刘铁诚、李子方及陈廉伯）。而华民各界协议会则有委员22名（主席周寿臣，副主席李冠春，委员董仲伟、叶兰泉、伍华、罗文锦、邝启东、凌康发、林建寅、李忠甫、郭赞、陆霭云、周耀年、郭泉、王德光、谭雅士、王通明、邓肇坚、颜成坤、黄燕清、冯子英、章叔淳）负责向华民代表会提供意见。与英治时期的行政或立法局不同，华民代表会或协议会并无法律上权力。

在日本控制下，基本的行政区域架构由民治部于1942年3月成立，将香港岛分成12区，九龙分成9区，新界分成7区。每个区都设立一个区役所，并指派一个华人作为所长，管理该区的大小事务、处理该区市民的所需。这行政架构于矶谷廉介统治下重新设计，奠定香港日后发展分区管治的基础。此外，占领地政府向香港市民发出“住民证”，是香港首种出现的身份证明文件。

历任地方长官

香港日占时期历任地方长官列表

1941年12月25日 – 1942年2月20日

行政长官酒井隆中将（军政厅最高长官）

Lt. Gen. Takashi Sakai

行政长官新见政一将军（军政厅最高长官）

Gen. Masaichi Niimi

1942年2月20日 – 1944年12月24日

矶谷廉介中将（香督）

Lieutenant General Rensuke Isogai

1945年2月1日 - 8月15日

田中久一中将（香督）

Lieutenant General Hisakazu Tanaka

经济

日军拘捕西方银行家，并将他们囚禁于中国旅馆。

概况

沦陷时期，很多主要的工厂被日本人夺取，香港经济运作完全由日本人支配，并将资金及不动产全部充公。英资和外资企业，以及各大银行全部被日本人接收，华人公司则大多无法经营而倒闭。基本的民生所需，如米、糖、面粉和食油，都面临短缺，需要定额配给。燃料短缺加上美国的轰炸，使公共交通陷入停顿。造船业和建筑业的人无家可归。在农业方面，日本在新界地区的粉岭和锦田石岗机场建设耕地，他们亦曾打算在吐露港填海。香港保卫战爆发前，黄埔船坞已开始建造帝国轮Empire Dragon货船支援英国在二战期间的物流运输，日本将之没收并继续建造成为晓空号。

为了提升日本在香港的影响力，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与有利银行等外国银行遭到清盘，英国、美国及荷兰等同盟国的银行家被迫住在小酒店。而两间日本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和台湾银行则在香港重开，日本的银行并向外国银行发出债项。

矿产及金属

日本实施南方作战的其中一个目的是占据天然资源，以弥补日本本土的不足。尽管相比起英属马来亚和荷属印尼等东南亚地区，香港矿产资源并不算丰富，但日军仍是尽量搜刮香港的矿藏，包括继续开采莲麻坑的铅矿及针山的钨矿，又大肆采挖马鞍山矿场的磁铁矿，以应付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军备生产。因为战争规模扩大，日本须要扩大武器生产，东南亚搜刮的物产也不足以满足需求，日军在战争后期处于劣势，难以将东南亚的物资运往日本本土，于是开始征集金属制品，再运往日本熔化成为武器原料。日军曾在香港发起“献铜运动”，以捐献为名把香港市民持有的铜制品充公，以供日军制造武器之用。在香港竖立的维多利亚女皇铜像及扈臣铜像等塑像也纷纷遭到日军拆下并运往日本，有部分铜像更于战争结束前被溶化，成为生产武器的原料。

货币

1941年12月26日，即香港被日本统治翌日，日本已宣布以军票取代本地货币。港元变为“非法货币”，藏有港元的市民会被施以重罚。1942年1月，港元和军票的兑换率为2兑1，可是在1942年7月24日起兑换率变为4兑1，比之前兑换率骤降，使得香港人在交易后变得贫穷。日圆军票于1943年6月1日正式成为香港的唯一法定货币，日用品的价格必须以日圆作单位。至1945年日本投降时，被强迫兑换的日本军票总值超过当时币值的57亿港元。

香港虽然已不准使用港元，但宗主国英国仍在与轴心国战斗，并承认港元的价值，因此港元在珠三角、葡属澳门及其他中立地区依然获承认，转为黑市的港元买卖活动仍然活跃。日军采强逼手段收回香港市面的港元钞票，再于境外购买物资，故日军获益甚丰。另一方面，日军在印制军用手票并没有任何储备金，所以实际上日军是以白纸强逼市民兑换仍获海外承认的港币，加上日军滥发军票，使香港出现灾难性通货膨胀，物价每日贬值。于1945年中期，日本当局强迫汇丰、渣打、有利银行高层在没有任何储备金下签发大面额的港元钞票，总数达1亿零300万元。日本战败后，日

军在香港印发的军票立即成为废纸，日本对香港的金融掠夺使很多市民倾家荡产，战后身无分文。

民生

归乡政策

由于食物短缺，为了缓减人口压力，日本在占领期间执行归乡政策，软硬兼施强迫大量市民归乡，市民被驱逐至广东。1942年1月，由占领地政府民政部成立的“归乡指导委员会”，每月均安排火车和轮船将市民强迫离港，但这些交通工具只将人送出境，离境后回乡的路途就要各人自理，更多人付担不起路费，只能徒步回乡。当时香港既已沦陷，市面粮食不足，生活艰难，因此很多港人选择离港回乡。同年12月，已有60万名市民离港，其中不少家庭于途上分散，或被迫抛弃幼儿、老人，或途中饿死、病死，至于途中被洗劫一空者更不计其数。而于后期，宪兵队更在街头随意捉人强行押解离境。结果在1945年，香港的人口由1941年的161万人跌至60万人。战后发现马鞍山乌溪沙、墨鱼洲均为万人坟。

设施毁坏

日本在占领后随即重组政府及私有物业。知名建筑如英皇书院、华仁书院、拔萃男书院、中央英童学校（今英皇佐治五世学校）、香港圣公会的圣保罗女子中学（今圣保罗男女中学）、喇沙书院、圣若瑟书院、圣士提反书院等等都被强行征召成为日军的马厩、医院或战俘营。拔萃男书院更被谣传是日军执行斩首的地方。而协恩中学亦被指为日军当年其中一个用地，于山后设有防空洞。因为扩建启德机场的关系，他们摧毁位于九龙城的九龙寨城及宋王台，及邻近包括蒲岗村的20多条乡村亦被拆毁。当中，大磡村全村连同朱氏宗祠被夷为平地。

此外，皇后像广场的维多利亚女王铜像被拆掉，原址则竖立一个石碑，宣告香港已经被日本占领。1942年2月开始，日本开始于香港岛宝云山山顶兴

建忠灵塔，以纪念阵亡的日军，使其成为香港的地标。重光后被香港政府炸毁。

当时香港很多交通工具都被战火摧毁，私家车全部被日军掠夺，当中不少被运往日本，余下的成为占领地政府的座驾。日军也将香港的全部巴士、的士及货车等充公，其中不少成为军用物资，其余车辆则拨归由日方成立的“香港自动车运送会社”，提供有限度的公共交通服务。1942年起，香港电车、山顶缆车及天星小轮亦逐渐投入有限度的服务。九广铁路于1943年恢复运作，以满足日军的运输需求。由于缺乏燃料，公共交通工具须经常停驶，情况在1944年起加剧，到1944年6月，电车须全线停驶。由于燃料不足，日军又将部分车辆夺去及运往日本，在香港可行驶的机动车辆越来越少，在香港岛便出现载客的单车、三轮车，及由载货手推车加装座椅和顶蓬而成的载人手推车，沿电车路线行走西环至铜锣湾一带。而在九龙半岛，曾经出现以马车作为公共交通工具，行走于弥敦道一带。

饥荒

在日本统治下，战争已妨碍粮食的生产和运输，日军却将粮食优先用于支撑战争及满足日本的需求，香港民众生活艰苦，长期没有充足的食物供应，市民普遍营养不良，在战俘营当苦工的英军战俘更骨瘦如柴。占领地政府从1942年开始定额配给日用品，如米、油、面粉、盐和糖。每个家庭都有一张定额配给许可证，每人每天只可以买六两四的白米，以香港的重量标准，分量等同约242克，为当时东京市民每日平均耗米量。然而由于当时香港不如日本国内有其他杂粮及食品供应，故这个分量并不足以吃饱，也无法摄取基本的营养，而且并非保证有军票及配给证便可购得这个分量的粮食，所以很多人只能以山边的树叶、树根、番薯藤、木薯粉或花生麸勉强充饥，导致疾病频发。其后因白米缺乏，改为配给萝卜作粮食。因为战局对日本逐渐不利，粮食供应日趋缺乏，即使有军票及配给证也买不到粮食，故占领地政府索性在1944年取消定额配给制度，改以自由买卖，引

发疯狂的通货膨胀，使更多人付担不起食物的价格，实际上是任由市民饿死。

日占时期，香港经常有市民饿死，甚至出现人吃人事件，街上常有皮包骨的弃尸。即使如此，弃尸的大腿肉还是经常被割走。报章亦曾报导有妇人烹煮弃婴的新闻。当时市面曾盛传某些食肆使用人肉做成肉包，因为市面上根本不可能买到足够肉类。据七十年代无线节目“当年今日”所描述，当时的人食人情况相当普遍。

根据天主教香港教区档案有关日占时期的档卷资料显示，每日在市区街道上收集到300至400具尸体，有时更多，曾经有一日达到731具。因饥饿及所造成的衰竭、疾病而死亡的人数达50,000人。

物资短缺

因为没有木柴进口，市民只好以家具替代充当柴薪。而到了后期，由于那几年冬天特别寒冷，市民生火取暖需求增加，一些无人看守的建筑物，如香港大学、英皇书院般咸道校舍及皇仁书院位于鸭巴甸街及荷李活道交界的校舍等建筑，内里的木制品均被抢走，狮子山上的林木也被砍伐一光。由于燃油属军需品，因此也十分紧张，电力只能提供有限度供应，例如于1943年，总督部就下令只限20:00至23:00亮灯。而供水因需要发电，因此即使日占时期水塘常因台风吹袭而满溢，但供水依然十分紧张。

在物资供应短缺的情况下，仅有的物资变得奇货可居，因此引发一些商人囤积居奇，或以赝品、劣品代之。例如当时总督部就曾下令严惩以牛奶公司奶瓶灌假冒奶制品的行为。于1943年8月市面肥皂供应突然过剩，因为夏天之前有过多肥皂被商人炒卖，于秋天快到时肥皂需求下降，商人只得将存货抛售。无良商人的投机行为使市面的日用品供应更不稳定。

日军特权

日军在占领期间于湾仔骆克道一带设立多间慰安所，强迫妇女提供性服务；又在市区恢复设立赌馆及烟馆，占领地政府藉此赚取更多收入。另外当时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例：市民在街上每当见到日军，无论远近皆须作90度鞠躬；否则一旦被喝停，有机会遭受拳打脚踢甚至杀身之祸。除“居民证”外，市民亦须全家合影一张“全家福”照片，当日军查户口时出示，若相中家中的人并不在，又无合理解释，便会被当作窝藏游击队成员。

战后日本将种种暴行都推卸到“朝鲜籍士兵”的身上，他们甚至指香港的慰安所和妓院“都是由朝鲜籍士兵营运”，“与日本士兵无关”。战后的日本也将部分责任推卸到香港的华人非法组织之上。不过，新近发现的盟军审讯文件显示，日军的确在香港境内犯下种种战争罪行，包括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杀害大屿山银矿湾12名村民。

公共卫生

沦陷时期的公共医院甚少。九龙医院和玛丽医院均被日军所占领，东华东院也改成日军专用的军事医院，其余不少医院亦因没有医护人员及缺乏药品被迫关闭。在器材和药物的短缺下，只有东华医院及广华医院继续提供有限度的社会服务。这些服务包括提供食物、医药、衣物和殮葬服务等。虽然它们仍有一定的资金储备，但仍然需要面对巨大的财政困难，因为它们无法收集租金，而且亦有很高赔偿的开支。这促使他们进行更多慈善活动以筹集捐款，例如音乐和戏曲表演等。

慈善及社会服务

日占时期，慈善组织受到很大限制，以免被用作支援游击队。虽然日方设立一个以“东亚建设基金”为名的所谓慈善组织，但事实上捐款是用以支援日本政府所需，并非用作慈善用途。当时，香港圣公会会督及华人代表联合会希望透过举办慈善活动来救济穷人，所以向当时日占政府要求援助。

1942年9月，总督矶谷廉介答应他们的要求，于是命东亚建设基金拨款。不

过，援助并不是直接送到筹办者的手上，而需要经手日本总督。

凭着东亚建设基金的资助，“华民慈善总会”设立，以组织筹款和分发善款。为了促进慈善活动，该会组织委员会，挑选工会里面的名人等来领导筹款活动，继而请求工会成员参加小组，协助筹款活动。这些成员从各个社会阶层筹取善款。活动也包括政治宣传工作。捐赠活动最后筹得5万5500日圆军票。除此之外，也有足球赛和戏曲表演来筹募捐款。活动在其后数年持续进行。

日化政策

教育

日占时期，香港教育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学生人数由1941年的118,000人跌至1945年的4000人，几乎所有适龄儿童失学。战前香港有学校649所，日占时期只剩下34所。在仅余的学校里，日本当局积极推广日化教育。日语成为主要的教育课程，中小学每星期必须教授日语4小时。至于教导英语、中华民国国语，占领地政府不提倡，但也未完全禁止教导。日语成绩不好的学生，会遭受严厉的处分。除此之外，认同日本文化、礼节及国情等都成为学校的主要教授内容，例如高小的中文科的课文内容就包括《新生香港》、《兴亚进行曲》、《从香港到东京》、《日本刀》、《忠灵塔》、《日本的体育》等。这种教育制度推行的目的，是希望加强日本对香港人的影响，使他们认同“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

相较严重不足的基础教育，政府对推行日语教育则相当卖力，设立多所日语讲习所，亦鼓励设立私营的私立日语讲习所；凡政府或日资企业招聘员工时，日语程度较佳者不但可获录用，且可获发额外的粮食配给。政府亦强逼教师应考日语考试，未能合格的需要接受3个月日语培训。为了应付日语师资需求，培养认同日本统治的华人政府人员，政府曾成立“香港东亚学院”，是日占时期唯一的专上学院，但只维持短时间，学生人数甚少。至于

香港大学，则因香港的高级知识分子或已被关在战俘营，或已逃亡离港，因此缺乏人材，日本战败投降前一直未有复课。

地区与建筑命名

日占时期，香港的正式名称是“香港占领地”。占领地政府将香港多处分区或重新命名，例如“香港仔”更名为“元香港”、维多利亚港作“香港港”等。港九部分主要街道及地方更名，都带有日本色彩，改“道”为“通”，如“皇后大道”更名为“明治通”；“跑马地马场”更改名为“青叶峡竞马场”等。与此同时，亦有不少源自英国人名的街名，如歌赋街尚未更变。日占政府原计划会有更多改名地方，例如当时称作金马伦山、正兴建忠灵塔的宝云山。至于新界，则绝大部分地方名、街名至日本战败都未有改变。

此外，街道改名作通后，该街道路牌“XX号”正式作“XX丁目”，并在通名旁附上片假名，例如“东昭和通一丁目”旁作“ヒガシ セウ ワ ドホリ イツ チョウ メ”。然而，战时印刷中仍可见日式街名用“号”而不用“丁目”。

当时政府亦没收所有外资公司的物业，鼓励日本公司取而代之，并将原有名字更改。例如“告罗士打酒店”改为“松原酒店”、英资百货公司连卡佛改为松坂屋等等。除此之外，就连与英国无关的名称也要更改。例如尖沙咀重庆大厦的前身“重庆市场”，因为要避重庆的忌讳，而改称“中兴市场”，甚至把西方的教堂改成日本神社。坊间流传日本曾把香港更名为“香岛”，但没有史料支持。反而香港的简称由“港”改为“香”真有其事，如战前以“港九”命名的团体于日占期间皆改以“香九”称之、占领地香港总督简称“香督”、其命令名为“香督令”等。当时《星岛日报》曾易名为《香岛日报》。一九四三年，《亚洲商报》曾印刷《香督令特辑》。

文化影响

政府废用公元，改以日本使用的“昭和”年号，并以纪念日本节日、天皇寿辰、胜利纪念日 and 周年纪念日以加强日本文化对香港的影响，例如以神道

教节日悼念战死者，1943年2月11日则有日本纪元节，崇拜神武天皇。日本人亦在香港多地建造神社：香港动植物公园改名为大正公园后，计划增建“香港神社”供奉战死者，但因日本战败而未能成事。日本海军亦在域多利兵房内（日治时期是舰队司令部）建立“南海神社”，战后仍然保留碑石和鸟居，其中碑石在后来重建时由靖国神社接收，收藏在游就馆内。今九龙圣安德烈堂亦被用作神社。另港日政府计划在宝云山兴建忠灵塔纪念战争死难者，但至日本投降仍未完工。战后神社已被清除及还原为教堂等建筑物。

政府又实行全年夏令时间，将香港标准时间拨快一小时，使香港和日本两地时间一致，进一步将香港同化。

战前由日本人拥有的日文报纸《香港日报》，在1942年1月复刊，同时增设中文版《香港日报》及英文版《Hong Kong News》。被日本管治前的10份中文报纸到1942年5月只剩下5份，并受到官方新闻审查。当时《星岛日报》曾易名为《香岛日报》，继续维持出版，《循环日报》则因被盟军误炸而停刊。电台被用作为日本宣传之用。市面仍然有各种娱乐，但只有付担得起的人方可享用。戏院只放映日本电影，《香港攻略》是日占时期唯一在香港拍摄的电影，由田中重雄导演，大日本映画公司生产，影片主要由日本演员演出，参与的香港演员有紫罗莲。这部电影在1942年11月19日，接近日军占领香港一周年纪念期间上映。赛马亦重新在跑马地马场举行。

日军战争罪行

港岛南区杀人事件

1941年，日军将一整车的人骗到玛丽医院附近海边，再趁机将其全数杀害，但未知受害者身份。

难民船沉没事件

1942年5月19日，一万名难民被日军拘留及被押送至西环后登上19艘船只，上船时每人获派重约2斤的小米罐，面包2个，国币10元，上船后即被推入舱底，封闭舱门，不能上船面，此19艘船乃由一艘小船拖行，惟开行不久即遇台风，船不能支撑，日宪队遂斩缆任由此19艘船自行漂流，其中14艘沉没，酿成约3,000人丧生。另有1艘船船头爆裂，死伤狼藉。其后获救的生还者大部分因饥饿而不能行走，当中多人在沙滩上自然死去，沿路满布尸体。

人口普查滥杀无辜

1942年9月18日，香港占领地政府举行首次人口普查，日军藉“清查”去清算大量平民，文献指遇害及被捕后失踪者达2,000余人。

里斯本丸号战俘船事件

1942年9月25日，日军将深水埗战俘营的1,816名战俘赶上停泊在昂船洲的客货轮“里斯本丸”，两日后启航将战俘运往日本做苦工，但日军没有为该船作运送战俘的标识。10月1日，在浙江舟山对开海面被美国太平洋舰队潜艇“鲈鱼号”（USS Grouper）发射的鱼雷击中，日军派船接走船上的日本人，却将战俘全部封死在船舱内，该船于10月2日沉没，虽然有部分战俘从船舱游出脱困，但在邻近船只上的日军士兵，不但没有救起战俘，反而开枪射杀战俘，酿成约1,000人死384人伤。

放逐难民至荒岛

1944年7月，螺洲被发现约有400名被载至此荒岛的难民，在岛上没有民居亦没有任何生产的情况下自生自灭。其后螺洲对岸鹤咀居民称经常听见从螺洲传来的惨叫声，登岛时更见岛上到处骸骨，死者多为饿死或游水逃生时溺毙，岛上亦曾发生人食人惨剧。

中央警署私刑

在日占时期，从中央警署获释者多数在不久后死亡，估计因饥饿或遭虐待致死，死者达百余人。警署亦曾用囚车将部分并未被审判的囚犯载往行刑，即使有审讯也是在监狱附近进行，而主持审讯多为负责拘捕犯人回来的人，而审讯也只是日本宪兵私下问讯而已，并无法官、律师及旁听者。

放逐苦工至海南岛

1942年3月，484名被囚禁在湾仔告士打道合记公司的平民被驱逐上“榆林丸”号，驶往岛上并无医疗设施的海南岛，在该处被强迫为日本人工作。“香港重光”后，能返抵者仅百余人。300多人因遭虐待及饥饿而死。

日占时期，总共有20,000名香港人和20,000名内地人，被诱拐到海南岛开矿，期间受到虐待，不少人在饥饿下死亡。在海南岛的40,000名华工中，仅有5,000人生还。

屠杀

1944年12月1日下午，有一妇人外出到山边捡拾柴枝，突有1名日本宪兵及2名华警前来拘捕，并用刺刀刺其背部，华警称因妇捡拾柴枝而将其拘捕，同时被捕的2名老妇亦被同一刺刀刺伤背部，随即带往香港仔警署内监禁，期间并无提供食物及水，至12月2日被载往北角难民营，车上有在赤柱被拘的另外1男2女。营内亦有多人被囚，营门有持武器的日本宪兵及华警把守，有当事人称营中每日只有2餐，早上8时给稀粥一碗，无盐无菜，除进食外，整日均被困在监狱内。稍为光鲜的衣服均被扒光，连裤头带亦被除去，甚至把胸围内裤也给脱掉，被迫赤裸示众。营内除大人外亦有小孩。

2星期后，营内人数达400人，当日下午4时全部人被迫到北角海边登上一艘船，并被锁在船舱内。众人在舱内被困24小时后抵达惠州市平海镇，所有难民由4名宪兵挑选身体强健者释放后，剩下约70名身体残弱及病患者均被逐一杀害并将残肢推下海。

血洗圣士提反案为1941年12月25日在圣士提反书院发生的一起大屠杀，遇害者由60人到超过100人不等。1941年12月15日，圣士提反书院大楼被政府用作军事医院。至12月25日，超过150名日军闯进医院，当时在内的56名英籍、印度籍及加拿大籍伤兵，以及部分医护人员和书院职员被杀，受害职员包括中文科科长谭长萱。一些生还的伤兵和护士，分别被囚禁在两个房间。后来另一批日军肢解2名加拿大人。在隔壁房间的身材姣好的女护士则被性虐待。

帆船蒲台岛入水事故

1944年6月，赤柱海边难民营中有800多名无故被拘的平民。约一星期后，营内人数增至过千人，即由数只帆船，带至宝安南澳。两船外有一火船，内有日本宪兵及华警持械把守。船驶至长洲时，火船离开，并命令帆船驶往南澳，同时给予2包米。帆船行至珠海担杆列岛，天气变坏，遂折回蒲台岛，此时船上入水，水深及膝，船上50余名老弱者因此淹死。船到蒲台岛后即下锚，在海面停留。有20人此时获岛上艇家解救，到大潭笃水塘上岸。

置人于烈日下晒死

有报道指15名华人被日军置于烈日下暴晒，用火水罐挂在手上，直至脱水汽绝为止。

梅窝血案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军在梅窝银矿湾无故随机弄死12名香港市民。

1945年8月19日下午2时，一队为数15人的驻银矿湾日军，遭到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突袭，造成十余名日兵伤亡，港九大队则有一人身亡。日军为报复，随即在邻近的三个村落杀人放火，更押解300名村民到沙滩虐待，部分

人被打死。其后英国政府在香港设立四个战争罪行法庭，有关案件于1946年3月28日开审，4月24日审结，有村民亲身到法庭指证。

落闸放狗事件

1943年某日，薄扶林道近坚尼地城有10名华妇正在割草，突被日本宪兵拘捕，囚于一混凝土小屋内，然后放狗入屋，10名华妇被野狗咬死。

杀害医护人员

苹果日报引述“东京战争罪法庭”（相信是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纪录，指一队日军在1941年12月来到黄泥涌峡的医疗基地，轰死十名担架手。报导指担架手的手臂上绑有“红十字”，且已举手投降，另有五人在帐篷内被俘，他们曾试图在红十字旗上写字表明医护人员身份，身上没有武器，惟旗帜在伸出帐篷时被日军子弹射穿。五人其后被缚在树上，日军带走其中二人，二人再没有回来，其余三人在半夜逃走，最后只有一人生还[36]。报导又指，一支业余考古队发现的半块肩章，属于英国皇家陆军医疗队（Royal Army Medical Corps）队员。考古队成员Craig表示，当年只有队长才会佩戴肩章，肩章主人极可能是失踪者之一的队长Barclay。Craig找来Barclay的儿子Jim，后者特意来到香港，领取父亲的唯一遗物。

虐待战俘平民

香港大学法律系建立香港战争罪犯网上数据库，于2010年12月25日投入服务。副教授Suzannah Linton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一叠文件纪录，显示日军曾虐待战俘和普通市民，手法包括强行灌水至肚胀，再用脚猛力踏在肚皮上。除了强行灌水，还有电刑、绑手吊起毒打等。

南石头收容所大屠杀

日军8604部队诱骗及驱赶超过十万香港难民到广州，难民被关进日军设置

在广州南石头收容所，进行活人试验及活体解剖，共害了逾万人。

战后审判

Suzannah Linton寻获的文件显示，由1945年至1948年，英国殖民政府审判最少123名日军战犯，他们涉及最少45宗战争罪行。当年的战争法庭位于铜锣湾的崇光百货附近。其中22名被判死刑，并于赤柱上吊行刑。14名因证据不足获释。其余战犯被判监禁，刑期由6个月至终身。不过，由于政治及经济因素，这些战犯在1950年代获释。

另根据生活杂志的档案照片，可见部分日本战犯或滞港日军士兵在战后从事各种体力劳动，包括打扫花园和修筑公路。

盟军空袭、持续抗日及敌后活动

早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为了对日军侵略东北表示不满，有香港市民组织拒买日本货物；很多1910年代关闭的工会再次成立，市民再度激起爱国主义情绪。在日占期间，香港华籍市民的反日活动仍无间断，变成地下活动。

盟军轰炸

盟军由1942年9月至1945年7月期间多次轰炸香港，亦为英国政府所允许；盟军战机主要空袭香港的日军据点，主要集中于红磡、港岛北岸（太古、海军船坞、湾仔）及荔枝角一带，但是间中亦有误中民居，不少市民成为战争中的牺牲者。

1945年1月15及16日香港大空袭，美国陆军航空队第38特遣舰队共派了471架飞机、投了150吨炸弹攻击香港。15日，为夺取制空权，美军投下14个500磅烈性炸药，并发射了120枚火箭，攻击启德机场及扫荡空域。到1月16日，美军投下649个100至2000磅炸弹，攻击军舰锚地、启德机场、太古船

坞、黄埔船坞、油库、维港船舶和一些港口设施。此为香港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最大规模的轰炸。不过行动也误炸了太古船坞邻近糖厂及赤柱收容所等，日本的海运被完全截断。

其中最严重一次为1945年1月误炸湾仔市中心，酿成市民约1,000死3,000伤。第二严重的是1945年4月误炸铜锣湾法国医院（圣保禄医院）及铜锣湾避风塘，造成490余死数百伤。

第三严重则为1944年10月16日，美军派出30架B-24轰炸机，从几千米高空投放炸弹，但误炸了不少地方，包括区役所、小学、160间房屋，涉及1570户，导致916人死亡，数千人无家可归。其中正在上课的红磡街坊会小学被误炸几乎全体教师及学生死亡。然而根据香港作家小思在《香港的忧郁》一书的印象，香港市民一般都不反对盟军轰炸。

英军服务团

英军服务团（British Army Aid Group）由原香港大学教授赖廉士上校（Lindsay T. Ride）组建，负责收集日军情报、接送重要人物潜出或进入香港。成员包括战后新界理民官何礼文及战前担任华民政务司的麦道轲等。1942年7月，英军根据赖廉士上校的建议组成这个援助小组。1941年12月底，守军都被日军押送入战俘营，赖廉士上校成功逃脱并到达重庆，于是建立英军服务团，他将总部设于桂林，并视广西为华南的前线基地。初期任务主要是从战俘营中协助战俘逃脱，并走私药物和其他必需品进出战俘营，亦组织了智囊团。英军服务团亦与重庆国民政府及东江纵队等组织展开合作。英军服务团秘密联系之前在英军及香港义勇防卫军服役的香港本地华人，在香港及华南组建情报网络，搜集日军据点及建筑物情报，绘制日军据点的环境、地势及地理位置、驻守人员数目、存放物资的种类及存量等记录的草图，协助盟军制定空袭目标及汇报空袭成果，救援落入香港的盟军人员，策反船厂工人拖延维修日军船舰，并在日本投降时协助组建临时政府。

香港志愿连

香港志愿连（英语：Hong Kong Volunteer Company）是一个在香港保卫战结束后由香港人组成的步兵连。在香港保卫战爆发时，已有过千名香港华人居民在英军、义勇军及华人军团服役及参战，在香港向日军投降之时，英军军官安排华人成员将军服换成平民服饰及离队，避免一同被日军俘虏，大量华人士兵因此成功逃脱。部分华人士兵之后逃离香港，组成一个步兵连，继续协助英军在东南亚抗击日军。香港志愿连先跟随歼敌部队（英语：Chindits）英印步兵第77旅（英语：77th Indian Infantry Brigade）参与缅甸战役，后来被调往英属马来亚进行敌后侦察任务。

港九大队

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简称港九大队，1940年9月建立，于1942年2月正式成立，是一队由香港新界原居民子弟在中国共产党属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下组成的游击队，成员包括农民、学生和海员，主要于新界西贡一带活动，以加强在东江及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反日力量。

港九大队由中国共产党党员曾生领导，在1941年日军进攻香港时，港九大队从200人扩展到超过6,000位成员；日军在进攻香港期间并没有与游击队发生交战的记录；东江纵队亦没有提及曾经与进攻香港的日军第38师团及担当后卫的荒木支队相遇，故此东江纵队并没有参与香港保卫战；惟其提出在英军撤退时获取被英军摒弃的武器，并在新界及九龙建立基地，同时在西贡墟建立地下联络系统。而第三个和第五个分支在蔡国梁之下，被派遣到香港和九龙，由队长黄冠芳和副队长刘黑仔带领，统领香港及九龙的抗日武装斗争，并让中国获取日本对华南、台湾和东南亚的战略机密。港九大队属下有短枪队和几个区中队，队员竭力攻击强盗和日军，保障农作物及人命安全。港九大队亦帮助破坏日本在香港的军事据点，和促进在中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友谊。在使用游击战的常规战术下，他们杀死

一些汉奸和其同党，在九龙和广州保护贸易商人，攻击大埔的警察局，并轰炸启德机场。

港九大队在拯救英国和外国人士上亦扮演重要角色，共有20名英国人、54名印度人、8名美国人、3名丹麦人、2名挪威人、1名苏联人以及1名菲律宾人获拯救，包括被囚的赖特上校等英军官兵及美军飞行员，此外亦有大批内地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人士获救。另外，港九大队亦协助营救战俘，包括著名的赖廉士爵士、祈德尊爵士、王国栋教授和David Bosanquet。港九大队对盟军最重大的贡献，是抢救了8名因日军击落其飞机而跳伞到九龙的美国飞行员。当时为1944年2月11日，美军第十四航空飞行指挥员兼教官克尔（Donald W. Kern）中尉在轰炸启德机场时被日军击中，跳伞降落慈云山，后得到游击队小交通员李石仔等救助才能逃出日军的搜捕。

1942年4月，港九大队队员加强对大屿山的控制，强化与澳门和广州的通信。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为东江纵队，而港九大队仍是它下辖的一个分队。

有香港学者指，在西贡区传教的天主教神职人员成为港九大队针对对象，1942年内三位在区内工作的传教士黄子谦、郭景芸、丁味略先后被人谋杀。其中，根据天主教香港教区档案的纪录，神父郭景芸于1942年被港九大队俘虏并杀害，至于丁味略是在郭景芸被掳后被共党游击队携带上船，之后把他杀死，将尸体投入海中；一星期后有人发现他的尸体在深涌一个小沙滩上。

香港重光

香港重光后，英军于1945年9月17日在中环举行胜利巡游，中华民国亦有派代表出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引发香港归属问题。当时蒋中正认为英国应把香港的主权移交给中华民国政府，但丘吉尔领导的英国政府也展现出强硬的立场，加上在战胜国之间的利益关系之下，以及国民政府须要应对共产党势力在战后的扩张，最终让香港在战后继续由英国统治，香港才能避过国共内战的战火，得以顺利进行战后重建。

1945年8月15日，英国宣布接收香港及恢复香港的管治。中华民国政府曾表示强烈反对，但经过多次交涉及美国的协调后，中方最后同意英方代表可在中英两国政府授权委托下，在香港接受日军的投降。8月30日，英国海军少将夏悫抵港，正式代表英国恢复对香港殖民统治，当日遂定为重光纪念日，至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以前，每年重光纪念日都成为香港的公众假期。1945年9月16日，英国在举行香港总督府受降仪式，中华民国亦获邀派代表出席，由皇家海军夏悫少将接受日本占领地代表向盟军投降，英日双方在英方草拟的降书上签字，确认占领香港的日军投降。

英国重新接管香港后，暂时以军政府形式管治，使公共设施尽快恢复正常，并致力维持公共秩序。1946年5月1日，曾被囚于沈阳集中营的前总督杨慕琦复职，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恢复正常。

影响

战后香港发展迅速，加上当时的香港政府积极去日化，战后遗留至今的日占痕迹不多，但有些地方仍保留着日占时期的痕迹。终审法院大楼及汇丰总行大厦铜狮子上皆有保卫战时留下的子弹孔，拔萃男书院于礼堂门前有于校园内挖出的日本军刀，新界地区的一些荒废地道里有日军刻划的签名。建筑工地也不时会挖掘出炸弹、军刀或人体骸骨，其中有近期于2007年在赤柱圣士提反书院附属小学广场地底挖出的战时炮弹，另外1999年薄扶林道近玛丽医院修建天桥时亦发现一枚未爆炸的盟军炸弹。再之前亦曾在旺角及深水埗闹市的修路工地挖出多枚日军炸弹。2013年，一支业余考古队在大潭笃水塘山头，发现七枚炸弹及多发机枪子弹，包括一枚2,000磅

空投炸弹，考古队相信这些弹药属于一架被击落的美军TBM3轰炸机。

至今仍有不少地方未能恢复战前原貌。例如狮子山山头依然只有很少树木，而蝴蝶谷的生态破坏亦使蝴蝶从此绝迹。

在建筑方面，由于某些原因，礼宾府至今还保留着当时兴建的日式的屋顶及塔楼。战后的香港政府于今香港大会堂修建纪念花园，是主要的纪念建筑。在香港历史博物馆内则展有一批日占时期文物，其中包括当年挂在日军占领地政府总部（原汇丰银行大楼）正门的“香港占领地总督部”门牌。

在1945年香港重光后，香港余下人口减少至不足60万，即由沦陷至重光，平均每天减少760多人。

日军在日占时期设立“香港市民图书馆”，是香港的较早期开放给公众的公共图书馆，其藏书今收于香港大学图书馆内。港日政府开香港分区及签发身份证之始，于战后一定程度上被沿袭下来。

日本占领期间的“归乡政策”亦间接使不少香港居民丧失在香港原有的权利。由于早期英国对香港人移民的政策仍然宽松，在1950年代，只要有香港的永久居留权，就可以在英国定居，而当时只要在香港出生，就可得到永久居留权。不过因为日本的归乡政策，不少儿童在战时移居中国大陆（内地）。当他们回到香港之后，有不少人由于各种原因（例如：记录遗失或被烧毁）而未能确认其香港出生地位，被当作在中国内地出生。随着后来英国收紧移民政策，这一部分人亦失去移居英国的权利。

当香港沦陷时，中国著名作家张爱玲正在香港大学念书。她的小说《倾城之恋》就是根据当时她的所见所闻和从友人处听到的故事受启发写成。

《倾城之恋》小说后来在上海被改编为舞台剧，近年香港话剧团再改编为《新倾城之恋》上映。此外，香港演戏家族分别于1993、1994及2000年（1月及4月），上演以日占时期为背景的音乐剧《遇上一九四一的女孩》。

流产的改革

1930年代后期，香港政府在时任港督罗富国领导下，有意放宽殖民政策，给予香港市民更多的社会权责，更开征入息税，计划推动全新的福利制度。有关计划已获英国政府允许，但由于日本占领香港，计划最后付诸东流。

战后香港都市传说及大众文化

英国接收香港之后，日军威胁不再，但由于不少平民死于战火、日军军法或虐待，日皇裕仁宣告终战后又有好多日军基于“武士道精神”拒降自杀，后来有不少闹鬼事件都认为是源于战后死者冤魂不散。部分事件甚至曾惊动战后香港政府出手摆平，或者广为传媒报导。

按亚视节目历史话当年说法，萝卜糕源于芋头糕，就是为通行萝卜头（日本人的俚称）而来的。打碎萝卜头吃掉变成年糕之一。

1974年，运输署总部搬入1973年落成于中环的美梨道停车场大厦后（美梨道，今美利道），发生闹鬼事件。当时更报导有外籍高官被一无头鬼吓晕，又谓美利道停车场大厦及旁边之美利大厦于战时均为日军刑场，令“鬼佬撞鬼”之说不迳而走。最终香港政府请来佛教联会高僧举行法事，超渡亡灵。时任运输署长惠柳新亦有在场上香。法事过程除被拍摄，亦有相片纪录。当时记者问及相关官员是否相信运输署有鬼时，官员则答：的确有同事遇有怪声或古怪情形，无法确切证明真有其事，但又无法证明并无其事。

2003年，有8名青年到战时曾为日军慰安所、战后荒废多年的湾仔船街南固台探险。据报导，其中一位少女疑被鬼上身后狂叫乱跑，变成男声而力大无穷，同伴无法阻止，结果出动4位警员方可以将她制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45%E5%B9%B4%E6%BE%B3%E9%96%80>

1945年澳门，澳葡政府虽仍对外宣称在二战保持中立，惟1月暗中出售燃料予日本，遂触发美军大举空袭澳门，其后再于2月至7月期间施袭数次，造成人命伤亡及财物损毁，导致葡方多次谴责抗议。8月，日本投降使二战结束，澳门各界于9月初狂欢庆祝，工商界休业3日，公务员亦特别放假一天。10月，中国各界出现收复香港及澳门的声音，而9月底国民政府外交部欧洲司提出处理澳门的几种对策，包括收回澳门为“彻底办法”，更曾一度派出军队封锁关闸，禁止粮食输入澳门，至11月外交部认为应先解决香港主权后才处理澳门主权问题，又指收回澳门时机尚未成熟，事件遂暂告一段落。航运安全亦在本年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先有多宗船只在澳门或附近水域被炸沉事故，10月中国国庆前夕更发生澳门史上最严重的交通惨剧，行走广州至澳门的“广源渡”客轮深夜途经外港时撞石翻侧沉没，酿成约300人罹难，国民党澳门支部为此召开全澳航业界会议，议定5项航运安全法，并决定成立澳门航业社团，以加强海上安全保障。

大事记

1月

1月1日，公共救护队转归市政厅，并入消防队。

1月16日上午约9时半，美国海军得知澳葡政府准备将新口岸水上飞机库库存部分燃料售予日本后，派遣美国空军第38特遣小分队7架飞机对澳门进行

首次空袭。飞机除低飞用机枪扫射新口岸一带外，还向新口岸飞机库及黑沙环电力局车房附近之澳门电台投下数枚炸弹，引起建筑物燃烧，浓烟弥漫整个南湾一带。下午3时45分，美军再次向新口岸飞机库投弹达10多分钟后向东北方飞去，澳督戴思乐、经济局长的座驾汽车亦遭到损毁。不久飞机再次折回，对黑沙环澳门电台等地投弹，并沿电力局车房、望厦、高士德大马路、松山、新口岸一带低飞扫射。美军主要目标是摧毁位于澳门半岛外港的原海军机场的机库，担心那里停放的飞机和汽油落到日本人手，故先后两次对停放了6架飞机的新机库进行轰炸，所有飞机被炸毁，马交石炮台亦遭轰炸破坏。轰炸中，停泊于青洲海面的澳葡政府运粮船葡萄牙号遭袭击，一名工人中弹身亡。事发后，澳门政府立即通报葡萄牙政府，并强调这种行为违反战争法例。美国政府为此表示歉意，并向陆军当局查明原因。是日轰炸共造成1死5伤。1月18日，葡萄牙驻广州领事馆发表声明，谴责美军于1月16日先后三次轰炸澳门。

1月20日，为响应筹募难民学童经费，当时的澳门女歌星在清平戏院义演，筹得一万余澳门元。

2月

2月3日，日本驻澳门领事馆首任领事福井保光及书记官朝比奈泰晖于东望洋山做完早操返回领事馆途中在连胜马路遭两名华人枪击，福井翌日伤重死亡、朝比奈则身受重伤，事发后澳葡政府全力配合侦查，惟毫无头绪，继任领事的岩井英一除聘用卫队达50人外，亦提出四点要求，包括逮捕犯人、澳督有责任维持治安、对死伤者予以赔偿及对日本人今后安全予以保障。岩井还支持南京日本军司令部以保护侨民为名去占领澳门，但最终因缺乏具体实施步骤而不了了之。日军则从广东对澳门实行惩罚性封锁，造成澳门市面食粮短缺，再次引致澳门发生饥荒。

2月24日，“中华篮排球协会”在澳门成立。

2月25日上午10时50分，一架美军战机在内港避风塘上空低飞，用机枪扫射葡萄牙号轮并投弹数枚，枪击造成1死4伤，事后发现青洲及逸园跑狗场均有炸弹爆炸痕迹。下午4时，澳督戴思乐表示不明白市内遇袭原因，并会向葡萄牙政府汇报事件。2月26日，葡萄牙政府对美军再次破坏国际法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3月

3月10日，驻澳葡军在东望洋山至氹仔东南端一带进行地对海实炮演习。

3月23日，日本外务省致电日本驻里斯本公使馆，要求跟进福井被杀案，公使建议葡方无需赔偿，认为意义不大。公使会见葡萄牙外交部秘书长时要求澳门政府全力缉凶，追查幕后指使，大力监控破坏份子及保护日本驻澳门官员和公民。秘书长则指由于日方无法指出澳门政府中有任何官员牵涉此案，故不会撤换政府职员。澳门著名历史学家文德泉认为福井之死是日本驻澳特务机关关长泽荣作收买刺客所为，泽荣作其时为领事馆武官，并负责领导日军在澳门特务组织，且伙同日驻澳特务机关特工队长从事贩卖武器、军用物资及操纵米市等非法交易。福井多次试图阻止这些黑社会生意，因而与泽荣作结怨。案发后，泽荣作散布谣言，称福井被杀乃国民党特务所为。随时间推移，日本内部予以自行解决，此事遂不了了之。

4月

4月7日，广州怡崇行飞翔号轮船运送食米在外港码头附近被一架盟军战机击沉，船上19人丧生。

4月21日上午约8时，由澳门出发前往广州的客轮南海丸在驶经海心沙时遭美军空袭[12]，先是一连4次机枪扫射，继而连续投弹3枚，船尾中弹，由于船身小，轮船立即沉没，酿成50余死120余伤。

4月29日，为庆祝日皇寿辰，日本驻澳门领事岩井英一在澳门举行庆祝招待

宴会，邀请了二三十名华人名流、富商出席，并筹募日本驻澳门领事馆经费。

5月

5月2日，澳门至广州货轮“荣华一号”被美军炸沉。

5月15日，行走澳门至广东省的“华兴”号机动帆船驶往澳门途中被海上船只袭击，1死1伤。

5月20日，镜湖医院改组，实行院长负责制，改变此前长期的松散状态，由柯麟出任首位院长。柯履新后进行多项改革，使镜湖最终成为一所正规化的大型医院。

5月23日，澳门出现抗战以来第3次粮食恐慌期，因日军封锁澳门，再次出现食米短缺，导致米价暴涨，5月20日每担米涨至280澳门元，民间组成的“平抑米价委员会”在经济局局长罗保、贸易局司理梁基浩面前当面指责政府将食米定价过高。由于该会对澳门米价的干预，导致5月24日澳门米价急跌，每担米价在一日内暴跌至60.7澳门元。

5月31日，海运二号轮在驶近澳门时被美机炸沉，全船30余人死伤失踪过半。

6月

6月11日下午约1时，4架美机意图袭击停泊在青洲附近海面之葡国商轮“马士弼”号，向青洲附近投掷炸弹3枚，2枚落在地面爆炸，1死2伤；同日下午3时半，再有数架美机来袭，目标为路环岛，投掷炸弹完毕后又以机枪扫射，结果仅4名市民受伤，而当日的两次轰炸共造成7万澳门元之损失。

6月12日，澳门著名商人兼华人代表梁后源向澳门政府提出辞去华人代表一职，稍后又宣布其所经营的同德源记银号停业，并将其名下19幢物业变

卖。

7月

7月2日—7月16日，为解决澳门粮食供应问题，澳门政府派遣军需处处长贾拉度赴广州谈判，澳门地区粮食主要靠外地供应，每月米粮由中山县输入最多。经过数天周旋，粤澳双方同意续米约，且每月输澳米量增一倍，达到4万担。

7月5日，美军再度空袭，导致几名平民伤亡，且对澳门济贫院造成严重损毁。尽管美国声称是次轰炸是意外，惟葡萄牙政府仍向美国政府提出赔偿要求。美国参议院后来承认轰炸中立国的错误，并支付葡萄牙20,255,952美元的赔款。

7月8日，强烈热带风暴兰茜登陆阳江，澳门当局悬挂七号风球（今八号风球），无伤亡。

7月23日，热带风暴蓓姬登陆汕尾，澳门当局并未发出热带气旋信号，无受伤报告。

8月

8月10日，台风昆妮登陆茂名，香港天文台于8月7日至8月10日悬挂一号风球，澳门当局并未发出热带气旋信号，无受伤报告。

8月9日，文艺周刊《迅雷》面世。

8月11日，澳门市民得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并无条件投降后，群情激动，鸣放鞭炮，以示庆贺。澳门警察厅认为此行为违反中立立场，数百人因此被捕，并发布严禁特异举动及燃放鞭炮的告示。

8月13日，鉴于欧洲战争结束而太平洋战争持续，澳督戴思乐于上午11时接

见各报社代表，表示日葡邦交友好关系与战前相同，而澳门方面则务必继续维持中立立场，否则违背中立报道之报章将予停刊。

8月14日，大量食米运到澳门，致米价狂泻，每担最低见109澳门元。

8月18日，澳督戴思乐就抗战胜利在电台发表致澳门广大市民的文告，赞颂澳门居民在太平洋战争艰苦的岁月中，忍受着物质短缺和精神痛苦，坚持团结、合作和自信精神，乐观地克服和抵抗几乎无法解决的困难，并且承认政府虽然对民间的援助不足，但澳门居民仍能团结一致，渡过难关。

8月19日，滞留澳门的日军及伪军被解散，并乘西安轮离开澳门。

8月26日，台风戴丝掠过华南沿岸，澳门当局于8月24日至8月25日悬挂一号风球，无受伤报告。

8月28日—8月30日，为庆祝日本投降，知名画家高剑父在新马路与南湾街交界处的“利为旅大酒店”地下舞厅举办“庆祝世界和平画展”。

9月

9月2日：

台风海伦横过台湾北部，其外围环流为澳门带来雷雨，本澳及香港当局并未发出热带气旋信号，无受伤报告。

为庆祝日本投降，全澳工商界放假狂欢及庆祝3天，政府公务员更特别放假一天。当日虽滂沱大雨，雷声大作，但仍然有超过10万人涌上街头庆祝。人们在街头载歌载舞，舞狮挥旗游行，澳门主要的华人领袖发表战争结束和抗战胜利的演说。议事亭前地挤满数千人观看舞狮，在市政厅礼堂内，澳督、澳门主教、各级官员和社会知名人士等也聚首一堂庆祝。

9月3日，侨胞庆祝抗战胜利，正午12时召开大会，晚上举行提灯巡游。大

会向侨胞及社会各界人士筹得38,144,868澳门元善款。

9月24日，热带风暴温黛登陆雷州半岛，皇家香港天文台悬挂香港重光后首个一号戒备信号，澳门当局并未发出热带气旋信号，无受伤报告。

10月

10月2日，强台风珍妮横过台湾西南部海域，与澳门保持超过500公里距离，本澳气象部门悬挂五号风球（今八号风球），无受伤报告。

10月6日，澳门与菲律宾之间的电讯恢复。同日，澳门与香港间的邮递服务恢复。

10月9日晚上11时半，行走于广州及澳门之间的广源渡客轮深夜途经澳门新口岸外港时撞石翻侧沉没，船上大多数人来不及逃生，酿成约300人罹难，成为澳门史上最严重的海难。

11月

11月4日，关闸附近一个火药罐爆炸，4死3伤。

11月24日，中国外交部仍本着一贯主张，认为解决香港问题后再处理澳门问题。外交部长王世杰致函蒋介石，指现阶段收回澳门时机尚未成熟，建议暂缓处理。12月1日，蒋复电同意。

11月29日晚上9时，由澳门开往广东省的客货轮昌明号驶至九洲洋海面时，误触水雷爆炸沉没，酿成52人丧生、21人获救生还惨剧。

12月

12月1日，澳门记者公会正式成立，取消“新闻协会”原名。

12月12日，针对在澳门的汉奸将资产变卖或转移隐藏之现象，国民党中央

12月16日，驻澳葡海军士兵多人与广东省驻澳办事处官员及159师军官在澳门闹市因语言误会引起冲突，双方互相追打，中途有市民声援国军，并围堵到场维持秩序的葡警，其间有中国军官拿枪对抗，后被葡警制服。事后有平民和国军受伤入院。12月17日，澳督戴思乐致函中国外交专员唐榴表示歉意，并允诺惩处凶徒，负担受伤军民一切住院费用和财物损失，事件平息。

A 10x30 grid of dots. The first 9 rows are completely filled with 30 dots each. The 10th row contains 15 dots, starting from the left and ending at the 15th column position.

Page | 649

马来西亚华人，也称为马来西亚华裔、大马华人，是马来西亚的本地民族之一。

马来西亚华裔大多数是自明清起数百年来自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等省迁徙至马来亚的移民及其后代。在马来西亚，本土华人是第二大民族，总人口约有741万人。其中包含闽南民系近300万（其中200万是福建闽南人）、广府人100万、客家人100万等。

马来西亚华人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约23.4%，主要分布于吉隆坡（首都）、乔治市（檳城州）、怡保（霹靂州）、新山（柔佛州）、古晋（砂拉越州）、亚庇（沙巴州）和马六甲市（马六甲州）等各大城市。此外，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华人也是首都吉隆坡的第二大民族，占该直辖区总人口的43.2%（马来人占44.2%）。

历史

马来西亚华人的移民史可追溯至汉代，唐、宋时中国和马来群岛已有频密的商业活动和文化交流，元代时已有中国人在当地定居的明确记载。

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曾多次在马六甲（明史称为满刺加）停留，后来将马六甲、巨港（今属印尼）、泗水（今属印尼）等营建成其船队的大本营。至今马六甲仍然留有大量与郑和有关的遗迹。一些华人因为和当地人通婚，开始在马六甲定居，渐渐受马来文化影响，繁衍开来。

此时开始，华人开始在马六甲形成聚落定居，成为组成马六甲重要的一个民族。明朝衰弱后，这些通婚华人的后裔由于交通不便、满清闭关政策等因素，开始与祖国关系疏远。在与本土文化相互交融的情况下，他们逐渐形成一支新的民族——峇峇娘惹(Baba-Nyonya)。峇峇娘惹的母语也由方言（主要是闽南话）慢慢转变成夹杂方言以及马来语的峇峇娘惹语（Peranakan Hokkien），但依然保留了各种华人的风俗仪式。

而华人大量移民今马来西亚各地则是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始，当时清朝战败，中英签署《北京条约》，清廷容许外国商人招聘汉人出洋工作，充当廉价劳工（苦力），由于当时英国殖民者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以开发马来亚半岛，大量的华工（或称为苦力）从中国输入到马来亚半岛成为矿工、种植工人等。在蒸汽船使用后，华侨南来的数量更是急剧上升。此时到来的华人移民人数已经大幅度超越早期的娘惹峇峇，所以被早期定居的人称为“新客”。这时期马来半岛的华人人口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这是因为劳工们的侨乡意识浓厚，多不打算扶老携幼来到马来亚定居，而是希望赚够钱回到老家故乡。

到了1929年，全球开始经济大萧条。此时，华侨妇女开始大量移民马来亚，男女人口比例结构趋向平衡。二战后，由于世界进入冷战时代，英属马来亚正值马共叛乱，移民条例收紧，中国抵马的移民潮逐渐减少甚至停止。此后，华人参与了马来亚独立运动与马来西亚的建国运动，并在当地繁衍开来。

随着马来西亚建国独尊土著的政策，华人在社会上受到许多不平等待遇。由于华人生育率较低，预估2040年马来西亚华人比例将下滑到低于总人口20%，不利于华人的参与权及决策权。

人口

马来西亚华人现今人数为七百多万，是马来西亚第二大民族，仅次于马来族，并多于印度裔人数的一倍半。华人人口在某些城市（如：新山、槟城、怡保、巴生、马六甲、古晋、诗巫）占的比例较重，有些更超过半数。

大马华人的主要祖籍包括：福建（约四成的大马华人属于福建籍贯，占最多数，包括泉漳人、客家人、福清人、福州人、兴化人）、广东（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海南（海南人）等。另外有部分大马华族长期受马来和其他文化影响而形成了新的华人族群，称为峇峇娘惹或土生华人，但基于国家宗教政策，此现象已不复存在。

根据马来西亚政府的数据显示，在1957年，马来亚华人人口比例约为全国总人口的40%之多（不包括共组马来西亚时加入的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人口），而到了2010年则下降至24.6%，预测到2020年将降至20.7%；加上其他穆斯林种族多生多养的文化，如果生育数不见起色，华人的资源未来会逐步被侵蚀。人口比例下滑的原因之一是华人是注重对子女的培养与教育，以应对未来挑战，而不愿因“多生粗养”来承受过多经济的压力。因此，相对富裕的阶层或知识水平较高者都不愿多生孩子。在乡村地区，由于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准不高，一般孩子较多。

不过，马来西亚华裔人口不是“绝对”减少，而是“相对”下降，也就是说华裔人口依旧在上升，只是没有其他族裔上升得快。据当地媒体报道，从1961年至2000年的近40年里，马来西亚华人人口从300万增加至560万，增长比例是87%。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主任文平强表示，华人人口其实是在增加，但是速度很慢，比例下降也是对比其他族群的增长率来说的。如在出生率方面，1957年，印度族人为7.9%，华人是7.3%，马来人是6.0%；到了1995年，华人的出生率开始大幅下滑，比例跌至2.5%。

方言的人口比例

在2010年马来西亚人口普查里，华人的方言被分为九大类，即闽南（马来西亚大多数称为福建）、广东、客家、潮州、海南、广西、福州、兴化、福清及“其他”小语言群。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2010年未出版的统计，华人人口有6,640,000人。

与邻国新加坡的当地华人统一使用华语不同，马来西亚并没有限制当地华人使用方言，所以马来西亚华族之间普遍以华文或一些汉族语言交流，如福建闽南话和广东话（分为北马檳城福建话、中马吉隆坡广东话和南马柔佛潮州话）和客家话。

受中文教育的年轻一辈大多会说华语，学校里华文课皆用简体中文，国语（马来文）和英文在马来西亚是必修语。在日常生活中，马来西亚华人会说一种比较本土化的华语，而在正式场合（如本地中文媒体）则会转用一种较为正式的标准华语（类似台湾的国语或中国大陆的普通话）。本地中文媒体则简繁并用，使得两种字体得以在马来西亚共存。

此外，也有部分华人以英语为日常语言，其中包括受英语教育的华人和半数受中文教育的年轻一辈华人。

根据2010马来西亚人口普查，共有6,640,000华裔，其中中文成为大部分人的日常沟通语言。

马来西亚华人最大的族群是闽南民系，总共约277.2万人。

狭义的闽南民系指福建闽南人，广义上包括了潮州人。

20世纪初的马来西亚华人对祖籍国有割舍不断的感情，渴望加强与中国的联系，故早期的华文报刊内容多以中国新闻为主。但在独立后，马来亚政府开放让侨民入籍以及第二代马来西亚华人的诞生，华文报刊也慢慢地转变编辑方针，同时加强华人社群与政府及其他民族之间的讯息交流，扮演着桥梁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50年代后的马来西亚华文报刊也依然有特刊报导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新闻。

马来西亚最初的华文报刊是1815年至1879年之间发行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尚存最长青的报刊是1910年由孙中山在檳城创办的《光华日报》，当地华文报刊在反殖民统治、抵御日侵和建国独立等历史事件上都发挥了反映民情的功能，渐渐由侨报转型为主流报刊。目前较具地位的报刊分别有：《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光华日报》、《光明日报》和《东方日报》等。

孙中山的影响和辛亥革命

清朝末年，孙中山数次来到马来西亚的檳城、太平、怡保、吉隆坡、马六甲等地方宣传革命。马来西亚华人前赴后继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有者倾家荡产，有的如黄花岗烈士牺牲生命，这些华人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孙中山先生于1910年11月间在马来亚的檳城开会密议广州“三·二九”起义（史称黄花岗起义）。在这件起义牺牲的华人有29名分别来自新加坡、马来亚、越南、印尼等国家和地区。年龄最大的是52岁的越南华侨罗联，最小的则是出生在霹靂(Perak)年仅18岁的余东雄。这些烈士中工人为15名，商人3名，其余的则为学生、记者、教员和传教士。

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及日军占领马来亚的3年零8个月。马来亚华人从早期的动员，组织，赈款到最后的投身战场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并引起日军占领马来亚后进行报复。

进行抗日动员与组织工作的重大日子有：

1937年8月 马来亚华人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

1938双十节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新加坡成立。

1942年1月 以华人为主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同盟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成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政府在马来亚登加楼州龙运（Dungun）开办的铁矿生产大量的钢铁运往日本制造军火。1937年底，为了抗议日本侵略中国，马来亚华人在巴株巴辖、甘马挽及加烘的日人铁矿罢工。在文德甲、芙蓉、彭牙兰等地的日人胶园，也有马来亚华人工人罢工。策划龙运铁矿华工罢工的人就是新加坡著名抗日英雄林谋盛。

在经济上援助抗日战争，马来亚华人发动赈款支持中国抗战，捐赠方式有很多种，分别为特别捐、月捐和义卖运动。其中南洋华侨筹赈总会最有组织领导，它根据各地区人数和经济状况确定月捐数目，在新加坡召集南洋侨领开会时，认定新加坡常月捐国币40万元，马来西亚认定月捐国币130余万元。当时国民党中央社有一评述：“各地捐款最多者为马来半岛，人数少而捐款多者为英国、菲律宾及南非三地侨胞。个人捐款最多者为胡文虎，最热心者为仰光侨胞叶秋莲女士。该女士尽将所有首饰财产变卖，以捐助政府，而自己则入寺为尼。团体最热心者为侨美致公会。该会曾以会所6处拍卖，得价全数捐政府”。

祖籍福建厦门同安的新加坡华人领袖陈嘉庚也创办《南洋商报》，大力主张国内全面抵抗，“七七”之后更是每天大篇幅报道抗战新闻，激励海外华人出钱出力支援中国抗日。从抗战爆发到星马沦陷前的4年多时间里，“南

侨总会”以义捐、认购国民政府战争公债、向国内亲友寄侨汇、捐赠药品、募集衣物等形式，为中国筹款达54亿国币之多，占全世界华人赈款的2/3以上，当时4万5千国币就可购军机一架，这些巨款填补了国内近半数的战争开支。

在人力上援助上，新加坡华人领袖陈嘉庚的号召下，马来亚华人机工前往滇缅公路，抢运抗战物资，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运输45万多吨物资往抗战后方。在这条公路，估计有1000多名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人机工在滇缅公路牺牲生命。

马来亚沦陷后，中国和英国政府组织136部队，许多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也投身太平洋战争。136部队负责联络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及增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军火物资供应。领导136部队的是新加坡著名抗日英雄林谋盛。

1942年日军占领马来亚后，2月16日，日军进入新加坡市区后，随即开始以屠杀华人抗日分子为主要目的的“大验证”行动，命令男性华人“听候良民登记”。在“验证”中，几乎每一个华人都受到了日寇的严厉审问，各界华人成功人士更是日军迫害的重点对象。

马来西亚目前拥有无数散落在各地的抗日纪念碑，最著名的是建于一九四八年的马六甲三保山（Bukit Cina）“马六甲华人抗日殉难义士纪念碑”。这是无数纪念3年零8个月的日子被日军残杀的华人的纪念碑之一。碑柱上刻着由蒋中正所题的“忠贞足式”四个大字。檳城州亚依淡（Ayeh Itam）附近也有一座马来亚华人机工纪念碑。

马来亚独立后

华人与现代中国

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政治上马来亚华人已经和中国大陆划定界限。由于政治上的对抗，马来亚政府限制华人访问中国大陆和看亲。这虽然造成

一种障碍，却不影响有限制的贸易和经济来往。马来亚华人访问中国大陆的限制延续到1989年马来西亚政府和平解决马来亚共产党叛变问题后才取消。除了政治问题之外，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后，为了避免其他种族的猜疑，马来西亚华人对涉及中国的课题上都保持沉默。

虽然英国早在1950年元旦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马来亚1957年独立后却因为马来亚共产党叛变问题而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建交。这段外交关系一直维持到1974年马来西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为止。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6%96%B0%E5%8A%A0%E5%9D%A1%E5%8E%86%E5%8F%B2>

新加坡历史可追溯至11世纪，该岛开始被重视是14世纪三佛齐王子拜里米苏拉建立马六甲苏丹王朝将其建设成港口，并于1613年被焚毁。新加坡现代历史要追溯至1819年英国人史丹福·莱佛士把该岛建设成港口，在英国治下该地茁壮成长成为重要的转口港，负责印度-中国以及东南亚间之贸易，进而使该地成为主要的海港城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加坡在1942年到1945年被大日本帝国所占领，当战争接近尾声之际新加坡重新为英国统治、也开始让新加坡自治；新加坡渴望加入马来亚联合邦并在1963年和该国一起建立马来西亚联邦；然而源于种族以及殖民地等遗留下来的问题，很快社会内部矛盾被各方激化，

促使人民行动党和掌握马来西亚政权的巫统产生歧见；最后马来西亚将新加坡逐出联邦，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成为独立的共和国。

在面临失业率高以及住屋不足的压力下，新加坡开始一连串的现代化过程，建立起轻工业、发展大型国宅以及重金投资在公共教育上，从独立后新加坡每年经济成长率高达9%以上，在1990年代该地成为世界最为繁荣的国家之列，伴随而来的是高度经济发展的自由市场经济、国际贸易，以及在亚洲仅次于西亚的国民平均所得。

早期历史

新加坡早期的历史记载并不多，使用的名字也各不相同。公元3世纪，马来人将新加坡的主岛命名为新加坡岛（Pulau Ujong），取意“（马来半岛）末端的岛屿”。东吴孙权时期交广刺史吕岱于243年派遣朱应、康泰南宣国化。康泰于归国后著《吴时外国传》记录出使南国时的经历的一百数十国的见闻，其中蒲罗中国就是Pulau Ujong 的对音，是新加坡最早的中文名称。后来，新加坡又被赋予“Negeri Selat”（海峡之邦）的别誉，因而先有早期的华人移民以“Selat”（海峡）为本源，呼其作“石叻”；后有士大夫在编撰相关书籍时，于《新唐书》中称“萨庐都”，在《宋史》中作“柴历亭”。

三佛齐时期

据史料记载，1320年，元朝派人到“龙牙门”（Selat Panikam）寻找大象；1325年，龙牙门派使臣到中国。而“龙牙门”就是今天的岷巴港（Keppel Harbour），位于新加坡南岸的海峡中。

1330年，中国元代航海家汪大渊首次来到新加坡，并在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将之称为“单马锡”，并留下“近年速古台王朝曾派七十多艘兵船攻打

单马锡，一月不下”的记录。1365年的《爪哇史颂》把新加坡叫做“Tamusik”，而绘制于1430年（明代宣德五年）的《郑和航海图》则称新加坡为“淡马锡”，类似的名字还出现在同一时期的一份越南文献上。显然，无论是“单马锡”、“淡马锡”、还是“Tamusik”，都是爪哇语Temasek”（海城）的对音，源自梵文“tamarasa”（黄金）。直到14世纪末，其梵文名字“Singha-pura”（狮城）才首次出现。

新加坡王国时期

满者伯夷时期

暹罗（今泰国）以及位于爪哇岛的满者伯夷（Madjapahit）曾争夺新加坡的控制权。根据马来文献《马来纪年》的记载，新加坡在一次与满者伯夷的战争中失败。因而于14世纪末被满者伯夷统治数十载。

马六甲时期

当时三佛齐被满者伯夷国攻占，三佛齐王子拜里米苏拉由巨港逃至淡马锡，杀了当地的暹罗摄政王，并自己宣布成为新加坡的新统治者。五年后，他因暹罗的威胁而逃亡马来半岛上的麻坡，然后到了马六甲，建立马六甲苏丹王朝。新加坡自此成为该苏丹国中重要的一部分，于15世纪初至16世纪初被马六甲统治。

柔佛王朝时期

在1511年以前，柔佛是马六甲王朝领土的一部分。1511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柔佛王朝因此而成立，新加坡属其统治。1613年，亚齐苏丹国入侵柔佛，焚毁新加坡河河口的据点。此后两个世纪内没有关于新加坡的史料。

开埠

18世纪中叶，英国正在扩张其在印度的版图以及与中国贸易。他们急需找到一个能够让其船只停泊、维修的港口，以在与荷兰人的贸易竞争中取得优势。因此，他们于1786年和1819年分别在檳城和新加坡建立贸易站。

1818年末，印度总督哈斯丁勋爵（Lord Hastings），决定授权明古连总督斯坦福·莱佛士爵士在马来半岛的南端建立一个新的贸易港。1819年1月29日，莱佛士在考察附近岛屿后登陆新加坡。第二天，他就与天猛公签订初步的协定，在当地建立一个贸易港。然而，天猛公是实际的统治者，新加坡仍是柔佛-廖内-龙牙马来苏丹国的一部分。柔佛苏丹阿都拉曼在前一年已经和荷兰人签订条约，他的王国其实已经处于荷兰的统治之下。显然莱佛士面临的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但是，莱佛士知道柔佛内部对这位新苏丹的合法性有很大的分歧。阿都拉曼只是前一位苏丹的小儿子。莱佛士成功地将被流放的长子东姑胡申偷渡回新加坡。1819年2月6日，莱佛士宣布东姑胡申成为受大英帝国所承认的柔佛苏丹。一份新的正式条约签署，授权英国在新加坡合法地设立工厂。该举动遭到荷兰的马六甲以及爪哇总督的强烈抗议。

在1819年8月之前，英国政府并不知道莱佛士与荷兰人的冲突。而当他们知晓时，新加坡已经成为英国重要的一块殖民地。而且，英国曾经在拿破仑战争中对荷兰施与援助。到1820年时，新加坡开始为英帝国产生利润，三年后，新加坡的贸易额已经超过檳城。1824年，新加坡的殖民地地位进一步地得到确立，2个新的条约正式签署。

第一个是1824年3月的《英荷条约》。根据此条约，荷兰撤销所有对英国占领马来半岛、新加坡的反对意见，并将他们在马来半岛和印度的所有殖民地让给英国人。作为回报，英国同意将其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让给荷兰。两国在马六甲海峡中划出一条分界线，两国各自取其南北两端。英国也依此条约从荷兰手中获得马六甲。该条约也有效地削减柔佛苏丹国的影响力，它的国土被分成三份：位于马来半岛的柔佛（仍属苏丹管辖），新加

坡（已经正式属于英国），和廖内群岛（由荷兰控制，今为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

第二个条约是8月与新苏丹东姑胡申和天猛公签订的，两个人同意将岛屿的管辖权让给英国，而因此他们获得更多的现金回报。

英属时期（1819-1942）

新加坡、马六甲和檳城这三个英国位于马来半岛的殖民地，于1826年成为海峡殖民地，受到英属印度当局的管辖。1832年，新加坡成为海峡殖民地的政府所在地。1867年4月1日，海峡殖民地正式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由位于伦敦的殖民地办公室直接管辖。

随着1860年代中蒸汽船的发展以及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新加坡成为航行于东亚和欧洲之间船只的重要停泊港口。1870年代前后，随着当地橡胶种植业的发展，新加坡也成为全球主要的橡胶出口及加工基地。到19世纪末，新加坡获得前所未有的繁荣，1873年到1913年间，当地的贸易增长八倍。经济的发展也吸引区域内的移民。到1860年，人口已经增长到80,792，其中华人占到61.9%，马来人和印度人分别占13.5%和16.05%，其他人种，包括欧洲人，则占到8.5%。

殖民政府采取许多措施来解决新加坡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于1877年委派威廉·必麒麟出任华人保护府，照顾新加坡华族社群的需要，尤其是控制苦力（俗称“猪仔”）的非法贸易和阻止妇女沦为妓女。1889年，总督史密斯禁止所有的私会党。虽然如此，许多社会问题，如住屋短缺和卫生水平低下，一直到二战时仍未改善。1906年，由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新加坡设立南洋分会；一时间，南洋华侨踊跃的捐款，间接支持该会的革命活动。

新加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唯一一起事件是1915年的印度兵起义。驻扎在新加坡的印度穆斯林士兵听说将被派去攻打奥斯曼帝

国后，他们将兵营里的英国军官全部杀害，准备起义。殖民政府从缅甸和柔佛调来军队，才镇压起义。一战结束后，英国在新加坡斥资五亿修建一个海军基地。这个海军基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船坞，并储存着能够支持整个大英帝国海军六个月的油库。之后，政府又建一个空军基地，协助保护海军基地。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称新加坡为“东方的直布罗陀”。可惜的是，这个海军基地并没有任何战舰。英国的策略是将英国皇家海军全部驻扎在欧洲，在新加坡有需要时才遣航过来。

日占时期（1942-1945）

1941年12月7日，日本攻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开启。日本的目标是要通过攻占东南亚，来取得当地的天然资源，以应付自身的战争需要，而马来半岛是块富产资源的土地（盛产锡、橡胶）。另外作为英国在东南亚的政治经济中心，日军必须要拿下新加坡才可以彻底把英国赶出东南亚。在日军发动马来亚战役前，英国参谋认为日军无法穿过马来半岛浓密的森林，所以日军会选择从南部海域攻击新加坡；同时，英军也坚信新加坡是座堡垒，能够承受日军的攻击。

日军于1941年12月8日（为珍珠港事件隔天）开始入侵马来半岛（史称马来亚战役），首先在马来半岛北端暹罗领地北大年府登陆并且击退驻守该地的暹罗宪兵，目标是向西南越过马来—暹罗边境进攻马来半岛西部地区，同年12月11日亦有一支日军在马来亚北部的哥打峇鲁登陆，这与日军在暹罗的北大年府及宋卡港所实施的登陆行动相配合。

英国皇家海军派来Z舰队包括航空母舰不挠号、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却敌号、及4艘驱逐舰，该舰队在战争爆发前已到达该区并由海军上将汤马·鄺·菲利浦斯指挥，目的是拦截准备登陆哥打峇鲁的日军，但是不幸地该舰队航空母舰不挠号在途中搁浅，不得不回航，由于日军拥有空中优势，导致英国皇家海军于1941年12月10日威尔士亲王号及却敌号被日军轰炸机在彭亨、关丹外海击沉，这使得英属马来半岛的东海岸门户大开，英国皇

家海军远东舰队经此役后更无力对抗日军的登陆行动。

日军利用快报废老旧轻型坦克快速地突破驻守在丛林里面的英军伞兵坑防线，因为在马来半岛上英军连一台坦克都没有，坦克被英军参谋认为不适合在丛林地形作战，故英军在马来半岛上没有配置坦克。当时拥有9万余人占人数优势的马来半岛驻守英军却持续败退，最后不得已只能撤至新加坡岛，撤退时英军顺势将连接马来半岛和新加坡两地的柔佛长堤炸毁、隔绝两地，让整个新加坡岛瞬间变成一座要塞方便防守。1942年1月31日，战争开始仅55天，日军占领整个马来亚半岛。

1942年2月1日，负责指挥日军的陆军中将山下奉文采用声东击西战术先派一部队在新加坡岛东北部假装进攻，成功吸引驻守在该岛上英军的注意力，然后在新加坡岛西北部的日军趁机用充气皮艇渡过柔佛海峡并在裕廊登陆。日军受到星华义勇军和盟军的联手抵抗，揭开新加坡保卫战的序幕。1942年2月13日，日军第18师以猛烈火力攻打鸦片山，爆发鸦片山战役，是为日军攻打新加坡最激烈的一次战斗。由于日军第一次攻击失败，战亡400人，所以决定乔装成英国印度兵。守军于鸦片山上、仅剩42人的第一马来军团的阿南·宾·赛迪上士识破敌人的诈术，对日军展开攻击。最后，马来军团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阿南上士遭俘虏。日军为了泄愤，把阿南的四肢砍掉，并将他用麻袋装起来倒挂在树上，用刺刀朝他刺了几十刀。阿南死时仅27岁。

白思华中将率领士兵向日军投降

1942年2月15日（时值农历新年），英国陆军白思华中将向大日本帝国陆军的山下奉文中将签署无条件投降同意书。新加坡岛上总数约12万余人的英军顿时成为俘虏，负责进攻的3万人日军却只有9千6百余人战死或失踪，日军以大约8个星期的时间就成功占领马来亚半岛和新加坡，当中许多被俘英军士兵遭遣送到缅甸、日本、朝鲜、满洲国等地修盖铁路。之后，日本将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行政上称作“昭南特别市”。同年2月18日至25日，

为报复星华义勇军和先前支持中国抗日的新加坡华侨，日军开展以“大检证”为名的肃清行动，并分别在大坡、小坡、芽笼、后港、裕廊等几个区域进行。最后，日军抓走约二万多人，当中绝大多数都被带到偏远的海边予以集体枪杀，剩下则被送到暹罗做苦工、建造“死亡铁路”。

日军还勒索南洋华侨，要华侨交出五千万元俸纳金。山下奉文当时给的理由是：“华侨支持重庆政府抗日，这笔俸纳金，是你们向日军赎罪的买命钱。”日本人成立南洋华侨协会，要七十多岁的华侨长老林文庆博士担任会长，并要他以协会的名义去筹钱。新加坡要负责一千万元。

由于资源严重缺乏，米价从一斤五元涨到五千元。于是，日本军政府定量供应粮食，成人每月可领4.8公斤，儿童2.4公斤，致使许多民众不得不在自家花园里种植木薯、番薯、香蕉等农作物。同时，政府也发行新的军用票（俗称“香蕉票”），使其与殖民地时代的叻币同值使用。可是随着军政府的滥印钞票，其价值贬到100叻币可换2380元军用票。讽刺的是，日军投降日是华人的中元节，许多人索性将军用票当作冥纸，烧给先人鬼魂。

随着日本投降，新加坡人民无不高兴。由于英军尚未抵达新加坡，这里仍由日军管理。但是日本的战败导致这些原本作威作福的士兵失去威信，新加坡已经差不多进入无政府状态。当年替日本人做汉奸的人都遭到仇杀；商店遭洗劫一空；日本军营遭焚，民不聊生。最终，1945年9月12日，在政府大厦举行受降仪式。代表新加坡的是东南亚联军总司令路易斯·蒙巴顿将军，日方则本来是由南方日军总司令寺内寿一签字，但是因为他在西贡病倒，所以改由马来亚区总司令坂垣征四郎代替。

虽然英军的回来受到人民的欢迎，但是他们的威信已大不如前。在人民的眼里，他们已经不是那么至高无上。

迈向自治与合并（1945-1963）

1945年9月，英军回到新加坡，英国开始实行军事管治。1946年3月，军管

结束，海峡殖民地也正式解散。1946年4月1日，新加坡成为直辖殖民地，而槟城和马六甲则成为马来亚联盟的一部分。1948年，槟城和马六甲成为马来亚联合邦的一部分。

战后的新加坡已经与战前大不相同，人民要求在政府中有更大的发言权。总督的权力被分散，一个由官方人士及被任命的非官方人士组成的顾问组成立。该体系于1947年7月变为两个分开的行政及立法会议。虽然总督依然拥有很大的权力，但是人民已经有权选出立法会议中的6名成员。

1948年6月，由于马来亚共产党企图使用武力夺取马来亚及新加坡的政权，新加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持续长达12年。到1953年底，英国政府任命一个由蓝带尔爵士率领的考察组重新评估新加坡的宪法地位，并提供相关建议。政府最后接受蓝带尔的建议，并最终修改新加坡的宪法，赋予新加坡更大程度的自治。

1955年的选举是新加坡历史上第一次重要的政治事件。新的登记制度使原本只有75,000人的合格选民增加到三十万人。而且华人选民的数量首次大幅度增加。最后，劳工阵线取得10个席位。大卫·马绍尔于1955年4月6日成为新加坡的首任首席部长。他领导的劳工阵线与巫统及马华公会组成联合政府。

马绍尔在作为首席部长期间经历许多困难。1955年5月，福利车厂事件爆发。林清祥和方水双等工会领袖要求福利巴士公司加薪，在公司拒绝后开始暴乱，焚烧车厂内的巴士。这场暴乱还获得新加坡的华校的支持。最后政府动用水炮和催泪弹才驱走暴民。在1955年期间，共产党人共发动275起示威活动和暴乱。

在与伦敦政府关于新加坡完全自治的宪制谈判破裂后，马绍尔于1956年6月6日辞职，由劳工部长林有福出任新的首席部长。1957年3月由林有福组成

代表团，成功在伦敦与英国达成协议：英国政府同意让新加坡作为一个自治邦，在英联邦之内实行自治，和给予新加坡更多权力等。1958年5月28日，双方在伦敦正式签字。

1959年，新加坡取得完全自治。同年5月30日，新加坡第一次举行大选，选举第一届完全民选的立法会的51名成员。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获得43席，成为最大党。同年6月3日，新加坡宣布实行内部自治。同年6月5日，新加坡最后一任总督顾德爵士宣布新宪法生效，新加坡成为自治领，他本人续任首任自治邦元首，李光耀则是成为自治邦总理。

新政府成立后，李光耀决定释放被林有福政府关在樟宜监狱的亲共政治犯，如林清祥、蒂凡那、方水双等人。他们在出狱后，都表明接受行动党现任中央委员会的领导。

1961年5月27日，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公布想把新加坡、马来亚、文莱、砂拉越和北婆罗洲（沙巴）联合起来组成联邦。这是因为随着新加坡政局不稳定，东姑害怕新加坡有朝一日会被共产党人占据，利用新加坡作为基地对马来亚展开行动，使马来亚之前对抗马来亚共产党成果功亏一篑。

人民行动党支持合并，但是党内亲共人士怕合并会对他们不利，所以林清祥等13人脱离行动党，成立社会主义阵线，反对合并。对此，李光耀决定在1962年9月1日举行全民投票。选票上有三个选项：

1. 我支持合并，新加坡获得劳工、教育和其他议定事项的自主权，同时新加坡公民自动成为马来西亚公民。
2. 我支持全部及无条件的合并，新加坡应以一州的地位，根据马来亚联合邦的宪法文件，与其他十一州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合并。
3. 我支持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条件应不逊于婆罗洲地区所获得者。

选票上没有反对合并的选项，社阵只能要求人民投空白票。最后71%的人支持第一个选项，只有26%的人响应社阵号召，投空白票。1963年2月，李光耀在英国及马来西亚支持下，发动冷藏行动，多位社会主义阵线人士遭逮捕下狱。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领土包括新加坡、马来亚、砂拉越和沙巴。文莱因为国内发生叛乱活动而拒绝合并献议。

印尼和菲律宾反对合并。印尼总统苏卡诺对北婆罗洲地区有野心，同时认为马来西亚的成立是英国帝国主义的表现。1963年1月20日，苏卡诺开始对马来西亚展开“对抗”。菲律宾政府认为沙巴是属于苏禄管辖，因此应该是菲律宾的领土。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后来承认沙巴是马国的。但是印尼的对抗活动到1966年8月苏卡诺被推翻后才结束。

英国1956年主张在远东部署核武对抗共产势力，1958年决定在新加坡秘密兴建核武库，1962年送原子弹到新加坡，次年投掷训练。军事评论员黄东认为，60年代印尼总统苏卡诺亲共，英国在新加坡部署核武制衡印尼。

马来西亚时期（1963-1965）

合并后，新加坡开始和联邦政府发生矛盾，对治国方针也有不同的看法。1963年12月21日，新马政府之间第一次发生公开矛盾。总理李光耀批评马来西亚的年度预算案没有给予提升社会状况足够的预算。新加坡在合并前，和马来亚政府谈判时，就提到设立单一市场。马来亚政府当时也同意在合并后逐步实行单一市场政策，条件是新加坡要给砂拉越和沙巴贷款一亿五千万美元，在15年内还清。新加坡因此希望在合并后能够加强贸易。但是，由于印尼实行对抗，使得新加坡的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也没有实行单一市场的进展，于是新加坡决定延迟贷款。双方都称对方在拖延时间，不遵守承诺。新加坡的商人也开始投诉联邦政府歧视他们，没有给他们和其他州属一样的利益，反而对他们实行固打制。

双边经济的矛盾在1964年12月，联邦政府要求新加坡将上缴联邦的税收从

40%增加到60%后升温。当时马国财政部长陈修信说这是因为印尼的对抗活动而导致军备预算案增加。新加坡则认为这对自己不公平，因为其他州属并没有因此增加缴税。

同月，联邦政府宣布将关闭新加坡的中国银行分行，原因是中国银行在资助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活动。由于该银行对新中贸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新加坡极力反对。但是，联邦政府还是宣布要在1965年7月关闭银行。

两地在政治上也有冲突。1963年，由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的联盟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参加新加坡州选举。然而，联盟不仅未添一席，原本控制的芽笼士乃、甘榜景万岸和南部岛屿这三个选区也被人民行动党夺取。事实上，这场大选不像是联盟和行动党的竞争，更像是社阵和行动党的竞争。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对此表示非常失望，甚至亲自来新加坡表达不满。联盟原先以为新加坡的马来人会支持他们，结果大失所望。

1964年，行动党参加联邦选举。他们认为既然联盟可以在泛马来亚的名义下参选，行动党应该也可以这么做。从一开始，行动党只表达对马华的挑战，而不是巫统。行动党认为他们如果在联盟内会比马华更有作为。然而，巫统把行动党的参选看成对国内马来人的统治地位的挑战。最后，行动党由蒂凡那赢得一席，成为马国会最大反对党（行动党在新加坡州议席有12个，总共有13个议席）。巫统和行动党的冲突加深。而此时期在马来西亚其他州属的行动党党部，正是今日民主行动党的前身。

巫统内部一些激进的领袖开始抹黑行动党，说行动党的政策导致许多马来人流离失所，贫困和低教育，是个华族政党。新加坡的华人和马来人原来的和睦也开始淡化，种族冲突最后于1964年7月21日，先知穆罕默德的诞辰，在芽笼爆发。当天，25000名马来族游行本来是要沿着芽笼路走到一所清真寺，路上由于有一群人走散，华族警员于是叫他们归队。那群马来人不满，就将他痛殴一顿。消息传出去后，华人开始在街上殴打马来人，种族暴乱开始。政府开始从联邦政府请来镇暴警察，但是由于警察偏袒马

来人，当解严后，有23人死亡，454人受伤。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新加坡州总理李光耀、马来西亚副首相阿都拉萨都来新加坡巡视，安抚民心。

然而，1964年9月，由于印尼特务的挑拨离间，新加坡又发生种族暴乱。印尼特务将一名马来族三轮车夫谋害后逃走，马来人认为是华人干下的，所以展开报复行动。共有12人死亡，109人受伤。巫统内的极端分子将李光耀比喻成马来西亚的公敌。双边关系持续恶化。

新加坡独立

1965年5月，行动党和其他主要的反对党成立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要求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巫统党内激进人士非常不满李光耀的行为，甚至要求东姑将他逮捕。东姑怕纷争将会进一步恶化，决定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8月9日，马来西亚国会以126票赞成、0票反对，同意将新加坡驱逐出联邦，李光耀为此落泪。新加坡共和国正式成立，李光耀为总理，尤索夫·伊萨为总统。

新加坡共和国（1965至今）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8月9日）后，由于担忧印马对抗中，印尼可能进行攻击，以及马来西亚内部巫统保守派反对分离协议而使得新加坡沦为傀儡国、或以不利的协议再度融入联邦的威胁，新加坡积极寻求国际承认，并于1965年9月21日加入联合国。同年10月，新加坡加入英联邦。1967年8月8日，新加坡协助成立东盟组织。1975年，邓小平暂时上台主政，最后决定参访并承认新加坡。（邓小平欲学习新加坡模式）

作为一个蕞尔小国，世界对于新加坡是否能继续存在表示疑问。除了主权纠纷，其它重要的问题包括住宅短缺，缺乏土地与天然资源短缺。失业率当时高达12%。社会主义阵线当时也宣布进行民主抗争，抵制议会，动乱随时会发生。

新加坡开始一连串的措施，发展工业及经济。于1961年设立的经济发展局致力于实行国家经济发展方针，重视新加坡的制造业。裕廊工业区于1968年成立，除此之外在加冷、红山和大巴窑等地也建立轻工业基地。为了吸引外资，政府决定给予外国企业优惠。同年，经济发展局重组，裕廊镇管理局以及新加坡发展银行也在该年成立。工业化之迅速使得新加坡的制造业在十年内成为世界主要电子产品出口国。作为世界主要的港口，新加坡成功吸引著名的石油公司，如壳牌公司和埃克森美孚，成为世界第三大炼油国。为了提供更有竞争力的工作团队，新加坡教育部决定使用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

住房问题被放在首位。1961年，河水山的平民窟发生大火，多达16000人流离失所。建屋发展局负责建筑所有的政府组屋，廉价提供给民众。直到今天，建屋发展局仍然为新加坡建造组屋和新镇，超过80%以上的居民居住在组屋里。

进入1980年代的新加坡经济发展迅速，政局稳定。失业率低至3%，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8%。这时的新加坡开始将目光转移到芯片制造业以及其它高科技产业，以和邻国的廉价劳动力抗衡。樟宜机场于1981年开幕，新航也成为区域主要航空公司。旅游业和服务业蓬勃发展。

然而新加坡政治舞台却被人民行动党所主宰。从1966年到1981年，人民行动党甚至占据整个国会。执政党经常利用各种司法程序，压制反对派的声音。比较著名的反对党政治人物包括J. B. 惹耶勒南和徐顺全（同样也因诽谤被判破产）。

八十年代，总理李光耀以年青一代选民在投票时，往往不太重视在国会里维持少数种族代表的重要性为由，提出集选区的构想，把原有单议席单票制的选举制度，改为两种选区的选举制度，一种为单议席单票制选区，一种为中选区有四至六席，候选人中必须至少有一人属于少数族群，以名单投票制，赢者全取该选区所有议席。这就是所谓集选区制度。有人认为，

集选区制度对反对党不利；集选区制度从1988年选举集选区设立至2011年选举，反对党没有从集选区得到过席次。同时，李光耀政府设立“非选区议员（即委任议员）”的制度，如国会内反对党民选议员少于某个数字，可以委任反对党的人出任非选区议员，补足这个数字，但非选区议员在国会中可以自由发言，不能对宪法修正案、拨款法案或补充拨款法案、关系到政府的财政法案以及对政府提出不信任等的动议，投票作出表决。以上两种制度，被视为人民行动党进一步压缩反对党空间的政策。

1990年李光耀卸下总理职务，由吴作栋继任总理，2004年吴作栋卸下总理职务，由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继任总理。

2006年5月6日，由总理李显龙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胜利，在总共84个议席中获得82席，另外2个议席仍被新加坡工人党和新加坡民主联盟所保留。

2011年由总理李显龙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胜利，保住执政权，而新加坡工人党既保存自己现有的一个单议席选区的席次，现任议员刘程强转跑道出战阿裕尼集选区，成功击败人民行动党外交部长杨荣文的团队，攻下一个集选区。为新加坡史上第一个由反对党当选的集选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AE%AE%E5%8D%8A%E5%B3%B6%E5%9F%BA%E7%9D%A3%E6%95%99>

朝鲜半岛基督教

韩战结束以后的20世纪下半叶，韩国的基督教迅速发展（包含天主教、新教等宗派），信徒数量持续多年呈爆炸性的增长。目前新教和天主教分别有信徒860万人和510万人。

韩国首都首尔是全国基督教的大本营，教堂林立，拥有世界上最大的12个基督教堂会中的11个。夜间无数闪烁霓虹灯的十字架是该市的突出景观。韩国天主教会也是世界上成年人信仰皈依最多的教会，每年都有超过15万以上的成人进教。

现在韩国教会还在海外进行传教活动，是世界上第2大传教士派出国（仅次于美国）。

另外，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派别——文鲜明的统一教扩展也很迅速。

基督教在教育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延世大学是韩国享有盛誉的常春藤盟校

之一。基督教对于韩国文化的影响显而易见。

许多韩国基督徒，包括赵镛基，规模庞大的汝矣岛纯福音教会牧师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1984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罗马封圣的韩国圣徒人数创一次性封圣的最高人数。韩国的天主教圣徒人数居世界第四位。

1945年以后，教会在朝鲜半岛只在南方（韩国）有影响力。在韩战以前，该国三分之二的基督徒分布在北方，但大部分都逃到了南方。统治朝鲜的社会主义政权政府反对一切宗教，故朝鲜基督徒实际人数不明。

目前在东亚各地中，相较于台湾、日本、蒙古及中国大陆境内，基督宗教依旧属于少数人信仰的宗教，在韩国的基督宗教势力就显得非常庞大，虽然韩国依旧以佛教或儒家信仰为主，但在政治方面以基督宗教的影响力最大，1987年韩国民主化后历任的韩国总统也多信仰基督宗教。

早期的挫折：1593-1784

基督教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历经许多挫折，才于1784年植根于朝鲜半岛土壤，直到20世纪，基督徒才在人口构成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起初阶段，基督教在朝鲜似乎没有什么前途，但最终被韩国社会所普遍接受。

最早来到韩国的基督徒是耶稣会神甫Gregorious de Céspedes，于朝鲜王朝宣祖四十二年（1593年）到达朝鲜向流亡在当地的日本人传教，但不被

允许向朝鲜人传教。10年以后，韩国使臣李光鍾从北京带回一张世界地图和利玛竇写的几本神学书籍。利玛竇著作立即激起学术界的争论；17世纪初，宫廷学者李睟光和大臣柳梦寅著书批评利玛竇著作。在随后的200年间，学术界对基督教信仰的批评持续不衰。

1644年清兵入关，昭显世子九月到十一月作为人质在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居住了70天，与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会面，了解西方科学技术、天主教，汤若望送他天文、数学、天主教书籍及地球仪、天主像等，昭显世子不胜欣喜，打算归故国后用于宫中，甚至颁行于世。汤若望同昭显世子商量以后决定以清朝皇帝名义下赐昭显世子带回朝鲜一些前明宦官和宫女，他们都是已受洗的天主教徒。昭显世子于1645年回国，当年5月21日暴毙昌庆宫欢庆殿，世子带来的西洋文物没有在朝鲜发挥影响，所有物品都在其死后被销毁，而信教的前明宦官李邦诏、张三畏、刘仲林、谷豊登、窦文芳和前明宫女也被遣返回中国。

增长的基础

这一时期朝鲜王朝闭关锁国，有大批帮助天主教传教士的朝鲜信徒殉道。其中最著名的是金大建神父，25岁时被处斩。

实学派学者的同情

一些学者比较同情基督教。实学派深受基督教的平等价值观所吸引。实学派提倡才学比出身更重要的观点常常受到反对，他们发现基督教可以支持他们的理论。因此天主教最终于1784年（正祖九年）传到朝鲜时得到了知

识份子的舆论支持 – 这对天主教信仰在1790年代的传播至关重要。1801年研究表明55%的天主教徒出身实学派家族有关。显然那时推动基督教增长的首要因素是同情基督教的少数士大夫。

使用谚文

基督徒对韩语和易学的谚文的使用激活了信仰在精英阶层以外的传播。此后谚文得到普及，而天主教会是第一个正式承认其价值的组织。早在1780年代，用谚文出版了一部分福音书，在1790年代用谚文出版了教义书籍如主教要旨，大约1800年用谚文出版了一本天主教赞美诗集。

新教和现代教育机构的建立

1884年，2位美国宣教士：亨利·阿本策勒（监理会）和元杜尤（Horace Grant Underwood，长老会）将新教传入韩国。1881年—1887年，在中国东北奉天的关东教会传教的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罗约翰（John Ross）牧师将圣经翻译成韩语。新教还建立了韩国第一个现代教育机构。长老会培材男校成立于1885年，监理会梨花女校成立于1886年。此后不久类似的学校纷纷成立，推动新教在平民中迅速扩展，这一时期新教超过天主教成为基督教在韩国的主流。

参与韩国爱国运动

在朝鲜日治时期，基督教与爱国运动的关联也是它被朝鲜人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时期朝鲜人遭受痛苦，700万人流亡国外。1938年，甚至韩

语也被宣布为非法。

1919年3月1日，33名宗教领袖和专业人士集会，通过了独立宣言（三一运动）。尽管是由天道教宗教领袖组织，但是33名签字者中有15人是基督徒——许多人后来被捕入狱。1939年还成立了著名的天主教独立运动义民团，一名监理会教徒李承晚成立了在中国的流亡政府。许多韩国人眼中把基督教与爱国事业联系在一起，拒绝参与当时强制推行的敬拜日本天皇仪式；尽管这主要是出于信仰原因而非政治原因，许多基督徒由于坚持信仰而入狱，在许多韩国人眼中，带有爱国主义和抵抗日本占领的意味。

基督教与韩国社会

基督教在韩国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中扮演重要角色。

文化教育

基督教对教育的早期影响前面已经提及。通过基督教文学的传播，教会团体所建立的学校，语音学和简单易学的谚文得到推广，使得人们识字率激增。虽然谚文早在1446年世宗大王时期就由宫廷学者们创制，但在几个世纪中基本没有广泛应用，书面上主要使用汉字。天主教会最先认识到谚文的价值，主教伯纽克斯（1886年殉难）命令向所有的教内儿童教习谚文。新教教会也把谚文读写能力作为领受圣餐的先决条件。妇女的识字率极大地提高，而传统上妇女没有机会接受正式教育。

可能的经济效果

韩国宪法保证宗教自由，实行政教分离，政府提倡基督教及佛教等宗教信仰，将宗教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壁垒。根据美国政府统计，1995年韩国大约26%的人口是基督徒。一个新教研究小组的1995年宗教年鉴认为比例高达40%。许多韩国基督徒认为其宗教信仰是韩国过去30年间戏剧性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相信成功和繁荣是上帝祝福的标志。统计数字的增长、庞大的组织和突出的建筑物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调查显示韩国基督徒在宗教方面非常活跃，每星期常常在出席聚会人数的百份比方面胜过美国的基督徒（美国约有30%-40%的人年每星期出席教堂）。

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可能是受到基督教影响最大的范畴。传统韩国社会是按照儒家学说的原则，按等级划分，并臣服于半人半神的天子之下，妇女毫无社会权利，儿女完全服从父母，个人权利必须由社会制度规定。这种社会结构受到基督教关于“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创世纪1章26-27节）及人具有绝对价值这一教导的根本挑战，强调私有财产权既与这一观念紧密相连。基督徒把皇帝看作仅仅是一个在上帝面前只代表他自己的个体，上帝的权威高于皇帝的权威。基督教价值观的传播也对解放妇女儿童作出了贡献。天主教会一开始（1784年）就允许妇女自由改嫁、禁止同居、纳妾，反对一夫多妻制，不准虐待、遗弃妻子；教会教导父母要把儿女当作上帝赐下的礼物，应当教育他们；不准包办小孩的婚姻，也不准重男轻女。

民众神学与人权抗争

基督教关于个人价值的观念是在长期的争取民主、人权的努力中找到其表

达方式的，近些年来，民众神学就是这种表达方式的体现。以“神的形象”这一概念为基础，结合韩国传统的“恨”观念，民众神学阐述了韩国人民是自己命运的合法主人的思想，并且同时强调民族独立与人权，它在韩国社会的左派和右派中都极具吸引力，两位著名的韩国政治领袖—金泳三、金大中都赞同民众神学的观点，两人都为反抗军人政府奋斗了几十年，经常被捕入狱。金泳三是长老会教徒，金大中是天主教徒，两人都在1988年韩国恢复民主之后先后担任总统。

民众神学的一次具体实践是在朴正熙主政的晚期，发生了几次基督教徒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示威运动，如天主教农民运动和（新教）城市产业工人运动，政府认为这些活动对社会安定是一种威胁，许多运动领导人遭到逮捕和关押。这些抗争运动正好处在那个普遍混乱的时期，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被刺杀，社会动荡发展到顶点。

争论

一些教会领袖因其品德等问题等而受外界批评，例如与教友发生婚外情。韩国基督教总联合会领袖张孝熙于2003年12月1日从办公室跳楼身亡其原因据说是与一名已婚女教友发生婚外情，并被该名女教友的丈夫撞破，这宗案件引起了公众注意。

另外在大型教会也曾出现一些以“父传子”形式移交教会拥有权及领导权的事件，不少基督徒均不接受这种做法。

一些比较极端的基要派基督徒曾被指强行对佛寺、庙宇、神像等进行破坏，其中一宗案例，是一群基要派基督徒破坏了一尊檀君像。

摘要

基督教经过将近200年不断的挫折，最终立足朝鲜半岛。起初只是“实学派”知识分子中间的一种世俗活动，他们把基督教作为其平等主义价值观的催化剂。经过与朝鲜文化互相融合、吸收，基督教有效的利用了其传统文化。日本40年占领期间，众多基督徒因拒绝崇拜天皇而被关押，朝鲜人对教会的鲜明性格及态度因此得到强化、坚固。这一立场使得朝鲜教徒们从此能够称基督教为“自己的信仰”，而不再是“外国宗教”。

展望

南韩从40年的独裁政治到1988年转变为自由、民主制度，让韩国教会迎来了新的挑战。教会所持坚定的民主、人权立场成为吸引民众的重要部分，也推动了韩国教会在70、80年代的成倍增长。在民主化后，基督教前所未有地成了一种权力机构，许多基督徒感到教会成了得胜后的牺牲品，自由繁荣导致普遍的满足现状(complacency)，教会的“锋芒”也磨钝了。近十年来教会增长速度放慢。

然而，21世纪后许多韩国基督徒重新确立了传福音的目标，那就是要把朝鲜半岛变成基督教在亚洲大陆的坚固堡垒，北朝鲜不可避免的在这一异像的范围之内，南韩教会正在制定应对意外事件的计划，准备为北方将来可能出现的政治、经济大崩溃提供宗教及人道主义援助。

<https://kknews.cc/history/jzxc59e.html>

韩国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国家？

文|游天婵

朝鲜半岛一向受儒家和佛教文化浸染颇深，并且统治者们对外来的基督教态度一向不好，曾多次对基督教徒实施迫害。1886年，朝鲜被迫与法国签署《朝法友好通商及航海条约》，基督教最终得到朝鲜政府的许可，变得公开化、合法化，传教士们终于可以安心传教，信徒的皈依也变得安全了。

从这之后到今天，韩国基督教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发展，在2014年，已经有30%的韩国人为基督徒，基督教的痕迹在韩国也随处可见，向人们述说着这里基督教的繁荣。在东亚各国基督教发展史上，韩国的成功没有出其右者，但这成功并非偶然，而与朝鲜半岛之前的内外形势密切相关。

1、本国宗教危机

基督教在韩国崛起之前，韩国的主要宗教有佛教、巫教和儒教。巫教也称萨满教，是韩国的本土宗教，通过巫师的狂舞和唱歌（就是我们所说的跳大神）来为人们祈福、摆脱厄运。传说中韩国的始祖檀君本身就是巫师，新罗王朝之前也一直是神政时代。虽然儒道释从中国传入朝鲜后，巫教有所衰落，但依然对韩国有着深远的影响。

巫教和佛教、儒教相比，它的宗教思想看起来并不成熟。它没有高级的宗教教理和经典，同时信仰万物有灵，希望能在神灵世界与人类世界间建立一种联系，它的祈求也是非常世俗化的，鲜有更高的追求。在儒教统治的时期，朝鲜的政治家们对巫教展开行动，将巫师降为贱民，禁止他们进入都城，不过巫教在百姓中一直相当流行，有个啥事人们还是愿意去求助巫师。渐渐地随着时间推移，巫教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存在，宗教色彩已经不明显，并且在韩国步入近代化后更是有很多人认为巫教是落后的迷信，甚至是发展的阻力，于是巫教生存空间大减，只能在韩国文化边缘寻找自己的位置。

佛教在新罗、高丽王朝时一直是国教，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和扶植，甚至王子和皇亲中也有出家为僧的。到了朝鲜王朝，太祖李成桂统一朝鲜半岛后尊儒排佛，出家人们一下子被降为贱民，所有的寺庙都被赶到山上。后来变本加厉，毁佛像造兵器，出家为僧被视为违反国家禁令。在朝鲜王朝5个世纪的统治中，任何复兴佛教的努力都遭到儒家学者和官员的强烈反对。尽管在16世纪末时佛教禅宗稍有恢复，但是佛教一直远离社会主流，没有整合社会、团结人心的力量。

这里说个题外话，中国一般不把儒家看成宗教，但是韩国学者认为儒家以四书五经为经典，并有各种祭祀仪式，有着一整套社会伦理道德规范，起着精神安慰作用，因此完全可以划为一种宗教。而韩国可以说是典型的儒教国家。高丽王朝之后，儒学就成为了官定的国学，到了朝鲜时代，儒教和程朱理学更是占了统治地位。国家的政治体制也同时在仿效中国，不过朝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日本逐步蚕食，西方势力也破门而入，封建势力力不从心，朝鲜社会的精神支柱儒教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另外，由于枯燥无味的儒学已经脱离民众，成为了各派勾心斗角的工具，对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吸引力，根本不能在民族危亡时期鼓舞士气，团结人民面对挑战。至于佛教和巫教，更是疲软无力。

由于这些传统宗教的逐渐衰落甚至崩溃，很多韩国人面临信仰危机，在信仰真空的情况下人们迫切地需要新的精神支柱，这就给基督教在韩国的兴起提供了契机，为其流行创造了足够的空间。

2、引入科学文化

基督教除了在朝鲜传播教义，还为朝鲜带去了现代科技、大众启蒙、现代思想等国家复兴急需的自强武器，其支持民主事业，为平民发声，致力于妇女平权，建立医疗机构改善了朝鲜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教会触及到了朝鲜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为整个社会带去了久违的新鲜空气。

为了拉近与百姓的距离，减少排斥和打击，很多传教士选择了免费治病施药的方法。很多民众切身体会到西方医学真的很“灵”，便逐步接受了传教士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身边人，进一步扩大了基督教的影响。而且西方

医学在韩国也随之推广，引起了人们医疗观念的变化，中医在社会的统治地位受到怀疑和动摇，在传教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医疗事业业进一步发展，他们的服务面向全社会，使得非信徒也对基督教会的印象非常友好。基督教也为朝鲜的公共卫生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修建孤儿院，建立了收容霍乱病人的收容所，抗击传染病，传播卫生观念，因此教会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拥护，吸纳了大量信徒，传教区域也扩大了。今天的延世大学最初诞生的时候就是一所由传教士华罗斯·安德伍德建立的孤儿院。

延世大学，由华罗斯·安德伍德创立，长老会传教士

在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后，各派教会积极活动，力求得到韩国大众的更多认同。在甲午战争到1910年被日本吞并的十几年间，韩人见识到了西方的强大和东方的衰落，对于西方有了浓厚的兴趣和相当的尊重，学习西方先进教育模式的活动也随之扩大。在当时的很多朝鲜人眼中，基督教最有益之处是传教士们带来平等教育的机会。这和在韩国传统的教育中只容纳贵族子弟是完全不同的。于是很多之前缺少教育机会的平民抓住机会，将孩子们送去教会学校，这使得基督教教会在广大朝鲜民众的支持下迅速增长。1901年至1910年间，基督教会设有专门学校4所（当时官立学校仅有3所），高等普通学校40所，普通学校601所，圣经学校33所。教会传教学校是一战前现代学校的雏形，战后许多韩国的领袖人物大都是从教会学校毕业，大韩民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就是其中之一。

基督教在韩国的女权运动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长期以来朝鲜妇女在父权社会中被多重势力压抑着，一直只能是男性的附庸，不管是在家庭

还是在社会都是被边缘化的。很多女性在和社会、教育机会等绝缘的情况下渴望与外面的交往机会，而基督教的平等自由思想以及基督教教会组织能够为她们提供场所和机会。这种情况很受传教士的重视，劳动阶级和妇女一向都是他们的重点传教对象。两方的意图十分合拍。很多妇女在走进教会施洗之后才拥有自己的名字，在教会中她们可以像男人一样地生活：她们可以担任主日学老师和义工，传教士也会挑选妇女执事或者培训牧师助手。

梨花女子大学

很多教派开展女子学校教育，给她们提供较好的职业。1886年监理会传教士玛丽·斯克兰顿创建了梨花女子学堂（后演变为梨花女子大学），取得很多教育成就。基督教从开始就给韩国女性提供了其它宗教从未给予过的学习、成长、自我奋斗的机会，这样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妇女中的基督教人数涨势大好，女人比男人更多地参与教会活动，在早期教会中，男女分坐走廊的两边，女人的坐席总是人满。

3、民族主义同盟

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朝鲜民众将基督教当成唯一的避难所，朝鲜近代民族主义得以形成，危机深重的韩民族把基督教信仰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希望反抗入侵者日本，基督教成为了抗日运动的温床。

基督徒领袖们成为了社会组织中带领人民起来反抗殖民主义领头人，教会

则是逃脱日本迫害的庇护所。基督教会中所支持的自由民主思想自然引起了殖民政府的担心，于是这被当作了政治问题。1909年一名朝鲜民族主义者刺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这件事被拿来做文章，日本于1911年制造了“105人阴谋事件”，日本军警编造理由对123名教会学校的师生进行抓捕，传教士也被指控煽动学生，因此也犯有阴谋罪。随后日本军警对新民会等民族主义组织大肆搜捕，七百多人被捕。在刺杀案后，殖民政府要求教会的学校和医院机构都必须符合总督府的标准，且学校正规课程中不能包含宗教课程，这道规定一下子就抹杀了大多数教会学校存在的理由，也使不管国内还是外国的教会都觉得压力山大，对日本统治者的敌意也越来越深，与民族主义者也愈发亲密。

1911年，日本殖民政府发布“教育令”，命令在韩国强制教授日语，韩国历史地理等课程被取消，许多学龄儿童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学校所教授的课程仅限于基础教育和初级技术等基本技能。这些都是为了弱化下一代的民族意识。对于舆论的控制更加严密，反日救国之言论被严厉打压。在这种情况下教会提出抗议，并成为了守卫韩国语言和文字的大本营，在教会人们坚持用韩语进行祈祷，将韩语传授给下一代，并扬起了反日的大旗。

伫立于塔洞公园的“三一运动”浮雕

1919年3月1日，韩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民族主义独立运动在全国爆发。大量的基督徒参与了进来，在各地组织抗议活动，并发表《独立宣言》，在这份宣言的33个签署者中有16名是基督徒。基督教是这场运动的中心，起领导作用的多为基督徒，集会场所多为基督教会堂，因此受残害最多的也是基督徒。“三一运动”使得基督教在韩国民众心目中的威望大大提高，反而

更加吸引民众入会。不过在这之后，日本政府越发觉得必须摧毁韩国的基督教不可，出台一系列严厉、洗脑的法令，基督教因此受了很多灾难，不过大腿却最终没能扭过胳膊，在压迫中，民众坚决拥护的基督教的斗争精神和生命力依然顽强地存在着。

对于韩国来说，基督教已不再是外来宗教，而是一种爱国爱族的宗教，已经融进了韩国的文化中，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了。

日本战败后，朝鲜半岛被划成两半。1948年，南北分别成立各自的政府。在1945年到1949年之间，北方的基督徒因惧怕北朝鲜当局的打击纷纷逃到南方。在之后发生的朝鲜战争中，基督徒被视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人民的公敌，北方军队所到之处，基督徒、传教团体遭受了残酷的对待。仗一打完，北朝鲜的基督徒聚会被驱散。经历过这些惨痛经历的北方基督徒不仅增长了南方基督教的势力，也更坚定地支持南韩政府，南韩政府报李投桃，也与基督教会关系非常好。

在这之后的发展中，基督教会的重要程度丝毫不减，在国家的各个方面都能看见他们。而且随着韩国经济起飞，韩国基督教会的影响力也随之更上一层楼。

<http://www.shen-guo.org/ever-blossoming-mugunghwa-s.html>

绵延绽放的无穷花

韩国教会历史发展特点

文 / 林敏雯

发表于/“神国资源为基督协会”《神国》杂志13期

朝鲜半岛，位于亚洲大陆的东北角，延伸探入海产丰饶的日本海及黄海
中，藉著长白山和鸭绿江的天然屏障，与中国为邻；隔著对马海峡，与日
本遥遥相望。在这块仍似依附大陆，却被山水孤立的土地上，孕育出一支
性情鲜豔、本质纯洁的民族。几千年来，纵使度过政治、经济、军事的动
乱，仍旧顽强屹立。宛如韩国国花无穷花，即使朝开暮谢，却绵延绽放，
代代承传。

也正是于此地，由郑斗源一人带进神救赎恩典的好消息，彷彿第一朵吐蕊
的无穷花，纵然转瞬消逝，却已将花信传开。期间经酷暑严冬，却拦不住
旺盛的生命力。两百多年后，虽然铁幕封锁半岛北部，无法得见锦簇。但
是半岛南部的大城小镇，街头巷尾，每当夜幕低垂，霓虹十字架一亮起，
恰似绵延绽放的无穷花，执著地散播基督馨香。

剪不断，理还乱——与中、日邻邦的关系

朝鲜半岛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山水为界，三面环海，足能为独立的社会与政权带来天然保卫，却仍与亚洲土地相连结，不可分割。此种情况，造成朝鲜与中、日邻邦的关系，祸福交错，益损纠结。

汉朝司马迁所著《史记》中，曾记载西元前十一世纪末，商朝结束之际，纣王的叔父箕子将当时的礼仪制度传进朝鲜半岛，使其成为周朝的诸侯。

▲朝鲜王朝的开国君主李成桂。

此后，即使汉武帝征服朝鲜，于半岛北部设立所谓「汉四郡」，却时有朝鲜人反抗，什至独立。当中国面对来自北方的匈奴、鲜卑的攻击，在朝鲜半岛的势力也相对减弱。经过势力整合，形成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鼎立的局面。唐、宋年间新罗与高丽先后统一朝鲜半岛；高丽王朝与宋朝关系密切，亦曾为元朝的藩属。西元1392年，明太祖时，李成桂建立李氏王朝，自太宗始受明朝册封。

1896年，清末宣统年间，俄国支持高宗登基，成立大韩帝国。1904年日俄战争后政权由日本掌控。1910年日韩签订条约，日本正式吞併朝鲜半岛，进行殖民统治。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朝鲜半岛由美国与苏联接收，以北纬卅八度线为界，划分南北韩。

综观韩国历史，因地处中、日之间，儒家思想中敬老尊贤的伦理持续影响现今社会，从语言中仍然使用许多敬语可知。汉字书写虽已少见，口语中仍可辨认许多中文、日文的片语，例如片纸（即便条、信箋），建物（同日文，即建築物）。

同时，朝鲜往往成为两国拓展势力的牺牲品。长期隶属中国，政权受牵制，例如元朝时利用朝鲜半岛为进攻日本的跳板。而一心向外扩张的日本，总是虎视眈眈，多次入侵，如1591年丰臣秀吉派兵入侵，一度占领平壤。

然而，福音传入朝鲜半岛，中、日却各自扮演关键角色。

千里寻真理

约在1631年，郑斗源在前往中国朝贡期间，初次接触天主教，从耶稣会教士处带回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所著《天主实义》（The True Doctrine of the Lord of Heaven）及许多关于天文、地理的书籍。1783年，李承薰前往中国，期望跟从天主教宣教士学习西方宗教。他不仅接受洗礼，更带回许多关于基督教义的书籍。天主教从此传开，在任何传教士抵达前，已从1795年的四千名教徒，六年内增加至一万名。

1883年，日本基督徒长阪由釜山登陆，把中文及日文圣经，以及韩文福音书和福音小册，带进朝鲜半岛，成为新教宣教的先锋。

与中、日宣教历史相较，韩国独特之处在于「自己将福音带回韩国」，而非由宣教士传入。并且不论天主教或新教，接触的起点都是圣经与福音书籍。之后新教信徒数目能成长迅速，很快超越天主教的主要原因，在于新教宣教士以韩文翻译圣经，平民百姓皆得以认识福音。韩文由十五世纪李氏王朝的世宗所创，是一套拼音字母，能简易地把口语化为文字。对照之下，天主教将圣经译为汉字，使得福音的传播受限于「两班贵族」（贵族出门带著前后两班随从，故此得名），因为汉字是上层社会菁英分子才识得的文字。

福音教育多层影响

早期宣教士传讲福音和教导真理，扎根于稳固的圣经基础。他们带著权柄和笃定相信的态度，震撼深受佛教、儒家，以及民间信仰影响的民众。并且从教会建立以来，不论领袖或平信徒，一定接受系统性的圣经课程。圣经班与主日崇拜、祷告会，成为固定的教会聚会。

每年且有一、两次圣经课程特会，为期两週。许多乡村地区的信徒自费来参加，为信徒奠定圣经知识的根基。而信徒为使用韩文圣经必须学习识字，更促使基督教在迅速深入民间的同时，无形中普遍提升人民的教育水平。

信徒具备了稳固的真理根基，在个人佈道时，能带著权柄讲述圣经，範圍也超越个人经历。一个家族从一人信主开始，通过社交、工作、地方的渠道，福音的无穷花接连吐蕊，紧接著家人、亲友、邻舍也一一归入基督名下。这是宣教学中所谓「群体归主运动」的最佳例證。

▲新教长老会的首位宣教士艾何瑞。

韩国人民并没有满足于识字，他们强烈的求知慾推动原有的圣经班，扩充教学内容，渐渐具有小学雏形，初中、高中也相继成立。这些基督教学校以教授西方学科为特色，包括英文、世界历史、科学等。1910年后，这些学校也成为与日本殖民教育相抗衡的主要力量。

诚如天主教东进朝鲜半岛，原是由一批渴求西方科学知识的学者引入。新教长老会的首位驻地宣教士艾何瑞（Horace N. Allen, 1858-1932），1884年抵达朝鲜半岛后，首要贡献是医术，而非信仰。

那时贵族分成的开化派与守旧派爭鬥不休，最后开化派结合日本军队的力量发动政变，称为「甲申政变」。艾何瑞医生治疗了受伤的贵族闵泳翊，所用的技术是当时韩国人前所未见的。因此艾医生很快得到信任及财务支援，顺利建立广惠院（取义「广泛施恩」），后改称济众院（取义「广泛助人」），是韩国第一所现代医疗机构，也是目前著名的延世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的前身。

延世大学以及随后成立的护理学校，在一般韩国人民心中，象徵现代科学知识，以致将基督教等同于现代化。许多慕名而来的学子在校期间，不仅求得知识，也认识真理，成为基督徒。而延世、崇实，以及梨花女子等基督教大学，也培养出一批菁英，进入韩国社会，成为教会及各个阶层的领袖。

敬拜真神的决心

韩国基督教历史，亦是血泪霑濡的殉道史。从传入之初，因为拒绝祭祀祖先，宣教士与信徒皆受到迫害。

日本吞併韩国后，更强迫神道崇拜，许多信徒坚决抵抗，因此遭受囚禁、酷刑，甚至丧失生命。教会面临如此苦难，非但没有苟且逃避，反倒站在独立运动的前线。1919年签署独立宣言的卅三位代表中，就有十五位是基督徒领袖。在韩国人民心中，基督教亦等同民族主义。

李仁宰牧师（1906-2000）的事迹，只是许多抗日基督徒共同历程其中之一。

仁宰受过传统教育，深受孔孟学说影响，于十八岁接触福音，发觉耶稣的教导胜于儒家思想，便立志跟随基督。中学毕业后任职地方政府书记，担

起抚养幼儿、照顾弟妹的责任。

然而，日本政府要求所有公立学校及机关崇拜神道。他当时必须决定，若是坚守基督信仰，原本看好的公职前途就此断送。1938年，正值盛年的仁宰义无反顾进入惟一的神学院，立定心志将余生奉献于扩展神的国度。

不久神学院遭关闭，李牧师与其他基督徒更积极反对神道崇拜，认为这是违反十诫里前三条命令，也是亵渎神的名。1940年，他与许多同工被捕入狱，承受不人道的待遇，甚至有同工因营养缺乏和疾病侵袭，枉死狱中。

1945年大韩民国独立，他得到释放；两年后完成神学教育，于1951年受按立成为牧师。1974年移民美国后，服事热诚并未稍减。近三十年间在芝加哥、新泽西、费城、丹佛（Denver）等地，共建立、牧养五间教会。

李牧师当年为拒绝神道崇拜而离开公职，此后一生清贫。即使后来成为牧师，只要有额外收入，便奉献予新兴的神学院。最小的儿子廷秀印象中，父亲总是伏案疾书，准备讲章；或手不释书，研读圣经；对真理的追求，孜孜不倦。廷秀表示，如此温柔，不善与人交往的人，「对道德和属灵真理，他绝不让步，绝不妥协。」

李牧师很少提及那五年的禁锢经历，并不认为那是什么特别的英雄行径。只是在讲道时勉励会众，他相信基督徒能在面对苦难时，慷慨殉道；每日

与基督同死，却是更大的荣耀。

李仁宰牧师最喜爱的经节，足以诠释他一生的服事，便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18节所述：「我们众人既然敞著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鲜明的信仰表现

白色象征纯洁，是传统韩服里衣，以及一般平民衣饰的颜色，正如韩国基督徒对信仰的专一。

而豔红、宝蓝、金黄、黛绿等鲜明多彩的韩服外袍，恰似韩国基督徒在服事及敬拜上对外展现的热诚。

早期宣教士积极接触韩国妇女。当时圣经课程、女子学校，对于妇女教育的提升影响深远，更培育出热心服事社会的领袖。1920年代，两位韩国女学生在参加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World Christian Student Federation）后萌发创办基督教女青年会（Young Women's Christians Association，简称YWCA）的意念，1926年已在首尔及其他几个城市成立分会。事工内容包括畜猪来筹募妇女福音基金，兴办幼稚园及打工妇女的夜间学校等；另开设青年会馆，让出门远行或离家求学的妇女有安全的住宿。

女青年会在1950年代韩战之后，设立寡妇之家、孤儿院、职业训练中心。种种事工正是信仰付诸行动的典范。

1907年，平壤中央教会开始的大复兴，宛若第一世纪圣灵降临的那个五旬节，会众齐声祷告、认罪。这次复兴不仅当时遍及全国，甚至为现代韩国教会的热情敬拜，定下标竿。赵镛基牧师创立的汝矣岛纯福音教会（Yoido Full Gospel Church），任何一场主日崇拜中，全场两万五千名信徒齐声向神呼求的震撼，足以使人领略圣灵之火的能力。

只要提及韩国教会，许多人的印象便是清晨祷告。不但许多信徒黎明即起，在上班、上学前至教会祷告，教会并在郊区设立祷告山，作为信徒较长时间灵修之地。原来自韩战爆发，许多北韓基督徒逃至南韩。南韩基督徒分享有限的粮食，以行动表现对主内肢体的爱心，并且同心于清晨前往教会祷告、禁食，这样的传统延续至今。可见如此持之以恒的祷告习惯，并非只在生活偶遭困难时的应急之道。

韩国教会重视宣教，宣教士人数高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请参阅本期「国度外展」单元的详尽报导。

在省思韩国教会历史，试图分析发展因由之际，确实发现许多历史及境遇的特点。福音的无穷花，由一人带进朝鲜半岛土地，屡经政权交替、国势动荡，却依然有人栽种、有人浇灌。韩国人民秉持对追求真理的执著，持

守信心的毅力，全力以赴的服事，以及活力奔放的敬拜之心，使得基督信仰至今绵延绽放，不仅开遍了韩国，更往地极散放馨香。

原来使徒保罗早已见证：「惟有神叫他生长。」（参哥林多前书3：6）

韩国基督徒是否仇日？

当年李仁宰牧师获释后不久，即拜访当初审问他和其他同工的日本法官鎌田。因为审问当中，法官曾问：「你相信日本是太阳神的后裔吗？」仁宰当时没有仔细思考，便回答「是」，后来觉得如此答案等于承认假神。他希望藉此机会向鎌田重申自己信奉独一真神，并向他传福音。

那时，鎌田法官非常害怕韩国人民的报复，但仍客气地接待仁宰，并为自己给李牧师带来的艰苦牢狱生活，诚恳地道歉。

根据李牧师自述，鎌田从自己所审判的韩国基督徒身上看见不屈不挠的信心，因而承认耶和華為真实、永活的神。仁宰鼓励他于返日后要相信神，鎌田欣然接受。

以父亲为例，李廷秀认为韩国基督徒并不仇视日本人，却希望历史正确记载日本军队的暴行。他承认日据时期，许多韩国基督徒迫切祷告，祈求日本帝国的毁灭。这是因为他们视日本为敌基督的象徵；所受的苦难如同末日。他们在二次大战期间及战后，最常研读、传讲启示录。对韩国基督徒而言，日本投降实具属灵真意，是神的胜利。

<http://production.lifejiezou.com/node.php?nid=14736>

悔改——韩国基督教是这样复兴的

作者：罗门牧师

近日发生的诸多事件让许多人的目光投向韩国。对于基督徒来说，韩国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宣教大国，但甚少人知道韩国是如何经历大复兴的。今天这篇文章就让大家了解历史上韩国基督教大复兴是如何发生的。

自1907年起至今(2007年)，圣灵的火从平壤的大同江边，到朝鲜半岛全地，到如今已经延烧了一百年。2005年，韩国政府公布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信奉佛教占22.8%，但信仰基督教(含天主教)超过28.3%，全球最大的教会韩国中央纯福音教会屹立在首尔汉江旁。但是韩国在过去的宣教历史中，曾经背负着流许多无辜人血的罪，因为许多宣教士和信徒，都曾被人心中的无知和残暴杀害殉道。

宣教士用生命撒下福音的种子

1866年至1871年有大规模的逼害(the Great Persecution)，12位法国籍

神父中有9名被捕处死，信徒则惨死了8000人（史称「丙寅邪狱」），而当年，基督教第一位殉道宣教士汤玛士牧师（Rev. Robert Thomas），也因乘坐美国船只运送圣经入境而被杀害。汤玛士牧师（Robert J. Thomas，1839-1866）是英国牧师的儿子，1863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伦敦宣教会成为宣教士，1866年8月，来到亚洲不到三年的汤玛士，得知有一艘叫「歇尔门将军号（General Sherman）」的商船要开往平壤，于是他以翻译员的身分带着许多中文圣经上了船。每停泊一处，他就分送圣经。

当时的朝鲜正值锁国，不与外国通商，结果开到平壤的歇尔门将军号在9月5日遭朝鲜军开炮攻击，船只搁浅随后又被朝鲜军用火焚烧，下船逃难的人一落地就被当场处死。但汤玛士却异常勇敢，不惧死亡，在船只被烧的时候，他开始拼命向外抛掷圣经、属灵书籍及福音单张。当他两支手臂抱满了书籍最后一个下船，蹒跚涉水上前，跪在一位军官及群众的面前，双手高举圣经要给他们，就在朝鲜人用棒棍将他打倒的那一刻，汤玛士将圣经塞入他们的手中。他们将他杀了，全然不知道汤玛士到朝鲜是要帮助他们，这位才27岁的年轻宣教士，带着基督的爱千里迢迢来到亚洲，好不容易抵达了朝鲜，却从此殉道在大同江边。这粒落在土里的麦子，最后结出了许多的子粒来。

那天在心碎的大同江边，11岁的黄明大（译名）和他的叔叔看到了汤玛士殉道的经过，汤玛士临终前高喊「耶稣！耶稣！」，他们当时不了解那是什么意思，回家前随手捡起了三本汤玛士丢出来的圣经。

崔致良（译名）也捡起了圣经，但他知道这是一本禁书，于是就将圣经交给了一位平壤的公务员朴永植（译名）。朴永植没有当场烧毁它，反而将圣经

带回了家，将圣经内页一张张撕下，涂上了浆糊贴在墙壁上当壁纸。感谢神，这本「壁纸圣经」最后让朴永植信了主，而交圣经给他又经常到他家串门子的崔致良也归信了基督。

那位捡圣经的少年黄明大后来成为大同江边「眺望里教会」的会友。而崔致良成为平壤「外野村教会」的长老。而那间贴壁纸圣经的房子，后来成为平壤第一间教会，就是1907年平壤大复兴的发源地——「章台砚教会」的前身。当年捡到汤玛士圣经的人，还有韩国第一位基督徒姐妹李信行，而拿到汤玛士最后一本圣经的朴春权，30年后，也成为一间教会的传道人。1893年宣教士（马布三悦）在平壤一带巡回建立教会，他发现许多涌进教会的人中，有不少人是因为当年拿到汤玛士所丢掷的圣经而信主的。

1876年，也就是距离汤姆士殉道的十年后，两位苏格兰宣教士在中国满州为第一位朝鲜基督徒受洗，并开始进行翻译朝鲜文圣经的工作，终于在1882年出版了朝鲜文的新约圣经。而在平壤大复兴前的二十年里，多达40多种流通朝鲜的汉字基督教小册子，也为大复兴修平了道路，这些小册子十分适合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朝鲜。朝鲜一直到1882年开始与外国建交后，才不再迫害传教的人。

尼维斯建立教会的理念

「尼维斯法」早期韩国宣教士唯一最重要的决定，就是采用尼维斯牧师（Rev. John Nevius）在山东所用过的方法。一八九0年他应邀至韩国，与

韩国的宣教士分享其看法。之后，他的原则就全然地被采用。简略地说，尼维斯法就是：

各人蒙召的时候是甚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林前七20）。尼维斯强调，基督教是为普通人预备的，也是经由圣灵赋予能力的普通人所传播的。尼维斯本人在中国大陆曾牧养过六十多个小礼拜堂、八百多个基督徒，却只用了两位支薪的助手。

教会所有的活动与工作必须鼓励由不支薪的平信徒来发展：工作必须只能发展到当地基督徒所愿意发展与维持的程度。完全仰赖国外力量所支持的工作必然要失败。同样的教会的工作更是大量的属于不支薪的信徒来从事。

让所有基督徒在家中开始新的教会：教堂只有在当地信徒经济能力许可下才被建造起来。如果他们负担不起，就继续在家里聚会，直到他们有能力建造自己的教会为止。在这种方式当中，教会从一开始就属于他们，宣教团体至终并不是教堂的所有人。

当教会成长且有能力之后，让他们从自己当中选出领袖：训练他们并支持他们作全时间的教会服事工作。如果他们无法支持一位全时间的工人，就让他们继续依靠义工和来自宣教士或其他国内工人不定期的教导访问。

强调系统性、长期的圣经教导：尼维斯认为主日讲章是用来教导，而非布道。在每个冬季，为教会领袖举行为期一个月的圣经班，这在农业社会是必要的。慕道友被接纳进入教会之前，要接受不支薪的平信徒领袖三个月至廿四个月的教导！教会强调背诵神的话语——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许多人不识字。正因强调这样的圣经班，才奠定了1907年韩国平壤大复兴的基础。

让现存的教会来培植所有新教会：必须由现存的韩国教会培植出新教会，宣教士只是从旁协助而已。

1903年，复兴的火焰开始在韩国点燃。当时从韩国东海岸群山（Gensan）来的哈迪（Hardie）博士，应邀在宣教士所举办的聚会中讲道，当他准备他的讲章时，圣灵借着约翰福音十四章和其他经文教导他很多事情。因着这篇信息，使在座的宣教士们大受激励，与会的韩国信徒也都受到圣灵的感动。后来，哈迪博士又周游十间韩国宣教中心，宣讲神给他的信息。到了1904年，已经有一万人归向基督。而这属灵的能力及复兴之火一直延续到1906年。

哈迪博士(Robert Hardie)曾对与会的宣教士们公开流泪忏悔：「其实我的心没有真正爱朝鲜人，每时每刻我都认为我比朝鲜人更优越，我倚靠医学院毕业的学历过于倚靠圣灵，见到朝鲜人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很不干净，认为他们的饮食和文化都是未开化的，我的心里是充满着这样的骄傲。」他将骄傲、心灵刚硬、信心不足等罪在众人面前悔改，韩国人心中一向认为西国宣教士都崇高无比，但哈迪竟然如此谦卑地悔改，这带给韩国信徒极大的冲击，也成为平壤大复兴的起始点。

痛悔—冬季查经祷告成为复兴的前奏

1906年的冬天，在平壤的宣教士们意识到当时政治的危机越来越严重，他们要怎么办呢？宣教士们什么都不能做，只能每周聚集查经祷告，寻求上帝的面。在查经会中，他们这才首度认清，只有圣灵的洗所带来的大能，才能使他们和朝鲜的弟兄们在未来遭受试炼的时刻站立得住。上帝感动朝鲜的教会不只是一定要饶恕日本人对朝鲜的伤害，为这份仇恨向上帝认罪，同时还需要更清楚的看见一切悖逆上帝的罪，因为，有许多人到教会来无心遵从上帝的旨意，对罪少有深切自责的心，总觉得那是习以为常的事。所有的教会若要成为圣洁，就必须认清上帝是圣洁的，于是在聚会中他们就更迫切的求上帝大大赐福给朝鲜的众教会，特别是赐福在这次平壤举办的冬季查经班。

在朝鲜复兴的工作中，查经班体系是一大特征。在一年中，每个教会都会指定一星期或更长的时间，完全用来查考圣经。这时候，所有工作会被搁在一旁。就如同犹太人守五旬节一样，朝鲜的基督徒也将这些日子分别为圣，专心用来祷告并查考上帝的话语。这种不受任何事物干扰的查经班带来了朝鲜教会灵里的活泼，也带来了真正从爱和服事开始的复兴。

另外与查经班同时进行的祷告会也是蒙福的重要管道，从1906年9月有廿多位宣教士每天中午都为复兴的临到祷告，当这样的祷告持续了一个月之后，有人建议停止这个祷告会，他说：「我们已经祷告了一个月，却没看见半点不寻常的事发生，花费这么多时间，我觉得不值得，还不如回到各

人平常的工作岗位，有空的时候各自在家祷告算了！」，但他们非但没有停止，反而花更多的时间在祷告上。由于这股执着与坚持，他们从中午十二点一直延长到下午四点，愿意的人还可以继续祷告到晚上。除了祷告之外并没有别的，如果任何人有激励的话，也可以在祷告中说出来。如此的祷告持续大约四个月之久，结果大家在主耶稣基督里都更加的合而为一了，彼此没有宗派的分别。教会真正的合一是用膝盖换来的；它必要持续到永远；它必要荣耀至高的神。

1907年一月十二日(周六)，宣教士威廉·布莱尔(W. N. Blair)在平壤的查经会中分享信息。他以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作肢体」跟会众分享主内肢体的信息——教会中若起争执，好比身体受伤一样。「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弟兄心存仇恨，不但伤害全教会，也给教会的头(基督)带来痛苦。会后有些人痛苦承认他对人缺乏爱，尤其是对日本人的仇恨。

1907年一月十四日(周一)中午，宣教士们再次聚集在神面前恳切的祷告，他们紧紧缠着神直到祂愿意赐下祝福，果然当天晚上的聚会大得释放。那天晚上会众同声同心开口祷告，灵里和谐，全场的祷告声如泉水滑落，并直达上帝的宝座。如使徒行传记着五旬节圣灵降临一样：「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房子。」那个夜晚，圣灵进入会场，祷告中传来阵阵哭泣声，过没多久，全会众都哭泣了起来。

就在这时候一位主持中央长老教会的吉长老突然站起来，说：「我就是亚干(书七1-6，廿二20；代上二7)，所以神的祝福因为我而无法降临。约在一年前，有个朋友于临终前嘱咐我说：『长老，我已将不久人世了。有

些遗产希望您能代我处理，因为内人实在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说：

「放心吧，我一定全力以赴！」我的确曾经竭诚帮助那位遗孀，可是却将其中的一百元放入自己的口袋中。我得罪了神，明天早上我立刻就把这一百元送还给那个寡妇！一时全场都愣住了。刹那间，拦阻神祝福的障碍物倒塌了！神的圣灵降临，会众认罪之声不绝于耳。

有一位牧师描述说：「会众们一个个站了起来，承认他的罪，然后，开始控制不住的哭了起来，全人仆倒在地，双拳敲打着地面，为自己的罪悔恨不已。我的厨师想要认罪，哭着过来找我：『牧师，你告诉我，我还有一点希望吗？上帝可愿意饶恕我？』说完，他就全人仆倒在地，哭了又哭，痛苦得几乎嘶喊起来。」

经过认罪之后，全体会众就开始祷告，那份冲击力是难以形容的。再经过另一次认罪后，大家又是无法控制的哭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哭泣着，泪水硬是隐忍不住。整个聚会一直就这样认罪、哭泣、祷告着，当晚七点开始的聚会，一直延到凌晨二点才告结束。

平壤大复兴于是启动，接下来平壤多间教会举行特别聚会，为期长达一个月，甚至学校都需要停课，因为孩子们常会为了自己做错事而聚集痛哭。曾有一位九岁大的男孩，参加聚会后哭着说要每天为未信主的父母祷告，两年后，他们的家人全数归主。大复兴的激流波及到全平壤市区的大街小巷，悔改并不只限于认罪和哭泣，也带出了悔改的行动，人们纷纷归还亏欠人的物品或金钱，彼此承认伤害对方的罪。它还包括对过去罪行尽可能的加以补偿，而平安总是伴随着这些补偿行动。在那些日子，全城的人挨家挨户的去向他们曾经伤害过的人认罪，并且归还所偷的东西和金钱，他

们不只对基督徒，甚至对外邦人也这么做。

正如一位宣教士史瓦伦牧师所说的：「花几个月的时间祷告是值得的，因为当神的圣灵降临时，祂能在半天之内完成我们宣教士半年才能完成的事。短短不到两个月之间，就有将近二千名异教徒信主。」只要神一起头，结果总是如此。从1903年哈迪博士开始的大复兴浪潮，就不断扩展这股势力，继续推波助澜，从平壤一直延伸至整个韩国。至1907年，平壤已有三万名基督徒，四至五间教会，复兴的火一直到1910年仍未熄灭，因为在这年十月份的一个星期中，就有多达四千人受洗，另有上千人留下姓名决志信主。另外在1907年的汉城，每间教会都被挤得水泄不通。有位宣教士说，他在六个礼拜内就为五百名信徒施过洗，并且已有七百人登记，愿意受洗成为基督徒。而在一年当中，他的布道所从五所遽增为廿五所。到了1910年间，汉城已有一万三千人填卡决志信主。九月时，汉城的卫理公会总共为三千名信徒施洗。

复兴的火焰是由圣灵所点燃的。那些曾经受到这把灵火炼净的韩国基督徒们立下心愿，要在一年之内将福音传遍全国。他们汇集了大量的金钱，拣选传道人往福音还未传到的地方去。接着，为了提高传福音的果效，他们印制了上百万本的圣经，而仅仅在一年内，就售出了七十万本。这还不够，他们甚至还差遣传道人到国外宣教呢！例如有一个宣教士就被差派到西伯利亚的海参威，去照顾喂养住在那里的韩国侨民。另外也有许多人被派遣到偏远的小岛上，有的则被送到中国大陆各省。

复兴运动为韩国基督教会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它所发出的影响到如今依然深入人心，尽管当时的环境到处都充斥着政治、战争、社会、经济等各

种问题，也不能使圣灵的火稍稍减缓。无论是教会、神学院和一般学校都被复兴巨流充满，教会有强烈的祷告负担，也有将福音早日传遍朝鲜、日本、中国的负担，因此新成立的朝鲜教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焦点就是宣教的差传。当信徒从仇恨中被释放，复兴即临到，这股复兴大能也让朝鲜教会度过尔后日本殖民36年的迫害时期（1910年日本曾正式并吞朝鲜，日本的占领一直持续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

日本的宗教信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9%81%93>

神道（日语：神道 / しんとう Shintō），也称为“惟神之道”、“随神之道”，是日本的原生传统宗教，为日本民族的民族宗教，奠基于日本自古以来的民间信仰与自然崇拜，属于泛灵多神信仰。其特色是将世间万物中令人敬畏及崇拜的均视为神，从山、海之类的自然界物体或现象、祖灵、传统神话中的神祇与英雄、乃至各种幽灵等皆是，数量之多可以“八十万神”或“八

百万神”来形容。与其他民间信仰相似，神道没有统一的信仰组织，旗下分为数个流派。

历史

神道起初没有正式的名称。一直到公元5世纪至8世纪，汉传佛教经朝鲜半岛的百济传入日本，渐渐被日本人接受，在《日本书纪》〈用明天皇纪〉中的“天皇信佛法，尊神道”句中，首次出现“神道”这个称呼。

汉字传入日本后，“神”字被用来表示日语中的“かみ”(kami)。当时的日本人称已逝的人之亡灵为“かみ”，亦将认为值得敬拜的山神及树木、狐狸等动植物的灵魂称为“かみ”。“かみ”还包括一些令人骇闻的凶神恶煞。其后，人物的历任天皇、幕府将军、功臣、武士等也渐渐被作为膜拜对象，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

佛教初传入日本时，神道信徒甚为反对。苏我氏支持佛教。物部氏和中臣氏拥护神道，反对佛教。佛教僧侣具有中国先进的知识，天皇因此支持佛教，一时神道失势。然至8世纪末，佛教僧兵的权力亢进，天皇欲制衡佛教的势力，因而神道再度得势，两种宗教逐渐互相混合(即神佛习合)。至明治时期，百姓等信仰两宗教。于是佛教寺院和神道的神社，两者浑然。例外的是伊势神宫，供奉天皇的祖先，属于古神社。

14世纪北畠亲房著《神皇正统记》，上起于神代，终兴国初。《神皇正统记》中的天皇世系经德川光圀《大日本史》采纳成为官方史家定说。

德川家康的儒臣林罗山提出神道即尧舜之道，皇祖皇宗的正道与儒教的精神同一。

德川义直继承了林罗山的神道观，著有《神祇宝典》，排斥佛菩萨本地垂迹说；主张神道即王道，即尧舜之道，即儒道、圣贤之道，即“《易》云：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2]德川义直认为日本为神灵栖舍之所，故称为神国，其宝称神器，守神器之人称神皇，其兵称神兵。神意人心本是一理，剑玺镜即勇信智，玺镜为文，剑为武。若林强斋继承了山崎暗斋的垂加神道，著《神道大意》强调儒教即神道。

当时盛行的还有朱子学派儒者山崎暗斋的创立垂加神道。阳明学派儒者中江藤树提出神明即良知的本体；其门人熊泽藩山以此为旨著《神道大义》，主张神道与儒教一致，“以神明之本体为良如”，神道以正直为体，知仁勇为三德，三种神器分别象征了知、仁、勇。荻生徂徕的门人太宰春台在《辨道书》中指出，神道即《周易》观卦《彖》传中的“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出口延佳受林罗山的影响，收集战国时代以来散逸烧亡的神宫旧记和神书，导入理气学，创设的伊势神道则以《周易》易理为神道，强调神道即天下万民的道。出口延佳撰有《中臣祓瑞穗抄》、《神代卷讲述抄》、《太神宫神道或问》。

至江户时代末期，国粹的神道理论家宣称，两者不能相混。本居宣长反对把儒家和神道混同，由此产生了复古神道。荷田春满及其门人贺茂真渊通过对《万叶集》、《古事记》的古语、国学的研究创设复古神道，把《古事记》奉为第

一神典，主张以孝道为先，孝父母、敬神和忠于天皇。复古神道主张古道即神道，万国都承蒙天照大神的御德；日本是天照大神降生之国，其子孙天皇万世一系，继承三种神器，居于万国之上。平田笃胤是复古神道的集大成者。平田笃胤早年在朱子学者中山青莪门下学习汉学，批判太宰春台《辨道书》，著有《古道大意》，提出日本人都是神的后裔。他以中国自古革命不断、乱臣贼子众多为根据，论证日本输入儒道以来也战乱不断。他在《赤县太古传》、《三五本纪考》中提出，中国才是日本神祇渡海所经营的，三皇五帝是从日本渡海去的神；他著《俗神道大意》排斥其他神道派别为俗神道。

明治元年正月，明治天皇下诏宣布太政复古。明治元年十月十七日，明治天皇亲祭冰川神社并下诏宣布祭政一致：

诏崇神社重祭祀皇国之大典政教基本。然中世以降，政道渐率，祀典不举，遂驯致纲纪不振。朕慨之方今更始只秋，新置东京亲临视政，将先兴祀典张纲纪，以复祭政一致之道也。

明治二年12月，宫内建成新神殿，供奉八神、天神地祇和历代皇灵。1870年1月3日，在新神殿中举行天皇亲祭，并发布《镇祭诏》：

朕恭惟大祖创业，崇敬神明，爱抚苍生，祭政一致，所由来远矣。朕以寡弱夙承圣绪，日夜忧惕天职之或亏，乃祇镇祭天神地祇八神暨列皇神灵于神祇官，以申孝敬庶几，使亿兆有所矜式。

明治3年1月3日（1870年2月3日），明治天皇作大教宣布诏书：

朕恭惟天神天祖，立极垂统；列皇相承，繼之述之。祭政一致，亿兆同心。治教明于上，风俗美于下。而中世以降，时有污隆，道有顯晦，治教之不治也久矣。今也，天运循环，百度维新，宜明治教，以宣扬惟神大道也。因新命宣教使，以布教天下。汝群臣众庶，其体斯旨。

随后神道成为国家的宗教，兴起“废佛毁释运动”，以致许多佛寺遭毁。虽然明治宪法承认宗教信仰自由，但崇拜神道成为日本国民的义务，成为统治国民的手段。此一近似于国教的神道信仰体系被称为“国家神道”。明治维新执行王政复古、祭政一致，再次确立王朝时代以来的神社制度，展开神祇官复兴运动。明治五年三月创立教部省，确立政教合一，在国家层面设大教院，主祭天之御中主神、高皇产灵神、神皇产灵神和天照大神。在地方上设立中教院、小教院。明治三十一年十一月创设全国神职会。国家神道的制度直到二战后，才在盟军占领当局要求政教分离的指导下被废除。

根据日本文化厅在2016年的统计，神道在日本国内约有8千9百万信徒，占日本居住人口(含外籍居留人口)比例达47.4%，但此数据没有考虑到日本的神佛习合现象(类似华人的三教合一)。有人认为实际上真正虔诚的神道信徒数量并不多，日本五大报之一的《日本经济新闻》则指出很多日本人不过是进去寺庙里面求神许愿罢了，并不是真正拥有宗教信仰，但实际上，宗教除了制度性宗教外，还有非制度性宗教，求神许愿本身也是宗教行为的一种，不能说成没有宗教信仰。

祭仪

日本神道祭祀包括了天神、地祇、人鬼的祭祀典礼。祭祀分大祀、中祀、小祀。大祀包括大尝祭。中祀包括新尝祭、神尝祭、相尝祭、神衣祭、祈年祭。小祀包括镇花祭、镇火祭、镇魂祭、三枝祭、道享祭、风神祭、祈雨止雨祭、月次祭、星祭、招魂祭、荒神祭、地镇祭。《古事记》中除了至尊神天照大神以外，神道教的神按职别包括六个辅佐神、五部上祖神、三十二神、五行神、风神、雷神、山神、草神、海神、河神、二十一祓神、六福神、道祖神、和歌神、八大武神、军神、酒造祖神、医术祖神、神乐祖神、服部祖神等等。

月份 神道祭祀

一月 四方拜、元始祭

二月 皇灵殿祈年祭、春日祭、新年祭、御田植祭

三月 春季皇灵殿并神殿祭(三月春分日)、春日祭(三月十三日)

四月 神武天皇御例祭、贺茂祭、神衣祭

五月 端午祭(五月五日)、贺茂祭(五月十五日)

六月 神今食大祓、神宫月次祭币帛发遣(六月四日)

七月 乞巧奠

八月

九月 伊势例币、重阳宴、秋季皇灵殿并神殿祭(九月秋分)

十月 神尝祭(十月十七日)

十一月 新尝祭(十一月廿三日)、相尝祭、镇魂祭(十一月廿二日)、靖
国神社例祭(五月六日、十一月六日)

十二月 大祓(十二月卅一日)、除夜祭(十二月卅一日)、追傩、后桃园
院天皇御例祭(十二月六日)

神宫里的神官称为祭主、大宫司。神社的首领称为神主，其下有祢宜(覲)、
祝、巫(神子)等等。神乐舞女称为巫女。明治二十七年颁布《神官神职服制》
敕令，此后修正3次，分为正装、礼装、常装。正服黑罗冠、略服乌帽子(有位立
乌帽子、无位折乌帽子)。正服衣冠，四位以上缝腋位袍黑唐草纹、五位赤唐
草纹、六位以下绿无纹、无位黄平绢无纹。礼装斋服服制与位袍同，用白绢。
中单短帷子，有位者为红绫，无位者红绢。下着指贯，三位以上紫底藤丸纹，
四位五位紫平绢，六位以下浅黄平绢。此外有衣冠代用布衣，即无褌狩衣。常
装包括狩衣和净衣。中祭、小祭的祭服为常服，即狩衣。别官以下仆从服白
张。供品称为神饌，包括饭、饼、白米、黑米、野鸟、水鸟、海鱼、川鱼、海菜、
野菜、果实、盐、酒。

神前结婚仪式

神前结婚仪式可追溯到伊势礼法。1878年，深受水嶋流礼法家影响的伊势神
宫的神宫教院颁布神道纲领《五仪略式》，包括诞生之式、创业之式、婚姻之

式、奏功之式、葬祭之式五种。不久《类聚婚礼仪式》一书出版。明治三十三年，以大正天皇结婚为契机，出现了明治式神前结婚法。1899年，华族女学校校长细川润次郎男爵拟定了《新撰婚礼式》，提倡推广神前结婚式。翌年礼法讲习会在日比谷大神宫(东京大神宫)为当时身为皇太子的大正天皇的结婚式举行演习。此后大正神前结婚法集其大成。目前神前结婚式有三种：自家神前结婚仪式、氏神神前结婚仪式、宗教神道教会结婚仪式。结婚祭仪分为几个步骤。社司为新人开启神社大门，新人献上神饌，社司吟诵祝词，新人交换誓词并献上玉串再敬拜。摆上神酒、一献、二献、三献。媒人、男方亲族及女方亲族入座，与新人敬酒并问候。结婚式举行完后，紧接着举行“披露宴”。结婚仪式只有新郎新娘、媒人夫妇、双方父母、近亲参加。“披露宴”意即“公布于众”，所以参加的人可以很多，如双方工作单位的同事、远亲、同学、朋友均可参加。

皇祖天照大神

天照大神是天皇一系的祖宗神，天皇所郊祀的皇大神，即日神，为治天(天的君王)。

天照大神赐给其子孙三神器，即八咫镜、草薙剑、八坂琼曲玉，作为统治的凭证神玺，保佑子孙永远统治日本。

垂仁天皇下诏祭祀天照大神，以兵器祭神祇。

分类

神道依信仰形态可分成：神社神道，教派神道和民俗神道，教派神道分有13个教派，每派有自己的创始人；民俗神道无严密组织，是农民自己祭祀农事和路神。明治维新后，政府扶持神社神道，宣布政教合一，将神社神道定为国教，即国家神道，由政府出资资助。古来神道的祭祀神职人员、神主（神道的祭司）以及下级神职人员一般都是世袭。明治政府不采传统的制度，废止世袭职。设置内务省中一部局来管辖全国神社，而神职皆成内务省的职员。又将古社中多数小者，由政府统筹到大社中。1945年日本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后，在盟军要求下，日本政府宣布政教分离，裕仁天皇发布诏书，宣布自己是人不是神，废除国家神道，政府不得资助神社，但神社神道已经成为日本神道信仰的主流。

神道诸派

伯家神道（白川神道·白川伯王家）

伊势神道

吉田神道

两部神道

山王一实神道

法华神道

土御门神道(天社土御门神道)

吉川神道

垂加神道

出云神道

物部神道

复古神道(古道)

国家神道(大日本帝国时期具有官方身份的神道体系)

神社本厅(国家神道在1945年12月废止后, 为承接其组织而成立的民间宗教团体)

教派神道(指神道系统的新兴宗教)

神道十三派

神道大教

黑住教(神道黑住派)

神道修成派

出云大社教

扶桑教

实行教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5%AE%97%E6%95%99>
9

日本宗教呈现多元性，现在的日本国宪法保障国民的宗教自由，不立国教。基于历史因素，神道教与日本佛教是日本的主要宗教，文化上，多数日本人同时崇奉神道与佛教，这两个宗教的仪式已与日本人生活融为一体，如婚礼和葬礼。部分日本人认为在日常生活中采用某些宗教仪式已是属于民俗习惯的范围，并不代表他们就是该宗教的信徒。

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于2015年的调查，日本神道教约占日本人口比率70.4%，佛教徒约占人口的69.8%，且两教信徒组成大量重叠。

根据日本文化厅每年实施的《宗教统计调查》，截至2016年底日本神道教的信徒有8474万人（约占人口67%），佛教信徒有8770万人（约占人口70%），因数据来源为各个宗教组织自行汇报的数字，对信徒的认定也由各组织自行定义，故调查报告中诸教信徒的总数超过日本总人口许多，达到日本总人口的145%。

许多日本人不参与任何宗教组织，只参与婚丧喜庆与祭祀等传统上的宗教

仪式，还有不少年轻人就算参加宗教仪式，但却自认为不可知论者，甚至是无神论者。而据日本NHK于2018年的调查，整体日本人中有62%人口自认没有宗教信仰。

日本宗教信徒比率

神道 70.4%

佛教 69.8%

基督宗教 1.5%

其他 6.9%

中央情报局2015年调查（因有大量同时信仰神道与佛教的信徒，故数据总和超过100%）。

宗教组织

对一般的日本人来说，“宗教”或“信仰”，指的是参加宗教组织，（如教会、念佛社等），因此当日本人被问及“你属于那个宗教信仰？”根据日本放送协会（NHK）的研究，大部分日本人会表示“无宗教，无信仰，或神道与民间信仰”，只是指他不属于任何宗教组织，但其实一般日本人同时采用神道与佛教习俗且时常参拜神社与寺院。1996年，阿满利磨（Ama Toshimaru）在《日本人为什么无宗教信仰》中解释，多数日本人不参加宗教组织，但会经常祈求和祭祖、祭拜神灵，如果依照文化上的定义，这些日本人属于神道与佛教的信徒。虽然官方称绝大部分日本人信仰神道教，实际上现代日本人对宗教多表现出不关心或者“抱佛脚”的功利心态度。

日本参与宗教组织者（2000年调查）

无宗教（51.82%）

佛教（34.9%）

神道教（4%）

基督宗教（2.3%）

未表态（7%）

人口统计

日本宗教教派(1996)

佛教净土宗（12.9%）

佛教禅宗（4.1%）

佛教天台宗或真言宗（4%）

佛教创价学会（3%）

佛教日莲宗（3%）

其他佛教教派（2.5%）

基督宗教（2%）

神道（1%）

无宗教（67.5%）

日本宗教组织

宗教 1984 1996 2008

佛教 27% 29.5% 34%

神道教 3% 1% 3%

基督宗教 2% 2% 1%

主要宗教

神道教

在明治维新后，神道教曾被定为日本的国教。在日本二战投降后新的日本国宪法中保障宗教自由，神道教不再视为国教，但神道习俗也在日本人的生活中融入。神道教是在日本本土所发展出来的宗教，祭神的场所是神社，神道教认为自然界万物皆有神。也有奉祀先烈先贤、名人武士、诸侯大名、公家卿相甚至是幕府将军与天皇者，如明治神宫、日光东照宫、靖国神社等。

佛教

日本佛教宗派

在《日本书纪》中，佛教于552年（公元6世纪）由朝鲜半岛百济国传入日本，7世纪初，圣德太子兴建法隆寺，致力推广并普及佛教。根据2010年东本愿寺僧侣的调查，净土宗系（含净土真宗）宗派占大多数，约占47%；日莲宗系（含创价学会）的宗派约占21%；禅宗系的宗派约16%；密教系（含台密与东密）约12%，其余4%。

其他宗教

基督宗教

1549年，基督宗教中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进入日本，至17世纪初，教徒大约有75万人，而后德川幕府为了巩固统治，实行禁教政策，规定日本人必须要皈依佛教宗派，此刻日本人自认是佛教信徒，无论是实际上或是名义上。

基督宗教教派直到19世纪后期，美军强制日本的江户幕府开放贸易与外交的黑船来航事件以后，传教活动才再次兴盛于日本，现在日本正式的基督徒不超过总日本人口的1%。

伊斯兰教

日本伊斯兰教穆斯林主要是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小型移民社群。根据估计，2008年日本80-90%的穆斯林是来自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伊朗的外国侨民。日本穆斯林总人口为70,000-100,000人，而“日本人穆斯林的估计数范围从几千到几万”。

犹太教

日本的犹太教主要由居住在日本的犹太人信奉。

印度教

日本的印度教信徒主要为居住在日本的南亚侨民。

锡克教

日本的锡克教信徒主要为居住在日本的印度侨民。

耆那教

日本的耆那教信徒主要为居住在日本的印度侨民。截至2009年，日本全国共有三座耆那教庙宇。

阿伊努人信仰

阿伊努人主要分布在北海道和部分俄罗斯远东地区。阿依努传统信仰为万物有灵的信仰，神威（阿伊努语：kamuy），又称神居，是阿伊努语中对高等神祇的称呼。

中国民间信仰

大多数日本华人信奉融合中国民间信仰的大乘佛教，与日本人相似。

道教

道教于公元七世纪到八世纪从中国传入，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日本的本土信仰。道教的法术被神道信仰所吸收，并成为阴阳道、修验道和庚申信仰的宗教来源。

日本儒学

儒家理学思想在江户时代从朝鲜国引进，并发展成一个思想，对日本整体的社会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其它新兴宗教

除上述传统宗教外，日本还有为数众多的新兴宗教，如创价学会、幸福科学、大本教等。一些新兴宗教对日本社会产生较大影响，如公明党便是创价学会的关联政党，与自民党同为日本执政党。另外，有些新兴宗教团体因本教派的行为招致日本公众普遍反感，如曾制造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奥姆真理教就被日本人普遍视为邪教。

其他

一些日本人由于日本历史的原因，或是科学的发展，而反对宗教，认为是迷信；另有些日本人则对宗教持中立态度，一生中也曾信奉过多种宗教。

台湾的宗教信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AE%97%E6%95%99>

9

台湾各宗教受《宪法》保障，人民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并且各宗教间皆为平等。除此之外，政府奉行政教分离原则，政府与宗教之间亦无关联。又因台湾为一移民社会，汉字文化圈固有的传统信仰如佛教、道教，在一般民众极为流行且根深柢固；而西方世界较常见的宗教，如基督宗教及伊斯兰教，亦拥有不少的信众。

根据200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调查，台湾人口中佛教占35.3%、道教占33.2%、民间信仰（包含儒教）占约10%、基督教占3.9%，无信仰或拒答占

18.2%。

根据2019年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显示：美国政府估计台湾总人口约为2,360万人（根据2019年年中的估计）。台湾内政部宗教辅导科在2005年进行的全面调查显示，台湾人口中有佛教徒约有800万人（35%），而道教徒约有755万人（33%），该报告里面，将台湾民间信仰纳入道教体系。除了佛、道教之外，其余人口包括80.5万人（3.5%）信奉一贯道，59.8万人（2.6%）为新教徒，29.7万人（1.3%）为天主教信徒，22.9万人（1%）信奉弥勒大道，53,000人（0.2%）为逊尼派穆斯林。信徒不到人口4%的宗教包括：天帝教、天德教、理教、轩辕教（黄帝教）、天理教、先天救教、山达基教、巴哈伊教、耶和華见证人会、真光教团、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统一教）、长老会、真耶稣会、浸信会、路德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以及圣公会等。剩下20%的人口宗教信仰不明或是没有宗教信仰。

虽然自2005年之后内政部未再对宗教信仰的人口进行追踪，但内政部表示此一统计数据大致上并无改变。虽然绝大多数有宗教信仰的人自认为是佛教徒或道教徒，但是也有很多人自认既是佛教徒，也是道教徒，还有许多人把其他宗教信仰的习俗也纳入自己的宗教信仰。内政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登记在案的信徒人数合计953,599人，寺庙总数为12,305间，教堂总数为2,839间。

除了信仰有组织的宗教外，很多人还信奉传统的民俗宗教，包括某些面向的萨满教、祖先崇奉、动物崇拜等。研究人员与学者估计，有高达80%的人口信奉某种形式的传统民俗宗教，这类民俗宗教经常与个人信奉佛、道、儒教，或其他传统宗教有所重叠。有些信仰佛、道，以及其他传统宗教的信徒也有修练法轮功。法轮功自称为一种精神纪律，据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的领导人物表示，法轮功学员人数在数十万之谱。

根据劳动部与原住民族委员会最近的统计以及与宗教领袖的对话，原住民大多是新教徒或罗马天主教徒，总共有570,000人。台湾的犹太教徒估计有1,000人，约有一半是外国居民。台湾的外籍劳工人数估计有711,000人，主要来自东南亚。印尼籍劳工占外籍劳工之大宗，约有271,500人，以穆斯林为主。来自菲律宾的外籍劳工人数约有155,500人，普遍信奉罗马天主教。

台湾宗教信徒比率

佛教 35.3%

道教 33.2%

基督信仰 3.9%

民间信仰（包含儒教） 10%

无信仰或不明 18.2%

先前调查

根据《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一些研究人员估计现今台湾有将近八成的民众拥有宗教信仰，另外，更有超过五成的民众经常参加各类型的宗教仪式与庆典，强调自己为无宗教者（并非无神论者）约18%。

据《内政统计年报》2013年12月统计，中华民国依各宗教皈依规定之信徒人数1,581,383人，以道教、佛教、基督新教最多，佛教道教界线不明确。

据《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计划第七期》于2015年随机访问2034位民众的

抽样调查报告显示，民间信仰35.5%，佛教19.9%，道教16.6%，一贯道1.5%，天主教1.5%，基督新教4.5%，没有宗教信仰19.9%。合计，无宗教者约20%，佛道与民间信仰者约72%，一贯道1.5%，基督宗教6%。

佛教

一如其他东亚国家，佛教思想的传布成为建构东亚文化的特征之一，并往往融入当地既有信仰。台湾佛教信仰人口可能与道、儒或台湾民间信仰高度重叠。“佛”即为“佛陀”，为古印度的梵文音译，为“觉悟”、“觉悟者”之意；指觉悟宇宙人生一切真理之意。

佛陀又特指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原本是释迦族悉达多太子，前623年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城，他舍弃了权位出家修道，成道之后，被尊称为释迦牟尼。释迦是姓，牟尼是梵文中对圣者的通用尊称，意为文、寂默。

源起

清朝统治中国后，闽南地区信仰发生重大变革，除了产生吸收佛教世俗化的福建道教闾山派之外，也衍生出适合汉人（闽南人）民情的佛教。此阶段，以我为主体的观音信仰，在佛教中，最容易被汉人所接受。

18世纪之后，观音为主神的佛教。此种佛寺又以岩仔居多。岩仔，漳州人发音为（giam ah），泉州人发音为（gum ah），本来意思是山洞，后来靠近山边的庙就都称为岩仔。1835年刊行的《彰化县志》：“闽省漳泉南人谓寺曰岩”。可见岩仔在当时应专指佛寺。而“岩仔”于佛寺的正式名称又可称为岩或岩。以岩为名的佛寺，自18世纪后大量出现于台湾，借由观音信仰，将佛教教义传至台湾，例如1752年建成的芝山岩与1791年整竣完成的宝藏岩等。

除了岩仔之外，台湾清治时期主祀观音的庙宇有寺、宫、阁、堂、坛、庵、岩等等的名称区分。除了岩仔之外：佛亭通常为地主所盖、寺为大庙、堂常为村庙。

另外，18世纪后的台湾道教或斋教等民间信仰于兴建庙宇时，也常将佛教的观音、佛祖圣像列于道观或宫庙中。而所谓以天神下旨来教化民众的神道儒教也会用佛教神祇做对象。至此，台湾佛、道、儒教及民间信仰成为不可分的共同体。

在台湾颇负盛名，兼容民间信仰的观音信仰圣地有艋舺龙山寺、林口竹林寺、台南大观音亭及内门紫竹寺等等。民众家里奉祀的神佛也以观音、妈祖、关公、土地公等为多，并常会雕饰以以观音为主的神佛画像观音妈联。

发展

1895年，台湾日治时期开始。在治理台湾所需要的宗教安定力量上，台湾总督府舍弃19世纪末因对外战争胜利而兴起的日本国家神道（国教化的神道信仰），而选择了已经在台湾稍有根基的佛教。

为因应现实环境，台湾汉人不得不与在台日本人合作，并以传统道教寺庙改建、增设日人所熟悉的佛像；如地藏王菩萨等。日人统治者，更于台湾各地设立许多寺院及布教所。

1941年，全台湾人口共500多万，而光是积极参与日本佛教宗派的信仰人口就达到8万人。其中以真宗本愿寺派、曹洞宗、日莲宗、净土宗等派为主。

高僧信仰

另外，明清时代来台的移民，自闽、粤等地，带来许多高僧信仰，学者有人称之为“佛教俗神”信仰。如福建泉州安溪县的清水祖师信仰、显应祖师信

仰，闽西的定光古佛信仰，高僧信仰亦会道教化、如道教庙宇、鸾堂也时常奉祀原属佛教禅宗的达摩祖师、济公与普庵禅师等。

现代佛教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台湾进入中华民国政府时期。稍后的1950年代，因为国共内战与中国共产党不允许宣扬佛教等因素（中共官方奉行无神论，禁止一切宗教组织的自由活动），来台定居的大陆佛教徒日渐增多。不同于以往闽南泉州、漳州流行的较偏向世俗化的佛教徒，强调因果论的汉传丛林佛教徒，在此时正式于台湾耕耘。

经过超过廿年的宣扬，现代佛教于1980年代中期开始于台湾盛行。加上经济发达、政治松绑等因素，由中国大陆传入的汉传系统大乘佛教成为佛教的新兴主导力量。因为教义诠释理性化，也适合现代社会需要，佛教信徒迅速增多。不但如此，以往从未出现的佛经偈语也大量出现于各种场合。

目前台湾佛教以净土宗、禅宗及无所属的宗派居多。如就团体来说，则以佛光山、法鼓山、中台山、慈济等四大教团最具规模。

道教

道教为中国本土宗教，历史十分悠久。历经推广与传布后，大约可分为北方的全真教，与南方的正一教。北方全真教偏重自行主义，重视冥想、苦行，南方正一教，又称天师教，以张天师为首领，偏重他力主义，重视符咒科仪，一般来说，台湾的道教来自南方福建泉州与漳州一代所盛行的天师教（天师道）。

沿革与推广

在台湾，从台湾清治时期，经过日治时期与中华民国百年统治之后，本土发源的道教仍呈热烈的蓬勃发展风貌。以福建巫术、佛教密宗瑜珈派与道

教正一道正一派、符篆派相融合以及吸收佛教世俗化的福建道教闾山派，一直都是台湾主要信仰之一。而不论是正一派或闾山派所带来的道士、法师及造醮观念与习俗更是深植民心。这里面，虽然科仪与中国其他地方不尽相同，不过台湾多数道教庙宇仍自诩为正统天师教的传承。

1980年代之前，佛教未经印顺、圣严、星云等佛教法师宣扬前，正一派或闾山派可说是全台最主要宗教。1980年代，道教势力略为衰退。不过今只要逢年过节，画上代表三清的三个“V”字及制式符首与符脚（闽南话称“符仔脚”）的正一派符篆在台湾处处可见。台湾现有喜庆丧葬过程，甚至媒体节目与大部分建物，更多处可见道教科仪与风水禁忌。另外，闾山符篆延伸的收惊仪式，更是全台北最大庙宇行天宫的主要特色。

道士

在台湾，道士的宗教约略任务有二，一则度生，一则度死。所谓度死，乃是指丧葬的科仪与做功德，所谓度生，又可分为祈福与驱邪。前者有建醮，谢平安，做三献等，后者指安胎，起土，补运等。而从事的人员通常称司公。若再细分，盛行的有正一派与闾山派，闾山派又可分为临水夫人派与法主真君派，临水夫人派的红头司公专门度生，作喜庆的法事居多；法主真君派的乌头司公专门度死，作超渡的法事居多。

台湾泛灵信仰

台湾原住民的传统信仰是泛灵信仰（包含自然崇拜及祖灵崇拜），隶属于南岛原始神话体系的一部分。他们认为天地世间的万物、自然现象和祖先都有神灵的存在。在传统信仰里面，祖灵被认为最能影响族人的吉凶祸福，原住民相信祖灵会保护族人的农作物和渔猎收获丰盛，因此最受原住民的敬畏。

通常来说，族里的祭师在信仰活动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除了主持祭典仪式的进程，并与神灵进行沟通，也是族群历史、神话和传说的诠释者，主

导著整个族群的信仰和宇宙观。

台湾移民民间信仰

台湾民间信仰揉合古代中国儒、释、道三教的信仰，随着闽粤移民，由中国华南地区传播来台，落地生根，逐渐产生本土的民间信仰风格。全台被认定755.7万道教徒中，混杂着台湾民间信仰者应占大多数。这里面，也包含祭祖、巫术、鬼神和其他神灵、动物等泛灵崇拜等信仰。

起源与定义

闽客移民渡海来台时，大多由故里迎请地方神祇，分灵侍奉。由于移民渡海需面对莫测的海象变化，到台垦殖后，因水土不服，瘟疫四起，又须与台湾原住民及不同的垦殖团体相互械斗，争夺土地、水源、商业利益等等，迎奉而来的原乡神祇，成为移民的精神认同，并逐步发展为无所不能的地方守护神。

除了人格化的地方守护神原因外，台湾民间信仰另外宗源则来自道教。本流行于泉漳一带的正一派道教来台后，经过一段时间与佛儒两教渗合，逐渐变成“民间基层人口的传统信仰及文化现象，只求个人与家庭之富贵财子寿”的台湾多神格民间信仰。

台湾这种民间信仰也有学者将之归类为“儒宗神教”或“鸾门”，因为就其信仰内容来看，大都是借着神明持笔挥鸾来阐述儒宗孔教的伦理道德教化，相容圣贤、佛祖、仙神思想，强调修身、持家、行善、劝化；即以劝化世人，挽救人心，导正社会颓风恶习为宗旨。

信仰种类

台湾民间信仰基本为多神信仰，其中以地域性可区分，福建福州籍移民信奉的开闽圣王、临水夫人，漳州籍移民信奉的开漳圣王，泉州同安籍移民

的保生大帝，泉州三邑人的广泽尊王，青山王，泉州安溪籍的清水祖师、显应祖师、法主公、保仪大夫、保仪尊王，泉州晋江籍的苏府千岁，客家汀州籍的定光古佛及其他客家、潮州移民的三山国王。

另外，以鸾堂信仰发展的恩主信仰，也颇为盛行。所谓的恩主是扶鸾的名词，是对人有恩德的主神，或者是救世主的意思。多以历史名人为膜拜对象的恩主信仰，主要神祇有俗称关恩主的关云长、吕恩主是八仙中的吕洞宾、俗称岳恩主的12世纪宋朝名将岳飞。恩主信仰中的多位神祇，民间常以关云长为首，因此一般台湾人亦直称关云长为恩主公。

除了地域性神祇与恩主信仰外，台湾民间信仰尚有海神信仰的玄天上帝与妈祖，瘟神与英灵信仰融合的王爷信仰：五府千岁、温王爷、土地公等，死亡鬼灵神格化的有应公与义民爷及民间刑罚府衙神格化的八家将等。不过性质与道教几乎难以厘清，不但信徒无法分辨两者差别，就连一般统计数据与社会观察，也将民间信仰归于道教体系。

如果硬性归类，台湾较接近道教的知名民间信仰庙宇如下

北部：台北行天宫、大龙峒保安宫、北投关渡宫、松山奉天宫、松山慈祐宫、大稻埕霞海城隍庙、艋舺青山宫、木栅指南宫、板桥慈惠宫、三重先啬宫、烘炉地南山福德宫、礁溪协天庙、大溪普济堂、新竹城隍庙等。

中部：大甲镇澜宫、鹿港天后宫、芳苑普天宫、鹿港城隍庙、大庄浩天宫、彰化南瑶宫、竹山紫南宫、白沙屯拱天宫等。

南部：南鯤鯓代天府、麻豆代天府、台湾府城隍庙、北港朝天宫、新港奉天宫、东港东隆宫、台南大天后宫、高雄三凤宫、高雄关帝庙、高雄文武圣殿、旧城城隍庙、凤山城隍庙、哈玛星代天宫、旗津天后宫、新营太子宫、车城福安宫等。

东部：花莲慈天宫、花莲胜安宫、台东天后宫等。

离岛：澎湖天后宫

据中华民国内政部提供资料显示，台澎金马地区现有包含种类为玉帝庙、关帝庙、妈祖庙、哪吒庙、王爷庙、土地庙等等民间信仰庙宇共8000间，利用民房设立之中型道坛约在10000间左右，传教人员约有28,000余人。

一贯道

一贯道发源于中国大陆、目前主要兴盛于台湾的宗教信仰，根据一贯道的官方历史源流简介，在台湾应是孙慧明于1954年迁居到台湾之后开始盛行。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一贯道接纳部分日治时期的儒教信仰人口。因该教结构严谨，又有秘密色彩，早期活动曾被国民党政府大力压制，1953年内政部更颁布禁令，严禁该宗教的散播，该限制直到1987年解严后才解除。

历史

一贯道的中心主神是明明上帝：“明明上帝 无量清虚 至尊至圣 三界十方 万灵真宰”，在其教内被视为与佛教大日如来、儒家昊天上帝、道教三清道祖等同。根据一贯道的主张，宇宙真理虽只有一，但可经由各种形式依各地风俗民情来显现。另外，依照“一贯道源流”的记载，“一贯道”这个名称开始于清光绪12年（公元1886年），于山东一带开始传教，之后拓展至各地。

一贯道在民间的兴盛主要原因是由于传道者或是组织经常主动的帮助街坊邻居，教内人士亦是互相帮助，于是一贯道的活动与市井小民的生活紧紧的结合，从而兴盛。同时也是因为教徒经常的聚众活动，引起了当权者的注意，导致当局发布了禁止一贯道的禁令。

佛堂

一贯道设有家庭佛堂与公共佛堂。个人家庭中设有规模较小的家庭佛堂，而公用道场中则设有公共佛堂。部分较大的道场，另设有讲堂，专供讲道用。佛堂所摆设的主要是三盏油灯（称为佛灯），左右两盏代表太阳与太阴，中间一定会有一盏油灯（称为母灯），代表的是明明上帝无极老母，除此之外，还有主祀神祇。主祀神祇多为儒、释、道三教人物。一般来说以弥勒祖师（弥勒尊佛）、南海古佛（观音菩萨）、济公活佛（降龙罗汉）、孚佑帝君（吕纯阳）、关圣帝君等，做为主祀神祇，部分佛堂两旁会悬挂祖师画像、照片，或悬挂于讲堂（讲道的场所）。少部分大型佛堂，另设有祖师殿（路中一、张天然、孙慧明等）。

观音法门

观音法门由清海无上师于 1985 年创立，清海以弟子须接受印心仪式，接受纯素饮食，并遵守五大戒律“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才可进入门下。创办人张兰君自称能与上帝沟通，结合基督教、佛教、犹太教、印度教等等，并“宣称自己是下一个继承耶稣、佛和穆罕默德的人。”在台湾各著城市都有低调的道场，供会员修行、冥想、打坐等，在台势力庞大，会员人数惊人。

事业

爱家国际餐饮 Loving Hut 为全球连锁餐饮企业，在亚洲、欧洲、美洲、非洲、澳洲都有分据点，以清海无上师之名，在各大城市提供纯素饮食。店内通常会播放组织内部制作的无上师电视台。餐厅内也通常可见供奉师父之照片、画像、艺术作品、签名等等。另外还成立清海无上师世界会出版社，建立给信徒购物的线上商店“黄金新纪元”，可购买各种师父设计的精美艺术品，事业版图非常广大多元。

争议

1. 清海无上师过去原是圣严法师释圣严的弟子，由于语言能力优异，当时

替圣严法师提供英文秘书与翻译等工作。之后开始从圣严法师门下私自招收信徒，传授修行法门“观音法门”，因此开启了她自己的宗教事业，并在苗栗西湖开启了自己的道场。

2. 民国 85 年时，清海被污指敛财接受调查，离开台湾，事后证明非事实。近年才再度在台湾进出，清海本人行事非常低调，只着重在修行方面。

3. 信徒自认等级不够高鲜少谈论自己的宗教信仰或是上师的背景，出入道场需要会员通行证，不对外开放。

4. 信徒家中有时可见购买的清海无上师的珠宝、服饰设计（也称为天衣）、艺术作品、甚至是她使用过的物品（手表、牙刷、服饰等），因为不接受供养，这些是清海弘法的资金来源。

5. 清海讲道时通常配戴各种珠宝，衣着极为高贵且华美，据她表示世界是美好的，人的穿着应该也是高雅的。因为没有道场，同修们经常要在雨中搭帐篷修行，2019 年信徒终于花费20亿买下苗栗县苑里镇温泉游乐区，购入地产建置道场。 6. 2019 年，在台湾举办为期五天的“国际禅”，邀请海外各国信徒来台共襄盛举，会员一人缴纳台币 \$5000 元。信徒们遵守使用者付费不亏欠世人的道理。

基督信仰

基督宗教是最早进入台湾的世界性宗教。在台湾，“基督教”一词经常专指新教，而不包括天主教、东正教等其他基督宗教派别。

史载17世纪中期，西班牙（天主教）和荷兰（新教）两国传教士就曾在台湾北部的平埔族区域展开传教工作。但因两政权并没有在台湾深耕，加上统治台湾的期间与范围有限，当时基督教信仰人口并无显著增加。明郑时期和清治前期，基督教的传教活动遭到禁止，至1860年代台湾开港后，基

督宗教各派别才正式进入台湾传教。

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台湾采取政教分离，但基督教在政治圈有着较大能见度。曾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中正、蒋经国、李登辉皆信仰基督教；台湾本土的基督宗教组织（例如长老教会）在参与台湾民主化过程与社会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亦有为数不少的政界、公民运动人士为教徒。

自2001年起，台湾数个新教团体皆会联合举行盛大的国家祈祷早餐会（简称国祷会），由元首与政界领袖为国祈祷，国祷会的出席组织包括不同的宗教团体。历任总统包括陈水扁、马英九和蔡英文，皆有出席过国祷会。然而近年同性婚姻问题，部分基督宗教介入政治甚深，甚至投入选举、公投、媒体等，受到批评，而基督宗教亦出现“宗教干政”的“自我反省”。

天主教

就天主教而言，真正经营是起始于19世纪中期。1858年，于对外战争失利的清廷与西方列强签订天津条约，台湾成为可自由经商传教的地区之一。翌年，西班牙道明会依照罗马教廷的要求，从菲律宾派神父2人抵台传教，并在福建教友帮助下，首先于1862年，在打狗（今高雄）建立第一座教堂，是为圣母堂，之后再于1928年改建为今日的前金天主堂。

日治时代，天主教会逐渐扩展至全台湾，到1913年7月19日，罗马教廷成立台湾监牧区，使台湾拥有独立的教会管区，当时教徒达到万人，但仍由教廷敕封道明会士作为地方教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台湾总督府迫使西方传教士离台，改由日本人主持教务。二战后，台湾进入中华民国时期，恢复由西班牙籍道明会神父主持教务。1952年8月7日，台湾建立圣统制，正式由原有的传教区体制转为教区制；而台湾的教区数目，也逐渐由原本的1个监牧区，增加至7个教区、1个宗座署理区。

今日台湾的天主教会，共分成七个教区、一个宗座署理区、主教十七位，其中包括单国玺枢机的这些主教，均由教宗所敕封。另外，台湾天主教会

辖下还有神父修女共两千位，分别在八百个教堂及社会事业，包括大学（辅大、静宜、文藻）、医院、地方诊所、安老院、启智中心等处所服务。台湾天主教信徒虽仅占台湾人口约百分之一余（根据2010年天主教官方报告有会堂718间，会友239,565人，无崇拜人数），但其社会服务事业却极为有名。

基督新教

台北灵粮堂

1954年9月，在台大陆灵粮堂会友发起，台北灵粮堂正式设立，并邀请赵世光牧师来台举行多场布道会。1957年8月，寇世远弟兄正式负责本堂讲堂服。

旌旗教会

1980年起，中部地区一群不同学校之大学生基督徒成立了“假期之声福音团”，专门在每年的寒假训练装备，而暑假期间则组织福音工作队，协助乡村教会作福音遍传之事奉。这团体在1990年起转型为“旌旗使命团”，除了持续寒暑假的学生短宣差派事工之外，也参与、协办着中部地区超宗派的布道会及各项特会。这整个团队的宗旨是期盼看见台湾的归主，并能积极参与普世的宣教工作。

1994年的六月及八月，泰国的赛克牧师与新加坡的邝健雄牧师分别来台举办建造教会与细胞小组的研习会，在参加过这些研习会之后，这团队同工大受激励，感受到要看见团队的异象成就似乎需要做一些调整。因为这样，经过数月的寻求与祷告，他们决定结束使命团的服事，建立教会，沿用“旌旗”之名，成立旌旗教会。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归正宗）

在基督新约新教方面，乔治·莱斯里·马偕（George Leslie Mackay，1844年3月21日—1901年6月2日）是台湾基督教的启蒙者。他于1871年到达台湾，在沪尾（今新北市淡水区）开始传教，学习闽南话。并且四处旅行传播福音，除了在淡水、艋舺（今万华）、锡口（今松山）、大稻埕、五股、苗栗、台北、基隆、新竹拥有二十个以上教会之外也借由行医扩展基督教的教义，也因此，他所属的加拿大或苏格兰系的长老教会于台湾为基督教最大组织。据基督教学者调查，2011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1211个堂会，会友人数240,400人，出席人数86,737人（不含12岁以下儿童）。

真耶稣教会

除了基督长老教会之外，在日治时期传入台湾的还有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于1926年由张巴拿巴等人传入台湾，据基督教学者调查，到2011年为止真耶稣教会在台湾有教会244处，信徒达到52,501人，出席人数14,082人（不含12岁以下儿童）。

召会

1948年后，大批原在中国大陆传教的教派纷纷转往台湾。其中最为活跃者为倪柝声所创立的地方召会（登记名称为教会聚会所，自称主的恢复），1949年之前已有数百名信徒，开始擘饼聚会。1949年倪柝声委托李常受开展台湾工作，数年内圣徒既增加至数万人。

美国台福教会

1965年秋，由几位台湾青年基督徒参加美居的蔡信彰牧师的家庭聚会，组织了团契，依加州法律在1966年5月正式登记为“罗省基督教会”（First Evangelical Church），“罗省”指以广东话音译的洛杉矶市的简称。之后，由罗文牧师接续带领，于1967年在洛杉矶银湖区（Silver Lake）Fargo

街购了一间旧房修建为礼拜堂，同年10月8日启用。1970年，40几位台籍兄弟离开罗省教会分设了台语福音教会，完成了以台语（闽南语）敬拜上帝的心愿。台福教会遂于同年10月11日在美国洛杉矶成立。1979年，三家布道所成立，1981年3月又在西北区开设始家庭聚会（圣谷教会），1982年9月橘郡的家庭聚会也福音教会，于是5间教会联合于1982年10月16日举行台语福音教会总会成立感恩礼拜，修整章程，正式成立总会董事会。1985年，台福教会开始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德州圣安东尼城跨州建堂。1989年，台福教会开始跨国建堂，先后在中美洲、澳洲、新西兰、加拿大等地建立台福教会。1996年4月，台福教会设立“台湾宣道部”，开始向台湾宣道。次年3月正式向政府注册成立“财团法人基督教台福宣教中心”。截至2015年9月30日，台福教会共计134福音聚会点分布在南加州中区、南加州东区、南加州西南区、北美东区、北美中区、北美南区、新西兰区、澳洲区、台湾北区、台湾中区、台湾南区，和第四宣教区（中国大陆、日本、印尼）。

其他新教教派

中华基督教浸信会于1948年12月26日，在台举行第一次主日聚会。根据2011年教势报告，该会在全台建立215所堂会，会友人数44,528人，出席人数19,897人（不含12岁以下儿童）。另外，近年发展最快速的基督教组织是台北灵粮堂，该堂于2005年纪念建堂50年。据基督教学者调查，该教会在有组织有计划发展下，2011年全台已植堂119个堂会，会友人数60,034人，出席人数23,695人（不含12岁以下儿童），并设有好消息电视台，宗派发展规模几与浸信会并驾齐驱。

台湾圣公会，是美国圣公会于1954年建立的美国圣公会海外教区，属于美国圣公会第八教省。台湾圣公会在行政体系上虽属美国圣公会所辖，但实为自立自养教区。

台湾信义会于1954年11月10日正式成立。起源于公元1920年在河南鸡公山

成立的“基督教中华信义会”，在台湾延续其名，称为“台湾信义会”。台湾信义会先从高雄、台北两地开始，逐渐扩展至台中、嘉义、台南等各地。台湾信义会第一间会堂—“基督教台湾信义会高雄教会”，于1951年成立。初期由美国、挪威、芬兰和丹麦四国八个差会合作，后来其中四差会因政策不同各自独立发展成立总会。至1954年信义会所属之堂会已有十三间、圣经学院一所、文字中心一间以及一处广播中心，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在地的总会管理教会事务并迈向自立的目标。

台湾卫理会主要是在1949年国民党撤退来台后由原在中国的卫理公会传入，1953年在台北正式建立台北卫理堂，1963年召开首届临时年议会，建立南北两教区。1972年台湾教会自立，定名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

东正教（正教会）

台湾基督正教会，于2003年向政府正式注册，现由正教会普世宗主教圣统香港及东南亚都主教教区管理教务。

其他基督教派

在台湾亦有一些较少与其他教派来往的小型教派，传教方式方式特立独行。例如江端仪在1960年代创立的新约教会，江端仪去世后由洪以利亚带领。新约教会的圣山位于高雄市那玛夏区的锡安山。至于众多国际小教派，如东方正统教会（非指正教会）、旧天主教会、基督科学教会等则无相关社群、仅偶然伴随外籍人士出现在台湾人眼中。

在街头及校园等可常见到骑单车穿白衬衫的摩门教（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教士，耶和華见证人其基于圣经真理的教义与主流基督教派的教义有别。而自韩国传入的统一教会，也在台湾流传，但现有人口仍较少。

伊斯兰教

台湾穆斯林大约分布于台北、桃园、高雄三处。其中大多是1950年代国共内战来台避祸的人员，与近年来移入的新住民人士，母国大多来自印尼。

台北清真寺

1661年，福建汉人郑成功攻下当时由荷兰统治的台湾，随同登陆台湾的福建军民也有不少穆斯林，如或泉州陈棣丁氏与郭氏的伊斯兰裔台湾河洛人。之后为数不少的这些中国穆斯林大部分是来自泉州的郭姓汉人，相传是唐代名将郭子仪后代。这些大部分来自福建惠安白奇乡郭姓族人也有“北奇郭”的另外称呼。（泉州汉语北奇与白奇同音。）

伊斯兰教于台湾真正大有进展是1949年国共内战后，随着当时国防部部长白崇禧与军事将领马步芳等知名伊斯兰教徒人士来台定居的20000名穆斯林教众。1950至1960年代，因为20000多名穆斯林与知名将领白崇禧推动下，台湾伊斯兰教有了一定程度的复兴。1980年代以前，更因台湾与许多中东国家的政经交往密切，穆斯林人数呈现一定发展，从20000人增长到50000人。

1980年代后，因为白崇禧等知名回教人士去世和中华民国与伊斯兰国家陆续断交等种种因素，台湾伊斯兰教发展开始走下坡，信仰人数并无增长。截至2020年，台湾共有七座清真寺，其中最著名的为台北清真寺，教长为赵锡麟先生。而其他比较知名的穆斯林有石永贵、马镇方、穆闻珠、林忠正、刘文雄，其中以曾担任立法委员的刘文雄参与教务最为积极。

神道教

随着日本统治而传至台湾，成为大日本帝国以神道教为国教（即国家神道）作为政教合一的统治手段控制台湾，在台湾各地皆有神社，甚至出现揉合日本神道、台湾民间信仰的新兴宗教天母教。

日治时期结束后，国民党政府移除大部分神社，神社几近绝迹。仅台南市

延平郡王祠（原开山神社）因主祀之郑成功为中、日混血，偶有出生地平户市代表，以神道教方式祭祀。

2018年开始重新供奉的屏东县牡丹乡高士部落的高士神社，是全台第一座也是目前唯一恢复祭祀的神社，但祭祀神灵为排湾祖灵，并非日本神祇；另外，战前目前全台各地仍有一些遗构，在修复后多成为古迹、观光景点、忠烈祠等。

香港以及珠江三角洲一带地区的人民的宗教信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5%AE%97%E6%95%99%E8%88%87%E9%A2%A8%E4%BF%97>

香港宗教与风俗相当多元化。根据《香港基本法》第32和141条，以及香港法例383章《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信仰及宗教自由是香港居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并受法例保障。源自世界各地的宗教均在香港和谐并存，其中

有佛教、道教、孔教、基督新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锡克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和巴哈伊教等，其中基督新教、天主教、佛教、道教、孔教、伊斯兰教六大宗教具有特殊政治地位，在特首选举委员会宗教界别各享有十个议席。

香港大约有44%的人口信仰某种宗教，三种最主要的宗教是佛教、道教、基督新教。据一位和主要宗教派别有联系的当地学者估计，香港约有200万名佛教徒和道教徒（包括孔教及民间信仰、民间教派）、48万名基督新教教徒、38万名罗马天主教徒、约2万名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摩门教）教徒、30万穆斯林、10万印度教徒、2000-3000名锡克教徒以及3000-4000名犹太教徒。许多宗教团体除了弘扬教义外，也兴办学校、提供卫生福利设施等。

佛教

佛教是香港的主要宗教，大大影响了香港民众的传统文化。香港佛教寺庙众多，知名的有大屿山宝莲寺、东涌罗汉寺、港岛东莲觉苑、屯门青山禅院、妙法寺、九龙钻石山志莲净苑、慈云山法藏寺、元朗八乡凌云寺、粉岭香港观宗寺、沙田万佛寺、古岩净苑、荃湾西方寺、东普陀讲寺、弘法精舍、竹林禅院、大埔洞梓慈山寺、半春园等等。

道教及中国民间信仰

香港的庙宇一般均由华人庙宇委员会负责管理并对外开放，每逢神诞节日或农历初一、十五，不少市民会到访参拜。部分庙宇历史可追溯至1600年前，例如青云观；也有部分是新兴宗派建立的，例如圆玄学院。

最著名的香港庙宇位于九龙黄大仙区的黄大仙祠，庙内主要供奉道教神明黄初平真人，长年香火鼎盛，不少信众会在农历新年争先上头柱香。其他

著名庙宇包括位于新界的沙田车公庙、位于港岛荷李活道的东华三院文武庙、位于联合道的九龙城侯王庙和九龙油麻地天后庙等。

香港道教的宗教研究和修行，多集中在庙宇、道场和道观进行，例如全真派的修行道场蓬瀛仙馆、青松观、云泉仙馆等，还有各大小道场。道教团体对香港的社会福利贡献良多，其中很多与教育、医疗和社区服务等有关。除主动开办的福利、教育和医疗服务机构外，更会捐助其他慈善团体。不少庙宇都设有捐款箱，将所得善款会用以资助学校、医院或其他慈善用途。

乡土神简表

香港早期是一个渔港，故香港很多受人崇拜的神祇都与海洋有关，著名如海神天后，便是水上人的守护神。香港至少有天后庙24间，许多天后庙原本靠近海滨，后来因填海关系，现已变成位处于内陆地区。其他受供奉的神明主要有关帝、北帝（玄天上帝）和司天气的南海神洪圣大王，惠州海神谭德真人等。

由于香港也是多元族群融合的社会，在汉人民族方面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省籍族群，他们在移居香港时带来了原乡的信仰，这些神祇称为乡土神。

广府籍：金花娘娘

广府四邑籍：林七仙娘

客家籍：柳春芳、三山国王、定光古佛、三仙姊（冯仙姊、张仙姊、何仙姊）

海陆丰籍：真君大帝、赵太祖师、宋帝

潮汕籍：双忠王、风雨圣者、大峰祖师、昭利圣君、宋禅师、三山国王、注生娘娘、大王爷、珍珠娘娘、陆压真人、太子千岁、李老仙师

闽南籍：七大巡爷、顺正大王、保生大帝、注生娘娘、广泽尊王

福建籍：天后圣母（不分广府、福建、潮汕、客家，汉人普遍信奉妈祖，视为海神。福建兴化人视为乡土神）

香港水上人：大王公

上海籍：伯乐

孔教（儒教）

孔教教义（儒家思想）是以孔子的教诲为基础。孔子是中国古代圣人、思想家和教育家，宣扬一套以人际关系为本的道德标准，强调传统和礼制的重要。孔子的思想对中国历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影响深远，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孔教的主要活动及节日是农历八月廿七日或新历九月廿八日的孔圣诞祭孔仪式。香港孔教源于清末民初康有为发起的孔教运动，孔教代表机构孔教学院由其弟子陈焕章创办，院址位于香港九龙黄大仙大成街。香港孔教徒多会参与教育工作，兴办学校，以弘扬孔子的思想；香港孔教目前并无正式宗教场所，每年常藉公众场地举办祭孔仪式，亦于孔教学院学校内设有圣贤祭坛，其有计划在黄大仙钻石山综合发展区内设立孔庙。

基督宗教

2008年香港信仰基督宗教的人口约67万（此数目包括天主教信徒在内）。而据统计2018年香港信仰各宗派基督宗教的人口在大约120万，其中以基督新教（约80万人）和罗马天主教（约40万人）人口为多。

基督新教

基督新教于1841年传入香港，现有在香港的独立教会至少400所，堂会逾1500间（其中以华语宣道者约1300间），大小宗派逾70个。主要宗派有香

港圣公会、中华基督教会、循道卫理联合教会、真耶稣教会、信义会、播道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浸信会、宣道会、五旬节宗教会、救世军、神召会和聚会处（也称小群教会）等。基督新教出版两份每周出刊的主要报章《基督教周报》和《时代论坛》，在香港电台有定期电台节目，同时也通过媒体播放电视节目。

香港基督新教两大合作团体分别是香港华人基督教联合会（1915年成立）和香港基督教协进会（1954年成立）。香港基督教协进会主要成员包括各大宗派、各基督教服务机构和香港及东南亚教会。协进会致力促进香港、中国大陆和海外各教会之间的联系，并通过基督教服务处、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基督教联合医务协会、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和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等辅助机构，为市民服务。

基督新教在香港运营有超过730家机构，积极参与教育、医疗护理和社会福利工作，尤以浸信会等主流教会为甚。基督新教主办3间大专院校（即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香港浸会大学以及岭南大学）、约180间中学、206间小学、260间幼稚园、130间幼儿园、逾30所神学院和圣经学院、80间教会出版社（含出版代理）和110间基督新教书店与门市部、同55家影音传媒和艺术事工机构等。基督新教也开办7间医院、17间诊疗所和110个提供多种社会服务的社会服务机构，其中包括逾100间家庭及青少年中心、11间儿童院、170间老人中心及院舍、59个为戒毒人员和残障人士而设的复康中心及逾50项医院院牧事工、3项监狱牧灵服务、1项机场牧灵服务和23个营地等。基督教青年会及基督教女青年会则开设5间酒店式国际宾馆，服务香港居民和海外旅游人士。

香港基督新教也有支持中国大陆（内地）和发展中国家的紧急救援工作和发展计划。超过450名港籍宣教士在海外传教。

天主教（公教）

天主教方面，圣座于鸦片战争后的1841年在香港设立宗座监牧区，1874年晋升为宗座代牧区，其后于1946年晋升为教区。圣职人员计有司铎292人、修士69人和修女449人。全港共有52个堂区，包括40间天主教堂、33间小教堂和27个用作宗教活动的礼堂。弥撒所用语言以中文为主，而五分之三的堂区也有英语弥撒，有些更有菲语弥撒。

天主教香港教区有其本身的行政架构，但亦与教宗和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团体保持密切联系。香港教区与世界各地其他天主教区一样，均采用同样的《圣经》、教义、礼拜仪式和架构组织。亚洲主教团协会助理秘书长的办事处亦设于香港。

天主教香港教区除传教外，也关注市民的生活。教育方面，主办天主教学校和幼稚园共248间；办学工作由香港教区的天主教教育事务处协助推行。天主教会开办的医疗及社会服务机构至少包括6间医院、13间诊疗所、41间社会服务中心、23间宿舍、19间安老院、30间康复服务中心以及多个自助会社和协会。明爱社会服务中心为香港教区属下的社会福利服务机构，服务于市民基层。天主教会为了通过传媒把信息带给市民，每周出版《公教报》及其英文版Sunday Examiner。此外，教区视听中心更制作影片和录像带，供学校和堂区外借。香港天主教社会传播处则代表香港教区负责统筹参与媒体的事务。

以上资料乃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的2018年年报叙述。

东仪天主教（公教）

香港有不少亚美尼亚人社区信奉亚美尼亚礼天主教会，信徒估计至少有数百人。因此相关的宗教团体在2013年于香港成立香港亚美尼亚协会，借此促进更多香港人与亚美尼亚人交流和让居港的亚美尼亚人融入香港社区。

东正教（正教）

1996年，君士坦丁堡牧首批准成立正教会普世宗主教圣统香港及东南亚都主教教区，管理香港及东南亚地区的教务，并选出聂基道（Nikitas Lulias）任首任都主教。目前的都主教为黎大略（Nektarios Tsilis）。2008年起辖区包括香港、台湾及菲律宾。

香港东正教会的发展比其他基督教教派来得晚。早期活动形式为一个以圣路加为名的信仰团体。教区成立初期，在香港约有一百名成员，目前成长增至约两百个家庭，当中包括了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埃塞俄比亚、美国、法国和香港本土的信徒。在教区的信徒有二万五千人。官方刊物为《The Censer》。

香港东正教区同时为香港基督教协进会成员。

伊斯兰教（回教）

香港约有穆斯林18万人：当中主要是来自印尼的外佣，占10万人；其次是华人，占四万人；余下的四万人分别是来自东南亚、南亚、中亚及西亚的马来西亚（马来族）、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土库曼、土耳其、乌兹别克、塔吉克、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地区多个国家移民及佣工。

香港现有四间清真寺，分别位于港岛中环些利街、湾仔爱群道、九龙弥敦道和柴湾哥连臣角，四间清真寺每日均举行祈祷聚会。些利街清真寺为香港最古老的清真寺，初建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于1915年重建。

九龙清真寺暨伊斯兰中心在1984年启用，可容纳约2000名教徒参加礼拜。爱群道清真寺暨伊斯兰中心于1981年9月启用，可容纳700多名教徒参加礼拜。哥连臣角回教坟场也有一座清真寺。香港回教信托基金总会负责统筹伊斯兰教的事务，并管理所有清真寺和伊斯兰教坟场。该会由四个回教社团组成，分别为香港伊斯兰联合会、巴基斯坦联合会、印度穆斯林协会和达乌迪协会（什叶派）。

香港的伊斯兰教社团提供各种慈善服务，包括向有需要的人士提供经济援助、教育、医疗护理和助学等。

印度教

香港约有四万印度教徒的参与宗教社交活动，以跑马地的印度庙为举行场地。该印度教神庙宇由香港印度教协会管理，信徒可在该处冥想、灵修、练习瑜伽、参加社群活动和重要节日庆典，如亮光节和镇邪节等。印度教徒亦会在该处举行典礼。印度教徒的订婚和结婚典礼，都在庙内按该教的风俗礼仪举行。每逢星期日上午及星期一晚上，印度庙内都有聚会，包括宗教音乐演奏和讲道。星期日聚会后，教徒可免费享用饭餐。

根据香港法例第181章《婚姻条例》，印度庙乃认可宗教崇拜地方，结婚仪式可在印度庙内举行。

印度庙提供的其他主要服务，还有主持殓殮仪式、安排火化和有关事宜。该庙亦负责管理哥连臣角印度火葬场的一般事务。

锡克教

锡克教据考于20世纪之前，随着英国雇用的印度旁遮普士兵传入香港，并在1901年于湾仔皇后大道东建立锡克庙。时至今日，香港锡克教徒约有1万人。

犹太教

香港的犹太人社区建立于1840年代，约3000名教徒来自世界各地，在三个主要的犹太教会堂聚会。莉亚堂（传统派）在每天、安息日和节期举行聚会；香港联合犹太会（改革派）也在安息日和节期举行聚会。这两个会堂均位于港岛罗便臣道的同一建筑内。位于港岛花园道的Chabad-Lubavitch会堂每日都有聚会。罗便臣道的犹太会堂建于1901年，土地及神圣洗池均

由沙宣爵士及其家族捐出。位于跑马地的犹太教坟场则是香港另一历史悠久的地方。

罗便臣道犹太庙毗邻有一座住宅楼宇雍景台。犹太教社区中心设于楼宇内，为三大教派共600个家庭会员及其他非会员的犹太人提供犹太餐、宴会、文化和康乐设施。中心内还设有一所图书馆，专门收藏有关犹太文献和文物的资料。该中心现已成为犹太人举行社交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

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拜火教）

现时香港的琐罗亚斯德教教徒（多为帕西人）在港的人数数百人，主要的众会地点于铜锣湾的善乐施大厦。另外他们亦在跑马地有一坟场，名为祆教坟场。

摩门教

现时香港有摩门教教会，总部分于九龙塘歌和老街。

一贯道

一贯道为中国大陆及台湾传入的宗教，旗下有多条分支组线，在香港最大分支为善一堂道德协会，善一堂中心位于佐敦茂林街。

国际创价学会

国际创价学会是由日本传入，为佛教分支。总部香港国际创价学会位于九龙塘界限街。

神道教

神慈秀明会：是日本一种新兴宗教，本属神道教世界救世教的一支。香港支部位于西贡竹洋路。

天理教：原属日本教派神道系统、后自立成教的日本新兴宗教之一。江戸时代末，1838年由农妇中山美伎在日本大和国山边郡庄屋敷村（今奈良县天理市）创立，信仰父母神“天理王命”（てんりおのみこと）。香港支部位于湾仔轩尼诗道179～181号康富大厦3楼。

其他宗教

天德圣教

天德圣教是一个新兴宗教，由四川人萧昌明创立于1927年，教旨共尊五教—儒释道耶回，并以佛之因果报应为核心，教人行二十字美德：“忠、恕、廉、明、德、正、义、信、忍、公、博、孝、仁、慈、觉、节、俭、真、礼、和”廿字真言。教坛以奉一黄布代表天启（宗教上网，可出诗句），不设神像，教徒学习佛经外，并诵萧昌明宗师所立之经典，特定“开导师”（道长）得传授“先天掌光”气功及气针功、符法等替人免费治病。萧昌明时代曾派各大弟子至全国传教，全盛时如湖南一省办戒毒农耕中心已有50万信徒。1930年其弟子赵连成道长带经本至香港—新界—屯门—青山青杨路立院，是为香港总堂之始。

华人传统和宗教节日

香港华人一般奉行六大农历节日，其中最重要的是农历新年。每逢岁首，亲友互相拜年，馈赠礼物，儿童并获派“利是”（红封包）。在暮春的清明节，孝子贤孙纷纷踏青拜山（扫墓）。端午节在五月初五，时值初夏，人们赛龙舟、吃粽子。农历七月初一至七月三十日相传地府鬼门关大开，由大士王率领阴灵上阳间，领受款待，以七月十五为盂兰节（中元节），通常在本日以牲礼果饼，焚烧冥镪举行祭祀仪式，本月也讲究布施贫苦，很多慈善团体会在各区举办派米活动。农历八月十五是中秋节，亲友互赠月饼酒果，市民扶老携幼前往公园和郊外赏月，燃点彩灯。农历九月初九为重阳节，民间素有登高的习俗，以纪念登高避灾的古人，不少人亦趁此节

日前往扫墓。

佛诞是香港的一个宗教节日，香港回归后成为公众假期。除中国传统节日外，耶稣受难节、复活节和圣诞节三个基督宗教的节日自殖民地时期起就被列为公众假期。每逢这些宗教节日，信众都举行庆祝或纪念活动。非教徒也会在节日期间有娱乐活动。

风俗与习俗

不少香港人除了参神求签，也相信风水命理。例如在装修布置时，不少人会先看风水；而结婚及开业等大多也先查通胜择吉日良辰。

另一方面，很多香港人也讲求中、西意头，并对不详的数字或名称忌讳。

=====

=====

由于本书的本章内容是聚焦于1937-1945年时期的中国以及其周边环境以及历史渊源，所以，我们在这里不继续深谈台湾香港等地宗教信仰的情况。在本书后文中，尤其是在关于1949年以后近代历史时代的章节中，我们会进一步相关叙述与反思。

在这里，我们接下来引述一些关于佛教以及道教书籍《金刚经》《老子》的一些反思文字。

+++++

+++++

+++++

+++++

+++++

【引述 从金刚经说起 第一品 什么是佛教；后面的一品，信仰的动机】

【引述《剖析老子》道德经第一章】

【反思：一个世界，许多个神；两个世界，一个神】

+++++

+++++

+++++

+++++

+++++

+++++

[illegible]

+++++

+++++

+++++

+++++

+++++

+++++

+++++

+++++

【引述 《剖析老子》】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道”如果可以用言语来表述，那它就不是常“道”（“道”是可以用言语来表述的，它并非一般的“道”）；“名”如果可以用文辞去命名，那它就不是常“名”（“名”也是可以说明的，它并非普通的“名”）。“无”可以用来表述天地浑沌未开之际的状况；而“有”，则是宇宙万物产生之本原的命名。

因此，要常从“无”中去观察领悟“道”的奥妙；要常从“有”中去观察体会“道”的端倪（终极）。“无”与“有”这两者，来源相同而名称相异，都可以称之为玄妙、深远。它不是一般的玄妙、深奥，而是玄妙又玄妙、深远又

深远，是宇宙天地万物之奥妙的总门(从“有名”的奥妙到达无形的奥妙，“道”是洞悉一切奥妙变化的门径)。

=====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精髓中，以《老子》（或称为《道德经》）为核心基础的道教思想占据着大约三分之一的影响力。所谓中华传统思想，包含了儒家思想、佛教思想、以及道教思想三大组成部分。这三个组成部分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也互有矛盾；它们试图回答关于人生、世界、道德、信仰、价值方面的一系列、许多根本的、重要的问题。

在这三者之中，以《论语》等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儒教思想一直牢牢地占据着主流、统治地位；甚至在中国历史上，历世历代的科举制度中，都以儒家经典及其思想体系为唯一标准内容；孔子甚至被称为是至圣先师，以至于，在1911年清朝灭亡之前的中国人都笃信：“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然而，虽然儒教中包含着许多光辉的思想，例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等等，并且，儒教极力地推崇人生应当精诚求索、“朝闻道、夕死可矣”；但是，儒教却无法在严格意义上被称为是一个宗教，因为它所表达的内容，仅仅是没有超越性、没有超自然根基的道德伦理主义而已。

任何人，无论多么良善、或是多么罪恶，都要不得不面对死亡。在死亡面前，无论多么华丽的道德言辞，都是无能为力的。如果离开了永恒的、超越性的、超自然的、超越死亡的根基、权柄、源泉，那么，任何道德就都是苍白的、无力的、甚至是滑稽的。如果离开了道德法则的永恒颁布者，那么，道德法则本身也就失去了隽永的、内在的、持续到永远的、价值与意义。

在世人的内心深处，都先天性地知道上天、永远、永恒这些概念；在世人的生命之中，都本能性地有着追寻真相、追求真理、寻求信仰、寻找心灵依靠与精神支柱的渴望。在人的内心中有一个空洞，只有上天自己才能填满。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却借着所造之物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儒教非常强大、一直牢牢地占据着统治地位，以至于读书人如果不读儒家经典，不读《论语》、不读《孟子》、《大学》、《中庸》、《礼记》等四书五经，那么，就不可能光宗耀祖、金榜题名、出相入士、进入上层社会，也不可能有效地为国家、社会、群族、县乡治理等等社会事务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儒教自身具有着深刻的缺陷和漏洞，以至于历史上的中国人不得不到佛教和道教思想中去寻找那些关于超越性、超自然性、超越死亡的许多方面之问题的答案。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儒教本身仅仅是关注于此世的问题、价值与意义；因此，儒教无法在终极的层面上，在超越死亡的层面上，讲述人生的真正意义，以及道德的真正价值。

虽然，儒教中包含着许多重要而宝贵的道德伦理，也讲述了许多对于社会秩序、家庭、人生具有着极其重大意义的话题，但是，儒教既无法给出那些指向永恒、超越死亡之人生问题的答案，也无法讲述世界的本质、起源、性质、未来等等话题内容。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儒教尽管如此重要、如此占据统治地位、主流地位，却始终无法完全取代、抹煞、消除佛教思想和道教思想的重要影响。

后两者，正是要试图思考关于人生与世界的那些超越性的问题；在人生观、道德观、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的层面上，它们试图要给出关于人生与世界之本质的超越性的、超自然的答案。可是，佛教思想与道教思想也各自包含着深刻的局限性、谬误性。

佛教思想属于泛神主义的思想范畴；它不是把人带入以上天为中心的信仰之中，而是恰恰相反，使人远离上天，甚至主张“人定胜天”（人若能够禅定、安定、安静、看破红尘，那么，即使是天也能够被胜过）。在佛教的经典中，清晰地否认这个世界上有那样一位造物主、主宰和安排一切的“上天”。佛教并非是要把人带入热忱、执著的信仰与真挚之爱中，而是要反对一切执著，否认爱的真实意义，甚至否认一切事物、以及人生的真实意义。佛教的主旨是，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即，一切事物的表象，在本质上而言，都是空的；空本身，从本质上说，就是一切事物的表象）；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教主张，人应当放下一切执著，看破一切，悟透人生，从而不被一切事情、一切人所羁绊，才得以进入涅槃、寂灭；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佛教曾经大力提倡割亲、出家，即割断世人与亲人、父母、家人等等之间的关系；因此，曾经受到以孝悌为核心理念的儒生们的激烈反对。

总而言之，佛教常常是以这种空灵、放弃、舍得、看破、了脱等等思想，作为其核心色彩；而不愿意主动地涉足于社会政治、经济、伦理、法律等领域的活动和理论建树。因而，虽然，佛教在中国民间受到很多欢迎，尤其是在江南、华南等地区，自古寺庙云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人历史上的一些慈善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杀人放火等罪恶昭昭的犯罪行为（佛教以因果和轮回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吓阻人去犯那些罪恶昭昭的行为；以烧香拜佛、敲木鱼、念经、积功德等等形式，间接鼓励人对他人行善和捐助等等）；但是，佛教从未能够在中国历史上取代儒教的主流统治地位。

事实上，佛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人心中敬虔、真诚、真挚的、敬神畏天的信仰。在佛教历史与信仰实践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许许多多形式主义、信仰虚伪的和尚尼姑们，信无所信，敬无所敬；他们以虚无主义、否定主义（即，否定世上任何事情与价值的真实与隽永的意义；甚至否定“否定”本身）为所谓的信仰，但实际上，却仍然是生活在自私、自利、清高、自义之中。

相比于佛教，道教作为一个宗教的形式，显然影响力要小很多。这部分地是由于，道教的经典不像佛教经典那么冗长繁杂，也部分地是由于，道教不像佛教那样有着相对而言比较组织化的宗教形式、以及比较系统化的教义。但是，以《老子》为核心的道教思想，自古以来，对于中国人的影响却是非常深刻、广泛、普及的。在思想、哲学、文化、社会层面，道教思想的影响力，绝不亚于佛教思想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直到今天，我们在现代中国人心中普遍流行的人生观、

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中，仍然能够深刻地看见，以“无为而无不为”为代表的道教思想的影响，广泛地遍及各处。这种影响，与《周易》以及风水理念、八卦理念等等相互作用，构成了现代中国人思想中的一道风景线。它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了许多普通中国人心中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信仰观中的一些主要特征与理念。

我们在《关于论语的联想》以及《从金刚经说起》两本书中，曾经专门讨论和剖析了儒教与佛教的一些主要特征、特点、缺陷等等。在本书中，我们继续深入地思考、评介、剖析以《老子》为核心基础的一些道教思想与理念。

=====

在《老子》书中一开始的内容，就开宗明义地指向了世界以及其中万事万物的起源。我们可以基本上说，在老子看来，天地、世界、以及其中的一切，都是源于“道”。“道”，正是《老子》一书的主题：——

“道”如果可以用言语来表述，那它就不是常“道”（“道”是可以用来表述的，它并非一般的“道”）；“名”如果可以用文辞去命名，那它就不是常“名”（“名”也是可以说明的，它并非普通的“名”）。“无”可以用来表述天地浑沌未开之际的状况；而“有”，则是宇宙万物产生之本原的命名。因此，要常从“无”中去观察领悟“道”的奥妙；要常从“有”中去观察体会“道”的端倪。“无”与“有”这两者，来源相同而名称相异，都可以称之为玄妙、深

远。它不是一般的玄妙、深奥，而是玄妙又玄妙、深远又深远，是宇宙天地万物之奥妙的总门。

我们如果通篇仔细地详读《老子》，就会看见，对于老子而言，“道”是在宇宙世界、人生当中最本质的、最本源的。

++++
++++
++++
++++

【引述 圣经 创世纪 道德经第一章与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的比较】

1起初， 神创造天地。2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上一片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4 神看光是好的，他就把光暗分开了。5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

6 神说：“众水之间要有穹苍，把水和水分开！”事就这样成了。7 神造了穹苍，把穹苍以下的水和穹苍以上的水分开了。8 神称穹苍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

9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10 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 神看这是好的。11 神说：“地上要

长出青草、结种子的蔬菜和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在地上的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12于是，地上长出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蔬菜，各从其类；又长出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 神看这是好的。13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日。

14 神说：“在天上穹苍中，要有光体来分昼夜；这些光体要作为记号，定节令、日子和年岁；15它们要在天上穹苍中发光，照耀地上！”事就这样成了。16于是， 神造了两个大光体，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了星星。17 神把这些光体安放在天上穹苍中，照耀地上，18管昼夜，分光暗。 神看这是好的。19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四日。

20 神说：“水要滋长生物；地上和天空之中，要有雀鸟飞翔！”21于是，神创造了大鱼和在水中滋生各种能活动的生物，各从其类；又创造了各种有翅膀的飞鸟，各从其类。 神看这是好的。22 神就赐福给牠们，说：“要繁衍增多，充满海洋；雀鸟也要在地上增多！”23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五日。

24 神说：“地上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爬行的动物和地上的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25于是， 神造了地上的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各种爬行的动物，各从其类。 神看这是好的。

26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以及全地，和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27于是， 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 神的形象创造了他；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28 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有走动的生物。”29 神说：“看哪！我把全地上结种子的各样蔬菜，和一切果树上有种子的果子，都赐给你们作食物。30至于地上的各种野兽，空中的各种飞鸟，和地上爬行有生命的各种活物，我把一切青草蔬菜赐给牠们作食

物。”事就这样成了。31 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很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

+++++

+++++

+++++

+++++

从上述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与老子第一章的对比中，我们能够看见，神（上帝）与老子的道，有着以下的异同。

1. 神（上帝）的位格性：——《老子》里面的道，是没有位格的；但上帝却是有位格的。所谓“位格”是指，一个主体有着自我认知、自由意志的能力；这样的主体正如每一个世人都是有着身份位格的。上帝是无限而完美的；他能听、能看、能言；他是全能、全知、全在、全备的；在他里面有无限的丰盛。他是创造宇宙天地以及其中万有的造物主，更是创造世人生命之主。他有意愿、意志、思想、情感、智慧、计划、旨意、目的、作为；他更有公义、圣洁、恩典、慈爱。【圣经中更向我们清晰地指出：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

2. 神是能看的：——上帝创造了世人的眼睛，使他们能够看见光明；他创造了光明本身，正如同他创造了雨露、彩虹、星夜。他自己更能够看见一切事情，看见一切世人的心灵深处的光景。神是监察人内心的神。在这个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在他的眼前被隐藏；他洞悉一切，鉴察一切。

3. 神是能言的：——上帝不仅是能听、能看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自己说话，能够把他自己的启示、话语和旨意，清楚无误地、完整清晰地向世人显明出来。圣经是上帝完全的话语、启示、全备的旨意。

4. 神是全能的：——上天、上帝的能力是无限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他既创造了宇宙世界，那么，这个宇宙世界中就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高于他，也没有任何势力、任何人、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的旨意。他的能力显明在一切被造之物的身上；他使百兽在大地上奔跑雀跃，使雀鸟有美妙的声音，使百合花有美丽的衣服，使大雁能够迁徙万里而不迷失方向；他更把生命赐给人，使他们有情感、理性、意识、意志、认知、智慧、思想、道德的能力。

5. 神的创造是从无到有的创造：——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以及其中的万有。上帝的创造，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什么人能够给他提供原材料，也没有什么人能够给他提供蓝图、钢筋、架构、支撑。他的创造，完全是出于他自己无上的智慧与能力。他的创造，完全是凭着他自己的话语。

6. 神是秩序的、审断的，喜悦良善与美丽：——从神的创造之工中我们能够看见，他是秩序的神，而不是混乱的神；他是审断的神，有着审美、价

值判断、等等能力与权柄。他喜爱良善、秩序、与美丽的东西，而憎恶罪恶。

7. 神是智慧的，并有着设计与计划的能力：——从神的创造之工中，我们也能够看见，他有着无限的智慧。他的所作所为无不是出于他的美好旨意、计划、设计。他不是无知无觉的，也不是漫无目的的，而是恰恰相反，他的一切作为都有着清晰的计划与目的。他的一切作为，都是出于无限的智慧与圣洁的旨意和目的。

8. 人的本质：——人是按着神的形象与样式所造的。世人虽然是有限的，虽然在生命的本质中已经堕落犯罪、悖逆离开了神，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在人的身上看见上帝的作为与恩典和公义。人有着心灵与灵魂，有着思想、意识、认知与意志、意愿的能力。在人的里面，有着这个宇宙世界中最为独特的东西，就是人的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

9. 为什么说上帝是存在的 【引述 从金刚经说起 一书开始的相关内容】

+++++

+++++

+++++

+++++

+++++

+++++

“造物主”的意思是什么

“造物主”的意思是：那位终极的、超乎一切之上的、宇宙天地以及其中万有的、创造者和主宰。他是公义圣洁的，是慈爱恩典的；他把生命赐给人，把阳光雨露以及地上丰富的物产赐给人；他是道德律法的给予者，是道德世界的终极审判者。他把道德法则先天性地放在人的良知之中，使每一个世人都在内心深处知道诚实、公义、公平、正直等等道德品格的含义。

他创造了宇宙天地以及其中的万有，更创造了世人的生命，使他们能够听、看、思想，使他们有理性、智慧、道德与情感的能力。

他创造了人的耳朵和口舌，使他们有语言表达和理解的能力；他自己更能够把自己的旨意向世人显明出来。

他使人能够听见和明白话语的声音；他自己更能够听见世人的呼求和祈祷。

他使人有眼睛能够看见光明；他自己更能够监察这世上所发生的一切，以及人内心的一切真实光景与境地。

他使人有思想、智慧的能力；他自己更有着无限的智慧、思想、意志。

他是有“位格”的，即，他有完美的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过去、现在、未来所作的一切事情，以及为什么作这些事情。在他的一切作为、话语、意图、计划中，都有着无限智慧、圣洁的旨意与目的。

他把智慧与思想的能力赐给人，更把生命赐给他们，使他们成为“有灵的活人”；——即，使每一个世人也成为有位格的存在体；使他们有自我认知和自由意志的能力；使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所作的事情、所说的话语；使他们能够在他们自己的作为、话语、意图、计划中，常常包含着智慧的设计，以及道德的属性。

因此，人在这个世上与其他一切动植物、花花草草、鸡犬牲畜都存在着本质上深刻的不同。一株树木，虽然高大、参天、美丽，但是，却不能说话，更不能表达自己的任何感受与思想；在它的里面，没有“位格”，即，它没有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换言之，在它的里面没有一颗真正的灵魂。

就严格意义而言，对于生命的真正定义，正是在此。一个无知无觉的存在体，就像是一个数学公式、或是科学研究中的黑盒子一样，在给定了输入信号与输入条件、系统状态的情况下，只会有确实的、不变的、一致的、死板的、甚至可观测研究的输出信号或是反应方式。换言之，在它的内部，没有一种驱动机制，使它可以自己自由地、自主地决定，在同样的外部条件下，去内在性地选择做、或者不做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这种自由的意志与自我的认知与意识，只有人才会有，正如一个人在某一个时刻，可以想要举手、或是不举手，或可以想要计划做一件事情、或是计划不做一件事情一样。

这种意识、意志的能力，在这宇宙世界中，是人所特有的。我们如果越是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就越会认识到这个问题是多么深邃而奇妙。这世界中的一切物体，都是由“死”的原子、分子等微观粒子所组成的；所有的物体与粒子，都按着牛顿运动定律等科学法则而运行；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它们都只能保持静止或匀速运动状态；——换句话说，它们都是“死”的；它们不可能有意识、自我认知，也不可能有意志、自由意愿。（对于这一点的认识，正是以造物主为中心的信仰与世上那些万物有灵、盲目迷信等等世俗宗教之间的重要分水岭；这也正是现代科学之所以诞生于基督教信仰为文化中心的欧洲的根本原因。我们将会在其他书籍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然而，人却不是如此。虽然，人生活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之中，受到各种有限的物质条件、生活条件、资源、健康等等的限制；但是，在人的里面，却有着一颗自由的心灵与灵魂。人的心思意念能够不受时空的限制，“飞”到遥远的天边；人的情感与思念能够遥“寄”给远方的亲人；人的心能够在复杂纷繁的外部条件下，进行深刻的思考、抉择，计划自己的行动目

标，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更重要的是，在世人的里面，都普遍地有一种追寻真相、追求真理、寻找信仰、倚靠精神支柱的强烈倾向与信念。这些，都往往是人生命中最珍贵、最伟大、最高尚的组成成分。

从宗教、哲学意义而言，人因着这些极其特殊而宝贵的品性、属性，而被我们在这里定义为“生命”。生命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爱。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活的、有内在生命的存在体，才能够谈得上去“爱”一个对象；这正如，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对他而言，道德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不会审判菜刀或是手枪，给它们判定杀人罪，而是会审判、刑罚那使用菜刀或手枪的人；——因为工具本身是“死”的，是无知无觉的，所以它们也不可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有一个有自由的、有生命的主体，才会具有道德的性质。

这样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这个宇宙世界中无中生有出来的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而是，我们回答说，这样的生命，正是来自那位创造宇宙天地以及其中万有的主宰，来自那位创造生命、把生命赐给世人的上天，来自那位全能、智慧、有无限权柄的造物主。

虽然，在人的生命中，充斥着许许多多的罪恶，甚至，人的生命从本质上就犯罪背离了神；

虽然，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人的生命是如此渺小而短暂；

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人的身上，想见那位无限全能之造物主、永生之神的品格与属性；

这正如，我们能够从这个浩瀚宇宙的本身之中，能够看见那位全能、全知、全在、全备之上天、造物主的能力与属性一样。

任何人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从社会与人类的历史，从对于客观世界的观察中，从对于我们生命自省的过程中，都能够明白、理解、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物体、存在体，其背后都有导致其存在的因素、原因、作用力、机制、法则或导因。我们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浩瀚的宇宙，以及其中如此浩大、纷繁、复杂、美丽、奇妙的万事万物又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说，在这些所有事情、事物、事件的背后，一定有那样一位极大能力、极其智慧、极其伟大、高尚圣洁的造物主。

宇宙是浩瀚无限的，因此，那位造物主就必然更是无限的，有着无穷的力量，更是生命的永远泉源。

虽然人是有限的，然而，由于人的生命有认知、意志，有价值判断、审美、秩序、知识、意愿、管理、恩慈、公义等等有限的能力或属性，从而，我们从人的生命中也能够知道，那位创造人生命的造物主，更有着意识、意志、价值判断、审美、秩序、知识、旨意、管理、恩慈、公义等等至善至美的能力与良善属性。

他掌管全地，监察人心，颁布道德法则，赏善罚恶，赐人生命，以公义和恩典待人，把救恩赐给万民。他是秩序的神，不是混乱的神；是喜爱良善之人的全能者，是公义圣洁的审判官；他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喜爱人的真诚、敬虔与谦卑，不喜爱人的虚伪、亵渎与傲慢、自义。

那造耳朵的，自己岂不能听见呢？

那造眼睛的，自己岂不能看见呢？

那赐人心灵与头脑的，自己岂没有思想、情感与意志呢？

他喜爱公义与良善，并将要终极地、公义圣洁地审判与惩罚世上的一切罪恶以及刚硬不悔改的罪人。

他创造的宇宙世界，何其浩瀚而美丽。如果，我们在夏天夜晚，凝视那清澈的星空，仔细地眺望那悬挂在夜空中的无数璀璨的星体；如果，我们在清晨的海边，看朝阳破晓，从天边磅礴而出的绚丽霞光；如果，我们俯视金色的麦田与浩渺的大地，或是遥望那雄伟翠丽的高山峻岭，或是奔流的大河之中的滔滔江水；——那么，我们就一定会惊叹于那位全能之造物主的创造之工是何其伟大而奇妙。

=====

关于造物主之存在性的辩论

从一些基督教护教学书籍以及一般性哲学书籍中，比如柏拉图的哲学思想论述，或甚至是从中国古人的书籍比如诗经、甚至论语（尽管孔子并不愿意接受关于超自然信仰的思想理念，但是，孔子仍然在论语中时常提到上天）中，我们都会看到对于上天、那位超越一切之上、眷顾世人之造物主的论述。

一般而言，那些相信造物主、上天、上帝之存在性的信仰者的思辨性论述，可以简单粗略地举例如下。

若没有那全能之造物主，那么，人的生命，包括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就不可能有终极的意义，而仅仅成了一个属肉体血气的存在体；在这个宇宙世间，人的生命就既不是可贵的，也不值得珍惜；人生命的意义，就仅仅成了或是虚无主义、或是弱肉强食的存在体而已。

若没有那全能之造物主，那么，人的生命、心灵与灵魂，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盼望，因为必将面临死亡而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每一个人所作的一切，就仅仅是为了在这个属肉体血气的社会中活着，并不得不面对冰冷的坟墓。

若没有那全能之造物主，那么，人间社会的道德，也不可能有任何真正坚实的根基与权柄的源泉。所谓道德，就仅仅是怎样维持社会秩序与运转的、功利主义的、伦理体系，而没有其内在的、终极层面的价值与意义。在这样的体系下，道德的力量是苍白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若没有那全能之造物主，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世界的起源。有人说，这个宇宙世界是自我存在的，从亘古就是如此。但这样的说法显然没有经过谨慎严格的哲学思考与逻辑思索。一个认真深思的人会认识到，这个世界如果不是被造的，而是亘古以来就是如此自我存在，那么，这个世界从无限远的过去就一定早已演化完结而进入彻底的寂灭。

若没有那全能之造物主，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科学，也不可能通过理性而认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之所以有普遍的、一致的、确定的、规则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之所以能够被数理以及逻辑的科学体系所研究，之所以是秩序的、而不是混乱的，正是因为，它是被这样一位智慧而全能之造物主所创造的。

若没有那全能之造物主，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在这个宇宙世界中观察到如此浩瀚而庞杂的、美丽而奇妙的、精确地调制的现象。比如，宇宙中有大约十个左右的基本物理常数，例如万有引力系数，电磁力常数，等等。这些常数直接影响到分子之间、原子之间、以及万物之间的各种作用力的大小。这些常数如果稍微有一点点不同于现在的数值，那么，这个宇宙中就根本不可能形成如此瑰丽的星空、数量巨大的星系，也根本不可能有生

命，更不可能有我们这个美丽奇妙的蓝色星球。

+++++

+++++

+++++

+++++

+++++

+++++

=====

【引述 圣经 约伯记35章】

+++++

+++++

+++++

+++++

+++++

+++++

1以利户回答说：

2“你说：‘我在 神面前更显为义’，

你自以为这话有理吗？

3你还说：‘你有甚么益处呢？

我不犯罪有甚么好处？’

4我要用言语回答你，

和与你在一起的朋友。

5你要往天仰望观看，

细看高过你的云天。

6你若犯罪，你能使 神受害吗？

你的过犯若增多，你又能使他受损吗？

7你若为人正义，你能给他甚么呢？

他从你手里能领受甚么呢？

8你的邪恶只能害像你的人，

你的公义也只能叫世人得益。

9他们因多受欺压而呼叫，

因受强权者的压制而呼求。

10却没有说：‘ 神我的创造主在哪里呢？

他使人在夜间歌唱。

11他教导我们过于教导地上的走兽，

使我们有智慧胜于空中的飞鸟。’

12因为恶人骄傲的缘故，

他们在那里呼求， 神却不回答。

13真的， 神必不垂听虚妄的呼求，

全能者也必不留意，

14更何况你说你不得见他。

你的案件在他面前，你忍耐地等候他吧！

15但现在因为他还没有在忿怒中降罚，

也不大理会人的过犯；

16所以约伯开口说空话，

多说无知识的话。”

+++++

+++++

+++++

+++++

+++++

+++++

却没有人问，那造我的神在哪里：——世上许多人追问关于造物主、上天的问题，也有很多人像道德经的作者这样，追问关于人生与世界的真谛。但是，却没有人问，那“造我的”神在哪里。人们看待这个世界、以及那位创造世界的神，就像是一个旁观者一样；世人更不会去思想，自己与那永生之神，本应当有着怎样亲密而神圣的关系。

【引述 圣思录 却没有人问那造我的神在哪里】

《真理之光》

5/26/2015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4:15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但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4:16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4:17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第一部分】

全地的百姓，人类的历史

你要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

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

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

你的过恶，或能害你这类的人。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

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因受能者的辖制（辖制原文作膀臂）便求救。

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

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

(1)

千百年来，人类的历史，就是在追寻信仰、追寻价值、追寻灵魂的历史。

他们在浩渺的天地面前，惊叹于宇宙和世界的宏大；

他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扪心自问，回首往昔，感悟人生的价值；

他们在世事的繁杂中，领会着那些灵魂的韵律，寻找着那些永存的辉煌。

他们有太多的疑问，无处诉说；

有太多的遗憾，无处抚慰。

面对上天，他们有着数不清的话，想要询问和倾诉——

他们像屈原在《天问》里那样，追问宇宙的起源，万事万物的根基，

像孔子在《论语》里那样，讨论应该怎样祭祀。

他们想要追寻天命是什么，想要寻求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他们在人生苍凉、百受挫折的时候，感叹着命运的不公，

在受人欺压，走投无路的时候，呼天抢地，寻求安慰。

可是，他们虽然会寻求“神在哪里”这样的问题，

却很少问：——“那造我的神在哪里”？

他们不愿意把“神”当作是“造我的神”，——

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已经离弃了神，已经失去了与神的亲密关系和感情。

虽然：他们对万事万物的起源有兴趣，也想要寻求人生的意义，

虽然：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命是神所造、所赐予，自己的命运是神掌管，

可是：

他们却很少对神感恩，而想要敬他而远之。

他们没有去想：

是他，

使人有聪明，有灵魂，

“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

他们更没有去想：

是他，

使人夜间歌唱；

他使我们即使在黑夜来临的时候，即使在身处黑暗、苦难之中的时候，

仍然有盼望，

仍然有渴求，

光明必将来临，

晨曦必将洒满大地。

(2)

全地的人，都像是坐在黑暗里的百姓，像是坐在死荫之地的人：

他们的生活，就是为了自己的柴米油盐，为了自己的面子，

为了自己的骄傲，为了自己的思索，为了自己的雄心，

为了自己的名利；

他们的未来，就是死亡。

每一个人都害怕死亡的阴影，因为那是一去不能回还的境地。

任何只要还活着的人，就仍然可以抱有希望，

因为不管今天是什么境地，

明天太阳仍然会重新升起，

每一天都是新的。

然而，若一个人，不认识永生之神，不寻求神，离弃那造物主、生命的创造者，

那么，他在死去的时候，就会毫无盼望，毫无安慰。

这是何等大的、黑暗的死荫之地。

【第二部分】

真理之光，照在死荫之地的人们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

他是那大光，照在我们这些坐在黑暗里面的，死荫之地的人们。

他使我们灵魂的眼睛，能够打开，

让我们看见自己——

看见我们属灵的光景，

看见我们人生的利益，

看见我们真正的幸福之路。

他是道路，是神所赐的生命之路；在他里面，我们得到无以伦比的平安与安慰。

他是真理，是真实的实际，是这宇宙天地、也更是我们生命灵魂的主宰。

他是生命，在他的旨意和爱之中，我们得到永远幸福的圣洁生命。

【第三部分】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耶稣基督所传的道，是要告诉我们：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为什么“天国近了”，我们就“应当悔改”？

因为——

(1)

这罪恶充满的世界，以及其中的罪恶之事，就快要满盈。

这世界将要如同衣服，渐渐旧了，渐渐腐朽败坏。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国家要兴起，与别的国家敌对。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要充斥着更多的，更激烈的冲突、自义、战争。

地震的消息，和打仗的风声，将要越来越多，愈演愈烈。

遍地要有饥荒和灾祸。并非是因为他们的缺乏和贫瘠，而是由于他们的贪婪和暴力。

全地的人，要在罪恶、骄傲、仇恨、褻渎之中，大声吵闹喧嚷，彼此为仇。

(2)

我们自己的生命和身体，也如同衣服一样，渐渐旧了，渐渐朽坏，渐渐破败不堪。

无论一个人多么强壮，多么长寿，多么富贵和健康，

他的生命，终有尽时。

当一个人死去的时候，当一个人在病床上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世界对他而言，就是如同末日一样；

他一切的属世的盼望和慰藉，都要离他而去；

他看不见儿女将来之事，也不知道自己的祖国将来会如何；

世界，仿佛在他眼前崩塌。

(3)

可是，世界与人生的结局，并非是如同灯灭，一了百了；

而是，必将落在永生之神的大能审判之下。

死亡之海，要交出其中的死人；

神的审判台前，人一切的罪恶、隐秘、阴谋、腹诽，

人一切隐而未现的罪，一切猖狂的罪恶，一切蝇营狗苟、自私自利、嫉妒争竞，

都将暴露在神的审判之下，面临神终极的审判和永恒的惩罚。

(4)

天国来临的日子，就是罪恶终结的日子，

就是神的终极审判和永远刑罚来到的日子。

在天国里，神的百姓，神所拯救、救赎的万民，那些心中谦卑、悔改己罪、接受神救恩的人们，将要永远圣洁和幸福。

那是神的国度，是圣洁的国度；

在那里，再也没有罪恶，没有私利，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哀愁，没有死亡使人分离。

在那里，不需要日头，因为神的公义如同明灯，永远长明。

在那里，没有黑夜，没有寒冷，没有贫穷，只有无限的丰富与富饶。

在那里，基督与属他的百姓们一同作王；因为他已经用自己的宝血和生命救赎了他们。

(5)

神的国度，何等美好。

天国已经近了。

所以，我们应当悔改，在耶稣基督里，在圣灵赐我们的重生的生命之中，

用我们的全人、全心、全身，

来寻求他，信靠他，来祈求他的恩顾和祝福。

我们祈求的根基，来自于基督对我们的舍命之爱；

在他里面，我们更有那永远美好的盼望。

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福音。

++++
++++
++++

+++++

+++++

+++++

=====

道德经看到了什么：——老子看到，神的创造之工，是从无到有的创造；他看见了神的深邃与奥妙。然而，老子却表现出了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甚至认为，真正的永恒之道，是无法用语言能够表达出来的；真正的永恒之名，也是无法用言辞能够称呼的。在老子的眼中，“道”虽然是一个极其奥妙的东西，但是，却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即，道本身只是一个本源性的对象、门、道理、玄妙，但并不一定是一个“活的”、有思想、有生命的主体。

道德经没有看到什么：——老子没有看到的是：——那永生之神的位格；神的全能、全知、全在、全备；神的公义圣洁、恩典慈爱；神是什么。神既然创造了宇宙天地，既然创造了人的身体、心灵、生命与灵魂，那么，神自己岂没有听、看、言的能力呢？神自己岂没有思想、意志的能力呢？神自己岂没有那永远的生命呢？

道德经的盲点（以及基督教信仰之外的许多哲学与宗教信仰思想体系的盲点）：——“却没有问，人是从哪里来的；那造我的神在哪里？”

老子的盲点，正是在于，只看见了那外面的世界，却没有看见人里面的心灵；只思考外面世界的本源与玄妙，却没有思考人自己心灵与生命的来源与奇妙。

如果，人的生命本身，真的是来自于老子所说的“道”，那么，这“道”自己岂没有思想、生命、话语、旨意呢？这“道”岂没有意志、权柄、智慧、荣耀呢？

=====

+++++

+++++

+++++

+++++

+++++

+++++

【引述 圣经 罗马书1章】

1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蒙召作使徒，奉派传 神的福音。2这福音是 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预先所应许的，3就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4按圣洁的灵说，因为从死人中复

活，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 神的儿子。5我们从他领受了恩典和使徒的职分，在万族中使人因他的名相信而顺服，6其中也有你们这蒙耶稣基督所召的人。7我写信给各位住在罗马，为 神所爱，蒙召为圣徒的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 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

8首先，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大家感谢我的 神，因为你们的信心传遍天下。9我在传扬他儿子福音的事上，用心灵事奉的 神，可以作证我是怎样不断地记念你们，10常常在祷告中恳切祈求，也许我可以照着他的旨意，终于能够顺利地到你们那里去。11因为我很想见你们，好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定；12也使我在你们中间，借着你我彼此的信心，大家一同得到安慰。13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好几次预先定好了要到你们那里去，为了要在你们中间也得一些果子，像在其他民族中间一样，可是直到现在还有阻碍。14无论是希腊人或是未开化的人，聪明的人或是愚笨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15所以，对我来说，我随时都愿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 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17 神的义就是借着这福音显明出来，本于信而归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18 神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19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 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20其实自从创世以来， 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21因为他们虽然知道 神，却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22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23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 神的荣耀。

24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作污秽的事，以致羞辱自己的身体。25他们用虚谎取代了 神的真理，敬拜事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事奉造物主。他是永远可称颂的，阿们。26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原来的性的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27同样地，男人也舍弃了女人原来的性功能，彼此欲火攻心，男人与男人作出可耻的事。他们这样妄为，就在自己身上受到应该受的报应。28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 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去作那些不正当的事。29这些人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心、阴险；满怀嫉妒、凶杀、好斗、欺诈、幸灾乐祸；又是好说谗言的、30毁谤人的、憎恨 神的、凌辱人的、傲慢的、自夸的、制造恶事的、忤逆父母的、31冥顽不灵的、不守信用的、冷酷无情的、没有恻隐之心的。32他们虽然明明知道行这些事的人， 神判定他们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

+++++

+++++

+++++

+++++

+++++

+++++

=====

什么是真正的奇妙：——的确，在这个宇宙世界中，有许许多多形态万千的事物、景色，有许多奇妙的动物、植物，更有那宏伟而壮观的天文物体与现象；然而，这个世界上最为奇妙的，却是人自己。人的眼睛、瞳孔如

[illegible]

Page | 789

第一品

法会因由分

原文：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

译文：

这是我亲自听到佛所说的。一时，佛在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里面，和大比丘众人、一千二百五十人一起。当吃饭的时候，世尊穿上袈裟，拿著饭碗，到舍卫大城去乞食。在城中，挨家挨户地要饭，然后回到原来的地方吃饭。饭后，收拾袈裟饭碗，洗脚，就盘坐在座位上。

（第一部分）什么是佛教

【世界佛教共识宣言】

《上座部佛教与大乘佛教的基本共识》（英語：Basic Points Unifying the Theravāda and the Mahāyāna）是一份重要的佛教普世宣言，发表于1967年世界佛教僧伽会（WBSC）的第一次会议。由已故的WBSC创办者及秘书长 Pandita Pimbure Sorata 长老，邀请化普乐·罗睺罗尊者拟定一份联合了所有不同佛教传统的简要条文，此文已由世界佛教僧伽会一致通过。

全文：

佛陀是我们唯一的导师；

我们都皈依佛陀、佛法和僧团；

我们都不相信世界是由神所创造和管治的；

我们都认同人生的目标是：对所有众生培育无差别的慈悲，为众生的利益、快乐与和平而努力，并培育能导向究竟真理的智慧；

我们都接受四圣谛，亦即是苦，苦因，苦灭，灭苦之道，以及缘起法则；

一切有为法是无常、苦的，及一切有为法和无为法是无我的；

我们都接受三十七菩提分法是佛陀所教导的导向觉悟之道的分别述说；

达至觉悟和解脱有三种：声闻、独觉、正自觉；我们都认同菩萨行和成就正自觉以拯救众生是最高、最神圣和最英勇的；

我们认同，对于佛教，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信仰和修习方式，但这些外在形式和表现不可与佛陀教导的基本教义混为一谈。

=====

展开阐述：

无论任何佛教派别、教派或系统的佛教徒，我们都认同释迦牟尼是教导我们的导师；

我们都皈依三寶：佛陀、佛法 和僧团；

无论是上座部佛教还是大乘佛教，我们都不相信这个世界是由神和他的意志所创造和管治的；

佛陀，我们的导师，是大慈悲、大智慧的体现者，以他作为榜样，我们都认同人生的目标是：对所有众生培育无差别的慈悲，为众生的利益、快乐与和平而努力，并培育能导向究竟真理的智慧；

我们都接受佛陀教导的四諦，亦即是：

苦，是生存于世间的现实，众生皆处于逼迫、无常、不圆满、不舒适、充满矛盾的困境之中；

苦因，是苦生起的事实，由于以虚幻不实的自我为中心而自私自利，苦即

生起；

苦灭，即由自我为中心而自私自利所造成的困境，是可以完全根除，达到释放、解脱、自在的事实；

灭苦之道，即解脱可经由实践称为中道的八聖道分，导向完美的道德行为（尸羅）、经训练的心（三昧）、智慧解脱（慧）；

我们都接受缘起法则所教导的世间因果律，因此，我们认为每一事物都是相对的、相互依存的、相互关联的；并且世间无一事物是绝对的、永久的与永恒的；

根据佛陀的教导，我们都理解：一切有為法是無常、苦的，及一切有为法和无为法是無我的，諸行的三相；

我们都接受三十七菩提分法是佛陀所教导的导向觉悟之道的分别述说，即是：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圣道；

达至覺和解脫有三种：阿羅漢、辟支佛、佛；我们都认同菩薩行和成就正自觉以拯救众生是最高、最神圣和最英勇的；但是，这三种觉悟和解脱并无不同，如大乘佛教的《解深密經》所言：“诸声闻乘种性有情，亦由此道此行迹故，证得无上安隱涅槃；诸独觉乘种性有情，诸如来乘种性有情，亦由此道此行迹故，说得无上安隱涅槃；一切声闻独觉菩萨，皆共此一妙清净道，皆同此一究竟清净，更无第二。我依此故，密意说言：唯有一乘。”；

我们认同，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僧人的生活方式，大众化的教徒信仰和修习方式，不同的仪式、仪轨和典礼，不同的风俗习惯等，但这些外在的形式和表现不可与佛陀教导的基本教义混为一谈。

(1. A)

为什么说，佛教中没有造物主

(1. A. 1)

五个方面的观念

世上的宗教有很多。然而，在世上许许多多林林总总的、千差万别的宗教信仰、以及相应文化传统中，成体系的、有详尽而系统化的宗教经书与教义为支撑的，有强大理论背景支撑的，能够构成一个相对而言完整神学、信仰理论体系基础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宗教，或三个宗教体系，即，以圣经为中心的基督教信仰体系；以及，可兰经为中心的伊斯兰教信仰体系；还有，一系列佛经为中心的佛教信仰体系。

这里，我们暂且不详细深谈基督教信仰与伊斯兰教信仰的深刻内容，以及圣经和可兰经的历史、关系、考据、文献、正典、原文等等，而是聚焦于佛教信仰体系。

在本书中，我们以佛教经典中的一本最重要的核心教义性书籍《金刚经》

为聚焦点（以后，我们也会讨论佛教经典中的其它重要典籍、书籍），从中分析、评介、剖析佛教的教义与思想，以及它在社会中、世人生命之中产生的相应影响。

无论是世上哪一种宗教信仰体系，它们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试图回答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信仰观；——或者说，在这些方面的观念、理论、理念、教义中，应当如何看待那些关乎世界、人生、价值、道德、信仰的种种问题？——

世界的本源、本质、未来、实质、存在、性质、属性、历史、规则、掌管、权柄、规律、等等，是什么？

人生的意义、内容、实质、光景、境地、期望、评价、作为、思想、情感、知识、智慧、公义、恩慈、未来、发展、归宿、结局、起源，等等，是什么？

道德的评价、标准、内容、基础、根源、权柄、尺度、善恶的分别、恩典、慈爱、圣洁、罪恶、结果、果效、动机、动力、源泉、等等，是什么？

价值的评判、体现、归结、动力、区别、比较、来源、基础、内容、驱动力，等等，是什么？

信仰的本质、对象、实质、内容、教义、形式、传承、经典、文化、目标、衡量、表现、目的、动机、根基、原因、法则、机制、范围、程度，等等，是什么？

（1. A. 2 ）

一个核心的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要分析、评介、剖析一个宗教的精髓与核心体系内容，那么，我们就应当来仔细地、认真地看一看，它们在关于上面五个方面的观念中，是如何阐述的。

在这五个观念中，即，在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上天，是否以他为信仰的中心与对象。

换言之就是：是否在信仰中承认、接受、敬拜、归向那位创造宇宙天地的主，那位全能、全在、全知、全备的、创造生命的主，那位伟大的、公义圣洁、恩典慈爱的造物主。

(1. A. 3)

“造物主”的意思是什么

“造物主”的意思是：那位终极的、超乎一切之上的、宇宙天地以及其中万有的、创造者和主宰。他是公义圣洁的，是慈爱恩典的；他把生命赐给人，把阳光雨露以及地上丰富的物产赐给人；他是道德律法的给予者，是道德世界的终极审判者。他把道德法则先天性地放在人的良知之中，使每一个世人都在内心深处知道诚实、公义、公平、正直等等道德品格的含义。

他创造了宇宙天地以及其中的万有，更创造了世人的生命，使他们能够听、看、思想，使他们有理性、智慧、道德与情感的能力。

他创造了人的耳朵和口舌，使他们有语言表达和理解的能力；他自己更能够把自己的旨意向世人显明出来。

他使人能够听见和明白话语的声音；他自己更能够听见世人的呼求和祈祷。

他使人有眼睛能够看见光明；他自己更能够鉴察这世上所发生的一切，以及人内心的一切真实光景与境地。

他使人有思想、智慧的能力；他自己更有着无限的智慧、思想、意志。

他是有“位格”的，即，他有完美的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过去、现在、未来所作的一切事情，以及为什么作这些事情。在他的一切作为、话语、意图、计划中，都有着无限智慧、圣洁的旨意与目的。

他把智慧与思想的能力赐给人，更把生命赐给他们，使他们成为“有灵的活人”；——即，使每一个世人也成为有位格的存在体；使他们有自我认知和自由意志的能力；使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所作的事情、所说的话语；使他们能够在他们自己的作为、话语、意图、计划中，常常包含着智慧的设计，以及道德的属性。

因此，人在这个世上与其他一切动植物、花花草草、鸡犬牲畜都存在着本质上深刻的不同。一株树木，虽然高大、参天、美丽，但是，却不能说话，更不能表达自己的任何感受与思想；在它的里面，没有“位格”，即，

它没有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换言之，在它的里面没有一颗真正的灵魂。

就严格意义而言，对于生命的真正定义，正是在此。一个无知无觉的存在体，就像是一个数学公式、或是科学研究中的黑盒子一样，在给定了输入信号与输入条件、系统状态的情况下，只会有确实的、不变的、一致的、死板的、甚至可观测研究的输出信号或是反应方式。换言之，在它的内部，没有一种驱动机制，使它可以自己自由地、自主地决定，在同样的外部条件下，去内在性地选择做、或者不做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这种自由的意志与自我的认知与意识，只有人才会有，正如一个人在某一个时刻，可以想要举手、或是不举手，或可以想要计划做一件事情、或是计划不做一件事情一样。

这种意识、意志的能力，在这宇宙世界中，是人所特有的。我们如果越是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就越会认识到这个问题是多么深邃而奇妙。这世界中的一切物体，都是由“死”的原子、分子等微观粒子所组成的；所有的物体与粒子，都按着牛顿运动定律等科学法则而运行；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它们都只能保持静止或匀速运动状态；——换句话说，它们都是“死”的；它们不可能有意识、自我认知，也不可能有意志、自由意愿。（对于这一点的认识，正是以造物主为中心的信仰与世上那些万物有灵、盲目迷信等等世俗宗教之间的重要分水岭；这也正是现代科学之所以诞生于基督教信仰为文化中心的欧洲的根本原因。我们将会在其它书籍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然而，人却不是如此。虽然，人生活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之中，受到各种有限的物质条件、生活条件、资源、健康等等的限制；但是，在人的里面，却有着一颗自由的心灵与灵魂。人的心思意念能够不受时空的限制，“飞”到遥远的天边；人的情感与思念能够遥“寄”给远方的亲人；人的心能够在复杂纷繁的外部条件下，进行深刻的思考、抉择，计划自己的行动目标，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更重要的是，在世人的里面，都普遍地有一种追寻真相、追求真理、寻找信仰、倚靠精神支柱的强烈倾向与信念。这些，都往往是人生命中最珍贵、最伟大、最高尚的组成成分。

从宗教、哲学意义而言，人因着这些极其特殊而宝贵的品性、属性，而被我们在这里定义为“生命”。生命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爱。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活的、有内在生命的存在体，才能够谈得上去“爱”一个对象；这正如，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对他而言，道德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不会审判菜刀或是手枪，给它们判定杀人罪，而是会审判、刑罚那使用菜刀或手枪的人；——因为工具本身是“死”的，是无知无觉的，所以它们也不可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有一个有自由的、有生命的主体，才会具有道德的性质。

这样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这个宇宙世界中无中生有出来的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而是，我们回答说，这样的生命，正是来自那位创造宇宙天地以及其中万有的主宰，来自那位创造生命、把生命赐给世人的上天，来自那位全能、智慧、有无限权柄的造物主。

虽然，在人的生命中，充斥着许许多多的罪恶，甚至，人的生命从本质上就犯罪背离了神；

虽然，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人的生命是如此渺小而短暂；

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人的身上，想见那位无限全能之造物主、永生之神的品格与属性；

这正如，我们能够从这个浩瀚宇宙的本身之中，能够看见那位全能、全知、全在、全备之上天、造物主的能力与属性一样。

任何人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从社会与人类的历史，从对于客观世界的观察中，从对于我们生命自省的过程中，都能够明白、理解、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物体、存在体，其背后都有导致其存在的因素、原因、作用力、机制、法则或导因。我们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浩瀚的宇宙，以及其中如此浩大、纷繁、复杂、美丽、奇妙的万事万物又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说，在这些所有事情、事物、事件的背后，一定有那样一位极

大能力、极其智慧、极其伟大、高尚圣洁的造物主。

宇宙是浩瀚无限的，因此，那位造物主就必然更是无限的，有着无穷的力量，更是生命的永远泉源。

虽然人是有限的，然而，由于人的生命有认知、意志，有价值判断、审美、秩序、知识、意愿、管理、恩慈、公义等等有限的能力或属性，从而，我们从人的生命中也能够知道，那位创造人生命的造物主，更有着意识、意志、价值判断、审美、秩序、知识、旨意、管理、恩慈、公义等等至善至美的能力与良善属性。

他掌管全地，监察人心，颁布道德法则，赏善罚恶，赐人生命，以公义和恩典待人，把救恩赐给万民。他是秩序的神，不是混乱的神；是喜爱良善之人的全能者，是公义圣洁的审判官；他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喜爱人的真诚、敬虔与谦卑，不喜爱人的虚伪、褻渎与傲慢、自义。

那造耳朵的，自己岂不能听见呢？

那造眼睛的，自己岂不能看见呢？

那赐人心灵与头脑的，自己岂没有思想、情感与意志呢？

他喜爱公义与良善，并将要终极地、公义圣洁地审判与惩罚世上的一切罪恶以及刚硬不悔改的罪人。

他创造的宇宙世界，何其浩瀚而美丽。如果，我们在夏天夜晚，凝视那清澈的星空，仔细地眺望那悬挂在夜空中的无数璀璨的星体；如果，我们在清晨的海边，看朝阳破晓，从天边磅礴而出的绚丽霞光；如果，我们俯视金色的麦田与浩渺的大地，或是遥望那雄伟翠绿的高山峻岭，或是奔流的大河之中的滔滔江水；——那么，我们就一定会惊叹于那位全能之造物主的创造之工是何其伟大而奇妙。

=====

(1. A. 4)

关于造物主之存在性的辩论

从一些基督教护教学书籍以及一般性哲学书籍中，比如柏拉图的哲学思想论述，或甚至是从中国古人的书籍比如诗经、甚至论语（尽管孔子并不愿意接受关于超自然信仰的思想理念，但是，孔子仍然在论语中时常提到上

天)中,我们都会看到对于上天、那位超越一切之上、眷顾世人之造物主的论述。

一般而言,那些相信造物主、上天、上帝之存在性的信仰者的思辨性论述,可以简单粗略地举例如下。

若没有那全能之造物主,那么,人的生命,包括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就不可能有终极的意义,而仅仅成了一个属肉体血气的存在体;在这个宇宙世间,人的生命就既不是可贵的,也不值得珍惜;人生命的意义,就仅仅成了或是虚无主义、或是弱肉强食的存在体而已。

若没有那全能之造物主,那么,人的生命、心灵与灵魂,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盼望,因为必将面临死亡而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每一个人所作的一切,就仅仅是为了在这个属肉体血气的社会中活着,并不得不面对冰冷的坟墓。

若没有那全能之造物主，那么，人间社会的道德，也不可能有任何真正坚实的根基与权柄的源泉。所谓道德，就仅仅是怎样维持社会秩序与运转的、功利主义的、伦理体系，而没有其内在的、终极层面的价值与意义。在这样的体系下，道德的力量是苍白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若没有那全能之造物主，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世界的起源。有人说，这个宇宙世界是自我存在的，从亘古就是如此。但这样的说法显然没有经过谨慎严格的哲学思考与逻辑思索。一个认真深思的人会认识到，这个世界如果不是被造的，而是亘古以来就是如此自我存在，那么，这个世界从无限远的过去就一定早已演化完结而进入彻底的寂灭。

若没有那全能之造物主，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科学，也不可能通过理性而认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之所以有普遍的、一致的、确定的、规则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之所以能够被数理以及逻辑的科学体系所研究，之所以是秩序的、而不是混乱的，正是因为，它是被这样一位智慧而全能之造物主所创造的。

若没有那全能之造物主，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在这个宇宙世界中观察到如此浩瀚而庞杂的、美丽而奇妙的、精确地调制的现象。比如，宇宙中有大约十个左右的基本物理常数，例如万有引力系数，电磁力常数，等等。这些常数直接影响到分子之间、原子之间、以及万物之间的各种作用力的大小。这些常数如果稍微有一点点不同于现在的数值，那么，这个宇宙中就根本不可能形成如此瑰丽的星空、数量巨大的星系，也根本不可能有生命，更不可能有我们这个美丽奇妙的蓝色星球。

=====

(1. A. 5)

佛教所信仰的神佛，究竟是怎样的神佛

然而，在佛教里面所信仰的神佛，却不是我们在上文所说的造物主，那全能、全知、全在、全备的上天、上帝、永生之神。

事实上，正如《世界佛教共识宣言》中所说的，也正如几乎每一本佛教经

典中的思想核心所表达的，——在佛教信仰体系中，并没有这样一位全能的、创造宇宙天地的、终极的造物主。

毋庸置疑，佛教是一个关于超自然信仰的宗教信仰体系，其中也谈到了许多关于世界本质、生命本质等等的问题。但是，佛教信仰的重点，在于每一个人的彻悟、看破、修行、成佛、等等；——关于世界与生命，佛教中谈到了许多复杂的、归纳性的、分门别类性质、甚至臆想性的纲目、条款，——究其实质，虽然其中有众多的神灵、以及各种各样称呼的超自然存在者，然而，他们却并非是那样一位全能、全在、全在、全知、全备、永生的造物主。虽然他们或许在某些方面看似具有造物主的部分能力、品格与性质（比如，有超自然的看见、知识、能力、生命，等等），但是，他们中间却没有一个是那样一位有无限能力的、终极的、公义圣洁的、至善的创造生命之主。他们在更大程度上，是智者、悟者、导师、引领者，可是，他们并非是创造生命之主，也不是那有着无限权柄的、生命的源泉、智慧的源泉、能力的源泉。

从广义的角度说，佛教思想属于泛神主义思想体系，其中也包含了多神主义内容与思想。粗略来说，佛教认为外部世界是客体，内在世界是主体，而神佛则是那些彻悟者；神灵与世界的关系，如同智者与房屋的关系，或是智者与思考对象之间的关系；前者因为智慧与彻悟，而不受后者的羁绊与搅扰。而这种智慧与彻悟，主要聚焦于否定主义，——即：既否定客体（外部世界）的实体性、本质性，也否定主体（内在世界）的实体性、本质性，而强调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等等；而这种否定主义，甚至否定“否定”本身，即：无实无虚，等等。

佛教的这种没有造物主、上天、上帝、无限全能之神的宗教信仰思想体系，与世上多数宗教信仰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直接影响到，佛教体系中对于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等等许多问题领域中的观念、理论、理念、看法。

事实上，佛教因着历史文化的原因，脱胎于印度古宗教，与今天的印度教在哲学层面，在关于“没有造物主”这一本质特点上，有着很多相似的关系；两者都可以粗略地被看作是属于泛神主义哲学理念。

=====

(1. B)

这与佛教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有什么本质而深刻的关系

由于在佛教中没有造物主、或不相信有造物主，因而，这一特征直接影响到佛教在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等领域中的一系列深刻的理念与观点。这些理念与观点的特征往往是泛神主义哲学所共有的。

这些理念与观点的特征，就是：——在世界观上，它们往往把世界看作是无珍贵价值、无隽永意义的，而不是把世界看为瑰丽、奇妙、意义深刻的。它们往往强调，世事无常，人不应当被世事羁绊，而是应当醒悟，看

清世界与世事的虚空性、撒谎性等等。在人生观上，它们往往把人的生命、心灵、位格等等看作是并无深刻价值意义的。

这种泛神主义哲学体系，由于没有造物主为中心的世界观、人生观，所以总是会指出，物质世界的虚浮性、不可倚靠性。然而，即使，这样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错，并且是重要的；但是，它们却缺失了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它们不能看见世界被造的奇妙性、美丽性、智慧性，也看不见世人生命的珍贵与独特、心灵的奇妙、思想的可贵。人的这种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是宇宙世界中一种最为独特、奇妙、珍贵的能力与品质，是来自于造物主、创造生命之主自己的无限能力与完美品质；这样的能力与品质，正是道德的基础，是爱的根源。

总而言之，它们把人生、世事、价值等等，往往都看为羁绊人的东西，提倡要离弃、舍得、放下，而不是要有满腔热忱的、执著的向往、盼望与信念。

究其原因，无论是人们在思考世界观、还是在思考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信仰观的时候，如果离开了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全能之造物主，那么，世界就是冰冷、荒芜、混乱、无意义、虚浮的，而人生也就是荒谬、困惑、荒诞、虚空的；甚至道德也往往成了虚浮的、欺骗人的符号与把戏；因而，根据泛神主义哲学，这些就都应当被看破、看空、舍弃，放弃执著，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

在评析本书《金刚经》的过程中，我们会清晰地看见上述特征。

第二品

善现启请分

原文：

时長老須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译文：

这时，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就从座位上站起来，偏袒右肩、右膝跪地，合掌恭敬地对佛说：“希有，世尊！如来护念一切菩萨，付嘱一切菩萨的佛法。世尊，如果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当如何安住无上正等正觉心？如何降伏妄心？”

佛说：“问得好！问得好！须菩提，正如你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你现在仔细听，当为你说明。如果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当这样安住无上正等正觉心，应当这样降伏妄心。”

“是的，世尊，我们很希望听佛详细地说明。”

（第一部分）信仰的起源、动机和动力

这里，因着须菩提所提出的这个问题，金刚经开始讲述关于佛教信仰中的一些最核心和看起来最深奥的教义。

（1. A.）

追求属世利益的所谓信仰

世人为什么应当有信仰呢？他们信仰的动机、起源和动力应当是什么呢？
世人为了什么原因而前来寻求信仰、渴望信仰呢？

许多世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往往看重的是饮食吃穿，看重的是身份地位，珍惜的是人情等等。他们眼中，往往被名和利填满；甚至，在信仰中，他们所想要寻求的，也是这些属世的利益。

他们渴望，——他们的信仰：——会带给他们丰足、康顺与平安；会使他们的儿女、家业、工作、财产、父母等等得到神灵的保佑；会使他们心想事成，升官发财，多子多福，福禄双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风调雨顺，瑞雪兆丰年，万事吉祥，出入平安，风顺水顺，逢凶化吉，等等。

总而言之，许多世人的所谓信仰，往往只不过是為了自己在这个世俗世界中、属肉体血气的世界中，得到各样的属世名利而已。他们所追求的信仰，虽然是超自然的，但是，他们所追求的动机、目的和目标，却在本质上根本不是超自然的，而仅仅是为了各种各样的此世的私利而已。

换言之，神灵、信仰，对于他们而言，只不过是他们的工具甚至奴隶，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而已。

对于他们面前的各种各样的神灵、信仰，这些世人不过是随手拈来、各取所需、临时抱佛脚。他们什么都信，又其实什么都不信。他们乞求那些众多的神灵来保佑他们，但实际上，他们一切乞求的动机，都不过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而已。他们愚蠢地以为，这些神灵就像他们自己一样，是不公义、不圣洁、不智慧的。他们以为这些神灵看人的脸面，看自己所得的

好处。于是，他们就妄想着，用各种各样的上香、敬献、建庙，来贿赂它们，讨好它们。然而，他们的内心却从不真正地归于任何公义圣洁的道德，而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偶像的崇拜，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庙宇庭院，其中摆放着各种各样人手所雕刻的金像、银像、石像、木像等等。世人把那伟大、圣洁、超自然的神灵，当作是自己手中所造的、物化的偶像，对它们顶礼膜拜，把它们置于烟雾缭绕的庙堂之中。他们愚顽地以为，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信仰。他们荒谬地认为，这就是他们在信仰中所要追求的。他们所看重的，不过此生、此世、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而已。

(1. B)

【引述 圣经 吃什么 穿什么 他的国和他的义】

马太福音6章

24“一个人不能服事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事 神，又服事金钱。25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甚么喝甚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甚么。难道生命不比食物重要吗？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26你们看天空的飞鸟：牠们不撒种，不收割，也不收进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牠们；难道你们不比牠们更宝贵吗？27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28何必为衣服忧虑呢？

试想田野的百合花怎样生长，它们不劳苦，也不纺织。29但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最威荣的时候所穿的，也比不上这花中的一朵。30田野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进炉里，神尚且这样妆扮它们；小信的人哪，何况你们呢？31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该吃甚么？喝甚么？穿甚么？’32这些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33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34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1. C)

【引述 圣经 我们有什么好处】

诗篇4篇

大卫的诗，交给诗班长，用丝弦的乐器伴奏。 1我公义的 神啊！

我呼求的时候，求你答应我。

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舒畅。

求你恩待我，听我的祷告。

2尊贵的人啊！你们把我的荣耀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

你们喜爱虚妄，追求虚谎，要到几时呢？

3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虔诚人分别出来，归他自己；

我向耶和华呼求的时候，他就垂听。

4你们生气，却不可犯罪；

在床上的时候，你们要在心里思想，并且要安静。

5你们应当献公义的祭，

也要投靠耶和华。

6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得甚么好处呢？”

耶和华啊！求你仰起你的脸，光照我们。

7你使我心里喜乐，

胜过人在丰收五谷新酒时的喜乐。

8我必平平安安躺下睡觉，

因为只有你耶和华能使我安然居住。

诗篇73篇

神必善待内心清洁的人

亚萨的诗。 1 神实在善待以色列，

善待那些内心清洁的人。

2至于我，我的脚几乎滑跌，

我险些跌倒。

3我看见恶人兴隆，

我就嫉妒狂傲的人。

4他们没有痛苦，

他们的身体又健康又肥壮。

5他们没有一般人所受的苦难，

也不像普通人一样遭遇灾害。

6所以，骄傲像链子戴在他们的颈项上，

强暴好象衣裳穿在他们的身上。

7他们的罪孽是出于麻木的心，

他们心里的恶念泛滥。

8他们讥笑人，怀着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

9他们用口褻渎上天，

他们用舌头毁谤全地。

10因此他的人民归回那里去，

并且喝光了大量的水。

11他们说：“ 神怎会晓得？

至高者有知识吗？”

12看这些恶人，

他们常享安逸，财富却增加。

13我谨守我心纯洁实在徒然；

我洗手表明清白也是枉然。

14因为我终日受伤害，

每天早晨受惩罚。

15如果我心里说：“我要说这样的话”，

我就是对你这一代的众儿女不忠了。

16我思想要明白这事，

我就看为烦恼；

17直到我进了 神的圣所，

才明白他们的结局。

18你实在把他们安放在滑地，

使他们倒下、灭亡。

19他们忽然间成了多么荒凉，

被突然的惊恐完全消灭。

20人睡醒了怎样看梦，

主啊！你睡醒了，也要照样轻看他们。

21我心中酸苦，

我肺腑刺痛的时候，

22我是愚昧无知的；

我在你面前就像畜类一般。

23但是，我仍常与你同在；

你紧握着我的右手。

24你要以你的训言引领我，

以后还要接我到荣耀里去。

25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

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无所爱慕。

26我的肉身和我的内心虽然渐渐衰弱，

神却永远是我心里的盘石，是我的业分。

27看哪！远离你的，必定灭亡；

凡是对你不贞的，你都要灭绝。

28对我来说，亲近 神是美好的，

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

我要述说你的一切作为。

(1. D)

在哪里安心

在这里，须菩提在佛的面前，问了两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应当如何安住我们的心呢？”“我们又应当如何降伏我们的妄心呢？”

我们生命与心灵的锚，应当放置于何处呢？我们的生命的倚靠，精神的支柱，生命的盼望与根基，应当在于何处呢？我们又应当如何胜过自己，战胜自己的软弱、缺点、谬误、愚妄呢？

如果我们诚心向善，如果我们想要追寻真理，如果我们想要得到真正的、敬虔的信仰，如果我们想要彻悟人生、明白世界，如果我们想要得到尽善尽美的人生与生命，——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安放我们的心呢？应当怎样降伏我们的心呢？

这，基本上就是须菩提在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坦率地说，这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关于信仰的问题。这个问题中所体现出的关于信仰所应有的动力、动机、目的、目标，要远远好于我们在前文所述的、那些眼目中只有属世利益的世人心中的所谓信仰。

那么，就让我们沿着金刚经的脉络读下去，看一看金刚经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又是怎样以此阐述佛教的核心深奥教义的。

=====

（第二部分）什么是信仰、信靠

（2. A）信仰的对象

如果我们想要探讨信仰的问题，想要知道关于信仰的真理，那么，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信仰的对象是什么呢？

我们所信仰的对象，是这个世界吗？是神灵吗？是众多的神祇吗？是佛吗？是某种高深的智慧吗？是某个高深的哲学吗？是某个博大精深的哲理体系吗？

信仰的真理是什么呢？

还是，我们所应当信仰的对象，是那位创造宇宙天地的主，那位超越一切之上的上帝、生命之主、永生之神呢？

（2. B）信靠的对象与本质

我们所信仰、信靠的对象，他或它、他们或它们，本质是什么呢？我们之所以信靠他们或它们，是由于什么呢？是由于它们的权柄、能力吗？是由于他们的心意、意志、旨意、品质吗？是由于它们的深刻、真实、精深的真理吗？

我们所信仰的对象，本质在于什么呢？

（2. C）真理是什么

真理首先是真实、真相。真理绝非仅仅是抽象的玄学、也绝非是什么故作高深、故作玄奥的理论，而是关乎生命的真实，是客观的真实与实际、本相。

真理是简单的、直白的，是明晰的、清楚的，是每一个世人都能够懂得、都应当懂得的。

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的最重要意义之一，就是要追寻真理、渴慕真理、求索真理。

真理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心灵与灵魂的，是最本质、最深刻的真相、事实、道理。

（第三部分）信仰的目的

我们为了什么而信仰，那背后的原因，正是我们信仰的对象。即，信仰的动机、目的，与信仰的对象、内容，其实是本质一致的。比如，我们为了此世的福利而信仰某个宗教，那么，我们所真正信仰的对象、内容、所倚靠的锚，就是此世的福利而已。

（第四部分）信仰的敌人（云何降伏其心？）

（4. A）人生命的本质

罪的本质：——罪的性质，绝非仅仅是表现于外在言语行为上的欺诈、暴力、谎言、欺压、盗窃、贪婪、冒犯、杀人、放火、奸淫，等等，而是，

从人的内心深处所发出来的根深蒂固的症结。

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所有人都犯了罪，亏缺了造物主、上帝的荣耀。所有人都背离了生命中所应当有的公义、圣洁、正义、良善、恩慈的道德品德。

所有人在心中都以自己为宇宙世界的中心，都看重那些与己有关的利益之事，而轻视那些与己无关的事情。因此，人们常常会看重自己的同乡、同学、同僚、家人、亲人、亲戚、朋友、同胞，重于世上的其他人；甚至，会不问事情的青红皂白、不看事物的本身之理、不看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而充满偏见地对待他人，固执地认为自己的国家比别人的国家好，自己的文化比别人的文化好，自己的利益比别人的利益重要，等等。世人就是这样生活在以自己为中心的大大小的同心圆之中。

如果这世上没有法律与刑罚的羁绊，如果这世上人们可以随心所欲、而不会承担任何事情的后果、责任、审判、惩罚，那么，我们会惊讶地看见，在任何一个世人的心底、深处，都隐藏着多么罪恶的、可耻的、龌龊的、野蛮、丑陋的心思意念。

是的，虽然，人在这个宇宙世界中是最宝贵的，有着最可贵的自我认知、自由意志的能力，有着道德的性质，有着那本应当能够通向永远的生命、心灵、与灵魂；人与这世上的一切事物都不相同、都本应当更加高贵、圣洁、满有贞德；——但是，人却可耻地、无知地、顽梗地生活在罪中而不

自拔，生在罪中、死在罪中、沉沦在罪中、灭亡在罪中，并将要受到对于罪的终极而永远的审判惩罚；——而且，人还不愿意有敬畏之心，还刚硬顽梗地不愿从罪中悔改。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生命中充满了罪性与罪行；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曾经说过谎、没有占过别人的便宜；没有一个人没有曾经在心里面犯奸淫、贪婪、贪恋别人的东西与利益。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曾经在内心对别人不当地发怒，也没有一个人不曾以冷漠的心对待别人，以高傲自义的人心看待别人，以嘲笑、甚至幸灾乐祸的心态看待别人的失败与尴尬。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对待我们心中的罪性呢？我们应当如何降伏我们的心呢？我们应当怎样除去我们心中罪的势力与污秽呢？

（4.B）人生命的敌人

人的真正利益在于何处？如果没有上帝、永生之神，那么，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得到我们的真正利益？

如果有上帝、永生之神，那么，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得到我们的真正利

益？

人真正的利益所在，难道不正是在于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吗？然而，我们到哪里去寻找真正的幸福呢？那真正的幸福，一定是胜过死亡的；否则，无论多美好的温馨幸福的愿景，在死亡面前都是滑稽的、虚浮的。在死亡的面前，任何谈论幸福的话题都是苍白无力的。

然而，死亡的本质是什么呢？凭着什么，人才能够胜过死亡呢？胜过死亡的权柄在于什么呢？如果真的有那创造宇宙天地之主、那创造生命之主，那永生的上天、上帝，——那么，那胜过死亡的权柄，难道不正在他的手中吗？人只有悔改罪、离弃罪、相信和接受他救赎的恩典，才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才能够真正地胜过死亡。

人生命中的敌人，其实正是自己。人犯罪所戕害的，正是他自己。因着罪，人与公义圣洁之上帝之间有了根深蒂固的隔阂；人若不悔改，就必然灭亡在罪中、并将要面临那永远而终极的刑罚。

【引述 圣经 约伯记35章】

1以利户回答说：

2“你说：‘我在 神面前更显为义’，

你自以为这话有理吗？

3你还说：‘你有甚么益处呢？

我不犯罪有甚么好处？’

4我要用言语回答你，

和与你在一起的朋友。

5你要往天仰望观看，

细看高过你的云天。

6你若犯罪，你能使 神受害吗？

你的过犯若增多，你又能使他受损吗？

7你若为人正义，你能给他甚么呢？

他从你手里能领受甚么呢？

8你的邪恶只能害像你的人，

你的公义也只能叫世人得益。

9他们因多受欺压而呼叫，

因受强权者的压制而呼求。

10却没有说：‘ 神我的创造主在哪里呢？

他使人在夜间歌唱。

11他教导我们过于教导地上的走兽，

使我们有智慧胜于空中的飞鸟。’

12因为恶人骄傲的缘故，

他们在那里呼求， 神却不回答。

13真的， 神必不垂听虚妄的呼求，

全能者也必不留意，

14更何况你说你不得见他。

你的案件在他面前，你忍耐地等候他吧！

15但现在因为他还没有在忿怒中降罚，

也不大理会人的过犯；

16所以约伯开口说空话，

多说无知识的话。”

=====

（4. C）我们渴盼、期望得到什么

幸福是什么？

仅仅是身体的舒适、心灵的舒畅吗？难道人的幸福，不是正在于人心中最深刻的平安与满足吗？不是正在于爱与被爱吗？幸福，是我们在此生此

世无论经历风和日丽还是狂风暴雨的时候，都能够在心里面有那永远的、属灵的平安；是我们深知，那创造宇宙天地之主以牺牲的爱（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救赎与永生，而死在十字架上、并第三日复活）而爱了我们，因而，从此，我们就再也不畏惧任何困难、苦难、痛苦、别离甚至死亡。

利益是什么？

仅仅是自己所得的、各样的、物质上或精神上的好处吗？如果人的心里面没有爱，如果人的生命中没有公义、圣洁、美德、慈爱、恩典，那么，人眼中的任何利益，就是他的自我所能够得到的什么美好之物、美好之事，而与别人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如果在人的心中有那来自于永生之神的爱，那么，——正如芬芳美丽的爱情，是生死相许、以心换心的，同样：——人的真正美好利益，就是在于他心中的爱得到完美的成就与满足，就是在于他的圣洁生命与美德而得上帝的喜爱、悦纳，就是在于他真心知道别人的生命得到了上帝的祝福，而他自己也在那祝福中有分，就是在于使自己的生命成为上帝祝福他人生命的管道，使自己成为对于美好之事的服事的仆人。——这才应当是一个人的真正利益所在。

“舍得”是什么意思？

佛教的思想文化，经常告诉我们应当“舍得”、“放下”、“看破”、“彻悟”、等等。

这是什么意思呢？固然，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应当清楚地看到、明白，我们手中的物质财物，以及所享有的物质条件与环境，既不是永远长存的，也没有隽永深刻的价值意义，因而，我们不应当把心系于这些物质性的东西上，以它们为我们心灵的依归，而是要寻求我们真正的幸福与利益所在。

然而，信仰的真正精髓，绝非是负面的“抛弃”“舍得”“放下”等等为核心内容，而是应当告诉我们，我们所真正应当信靠、倚靠、依归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即，如果我们不应当作一个拜金主义者、物质主义者，那么，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应当以谁、或是以什么，为我们的信仰对象、信仰内容？这是问题的关键。

降伏什么？

我们所应当降伏的，是我们的罪心、罪性；我们究竟到哪里，能够得到战胜自己之罪性的力量呢？

守住什么？

我们又应该守住什么呢？我们的心应当住在哪里呢？我们的良知，应当如何安放呢？

目的是什么？

我们做这一切的事情，目的又是什么呢？

信仰，是关乎心灵、更是关乎生命、永生的事。

信仰的根基与目标是什么？

盼望本身，是应当的吗？为什么？

让我们继续本书的思索之旅，深入地思考关于上述问题的种种答案。

第八品

依法出生分

原文：

「须菩提！于意云何？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宁为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彼。何以故？须菩提！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

译文：

“须菩提，你的意思怎么样？如果有人用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来做布施，这个人所得到的福德，多不多呢？”

须菩提说：“很多，世尊。为什么呢？是福德，即非福德，所以如来只能说福德多。”

“如果有人，受持此经中的义理，甚至只是用四句偈语来为他人解释说明，他的福德要胜过用充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来布施所获得的福德。为什么呢？须菩提，一切诸佛，以及诸佛无上正等正觉法，都是从这部经出的。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

（第一部分）是福德，即非福德

什么是福德：——因做了良善之事而得到的福气与德行、功德。

到底有没有福德：——在佛看来：——福德既是有，也是没有；不过，不同的福德之间，是可以比较大小的；例如，受持传诵金刚经的福德，就远远地超过用世上的一切其它财宝来布施而得的福德。

信仰的动机、目的、与结局、结果：——我们在信仰中的动机与目的是什么呢？这动机与目的，与福德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在信仰中，又期待什么样的结局与结果呢？

我们为了什么原因，而愿意接受、相信一个信仰？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吗？是为了此世的利益吗？是为了来生的好处与利益吗？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功德、福气吗？

我们在信仰中，期待最后的结果应当是如何呢？是要成佛、成仙吗？是要进入不生不灭的净土，或是永恒的寂灭、涅槃吗？

亦或是，我们誓言：“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即，把所有人都超渡成佛，让所有人都彻悟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看破红尘，——等到所有人都成佛以后，自己再成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但是，这样“度尽众生”的执著本身，是不是又是错误的呢？是不是又是违背了金刚经的原则，堕入了“我、人、众生、寿者相”之中了呢？

上述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以一颗真诚、敬虔、谦卑、认真的心去仔细思索，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里面的教义其实是一锅粥、不清不楚的。或许，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本身，正是佛教教义、以及金刚经的主旨本身所想要强调的吧。（甚至，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本身，也是金刚经所要反对的对象：——清楚是不对的，不清不楚也是不对的。）

如果我们把信仰中的常见的动机、目的、所期待的结局和结果，认真思考并进行简单的分类，那么，我们可以说，大约有以下几个类别：——外在的利益，内在的利益，超自然的利益，自身的优点，内在的优点，外在的优点，等等。让我们分别依次思考一下。

外在的利益：——外在的利益是指，人们在此生、这个世界中所得到的各

种各样外在的、可见的好处与利益。例如，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家庭美满、婚姻幸福、儿孙满堂、生意发达、财物丰足、出行顺利、考学中榜、一生平安，等等。难道，许多世人不正是仅仅为了这些外在的、属世的、属肉体血气的利益，而选择相信一个什么宗教信仰的吗？

内在的利益：——内在的利益是指，人们因着在道德方面所作的一些看起来“好”的事情，或是在道德品质方面所拥有的一些看起来“好”的品行，从而，所“收获”的一些在性格、品德、道义方面的功德、福德。

超自然的利益：——超自然的利益是指，人们在死后，因着生前在信仰方面所皈依的内容，或是在信仰方面所积累的德行与功德，从而，所得到的超自然性质的嘉奖或是福报，比如，能够下辈子投胎到更富贵的人家，或是能够进入一个更高深的境界，或是能够进入某种超自然的净土之国，或是，成佛，甚至进入永远的寂灭、涅槃，等等。

自身的优点：——自身的优点是指，自己所具有的某种先天性的优点、优势、强项，比如，自己出身官宦世家，或天资聪颖，或身体底子好、身强力壮、或相貌英俊或秀美，或是家境良好、有条件能够得到良好教育，或是出身书香门第、养尊处优且看似品行优雅，等等。

内在的优点：——内在的优点是指，一个人在道德方面，有一些助人、善待他人、甚至忧国忧民、心怀天下、怜恤他人等等的德行。

外在的优点：——外在的优点是指，一个人做这样或那样的“好人好事”、丰功伟绩，或是做许多捐助别人、甚至为了帮助别人而牺牲自己利益的事情，等等。

上述哪一个方面，或是，还有什么上面没有列出的、其它方面的好处与利益，是我们在信仰中应当有的动机、动力，或是想要达到的目的、目标、结果、结局状态呢？

上述动机、好处、利益，哪一个是在我们在信仰中所应当渴望得到的呢？哪一个应当是在我们在信仰中的真正而本质的动机呢？

严格地说，我们在信仰中想要寻求、得到的结果、状态、性质，可以包括各种各样的内在与外在利益与优点、优势。这些也可以是我们为之而祷告祈求的。——利益和优势本身，并不见得有什么不好。关键问题是，在我们的信仰中，什么样的动机是真正本源性、根基性的呢？

我们在这里想要探寻的真正问题关键是，从终极的层面而言，我们究竟应当是为了什么动机、目的、结果或原因而持守信仰、追寻真理呢？从终极层面而言，我们选择相信、接受某一个宗教信仰，就仅仅是为了上面所列的某些好处或是全部利益吗？

那么，我们是否就是“有奶便是娘”呢？

换句话说就是——

是否，无论是谁，只要能够给我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出入平安、或是家人平安、等等保佑、“祝福”，那么，我就相信他或它的教义呢？

是否，无论是谁，只要能劝人向“善”，使我积累功德，下辈子投一个好胎，我就相信他呢？

是否，我相信一个宗教信仰、并多行善事的目的、动机，——就是为了积功德呢？

是否，无论是谁，只要能够让我们国泰民安，那么，我就相信他或它的教义呢？

那么，我们的信仰，与功利主义、功德主义（即，客观为他人，主观为我）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不就是，只要结果好、结果正确，不管我相信什么教义、宗教，不管使用什么手段，也不管让我自己、或让别人付出什么牺牲，——即，“只要结果和目的正确就一切都是正确的”吗？

这样，岂不正是有点像“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哲学吗？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很多政治势力秉持这样的哲学。甚至，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正是凭着这样的理由，为了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度，而大行杀戮。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为了在世上建立一个理想国、乌托邦，而大搞阶级斗争、牺牲个体自由、甚至大搞领袖崇拜、专制主义，等等。

这种为了好“目的”而宁愿牺牲一切的理想主义，不仅其教义在本质上是谬误的，而且给人类社会带来贻害无穷的后果。

严格地说，在信仰中，功利主义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信仰的目的、路径与目标、结局是连为一体、不可分割、浑然一体的。程序正义与目标正义，两者是不可分离的。圣洁的目的，只有通过圣洁的手段、过程，出于圣洁的心意，才能够达到。

更进一步说，另一方面，若功利主义是错误的，那么，是否像佛在这里所说的那样，受持、传诵金刚经的福德，远远大于其它的各种各样良善之事呢？

而金刚经就整体而言，其主旨是什么呢？它在告诉我们，信仰的正确动机与目标应当是什么呢？

是否，就像金刚经这样，我相信一个宗教信仰，就应当是为了“什么也不为”的原因，就是“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看明一切都“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呢？

这样的模棱两可与含糊其辞的金刚经内容，并不能给人带来：——热切的、真挚的、全心全意、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信仰。——这是因为，与其说金刚经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信仰的动机，不如说，它用否定主义哲学来告诉我们，在信仰中不要有任何执著的动机。

圣经是如何告诉我们的呢？

【引述 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就都加给你们了】

马太福音第六章

24“一个人不能服事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事 神，又服事金钱。25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

忧虑吃甚么喝甚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甚么。难道生命不比食物重要吗？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26你们看天空的飞鸟：牠们不撒种，不收割，也不收进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牠们；难道你们不比牠们更宝贵吗？27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28何必为衣服忧虑呢？试想田野的百合花怎样生长，它们不劳苦，也不纺织。29但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最威荣的时候所穿的，也比不上这花中的一朵。30田野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进炉里，神尚且这样妆扮它们；小信的人哪，何况你们呢？31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该吃甚么？喝甚么？穿甚么？’32这些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33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34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马太亨利圣经注释】

主耶稣最经常、最恳切地警告门徒们的，就是不信、三心二意、忧虑不安的罪；我们不要为生命中各样的属世事情而忧虑；因为这是一个糟糕的记号，说明了我们的心、我们的财宝是在这个地上。所以，基督对此一再强调。

I。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基督是我们的律法给予者，是我们心的主人，是我们的安慰者，是我们的帮助者。他把喜乐赐给我们。基督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不要为身体而忧虑。不要为生命而忧虑。（25、31、34节）。不要为这些属世的事情忧虑。不要像那些信仰虚伪之人一样。这里三次重复这个警告；这并非是没有意义的重

复；神的命令，要不断重申、不断叮嘱；——因为这是一个很容易抓住我们的罪。我们必须没有忧虑地在这个世上活着——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对于基督来说，这是非常让他悦纳我们的事。基督的门徒们，不要把心思分割成很多细小的碎片，去为那些属世的事情忧虑烦恼。关于此生的事情，正确地面对、认真地思度、筹划、勤勉，这不仅不是错误的，而且是我们的职分——就像箴言27章所讲述的贞德妇人一样。

（哥林多后书11章28节、腓立比书2章20节：保罗、提摩太挂念教会的事情）。

这里，基督禁止我们的是：1. 焦虑不安、内心慌张的心态。这样的人，心思一会这样，一会那样；他们没有在神里面所得着的喜乐，也在神里面没有盼望；他们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患得患失。他们不能在神所赐与的环境和条件中得到平安，也不能在朋友那里得到安慰。2. 不信、没有信靠的意念。神应许，会把我们生命中所需的那些必要的、圣洁的事物赐给我们；神会把饮食衣物赐给我们——虽然不是山珍海味，但是却使我们能够饱足。神并没有说：“你们将要日日筵席”，而是说：“你们必有饱足的食物”。但是，那些忧虑慌张的人，却不信靠神的应许和良善；他们在困难中，心情胆怯，不信靠神的意旨安排，不信靠神的恩慈与智慧，不信靠神自己。在当前的处境下，我们不仅可以、更是应当要通过正当的、勤勉的努力，去争取各样的事情；否则我们就是在试探神。在神所呼召我们的事业中，我们必须勤奋，必须要谨慎地计划和支配我们的资源，来得到最好的结果；我们必须为每日的饮食而祷告祈求。信靠神的人，不会说，我怕羞、不愿乞讨（路加福音16章3节）；而是愿意吃桌上掉下的渣子（路加福音16章21节）。然而，关于未来，我们必须要把忧虑关切的事情交托给神，而不要为我们的生命吃什么、喝什么而

忧虑——否则，我们就是不信靠神。神知道，怎样供应我们、预备我们；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未来会怎样。让我们的灵魂在他里面得着安息！诗篇127篇2节：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惟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

（1）我们不要为生命而忧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忧虑，就是自己的生命。这世上的一切世人，如果迫不得已、没有选择，那么，都愿意用一切东西来换取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们不要为生命而忧虑：【1】不要为生命的延续而忧虑。把我们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由神凭着自己的意思，或使我们长寿，或使我们短寿。我的时间都在你的手里；你是良善的主。

【2】不要为生命的舒适与安慰而忧虑。我们的生命，或苦或甜，都交托在神的手里。我们不要为未来的那些饮食衣物等等乞求；这些东西，神已经应许了；所以我们应当满有信心地期待；我们不要说，吃什么？因为这是出于绝望或是不信的心。

（2）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未来乞求；不要为明年是否还活着而忧虑，不要为何时老去、何时辞世而忧虑。我们不可为明天夸口；同样，我们也不应为明天而忧虑。不要担心明天的事情。

II。为什么不要忧虑。基督的命令本身，就已经是足够的理由；我们应当顺从基督的吩咐，不要落在忧虑、不信的罪中。我们的心里要在基督那里得到安慰。然而，为了显明在此处的强调，基督又进一步给出了关于上面的吩咐的原因解释。基督的这些话语，给那些信从他的人带来巨大的喜悦；因为基督的解释是强有力的。为了驱除我们的忧虑，赶除我们的胆怯，基督在这里用极其有说服力的话语，使我们得着安慰。我们的心应当仔细思想，去除忧虑，为自己的惴惴不安而感到羞耻。我们应当有积极的、活泼的信心。

1. 生命不 胜 于 饮 食 吗 ？ 身 体 不 胜 于 衣 裳 吗 ？（25节）
是的，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基督完全明白那真正的价值是在哪里——因为他是创造那些饮食衣裳的神，并且他用这些饮食衣裳来支撑我们的生命——他更创造了我们的生命和身体。这里问题的答案，是不言自明的。（1）我们的生命，是神给我们的恩赐；这祝福本身，远远大于我们所得的饮食衣裳。的确，我们的生命离不开饮食衣裳这些物质上的支撑和供应；但是，饮食衣裳本身的价值，要远远小于我们的生命与身体的价值。然而，世人所乞求的，却常常是那些饮食和衣裳。饮食和衣裳是为了生命；目标，肯定比途径、手段更高贵、更卓越、更有价值。最精美的食物、最华丽的衣服，也是出于土；但是，我们的生命却是来自于神的灵、神的吹气。生命是人的灯；饮食只是像是维持灯继续燃亮的灯油。所以，在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别，其实并没有那么大；因为，就其最重要的事情意义而言，富人与穷人都是站在同一个水平上；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物质上的差别其实微不足道。（2）这是对我们的鼓励。我们应当信靠神，而不要为饮食衣物等等事情而焦虑烦恼。神赐给了我们生命，赐给了我们身体。这是极其大能的作为。这是极其恩惠的作为。这并非是出于我们自己

的原因。既然，神创造了我们的生命、身体，那么，他还有什么是做不成的呢？他还有什么是愿意做的呢？如果我们看重的，是我们的灵魂以及永恒的归宿（那些远胜过我们生命与身体的事情），那么，我们就会把饮食和衣物这些事情完全地交在神的手里（那些远逊于我们生命与身体的事情）。神已经一直在看顾我们，直到今日；那么，他就一定会继续保护我们，保守我们。神护卫着我们，使我们不遭遇凶恶；神也一定会供应我们，把美好的东西赐给我们。如果神想要杀我们，想要饿死我们，那么，他就不会这样常常差遣众天使来保守我们了。

2. 看那天上的飞鸟，想一想那野地里的百合花。神的普遍的意旨安排，保守着那些各样的生物，以及大千的世界。所有被造之物，都要仰赖造物主的恩顾，倚靠神的意旨安排。人已经堕落到了何等地步，甚至要向那些天空的飞鸟学习顺服神、明晓神的大能！约伯记12章7-11节：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或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華的手做成的呢？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耳朵岂不试验言语，正如上膛尝食物吗？

（1）看天上的飞鸟，学习它们信靠神，从神那里得到喂养（26节）；这样，你们的心就不会忧烦慌张，不会为生命的饮食而忧虑。

【1】神的意旨安排、护理之工，在看顾着它们。我们要仔细地观察它们，从它们身上学习到功课。天上有各种各样的飞鸟，有数目繁多的飞鸟，它们都能找到食物，都能得到天父的喂养。即使在严寒的冬天，它们也能够吃食物、存活。这些飞鸟，看似是渺小的，但却有神在看顾它们。诗篇50篇10-11节：“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神的普遍的恩顾，临到那些最不起眼、最卑微的受造之物的身上。这里尤其强调的是，这些飞鸟所得到的看顾，甚至不是它们自己努力的结果；它们也不种，也不收，也不把谷物积聚在粮仓里。蚂蚁和蜜蜂的确是常常勤劳地工作；但是天上的飞鸟却没有。它们并不为明天的饮食而忧虑，而是每天过每天的日子；正如白日每天来临，他们也在每日之中享受着神的供应。它们的眼睛，是注目于神的看顾；那位伟大而良善的看顾者，把食物赐给一切生命。

【2】从这些飞鸟的例子中，你要得到鼓励，信靠于神。难道你们不比那些飞鸟更好吗？是的，当然。你们本应是神的儿女。你们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天国之子，当然本应当胜过那天上的飞鸟；你们本应比它们更尊贵、更优秀；你们能够比它们飞得更高；你们有着更好的本质，本应比它们更有智慧。约伯记35章11节：“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可是，世人因为犯了罪、背离了神、与神隔绝，竟然不认识神的审判与公义，也没有各样动植物的智慧。耶利米书8章7节：“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你们是神更亲爱的、更看重的、更

亲近的；——虽然天上的飞鸟比你们看似更能在天上翱翔。是的，神是它们的主，神也是你们的主；然而，除了这些之外，神更是你们的父；在神那里，你们比一切飞鸟都更加宝贵。你们是他的儿女，是他头生的；那喂养了天上飞鸟的神，必不会让他自己的孩子饥饿。天上的飞鸟尚且知道要倚靠你们的天父的意旨安排，那么，难道你们这些儿女却不愿意信靠你们的天父吗？天上的飞鸟，并不为明天而忧虑；它们是生物中最快乐的；它们在树枝间快乐地歌唱（诗篇104篇12节：“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它们尽自己的力量，用歌声称颂着那伟大的造物主。如果，我们凭信心也能够像那些飞鸟一样、不为明天忧虑，那么，我们也能像它们一样欢欣地歌唱、颂赞神。可是，世事的思虑，明日的忧愁，在我们的喜乐上面盖了阴霾的纱布，使我们无力颂赞，使我们默然无语。

（2）看那些野地里的百合花，你们会学习到功课；在衣裳的事情上信靠神。这也是我们常常忧虑的事情。我们不仅忧虑饮食，也忧虑穿衣。衣服能够给我们带来优雅，能够防护，更能够带来尊严和装饰；世人常常为华丽的衣服穿戴而费心忧愁。但是，让我们想一想那野地里的百合花；不仅是用赏心悦目的心情去看它们（所有人的眼睛都喜欢看那些美丽的花朵），而且更认真地去仔细思想关于它们的事情。在我们每日所看见的一切事情中，若我们仔细思想，就会从中得着益处（箴言6章6节）（箴言24章32节）。

【1】看那些百合花多么娇弱。它们如同野地里的草。百合花的颜色虽然清

纯而美丽，但，它们仍然只不过是地里的草。所有的肉体的生命，都是如同草一样：——尽管身体和意念中的某些部分美丽如同百合，令人羡慕，但，我们都不过是如同草一样；我们在本质上、本性上，和野地里的草是一样的；我们的身体和性命，与草都是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人的日子，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也是如同花草一样（彼得前书1章24节：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荣，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要扔到炉子里焚烧。再过不久以后，我们也要离开这个世上；我们所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不再认识我们。坟墓就是我们所要被扔进去的炉子，在那里，我们要像草一样被焚烧。诗篇49篇14节：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死亡必作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存。——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我们不要为明天而忧虑，不要为穿什么而忧虑——因为，我们明天或许就要穿着坟墓的衣服下葬。

【2】看那些百合花是多么自由而没有忧虑：它们不像人那样劳作，也不挣钱；它们也不织布、也不纺线、也不做衣服。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轻轻忽忽；我们可以、也应当在生命中忙碌地从事正当的工作，正如箴言31章19、24节所称赞的那个贞德妇人，辛勤劳作，织麻布、纺线、作细麻衣、卖给商家。懒惰的人，并不是信靠神，而是试探神。然而，神若恩慈地看顾那些软弱的、不劳作的生物，那么，他就一定会更大地、更丰富地看顾和供应我们，祝福我们的劳作。我们应当辛勤工作，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职分。但假如我们生病了，不能织布、纺线，那么，神也仍然能够供应我们的需要。

【3】看那些百合花是多么美丽；看它们是怎样生长的；它们是从什么生长出来的。百合花的根是球根，像郁金香一样；冬天的时候，它们隐藏在地里，然而春天来到的时候，它们就迅速地生长起来。（因而，神的百姓也得到应许，以色列也将要像百合那样生长开放——何西阿书14章5节）。在几个礼拜之内，百合就会绽放出极其美丽的花朵。即使所罗门的衣服，也不如它们艳丽。所罗门是极其强盛富贵的君王；他的衣服极尽荣华，无疑是最美丽的、最昂贵的、最好的衣服；可是，这衣服却远远不如百合的芬芳与惊艳。所以，我们应当羡慕、并学习所罗门的智慧（没有人的智慧胜过所罗门），并用智慧来从事我们的职分工作；然而，我们不要羡慕所罗门的衣服（他的衣服还不如野地里的百合花）。知识与恩典使一个人得到完美——而不是他的外表美丽，更不是他的衣衫。这就是神借着野地里的草，给我们的教诲。任何被造之物的美丽与卓越，都是来自于神。神是它们的泉源。神赐马力量，赐百合花美丽；每一个受造之物，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来自于神。

【4】让我们思想，在这里所得的教导（30节）。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它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

（第一），我们不要为衣裳而忧虑；不要贪图华贵的衣服，不要以此为傲，不要对那些装饰物、装饰品沾沾自喜——因为，不论我们多么为自己

的衣服殚精竭虑，这些衣服也不会胜过那野地里的卑微的百合花。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试图和它们竞争呢？它们的装饰很快就会凋残，我们的也会如此。它们今天还在，明天就要被扔到炉子里；我们身穿的衣服也一样，很快就会磨坏、掉色、破败、变形；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以赛亚书40章6-8节：“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尤其是富人，也要如此（雅各书1章10节：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

（第二），在必要的简朴衣服之事上，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放在神的身上一——耶和华以勒，他必为我们预备。神把那美丽的衣服赐给野地的百合，因而，神更会看顾我们。若他把那些美丽霓裳给了野地的草，那么，他更会把适当的衣服赐给他的儿女——使他们温暖舒适。你是更加尊贵的受造之物，是更卓越的。若神把衣服赐给那些转瞬即逝的野草，那么他一定会更加把衣服赐给永生的你。即使尼尼微的儿女，也要比蓖麻树更受神的看顾（约拿书4章10、11节），更何况锡安的女儿呢——你们是与神立约的民。这里，耶稣称那些听众为“你们这小信的人啊”。——1. 这是对那有真诚信心之人的鼓励。你们是有信心的，尽管信心很软弱。这信心使你们能够得到神的特别看顾，得到神的应许与供应。有大信心的人应当受到称赞，也会得到更多的赐福；但是，小信的人，并不会被神离弃。我们虽是小信的人，然而我们都能够得到神在饮食、衣服上的供应。神会看顾那些信心软弱的人。在神的家里，那些在信心上是婴儿的人，与成年的人一样，都会

得到神的特殊看顾与恩慈。你们不要说，我只是一个婴儿，我是枯树（以赛亚书56章3、5节）；你虽是贫穷、缺乏的人，但是主要顾念你。——2. 这也是对那小信之人的责备。虽然你们有真诚的信心，但是你们的信心是小的、软弱的。主耶稣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在我们的忧虑与烦恼的背后，真正的症结是什么；我们的信心是小的；在我们里面，还有不信之心的残余。如果我们想要有更大的信心，就不要忧虑。马太福音14章31节：你 这 小 信 的 人 哪 ， 为 什 么 疑 惑 呢 ？

3. 你们哪一个有智慧、有力量，能够用思虑使自己的身量增加一肘，使寿数增加一刻呢？诗篇39篇5节：“你 使 我 的 年 日 ， 窄 如 手 掌 。 我 一 生 的 年 数 ， 在 你 面 前 ， 如 同 无 有 。 各 人 最 稳 妥 的 时 候 ， 真 是 全 然 虚 幻 。” 让我们思想，（1）我们的身量和寿数，并不是我们的思虑的结果，而是神的意旨安排的结果。一个人能够从婴儿长到六尺高的身材，是怎么回事呢？他并不是靠着自己的预测或是思度；他是在不知不觉中长大——因着神的大能与良善。那造我们身体的神，那赐给我们身量的主，必会看顾我们，供应我们。在我们身体的成长中，我们必须归荣耀于神；我们必须完全地信靠他，倚靠他在一切事上给我们的供应。神已经向我们显明，他顾念我们的身体、成长、年岁。那一直以来养育我们至今的神，岂不会仍然顾念和看顾我们、直到永远吗？

（2）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身量——若有人想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愚妄和荒谬的。如果有人殚精竭虑、辗转反侧、绞尽脑汁地想要改变自己的身量、让自己的身高增加一肘，那么，他一定会失望的。所以，我们最好满足于我们现在的境况！我们的身量和身高彼此不一，但我们之间的区别也并不是很大；这种区别也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一个矮个子的人，也能够做成一个高个子的人所成就的事业。从我们的身量上，我们也同样应当明

白，不要贪图属世的富贵与财富。【1】正如，我们应当满足于自己的身量；所以，我们也不要贪图世界的财富。【2】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处境中，随遇而安，就像我们满足于自己的身量一样。在环境条件中，我们努力取得方便；在逆境中，我们努力争取做到最好。我们不能改变神的意旨安排，因而，我们要在环境和际遇中尽量去适应、努力、奋斗。

4.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32节）。贪恋世界、忧虑明天、思虑属世的事，是世人的罪；然而基督徒们不应当为这些饮食衣裳的事情而忧虑。外邦人在寻求着这些东西，——因为他们不认识那更好的事情。他们渴望这个世界，——因为他们不认识那更好的天国。他们在追求世事的时候，内心充满了焦灼和顾虑，——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认识那造物主、神，他们更不明白神的意旨安排。他们畏惧和敬拜偶像，但是却不知道怎样去信靠那些偶像；他们也得不到那些偶像的拯救和供应。所以，他们的内心深处，满是焦虑忧愁。然而，基督徒不要为这些饮食、吃穿的事情忧虑；——因为他们不仅明白神的意旨安排，更明白神的美好应许；神教导他们，应当信靠主，轻看这个世界。我们不应当像那些外邦人那样，满脑子里面、所有的心思里面，装的都是这些今生的思虑、世俗的意念。

5. “你们需用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神知道我们的需要，胜过我们自己知道。虽然他在天上，他的儿女在地上，然而他查看、并看顾那些贫穷而卑微的人（启示录2章9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们的天父爱你们，怜恤你们，愿意帮助你们，愿意供应你们的所需。所以，我们的心里面不要有忧伤和忧虑。把我

们的渴望，都告诉他，交托在他的手中。神知道我们的缺乏，也愿意我们向他倾诉心肠、敞开心扉。让我们欢欣地来祈求和倚靠神的智慧、力量、大能、良善，来供应我们的所需。彼得前书5章7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你们为什么还要自己忧愁呢？若神顾念你们，你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6.“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里包含着双重的意义。（1）你们不要为身体饮食吃穿这些事情忧虑，因为，你们有更重要的、更美好的事情，值得你们挂念。这关乎你们的灵魂、永远的生命、永恒的幸福。“只有一件事情是不可少的”（路加福音10章42节）。这才是你的全部心思意念所应当集中的地方；然而，你的心却常常被今生的思虑和忧愁占满。如果我们真地想要得到神的喜悦，如果我们真地渴慕神的救恩，——我们就不应当为那些属世的、满足我们肉体血气的事情而去乞求、忧愁，也不应当在这个世界上立志去为自己建立产业。若我们真正关心我们属灵之事，就不会被今生的思虑忧愁所羁绊。（2）你们有一个更直接、更简单、更确定、更容易的方法，可以使你们得到饮食吃穿这些东西，就是——首先应当求神的国，求神的义。你们的信仰，应当是你们的首要之事；那么，即使在这个世界上，你们也将会得到看顾。

【1】我们最大的职分、全部的职分，就是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才是我们应当全心挂念的事情。我们要把信仰当作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的职分就是寻求、渴慕、盼望、注目于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是我们在新约中

所得的恩惠——尽管我们不完美，尽管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都软弱和失败，但是，若我们的寻求是真诚的（真诚的渴望与热忱的生命），那么，我们就会被悦纳。（第一），寻求的目标——神的国、神的义。我们必须以天国为我们的目的，必须以圣洁为我们的道路。“你要把天国的恩典、安慰、荣耀，当作是你的真正幸福所在。注目于属天的国度；勤勉地为之努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寻求天国的荣耀和永恒；渴慕天国的祝福，远远胜过渴慕地上之事”。如果我们的信仰不是指向天国，我们的信仰就毫无意义。寻求天国的幸福，寻求神国的义。神的义要在我们的生命中体现出来。神的义应当是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我们的义必须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必须追求和睦与圣洁（希伯来书12章14节）。（第二），这是基督对我们的命令。我们必须首先寻求神的国、神的义。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灵魂之中，这些要完全占据你的所思所想。你在今生之事上的思虑，必须要服从于对那将来之事的渴盼。我们必须寻求神的事情、基督的事情，远胜过我们思索自己的事情。如果在基督的事情与我们的事情之间，有不一致甚至冲突，那么，我们必须牢记，什么事情才是真正重要的。“你们要首先寻求这些事情；要在你的日子里，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要把青春和生命，都奉献给神。你必须要早早地求神的智慧；人的一生，应当从敬虔开始。你要在每一天里，都求神的国、神的义。你要在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在满脑子里面、满心之中，都是这些心思意念”。让这成为你人生的原则，成为你所愿意做的最重要的事情。让神成为你生命中的元首。把你生命中的初熟的、最好的、一切的果实，献给神。

【2】恩典的应许——“这些都加给你们了”。你生命中所需的饮食吃穿，等等，就都会赐给你。你将要得到你所寻求的，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你的诚挚、热切的祈求，绝不会落空。除此之外，你也会得到饮食衣裳。

提摩太前书4章8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惟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历代志下1章11、12节：“神对所罗门说，我已立你作我民的王。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民。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也必没有这样的。”——啊，如果我们深深地相信这里所说的话，那么，在我们的心里、生命之中，将会有何等大的、蒙祝福的变化——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得到慰藉的真正方式：是把我们的心瞩目于另一个世界！如果我们勤奋努力、为要得到神的国、神的义，那么，神就会给我们预备此生之中的一切所需。耶和華以勒——主必为我们预备；而且，主更要把远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事赐给我们。我们信靠神给我们所预备的天上基业吗？我们愿意信靠神给我们的、通往天上基业的、此生的杯吗？神的以色列，不仅是要最终被带入那迦南美地；而且，神的以色列，也要被带领、经过旷野漂泊的艰辛。啊，我们若真的是越挂念那所不见的事、那永恒的事，那么，我们就越不会忧虑这眼前的、暂时的事情！我们越求神的国、神的义，就越不需要担心此生的事情！创世纪45章20、23节。

7.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34节）。我们不要为未来的事情不恰当地烦忧，因为每天都有应当承担的事情；每天也都有每天的力量与供应。

(1) 为明天的忧虑是不必要的。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若每天当中都有患难和缺乏，那么，每天也都有崭新的救助与供应。耶利米哀歌3章22、23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他。”以赛亚书33章2节：“耶和华阿，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作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以斯拉记3章4节：“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我们应当每日做好每日的工作，持久地、不断地倚靠神。明天的工作，自有明天的力量去做。明天的担子，自有明天去承担。既然：——明天，以及其中的一切事情，都是神以大能和智慧而给我们预备的、不是我们自己所预备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没完没了地为明天而焦虑、烦忧呢？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当用谨慎的远见、来做相应的筹备措施。但是，若我们有烦躁不安、烦忧焦虑、急躁不耐、惊慌失措、杞人忧天、患得患失的态度，就是不对的。我们不应当沉溺于那些对未来患难之事的的不恰当的忧虑。我们所忧虑的未来的难事，并不一定会来；就算会来，到时也可能会容易地处理。主对我们的命令是，——谨记当前的职分，并把寄托、倚靠的心，放在神的身上。每天做好每天的工作，明天的担子明天当。

(2) 为明天而忧虑，是一件愚顽、有害、私欲的事情。许多富人，许多哀怨的人，都落在这个网罗中。他们的忧虑，把他们的心都刺透了。今日有今日的难处，我们不应幽怨地为自己积累更多的重担；也不要明天明天的忧虑，来压垮今天的日子。明天究竟会有什么患难，今日并不确定；不管它们是什么，等它们临到的时候，有足够的时间去为它们忧虑。我们要信靠

神在意旨安排之中的智慧。这段话的总结就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命令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在我们每日的祷告中，我们从神那里得到力量，敌挡试探，信心坚定。任何事情，都不应当使我们的信心动摇。

【引述 爱的真谛 我若没有爱，就是鸣的锣、响的钹一般，就是舍己身、让人焚烧，也没有用处。。。】

哥林多前书13章：

现在我要把更高的道路指示你们。 1我若能说世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2我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甚么。3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人，又舍己身被人焚烧，却没有爱，对我仍然毫无益处。

4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5不作失礼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6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7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8爱是永存不息的。先知的讲道终必过去，方言终必停止，知识终必消失。9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所讲的道也只是一部分；10等那完全的来到，这部分的就要过去了。11我作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想法像孩子，既然长大了，就把孩子的事都丢弃了。12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到那时就完全知道了，好象主完全知道我一样。13现在常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

（第二部分）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

金刚经的主旨就是否定主义，甚至否定的否定主义。简言之就是，无论关于“相”、“非相”、还是关于“法”、“非法”，都不应当执著。

整个佛教思想的总结、内容要点、与根本原则：——佛教的核心，是以佛的教导、以人的悟道为主旨，以修行等为形式，以复杂的关于超自然领域的经书讲说为教义，以“苦”、“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等观念看待人生与世界的本质，以寺庙中许多佛像等为偶像的敬拜对象，等等，——这样的一种结合民间迷信文化传统，与繁杂经书咒语教义等为内容的宗教。

金刚经所述的这种否定主义哲学，正是佛教的最主要内容之一，并成为佛教教义的最根本原则。

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如果说，佛教在中国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历史中的流行，有什么重要原因，那么，佛教的关于“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这样的教导，是值得肯定的。

这样的教导，使得人自己至少能够尽量在外在行为层面、在社会层面，不做那些杀人放火、偷鸡摸狗的坏事，或使得人在自己做坏事之前，至少有一定程度上的约束。

然而，以金刚经为核心教义之一的佛教，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方面是错误的；仅举以下几例。

空：从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为入手处，把客观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与实际性在根本上彻底否定掉。

苦：人生命的本质是苦的，是应当摒弃、看破、舍得的。没有看到人生命价值本身的可贵性、高贵性。没有看到人生命价值的真正积极意义。因而，无法有正面的、积极的、热忱的信仰与意义。

罪：没有看到罪的真正本质是什么。没有针对罪的坚决的、终极性质的斗争。

偶：在信仰实践中，偶像泛滥，对那些人手所作的金像、银像、石像、木像、等等顶礼膜拜，用那些又聋又哑的偶像，取代了全知、全能、全在的永生之神。

悟：佛教强调人的“悟”道；人在信仰中所得到的功德、利益、智慧，等等，是出于人自己的“悟”、“智慧”等等优点、优势、好处；因而，在佛教的信仰中，虽然也看似要人谦卑，但实际上，人却会在内心深处成为一个最骄傲的人。

修：佛教所强调的“修行”，也会导致与上面相同的一个事实上的结果，就是，那些所谓的有道高僧，却实际上在内心深处成了以自己为义的、自高骄傲之人。

义：在佛教教义中，并没有关于正义、真理、公义等概念的终极源泉的阐述。换言之，在佛教中，关于究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道德法则的根本基础、来源、根基在于什么，等等这些，并没有一个清楚的回答。

冗：在佛教经书中，对于超自然的世界，有许多冗长的、细节性的、“活灵活现”的描述。但是，这些事情难道不是出于人自己的主观臆想吗？谁又能真正凭着什么合理的证据和根据，而显明那些事情的真正客观性呢？

什么是区别善与恶的标准：——只有在以上天、上帝、造物主为中心的信仰中，我们才能够看到区别善与恶的根本标准所在。那永生之神自己是道

德法则的颁布者，是道德品质行为的终极审判者。上天把对与错、是与非、善与恶的根本观念放置在每一个世人的心中，并必将终极而公义地审判世上一切的世人。神是监察人内心的神。罪人必将要承受永远的、公义而圣洁的、终极的惩罚。

行善与积德；行善是为了什么：——固然，我们应当在这个世上尽力行一切良善之事；然而，我们行善的动机是为了什么呢？我们真的有一颗良善的心吗？所谓良善，绝非仅仅是看我们的行为如何，而更重要的，是看我们的内心如何。我们行善如果是为了自己积德的目的，如果是为了自己益处的目的，那么，我们的所谓行善，就并非真的是良善的。

佛教思想的虚无、虚幻元素：——佛教中，把世事、人生等等的本质都看为是虚空、虚无、虚幻的。所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正是由于，佛教思想和教义在本质层面而言，是一种泛神主义哲学。这正是佛教思想之锚。

正是因为佛教不是以那上天、上帝、造物主为中心，所以，佛教看不见这个世界是出于那位至善至美、永生之神的创造，更看不见：——我们人的生命是按着造物主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因此，我们才有生命、灵魂、心灵、自我认知和自由意志。

泛神主义——佛教思想之锚：在佛教与泛神主义中，世界的本源，或许是什么超自然的力量、机缘、因果、轮回、佛法，等等，但是，那个本源却

是没有位格的，即，那个本源并没有一个“自我”的身份，也更没有一个至善至美、全能的、全知的自由意志。

简言之，在泛神主义者看来，世界的背后，并没有那样一位全能的造物主；世界本身就是神，或世界本身就是自我存在的，或世界本身就是虚空的，等等；主宰世界的，并非是一个有位格的、有无限智慧、能力、有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的永生之神，而是一个无知无觉的力量、因果、理、等等。

=====

（第三部分）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

所谓佛法者，就是对一切法、相、道等等的否定；甚至，是对自己的否定。

佛教思想所擅长之处，在于“拆毁”，在于除去人的执著；然而，却不长于“建立”。

真理在于何处呢？如果没有那位上天，没有那位终极的、全能的上帝，那么，这世上又怎么可能会有终极的、本质的、根基性的真理呢？如果没有

上天，那么这个世上也就没有了绝对的道德法则，没有了绝对的真理。

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回答，我们世界的本质、来源、归宿、意义是什么；我们人生的本质、来源、目标、目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道德法则的本质与内容是什么。

永恒、终极、隽永、等等，又是什么呢？——如果没有那位上天，没有那位终极、全能的上帝，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人生中，就不可能有什么永远的意义，也不可能有什么所谓的永恒。

+++++

+++++

+++++

+++++

+++++

+++++

+++++

+++++

+++++

+++++

+++++

+++++

+++++

+++++

+++++

[illegible]

+++++

+++++

+++++

+++++

+++++

【反思：一个世界，许多个神；两个世界，一个神】

在这个世上，有许多所谓的“民间宗教信仰”、“拜拜”的传统。然而，且不说其中充满了多少封建愚昧迷信之事，即使就粗略的一般性、总体特点而言，我们也常常总是能够看见，在它们之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共性；——这个共性就是，在它们之中，“只有一个世界，却有許多个神”。换言之，他们的信仰的目的和出发点，都不过是为了要在此生、或是自己眼睛所能够看见、自己的私利之心灵所能够想象到的世界里，得到什么属世的益处、功德、利益、等等。为此，他们以人的私意和臆想，构建出许多所谓的神灵；那些神灵各管一摊、各负责一面，然而其实，它们都不过是哑巴偶像而已。

【引述 圣经 马太福音6章】

“一个人不能服事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事 神，又服事金钱。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难道生命不比食物重要吗？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

你们看天空的飞鸟：它们不撒种，不收割，也不收进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们；难道你们不比它们更宝贵吗？

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

何必为衣服忧虑呢？试想田野的百合花怎样生长，它们不劳苦，也不纺织。

但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最威荣的时候所穿的，也比不上这花中的一朵。

田野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进炉里， 神尚且这样妆扮它们；小信的人哪，何况你们呢？

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这些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